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美] 兰登·华尔纳 著
姜洪源 魏宏举 译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总主编 宿白 执行主编 荣新江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美] 兰登·华尔纳 著 姜洪源 魏宏举 译

以穿越漫长古道的冒险经历和对古老石窟的考察研究在中国西部广袤的大地书写了一个外国探险考察者最经典的篇章。享誉世界的敦煌千佛洞让他名扬天下,也引发了有关文化遗产的聚讼。探险者的经历、旅行者的见闻与劫掠者的心态尽显于本书之中。



ISBN 7-228-06206-X/K·934 定价:31.00 元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美] 兰登·华尔纳 著
姜洪源 魏宏举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美]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2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宿白主编)

ISBN 7-228-06206-X

I.在… II.①兰…②姜…③魏… III.敦煌(历史地名) —
游记 IV.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55 号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美]兰登·华尔纳 著
姜洪源 魏宏举 译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10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ISBN 7-228-06206-X/K·934

定价:31.00 元

序

荣新江

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在中国人眼里,他因为用化学胶水盗取敦煌莫高窟精美壁画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来敦煌考察的外国探险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在日本人眼里,他却因为被看做是京都和奈良免遭美军飞机轰炸的功臣而成为日本文化的救星,日本人为之树碑立传。中国的敦煌和日本的奈良,都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精华所在,为什么华尔纳一方面成为中国文化宝库的毁坏者,而另一方面却成为日本文化宝藏的保护者呢?我不想代读者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把华尔纳自己的陈述和有关华尔纳敦煌考察的前后史实尽可能丰富地提供给读者,让读者获得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印象,然后自己去解答这个问题。

华尔纳在中国最出名的事,就是他曾两次率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和发掘。第一次考察于1923年7月至1924年4月间进行,华尔纳用化学胶水揭取了十几方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精美片段,并贿赂王道士,携走现编号第328窟的唐代半跪式菩萨像一尊。他的考察游记《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6)一书,于1926年在纽约出版。第二次考察于1925年2~6月间进行,主要目的是

想用化学胶水粘走现编号第 285 窟(西魏时代)的全部壁画。但由于华尔纳上一次盗取敦煌壁画的手法极其恶劣,引起地方民众的极大不满,而且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华尔纳的行径对中国文物的破坏性,北京大学特派陈万里随行监视,燕京大学洪业教授也转请教育部通知甘肃地方官府予以防范,因此考察队在敦煌当地受到地方官绅和民众的阻止和反对,华尔纳的计划完全破产。随后而去的华尔纳本人则被同伴在肃州截住,根本没有到达敦煌。考察队把目标转向安西榆林窟,在地方官府和百姓的严密监视下,仅仅工作一周而结束。华尔纳这一次的考察成果为《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Buddhist Wall-Paintings: 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 Fo H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一书,迟至 1938 年才出版。这本小书,从分量上来说,实际只能算是一篇长文章,而不是他第二次敦煌考察的全面记录。

幸运的是跟随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旅行的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把自己的日记很快整理成书,题为《西行日记》,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于 1926 年由北京朴社出版,为我们提供了考察队活动的全面记录。

20 年代的敦煌,除了华尔纳的两次考察,除了华尔纳的两本书和陈万里的著作,我们知之甚少。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敦煌学史上的知名著作,向来为研究敦煌学的学者所重视。但华尔纳的书不像斯坦因、伯希和的敦煌游记那样早已译成中文发表,因此中国学者和普通读者实际上并不了解华尔纳及其考察队的全貌,也很少利用华尔纳的这两本书。

多年来,我一直想把华尔纳的两本书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但苦于课业繁忙,没有时间亲自动手。1994 年,我应邀参加甘肃省档案馆举办的敦煌学会议,与该馆副馆长姜洪源先生同车从兰州赴敦煌。虽然他是学理工科的,但却对历史充满兴趣,尤其谙熟于甘肃

地方史。随即建议他翻译华尔纳的书,他欣然接受。因为工作紧张,他又邀约同事魏宏举先生参加翻译工作。华尔纳的游记写得十分散漫,20年代的文字,今天读起来也有些别扭;而他的论文又充满了专用名词,对于他们两位非专业的译者来说,是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明白原意的。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把这两本并不容易读的书翻译了出来。

考虑到陈万里先生的《西行日记》构成了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也请姜洪源先生从原书过录下来,作为附录一并发表,以便读者相互参考。

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华尔纳本人,我约请兰州大学王冀青先生为本书写篇序言,介绍一下华尔纳的整个生平,因为他是我所知目前国内研究西北探察史的最佳学者,所收集的资料无有出其右者。谁知他一动笔,就不可收拾,《华尔纳与中国文物》一文写完以后,竟有八万余字。他谦虚地把序言再推给我,而把他的文章作为解说,附录书后。

王冀青先生的文章,几乎集合了所有已经发表的材料,加上他多年来在英国所收集的未刊书信、档案,对华尔纳其人其事,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这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陈万里《西行日记》三部书产生的背景,而且还可以使读者从华尔纳自身的性格、言行,中国现代学术界和民众的民族意识、反帝情绪,以及敦煌当地官绅的态度等多层面、多角度地审视华尔纳及其在敦煌的所作所为。王冀青先生在细致的描述之后,对华尔纳的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中肯的看法,也提示读者在阅读华尔纳著作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我对华尔纳及其考察队素无研究,但以能够先读到王冀青先生这样一篇大作而觉得充实了许多。他的文章因为太长而无法作为序言,但我建议读者在读了当事人的原始记录以后,还应当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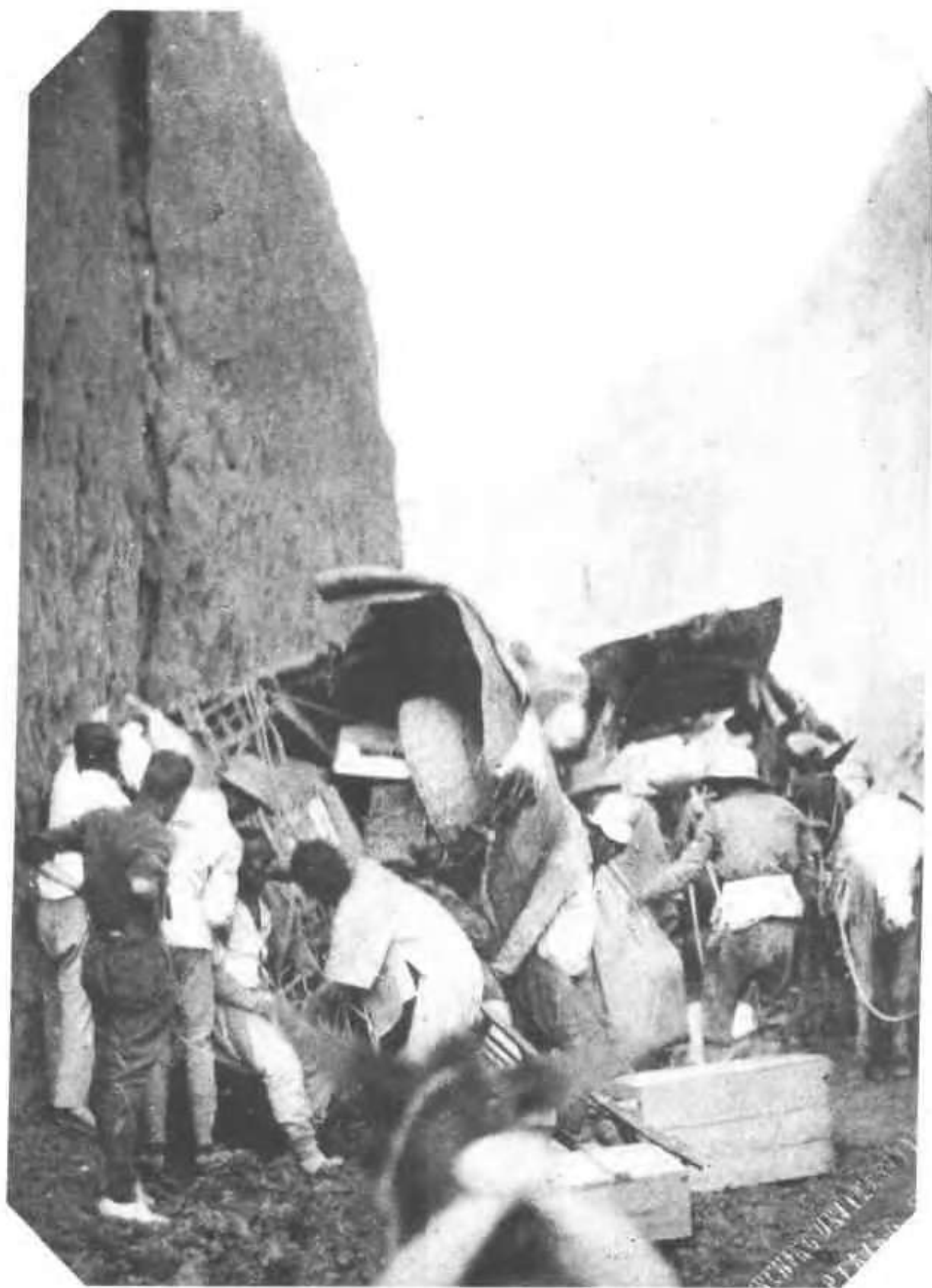
心来仔细读一遍王冀青先生的大作,他的文章虽然不是序,但已经把序言要说的话都讲给了读者,我这里只不过是交待一下成书经过而已。

由于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做些编辑上的工作,所以把他们几位的稿子一拖再拖,心里十分过意不去。现在总算把书稿辑成,相信这本书集合了已知的有关华尔纳敦煌考察的主要文献和研究成果,对一般读者和敦煌学研究者都是十分有用的。

2000年1月18日于北京大学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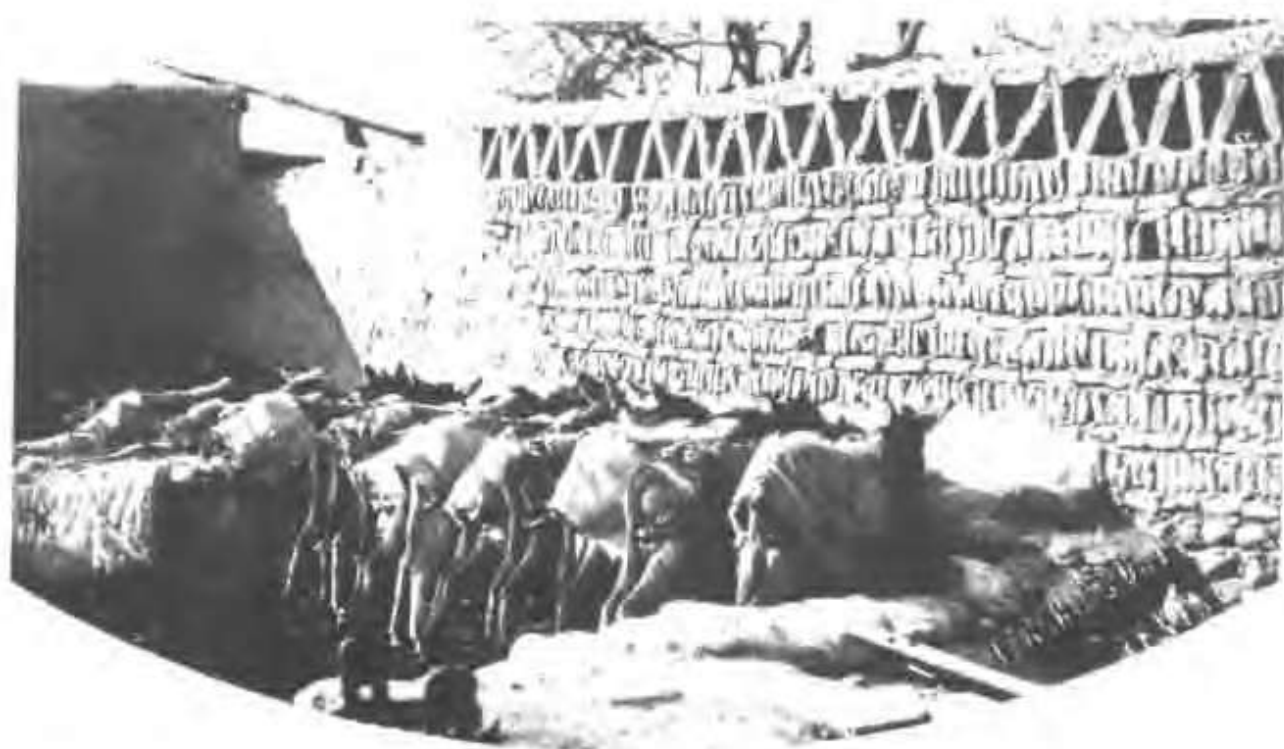
敦煌大佛



图一 道路堵塞



图二 城门



图三 通过西北的公路从新疆运来的绵羊



图四 一个拓碑者



图五 渭河河湾



图六 彬州城外的大佛



图七 象洞里的塑像



(a)



(b)

图八(a,b) 象洞里的公元6世纪的佛像



图九 在象洞里



图十 通过冰河



图十一 羌谷河的两幅运景图



图十二 西大门通道和护墙



图十三 从东大门远眺



图十四 城门外搭建的帐篷和工作间



图十五 被挖掘的寺庙地面



图十六 沙漠吞噬的古城



图十七 沙丘与庙宇



图十八 长城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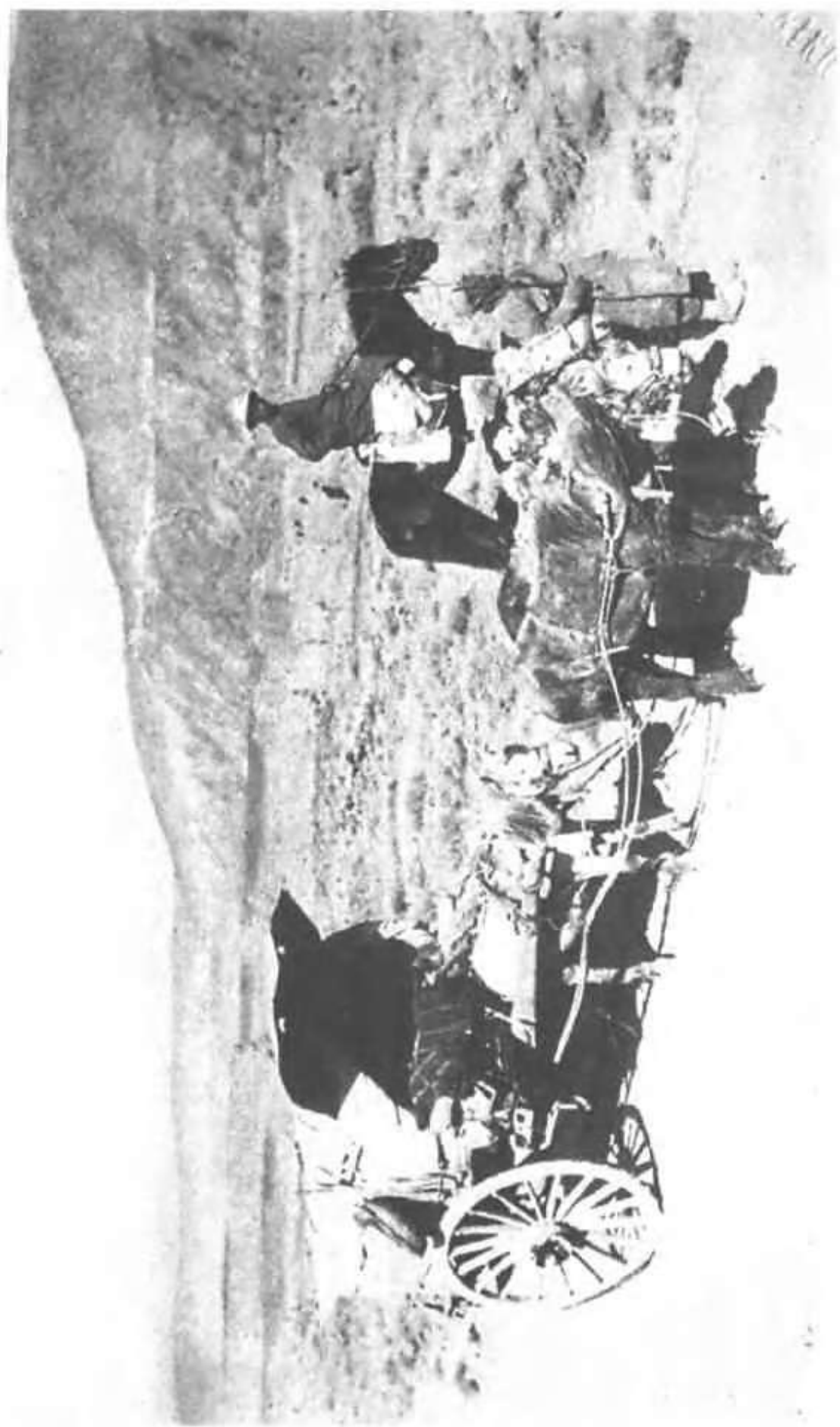
图十九 敦煌石窟



图二十 敦煌石窟公元9世纪的塑像



图二十一 现存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敦煌彩塑



图二十二 归途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已出书目

-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瑞典]斯文·赫定 著
- 《丝绸之路》 [瑞典]斯文·赫定 著
- 《西域考察与研究》 马大正 王岐 杨镰 主编
- 《罗布泊探秘》 [瑞典]斯文·赫定 著
- 《外交官夫人的回忆》 [英]凯瑟琳·马嘎特尼
戴安娜·西普顿 著
- 《新疆考古记》 [瑞典]沃尔克·贝格曼 著
- 《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 马大正 杨镰 主编
- 《橘瑞超西行记》 [日]橘瑞超 著
- 《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 [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著
- 《重返喀什噶尔》 [瑞典]贡纳尔·雅林 著
- 《蒙古的人和神》 [丹麦]亨宁·哈士伦 著
- 《游移的湖》 [瑞典]斯文·赫定 著
- 《新疆游记》 谢彬 著
- 《我的探险生涯》 [瑞典]斯文·赫定 著
-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美]兰登·华尔纳 著

346/03

● 西域探險考察大系

总主編 宿白 执行主編 荣新江

目录

序	荣新江(1)
第一章 难忘的西北之旅	(1)
第二章 中国古都西安	(18)
第三章 西行之路	(25)
第四章 象洞	(33)
第五章 从六盘山到兰州	(40)
第六章 凉州	(47)
第七章 俄国难民	(52)
第八章 驼队	(58)
第九章 沿黑河而下	(63)
第十章 额济纳——马可·波罗时代的城市	(70)
第十一章 中国沙漠之冬	(81)
第十二章 吞噬庙宇的沙丘	(93)
第十三章 敦煌	(99)

第十四章	千佛洞	(110)
第十五章	归途	(116)
附录一	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	
	华尔纳(133)
附录二	西行日记	陈万里(181)
附录三	华尔纳与中国文物	王冀青(291)
译后记	(436)

第一章 难忘的西北之旅

我们的身后横亘着太平洋,我们的前方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纷繁的政治时局——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还要在贫瘠荒芜的中国土地上进行为期几个月的艰难跋涉。

在坎布里奇全力投入研究之前,霍拉斯·翟荫(Horace Jayne)^①和我就对此行成功的可能性做了相当充分的计算。我们的案头上摆着马可·波罗和斯坦因^②的有关资料以及伯希和^③在千佛洞的笔记,地图上标示出法显^④走过的古老的商道,这正是我们希望探索的那条道路。如果此行成功,那就意味着可以为东方艺术宝库增添一两项新的内容。

① 霍拉斯·翟荫(Horace Jayne),任职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是华尔纳此次中国之行的同行者。

② 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英国考古学家,原籍匈牙利。190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我国的新疆和甘肃,曾从敦煌藏经洞窃取珍藏了千余年的大量写经、古写本、佛教绘画等,现藏于英国图书馆。著有《古代和田》、《塞林提亚》、《亚洲腹地考古记》和个人旅行记《契丹沙漠废址记》、《在中亚的古道上》等。

③ 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汉学家。曾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1906~1908年活动于我国新疆、甘肃一带,窃取敦煌藏经洞大量珍贵佛教文献和文书,运往法国。著有《敦煌石窟图录》等。

④ 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今临汾县)人,东晋高僧。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是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印度、斯里兰卡及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

但是此刻,在北京单调乏味的旅馆卧室里,忧虑之情油然而生。地图、鞍囊、打字机以及为我们在夏季和冬季准备的各种必需品乱七八糟地堆着。我们再一次审视了面临着的问题。河南边界和它的西边猖獗的盗匪活动;在甘肃,有可能甘肃以西也存在的穆斯林暴乱;西去的旅途上首先会遇到暴雨及道路泛起的泥浆——紧接着又是干旱和酷寒的沙漠。那些珍贵的敦煌壁画还会剩下多少呢?如我们所知,俄罗斯囚犯就曾把他们的名字乱涂乱抹在精美的壁画上,^① 而且有理由担心,那些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早已把壁画剥光了。羌谷(Etsin Gol)^② 地区 11 月份适于居留吗?水源如何解决呢?哈佛大学好不容易为此申请的经费,这是冒此风险的真正契机吗?等下去的结果是更糟呢,还是更好?

然而,想像往往对缜密的思虑是一种嘲讽。来自印度的僧侣们越过世界屋脊;可怖的盐沼荒漠;考古学家们使用的带尺和经纬仪;蒙古的游牧部落;皇帝的使臣们;从印度运来的绿宝石,从中国运走的丝织品;马贩、乞丐——在游历中所见到的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壮丽景观,肮脏污秽、苦难的呻吟以及辉煌成果——总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无法驱除。

法国、英国、德国、俄国和日本派出的所有学者都是经行这条路线的。从那里,17 世纪以前以富于冒险精神而著称的学者们,把神圣的佛经从印度带到中国,并且翻译成汉文。再上溯三百年,一支探险队也曾经过上述路线,人们赞誉探险队坚韧不拔地领导、带领他们来到里海的沿岸地区。沿着这条路从中国运出去的用马

^① 指 1920 年 11 月到翌年 8 月,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沙皇旧部约 900 余人,盘住千佛洞,建灶烧饭,损坏壁画。

^② 羌谷(Etsin Gol),即羌谷水,黑河的古称,又称为居延水、弱水,今又名额济纳河。发源于祁连山北麓,流经甘肃的山丹、张掖、临泽、高台、金塔,进入内蒙古的额济纳旗,是到达黑城(喀拉浩特)遗址的必经之路。

匹和玉石换来的丝绸一直抵达波斯的辖地和阿拉伯商人手中,起初这并不经意,后来则变成了蓄意所为。这条路一直通到衰落的罗马和希腊的殖民都市,当时的纨绔子弟把这些零散的和成捆的染色织品用于礼服上的镶边料。假设这条路的开通时日向后推移,人们就不会再对久远的事情津津乐道,如果不久以前在这条路上发现了陶瓷碎片,并且顺着这条路不至于把我们导入歧途而在特洛伊(Troy)发掘出了玉斧,那么,当米诺斯(Minos)在卡诺斯称王,特洛伊王^①的城邦被夷为平地时,人们就会在这里与西方人进行贸易活动了。

在我们对执意要走的这条西行之路“选择最佳方案”的心烦意乱的那个月,一个偶然的下午,我们路过一家店铺,发现店中古物的价格标得很可疑。欧洲和美国的领事馆办事处帮我们了解到,在林城(Ling Cheng)一带遍布盗匪,每天的报纸都有河南边界抢劫事件的报道,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必经之地。尽管许多胆小的中国人将这条路视为畏途,但仍有少数外国的传教士受其职责的驱使而义无反顾。

到我们临出发的那个月,我拜访了我的老相识、好心的吉尔伯特(Gilbert),他已经有两次中亚旅行的传奇经历了。有一次,他轻松自在地骑着一头跛腿骡子,从一个沙漠绿洲到另一个沙漠绿洲,历经三年。他混迹于牧人部落和乞丐团伙中间和他们神聊,极力宣扬威廉斯博士那些出了名的激进论调。他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以超乎寻常的美国人的悠闲方式去冒险。直到那头骡子跌跌绊绊地又返回到了铁路线的终点^②,他才回到公使馆。从那以后,我在北京又和他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某地发生了特别的冲突,他

① 古代希腊传说中特洛伊战争期间在位的特洛伊王。

② 铁路线的终点,在当时指河南洛阳。

正准备动身去传教,把真主的声音带给在那里等候的伊斯兰教教徒们,转告他们,皇帝(Kaiser)实际上是恶魔而不是穆罕默德的化身。由于我是到另一个地区进行类似的新闻报道,互相都觉得事关重大而故作神秘地假装看不见,这样,在寂寞的旅途上我们分手了。吉尔伯特也出身哈佛大学,在学校他就是个活跃分子,尤以文笔见长。那个时候,在那个遥远的中国城市里,有三分之一的外国居民为了他们的生存而正发生着械斗,他们频繁地出入于旅馆,并且在易于躲藏的地方把白骡子拴起来,借着月光擦干他们手上的血迹。如果吉尔伯特掌握了这些线索,我就一定恳求他为了后代把这些发生在那儿的械斗记录下来。

此刻,在公使馆的聚餐会上,我们久别重逢又第三次见了面,他提出要为我引见吴大帅^①以便为我们的西行提供安全保障。他对这次旅行倒不认为有什么困难,仅仅对有到西部去的机会感到意外和惊喜。而我们竟把时间白白地耗费在北京,我们理所应当要听取这个善意的忠告。

为了报答哈佛大学当局的恩惠,我已经疾步环绕了地球的一半,身临其境方感到这头中国雄狮好像没有当初认为的那样令人敬畏。以往,以印象中的全部事实和并不熟知或者并不充分的理由作为真相而形成的结论,看来要加以改变了。

拿到了护照以后,我们考虑买枪的问题。至于在中国内地携带枪支,我想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常去实弹射击的停留地,在那里向中国入证明了我持枪的技巧和能力。另一件事是,那枝与我始终相伴的插入枪套里的左轮手枪,这枝枪非常安全地放在骡子饲料与炊具之间,自从康涅狄格制造厂出厂后还从未发挥出它的威力。最终,我们买了一枝和自动手枪性能一样的旧滑膛枪。我无

① 吴大帅“Fiedl Marshal”,也可以译为“军帅”,指吴佩孚,在北洋时期的公文里,有“军帅”和“大帅”的称谓。

法给我的那只旧的 45 毫米左轮手枪找到子弹,那枝枪曾经一直放在我的背包里,它是我以前成功旅行的见证。

乘火车去河南府极为便利。吴佩孚大帅的司令部就在河南府火车站以西四英里处,在那儿,我们将受到他的接见,这当然要感谢吉尔伯特了。我对有幸见到中国最显贵的“军阀首领”而充满兴趣。去年,吴大帅强大的军队把张作霖将军驱逐到了满洲,成了无可争议的统治中国西部的铁腕人物。他的司令部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园林建筑里,门前有一条整洁的大路。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士兵们正在路边种树并给小树浇水。这里有大量的玉米田,庭院里停放着运货车,俨然一座俄亥俄州农场在中国的移植。

一位漂亮的年轻秘书在一所简朴的布置着家具的房子里接待了我们,房间的墙上挂着用有色图钉钉住的地图。这位秘书一身丝绸长袍白得发亮,在灰暗的军服中间显得格外耀眼,他那纤细的手指和精心修剪过的指甲即便是女孩儿也不过如此。他讲的一口英语如同他的外表一样纯正,尽管这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来的。他告诉我们,吴大帅总是很忙,但等一会儿就会来。

当这位显贵快步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健壮。他身材瘦小,眉毛修长,声音缓慢而有力。他向我们致歉,说在这之前他正处理一批公文。我们通过王译员^①和他的私人秘书告诉他,我们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文化人,想到西部去而且渴望从他这儿获得沿途安全与否的消息。尽管他在留神地听,但仍在展开的文卷上浏览着。他当即向我们保证,如果有危险他可保证我们的安全,可以提供一支护卫队。并且解释说,匪患问题都是地方官负责处理的事情,他本人从没有考虑过清除匪患的琐事。

^① 指燕京大学学生王近仁,他曾两次随福格中国考察队去敦煌,担任翻译。本次为 1923 年,第二次是 1925 年。

当我们表示不希望被护卫队保护,以免被误认为是达官贵人,他却不屑一顾,说可以派十个士兵把我们一直护送到陕西省的边界。他仍在翻阅那些函件并不时地在上面签字,同时,吩咐传令兵准备快餐。接着,他谈起有关考古学和绘画问题,并且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水墨画。这幅画画的是—株枯朽的梅树,它的残干上展现出几枝柔软的枝条,枝条上冒出嫩绿的新芽,他说,他喜欢这幅画,认为它是新中国的象征。在这幅画旁边的一个名贵的木盒中,放着一片呈新月形的古玉,当他用一把小锤敲击它时,古玉便发出极其悦耳的声音。

我虽然很想继续他关于政治主题和总统选举的谈话,以平衡当时的谈话气氛,然而,我们单纯的西行目的不允许这种谈话扰乱我们的任务。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就起身出去了,接下来他安排我们和他及他的下属一小时后一起就餐。

饭厅里摆着七张圆桌,每桌六至八个人就座。我们和吴大帅及他的秘书坐在一起。窗外的庭院里,一支非常出色的军乐队正奏着军乐。有时,他们在奏乐当中突然以俄罗斯人的方式歌唱起来,颇为激动人心。在最初的半小时里,我们同靠近身边的军官们没什么可谈的,而我们杯子里的紫红色的葡萄酒却一再地被斟满。吴每次都把酒喝干,同时翻转手中的杯子在餐桌上旋转一圈,我们也只得一饮而尽。然后,他示意我们吃菜,餐桌上摆着羊羔肉、豆腐、炒蛋、汤团等六七种不同的菜肴。我们用袖子把筷子擦干净,站起来去夹圆桌那边的菜。

通过他的秘书,我们的主人向我们介绍中国的烹调技艺、兵士们的歌唱以及葡萄酒和烈性酒的制作方法,然而,对时局及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他却从未提到。我们边品着酒边吃着菜,我听到右边座上的身躯魁梧的参谋长打出了饱嗝。他那剪得短短的头发上和粗壮的脖子的褶皱里渗满了汗水,活像是被捕捞的鲟鱼刚从水里冒出头来一样。等最后一道菜吃罢后,吴大帅站起身来,以一个真

正的军人的声调大声宣布宴会结束。当我们走出这间房子时，发现所有其他参加宴会的人都以立正姿势站着不动，我们很自然地觉得自己非常荣耀。

知道吴很忙，我们不愿再占他的时间闲聊了，我们几个人连忙告辞，上了停在门口正在发动的汽车。护卫队也集合列队欢送。当汽车向河南府南城门开去的时候，道路变得狭窄了，原来是被路上的独轮车和卖食品和茶叶的小贩阻塞了，这好像是集市。从人流中通过简直太困难了。小商贩们的货摊儿一股脑儿地堆在店铺的前面，挤占了道路而且拒不腾让。光着身子的顽童不厌其烦地在我们的车前爬来爬去，年长的女人们像篱笆墙一样竖立在我们面前。然而，据我们所知，没有哪一个被轧死。

我们受将军的邀请，翌晨六时乘人力车再次去司令部与警卫队会合。这支警卫队是专门护送我们去龙门石窟进行一天的远足，到那儿要几十英里的路程而且要过一条河。翟荫、王译员和我骑的是矮种马，十六个司令部的骑兵前呼后拥地护卫着我们。傍晚前那个漂亮的秘书才赶到，因为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时候就没有练习过骑马，一直怯于骑乘。不过，也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将身体固定在马背上不动，双手紧紧地握住马鞍。当他骑在上面的时候，紧张得下巴颏儿都缩了回去，再也不讲什么英语了。这是他第一次骑马，不一会儿，他就从马鞍上颠了下来，但他不服输，强作笑颜，随即又重新骑到马上。由于一天二十五英里的路程，他在鞍座的前后挪动，又不停地催马赶路，臀部都磨破了。到了石窟前边，我建议他不要再和我们步行参观了，他很感激，在那儿留下来等了我们三个小时。明天他很可能会诅咒错生在中国，这个国家没有可供骑乘之苦的人受用的壁炉台。

两个骑兵军官意气风发，兴高采烈，相互追逐，我那匹矮种马和那两匹马相比就自愧不如了。伊阙河上的桥坏了，我们由平底

船渡运过岸。几如我十年前^①记忆的一样，石窟中的佛像及其巨大的守护神像高达六十英尺。有几尊造像出现裂缝，那是盗宝人把造像从坚硬的岩石上劈开而形成的，另外一些则是为了把头部敲落下来运到我们的博物馆而形成的。翟荫和我不再沉思于朦胧的宗教之中，我们躺在洞窟外一处平坦的草坪上。一群土鸽从高高的神像头顶飞进飞出，一只幼鹰猛扑下来，驱散了这群鸽子，当我们站起来的那一刻，成百只鸽子已经飞窜到河的浅滩上面了。

傍晚，我们骑着马慢跑着离开了石窟，在前面等着的那位秘书仍旧苦笑着等待，他已经备好了那匹温顺的牲畜的鞍座。天色已近黄昏，随着马蹄声唧唧地响，河南府狭窄的街道两旁扬起了一片尘土，最终我们散乱的队伍停在那个旅馆前。

两天以后，我们向西走了几个小时后来到了家旅馆，行李留下托运。那天晚上，负责托运我们行李的邮差和他的马车也到了这个旅馆，旅馆立即因车夫们的到来而热闹起来，那个邮差满脸堆笑。第二天，有位邮差给我们带来了一封信：

中国邮局

观音堂 8 月 23 日

诸位先生：

早晨好。一辆四轮运货马车到西安府收费七十美元，三头骡子运至同一地点收费一百零五美元，即每头三十五美元。这是他们提出的最廉价格，您若同意，将需预付十到二十美元订金。您启程时，一半费用须预先付讫。谨通知您。若此，翌晨出发是有绝对把握的。此外，您有贵国的国旗吗？每辆大

^① 十年前，即 1913 年。华尔纳携妻为在北京开办考古学校的事，曾来过中国，先后游历了上海、洛阳、大同、西安等地，这是华尔纳第一次中国之行。

车应插上一面旗子,否则,兵士将把马车征为军用。

您忠实的 周兴月

四个裁缝高高兴兴地缝旗子去了。这些旗会使人误以为美国陆军和海军在中国西部出现,但目的是防止对翟荫或者我的危害。首先我们必须为做旗子的裁缝们精心设计表示旗面大小的图样而且考虑了如何体现出我们国家的标志。虽然翟荫懂得一些星条旗的知识,但他拒不接受蓝色旗面上的星,而我想应该有。到底用不用星,在旗面上加五颗星恰不恰当,我们为此争论不休。我清楚地记得我在童年时代是怎样制作国旗的,那时,我以一颗真诚的心用纸剪裁并折叠出一面国旗,那上面就用了五颗星,我笃信不移。结果,这些无星点缀的旗子就算做成了,它们铺在床上一直连到床罩下边,像是一支船队扬起的帆,又像是幼童玩的一套玩具,我如鲠在喉。虽然最后还是把星添在旗面上,但这旗子简直与宪法修正案毫不相容,我看是没救了。我们知道要写下来我们所记得的星数并算出结果要花费许多时间。此外,我们俩都说不全四十二个州之外的州来,甚至当时每人怀疑另一个人对爱达荷州计算过两次。然而,这真是巧妙的安排,当裁缝打发他的伙计来问旗子的事,看到幅面太小,他就武断地给每面旗上选定了六颗星。这突然间好像合理了。那些土匪知道这数字意味着什么吗?几乎它们的一倍就是早期的十三个殖民地,与我们十三个人恰好相等,这数字的两倍也恰好象征一瓶白兰地酒的度数。

我们接受了最佳意见,内心无愧,与那些走这条路的传教士和中国商人相比,我们过分讲究的外表就是最好的保护措施。剩下的时间就是忙着装载运输和等待四个裁缝为每面旗子缝上六颗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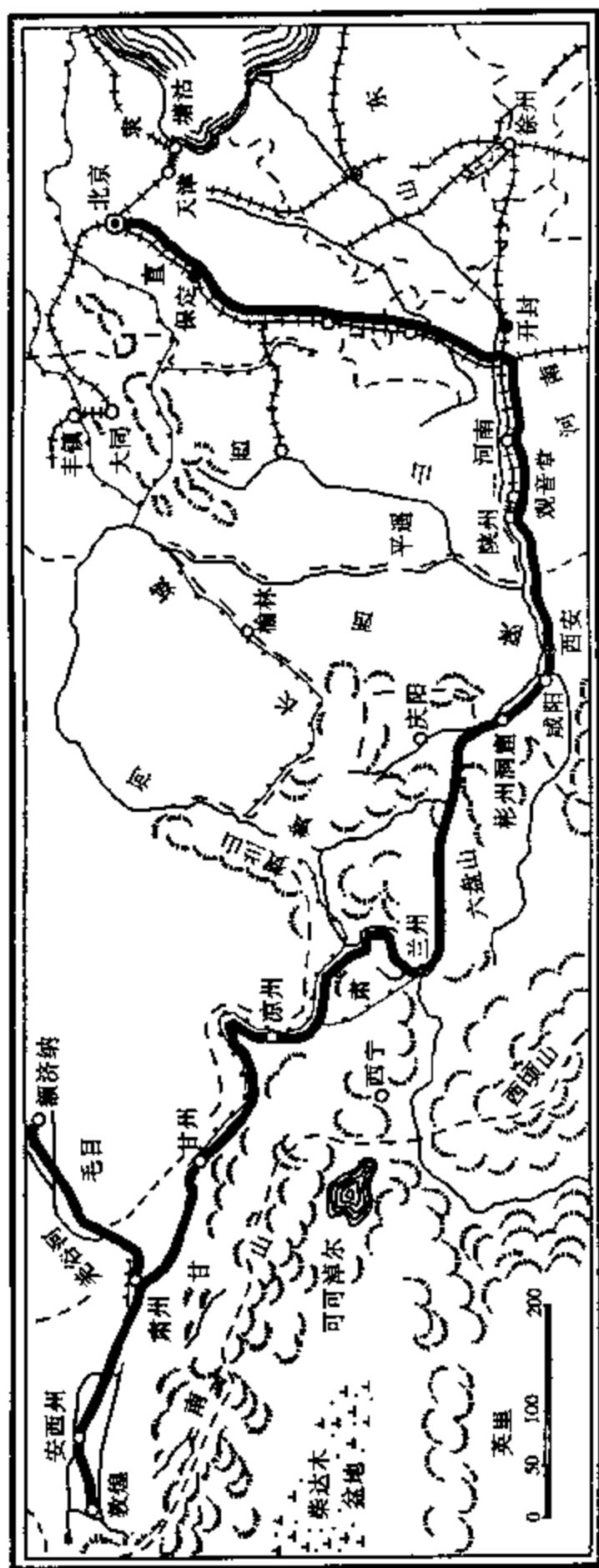
可恶的车夫们吵吵嚷嚷地要我们一次性付给受雇的全部费用,但我们也有相应的办法,他们必须在一份长期文书上签字,这

份文书已经由邮差代劳拟好了。文书规定,受雇方用大车把雇方的行李运到目的地,雇方在途中不同地段分期支付相应费用。面对这份文书,余怒未消的中国人只好到我们的卧室里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他们也似乎觉得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得到高报酬。之后,又为另外的事发生了小小的争吵,我们先给了分期付款的第一期应付的钱,这笔钱成了他们向西边偷运机制棉布和卷烟的投资。我们不久就发现了每辆大车都为装载的偷运物腾出了余地,而放行李的空间却大为减少,而我们为雇车所付的钱,是一所著名大学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资金。碗碟橱也被从铁路线终点作价得来的卷烟塞得满满的,在返程的路上还要运回更多的鸦片和其他禁运品,幸亏有这些六星旗和我们这些清白的外国人做保护伞,否则,这些禁运品是在劫难逃的。

我们通常都是在黎明前出发,午夜前一小时左右休息。整个前半夜都耗在琐事上,绑紧行李,搭好马车篷等。睡觉时这些都已经预先准备好了,但拂晓时还要花很长时间来重新整理。挽具是车夫从别人那里拿来的细绳补缀的,为此,我们向他们保证买一套新的。

翟荫和我各坐一辆大车,担任事务员和翻译的王先生也单独坐了一辆。当然,那个做饭的小伙子坐的是所有大车中最好的,除非他自愿调换位置,或者是坐在高处的行李上,或者是最惬意的车前盘柔软的羊毛毯上。要不是到了蒙古高原,在白天的行程中,他是不会离开他的位置的。

最初的几天,我们通过的始终是尘土飞扬的峡谷小道(地图一),这里,夏末炽热的骄阳持续地烘烤着。由两轮车的车轮碾压出一条条的车辙布满了这条窄道。山体愈来愈陡,我们几乎贴靠在两侧的山崖上,道路如此狭窄,以至于拉长了我们的队伍,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也愈来愈远了。我们彼此步履艰难地在这条深沟里走了几个小时,峡谷中粉末般的尘土和我们的汗水黏合在了一起。



地图一 中国漫长的古道

史前的陶器技艺被认为是沿着处于北方荒漠和西藏边缘的这条道路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传播并积淀下来的。两千一百年以前，远征军曾顺着这条路直达中亚乃至里海。也是沿着这条道路，佛教的朝圣者们从印度经阿富汗带去了大量的佛经。它又是为罗马贵族运去丝绸，并使玉石、矮种马从西方进入中国的通畅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数以千计的俄国人为寻求避难，使它成为逃亡的通道。今天，通过它从新疆运来了羊毛、葡萄干和矮种马。铁路在逐年延伸，但现在从北京乘坐平稳的两轮车，要十个星期才能到达新疆的边缘，到印度则需要三个多月。

前前后后分散着护卫队的步兵，他们的黄上衣变脏了，黄裤腿也随随便便地挽了起来。突然，从前面传来一阵沙哑、褻渎的叫骂声，我们两个白人从沾满油污的车轴和竖立的人墙中挤了进去，发现我们前面的两轮车卡住了向东驶来的车队的车轮。不远处，还有许多两轮马车吃力地向我们这边驶来。原来，每一方向的车都依峡谷地势倾斜着行进，这一事故完全是这种危险的行车方式引起的。前面这两个车夫慢悠悠地走到了一起，相互对峙了足有五分钟，但他们谁也不去指责对方，也都不大声嚷嚷，或者是让事态中止，或者去检查事故的原因，而任凭车轮卡在那儿。士兵们上前靠近车边俯身察看深沟试图找出原因，但这太不合军人的身份，他们向对面的人发出警告，同时，回过头来喊我们。

这突如其来的麻烦事，使翟荫和我介入了这场骚乱。我们急奔向前紧紧地揪住迎面而来的骡子的缰绳，一会儿，对方行列里的车夫们就有人做出了保证，顷刻工夫，事态就趋向缓和了，对方的车夫也燃起了烟斗而且咧开嘴笑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看来要持续近两个小时的疏通阻塞的混战，以便各走各的路。我们迅即弯下腰，在满载的两轮车下和混杂的骡子头、骡子后蹄之间穿来穿去，把这辆车向这边拉，那辆车向那边推，再沿着路面开出的沟槽把车向上倒推，推完我们的车，又推其他的（图一）。我们像小矮人似的在满是尘土的车杆旁左突右冲，又像是在做令人神经紧张的抽杆游戏一样，在一大截车杆上跳来蹦去。士兵们被派到前面去阻止任何迎面而来可能造成威胁的车辆通行，马的套具要解下来，否则再没有其他的办法，王译员和那个小伙子去催行动迟缓的车夫们解开套具。当我们最后起身离开这儿的时候，汗水和尘土在我们脸上划出了黑色污垢的条斑，我们倒活像是戴上白人面罩的黑人了。这样的阻塞一天要发生好几起，我们也只能在路上掘沟开道，但翟荫和我再也不会那样主动地干了。我们也学着许多中国游客那样袖手旁观，看着车夫们自己动手，因为这事儿最适合

他们自己去做。总的说来,我相信,即使是我们的交通秩序再严密,精心设计的制度效率再高,阻塞十分钟的事儿也在所难免。此刻,坐在两轮车里,倚靠在周围充满嘈杂声的崖壁上,想像着这时即使有一个穿制服的交通警察,也不会带来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照样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对这些粗俗的混杂的人群抱以宽容,就像是在纽约的第五大街上。

这条路前面的村庄曾发生了一起武装村民的骚乱。三天前在那里,中国商人遭到拦截和谋杀,官方最终调集了千人的军队去进攻并遭遇抵抗。这里的村民们自身似乎很少受到损害,由此,大可怀疑他们的子嗣几乎都与匪为伍,既然他们能外出抢劫满载的大车,那么,在家里也不会安分守己地缴土地税。然而,我们之所以勉强地停留,是靠我们手里握着的滑膛枪和翟荫别在臀部后边皮带上的自动手枪壮胆。忽然所有的人都停住了,看来真的察觉出盗匪活动的迹象,我们利用峡谷的地势都一起趴在崖顶上,周围的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便于我们一齐射击。紧张的气氛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都精疲力竭了。这时我们方才看清,几个庄稼人赶着小毛驴在前面走,他们实在没有能力和勇气袭击我们。毫无疑问,至少有三十个行人曾经被土匪扣押要求赎金,出事地点在向南一英里左右的低坡处,这时,我们才感到似乎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雨季基本上已经过去,似乎第一个星期没有阵雨的迹象,但官方的气象预报提醒我们也许将会有大雨,并且道路将会被洪水所淹。在七个月的旅行中,最初的几个客栈也许是最好的,但对它们的肮脏印象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村子的马路旁摆动着两扇大门,五辆大车笨重地移进用篱笆围住的院子里,卸了挽具的焦躁不安的骡子再也耐不住了,立即倒在松软的地面上打起滚来,一股扬起的尘土呛得人透不过气来。这些骡子各自找到一块滚动的地盘,那种通常卧在炉前地毯上的大牧羊犬随即跳了起来,围着骡子

转了一两圈，又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后退了回去。骡子的蹄子痉挛地踢动，尾巴像划船桨似地摇摆，它们在地上滚着，好长时间不起来，不过，它们的确需要尽情地蹭磨解乏了。骡子的四蹄又向上乱蹬，一会儿倒向右边，一会儿又翻到左边，肋腹上沾满了泥土，接着，这些饥渴的牲畜一腾而起，和它们的伙伴交头接耳之后，又满院子跑着找水喝。在等水和草料的工夫，它们也不闲着，不是追逐院子里的大母猪，就是把鼻子塞进麦垛拖出麦草。在这猫、狗相斗的当儿，车夫们和客栈的老板却不见了。一会儿，装得满满的用碎豌豆和草料搅拌的几只长袋子从大车的另一头抛了过来，水也端上来了。这些骡子吃足了草料，饮够了水，又肆无忌惮地打起滚来，有的去顶撞拴着的小马驹的左肋，有的激恼大母猪发出尖叫。一群母鸡咯咯地从一个狭小的洞口进进出出，这个洞口使它们逃脱了老鹰上百次的追捕。装扮得像牧师一样的喜鹊，它们套着白缎子般的袖子，翘起了黝黑的马甲，立在装满豌豆的柳条筐上啄着豌豆吃，偶尔闪现出它的一只黑眼珠。在中国所有的人、鸟、动物中，这些喜鹊是最干净和最漂亮的。像这个国家其他每件东西一样，它们生存在与污秽的经久接触中，但它们的黑尾巴和酷似主教袍袖的缎子般的羽翅上却闪射出彩虹般的美丽光泽。这就使人联想到大教堂庭院内模糊的清洁。其实，那些自喻教士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教士，他们是低能无知的，他们打家劫舍，狂妄自大，恃强欺弱，而且满嘴污言秽语，肮脏到了极点。

这个用围墙圈住的小客栈的客房是用树篱隔开的。每间客房的炕——用土砌成的泥土台，占据了整个地面的一半，放脚的一头紧靠着一堵略高的墙，墙那边是一眼可供冬季暖炕的灶。翟荫和我在这个泥土台上支起了折叠的军用帆布床，因它交叉的柱条支撑在炕上，指望它使跳蚤和成群的虱子不易爬上来，结果是徒劳的。过去，虽然我也经常在浅碟形洼地上支起油布折叠床来阻止潮气，但我们还从来没有像这次旅行对此制作得那么精心。我那

块用盐渍过的坚韧皮垫可以阻止臭虫的侵袭。这些小动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蠢蠢欲动,饥不可耐,又防不胜防,捉到了几只,我是不会随意扔在桌子上让它们溜掉的。但是,翟荫却被折腾得无法入睡。就在这第一夜,我被一阵呼呼声所惊醒,继而坐起来,看见一个巨大的发亮的圆球,是它发出的呼呼声和一闪一闪的白光。我还以为进入了在依斯克(Essex)草地嬉戏的梦境,但不到一分钟,终于看清了这个圆球正是翟荫,他猜想被单里面肯定有臭虫,就把被单裹起来,用他那只小电机驱动的手灯哆哆嗦嗦地费力而又缓慢地边走边照,他是在被单里搜寻折腾他的臭虫。我看到的只不过是透出织物的微弱的光亮,而翟荫却在黑暗中裹作一团,翻腾滚爬,尽管这几个月来他睡眠不足,神经衰弱多了,但到了蒙成一团、呼呼作响的地步却真令人担心。

晨六时,我们起床后喊来小伙子,那个被唤作“小伙子”的厨子端来了一盆水,我们每个人利用这盆水来剃须和洗脸,这一盆水竟够用了,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尽量保持干净,让一点肥皂的香味充满着我们的面容,给困难重重的未来增加一点自信心。在这次旅行的头几天里,我们真正的早餐是咖啡和鸡蛋,这些食物有时用小客栈的炉火来煮,有时就得用我们自己那一点宝贵的煤油来煮了。趁中午在驻地休息的时候,我们还要用一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喂骡子。我们则吃的是前一天傍晚从晚餐的剩饭里调配好的夹心面食。

从这条崎岖的道路走出去,前面的地势绵延起伏,从这边坡上可以望到那边坡上的棉田和谷子,这些作物已接近成熟期。路前面的货摊儿上搭着篷子,摆着可口的黄瓤西瓜在那儿卖,我们一饱了口福。熟透了的新鲜小柿子也在路边上摆着,汁儿虽多但个头却不如北京的那种大。往前走了不远,在我们的右侧突然闪现出黄河耀眼的光波,紧接着,我们的两侧又出现了雄奇的锯齿形山脊,它那一排排齐整的轮廓线真像是行进中军队的队列。

就在第三天，一位活跃的被称为博士的英国传教士从西安到北京途中给我们捎来了信。这封信是从一前一后驾辕的两匹骡子中间抛过来的，这位传教士向我们致意并通报了前方的道路畅通无阻的好消息。这对于我们无疑是急切期盼中抓住了几根救命的稻草，鼓舞着我们催马前行。

那天黄昏时分，客栈的院子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个围墙圈起来的院子原来是被掘开的一个高高的上山包，用于冬季仓储和做马厩的。巨大的开间是被挖开的黄土形成的。位于我们之上的是一处小庙宇和一个小人物，透过蜘蛛网才能呼吸空气。

打滚的骡子乱作一团，母鸡不安地叫个不停，漂亮的喜鹊为院落平添了许多的生趣。此刻，我却靠在我的小卧室的门框上，凝视着夕阳落山，思考着怎样适应在中国的这条道路上生存。一名身着黄军服的士兵站在我前面，一个放大的、轮廓扭曲的身影在我眼前突现，但他站着的姿式却不是这样。他挺直了腰板，缓缓地抬起手，脚后跟轻快地一碰，向我敬军礼，然后和我说话——竟用俄语！转瞬之间，那些打滚的骡子安静下来了，扬起的尘土散尽了。我沉湎于他的故事之中，仿佛看到漆黑的夜空中，在西伯利亚皑皑的白雪上铁路枕木搭起的一大堆篝火跳动的火舌。在火光的映照下，哥萨克轻骑兵们唇须间露出的牙白得发亮，尽管从未见过那条大河，但我仍能听得出木排在顿河蓑衣草之间穿行发出的低吟。这些哥萨克士兵到了乌苏里斯克(Ussurisk)，他们的蒙古人的养母们给他们吃栗色麦片和用山毛榉凿出的镶着银箔的碗盛的马奶。山毛榉是在神圣的五台山(Wu Tai Shan)的山坡上砍伐的，银箔是由硬币捶薄并且从墨西哥飘洋过海运到中国来的。

我的思绪突然又一下子中断了，又回到了这个不修边幅的士兵和那些骡子扬起的余尘之中。我费力地搜寻记忆中的俄语单词，还是无法理解超出我熟悉范围的话，实在没有办法。后来，我不得不大声把王译员喊来，耐着性子听用汉语翻译的一个普通人

的诉说。事实上,这个士兵的经历非同寻常。他压低声音极谨慎地详述了护送一位俄罗斯官员从蒙古返国的经历,从那时起,他就到了西伯利亚以至欧洲的俄罗斯。他在那里逗留了两年,学到了更多的语言。现在,他太需要棉鞋和棉裤了,遗憾的是,我此刻不在军事后勤供应部,不能为他雪中送炭。他熟悉西部的道路,愿意随队服务,想当一名优秀的卫兵,然而,我察觉出他的眸子里闪出一丝狡黠的光,我不能劳累他为我们服务。不过他已经得到了,他因为我讲述了那些闻所未闻和富于刺激性的想像中所见到的皑皑白雪中西伯利亚篝火的经验而得到了足够的钱。

第二章 中国古都西安

第六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我们还在旅途中,似乎觉得这条路永远也走不完。就在夕阳渐渐地沉向西边天际的时候,我们风尘仆仆、心情激动地停在潼县^① (Tung Hsien)这个坐落在山脚下的小城镇。从省城西安府骑马到这儿仅仅需要几个小时,这里的人有一种风尚,一年四季都有人来洗温泉。这就吸引我们腾出一些时间改变我们的路线到温泉去。我们到的时候,才知道那儿被军人占用了。士兵们正在新建的营房前面进行蛙跳比赛和双杠锻炼,但是,我们还是大胆地向大门口士兵挥舞着毛巾,并且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向他们的长官递上我们的名片,向他们通报我们这些来访者是希望沐浴温泉。

当我们通过大门的那一刻,映人眼帘的是一幅曾经辉煌至今仍残留着中国文明精华的奇妙图景。自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温泉就一直是帝王们的驾临之地,镶嵌在墙壁上的石碑碑文记载着皇帝们出巡的情形,碑文还记载着公元10世纪的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似乎能感觉出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了垂暮之年书写还是那么流畅。在碑文上也发现了公元10世纪一个遭贬的王储的一次新奇的经历。

自从有了这个供皇家享乐的温泉,当地的旅店就成了民间越冬的胜地,甚至一些小客栈都成了结伴而来的富家商贾周末度假

^① 潼县,今陕西临潼县。

以及西安府的达官贵人们的频繁光顾之所。在蒸腾着热气的水池中间,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建筑,没有裱纸的锯齿形窗格极具精巧的中国建筑艺术风格,可是现在,它却是一个团的指挥部。到那儿要通过一座桥,桥桩已出现裂痕,摇摇欲坠,其景致只能观望。有几个既不像是过去的皇亲国戚,又不像是官吏的人和几个歌女正斜靠在那儿观赏对面山谷的景色。一艘装饰华丽遮着顶篷的小游船在冒着热气的池面上漂泊着,从温泉池中涌出一股缓缓的水流,从泉眼中慢慢扩散开,延伸到整个池底。翟荫和我踩着通向池底的黏滑的台阶,扑向池中,在阴湿的空间里舒适地浸泡着。就这样,我们尽情地洗完了温泉,闲逛着回到旅馆,周身散发出一股硫化物的气味,顿时感到身上清爽多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和马车进入了西安府的城门(图二)。尽管天气闷得要命,我们的心情却格外开朗。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中国至少有五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十年前,我曾历尽千辛万苦到这儿来过,但土匪头子白狼(White wolf)^①的部队封锁了这条路,西去游历者只能到此止步。可是现在,我们终于来了,我们穿越城门,这一次目标是继续西行。此时此刻,对我们来说,它不再是神秘的远方了,我们将沿着这条伟大的道路抵达新疆的边缘(图三)。然而,我们现在就已经完全感受到了古代中国的气氛,公元7世纪的玄奘从印度带回神圣的佛经和佛像以后,他的遗骨就安葬在这里;也是在这儿,他耗尽心力翻译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在公元4世纪的最后一年,法显和他的同伴也是以这个城市为起点西行求法的。关于这一点,他的朋友这样评价道:

他付出辛勤劳动取得了累累硕果——他对人们普遍珍视的物质利益漠然置之,而对人们普遍忽略的精神上的东西却

① 白朗,1913年的讨袁起义军首领。文中的“白狼”系官府对其贬称。

锲而不舍，难道他不是这样的人吗？

对于任何身居外国土地上的游历者来说，这些成果无疑是一部有益的教科书，但是，在处处充满险恶的行旅中，他们那种顽强进取的毅力和披荆斩棘的精神才真正地令人钦佩，对于今天身在中国的我们才是最为有益的。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毕竟这个城市要接纳从高丽、波斯和拜占廷宫廷以及其他北部和西部国家进献的贡品。吐蕃和印度也与这个城市有来有往，斯基泰人(Scyths)在经历了短期的希腊军队占领之后，也带来少量的礼物。在这里，太宗皇帝和坚定地站在他一方的姐妹，开始了创建中国又一个集权的中央王朝的突然行动，开创了两百年繁荣昌盛的历史。但他姐妹的地位与他却并非平等，这场战争最终以突厥人的失败而告成功，已登上皇位的这位伟大的统帅不仅在战场上战胜了他的对手，而且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并使之追随他征服中亚。君王接受觐见也是在西安进行，城外还要临时安顿外国派遣的使节，朝廷官员要设宴盛情款待这些尊贵的宾客及其随员。哲学家、史学家和在皇家图书馆效力的皇帝亲授的舆图员以及刚从印度归来的教徒都在被邀请之列。这些教徒不仅带来了吉祥的佛经，而且，毫无疑问，还要把他们如何越过这个国家的高原的那条伟大道路，以及受阻于生性好斗的部落的地盘时那种难以忍受的经历告诉大家。

太宗的陵墓位于西安城外很远的一个地方，陵墓周围立着许多石刻雕像。人们说，这是他的附属国的君长像。在陵墓附近，也曾竖立着六匹巨大的石骏马，那是拼死在疆场上的战马的浮雕。现在，它已从原来的地方被拖曳出来，其中的四匹运到了这座城市。我们在一个不起眼的博物馆里瞻仰了它们的仪容。在博物馆里，与其说它们立在那儿，还不如说是斜靠在院墙上，幸运地避过了美元的诱惑。另外多少有些破损裂痕的那两匹，成为费城的大

学博物馆引为自豪的展品。^①

今天的西安府给人带来的欣喜虽与一千三百年以前不同,但依旧使人心旷神怡。我们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地在英国传教士住所的院子里进餐,听他们讲在中国严酷生活环境的经历以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与其进行的苦斗,更多一点了解这些,对我们提前进入这种严酷生存环境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快乐仅仅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就是在饭店里用手抓吃肮脏食物。在士绅显贵和自鸣得意的教士们光彩荣耀的列队欢迎后,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了两队凶相毕露的身着黄军服的士兵不由分说地把三个被捆绑的囚犯押上了大街的场面。他们在距我们一百码的地方停下来,只片刻工夫(所幸我们不忍亲眼目睹),三颗头颅就落地了,这些士兵头也不回地走了,把尸体留给别人去清除。

早就从北京,甚至从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商人那里听说西安府收藏有各种古代的青铜器或著名的石碑,但是我们去的这家店铺里却为数极少,而且毫无引人之处。然而,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里却到处都能看到古物丰富的迹象,而且,挖掘者立即就可以在那儿得到这些古物。不仅可以从农民那里收购来,在田野里也可以发掘出陶器,或者发现从山坡上被雨水冲刷下来的碎陶,而且有时会夹带一些青铜器、古代双轮马车的轮轴、铠甲以及表面上包着薄薄一层金箔的棺木。毋庸置疑,其中许多都是不可多得的古物,并且许多都是第一次被发现。指望能在省城得到的这种文物大都是些

^① 唐太宗陵墓位于陕西醴泉县城东北 10 余公里的九嵕山,距西安 50 公里,是为昭陵。昭陵北司马道设置了 14 国君长石刻,他们生前来过长安。六匹石马即所谓“昭陵六骏”。1914 年,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串通陕西督军陆建章由卢芹斋公司经手,把“昭陵六骏”石刻中的“飒露紫”、“拳毛騧”两骏,盗卖给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赝品,而那些精品肯定送到北京去了。

古董商老马,曾是最著名的美国汉学家伯特赫尔德·劳佛(Berthold Laufer)博士的朋友和帮手。他店里剩下的东西也没多大的价值,不过,在回来的路上,我还是花高价从他那儿买了一套盖有被谋杀的总督端方(Tuan Fang)^①私人印章的石碑拓片。正是这个名字和其传奇般的死突出了他在东西方世界里成为一批热衷中国伟大艺术和历史的一组人中耀眼的一位。这位总督收存的大量藏品中的许多石碑和青铜艺术品已远送到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的博物馆和欧洲的一些城市。我们早就通过某种渠道听说过他的藏品的重要价值和艺术家的鉴别力,因此,常常渴望研究他收集的秘藏和目录。在这套拓片上印有他的朱红色印章,也应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这些拓片最终应存放在哈佛大学博物馆的文库里,以供学者们世代地利用。

然而,在这座城市,也是在整個中国,我们获益最大、留下最深的难忘印象之一的就是碑林了——这片如森林般耸立着的石碑群。假若时光倒退到鸿蒙初辟的年代,当古代不列颠岛的布立通人正在描绘自身的蓝图,整个欧洲尚未启蒙的时候,这些纹理细密、回声响亮的巨大碑石就已经在古老中国雕凿出来了。在其后兵连祸接的年代里,由于保管不善,许多都成了残碑,有的甚至不知去向。所幸的是,尽管过了几个世纪,现在仍还有许多石碑留存下来,这些石碑和那些数以百计的晚期产生的石碑一起,被集中到有高高的屋顶的建筑物下保护起来。在那里,整天都有摹拓者用拓锤敲击附在碑上的纸显示碑上深嵌的汉字。他们把拓片卖给北京的学者们和读书人(图四)。由于这一系列拓片具有极高的书法

^①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1882年举人。1899年10月代护陕西巡抚,1901年3月护理陕西巡抚。后任湖北总督,摄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端方平生喜好收藏古物古画,藏品中亦有敦煌写卷精品。

价值而被公元9世纪后的中国学堂里的儿童们作为临摹本反复使用。

这里也立着著名的景教(Nestorian)碑,碑文上方雕刻着十字架。它记载着唐帝国下诏允许“大德阿罗本”和其他僧徒在都城建立景教寺院并宣扬他们的纯真教义。如果那些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徒们能来造访,那么,普雷斯特·约翰(Prester John)和他神秘的罗马教皇派遣的使者,即虔诚的景教徒们就会再一次传播福音,那么这种古代中国的精神也就会再次普及开来,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犹如这座石碑一样深深扎下根来。这座石碑是在马可·波罗或普雷斯特·约翰之前几个世纪的公元781年建立的,这个沟通遥远的东西方之间联系的遗存下来的实物,比其他任何什么别的留在中国的东西价值都更大。

对我来说,并非由于碑林才唤起我们对景教碑及由它引起的那些往事的联想。我正在记忆中搜寻到底是什么原因,但一会儿,我感到碑石好像与昏暗的光线融为一体了,最初是完整的一块,接着层层叠叠、黑黑的厚重的石板笼罩了我的全身。它表面醒目的汉字深深地嵌刻在石板上,厚厚的边缘上雕绘出精美的花卉、四足兽以及我早已熟知的半神半人像。由于长年的摹拓,它已伤痕累累。我在这些拓碑者身边站了许久,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在已经贴好的拓纸上试着用手指轻轻摩擦,尽管我专注地盯着这块原碑原物,还是常常对拓纸能产生如此相应的效果感到疑惑:当我虔诚地用手指轻轻抚擦碑文表面时,拓纸上居然真的显现出并且充满了暗黑色的古代文字。

我们在沿着碑林殿堂庭院排列的商店里经过一番讨价,买了一大捆石碑拓片。走出商店,室外的阳光格外眩目,虽然只花了令人愉快的两个小时,却好像经历了几百年光景一样。

鼓楼位于这座城市的中央,从这儿向城外延伸出四条马路,要从西安府众多的城门走出去,就得从鼓楼出发。鼓楼下面有几个

贫民正蹲在那儿。我们的眼前忽然一亮,莫非阳光映照在什么东西上?定睛一看,是一堆红彤彤的辣椒摆在那儿卖,红得真像是漆黑的铁匠铺里烧红的炭火。在辣椒堆旁边,是深紫红色的茄子,足有两英尺长,用水溅湿后,光滑、圆鼓,泛出青紫色的光。这里店铺正面屋顶上长满苔藓凹陷的瓦盖斜面不同于其他任何中国城市的屋顶设计,也正是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它比北京更为古老。这些屋脊都是单调的灰色,容易使人想起公元12世纪的画家们在画远山和瀑布旁边的尼庵时使用的银灰色颜料。假如北京的公使馆外表上是这样的话,就与所处的环境极不协调,而显得不伦不类了。

第三章 西行之路

离开西安府继续西行，城外最初的十五英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伴随着大车在路两旁未收割的作物之间留下的足迹，每走一步都是昔日的荒冢。除了翻犁过的耕地透露出大地的黄土色外，路旁高高隆起的泥土堆成的坟冢上长满了青草。古时的中国是真正的中央王朝，主宰它的皇帝、王侯和他们的嫔妃们死后就被埋葬在这里，它们神圣得令今天的人们没有一个敢去接近它进行挖掘，也没有人猜出其中究竟埋藏了多少珍宝。

在中古时代或更早的时期，盗墓者就已经把墓中大量的黄金和珍宝盗走了，然而今天的考古学家对此并不介意，他们了解多少这样的盗窃行径呢？这些盗贼无疑对陶器之类不感兴趣，而这些遗物在今天看来，正如所有博物馆里的精品一样，成为珍藏在玻璃窗内的展品。暂且撇开它表面悦目的古铜色不谈，仅根据被遗弃的这一点点希罕之物，就可以重构出往日的的生活情形，光是这一点就足具重要意义了。

过去的许多年以前，在渭河两岸，对于无论是盗墓贼以拙劣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掘开墓穴，寻觅他们的祖先留下的那些适于在外地贩卖的宝物，还是持许可证被准许来这儿的科学家用他们的带尺和照相机测量和拍摄来说，这些曾蒙上一层神秘面纱的王陵其全部尊严已丧失殆尽。当时及至嗣后，我们就应该了解王室成员如何被埋葬，会有多少令人称绝的成对成双的青铜器、玉器以及作为礼仪葬器的牛车和腾跃的战马的模型。从这些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小、远远近近的荒冢中经过，给人的印象是，挖掘者很能自

我约束不去触动它们。

我们步履蹒跚地走过了这诱人的十五英里,不知不觉已站在渭河岸边的河滩上(图五),要不是这条庞大的方形敞舱驳船等着我们摆渡,我们仍不舍离去。岸边有一处小集市,几十个扯开了顶篷的小吃摊儿一字铺开,揉好的面团旁边放着一口大油锅,在桌子旁边,灰白色的拉面由一双脏兮兮的手抓来抓去。乘船未开的工夫,车夫蹲在地上,端起碗,吹着蒸腾的热气轻轻地喝着。骡子低垂着耳朵打起盹儿来。一会儿吃完后车夫站了起来。

我们磕着西瓜子左顾右盼,这时,船像只庞大的箱子满载着货物,在篙竿的支撑下准备离岸了,河滩上顿时响起了起锚的号子。一块腐朽不堪的跳板平搭在船舷上。我们的两轮车被推上了甲板,骡子紧随其后。登上渡船时,骡子平素驯养的差异此刻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有的骡子要从后面推,前面拽,大声吆喝,拼力鞭打才肯往前走;而有的远远地就奔向甲板,好像上了船就躲进了避风港。对这后一种,上船后要揪住耳朵,拉着尾巴把它拴起来,而不愿登船的那几头骡子看来反倒更老实了。这样做显然是希望预先就把它们在甲板上隔离开,以免从另一舷侧掉进河里。一头骡子从甲板窜到了舱底,乱蹦乱跳,躁动不安,我真怕它的蹄子卡在船板之间的缝隙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不过,这头骡子只是前蹄搭在平行的栏杆上站住了,船到对岸,我们会让几个强壮的船工把它抬出去的。

我们的渡船好像一个单调五线谱上的音符斜着渡过了这条湍急的河流,船只停泊处的沙洲将河的主流分成两汊,涉过一汊的溪流才能抵达对岸。我们使劲拍打骡子的脊背,强迫它们从船上下来,满载的两轮车也沿着吱嘎作响的厚板被拖下了船。我们每个人则两腿跨在一个船工满是汗渍的背上,由他们把我们背到岸上千涸的沙地上去。咸阳的城墙遥遥在望,我们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来到高耸的城门之下。

尽管这座城市巍巍雄踞于这条湍急的河流陡峭的岸上,但城内的气氛却相当低落。只要在街上走一走,不出十分钟你就能找出其中的原因。街区的每个角落都有老百姓在卖陶土做成的鸦片烟枪,行人的头上裹着破布,脸上流露出忧郁的神情,好像这些中国人命中注定要受鸦片之苦而又麻木不仁似的。大约有二十个类似这样的人集中在一座快要坍塌的大庙院子里,每个人都衣衫褴褛,紧张不安地低着头。在他们身边,摆着烟灯、烟管,旁边放着一些纸片,上面就是由罌粟汁干后所形成的鸦片烟。好像有一样东西缝在其中一个人的上衣上,引起了王译员的注意。他上前用脚把那件东西翻过来,原来是一块系在衣服前胸上的白布条,布条上盖着一枚官印,问其究竟,那人回答说,这块布条是拘留者的标记。在这个城市里,谁要是吸毒或贩卖大烟,一旦被发现,就被扣禁在这儿。由于吸毒成癖的缘故,他半醉半醒,对迎面伸过来的脚毫不在意。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充斥我的心窝,我们赶紧离开那儿,散步出了城门到了河岸边。岸边的渡船上还有我们的大车、骡子和矮小的但负重力极强的毛驴,我们把它们从甲板上拉到浅滩上,溅着水花上了岸,又回到了这座位于陡峭河岸上的城市。

翌晨,先是细雨蒙蒙而后骤雨大作,而且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冒着雨在起伏的山丘上艰难而缓慢地走了五英里多。这样大的雨,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在河那边所听到的警告,现在亲身体会甚至比传说的还要狂骤。我们浑身都湿透了,途中避雨和傍晚歇宿时,看着我们个个活像个落汤鸡,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但是,到了第二天凌晨五时,当喝完咖啡坐在大车上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乐观了。

雨确实太大了,大车在雨中疾驶,雨水倾泻下来,浸透了车篷,打湿了行李,为此我们忧心重重。我们蜷缩在大车里一动也不能动,不用说,没有在路上走那么自由,又没有穿雨衣,一连几个小时任凭在充溢着潮气的车子里颠簸。到了中午,又一桩烦心的事接

踵而来,车轮深深地陷进了淤泥,骡子在下坡的时候比上坡还要慢,尽管我们拼命地抽打也无济于事。它们时常跪卧在地上不能动弹一步,到了下坡,驾辕骡子套的粗粗的辕杠直插到淤泥里,我们全体人马一齐用力才能把它撬出来。

夜幕已经降临,但因为深及马腹的淤泥陷住了牲畜的四蹄,我们被困在途中。道路愈加泥泞了,这些可怜的骡子亦愈陷愈深,已无力自拔。我们不知道到丰泽(Feng Zse)村的客栈还有多远,也不指望在泥潭中挣扎的骡子能重新振作起来。我们深知,在暴雨中连续一个小时不断地抽搦、不断地挣扎,再好的骡子都会瘫倒在地,任何另样的激励方式都不会使它因之所动。我们从前用纸圈成的圆形蜡烛灯被雨水浸湿了,已成一摊纸浆。茫茫旷野,一片漆黑,我们因绝望而不顾一切地大声呼救,结果毫无反响。翟荫和我只好派人前去求援,希望能找到那个庄子,再带回几头骡子和多一些人力并尽可能早点返回来。

在中国,当差报信可以说是很不错的差事,不过这次却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和脑力。派出的这位信使深知我们面临的处境,但他却不是匆忙冒失地去做。他到村子里找到人,凭他的经验猜测其中一个人可能是位当家的,就说了许多好话,他是通过这位第三者的努力,组织人马援助我们这些濒于困境的人。翟荫和我决定派他出去以后,已经三刻钟了,显然,我们浑身都淋得透透的,泥水没到了大腿根——再没有比顶着瓢泼大雨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奋力开路更糟的了。事实上,这个信使把这件事完成得非常好,但当我问及详情时,他却笨口结舌,似乎什么也表达不出来,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索性伸开四肢仰卧在路上。稠糊糊的泥浆粘了他一身,翟荫赶紧递给他一根木棍,我上前扶住他,我的手上也粘满了泥,尽管我试图刮掉指缝间的泥,但泥像胶一样粘得牢牢的,怎么也刮不下来。我们彼此紧紧地抱在一起,我和翟荫轻轻地摇着他,大声地喊他,他只是淡然一笑,露出了欣慰的神情。旁观的车夫们深受

感动,都激动地跳了起来。我们耳畔分辨不出周围是雨声还是欢呼声。

我们暗自庆幸渡过了难关,待紧张的情绪平复后,我们又加快脚步拼足全力去赶路了。才走了十分钟,就滑倒在一个斜坡上,发现我们的前面闪烁着一片淡淡的微光,不会是迎候我们的人端着浅碟上点燃灯蕊的油灯发出的光亮吧。我们的车夫已先期赶到村子里去了。但是他宁可先考虑如何解除他的同伴的窘境,也不肯另外找骡子把援助我们的那三个人送回去,我们却坚持要先送。半小时后,当我们擦净身上的泥,没顾得上吃晚饭就准备脱衣上床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要送的那些人还没有起程。由于在途中偷运鸦片换来的钱花光了,背弃诺言的中国人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又来要挟我们补充用品。这段时间里,我们又在床架上面做了顿晚饭,床架是靠在淌着泥水的墙上的,除非把它移开,否则成片的蒸馏水不断往下滴。直到第二天上午,这第五个车夫还没有回来,我们不知道他是被他的朋友抛弃了,还是他不熟悉到客栈的路。直到三点钟,在河湾两百码的地方才看到他的身影。由于耽误了行程,我们十四个半小时才走了十五英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发现这条路几乎无法行进,毫无疑问,只能局部通过甚至完全无法通行,我们为如何前进而焦虑不安。这场大雨好像永远也下不完似的,道路成了泥浆肆虐的巨流,尽管骡子已有了过去的经验,但是在这样的路上走还是不能适应。一整天闭门不出在小屋里写的那些信可能会给国内的人们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就是一片泥浆的海洋,我们经常被困在孤岛上并时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事实上,在八个月的旅行中,仅仅由于这一整天的雨,我们才推迟了行程。

在我们旅行的这些日子里,即使是在秋风飒飒的此刻,我们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不管多疲劳,也不管随时袭来的思乡之情多么难耐,我们从没有片刻的心灰意懒。这里典型的地貌是深沟

大壑和分布在层层梯田的黄土山岭,我们的四周漫山遍野开放着粉红色的荞麦花。前面的路是一条斜下去的狭窄的深沟,我们沿着深沟边陡峭的羊肠小径走了一百英尺,到了半山腰上,看见前面几里远的地方有一块平坦的呈舌形状的塬地。塬两边的深沟把我们和深沟那一边塬上的村庄隔开了,村与村间挨得很近,我们在那儿匆匆逗留了愉快的半天。傍晚,天空密布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血红的夕阳映照着重峦,霞光倾泻于千山万壑,整个天际一片辉煌灿烂。正午过后,暑热已经消退,此时,正是一个散步的人需要好好地散发一下周身的汗气,在低垂的夜幕下体味夜阑人静的妙处的时候。一个人非常愉快地自由自在地漫步,在中国,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脚板已经磨炼得非常结实了,不再感到长途与短途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双腿和肺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

第三天,我们在彬州(Pinchow)^①城外停了下来,对柔克义(Rockhill)^②和其他人报道过的水帘洞(Suei Lien Tung)石窟进行考察,期望对雕塑品有所发现。可惜,那儿的砂崖早已风化,只有星星点点的洞窟散布在陡壁峭崖上,我们失望地离开了。可是行至三英里,半山腰上一处依山建造的现代寺庙^③映入眼帘,我们满怀的希望之光又重新点燃了。

我们取道登上木结构楼阁的阶梯,屈身通过岩石甬道进入后窟,向里探望,迎面是一尊趺坐大佛丰圆、庞大的面部(图六),估计

① 彬州,今陕西彬县。

② 柔克义(1854~1914),英国著名藏学家及佛教史专家。著有《佛的一生》等名著,对古典藏文献的研究贡献很大。

③ 指大佛寺。大佛寺,原名庆寿寺,在陕西彬县城西12公里。依山凿窟造像。除有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大佛窟造像题记外,还有属于北朝时期的造像。是陕西省最大、最完整的石窟寺。

足有六十英尺高，两侧侍立着两尊菩萨。在佛像附近盘旋着上千只崖缝中巢居的鸽子，鸽子茸毛围成的花冠状巢穴塞满了岩石的缝隙。尽管这尊大佛造像本身还是那样的面相丰腴，雍容肃穆，但是仍无法与往日之壮观情形相比拟。经虔诚修补过的每条光洁的线条已褪去了原有的色泽，古代服饰的褶皱也遭到严重损坏，但自公元9世纪以来雕刻在头像背崖上的作为背光的同心圆却未受损。大佛安详地依崖附靠在围绕的极乐世界里，光环里面雕凿着蔓藤缠绕着的卷曲的莲花瓣，佛像边缘围绕着迎风飘逸的飞天。这尊佛像背负的光环是古代的确证，我们仔细察看石碑上的题刻，题刻上竟准确地记载着它的年代，我们的考证是徒劳的。在石窟南面的岩壁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壁龛，左侧的壁龛内有一组受到轻微损伤的属同一时期的三尊造像。这三尊造像分别立在一座祭坛下面伸展出一朵盛开的莲花瓣上。它们好像出自同一雕塑家之手，即使经历了久远的年代，依然是那样神态优雅，风度翩翩。这些造像安详地静立在那儿，周围的石头也因之大为增色。

这些造像褪去了色泽，而显得粗糙的头饰上装点的所有饰物以及绯红色的衣饰和金黄色圣洁的面容，还有待于我花很大的精力去进一步考察。在这几天的晨昏暮影中，几个身披锦缎袈裟的僧侣从容地从窟壁的甬道绕到巨大的佛像后面再往外走，他们手持蜡烛和明晃晃的火把高声吟颂着来到佛的膝下。悬吊在皮带轮上的火把拖出的余迹映射在岩壁用绘画和花毯装饰的浮雕上和佛像慈祥的面部上，给洞窟平添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在祈祷声中，被烟火熏染了羽翼的鸽子即刻向四处飞散，鸽子粪发出一股秽恶奇臭。这就是我们逐渐熟悉了的中国，这个中国并不是我们寻找的那个过去的中国。

离开之前，我们大为不敬地登上了高大的佛像，站在这尊巨佛的大腿上，方才明白古人是怎样巧妙地欺瞒我们的。从我们站的这个高度看，端坐着的大佛左右侍立的两尊菩萨恰好与大佛膝部

的高度相等,看来极不协调。但是,从石窟较高的地面上选择一个远一些的适当角度沿着三角形底边延长线透视过去,它们似乎又合比例了。这决非雕塑家的失误,而是以其独具匠心的手法审慎地处理了这一视野错觉的难题。人们还要花很多精力去了解,这一技术是何时被利用的以及是否由传教的僧侣从印度将这一技术连同宗教一起带来的。

第四章 象 洞^①

越过陕西省界进入甘肃,我们感到自己终于踏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西部的土地。随着地势的不断拔高,这里秋天的气候也愈加闷热。人们在平坦的地势下应达到的进度,由于路两边的冲沟和深谷的阻断,使我们不得不走了十二个小时。这里种的树木已经长成了,成排成行,夹道矗立,唤起了我们对70年代镇压伊斯兰教徒们的那段不幸的回忆。^②左总督^③报复性的手段是无以复加的。他们见到信奉真主的穆斯林就杀,见到房屋就烧。这次远征期间,左的经费超支危机就已经显露出来,但是,他不敢再额外地向皇帝要钱了。

终于,一项在大西北重新植树造林的巧妙计划形成了。皇帝

① 象洞,即王母宫石窟,在甘肃泾川县城西一公里,泾河、汭河汇合处山嘴上。建于北魏永平三年(510)。窟略呈长方形,中有中心塔柱,直连窟顶。中心柱内分别雕出四头大象,故华尔纳称为象洞。

② 指清同治年间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事。同治年间,爆发了起于陕西,波及整个西北的回民大起义。同治六年初,清廷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不久,左宗棠即率领曾镇压过太平天国的湘淮军人陕,并于同治七年十一月,分三路进兵甘肃。清军每攻克一个起义据点,总要烧杀劫掠,给西北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祸害。据左宗棠自己供认:“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左宗棠全集》卷31)这次起义历时十三年,虽然最后失败了,但给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③ 左总督,即陕甘总督左宗棠。

陛下获知他在统辖的地区植树的计划后深为赞许。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阴,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同时,也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为数不多的旅行者们带来恩惠。虽然这些树木及时地栽植了,但已获下拨的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堂而皇之地被整个隐匿了下来,就像一个得胜的指挥官应该享受的那样,被用来引退后过舒适的日子。

在连续一个月的旅途中,连绵不断的柳树和参天耸立的白杨齐齐整整地排列在道路两旁,这些树木穿过两山之间伸向远方的平地,翻山越谷,蜿蜒行进,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奇景。然而,那些变成废墟的城池其情景却令人触目惊心——在方圆半英里的有城墙的城市里,只剩下十几间泥屋和羊圈挤在一个犄角里,蚕食着这片废墟。照看羊群的人几乎赤裸着身子。在这几个星期里,我们目睹了比这多得多的废弃的房屋,此情此景令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

但是,进入甘肃省境毕竟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就在到甘肃的第二天,我们在一个小城外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过了夜,为将要到来的考察活动养足了精神。靠近这座城镇^①的西门附近,一条被称作纳水(Jui Hseui)的小河与开阔一些的泾(Ching)河交汇在一座凸起的圆锥形小山下。天刚破晓,我们在一处可涉水的河段过了河,抬头看见我们头顶上的岩石有一孔洞窟的进口。自彬州一无所获之后,我们对这儿寄予了一线希望,我们弃车徒步登上了上山的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石窟洞口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块大约两英尺高的方形石块,四面开凿了壁龛,龛内各有一尊佛像(图七)。这类雕塑是公元6世纪所特有的,比我们在彬州看到的雕塑品的年代要早,我们因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而怦然心动。但是看到这个洞窟的进深似乎比较浅时,又不免有些失望。我们面

^① 指甘肃泾川县城。

对着的雕凿在坚硬的岩石上的这尊佛像，虽然是重新雕刻的，但确定其重刻的年代却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的范围。我在右侧看到，烧制的砖石和倒塌了的石块堵住了我的去路。翟荫已经到了左边。他发现了一条与崖壁表面平行的通道，由于我们从洞外清晨的光照下进来的缘故，眼前几乎漆黑一团。向前走了几步，这个通道突然拐进了小山，现在我才明白翟荫为什么如此高声地叫喊我的原因了。

窟内的光线还算令人满意，雕刻在岩壁上的一排连一排的佛像俯视着我们。它们的造形生动逼真，其中有许多曾遭到损坏，但是，根据我们的第一印象，有的几乎没有被改动过，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公元6世纪的原原本本的佛教雕塑，迄今未见报道过。我们意识到，过去在河南府的三个星期和将要西去的敦煌的两个月时间里，在这一段伟大的西北部道路上，再没有那个时代的其他范例了。细微的检查表明，近代确实对这些雕像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一些补偿性修补，但主要的雕像风格是明确的，正是中国佛像雕刻的那个最早时代的风格。由此诱发了我的联想，思绪把我带回九年前在一千英里以外的云冈(Yung Kang)石窟，在那里，一场暴雨淋得我浑身发抖，我更担心我的同伴，那位颇具绅士风度的老学究受不住暴雨的侵袭。他是一个词典编辑者和传教士，天真得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他在泾州，他会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几乎会笨拙地跳起苏格兰舞。而在云冈，他是那么的兴奋，以至他不停地咳嗽，声音都哑了。

我们不久就从停在河滩下的两轮车里取来了照相机、闪光灯和测量卷尺，并且立即着手绘制洞窟的平面图，详细考察这些雕刻品。石窟洞口面对着我们的那尊雕像位于一个中心柱之前，这个中心柱呈方体，柱的一面堆积了由窟顶塌落下来的成堆的碎石。但是，这一面还算没受到多大的损坏，洞窟两壁和另半面壁和中心柱的其余三面也没有被掉落下来的石块遮掩。

在中国的石窟中,这个洞窟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中心柱竟伸出四头大象的头部和前背部来,象背上还驮着小宝塔。由于立着大象,从象的头到脚之间的柱石就显出空凹处,这部分柱身的周长因此而缩减了许多,这些象的前脚稳固地踏在宽宽的支柱底部,从容地屹立在岩石上(图九)。我试图将这些大象与印度佛教中的智慧神文殊^①的崇拜联系起来。在晚期的佛教绘画中,他常常高高地坐在象背的宝座上,但在这里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场所是专为崇拜他而修造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与印度的建筑风格并不完全相同。

从中心柱的拐角伸出的这些巨大的四足兽下面是三英尺高的带形图案,上面镌刻着浮雕品,给人以柱附在墙上的奇妙的感觉。这些带形图案显然应该有八面,柱的每个角各有两面,但是,现在完全辨得出的只剩下三面了。由于有少许的光线投射在驮有宝塔的大象上,西南面的浮雕可能最终脱落,它给我们提供了正确地估计象洞环境的另一原因。在这面带形图案上,有三个站立着的、头后背负着光圈的佛,使人联想到这或许描绘的是他前世的本生故事。一个怀抱着一头小象,很像是小商贩的妻子抱着猪崽,另一个以田径运动员抛链球的姿式握住象鼻,而第三个则一只手掌托着一头站立着的小象。毫无疑问,进一步研究或许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这些图像表明,它反映的或者是扔掉腐烂的大象的躯体,或者是表现了后来成佛的乔答摩(Gautama)太子婚礼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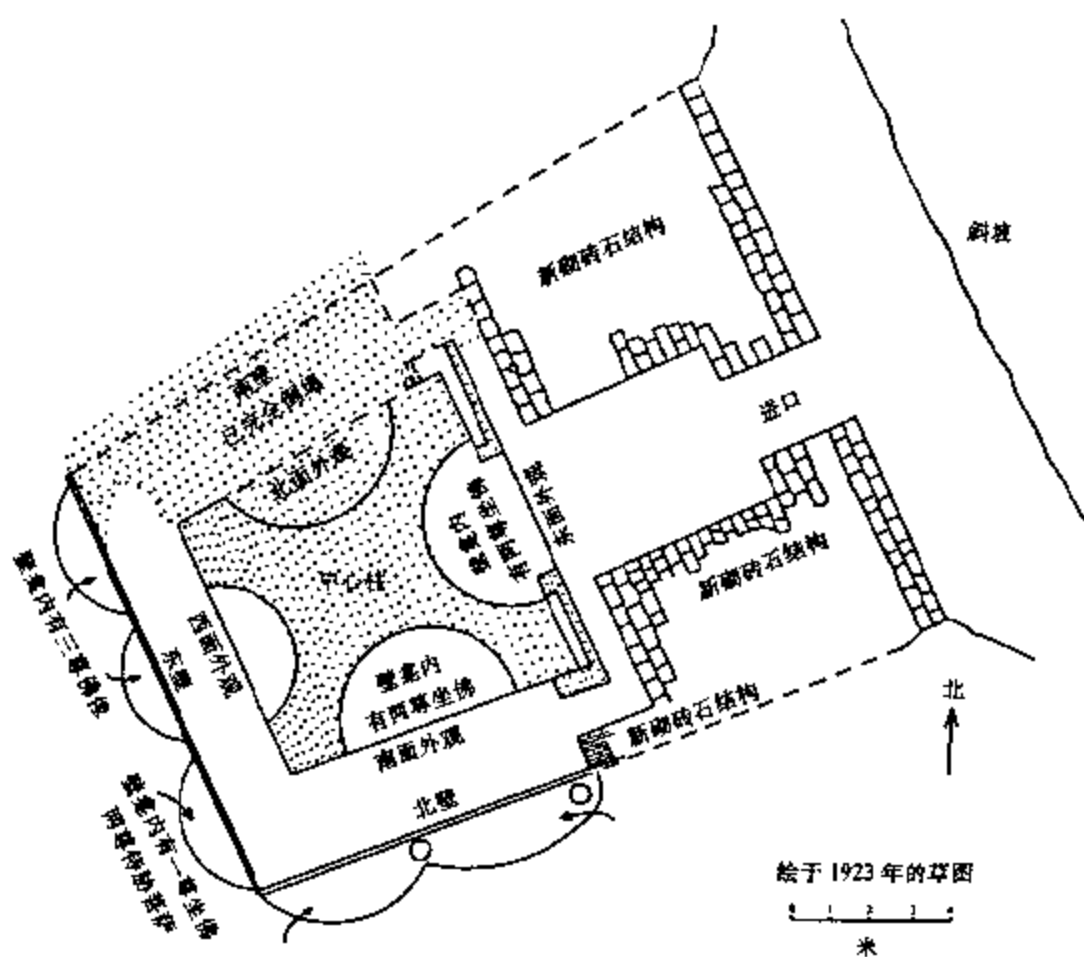
紧接着的也是一组由三个浮雕组成的有代表性的群像,也可能这三层自然排列的浮雕叙述同一个故事。佛陀(或年轻的太子)的左手高举着剑,朝着一棵树,更确切地说好像朝着一棵伞形树砍去。砍这棵树实在太难了,他已经垂下了他手中的圆盾。终于,这

^① 文殊(Manjusri)骑狮,普贤(Samantabhadra)骑象,华尔纳的记忆有误。

棵树被拦腰砍断,第三棵树也被这样砍断,尽管它还没有完全倒地,但这最后的一击显然是成功了。就我所知,这在中国是流传最早的西藏和蒙古喇嘛教晚期艺术中的一个寻常的故事情节。虽然另一排雕刻看起来相当清晰,但却超出了我的佛教知识的范围。

然而,在所有这些雕像和雕刻品中,出类拔萃的当属支柱北面塌落在壁龛周围几吨重的碎石中露出精美绝伦的头部和肩部的佛像,其神态依然是那样的安详,那样的宁静。除了受到从窟顶掉下来的石块轻度的撞击而被削掉鼻子外,其他部位仍是无损的。即使这样,也决不影响它们整体的价值。我极想安排一群苦力把它挖掘出来,但我们的良苦用心却无法实现。现在,它盘膝坐在宝座上,无疑地是期盼他们能受到保护而不要被这些坠落的岩石所砸损。在著名的云冈石窟里,折断了头部和双臂的那些雕像——显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留下的时代最早的遗迹——比这身优美得多,并且保存也好。这要有权威性的报告才能证明出它的年代,现在还看不出比公元6世纪末更迟的年代特征。大概是由于这尊雕像和其他的雕像已经用施加于薄薄一层灰泥中的颜料和金粉掩盖上了的缘故,可以看出,在深黑色的表层之下是一幅金黄色的面容,头冠也着上了厚厚的一层色彩(地图二)。

我们仅用了短短一天的时间记录、拍照和测绘,回到旅店后马上就冲洗胶卷。门外,一个身材矮胖,蓄着褐色胡须的法国人和讨厌的中国人的交谈声不绝于耳。当这个法国人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准备晚餐,花彩形的胶卷底片还挂在屋子里的泥墙边上。他和我们共进了晚餐,席间,他一直在谈论着,我们干着自己的事情,并没注意他说什么。当我们赶紧把笔记补写到最近日期的时候,他安详地用麻梳梳理他的胡须,但仍旧口若悬河。当他终于结束了他的滔滔不绝的闲谈起身告辞后,我们才全部了解了他的经历。他生在里昂,在河南铁路部门做事。去年,他穿过中国的西部,至今仍在西藏的边界做手表生意。他有许多情人,而且都是不同种族的,其中最



地图二 中国甘肃泾州附近的象洞(西王母庙)

淫荡的几个显然是西藏人，她们身上散发着腐败了的黄油气味。在从上海到可可淖尔(Koko Nor)^①途中，他被一群狗咬伤，一些乐善好施的人们救助了他。此时此地，他见到我们肯定是兴奋异常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尽情倾诉的机会，而且再三地给我们指点他走过的路线，一直说到西藏边界。临出门前，为防不测，他拿起一块我们切好的面包，打算随时扔给户外的黑暗中可能袭击他的狗。

第二天整整一天，以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们沿着泾河河谷穿

① 可可淖尔(Koko Nor)，指青海湖及其附近地区。

行在庄稼地和果园里,中途停留了一次,由热情的斯塔的纳维亚人的联合传教组织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很久没有品尝到的美味佳肴。他们在这个国家已经有三十五个年头了,建起了一座教堂,一所大型的慈善院和一个诊疗所。他们在经历艰难岁月的过程中,用如此良好的生活方式来减轻生存环境的压力,以至于我们在餐桌吃饭的时候竟都瞪大了眼睛,简直不能相信这确实是在中国。这个家庭舒适的起居室里并列挂着瑞典国王和王后的肖像,旁边是林肯和罗斯福的像。我们在这儿喝到了纯正的牛奶!我们一连喝了十二杯!还有葡萄干和面包!我们把盐撒在新鲜的黄油上,还饱餐了一大块加上了糖霜混合的刚从烤箱里烘烤出来的浅褐色的饼!我真后悔我没有多吃一些那种呈琥珀色的苹果冻,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仁慈的夫妇俩常常以他们自己在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再三劝我们吃这越上越多的美味佳肴。他们的女儿前不久刚从海滨地区的学校回来,当到了铁路线终点的时候,不坐两轮车,而和她的弟弟骑马跟着驮邮件的一群骡子通过雨季到他们西部的家里。由于邮件不能延误,因此即使是在洪水和旅途劳顿面前也未气馁。这家人宁肯延误我们的考察时间,也要让我们尽情享受这精心制作的丰盛宴席。

泾河边肥沃的低地草甸,绿草如茵,杂花缤纷,走在草地上脚上有湿漉漉的凉爽的感觉。山坡上遍布着飞燕草和一种奇怪的黄色铁线莲,很像我们那里道边的龙胆属植物。最吸引我们所有人注意的是一种硕大的、蓝色知更鸟蛋般的龙胆属植物,足有新英格兰那种的两倍大。金纳德·法勒(Reginald Farrer)在我们之前好像就给它取了“龙胆草”这个名字。翟荫懂得一些基本的植物学知识,他不仅知道我们看到的每一种植物的名称,而且通晓它的科属。他花很长时间爬到山坡,坐在地上,仔细地辨认与他曾经收藏过的那些植物微小的差别,并把采集的这些籽种包在衣袋的手帕里,以便藏于费城外那座祖传的玻璃暖房中。

第五章 从六盘山到兰州

六盘山——六重盘旋的山路——对于攀越这座山峰的骡子来说,真是难以忍受的一天。因为要让两辆车的牲畜一起先拉一辆车,因而它们要在上山的路上走两个来回,要付出双倍的力气。而且,两轮车还经常陷进并且翻在坑里,这类临时故障往往要耽误很长时间。

行至半山腰,在道路的一个转弯处,不知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一座残破不堪的庙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听说这是关帝庙(Kuan Ti Mia),王译员马上想起记忆中的一个男学生曾说过的,这儿就是成吉思汗(Genqhis Khan)去世的地方。直到今天,在整个中国还从未发现那个威震八方的老虎长眠的陵寝。这座庙被挤在道路和峭壁之间,从这儿往山脚下看,我们从东边来的那条路历历在目。沿途栽种的树木在弯弯的山路上形成了连绵不断的两行绿带,好像一条绿色的缎带在山上盘绕着,一直延伸到我们脚下。车骡在逾越这座陡峭的山峰时,经常在斜坡上做“Z”形运动。山下的灌木丛隐约露出一个个农家村舍,曲曲弯弯流经灌木丛汇入远方的那条泾河,给大地规划出分外清晰的界线,这广袤的高原上成排的林木正是汲取了它的水分而郁郁葱葱。

我们想在小庙里找出一块碑来证明这位帝王的死因,结果白费精力,守庙的老僧人除了照看他那几只山羊、绵羊和他的鸦片烟枪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这座庙实在太旧了,已濒于坍塌。上一次的重修大约还是五十年前的事儿,现在又一次面临着倒塌的危险。在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帝经过这条路,在这里连骡子的饲料都

难以找到，路过此地的车夫们又都是些无所不偷的粗俗的家伙。它所背负的就是如此沉重的历史。

作为征服远东和近东而且足迹遍及欧洲大地的帝国开创者成吉思汗，这些地方对他来说是无所不及的。第二次路过这里，尽管车夫们发着牢骚，但更引起我兴趣的是，在漫天风雪中精神抖擞的、欢快的骡子，而不是故去的蒙古王爷。

在六盘山这一带，两年前曾遭到了一场可怕的大地震。^①地震后，山头移陷，地势如翻，我们是在《新世界》获知的，而北京却迟迟没有收到这条消息。我们顺着旧车辙往前走，突然停在一处陡峭的悬崖边上，往下看足有二百英尺深。我们看到了断层另一边的壁顶上的车辙，好像是末尾的两轮车与塌陷的山体同时滚落下去了。我向四周环顾，在旧路的尽头又开通了新路，地面像是被一只巨大的铧犁翻过似的。我们头顶上的那座山坡已经滑下来了，原来的路变成一处裸露的断崖，倾塌下来的黄土高达二十英尺，这个地方原先有一条河流穿过，但现在却耸立起一座山脊。

幸好这不是人口稠密区，所有的村庄都被滑坡埋没了，半山腰的农舍滑到河床上，瞬间又被从它们上方崩塌下来的沉重的山体所覆盖。一群山羊从大震中苏醒过来，摸黑沿着走惯了的小路爬上这座山，盯着这块陌生的土地而不知所措。牛棚和农舍顷刻间便不复存在，也见不到农夫的妻子推门出来挤牛奶。现在滞留在山地牧场上的人们只好把堆积的干草作为冬季饲料，人们不明白究竟为什么把他们深深陷入这灾难之中。

当这桩可怕的消息终于传到北京，当地官员们乞要短缺的饥荒专款的同时，一些无端的谣言又不胫而走，说这都是为了掩饰省

^① 指1920年12月16日甘肃8.5级大地震(按当时行政区划此地震属甘肃境内)，震区一部分属现在宁夏，一部分在甘肃，由于海原破坏特重，故现称海原大地震。

府官员们营造自家安逸窝的新阴谋。政府拿不出救济款，而私人慈善团体却慷慨解囊，这一切又使人想到似乎是另一骗局的开始。即使沿海知晓了这一真相也为时已晚，况且很快会被那些热衷于经商的人们所忘却。在穆斯林的反抗并遭到可怕的镇压之后，对地震这一不可抗拒力量的恐惧足以使几乎一半存活下来的居民举家迁移。但是，在我们经过的稀稀落落的村庄中显露的少数几所泥屋顶和新木屋表明，虽然一些人有足够的勇气背井离乡，但也有另一些人有着更大的勇气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

我到此地最兴奋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遇到了一流的猎鹰人。这些猎鹰人把架在臂上的鹰撒出去，企望能捕到一两只小鸟什么的。许多中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驯养，或许更有可能是为了消遣。对其中一只雄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一个劲儿地撩逗它，它被惊得从手臂上振翅飞入山那边的灌木丛中。我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它的主人操纵它的能力到底有多大。猎鹰人发出阵阵啧啧声和手指弹击的叭叭声来引诱它进食，把装着食物的小布口袋来回摆动着，可接近它还是有点困难，最终，那只鹰安全稳健地落在手臂上。另只鹰不是雄鹰，是只体形较小而强健的母鹰。它在被捕获时，还没有产卵，我推测，它是在移栖时被捕到的，现在它神气十足。

我急切地想与这些鹰把式攀谈。除了过去参加皇家野外科学考察活动的那几个狂热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星期外，我的猎鹰驯练术多是些理论上的知识。我的那只鹰，虽然是一只衰退的中亚品种，但没有什么能使我忘记我和我的鹰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时常翻阅猎鹰词典，祈求有一天我成为一名真正的猎鹰人。我曾有过一只受伤的美国鹰，但它却拒不接受我的治疗，我照着《杰瑞斯·马卡姆的狩猎术》所写的方法去做，结果它却凶猛地向我发出攻击，最终，它还是不愿从临时扎成的头罩中探出头来进食。我不得不给它松绑，最终看着它带着那条因

挣脱皮带束缚而造成脱臼的黄瓜飞走了，那天晚上，我偷偷地哭了，为它的脱臼的爪子而哭泣。

这是我在中国很少遇到的几个服饰华丽、面露喜色的打猎人。我向他们走去，他们似乎并不以为然，其实，他们中落在后面的那个人显然是在议论我。我看到一个身穿丝袍的中国人，他稍侧着身，托着一只漂亮的雏鹰，手里握着一条长绳，绳上系着诱回猎鹰的有颜色的诱品。当他到路边店铺里聊天时，我走近这只猛禽久久地注视着。这正是那种近东“黑眼”鹰，它的斑纹铠甲——胸脯羽毛——呈褐、红相间的杂色，羽色灿烂。虽然我们从我们的敌人十字军那里学到了欧洲的猎鹰术，事实上，阿拉伯人却更早地从中国学到了。当热心的猎鹰爱好者们在《新世界》上得知在甘肃高原上有专门从事猎鹰的中国人的消息时，猎鹰知识体系才算是真正完整了。

由于下雨，我们整整两天被困在屋子里。在这间阴冷的客房里，为了消磨时间我打开书箱，翻读着斯坦因的《契丹沙漠废墟记》，直到我由于忌妒而再也读不下去为止。到达省会兰州边缘的这段路山丘起伏，阴雨连绵，可怜的牲畜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我们不得不几次把马具解下来，把两头骡子套在一辆车上，一颠一簸地在崎岖的山道上挪动。

临近兰州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十四个小时之后，终于在晚上九点半，才在盼望中看到旅店门隙透出的一线光亮。我们的到来不知什么时候被士兵知道了，而我们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这大概是我们在泥淖中奋力跋涉毫无警觉的时候，被把守城门的卫兵发现。一群士兵从黑暗中跳了出来，抓住骡子的头，说要征为军用。我勃然大怒，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拉走别人的骡子，你们可以随心所欲，但在我这里是不能得逞的。”当这些恃强凌弱的人开始动手时，随即发生的事儿似乎是一个人在书中读到的一样。我揪住靠近身旁的一个士兵的颈背，喊叫着要他带

我们去衙门见他们的长官。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往衙门走，忠心耿耿的翟荫走在我旁边，愁眉紧锁的王译员紧随其后，黑暗中，跟在后边的人提着一盏灯。尽管一路泥泞，而且黑稠的泥水溅了一身，我们还是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这不是带我们去做正式的访问，而是被无法无天的军人非法剥夺和遭受袭击后的控告。总之，这是一个生来自由的美国人在要求他的权利。这并不需要通常的问候，而要的是立即归还我们的骡子和大车。

“长官大人已经睡了。”

“这是我的名片。”

“跟你说过了，长官大人睡觉了。”

“那就去叫醒他。”

我坚持要把那位长官唤醒，因为我们几个人和背着步枪的士兵一直在衙门大门口站着。几经努力我们到了等候室，室内桌子上孤零零的一盏煤油灯发出惨淡的光。我看着浑身的泥水滴在长官的毡毯上和铺着长毛绒的椅子上，心想，泥水把它们弄脏才好。

一会儿传令兵来了，他说，长官还在睡觉，要见的话须待天明，他这是在下逐客令，我说，我可以等他五分钟穿衣服。

五分钟过去了，没有反应。终于，在十五分钟的时候，这位阁下姗姗露面了，我没有客套的辞令，而是直接出示了我们的护照，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求。他认为，我所说的这些似乎不像是真的，因为还没有人拉走我们的车，而且，我们的车与督军为紧急军务所征用的车同属一类。再进一步说，就是每辆大车都得停下来等待征用，因此我们就没有为此而申诉的理由。我瞪起眼睛告诉他，我并非为申诉而来，我纯粹为要车而来的，在我和他交涉的过程中，我始终盯着他的脸，因要车心切，此刻我竟憋得满脸通红，像是通常印度陆军上校那种赤褐色的脸。我和翟荫都不敢对视，因为一看就知道他也强压着内心的怒火。

王译员将长官的话翻译了过来，意思是，他对这一偶发事件很

抱歉,打算第二天早晨就亲自去察看。我却说,今晚就是解决问题的好时机。他不无遗憾地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他所能解决的,权限在督军。我说,既然如此,那我们最好马上去督军府。这话果然奏效,他让我放心,说明天早晨一定会归还我们的两轮车,我知道硬逼着他未免太过分,就表示我要和衙门的一个传令兵同去,再带上一纸长官写的便条,问题就可获得解决。

就这样,我们的两轮车又归还给我们了,这种经历,对车夫来说恐怕在这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十分感谢我们,说如果听任军人的摆布,他们的骡子就会累死在服劳役的途中,而只有极少的骡子能够活着回来。

在兰州四天,最初给人的印象是荒凉而凄寂的,但这确实是一座真正使人产生兴趣的城市。在两面高山的夹峙之中,黄河泛着光波流贯其间,浩浩荡荡流奔东去。热情的中国内地传教团的团长邀请我们聚餐,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已与苏格兰人、澳大利亚人和英美烟草公司在这里的促销代理人混熟了。比利时教士拉着小提琴,奏起了悠扬的小夜曲,并且取来纯正的紫葡萄酒来温暖我们的心,使我们倍感亲切。除了这些很早就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以外,还有一位暂居的中国邮政特派员,他也是外国人,他安排了一个西餐会来专门款待外国人。参加聚餐的有一位伍森(Wulsin)先生,他正准备把采集来的鸟羽和动物毛皮打成包,运回哈佛大学。这是他和他的夫人在青海和西藏边境采集来的。眼下,他正等着黄河的水足够深,以便可以使由一百二十个皮囊组成的筏子漂流,以便带着他们的行李到铁路终点。

所有这些外国人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那位教士和澳大利亚人热衷于摄影;传教团的团长对中国西部的伊斯兰问题比其他任何白人研究得都深入;刚刚结束长途旅行的伍森夫妇在他们所收集的禽类和动物的研究方面最有发言权;而风度翩翩的斯科特(Scott),是在布莱克沃茨经历过世界大

战幸存下来的少数军官之一，他的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他那个参战团的全部经历。

在座的有一位芬兰皮货商，我以前曾在蒙古首府见过他；还有一位俄国难民，他曾被迫在狂人巴隆安吉尔(Baron Ungern)恐怖的蒙古人手下做事，他熟知图什嘎(Tushgun)喇嘛的神秘宗教仪式；而奥森道斯基(Oossendowski)医生，是《动物、人类及其造物主》的作者。他们每天都在这里或那里进行这样的聚会，像枫特诺依(Fonteroy)战役、地处寒冷而偏远的青海居民、中国的穆斯林以及各种激进的论调、批判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席间讨论的话题。但是，所有这些讨论自始至终都是以险象环生的中国为背景的，这种背景是以瞬息变幻的情感政治以及适宜于人们在其中生存的相对稳定性为其特征。我们对讨论的所有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我认为，正是经历了多日旅行之后，这些白人们才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些情况，并且从这些谈话中我们也更清楚地认识了这条道路前方的西藏和中亚的交叉点的一些情况。

第六章 凉州^①

已经到10月了,当我们离开这座充满友谊的城市的时候,要跨过一座长长的美国人架设的黄河铁桥。^②这是这条河上仅有的两座桥中的一座,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由美国工程技术造就的有钢板护栏的铁一般坚固的桥梁上,不断通过的竟是来往于新疆的牦牛、骆驼和满载的骡车。对岸的山坡上正牧放着一群牦牛,我可以肯定,从现在起,我们今后看到的牦牛要比这多得多。这些牦牛并不是沿着这条伟大的西行之路来旅行的,除非它们是沿着进入西藏的公路到兰州来的。

在去往凉州的这个星期里,旅途中遇到的天气总是似晴将雨,最后的三天,两轮车行驶在开阔的河滩上,车轮碾压着松滑滚动的大鹅卵石,一路颠簸,速度慢极了,我老是盼着快点儿走到正常的土路上去(图十)。正当我们爬一个坡的时候,离我们不远的前方路南约两英里的山头上,突然降下了一场雪一般的雹暴。这几天来,除了途中午休和晚上到村庄投宿外,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过行人,只是隐隐约约地看见赶着羊群,披着羊皮袄的一个牧羊人和受

① 凉州,即甘肃武威。

② 兰州黄河铁桥,是清末德国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与清政府甘肃洋务总局总办彭英甲等人在签订包修合同后修建的。建桥材料全部自德国运来,工程技术人员也以德人为多。泰来洋行聘请了美国籍工程师满宝本为建桥专家。因此,兰州黄河铁桥是德国人修建的,而不是美国人修建的。有关创修兰州黄河铁桥的档案材料,现存甘肃省档案馆。

了惊吓而狂奔的几头牦牛。这几天我们是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脉前进的,但这里的山并没有其他地方的那种千姿百态的变化。晚上,我们在一个又一个肮脏的客栈里过夜,守着两辆破车以及病骡,这种恶劣的环境使我们实在顾不得再去想其他的事了。

黄昏时分,我们经过一条小河进入了城镇,就在那一瞬间,旅途上的那种荒凉沉寂的感觉被驱荡得一干二净。飞过我们头顶上的是上千只肥硕的大雁,雁队从头到尾齐声嘎嘎地鸣叫着。这群中国大雁发出的叫声,听来虽不像我们的那种悦耳,但这足以使我这个新英格兰人激动不已了。远远地看,排成的雁队有一英里长,只消三分钟工夫,它们就像狂风似地呼啦啦掠过大地,也飞过我们的头顶,发出如同猎狗一样急骤的叫声。10月的甘肃,很像同样季节的马萨诸塞州,此刻的雁鸣真能使人感到一阵冷颤。

凉州看起来并不很大,下午到那儿以后,我们打算次日清晨再上路。因为我们带着给中国内地传教团的信,所以要步行送到福音堂去。这是一个冷飕飕的星期日的下午,一小群人或蹲或坐在传教团院子门外围了一圈。人群中坐着一个怪异的人,他的拇指按在一本合着的《圣经》上在向人们讲道。我们走近他的时候,他站了起来,用苏格兰方言和我们打招呼,邀请我们参加到他们的圈子里来。这时,传教士还在家里,而他仅仅是作为来访者利用安息日的下午在教堂的门口尽他的布道义务。他看上去很像是艾特克·谢泼德(Etrick Shepherd),只不过没穿苏格兰方格花呢披衣。他叫H先生^①,我和他只聊了一会儿,就感觉到他对中亚和新疆省简直无所不知。我猜他可能是四十年前穿着他母亲在皮拨斯(Peebles)按照服装裁剪书做的衣服到中国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来的。当他在乌鲁木齐把这套衣服穿破的时候,他就让裁缝照着这

^① 即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中亚探险家兼传教士,他的一生中有五十七年在中国度过,死于1946年,葬在乌鲁木齐。

个式样又做了一套,之后,那套衣服又穿破时,他又让裁缝仿制了一套,我眼下看到的也许是第四套或第五套了。看来一个欧洲人穿着新疆本地用织机织出的精细毛衣并不合身。他身材高大,马甲没系扣子,敞着怀,上身发胖的部位明显地凸出来。外套的两只袖子足足短了三英寸,露出赤裸的腕关节。一条老式的领带皱皱巴巴的,好像每日清晨都要从头至尾费劲地扎一遍似的。他的拇指仍旧按在合着的《圣经》上,心中俨然充满了对神的恩典的感谢。他把福音书翻译成三种中亚语,经常驾着他自己的骡车穿行于农田小径,用汉语、土库曼语和撒特语(Sart)及其他语言向这里的人们传扬福音。这些都不是他自己说的,他的拇指一仍旧贯地按在《圣经》上继续他的讲道,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传教士和他的夫人告诉我们的。

下午在正式的茶点上,我们受到葡萄干饼和上等牛奶的招待,与这位老人聊了两个小时,向他了解了教区内的教徒和这条道路上外国游历者的情况,还询问了曾和他待在一起的往返于吐鲁番古城的法国、德国和英国考古学家们的情况。伯希和、斯坦因、勒柯克^①和亨廷顿^②,所有这些人他都熟悉。但他居然不知道我们要到甘肃来,在他的言谈中流露出对我们到来的惊异。特别对我们走了七八十天的行程后突然到来似乎缺少某种思想准备,使我们有点儿不快。见面以后,这种意外之感仍在缠绕着他。他希望能和我们同行,但他实在没办法自己雇一辆两轮马车,而我们不管

① 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德国考古学家。曾于1904~1905年、1905~1907年、1913~1914年三次赴新疆探险,发现并带走大量的古代遗物,如壁画、遗书、古物等,并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回鹘文的研究贡献最大。

② 亨廷顿(Huntington 1876~1947),美国地理学家。1905年入中亚探险,发现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梵文、于阗文写本。

怎样又必须要带上装满书的皮泼斯产的棕毛箱子,还要捎带上准备运往乌鲁木齐的装着药品的一对马鞍袋,再向西走一个星期,把这些东西留在甘州^①。这样的话,我们的马车上才会有空间给他。这就要求他要先骑着骡子,驮着面包和茶叶先到甘州,这样就要比我们晚几天到。我倒情愿等上一周与这位博学多才又有着丰富经历的老人做伴,但时间不允许我们再耽搁了。

当涉及到中国的穆斯林话题的时候,他谈到了甘肃地方部队的情况。他说:“那些可怜的孩子非常粗野,动不动就打架,他们把我抓了两三次,但我都说服他们把我释放了。”这就是我们从他那儿了解到的在旅行中士兵们抢劫甚而掠夺的全部情况。我们还了解到,《泰晤士报》的记者,后来做了中国政府顾问的莫理循(Morrison)^② 博士就在兰州,他对中国的新疆问题最具权威。

从凉州起,两个驿站之间的距离近多了,但情况却不见得更好,因为在这个地区越走越趋近沙漠,村庄之间要想找到食宿都相当困难。走一天要经过好几个城墙和房舍都完好的但全都废弃了的城镇。在远远近近的山麓小丘上能看到围成圆形耕地的大片军屯畜牧场。每个畜牧场后边的高墙上都竖立起一个矩形瞭望塔。这个地区曾经而且可能会再次发生汉人和穆斯林的冲突,如果这样的话,穆斯林就会再一次控制这个地区,这就是一个证明。汉人和穆斯林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尽管许多穆斯林在这里定居了很长时间,而且他们只会说汉语。这些蓄着胡须的中亚人长着鹰钩鼻子,眉宇宽阔,褐色的双眸,与相貌平平的中国农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① 甘州,即甘肃张掖。

② 莫理循,法国驻华使馆要员,西夏文研究的先驱。1904年从北京偶然得到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写本,撰成《西夏文字解读》,是国际西夏文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在这条荒僻的道路上,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一伙人,他们护送着由骡子拉着的三架轿车,这些人带着枪,从鞍座和膝盖间露出老式的马刀,一看他们就是一帮凶狠善斗之徒。我肯定其中一个轿车里坐着一位曾帮助过凯姆(Kim)和他的喇嘛的老妇人,因为从帘子后面不断传出尖声的话音,面目原本凶狠的士兵却龇牙咧嘴地陪着笑脸。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穿着猩红色的上衣,前胸和后背都绣着大大的黑色汉字。显然,这是某一个卫戍边陲的士兵在皇帝时代留下来的遗物。我很想停下来和他聊一会儿。

在这条行人稀疏的道路上,有一群人迎面向我们走来,大概有十几个人,他们的羊皮袄里揣着干粮,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插着一把制作粗陋的镰刀。他们这是在收割后的归途中,在庄稼成熟的季节,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要赶场几百英里。有时他们两个年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能回家,不过,一般来说他们在冬天农闲时和家人可以待上几个月,外出时,通常是一个村子的人结成一伙,回家时,又都一同踏上归程。

第七章 俄国难民

几天以来,隐约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模糊的感觉,好像在这条大西北的道路上总有别的外国人和我们在一起似的,而这些人似乎又不像是来探察游历的。当然,电报线路会不时地直接传出到这儿来的外国传教士们和欧洲考古学家们的消息,可是这股愈加强烈的感觉总是跟随着我们,但是又无法追寻。每个旅店的每间房子和一些废弃城镇的许多光秃秃的墙壁上,都涂写着几个月以前离开这儿的俄国人的姓名、团队的番号和日期。在这条古老的商道上,在过去经过曲折艰难的行旅,丝绸被无数双手运往近东并从那里运抵罗马,除了带走了无以计数的丝绸之外,还带去了关于这条商路的秘密的故事,现在,它又一次成为连接东西方的要道。最近三年来,走在这条路上的西方人比曾在两千年内来过的还要多,可以预计,今后几百年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到这儿来。那些沙皇俄国人是从小红色恐怖下逃向东方的。他们从里海附近可汗的领土,从位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城市,从乌克兰(Little Russia),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上曾一度繁荣的城镇逃到这里,或单枪匹马,或结伴而行,终于,逐渐地聚集了庞大的有四百辆车马的逃亡大军。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那儿的难民就随处可见,上海和天津也无法接纳上千名新近出现的乞丐群,在日本城市,第一次见到了白种人和赤脚的白人妇女在路边向亚洲人行乞。

我们只是感觉到了他们在这个国家偏僻道路上的存在,而真正遇到的只有两个这样的流浪汉,而他们又在我们的探险活动中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是,就在我们离开兰州

的第四天,当时,我正在旅店院子的牲口棚里四处张望,看见了一辆破旧的可套三匹马的老式俄国四轮旅行马车。我站到了宽展的包着铁皮的踏板上面,在我看见它之前,就已经闻到了厚厚的皮革车篷散发出的气味。这正是座子深陷而且车夫的位置很高的那种不透水的旅行车,我曾乘坐这种车沿着西伯利亚林木茂密的道路驶过好几百英里。我坐在了车上,仿佛看到中间驾辕的那匹漆黑的雄马飘动着长尾巴,高昂着头轻快地小跑,而在边套上和它并驾齐驱的同伴却弓着头费力地奔跑着。还有一次,我从一位墙上挂着油画的公爵家临时外出,搭乘他家的车在雪地上奔驰,车上是裹着厚大衣的主人,做工的女仆恰好和我们坐在后面,我亲眼看到飞奔的马车把追我们的狼远远地甩在后边。总之,驾驶正宗的四轮马车比驾驶任何不入流的马车都要浪漫得多。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沙皇军官和他的夫人被迫抛弃了适于他们身份的四轮旅行马车而搭上丑陋的、前后摇晃的中国两轮车呢?遗憾的是他们已经搭上了那辆车,起码到目前为止已经沿着那条路走了如此之远的距离。就我所知,三套车进入西伯利亚的最捷径的路线是从乌鲁木齐直达额尔齐斯(Artish)河,而那条路要比我的老朋友曾走过的路要多走三十八天。

欧洲人的皮革挽具散发出来的气味常常令我感伤不已,这算是我所感慨的第一件事。而另一个,是在中国的这条路上遇到的那双碧蓝色的眼睛和留着斯拉夫式头发的男孩,则更使我黯然神伤。这个男孩还不满十六岁,瘦削的膝盖从破烂的裤腿里裸露出来。卷发上是一顶中国式的帽子,脚上的长筒靴缀满了补丁。我想我会花许多精力教他骑马,让他吃饱,然后把他带回家接受教育,但是翟荫提醒我说,教育是典型的美国人解决难题的办法,正如狄克(Dick)^①先生用在浪迹天涯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al Cop-

① 狄克是《大卫·科波菲尔》的作者,也译作狄更斯。

prfield)身上那句简洁的“革心洗面”的话一样,也许狄克先生早已发现了更加意味深长的答案。我们不再说那些半懂不懂的俄语了,但这样我和这个男孩就再没什么语言可以进行交谈了。他是从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来的,身上的钱花光了。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了他,他将来会怎么样呢?在这个冷酷无情的环境中,这双纯真的碧蓝色的眼睛将会变得目光呆滞、冷漠无情,清秀的面庞也将被扭曲得可憎和凶残,我把他留在了北中国的寒冬里,留在了缺少怜悯与同情的黄种人之中。此后又有一些俄国难民行进在这条古道上,其中还有许多妇女,但没有一个给我如那个小伙子一样深刻的印象。

我们顺着长城已经走了好远了,这段长城还不足十五英尺高,但总体来说长城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其原因是因为它自海边为起点绵延万里的事实。我从仍可分辨出的因掘土筑墙而形成的堑沟来判断,这一段长城大概还不是最古老的。一天傍晚,我们好像在这段长城遗迹的引导下通过了它的一个豁口^①,并沿着与豁口平行的路线走出长城。

中国人对出长城是很忌讳的,在他们的观念中,往往把这与谪戍边塞,惆怅悲苦以及蛮荒部落的强抢劫掠联系在一起。当我们通过了这道命运攸关的界线的时候,车夫们就开始了唧唧嚙嚙,转瞬之间又突然暴躁起来,由此使我记起了上述这一点。这股情绪随着远处野狼的嗥叫声和隐约可见的两个朝我们这边走来的似乎不很友好的人影而愈加激愤。他们这种无可名状的敌视情绪当然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也不可能针对我们。在蒙古高原古老的边界线内崎岖不平的丘陵上,我们沉重而缓慢地走着,越来越觉

^① 指甘新公路在山丹至张掖途中的426公里处穿过长城,形成的一处豁口。现该处立有“长城遗迹”碑。

得在这茫茫旷野上迷失了方向，而偏偏这时候，夜幕就要降临了。但这终归还不那么十分令人担心，无非推迟到次日天明再去喂牲口，其实我们并不愿意这些骡子空着肚子过夜，但那句“走边外”（“Beyond the Wall”）^① 却使我们外国人都受到了感染，一股恐怖感袭来，使我们不寒而栗。所幸的是，在天黑之前，我们重又找到了原来的西去之路，车夫们的情绪也好多了。

在甘州这座大城镇我们只住了一夜。担任中国内地传教团西部代理人的那位中国医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急于打探外边的消息，我们又不能在这儿停留过久，只简略地向他通报了一点儿情况。下次我们和他再见面将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儿了，那时，他的情形将会怎样呢？

出了甘州两天，我们第一次遇到了裹挟着黄沙的近于褐色的尘卷风，羚羊以惊人的速度穿过沙丘。正如我们经常遇到的那样，我简直不习惯这种情景，狂风袭来，总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恐怖的紧张感。

那是一个略带寒意的清晨，也是一个令人振奋难以忘怀的清晨。我们在黎明前一个小时出发，当我们离开这座城镇矮小的城门的时候，满天繁星密布，寒风凛凛，月牙还挂在空中。我们的两轮车碾压路面发出的辘辘声响，惊动了在路边渠中栖息的肥鸭扑棱棱拍打着翅膀，四周传来低沉的咯咯鸡叫声和嘎嘎的鸭鸣。

那是鹅！一个群鹅聚集的世界。在距我们头顶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鸣叫，忽而又在收割后的田野上掠过，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时，天渐渐地透亮了，四周的轮廓开始呈现在眼前，群鹅都亮起嗓子像吹着号角一样高声争鸣，它们呼应着向领头鹅发出信号。灰暗的拂晓时分，从下面看，群鹅宛如闪着白光的幽灵。以前，我还从来不知道鹅发出的叫声有这么多音调，这么多节奏，还

① “走边外”，边指边墙，即长城，意指到长城外去。

能抑扬顿挫。看着它们展翅飞奔，咕咕啾啾，低语着，喧闹着，仿佛是长了羽翼的少男少女在做长途飞行。

这时，长空中一支庞大的鹤队正振翅高飞，间或从低空掠过。起初，这支鹤队井然有序地做平行状飞行，一会儿，又协调一致地以阶梯形俯冲，而后又都平静地伸展着翅膀，盘旋在空中，好似一个个巨大的长圆形托盘。当它们落入地面，又变成了硕大的“？”，每只足有几个月绵羊那么大。

当红彤彤的旭日升起后，在晨光的辉映下，那些和天鹅一样大的或较小一点的如美洲驼一样大的鹅仿佛披上了金黄色的浴衣。路边上有一块离耕地不远的湿地，群鸭唧唧地在湿地里嬉戏，鹅漫步在农田上不时地在地上觅食。一会儿，光线变得更强了，我又看到了沙锥鸟，鸫科鸟和成双成对的小鹏鸭。有一只冠毛黑白相间的沙锥鸟，涉过浅水，异常柔顺地在水边蹦来蹦去，还有一对像我们见到的燕鸥一般大小的大杓鹬，在地上走起来就像踩着高跷，它们面对着我亲昵地呼哨着，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缅因州。那遥远的农庄、狗吠、驴叫和鸡鸣，此刻早已沉寂了下来，而身旁的鹅群的呼鸣，头顶上的鹤队发出的唧唧喳喳使周围一片喧嚣。

群鸟的鸣叫和飞禽在田野上唧唧啾啾地啄食，使清早一片生机，但这是在异国他乡的途中，心境截然不同。

到了下午，脚下的土地转瞬之间变成了沙漠，我们又看到了羚羊在沙丘穿行。这里没有村庄，也没有耕地。田野上的狗叫和人们赶驴的吆喝声被蒙古高原的极为荒凉、贫瘠的连绵起伏的沙漠所取代，尽管我们距耕地才不过十二英里。

这里远离沃土，短促的春雨积留在干透了的沙地里的所有水分虽然被无情地蒸发了，但在整个夏季还是顽强地长着一些沙生植物。这是我们见到的全新的植物群，远处沙丘间的羚羊、刺眼的黑色甲虫以及在植物根部之间急速游弋的蜥蜴，这些也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脚下和前面的地面都是白花花的碱，起伏不平的沙

地饱尝着苦涩。这儿很难有游客过往,以前人们歇宿时留下的交叉的两轮车车辙成为惟一的痕迹。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前面的一个村子停下来,那儿的村民从低地附近拉出满车闪烁着水晶般白光的盐。我们的一头骡子得了可怕的肿胀病,我真担心这头可怜的牲畜的肚子会胀破。在这里治疗这种病是用一些家常药,包括从骡子的左耳灌入高粱酒,因而我们这一队人情绪不振,步履蹒跚地到了一所简陋寒酸的客栈。我们意识到,到达肃州^① 还要有一段路程,只有租用骆驼才是去蒙古高原的最好办法。

^① 肃州,即甘肃酒泉。

第八章 驼 队

在肃州城的整整十天里,我们熟悉了每条大街小巷,除了路过并打算在这里居住的俄国难民或一些中亚人之外,再没有别的外国人了。这些中亚人在主要街道上开面包房并经营贩马的生意。

首先,当务之急是雇骆驼。这里的穆斯林是从新疆来的运羊毛的人,他们宁愿组织三四百头骆驼的旅队在鄂尔多斯草原走上五十天,也不愿与我们这些疯狂的外国人一起前往那远离水草的地方。六天以后,当一个骆驼主终于答应下来的时候,我们几乎耐不住性子了,而这种事情在中国往往是要有耐性的。他的要价几乎没有余地可讲,但经多次讨价,还是比我们与别人谈的少了三分之一,最终,商定在四天内,最多不超过五天他就把骆驼领到城里来。

一天黄昏后,旅馆门外响起了声声驼铃,接着是一阵敲门声,两扇大门突然被撞开了,骆驼前呼后拥地挤了进来。我站在原地,手里的提灯在围墙四周映出一个个晃动的骆驼头和粗壮的脖颈的影子。它们迈着大步顺着墙根转了一圈,然后头尾交错伏在地上,一眼看去,整个院子全是高高的驼峰和长长的脖颈。那位厚道的老军官已经款宴过了我们,上午十一时给我们送来白兰地酒,现在又派来一名肃州城里最脏、相貌最丑陋的人到我们的旅馆里担当我们到蒙古高原的向导。向导对这条路是很熟悉的,所以我并不希望让他借助于我们地图的帮助,于是立即带他到灰尘弥漫的旅店院子来,他满是老茧的粗硬的手指着自带的地图上的那条羌谷河和我们将要去的已成废墟的城池的位置。尘土弥漫中,他指出

的位置就像斯坦因精密的三角测量仪测量的那样精确，我们当即就雇用了他。尽管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我还是马上表明态度，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向导沿袭下来的习惯，他还要为我们的安全，包括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性结局负责，他认为这也是当然的事情。

几天以前，一个萎靡不振的鸦片商带着他的十七岁的小妾和四个身强力壮的保镖来到了这个城镇。一天，在向东去的路上，他们被两个土匪挡住了去路，这两个土匪要他们留下所带的钱财。这时，那四个高大强健的保镖却躲开了，当这个商人从他的两轮车的钱袋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慢慢地下车的时候，土匪开枪射中了他的脚，然后把两轮车洗劫一空，骑马逃之夭夭。枪伤如不及时处治，就会染上败血症。翟荫把一块脏布撕成长条当做绷带，把药涂在纸片上，我们把由弹头穿透了的发青的伤口洗净。翟荫天天都去探望他，我们能做的只能就是这些。当我们离开时，这个商人为了表达谢意，送给翟荫和我几包香烟、葡萄酒和蜡烛让我们在路上用。

骆驼驮得满满的，无法再增加负担了，可临走的时候，为难的是那位军官又给我们送来了礼物。四个民工整装待发，向导也已把他的背包扔上车，领驼人和站在骆驼下的那两个人也已经各就各位，但三十来个围观的人中的一些好事者却要把一峰驮得最重的骆驼上的货卸下来。我不同意。他们告诉我，肃州城外一片洪水，天黑路不好走。我不相信，认为这是他们临时编造出来阻止我们立即动身的理由。为了让驼队尽快动身，我们已经给驼主付了一笔钱，但现在他们却要让我们浪费我们已经“购买”了的一天时间。驼主是位很谦卑的人，他尽管很想让我同意明天再走，但对我还是一个劲地说，如果我决意要走，他愿意马上就动身。装载量的决定权在于我，而我也拿不准这片旷野是否真走不过去。当我们最后被迫卸下多装的货物时，我看出了他的窃喜，他提醒的那个问题正是我所没有考虑到的。在留和走的激烈争论之后，我们还是于傍晚六时出发了，尽管当时我的确并不十分确信我所选择的远

行出发时间是正确的,这是我很少有的固执己见的一个实例。

在泥泞中跋涉了几个小时,我们一直行走在湿滑的道路上。前面是灌满水的深深的壕沟,那头小骆驼走在最后,一失足,就被卷入急流向下游漂去,显然马上就有被淹死的危险。夜里冰冷而凄凉,我们几个人跟踪着这头落入水中的小骆驼,就在它将被淹没的一瞬间,我们托着下颏把它拉了上来,然而,这头骆驼却在一个劲儿地试图想摆脱我们,它驮得太多了,好不容易把它拖到岸上,把它背负的行装又重新整理了一遍。十分钟后,领头的那头高大的骆驼把我们带到了一条纵深的河湾,河水发出哗哗的声响,汨汨流淌,有如阵阵呻吟,我们的心情也突然间沉重了许多。

我们在这条河湾上奋力跋涉,直到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向导提出了建议,说往东南走是条干路,而且可以一直走下去。我们在大约离开起点三个小时后调转方向,极小心地择路而行,又安全地返回到肃州城的边缘。一支巡逻队拦住了我们,我们遇到了盘查,他们扬言要对十三头骆驼每一头征收十两税款。由于我被接连而来的重重忧虑弄得焦头烂额,对眼前这件麻烦事不知如何处理。如果要对他们发火,反会陷入困境。只有权衡利弊、相机行事,哪种效果好,就按哪种办法办。这的确产生了奇妙的效果,结果缴纳税款的事因此而作罢。

当我们离开了肃州黝黑的城墙时,皎洁的月光似水银泻地,南山山脉就像染上了一层朦胧的银白色,而远处却是黑压压的层层峰峦。不久,我们在一条湍急的小河边,沿着相当陡峭的小径蜿蜒而上。我们像戏剧中的走场一样迂回行进,明亮的月光映照下的黑影歪歪扭扭。最小的那头骆驼在水沟里拖延着不走而忘了有可能再次被淹,尽管它耽搁了我们好一阵子,但我们担心的却是它的安全。它每走一步,鼻索就绊一下,月光下在陡峭的山路上负重行走,难免会栽进对面的山沟里。翟荫和我果断地让驼队停了下来,让它们一个个分别通过山顶,骆驼们驮着相当多的小件累赘,被堆

放在山腰上,每峰骆驼的负重明显地减少了。羊皮衣和皮裤由骆驼驮着过山顶,堆在山腰上的是些瓶子、长筒靴和在最后一刻由那个军官赠送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骆驼抬起前蹄时,我匆忙地抓紧了缰绳,身子猛地后倾,脚却一下子抬得比骆驼头还要高,几乎掉下来。这时我们又走上了一条坑坑洼洼而又黏滑的小路,我用手撑住骆驼的后背,可是不停的抖动还是把人剧烈地向上抛,颠簸,震颤,震颤,颠簸,就这样,持续了一夜又一夜。在整个旅途中,这样的日子,我们首先过了十四天,随后,休息了十天,又走了二十二天。这些日子一直是在这样颠颠簸簸中度过的,而我好长时间未受过这种颠簸之苦了。我受到的特殊照顾是骑在一峰臭味熏人的高大骆驼上,到后来因睡着了而摔下来,然后又爬了上去。不一会儿,天气又变得刺骨的寒冷,使人无法忍受,我又从驼背上掉了下来,我真想舒展一下腰腿,好好地睡上一觉。翟荫比我能忍受这彻骨的风寒,他整夜和我们共渡难关而不发一句怨言。

由于骆驼在白天可以散开寻找有限的牧草吃,而且在某些危险地带还会遭遇群狼,所以我们主要是在夜里走。我们经常能清楚地听到狼嚎。一次,来了一个牧驼人,他赶着一群骆驼,他告诉我们,他见过五条狼袭击一峰骆驼。狼每晚的嚎叫在月圆之时进入了高潮,这已不是单纯地嚎叫了,似乎像是无数惨人的声音组成的合唱,忽高忽低,又像是魔鬼的弥撒曲与圣歌在一唱一和。

头一夜,驼队到了一眼泉边,我们没有任何准备,顾不得舒适与否就在陡坡上合衣而眠。

清晨,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悬崖之下,崖顶上有一座废弃的建筑遗址,遗址中还有一座砖砌的底部呈正方形而上部渐细的瞭望塔^①,这种瞭望塔遍布于中国西部。顺着这些大路和小径一

^① 这里的瞭望塔,指长城烽火台遗迹。

直往前走,就是蒙古区域的一部分。正午过后,我们开始出发,走出了这群小尖山,肃州后面南山顶上的积雪在阳光下依然眩目。这天晚上八时,我们摸着黑在三道岭(San Tao Ling)的一段可涉过去的河段边停了下来,小河已经结出明亮的冰棱。第二天早晨渡河时,这些中国人竟破冰而入,周身浸在布满卵石的刺骨的水流里,这让我非常感动。河水深及驼背,放荡不羁的那头最小的骆驼企图在水中摆脱背上的负载又险些被淹,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分三次涉过这条河。

第九章 沿黑河而下

在金塔县^①，我们向县衙门递交了通行证，为了欢迎我们，这里的地方官从县上的几个部门和边远小镇上召来了八位寡言少语的士绅陪我们吃了饭。这个地方官的兄弟最近刚结婚，他曾带着新娘到羌谷的下游——黑河蒙古王爷的帐房里进行了几天的旅行。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燃料和水的确切消息，但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被废弃的城市他却一无所知。

在宴会之前，我们搭乘这个地方官私人的马车已经进行了一次远足，这驾阔气的有车篷的马车在这个县上是颇有盛名的。驾辕的骡子似乎急于在外国游客面前炫耀，马不停蹄地沿着溢满水的绿洲田地中间的小路尽情地奔跑，直到最终在一座未设护栏的桥边突然停止了奔跑。不得已，这匹马只好由两个农夫、车夫一起小心地牵过了这座小桥，为了不失尊严，尽管我们虚惊一场，但我们并没有埋怨。

我们停在县城外，一座金塔（金色的塔）映入眼帘，这座县城的名称就来源于这座金塔。他们告诉我，塔的圆顶从前是用纯金覆盖的，而不是现在看到的上面涂覆的这种黄油漆，而且是从我们恶名远扬的国家来的那个人把它剥光的，这种结论似乎有失公允，因为美国人以前可能从未在任何时候来过这儿。从这个建筑物显示出的年代特征看，它建于几百年以前，但是，毋庸置疑，它的建筑风

^① 金塔县县城东南五里处有一座古塔叫金塔，县名由此而来。

格却很古老。^①当我注意到祭坛上的那些现代塑造的糟透了的泥塑像中间,有一尊公元7~8世纪的精巧的古铜佛像时,就愈发使我相信了这一点。类似许多这样毫无价值的塑像在北京商店里到处出售,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它的原地看到它。看来对于我们即将进行的工作是一个好兆头,当地方官的兄弟把这尊精巧的古铜佛像作为一件礼物劝说我接受时,我仅仅略作推辞便接受了下来。倘若我能预见它会把我们搅得心绪不宁而且几乎打乱了我们完整的计划,以及它在结束长途旅行后重新回到它那悲惨的环境的话,我绝对会郑重地把它留在那里。

翌日午前,我们带着地方官用纤细的蒙文写给当地游牧部落王爷的介绍信,立即动身沿着金塔远处狭长的连接绿洲农庄的道路出发了。由于我们的骆驼不时地在溜滑的沟渠上寻求平衡,而且要在秋季被洪水所淹没的路上溅着水花前进,我们直到日落才赶到。洪水一遇冰点以下的温度就会在干枯的戈壁上结成薄薄的一层冰,冰冻期一直延续到开春。秋季的洪水据说是由之前降落在我们南面的西藏地区的山脉上的雪在阳光照射下很快融化而引起的。几十条溪流曲曲弯弯流向北方,隐设在这高原的荒漠戈壁之中,假若这些雪水全都奔涌而下,那将汇成汹涌的波涛,澎湃千里,其险情不可想像。

在天黑以后,我们到了驼队主人家,在他家院子里支起了帐篷,他家就在这同一块绿洲上。主人在他的院子里给我们腾了一个小空间,在堆起的粪堆旁我们搭起了帐篷,想想不同的人在这个晚上在自己家里都在干什么呢?今天正是万圣节前夕,此时,孩子们早去掉了芳香馥郁的南瓜心,在南瓜上挖出双眼,露出三角形

^① 据说建于唐代,原名筋塔寺(塔以筋砌),明万历二十三年改为金塔寺。后不知毁于兵乱,还是年久倾颓。清代修复后,雍正十年改为塔院寺。不过,至今人们仍习惯称之为金塔寺。

的鼻子,做成面具,嘴的部位刻上参差不齐的牙齿。他们竞相追逐,挨家挨户地吓唬头脑简单的厨子们,在幽暗中,客厅里的女仆几乎吓昏过去。我似乎闻到燃烧了一半的“南瓜藤”的味道,就像将要熄灭了的蜡烛味,我仿佛鬼使神差地爬到了葡萄藤架后边的门廊上面,推开窗子,用手把举起的灯笼垂放下去,突然感到手中空空,我猛地醒悟过来,我这是大白天在蒙古边境骆驼主人的家里。

这两天,我们常常是沿着被水淹没的道路溅着水花前进,沿途排列着的小沙枣树下落满了枯枝败叶。就在第二天下午,我们见到了真正的沙漠,这里遍布着小块小块白花花的盐碱地,羚羊在分布着一丛丛到处可见的骆驼刺中窜来窜去。这时恰好是日落前的最后几分钟,我骑在高高的驼峰上,凝视着我们一直沿着长长的矮土冈所走过的路。忽然间我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东西,一下子从骆驼的脖颈上滑下来,并几乎同时,对着前面领路的翟荫大喊一声。的确是太壮观了,远处是平展延伸、一望无际的大自然,而近处沙漠上的小丘就像是上千座长长的屋脊,好像它们是由沙漠风雕刻出来的。

我们在这些屋脊上仅用手刮了一会儿,便发现了一些平整的灌木捆,用柳树或是用杨树的细枝排列成一纵行桩子,斯坦因辨别出这向西推进不远的一圈最早的长城,这是在我们的时代最有戏剧性的发现,也是一个对阐明早期中国和中亚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发现。墙脊约有五英尺高,几乎是正东北至西南走向,毫无疑问,这长城建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是中央王朝为抵御扫荡中原王国的游牧民族,把他们挡在蒙古高原之外而设的一部分防御设施。

在暮色降临前,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考察这段数百英尺长的城墙。在某些地方这些木捆的末端已压得光秃了,但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木捆仍然覆着几英寸厚的泥沙。这些包紧的木捆,每隔二至三英尺就搀插着强韧的枣木桩子,有着从中心线劈开的明

显标记,像是被一种相当尖锐和沉重的工具劈开的宽痕。

我们的宿营地设在一眼泉边,这泉既叫臭水坑,也叫脏水井。早晨我们及时起床,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用五个小时清理出了一个石平台,这凸出的自然岩石,约十平方英尺,明显的与长城有着某种联系,在它的上面原有一个建筑物,这个不高的建筑物是由同样枝条包裹的木捆和一些未烧过的黏土砖块构成,它们排列在一层稻草上,这些稻草虽然都是规整地放上去的,但并没有全部粘在一起。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有好几层排泄物,我们判断那曾是看管小马驹的棚子,可能也有人常住在那里,但我没有发现明显的迹象,仅有的两三段马具绳子和表面的一些陶器碎片是对我们劳动的全部报酬。

那天傍晚,我们一直跟踪着低墙直到天色太黑看不到为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挖掘,总是发现同样枝条裹着的水平排列的木捆和包紧的桩子。在极少的地方,看到这些土墙被这里常年肆虐的狂风刮得扭曲变形,表层也被风蚀了,在这样的地方,腐败的木捆留下了一条深深的、黑黑的条状泥印,与灰色的沙子和戈壁卵石有明显差别,在这古墙边常有旅队露宿,需要燃料,因而有上千棵已死去两千年的树木,躺在那儿。

两天后,我们到达了黑河——或如蒙古人所称的羌谷(图十一)。这是条较大的河流,河水急速地冲刷下来,切割着两边黏性土质的河岸,显得那么险恶。营地的赶驼人在河岸议论着什么,声音渐渐减弱,这情形如同典型的罗马中部的农夫站在那儿,似乎他们在等待着河水退去,翟荫和我却不愿意这样等下去。于是挽起裤角,下水试探深浅和水底的淤泥。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发现了一条倾斜的路线。赶驼的领头人骑上他的小骡子下水了,驼队被分成三组,每一组都由一个蹚水的人牵着走,这样,假如有一峰骆驼失足的话我们也不会全军覆灭。河水没及骆驼的腹部,翟荫骑的那头骆驼突然甩动拴在鼻子上的缰绳,吓得翟荫心里怦怦直跳。

靠河右岸不远处,是一座有城墙的小城毛目(Maomu)^①,我们拿着给当地官员的介绍信,到了这里。我们在这几个月的旅程中,还没有受到比这个生活在边远贫困地区的地方官更热情的接待。他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膳食,在衙门里通宵宴饮,虽则如此,我们还是把营地设在村庄一处仅仅用墙围住的空地上。这个地方有三个店铺,但好像都卖同样的东西,我们要买东西不管到哪个铺子都一样。

第二天中午,我们带着给边境哨卡的信,由衙门的一名骑着毛驴的警察陪同,沿着黑河向尚待确定的目标——那座被埋葬的废墟黑城(喀拉浩特)出发了。我们从中午到天黑,骑着骆驼一直沿着黑河而行,前面的河段上有座未设栏杆的小木桥,胆小的骆驼偏要从桥上过,而这仅仅是道阻隔着对面的沟渠,我们决定蹚水过河。接着,还要花一个小时过沼泽地,我们必须在前面溅着泥浆,吆喝着,拼力拖着裹足不前的骆驼。这真是一段难以逾越的漫长的路程,我的脖子和脊背由于连续固定的用力而痛得实在忍受不了。一阵微风吹来,骆驼振作了起来,它们支撑起躯体缓缓地移动开了,我烦恼而疲倦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在队伍的后边。

旅途中,我们在毛目拾到一只狗,它咬每个接近它的人,我们把它用绳子拴在骆驼上跟在后边走。它的到来,事实上给我增添了几分忧伤,因为这是在这种情形下认识这条小狗的,而且已经与这只狗建立了真正的友情。它简直成了我们旅队中的一员,可我深知,它只能和我们愉快地相处三天就得离开了。

经过了十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在午夜十一点踏进了月光映射下的一个巨大的阴影内,这一阴影是绿洲堆积如山的骆驼饲料和挤撞在一起的大车的投影。在这些大车和草堆中间,隐蔽着一

^① 清代设毛目城屯田县丞,1928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1956年鼎新县并入金塔县。

个方形小屋,从屋内走出两个身穿袍子,脚蹬蒙古长筒靴,戴着便帽的边界哨兵。与他们长时间的谈话太疲倦了。宿营后,我们吃了顿冰凉的晚餐,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夜里看到的这些饲料堆和大车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蒙古人都看不懂地方官员写的信,可能是字太小了。他们非常友好地把一大张漂亮的、风干了的羚羊皮拿出来给我们看,他们想把这张羚羊皮卖给我们,我后悔这一次没有买。这张羚羊皮手感柔滑,色泽像牛奶一样的白,尽管后来我从其他蒙古人那里了解了它的制作方法,但我从不认为我学会了它。一个穿着长筒靴的边境哨兵,不知什么时候从远处的沙丘上来到这儿,他拿来一只捕捉羚羊用的夹子,这个夹子是由一副很大的弧形夹片构成,我断定上面并没有尖齿,在一块皮垫上面是一只精巧的小扳机,这是他们以往用过的老式步枪上的栓。

我们是在西北高原不时刮起的近乎风沙尘暴的肃杀寒风中拔营离寨的。尽管我们走出模糊的边界已经多时了,但蒙古高原最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冷风割面。几小时后,十五峰轻装的小骆驼加入到了我们的旅队,这些小骆驼在队伍里跑前跑后。这是一群放牧的骆驼,由于迷了路,中止了放养,驼群在大漠荒野中漫无边际地狂奔,牧驼人极费力地驱赶着它们。牧驼人骑在一峰高大的白骆驼上,这是峰训练有素的骆驼,就像是一匹矮种马能对付一头小公牛一样,它能把小猛兽置于死地。它驮着它的主人落在了迷路的驼群后面,偏离了游牧路线毫无目标地奔跑,主人拼力拍打着它的后腿和连着前腿的肩肉,直到它回到伙伴之中。这些幼小的骆驼中的最小一头,在铺天盖地的尘暴中长时间奔跑,被迎面扫来的尘沙吹打着双眼,灌满了鼻孔,它发出了凄惨痛苦的嗥叫。这些小骆驼肋腹上的烙印是新打上去的,在这沙尘暴的刺激下,发出阵阵痉挛。

天实在太冷了,为了不至于冻僵,我们由骑乘改为步行。当我们在三隆子沙窝(San Lungtzs She Wo)扎下营帐时,尽管才走了五

十里——大约十八英里——我们还是很满意的。一路上，我们沿着我们左边的河岸浅滩行进，有两次看到另一边的堤岸塌陷了。在如此遥远荒寂的地方探险，前方的道路还会遇到什么情况，几乎难以预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在回来的路上可以轻松一些，悠闲一些了。

第十章 额济纳——马可波罗时代的城市

早晨醒来,天色晦暗,寒意逼人。锡皮浴盆里连洗脸水也没有,我只草草地刮了一下胡子。虽然冷风嗖嗖地刮着,但我们在途中却很顺利。下午,位于我们左方的河流还很远很远,但是日落时分,我们便沿着大路来到河边高高的土堤近旁。入眼一派荒凉,但不久,前面出现了柳树和杨树。将近午夜时候,我们进入了树林,想在水边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在树林中蜿蜒行进,一会儿爬上高高的沙丘,又小心地吆喝着疲乏的骆驼快速冲下来。这时,惊醒了附近蒙古包前的看门狗,虽然我们看不见帐篷,也看不到灯火,但那些狗狂吠着,咆哮着向我们挑战。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有我们自己的狗与我们同行。它护卫着我们的侧翼和后方,在骆驼鼻子下面绕来绕去,显得非常忙碌。我估摸它一天走的路程约有我们走的二十倍。它不再懒洋洋地拖曳着尾巴。那黑白相间的长“外套”上满是尘土,一抖动身子,就会熠熠闪亮。

其后三天三夜,除了天气愈加寒冷外,与其他时间并无二致。突然之间,我们发现已找不到从河里流出来的水,才知道我们在黑暗中已经通过了这条支流。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向导。他从骆驼背上一颠一颠的卧具上醒过来,似乎才成为我们这支队伍中的真正一员。整个下午乃至入夜以后,他一直在打盹儿,偶尔我们问一声“到宿营地还有多远”,他才能醒来一下。他回答因情绪的变化而异。越是心情不好,需要再往前走的路就越长,两者之间恰好成反比。

我现在几乎不再骑骆驼了,除非走得太热,在大风中坐在高达

十英尺的卧具上享受一下是天真的想像。我一边走着，一边嫉羨地看着向导。他坐在高高的架在驼峰上的小平台上，就像一个没有形状的包裹一样，前俯后仰，令人不可思议地保持着平衡。我认为，他肯定会让我们超过目的地（如果有目的地的话），到达一个除星光外一无所有的地方。但他常常会在深夜或凌晨某个时候，从骆驼脖颈上滑下来，然后勒一勒羊皮大衣上的腰带，猛烈地咳嗽一阵，再匆匆地沿着小径向前面奔去，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那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情景，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使酸痛的双腿得到休息，可以有地方暂时躲避开持续不断的大风。每当这时，我就会小跑着跟定向导，有时要走一英里甚至更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地方。

到达河床后，他会跑跑停停，用肥短的脚步踢被风吹积起来的小沙包，连腰都不肯弯一下。找到他认为合适的地点后，他就会双膝跪地，用粗糙的双手刨挖河沙。对挖出的潮湿的河沙，有时他会感到欣喜，有时候却流露出沮丧。如果他不满意，就会挪开几米远再挖。挖出水后，他会突然顺着原路，疲乏无力但却大叫大喊地小跑着向骆驼奔去，把它们牵到可以扎帐篷的地方。当我们一些人搭帐篷、生火的时候，其他人则肩扛镐头和铁锹去挖水井，超不过四英尺深就会有水。

这天，夜已很深，我们才在一个幽暗的柳树林中安下了帐篷。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不远处有两座蒙古包。我们前去探访，与主人一起进了早餐，那是一种用豆子做的饭和烤饼，还喝了加有黄油的奶茶。在寒冷的早晨，这无疑为我们增添了令人振奋的力量。主人娓娓而谈，将我的思绪又带回到十年前忍饥挨饿的那次历时十八天的长途跋涉之中。我曾经以为那些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已经一去不返，被新的一切所掩盖了，但那一次是与两个当地旅伴和三百多峰骆驼在一起达数周之久的陌生孤旅。帐篷生活的喧闹，目睹这些骆驼日渐虚弱，终至筋疲力尽时的沮丧，这些细节都清晰地

出现了。我记得在每一站都要计算一下走了多少路,消耗了多少食物,估计跟随我们的两匹小矮马和一峰驮行李的骆驼还能支持多久。长途行进途中的数学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时间、食物和计算准确的承受能力。这三项因素中只要有一项出了问题,其结果就将是遭受痛苦甚至更糟。感谢上帝,现在我们这支考察队还没有陷入如此境地,而且,友善的蒙古包总是到处可见。

标致的年轻主妇正在帐篷里用蜡线和尖锥缝制一双特大的长靴。她从皮制的架子上拿起一只精美的瓷碗,用一块并不干净的抹布擦了擦,倒上奶茶。她婆婆打开一只刷过油漆上了锁的箱子,从里边取出从南边带来的盐和麦片,在我们热气腾腾的茶碗里慷慨地放了一些。帐篷中央堆放着各种皮革,那是准备缝制女装的。这是蒙古妇女的一项无休无止的工作。在这堆皮子中间,有一团暗褐色的蓬松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两张鹰皮,上面的硬毛已经拔光,只剩下了绒毛。采用某种方法进行过鞣制,显得柔软而坚韧。它们是准备剪开后缝制帽子上的耳扇用的,据说比其他任何毛皮都要暖和而轻软。我记起了艺术家亚历山大·斯格特(Alexander Scott)曾告诉我,在阿富汗前线,有人借给他一条奇妙的围巾,是用小羊皮和鹰的绒毛织成的,虽然软若游丝,但却使他的脸和耳朵免受了冻伤。我立刻买下了这两张鹰皮,想把它们带回美国,制成帽子衬里或一条围巾。后来,在高原的寒风中,我用过两三次,发现它们真是最好的自我保护用品。它们几乎像带有电热一样,对冻得快要僵硬的耳朵和冰凉的双颊具有魔术般的威力。难怪那些我们后来看到的巨大的褐色老鹰能够翱翔于西藏的百丈悬崖之上,俯降于浓雾雷电之中,猛扑黑鸡、山羊,甚至野狼等猎物。多么壮观的鹰猎场面啊!我思忖,人们发明的游戏,是否有任何一项在促人振奋方面能够超过土库曼青年的放鹰活动。他站在世界屋脊上,脚下是群山逶迤腾起的波浪。他的放飞拳头上高踞着的一只猎鹰,任它去爬高,任它去扑袭猎物。在这空旷的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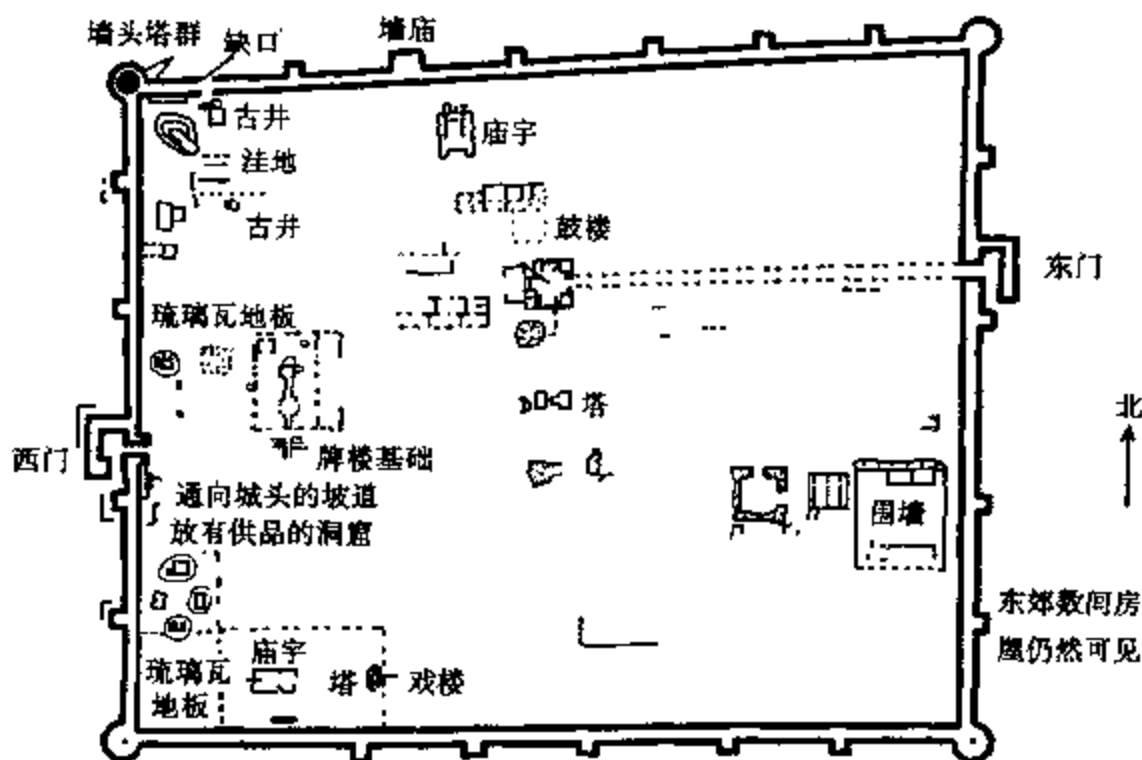
上,当暴风雨肆虐之际,一个人即使平淡无奇地在脖子上围一张鹰皮,他也会感到与那个携鹰独行、出没于暴风雨中的年轻猎手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终于有一天,我们离开这片有燃料可以随意取用的干河床,向东穿越沙漠,向黑城方向而去。那天夜里,我们在一个蒙古居民点旁边扎下帐篷,买了一只活羊准备宰杀。向导知道,那个荒凉的地方十分遥远。他认为只要自己所熟悉的路径没有被风沙掩埋掉,他就能够认准方向,穿越荒野。问题是稍后一些日子,往往是狂风肆虐的时期。

这些蒙古人急切想让我们沿着河道再走大约四天的路程,在去我们的目的地之前先到他们王爷住的地方去。他们许诺,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他们将为我们提供一名去黑城的向导。但我们决定按原来计划进行。由于沙暴的原因,又逗留了一天。在这一天中,与这些蒙古人费尽了口舌,听他们那些露骨的谎言,令人感到十分难受。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几天的水和燃料,踏着崎岖不平的路出发了。

早晨没有起风。由于没有路,我们只能靠着指南针,或者宁可说凭着向导的第六感官,向东北方向行进。骆驼艰难地在沙丘上跋涉。沙丘上有一片死气沉沉的树林,树木全都匍匐在地上,树根和经过漂白似的树枝四处纵横,阻挡在我们的道路上。我们的眼前是接连不断的沙丘,有的高达五十英尺以上,而且陡得难以翻越。到下午一点钟,我听到沙丘上有呼喊声,循声望去,看见了向导俯弯着的小小的身影。我钻过沙丘侧翼的灌木丛,跌跌撞撞地踩着滑动的沙子往上爬去。十五分钟后,我终于来到向导跟前。他用手指着远处的地平线。我仔细观察了约一分钟,发现这一地带有一条宽不盈寸而且近乎平坦的边缘,在那平面上竖立着一个针状物。不消说,这就是我们从斯坦因拍摄的照片上的熟悉的顶部建有一座小塔楼的城墙。这正是马可·波罗所知道的城墙,他由

这儿的城门进入了额济纳城。翟荫牵着载满东西的骆驼在沙丘下面。我对他高声喊叫着，连跑带滚地从沙丘陡坡上滑下来。衣兜里，长靴里甚至裤子里全灌满了沙子，到坡下时才将沙子抖落出来。这时是一点钟，我加快了步伐，以为我们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到达黑城。但由于沿途要在沙丘上和沟壑中爬上爬下，在九英尺高的芦苇丛中穿过一片干涸了的湖床，费尽全力登上鹅卵石遍布的斜坡，到达东门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六个世纪前，马可·波罗就是从这里骑马进城，装备自己后，继续在沙漠中跋涉四十天，到喀喇和林大汗的宫廷去的(地图三)。



地图三 喀拉浩特(绘于1923年11月15日的草图)

现在，再没有卫护城池的兵士出来检查我的证件，没有弓箭手懒洋洋地带着好奇心斜倚在城门顶部的堞楼上，也没有客房主人来用提供茶水、打扫房门、饲喂牲口等热情的活动来迎接我。一只

灰色的小鹰从灰白色的城墙高处的巢穴中蹿出，双翅平展，一动不动，低低地在高原上的卵石和稀疏的灌木丛之上盘旋。那儿似乎再没有其他任何生命的迹象。晴朗的天空上甚至连一丝云彩都看不见，更没有甲虫爬到我的脚背上来。正当下午最炎热的时分，幽灵也不会在此刻徘徊。正如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城墙是人力建造的一样，我断定，在这个空寂的小城里，确有精灵存在。在此地逗留期间，这种意念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心里。

我看不见城门入口。因为在我面前屹立着起防卫作用的高大幕墙。我必须绕过它才能看到入口。幕墙看样子足有三十英尺高，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女墙上完好无损的雉堞。那堵墙曾使来此抢劫的沙漠骑士们束手无策，但现在却慵懒地忍受着沙漠的缓慢侵吞。数条悠长的“沙龙”从我驻足眺望的卵石群那儿伸展过来，在地面上高高隆起身躯，头部枕在城墙顶上。有些“沙龙”腹部已越过城墙，在城内空旷的地方安顿下了前半截身子。以前黑城的居民——旅店主、赶集的农民、妇女和僧侣似乎都被这个已经绝灭了野兽吞没了。

我绕过幕墙走去，发现挡在我面前的一堵用沙子建造的平滑的胸墙，沙上清楚地印着狼的蹄迹。我登上胸墙，观察将近十天来我如此向往的小城（图十二、图十三）。我的第一印象是卵石遍地，除了那几条已经逾墙而入的“沙龙”外，城内再没有沙子。到处都是废墟，三四座造型匀称的小宝塔从废墟中挣扎而出，兀立于地面，乍看上去，似乎完好无损。如果我认为这些小宝塔未经触动过，那对博学多识的柯兹洛夫^①教授和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来说

^① 柯兹洛夫(P.K.Kozlov)，俄国著名探险家。他于1907~1909年率考察队发掘了西夏古城黑城(喀拉浩特)，获得大约8000件西夏、汉、藏、蒙文等文字材料和约3500件文物材料。柯兹洛夫此行的考察报告《蒙古、安多、喀拉浩特死城》于1923年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出版。

是很不公正的。他们已在我之前到过黑城，并在这弹丸之地四处挖掘，将所有引起他们注意的可能隐藏着什么东西的地方翻了个遍。说“所有”是不确切的，因为至少宝塔的基座正留在那里，这些基座自建筑这些宝塔时就已经位于那儿了。基座是由数百甚至数千个小塔的黏土模型和印有菩萨图像、未经煨烧的圆泥片组成的。

但我不能待着不动。我必须沿城墙在城内巡查一圈，进行探察，在我们因投入具体而细微的工作而无法牢记这个城市之前，对在此地的考察工作有一个总体的设想。脚下磕绊着卵石，卵石下面到处都有陶瓷碎片，有的上了釉，有的没有上釉。这儿是大半块磨石，那儿是一根烧焦的木桩。木桩直挺挺地竖着，表明那儿曾是一个屋角。我试图想像街道和小巷是怎样排列的，一队骆驼经过时，一个人是怎样在两排紧邻的房屋之间赶紧躲进门洞里去。当我探察一个垃圾堆时，回过头来，发现翟荫正在远处俯身拾捡什么东西，我顿感一阵疚愧的痛楚，因为我忘却了翟荫，直奔入城，抢先得到了进入这座空旷城池的激动人心的机会。当他进城后，发现已经有我的一件皮衣、一条皮裤和一顶帽子摆在那儿的时候，这城市的魅力对他就没有多少了。他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到这里来的，而且采取了比我更富戏剧性的入城方式。他爬上“沙龙”后背，从城墙中部的一个狼穴中打开了通向城内的道路。后来，当我们在一起交流看法的时候，我发现他已收集到两枚西夏铜币，并对一段半截埋入土中、颜色鲜亮的桁梁做了记录。他非常理智地没有去扰动它。我的兜中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陶器碎片。逗留在黑城期间，一直是这样，而且每天要往篮子里装十多次。

黄昏时分，驼队到达了。我们不得不暂停初步的探察来商定安营的位置。最后，安排在城内东南角墙头耸立着一座小塔的地方扎一顶帐篷。我们的民工已找到一口水井，距离住地来回约六英里。我打算把骆驼和赶驼人安排到有牧草的地方去住宿。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每天只往城里送一次水和燃料就行了。当晚，我们

带的水和燃料都很充足。帐篷很快就扎好,炊火也燃起来了。然而,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附近没有地方可以建立一个有遮蔽的工作间,于是又将帐篷移到城外,搭在一个看样子具有穆斯林风格的小建筑物下面,又用一堆砖和一些防水帆布在廊道里建起了一个只有一面暴露在风尘之中的工作间(图十四)。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按计划分头工作。翟荫的任务是用平板仪绘制一幅城市地图,它必须十分准确。因为斯坦因已经做过精细测量,毫无疑问柯兹洛夫及其考察队也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我必须决定从何处开始挖掘。我们仅带了四个挖掘民工,这些人,加上办事效率高而且自觉性强的王译员以及我本人,是无法清除任何一条“沙龙”的。它们跨越城墙,在城中延伸了一大截。很明显,我们只能有限地开挖那些已被风清除了沙子的地方。在沙丘边缘开挖看来是一项非人力所能完成的工作。因为流沙簌簌地滑落到开挖出的沟内,我们挖多少,它就会填多少。进行这项工作恐怕需要二十个挖掘工和四十个挑夫,而且也许还需要一些木板围栏才好。

当然,我的首要兴趣是寻找发现壁画的机会,但我在这儿的所得比我的先驱们要少。他们“清洗”了所有壁墙,掏空了每一座密封的小塔。而且,我知道,在地下寻找壁画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还是又做了一次尝试,因为一座庙宇原有的三面或者四面墙壁中有一面仍然直立着,约有十英尺高,在一定光线的照射下,从斜角看上去,显出一尊位于宝座之上的巨大佛像的痕迹来。这肯定是一幅杰作,那纤细修长的胳膊、浑圆的肩膀和椭圆形的下颏,这些所有我捕捉到的东西都使我激动不已。但是,虽然我随着日光变化不断地去观察它,不下二十次地举起照相机,我总也无法将它拍摄下来。这真像人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幽灵,试图将它拍成照片,但取出胶卷后,却发现是一片空白,但人们仍然相信幽灵的存在。也许我正看到了中世纪一幅壁画上的幽灵的显现,它微妙而

虚幻,不是照相机所能捕捉到的。

城中心简直是一片狼藉。经考察,发现这儿原来是一座复杂的建筑物,建造在约十五英尺高的经夯实的坚硬土台上。通往建筑物大门的斜坡几乎与西城门在一条轴线上。我们理解,这座建筑物在城市的中央干道上,我们径直将这条街称为“主街”。这座建筑物有可能就是跨居于城市中心通衢的“鼓楼”,中国每一个现代的和古代的城市几乎都是这样的。

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又一圈,留心观察可能会暴露倾颓的废墟或垃圾堆的密的每一丝迹象,想像构成这古城的道路和墙壁。到中午时,我所考虑的问题最终有了解决的办法。我认识到,要对这儿进行系统的挖掘是不可能的。斯坦因和柯兹洛夫已开挖了几乎所有庙宇的遗迹(图十五),只剩一处没有开挖,掏空了三座小塔,留下了许多坑沟和试探性的挖掘点,草率地在我们面前留下许多垃圾堆。但这是可以理解的。翻过城墙,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巨大的“沙龙”,它们所到之处,一切都匿迹藏形,在这些地方要进行挖掘,对我们这支小小的考察队来说,那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们只限于在房屋的断垣残壁间进行探索,这恐怕是考古人员最费时日的工作,一般来说也是最复杂的工作。于是我们循着一些线索寻找,不管它将我们引到城市的哪一个街区。显然,一个未经开挖过的寺庙废墟是肯定要清理的,翟荫发现的那段彩色桁梁就裸露在这个废墟之上。这儿起码有点什么东西。饭后,人们各行其便,骆驼被牵到并边它们的营地中去,而我则开始挖那段桁梁。

挖出来一看,它根本不是什么桁梁,而是一尊木芯泥塑大佛像的躯干,泥巴未经焙烧,表面上仍黏附着大量颜色,它沿城墙根横躺着,刚好处在背邻幕墙而建的一座庙宇的外围。这天整个下午和翌日上午,我们都在仔细地清除一个地窖里的沙子,地窖里藏有一些无头小画像和破碎了的泥塑,泥塑用石膏罩面,并涂上了颜

色。也许是斯坦因或柯兹洛夫把它们放在那儿,希望有朝一日重返此地,也许是某位僧人在庙宇失火后把它们扔在外面的,或者它们是该城遭到劫掠时被破坏了。柯兹洛夫相信,这场劫掠应当发生在中世纪后期。

当挖掘别无他获,而且在地面上进行了数米挖掘探索也徒劳无功时,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位于我们上方的城墙半腰的一个奇怪的洞穴上面。显然,它是人工形成的。我动手清理落入里边的沙子,这是一项进展缓慢的任务。因为洞里只能容一人蹲下来工作,另一个人站在洞口我们挖的坎沿上,转接里面的人递过来的沙筐。翟荫正在描绘黑城地图,虽然他离这儿有段距离,但倾倒下的沙子还是不断地拂落到他的纸上和笔下,使他不得不时时拂掉沙粒。我正在用手和一把小铲在洞里刨沙,突然,我禁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一头钻出洞去。翟荫跑了过来,我递下去一只筐子,里边放了一幅约六平方英寸大小的壁画。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幅壁画。诚然,它很小,但是颜色鲜艳;虽然它仅仅是一幅花卉设计,与我们后来发现的绢画的某些设计图案极其相似。虽然它不是在墙壁上被发现的,而是在清理洞中积沙时被发现,但是它确实是一幅壁画,并且就出自这个洞穴之中。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发现了更多的无头泥塑,都堪称造形完善的杰作。下午,当洞中的沙子几乎全部清除掉时,在洞的一边出现了一块竖立的木板。拿开木板,发现原来是一个小贮藏室,里边杂乱地堆放着许多小东西。花了十多个小时才取出这些东西。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极容易破碎的雕塑,几乎相互交错纠缠着堆放在一起。靠墙立着许多壁画碎片,这些残片不再只是丝绢上画的花型了,而是用柔和的曲线和赏心悦目的颜料在平滑的灰泥上画成的佛陀头像。

战前,在圣彼得堡,我看到过柯兹洛夫在黑城发掘得到的物品。但同这些相比,那些实在算不了什么,尽管这都是一些壁画碎

片。它们应当是技艺高深的佛教寺庙中专门画师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手法娴熟,线条明快,颜料纯正,着色均匀,造形优美。这些形象若非人间尤物,便是天上仙佛。也许斯坦因得到的样品比我们得到的更多,但这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的兴奋程度。因为在当时,我们在美国没有一件中世纪的壁画,连画在丝绢或纸张上面的好的画像也很少有。

接着,我们又清理了一座独院寺庙的遗址,它看样子还没有被挖掘过。清理到最后,发现一面可爱的古青铜镜,上面有神话中的海兽,首尾相接,环列成一个魔术般的圆圈。之后,又发现不计其数的小宝塔造型,有的里面是虔诚的佛教徒的一络头发,有的是一个小泥像,有的是一些谷物。所有这些,都必须写进提交给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考察报告中去。

我们的那四个雇工和不知疲倦的王译员连续奋斗了九天。我们知道,那高高的不断推进的沙丘是不可能搬掉的,除了沙丘下面掩埋的东西之外,我们那几位知识渊博、富有经验的先驱们已经以科学的态度细致周密地进行了探索。如果我们只是尾随在他们后面,而不去自行打通发现的航道,那就别指望能得到什么。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开端。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该城被遗弃的那个年代(比如说马可·波罗之后一个世纪)的一些文明情况,而且更全面地掌握了在亚洲沙漠中居住生活所要求的方法和技术。

第十一章 中国沙漠之冬

连日来天气非常寒冷。在持续不断的大风中摆弄照相机真让人伤透脑筋,以至于使我发出愤恼的叫喊。我们的帐篷与这里的天气很不相宜。那间我们所能建造起来的惟一工作间虽然可以避风,但却无法御寒,尽管那个小火盆中的用骆驼刺燃烧的火终日不熄。这次旅行我们从乘坐蒸汽汽车、两轮车到骆驼,时间长达三个多月。因此,为旅途准备行装颇费心思。我们准备了胶水、纱布、线绳、纸张和用不远处干涸沼泽地上的芦苇编织的苇席,还有在肃州时制作的几口箱子。虽然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制作得很粗陋,但它们最终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突然下起大雪,洁白的地毯覆盖了万物,挖掘工作根本不可能进行。我们为工作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停顿下来而感到高兴。沙漠地带降雪,这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但后来那些蒙古人告诉我们,每年仲冬都要降一两场小雪。如果春季或夏季降雨,那对土地是很有益处的,但在一两天之内就会被风吹干。而且,甚至当气温远在摄氏零度以下时,被太阳吸吮到天上的水分也要远远超过雨雪滋润大地的水分。

下雪当晚和翌晨的天气阴沉而寒冷。太阳升起之后,整个古城连同它那粉红中夹带苍白的城墙蒙上了一层产于卡拉拉(Carrara)的大理石色。雪原从我们身边延展,发出令人难耐的光亮。那古老悠长的“沙龙”全身披着银色的鳞甲,迤迤爬上城墙,将头探入城内。城墙里边,一片素白使古城显得比以往更加荒凉。我信步走去,脚下满是细砾、碎陶和残瓦。在我的身后,杂乱地留下了

一串脚印,像是一位忠实的仆人,走哪跟哪。其令人惊讶的程度,毫不亚于当年鲁滨逊发现的那些印迹。

我忍不住拿出照相机来,希望捕捉一些这儿的魅力和清冷,虽然我知道这是徒劳的。我兴奋地到处奔走,拍摄这已经熟悉但又变得陌生的景色。粗犷的轮廓被装扮得十分柔和,但那曾被漠风雕琢出优美曲线的沙丘,阳坡上裸露着沙砾,却显得粗犷如旧。照相机快门上的润滑油早已凝如果冻,我只得不使用快门,而利用一顶便帽进行曝光。调节光圈的纹环已经无法拧动,光圈便也调不成了,但我仍然拍个不停。我跑到城墙外边很远的雪原上,将全城尽收眼底。我从不平常的角度探究这荒原上的古城。我登上城墙,鸟瞰我们的小小帐篷。那片黑色的被遮掩着的地面距离我们的行李和拴在那儿的驼群很近很近。尽管我照得很起劲,而且觉得拍得够多了,但当我回家之后,才发现这些底片根本无法冲洗,我将永远不能重新领略黑城那银装素裹的壮美了。

中午,我们拆了帐篷,重又踏上河床。我们曾在月圆后第一天的一轮硕大的明月下经过这儿。九点钟,我们扎帐安营,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凶猛的蒙古狗的吠声,令人听了感觉到安慰。在经过了一个阶段的长途跋涉之后,听见那丑陋牲畜绷紧缰绳,恨不能将一个人撕成碎片的吠叫,竟然感到舒服甚至温暖,这是多么奇怪啊!它意味着炉火、宿所和伸展一下疼痛双腿的机会。虽然我们很少整夜赶路,而且几乎常常在午后拆帐开拔,午夜前到达有水源的地方,但这仍然是一个苦差。我们无疑都很健康,但通常两三个小时的步行和半个小时的驼背苦坐就会令人筋疲力尽。天黑以后,当夜幕遮挡了远处的景物,再也无缘看见羚羊或观察到雪地上夜出觅食者细小的蹄迹时,人的精神状态立刻变得喜怒无常,不能自制。变化的急剧犹如我们面对的现实,远比那冰雪覆盖的荒原的真实要剧烈得多。

月亮升起之后,景色体现出一种残酷的美丽。停止行进,原地

等候,不享用那十五峰骆驼驮载的行李带给我们的舒适,这必然是死亡,很可能就在天亮之前。而如要脱去一点点衣服,那必然意味着更快的死亡。繁星在天空中燃烧,但地平线上却是稀薄的雪雾。虽然是在皎洁的月光下,也显出一片约略的乳白色来。北斗七星绕着北极星在旋转,它的轨道奇特而又有规则,它时而眼睁睁地看着降落下去,时而又在我们不注意时溜了回来。严寒迫使我们在风中耸肩侧身,加快了前进步伐。我们的步伐加快了,但又发现往往太超前,不得不返回去照顾驼队。为思家的恶魔和对这次旅行的最后价值的疑虑所袭扰,我们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在这北中国荒漠中漫漫旅途上的枯燥单调。每天下午和晚上,我们都这样挣扎着,直到那个“小包裹”——骑在第二峰骆驼上的向导来了精神,“铺展”开自己,从骆驼脖子上溜下来,跑到前面去寻找宿营地。

到了宿营地,我们一改原先那种非穿睡衣不可的自豪习惯,只拔掉靴子,放松腰带,就一下子钻进了被窝,因为劳累和风寒不容许我们脱掉衣服。下午和晚上是一场犹如吸毒般使人虚弱的恶梦,直到很晚才睡觉,等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看见火堆和备好的早餐,那也是一份乐事。遗憾的是没有咖啡!起来后,我们悠闲地打发时间。坐在火塘边修面,穿着高领运动衫,还要把毛皮领子竖起来,而且常常要戴上手套。

到了中午,我们开始在住地周围放牧骆驼,并打好铺盖卷,收拾好行李。我常舍不得拆掉我们的帐篷,不愿看见雪中留下的一片“疤痕”,因为在那“疤痕”上曾建有我们的庇护所,使我们享受到家庭般的温馨。在一个地方睡一觉,吃两顿饭,聚集在一塘火的周围,这就是在那个地方的生活。但没有一个人不想继续享受这份安宁,并宁愿为此在雪地上艰难地跋涉几个小时。

天气大部分晚间晴朗,但白天彤云密布,狂风怒号。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遇到了两次如圣诞贺卡般美丽的景色。在我们帐篷近旁,灌木丛的细枝上凝结着白霜。安谧的阳光照射在上面,发出

耀眼的光芒。附近，静躺着黑河平坦的滩涂。冰封的河面上，有一条墨黑的缝隙，那是河水在那熠熠闪亮的雪堆中间辟出狭窄的水道，匆匆地奔流而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恩节之晨。中午，我们出发了，计划经过十五英里的短途行进后，在三隆子沙窝安营扎寨。二十四天前，我们曾在那儿待过一夜，如果瓶酒没有冻结，柴禾也易于到手的话，也许可以有时间举行一次不像样子的庆祝活动。但当这没有月色的夜晚来临时，却刮起了风，起初像撩逗人似的，继而猛烈地席卷而来。我们迷路了。这时，看到向导下了骆驼，往前边走去，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我知道，这次他并非去宿营地，而是在尽他的最大力量给我们寻找道路。就这样，到夜里十点钟，我们往右拐去，终于找到了黑河，在这儿有可能收集到一些柴火。但老向导却不愿意：他说这儿到处都找不到骆驼的饲草，而且他认为自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跟在他后边，心情沉重，步履迟滞地走着，心里奇怪当我浑身疼痛得就要倒地时，怎么还能晃晃悠悠往前走，天气非常寒冷。尽管我穿得很厚，可当翟荫爬上骆驼时，我却不敢效仿。

凌晨一点钟，我们踉踉跄跄地来到一个小小的驻防城堡——四面又厚又高的墙壁围起来的一个约有十平方米的院子。与我们这十三个小时在空旷漠野里的所见相比，这里没有多出一点点生命的迹象，不知道它已经荒芜地存在了多少个世纪。借着星光，我们发现这儿既没有骆驼的饲草，也找不到柴火，只找到了我们需要的水源：在这积雪区里，水是不缺的。当队伍还在挣扎行进时，我们做出了暂时停驻下来的决定。我们动手扎帐篷。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上次扎帐时剩余的木头，足够这次使用。

但可怜的翟荫从他骑的那峰骆驼上滑下来躺在地上，连一步也走不动了。我将他拖到雪地上，背朝着一堆火，脱去他的皮靴，发现他的双脚已经冻僵了。王译员和我用雪擦洗他的双脚，三个半小时后，他完全恢复了知觉，痛苦得一下子昏迷过去了。我们硬

着心肠,仍然使劲地擦洗着,并不时给他灌一口中国的高粱烈酒。幸运的是,在那个我们进行救护的小帐篷里,翟荫醒过来了。最后半小时,我们用黄油摩擦,希望能够挽救一部分皮肤,而且使其后的肿疼减轻一些。我们将他的脚底紧贴在我们内衣里的皮肤上,让双脚得到正常的体热。然后,将他放入帐篷里他的睡袋内,服了安眠药,让他安睡以待天明。在这一过程中,他没有喊叫一声。当我问他感觉如何时,他勉强打起精神,咧了咧嘴。

这天夜里,我一遍又一遍反复思考目前的处境:附近没有骆驼刺,燃料很快就将告罄;翟荫根本无法站起来或骑乘骆驼。我们不能停驻在这儿,但翟荫又忍受不了将他绑附在颠簸的骆驼上的折磨。很明显,我必须弄一辆车子来,以便走出这以前没有车辆经过的沙漠。

日出以后,我派人带两峰骆驼往西去找寻河床,收集些燃料回来;派王译员和向导两人到沙漠中的绿洲地带设法弄一辆车回来,行程不能超过两天。所幸我们的赶驼人把他的小骡子也带来了。这样,王译员和向导就可以轮流骑乘,而且还可以驮载铺盖卷和少量的补给品。

翟荫的脚上全是水疱,膝部以下全都肿了,更糟糕的是还发高烧。我们俩都猜想是坏疽病,但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自己应做的,只是挑破水疱以减轻疼痛,并在皮肤上敷上黄油。

帐篷外面,狂风呼号着,将干雪吹积到荒凉古堡那疮痍满目的灰墙下面。平淡无奇的雪原上,甚至连当风而立的一丛灌木也难得一见。翟荫在睡觉。虽然我怀疑他在装睡,但也许那些安眠药确实起了作用。我们的绷带已经用完。我将四条手帕水煮消毒后,笨拙地缠在翟荫的脚上,以便护住敷上的黄油。现在,虽然还保存着几张以那个感恩节之夜的雪地为背景的剪影式照片,但也许我们俩对那个白天和晚上的事情已记不清多少了。

第二天,风慢慢停了,太阳探出头来。但放在帐篷内燃烧着的

一根圆木一端的墨水瓶冻结在那儿。我又挑破翟荫脚上的水疱，用氯化汞清洗着，希望能缓解毒性。尽管翟荫说不疼，但我不知道疼痛是否真的减轻了一些。正当我们像放逐到荒岛上的囚犯一样感到孤独时，忽然听见帐篷外面一声叫喊。它将我们又带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我匆忙奔出帐外，发现从北面来的两个中国人、三个蒙古人，骑着躯体高大、绒毛粗长的骆驼，停在帐篷前面想到这儿来喝茶。他们随手掀起门帘，发现躺在睡袋里的翟荫，好奇地盯着看。稍后又来了两个蒙古人，骑着骆驼，赶着七头小毛驴。这些小毛驴在深深的积雪中用那纤巧的蹄子长途跋涉，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沏了一份异国茶叶，在里边加了点感恩节的红葡萄酒（酒瓶幸好还完好无损）。这样一来可提我们的神，尽管我仍在为燃料着急。因为现在只剩了一捆细树枝，要省下来供做饭用。这时，又一声叫喊将我引出帐外。我看到两峰驮着高高的两捆柴火和饲料的高大骆驼跪卧在地上。这一下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安心等候，至少可以等到王译员和向导带着车子回来了。我不敢想像他们使我失望的那种情景。

第三个夜晚过去了。凌晨四点钟，我被一阵响动惊醒（翟荫在这儿夜睡得很轻）。我急忙奔出帐外，发现冻得哆哆嗦嗦的王译员正在星光下从一辆两轮车辕上卸两匹小矮马。车上有一个临时凑合制作的顶盖，半像棚子，半像尖顶帐篷。王译员和向导已经疲乏不堪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狼狈过。与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个陌生的马车夫。他是这套车马的主人，勉强跟随他们来到这里。他希望能够平平静静地在河边上苟安度日。王译员意识到事情的紧迫性，坚持要大胆地穿过雪地。但在笼罩一切的夜色中，他们发现根本不可能上路。于是又卸掉已经驾好的马车，等待初月升起之后再行动。车夫想用翟荫身下的稻草做饲料和点火取暖，遭到了王译员的断然拒绝。当凄惨的初月升起之后，他们又试图去驾车，但那两匹可怜的小牲口拒绝戴那冰凉的马嚼子。他们

又费了好大工夫去加热,甚至用上高级的英国火柴和车上的几束干草,但也无济于事。

这当儿,两匹小马被牵到堡墙的避风处去吃草,而车夫则去喝茶,茶水中泡着我们给他的大块面包。我们又各自躺下了。我钻进睡袋中,辗转反侧,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显然,我们必须尽快地投奔住所,寻求帮助,但翟荫发着高烧,冻伤的双脚剧痛难耐,不宜乘坐两轮车长途颠簸,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早晨,当我们再次考虑目前的处境时,觉得除了出发之外别无他路。饲料已经断绝,我们现在才得知前方四十里就是蒙古边界,那里也没有饲料。下午两点钟,我们打点行装,拆掉帐篷。当我们从那古老城堡的高大砖墙下开拔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为离开一个地方面高兴过。它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们无法在它的怀抱里安营扎寨,只是选择了东南一隅作为避风处。

王译员对这辆双轮车进行了很高明的改造。这原是一个敞篷载货车,木制车轮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看起来像一个圆和椭圆以及多边形的混合物。坐在车上肯定像是在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刑架上一样。王译员在车上加了一个席棚,并裹上了一层毡片。车板上垫着稻草,上面铺上毛毡。我们让翟荫躺在睡袋里,平放在车上。我靠了服用的那一小瓶宝贵的浓缩牛肉汁和一些鸦片粒的慰藉,跟在车后步行。在我后面,王译员骑着那峰走得最快的骆驼,由我们忠实的民工牵着。队伍自成行列依序前进。

当我跟在车后艰难迈进的时候,那畸形木轮所导致的每一下颠簸都深深地震撼着我的灵魂。我说不清那颠簸对翟荫和他那冻伤的双脚意味着什么。尾随马车徒步而行,诅咒自己使翟荫陷入如此困境,脑海里浮现着坏疽病这可恶的念头,嘀咕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怎样用猎刀为一个人截肢,这一切都成了我悔罪的折磨。我们像蜗牛一样缓慢行进。即便如此,到达蒙古边界的那间小屋也只用了四个半小时。但我们却感到好像走了十天路程。翟荫的

体温又明显升高了。我们没有带体温计,这毋宁说是一件幸事。

我们将帐篷扎在小屋外边的高地上。小屋里挤满了蒙古人。由于对我们的某些要求的误解,他们出人意料地表现得非常愤怒,粗暴地拒绝让翟荫进屋烤火取暖。后来,他们竟以为我们的全部人马正在前来,要将他们赶走。我猛地提起猎枪,发狂似的猫腰冲进那低矮的屋门,把枪斜架在墙上,占据了屋子。我们将翟荫放在火旁边的毡垫子上,我动手给他的双脚更换绷带涂上药。伤势明显恶化了。由于路途上的颠簸,似乎有肿胀的迹象。

火炉周围,七张冷酷的面孔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好奇地盯着伤口,但没有一点友好的表情。中国人有这种表现是不足为奇的,我没有想到蒙古人竟然也会这样。一会儿,我们的其他人全都进了屋子。厨子凑集了一些零碎东西为我们做了一顿晚餐。

翟荫和我躺在火边,望着对面那些蒙古人。他们高高的颧骨上闪着光亮,露出一口白牙,吞咽有声地在吃大碗里盛的羚羊肉,从排骨上撕咬肉块。睡觉时,他们有三个人睡在火炉边,其他四人蜷伏在我们身后马鞍和麻袋堆的阴影里。凌晨,寒气逼人。那三人跨过已经熄灭的火炉,取出了羊皮大衣。他们那宽厚赤裸的胸膛在晨光中黑里透红,肌肉隆起的臂膊使劲抖动着,穿上了那羊毛朝里、满是油污的皮大衣。然后把大衣往上提了提,束上一根皮带。赤脚蹬了一双长毡靴,上面又套了一双皮靴。

旅程肯定不会太远了,但翟荫还在发烧,我不敢再在夜间赶路。十点钟,我们顶着寒风,不顾雪地上刺眼的光亮,拆帐启程了。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们穿过名副其实的沙漠,来到一个叫做双城子(Hsuang Cheng Tze)的地方。由王译员问路之后,我们拐进一个饲骆驼的院落内。院子里依然白雪一片。由于在这里可以将黑河水通过开挖的沟渠引入草场中,这里水草丰美,所以这一带饲养着好多骆驼。据我判断,翟荫还在发烧,双脚连同踝关节部分更加

肿胀,但起码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坏疽病的迹象。

我们吃过饭后,农院的老人招呼我到他那舒适的屋子里。我蹲坐在热炕头上好的毛毡上。老人通过王译员,询问我们的冒险经历。他的儿孙和雇工们在地下站着。这时,从另一间屋子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小女孩从我们待的这间屋子门上挂的蓝布门帘缝里探头看了一下。很显然,这是一个沙漠边缘上经营有方的农场。有一群羊、几头耕牛、四匹骡子;主要养的是骆驼。天热时在附近放牧,眼下正往东边的铁路终点去送羊毛,大约有六十天的行程。我买了三大团女工们纺成的驼毛线。如果我们要想摆脱困境,用它来织成长筒袜那是再好不过的。翌日早晨,我们离开了农场。除付给毛线钱外,我们又多给了他两块银元,他们非常高兴。还像往常一样,王译员骑着骆驼,骆驼上驮着铺盖和少量补给品。我依然徒步跟着马车。其余人落在后边,反正不掉队就行。

两天后,日落之前,我们来到毛目。王译员大步流星地赶到前面去见我们熟识的地方官,请他给我们安排住处。这位官员还是那样好客。他很为翟荫的伤势担心。我们还住在以前曾住过的那间屋子里,只是又经过一番布置。对我们的所有要求,主人一概热情地给予满足。但我们发现,这位绅士的生活是那样艰苦,尽管他对我们非常热情,但因条件所限,烧热水竟用了一个半小时,昏暗的屋子里寒气森森,砭人肌骨。晚饭摆在翟荫睡觉的炕旁边,一碟腊肉炒白菜,还有米饭,全都是这片绿洲自产的。

地方官礼貌得体,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而是在饭后来我们的住处问安。由于考虑到黑河暴涨之后涉水过河的问题,我们在去肃州的路线话题上谈了很多。由于我们那辆临时凑合的马车需要更换,马匹也需要健壮一些,我们的这位老朋友找来几个有马车的农民,当着我们的面向他们做了交待,让王译员第二天去详作安排。他执意要我们住下来,等翟荫的脚伤痊愈以后再走。但我估计那肯定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而我则希望尽快找个医生给他进

行治疗。沿黑河而下到肃州只需要五天多时间,但那儿没有外国人,也没有医生。如果我们斜向穿插到驿路上,我相信有八天时间就可以到达甘州,那儿有一位为人和善的中国高(Kao)医生,他曾经在中国内地受过英国传教士的培训。

据我们判断,翟荫的烧退了一些,他双脚上掉了不少皮,情况很不妙。虽然我们确实不愿错过去肃州的机会,因为在那儿可以寄出信件,可以取到汇款,但从总体上考虑,最好是去甘州。

我们的主人长谈现代科学的奇迹,并且高兴地翻阅了斯坦因的《契丹沙漠废址记》。他从书中作者所拍摄的照片上认出了几位他熟识的同僚。他也知道斯坦因曾路经毛目,虽然那是发生在他的前任期间。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为我们的平安和健康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为友善的了。他使我们感到最糟糕的处境已经真正结束了,并深自以为我们当初对好客的中国人的看法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哪里知道,前路依然困难重重,或者说,他乡异客期望遇到的真正友爱是何其难得!

当天晚上,翟荫没能入睡。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致命的感染已经开始了。然而马车还没有到手。王译员只选中了一辆合适的马车,可这个农民的索价几乎要掏空我们的渐渐空瘪的钱袋。问题很严重,我们只得极不情愿地请那位地方官出面说和。他派了两名差役去商量。当他还在坐着同我闲聊时,这两人便回来报告。这使我有机会看看一向偏颇的中国地方官员究竟是如何公正。两个差役明知他们的长官希望为我们搞到租价低廉的马车,但他们还是照实汇报了情况,而且,马车夫不在场,他们二人则充当了他的代理人。他们申诉收成不好、路途艰难,而且要空载返回等理由,一切都代表了马车夫的利益。地方官很不满意,派人叫来那个敢于冒犯的马车夫,厉声喝问为何漫天要价。车夫仍然冥顽不灵。最后,地方官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强行征用了这辆马车,而且自己做主让我们给了马车夫比较低但仍然足够的租金。然后,他转

向我，问如果旅途顺利，是否还会增加一些租金。我对此欣然同意。王译员出去，在车上搭一个车棚以阻挡风寒。

第三天上午，我们把翟荫抬进铺着稻草、毛毡和席子的高大车篷里。车篷前面挂了挡风的驼毛门帘。地方官礼节周到地等待着，我们一切准备就绪，他便来到县衙门口送行。他再次告诫我们新雇的马车夫要关照好我们，并叮嘱我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后给他来信告知，如有不周之处，他一定要让车夫吃一顿皮肉之苦。然后，他又硬拉我到小客厅里，饮了一杯告别茶，并再次接受了他的临别祝福。

我们发现马车夫实际上是两个而不是一个，而且，地方官还委派县衙惟一的警察，骑一头小毛驴，陪我们到下一站的一个农场去安排住房。马车非常舒适，有如住房一般。跟在马车后面的我，破了苦行赎罪的戒，也跳上马车，钻进车篷，休息了一个小时。

在这一段行程中，路线都是沿着黑河东岸的。人和骆驼可以在到处都是冰的面上行走，但马车却不太安全。我们不渡黑河，直接去甘州的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通往肃州的道路要过河再往南走一段距离。我们到那儿才能做出决定，而且要看冰有多厚。

日落之前，我们到达了宿营地。黑河岸边空旷荒凉，远远近近点缀着几株白杨和柳树。冰层下面河水仍在湍急地奔流，没有结冰的冰眼里黑咕隆咚，显示出要穿过冰河将是如何的危机四伏。黑河那边，太阳正在坠落。湛蓝的有点发绿的天空流溢着金光。天边上漫射出粉红色和橘黄色的光带。在清冷的暮色里，一只迟归的天鹅有力地扇动着不可阻挡的翅膀，穿越高空的光带，向南飞去。我不知道多久它才能远离这苦难的边陲，在一个温馨的河畔找到自己的伴侣。但它肯定比我们要快，因为我们有终日劳顿的马车和负载沉重、行动不便的驼队。

那个古怪的小警察骑着毛驴走在前面，在双树子(Hsuang Shu Tze)的一户人家里要了一间大房子。我们的到来引起了这家人

的轰动。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时，这个村落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大门口上，颇感兴趣地看我们把伤员从毡上架起来，放到马车里的草垫子上。这一天的行程很短，我们以每小时三英里多的速度，沿着冰封的黑河，在闪耀着银光的雪原上行进。

下午，我们很早就到达了预定的村落。由于去肃州必须在这儿渡河，而我们已决定尽快去找高医生和他的甘州慈善机构，所以，我们付了工钱，打发走了四个民工，其中一个带了我们给肃州邮局的一封信，让他从那儿给我们把邮件捎来。估计他会在我们到达甘州之后大约四天内也赶到甘州。我们也给那位毛目警察付了钱，打发他骑驴北上，原路返回，并带去了一封我们给他的上司的感谢信。在这位上司手下，小警察还将仍然担负起在那个拥有二十户人家的边陲小村和长城以北四十多个村落里维持治安的重任。

第十二章 吞噬庙宇的沙丘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们就起床了，直到八点钟，我才把翟荫护理完毕。离开农场时，我们的队伍又扩大了：加入了一个要去甘州但怕旅途寂寞的男子，他还带着一头毛驴；我们新雇用的一匹用来拉车的骡子；一位代替那个警察的半官方人士以及他的一个在回程中保护他免遭土匪袭击的朋友。离开这片绿洲后，再也看不见农场了。孤独的道路一会儿在黑河周围的平原上，一会儿又攀升到高出河面五十英尺的高原上。深深的沙碛上覆盖着三英寸厚的雪，行走十分艰难。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又雇了以前雇过的那匹骡子。曾有人保证说越往下游走，冰层越厚。但我们发现，越往下游走，越是流水湍急，而且路上泥淖遍布。我们那辆吱扭作响的马车轧在上面，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我走在前面，领着队伍沿着预定的路线前进。忽然，我们来到一处绝地：道路把我们引到一个足有三十英尺高、陡得不能再陡的沙坡顶上。右边是黑河，河边没有通道。左边是从我们脚下连绵起伏、一个高似一个的沙丘。沙坡脚下，可以看到车辙，这表明有车辆从这儿下去，但因为看不见车辆，不知道它们是怎样下去的。对一个外来者，甚至对一个相当熟悉中国道路和马车情况的人来说，似乎没有绞车和滑轮，车辆是无法下去的。但马车夫若无其事地来到我面前，阻止我们把翟荫抬下马车。他卸掉骡子，就地掉转车头，我们几个人全都攀附在车辕上，脚跟使劲蹬在滑动的沙里，惊险但却安全地溜下了沙坡。车辕在后面深深地犁入沙中，留下一条绝妙的长长的刹车痕。

薄暮时分，我们遇到一帮全副武装、马匹精良的穆斯林。他们

仔细地搜查我们的行李。有趣的是,这在中国道路上是不多见的。但我们队伍中有人说,像这样不带行李旅行的武装团伙常常是土匪。他们住在道路附近,袭扰迷途的旅客,抢劫财物。这一天在荒凉的乱石遍地的隘谷里结束了。风可怕地呼啸着,阴暗的棕灰色笼罩着一切。一口水井上面,有人垒起了一个小石屋,遮挡住从峡谷里吹卷来的沙子,保护水源免遭埋没。旁边还有一间石房,看样子主人刚从这儿出去。屋里有一只黑猫,从它的行为判断,这只猫常是以主人的脸当床的。它先爬到翟荫的脸上,又跳到我的脸上,后来又回到翟荫脸上。夜间,我入睡后,当它每次不安分地跳到我脸上时,都使我惊恐地一跃而起。这是一片表里如一、贫瘠凄凉的地方。在乱石嶙峋的山脚下的沙砾中,骆驼觅寻不到多少可食的东西。自从我们扰乱了它们的生活程序,白天赶路,没有时间放牧,这是最糟的一次。在感恩节之后,除了在毛目停留的那几天外,它们至今肯定没有吃饱过。

第二天,从这深谷中走出颇富情趣。我们在乱石中蜿蜒而行,费力地爬上悬崖下边的一座陡峭的小山。几周来,太阳第一次真正使人感到温暖。上山时,我把大衣撂在一边,高兴地扮了一个鬼脸。四野一片荒凉,是盗贼和土匪藏身的理想所在。我们刚一走出峡谷,就发现已来到奔流湍急的黑河边。河水呈黑色,岸边拥塞着数英亩面积的冰面。河水在冰面之间有限的河道里疾速流淌。我们来到一个村庄附近。王译员先赶到村里去。我们正向村里走去,他却出来了,看样子很生气,他让我自己出面。村里总共约有二十座房屋。王译员挑选了一家最富裕的前去探问。村里没有行政官员,只有一个老古董般令人讨厌的头人。尽管王译员要付给他酬金,但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与王译员的商谈。我们撤下他,径直去查看这个可诅咒的老乡绅一再否认他拥有的四五间空睡房。毫无疑问,他有房子,而且他显然也不怕我们(图八 a、b)。他一开始就拒绝我们,也并非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考虑到这个村里首富

的贫穷状况和中国农民的贪婪的本性,我永远不能理解,他怎么能够不理王译员,拒绝付给他的酬金,也难以知道以后几个晚上为什么要刻薄地对待我们。村子离主干道还有一段路程,否则我会以为一帮一帮流亡的俄国人使村民不再相信外国人。但我怀疑是否有白人曾经蹂躏过这个小河边上村子。

人群自然地聚拢起来。暮色已经降临,我们恳请村民帮助我们解决过夜的地方,但引来的只是嘲笑。无奈之际,我们找到一处正在修建,但尚未交付使用的校舍,这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干净的住所。骆驼还没有到来。我们在一个木炕上安下身来,利用木工干活留下来的碎木屑生了一堆火。浓烟熏得人不堪忍受,但室温却升不上来。有一部分村民尾随我们来到学校,我让一个人去取一口饭锅并打些水来,他只是满不在乎地笑了笑。这时,外面有人做猫叫声,有人发出嘲笑的喊叫,许多人拥进了我安置翟荫的屋子。无论王译员怎样解释,他们都不肯出去。而我面对几十个人,也不敢采用强力手段,因为尽管他们懦弱不堪,但我生怕他们弄断骆驼腿或做出其他不愉快的事来,延误我们的行期甚至使这次旅行发生意外。坏疽病的恐怖一直萦绕心头,翟荫的发烧依旧反复无常,再加上目前的情景,使我焦躁至极。

终于,我以冷峻的愤怒带着违心的笑容,将人群赶出了校园。我把门关上,又用长条凳顶住门,返身回去照看火堆,等待驼队到来做晚饭。天气又变得异常寒冷。翟荫尽管盖着几条毯子和毛皮,仍然发抖不已。数分钟后,村民又强行推开大门,在我们窗外学猫叫;发虎声,并试图壮胆推开我们的房门。王译员给他们讲屋里有外国人和伤员,殷勤地开导他们,不厌其烦地规劝他们,但只博得一阵哄笑。我又去驱赶他们,并且咧嘴笑着,表示我并非一个杀手,但心底里我真想杀了他们。我捉住两个人的头,使劲往一块儿撞,撞得他们眼冒金星,这引起了其他人的笑声。我有点觉得我们的麻烦就要结束了。他们坚持闹了四个小时,我不得不一次一

次地去堵门。我们找到一个丑陋非常的老头,让他去弄点煤来。我们知道煤是弄得到的。他搬来一些煤,但他和我们一样,只搞得乌烟滚滚。后来我们才得知,附近就有好煤,村里人烧的全是好煤。老头给我们拿来的,可能只是铁匠铺里用风箱吹风烧的那种煤。九点钟,驼队来了,在校园门口扎下了帐篷。直到一小时之后,我才为翟荫端去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和他极度需要的茶水。当晚他很少人睡,因为他的脚又疼痛起来。这是已过去很久的感恩节之夜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第二天早晨,需要王译员干的事千头万绪。他贿赂了贪心的老头人,让他派人送我们去下一个村庄,以免再遭到村民的拒绝。做到这一点既靠了答应给他一大笔钱,也靠了王译员施展的大可称道的本事。头人委派的使者带着一块红色的木板,上面写有证明他的公差身份的内容。我们尽早地出发了,为告别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感到欣慰。行进七个小时抵达了九坝(Chou Pa)。沿途路径一会儿在高原上,一会儿在旷原边缘下面的深沟里。沟壁映衬着在我们另一边的黑河,犹如一条堤坝一样。风裹挟着雪片刺打得人睁不开眼睛,马车上驾的小马和骡子也显得可悯可怜。我们投宿的地点脏污不堪。有一个供睡觉的平台,上面的污物扫也扫不掉。这就是“九坝”,意即“第九个堤坝”。由此我们得知河这边点缀的这些村庄名字是按顺序取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五坝。又一天之后,我们来到二坝。带着红漆木片在前面寻找住处的向导没有回来,王译员安排我们进入了一个富裕农民漂亮的居室里。这位农民有十个儿子。他们的辛勤耕作似乎给他们的父亲带来了财富。第二天早上,向导毫不羞愧地回来了,并且试图向我们索取更多的酬金。他的傲慢和可憎的脸上流露出的低劣的狡诈怂恿我放纵了自己,我早就想这样做了。我有意严厉地让他饱尝了一顿那双坚硬、无情、昂贵的美国伐木者的皮靴的滋味。他没有感到惊讶。可能他早就预料到了,也可能他早就从其他中国人那儿尝到

了比这更不好受的滋味。他恢复平衡之后,带着认为替别人干事就是为了索取高额酬金而且干砸了也不能让人指责的那种人才有的神情,转身走了。我遗憾的是,他穿的那身厚厚的衣服使我没有更清楚地表达出我的意思。

我们在二坝的房东是另一个面目可憎的人。他老谋深算地把他患支气管哮喘的一家人睡的炕腾出来接待翟荫和我。幸好我忘了拔掉炕边上油碟里边点着的灯芯,使得睡觉比我警醒的翟荫在房东夜间偷偷溜进来偷窃时将他吓跑。我被翟荫的喊声惊醒时发现房东正逃往门外。

第二天的道路十分难行。很明显,一些沙丘也是沿这条路线移动的。它们正在吞噬一座寺院。我把翟荫丢在车上,去观看这奇异的景象。现场表明,自从建筑物矗立在那儿以后,风沙已持续了五十年之久。有几座寺庙一半已葬身于仍在向前延展的“沙龙”腹中了(图十六、图十七)。建筑物并不古老,还有比它们更早的建筑基础的遗迹,诸如鲤鱼池、桥基以及铺有瓦片、已经钻人移沙之中的甬道。从裸露在外面的砖石料特点看,这座建筑物的基础已经很古老了,但寺中僧人想当然的回答却并没有为确证我的这一猜想帮多少忙。他说这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建筑,而中国佛教寺院的历史还没有两千年。他无知地把它推前了。这是一个广漠无垠的地方,肆虐蠕动的沙丘吞噬掉一座又一座建筑物,我在途中无法猜测哪里有建筑物。我的面前足有二十座寺庙,全都钻进环抱着它们的长城的臂弯里酣然入睡了。长城只有十五英尺高,基部有十二英尺宽,并不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那几个月里,我毫不厌倦地徘徊在它的身边。而且,每当路途转折,与它重逢时,我总产生一种感觉,感到它与北京以及中国腹地的温柔之乡有一种历史的和地理的联系。仅有两名僧人看守着这些高大的寺庙和难以计数的佛像以及粗糙的壁画。他们也将被移动的沙丘撵走。他们在长城脚下耕种的那一小片土地将被深埋在二十英尺厚的毫无用处的

干沙下面。也许若干个世纪以后，沙漠将从这儿消失。那时，考古学家们不仅将发现我看到的这些古老的桥基和古时寺庙中方形的鲤鱼池，而且将发现我现在穿行其间的建筑群，把这儿大量粗糙的彩塑和拙朴的壁画修饰得臻于完美。

我们满怀信心地相信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会找到一家小客店——数周来的第一家客店。但当我们到达一个简陋的村庄时，客店已经关门了。我们颇为艰难地敲开了门。店主的行为好像对我们怀恨在心似的，尽管我们付的钱比他的老主顾们付的多得多。第二天早上照例是一番争吵。我们离开时，发誓在中国再也不多付钱了，多付钱反倒产生一种罪恶感。

在那个倒霉的感恩节之后第十八天的中午，我们来到了甘州城。在这里有仁慈的高医生，氤氲着基督教的温馨，有充足消毒药品，而且还存放着家里给我们寄来的巨大的邮包。

医生检查了翟荫脚上的伤势，表情严峻。他熟练地清洗了伤口，肯定地对我们说现在还没有什么坏疽性危险。我们高兴极了，这消息，再加上家中的来信，还有什么比这些让我们更为渴望的呢？

第十三章 敦 煌

抵达甘州后的第十六天,我们又启程西行,去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地——位于古代新疆边界上的敦煌千佛洞。虽然现在翟荫已能站立起来,甚至可以穿着他那高靰皮靴走几步路,但他仍然有点发烧,也担心自己有碍旅行,因此我们的这次远行是比较勉强的。我们走的还是前次去肃州的那条路,与我们驾车从毛目渡河南下的那条艰难道路正相平行。路途需要一周时间。新年后的第四天,我们到了肃州。四天之后,我们又出了城。这时,情势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尽管翟荫做了最大努力,但他连一百米路也不能走了:他患了重感冒。我知道,这时候他极易感染病毒,而在中国肮脏的客店,感染的机会是很多的。其时正值一月,我们还要度过二月,这恰是中国西部边陲高原上风寒最为劲烈的隆冬季节。每个阶段的行程约需十三天,其中至少有一周时间要在不可预期的现场进行探察。如果我像翟荫一样体力不济,绝对不想继续前行了。翟荫和我一样,对这次旅行非常热切,但我不得不表现出特别粗暴的样子,终于使他痛心地同意放弃旅行。

一月八日中午,我们赶着马车离开客栈大院。翟荫雇了三辆两轮车,而我刚买了一辆大型马车,驾着四匹新疆小马。王译员和我同行。可怜的翟荫带上了那个小伙子——对此人的离去我特别高兴。他手脚不干净,而且欺负其他雇员,经常使我们处于窘迫的境地。我不敢带他去敦煌,在那儿,我们要与僧人进行密切交往,一言一行,都关系到我们完成这次旅行使命的成败。我对翟荫与

他同行感到同情,但这个小伙子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厨师,而且他有在途中恃强逞能的本事,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抵达海岸。在回程中,翟荫将负责收集我们沿途寄存的床铺、包裹、石制头像和邮局存款等物品。一句话,我一身轻松,而翟荫却负有把我们的东西(包括在额济纳的黑城发掘出来的珍贵古物)安全带回的重任,这是有很大难度的。在客栈门口,我和翟荫挥手告别,他去海岸,我继续西行。我俩的心情都很沉重。

我们的全部装备就是这辆马车主人以前的那一套东西。王译员对马车做了一些改进,架起了一个车篷,舒适得像吉普赛人的大篷车,大得足够让我们一个挨一个地并排躺下。四匹小马从新疆长途跋涉而来,现在已得到休整。与我们使役过的那几匹骡子和路上其它挽马不同,它们经过训练,中午不需要休息和进草料。赶车人驱使它们整天行进,只有途中小停两次,每次半小时。晚上让它们大量进食以恢复体力。起初,我发现它们经过一天的使役后,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感到很担心。但有人对我讲,西部所有的小矮马都是这样,伤口丝毫也不影响它们的行进速度。后来,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一位朋友——在弗利尔博物馆工作的毕安琪(Bishop)^①时,他惊讶不已:

“你发现的,正是公元前2世纪武帝派人到西域去带回的汗血马!”看来确实是这样,我们发现了汗血马。关于那次远征,人们知道的有三四个重大事件;在历经十九个世纪之后,这些事件之一又重现于我们面前。曾经使役过这种强壮耐劳的小牲口的旅客都没有把它们与一种奇怪的疾病联系起来,这种疾病也许是某种寄生虫存在的结果。因此,汗血马的故事植人到民间传说中去,就像琥

^① 毕安琪(1881~1942),全名 Carl Whiting Bishop,是美国的考古学家,多年供职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博物馆,曾三次来华进行考古,著有《远东文明起源研究手册》(1942年)。

珀中的苍蝇一样,被中国简洁的语言赋予不朽的含义。

太阳下山之前半小时,我们到达了嘉峪关(图十八)。中国的万里长城在这傍山而踞,在有城墙护卫的小镇上终止了。在北京以东有山海关,长城在这里延伸到太平洋岸边。两个关隘由长约一千五百英里的城墙联结,它们与基督教一样古老。设关的目的是抵御来自北方的入侵者。但在守卫者不够强大的时期,它挡不住来犯者的长驱直入,以至于让忽必烈在北京的龙椅上安坐下来。

长城是世界上七大奇迹之一。早在中世纪,欧洲就有了关于长城的诗篇。在B.夏普(Becky Sharp)摔掉词典之前的那个时期,一位大辞典编纂家,他曾是平克顿(Pinkerton)小姐的朋友。他告诉一位苏格兰律师说,长城是很值得去游览的。而在中国的诗歌和传说中,涉及到嘉峪关和山海关的名字,就如我们提到丹(Dan)和比尔舍巴(Bersheba)一样普遍。但从中国东部来西部边陲的人很少,即或有,他们也大多是从北京的监狱中或绳索下逃脱出来的政治犯。自从大英博物馆的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嘉峪关外的沙漠中发现了数百英里的长城之后,关于嘉峪关的神话被打破了。那段长城是将芦苇捆和杨树枝固定于钉在地中的木桩上修造的,比嘉峪关更为古老,更具浪漫色彩。尽管这一发现很重要,但现在中国知道它的人微乎其微。因而,嘉峪关仍然保持了它在中国民间的独特地位。

虽然这个城墙环抱的小城历史悠久,但当投宿的客人到来的时候,它却显得异常怪吝。说这时仍然有两千名士兵驻防的传说只不过是一个欺骗不了任何人的神话。这里的居民不足一千人,我估计驻军充其量有二百人。王译员、从黑城带来的民工老周(Laochow)、我们雇佣的十七岁的赶车人和我在住房地板上自炊,吃了晚餐。现在那个小伙子被赶走了,我们像那些从新疆带了葡萄干、羊毛和皮革到中国内地市场去出售的赶车人一样住下来,我感到非常满意。

这是一个开端。不久以后，尤其是当我们辞退车夫，自己赶车、做饭、饲喂牲口、与客栈老板周旋时，生活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我曾经认为，虽然做饭、与人争吵这些事都是那个小伙子干的，但我在沿途也已经深深地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现在才知道那是迥然不同的，就如里茨(Ritz)旅馆和缅因州的供膳寄宿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样。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来装载马车。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自豪地登上了旁边放置“长城最后一块砖”^①的长城一个檐台上，回首遥望山海关、北京和太平洋。我的左侧，是绵延至蒙古高原边缘群山处的沙漠，右侧是伸展无垠、卵石遍布的戈壁滩，数条依然冰冻的溪流从隐约可见的西藏群山中蜿蜒流下，将荒原分割开来。中国，这个我们在中学教科书上知道的“中央王国”，在这儿变得狭窄起来。虽然蒙古和西藏的确是这幅员辽阔的国度的一部分，但它的疆界还远远没有划定。在城门外面，我们购买马匹的豆料，重新整理了行李，一直逗留到十点钟，但在途中再没有耽误，从十点钟一直走到晚上六点钟，路上很少有旅客。我们只在一个小棚屋里停了一下，喝了点茶水。这个棚屋里在一个约有三百年的大型庙宇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断垣残壁上仍然留有壁画的残迹。壁画技法拙劣，具现代风格，毫无美感。这一夜我们是在一个比席棚大不了多少的屋子里度过的。木炕用棍棒支撑以后我才敢睡上去。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在十五个小时中走了一百一十里路，太阳落山之前停下来休息了一下，然后继续赶路，一直走到夜里十点

^① 指建嘉峪关关城时最后剩下的一块砖。据说，当初修建关城时，工匠们准确地计算了全部工程的用料数字。最后整个工程结束时，只剩下了一块砖。这块砖被后人安放在西瓮城门楼后檐台上，可望而不可取，以示对当时工匠的纪念。

钟。两天后,我们发现,沿途我们停留的地方都有许多穆斯林的马车。他们在肃州卖掉了葡萄干、羊毛和皮革之后,采购了中国商人从遥远的口岸贩运来的棉布、火柴、蜡烛,正在返回中亚或新疆去。这些人具有中国农村马车夫具备的所有特性,显得桀骜不驯。他们也许是一些“绿林”人物,但毫无疑问也在做马匹生意。交易的时候,是用他们那棕色胡须深掩着的白牙的一闪或像魔术一样的手势来表达的。他们的小矮马和我们一样,只是被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法驯化了,显得温顺听话。它们没有受到过中国车夫式的虐待,一直为聪明的主人所拥有。这些马匹的主人虽然生长于长城以内,但从来没有完全忘记他们的先辈们热衷的劫掠,特别是当他们从懦弱的波斯为自己掳取妻室的时候,马匹就成为男人们在露宿大草原的漫漫白昼和短暂黑夜中的伴侣。

第五天快要过去的时候,那匹栗色母马摇摇摆摆地跌倒在路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它刚满四岁,干净利落,拉车比其它马都卖力。我沮丧极了,开始憎恨起这赶车的年轻人,因为他讥笑过它,说它肯定有肺病。王译员对这家伙的漫不经心也极为不满,逐渐承担了照料马匹,置办饲料的全部工作。这小子是个中国人。在肃州时,他是我们旅馆隔壁一家小饭馆的食客。在我们找不到其他赶车人时,他毛遂自荐,当上了我们的车夫。在旅途中,我们对他的信任愈来愈少。他既不关心牲畜和车辆,也不在乎我们这些雇主,自己过得悠哉游哉。自此以后,我们便牵着这匹马前行。它耷拉着脑袋,步履蹒跚。过了不到一周,我们发现它原来怀孕了。不需要别的,它只需要上好的饲料和适量的活动,这两者它都得到了。

在漫长的白天徒步而行,晚上要操心牲口,而且连即使不很干净的饭也不能及时吃到,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不久,我就善于应付这种旅途生活方式了。一次当沿街旅店的大门都已经关闭,王译员和老周小心地带领着队伍在驿道上行进时,我就跌跌撞撞地奔

到前面，闯进院落，跳跃过肥大的母猪，跌倒在湿漉漉的粪堆中，额头碰在一架斜靠在低矮房檐上的梯子上。我登上梯子，爬上房顶，将上面放的草捆扔了下来。经过一番搜寻，找到一具前端带铰链的铡刀，我便开始铡草做饲料。这活儿我已经很熟练，不会将大拇指也喂到铡刀下面去。卸了车的马匹在冰冻的地面上打了滚之后，围到我身边来，专注地看我铡草。铡了足够的草料，放入它们面前挂在车尾的大筐子里。然后，半硬半软地劝说名叫詹魁德(Chan Kweide)的店主在一口大铁锅里烧开水，并且去擀面。如果他鸦片烟瘾正浓，这一切就毫无指望，只得由我们自己去干：将草秸一把一把地塞进大锅下面，等烧完后再往里边塞。在这穷乡僻壤，燃料状况是如此可气。但即使詹魁德肯屈尊去擀面，那种令人恶心的情况我但愿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他先用杆秤仔细地称好面粉，短斤少两地不让我们得到足够的分量，然后将面粉堆在面板上，拌上水，用他那双无所不干的手去揉。在这个乡村里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食物就是这堆面粉。他那双手，接触过牲口粪便，抓过母猪，捏过鸦片烟管，擤过婴儿的鼻涕，整理过骡马的鞍鞯，现在则在深深地插入到面粉中，这不是由我们花钱，去弄干净他的双手吗？面揉好后，他用擀面杖擀好，大小厚薄恰如一张婴儿的毯子。然后精巧地切成细条，投入锅内沸腾的水中，煮了三分钟。如果煮的时间太长，它就会太容易消化，我们肯定要抱怨上当受骗，使我们空瘪的肚子没有得到耐得住消化的分量。有一两天，我天真地以为被污染的面条会在沸水中得到消毒。但吃了几顿以后，我认识到，沸水仅仅煮了面条外部，其内部仍像刚擀出来时一样。切面的方式有三种，它们似乎直接与风味有关。一种是切成又细又长的条状，一种是切成寸把长的方块，还有一种是切成宽宽的带状。当我有选择的机会时，常选择前一种。尽管做了种种可以想像的努力，我仍然不喜欢吃面条。在长途行进中，我们时而停下来，帮扶摔倒在地的马匹，时而与劲烈的逆风搏斗，时而用人力操纵马车

碾过灌渠之上险情难料的冰层。经过了这样艰难的跋涉之后,对那一天一夜中仅能吃到的一次热气腾腾的面条,我没有几次是真正欢迎的。这说明,在这次旅行中,我还没有经历真正的艰难。各个旅店无不如此,但有的旅店甚至连最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如马的豆料、燃料、住房等)也没有。幸运的是,王译员非常精明,量入为出,精打细算,而且在准备饲料一事上从来不马马虎虎。如果他预计到几天可能找不到饲料,就会提前准备好豆料和饲草。

第八天到安西时,我收到翟荫的一封信。他在甘州经过高医生治疗后,正在兼程返回。他说他的情况很好,我们散存在沿途的物品也都安全。这儿的旅店老板是一个个子很小模样古怪的人,穿着一件价格昂贵但肮脏不堪的皮大衣,我想这肯定是从哪一个过路的俄国流亡者那儿偷来的。他招呼我们进了店,态度殷勤得有点过分。我有点意外地感觉到,他似乎是真心地关照我们。他虽然操一口北京话,但在谈话中,我连自己通常所能捕捉到的意思也得不到。晚饭后,他拿着名片来访谈。一个小店主竟然有名片,这是很希罕的事。即便到这时,我也很难相信他讲的故事。他说他曾经是一个骑兵中校,担任过地方官的副手。从北京来的途中,他曾遭到洗劫。出于嫉恨或由于害怕,那些更有权势的官员阻止他从北京得到补给。他花了九块中国银元(折合4.5美元),盘下了这并寄托着他的希望的小店,和他的妻子和幼子安居下来,等待时来运转的那一天。

他说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段约一英寸长、五英寸粗细的竹筒,竹筒上好像还带有一小段竹枝。他不时地把鼻子和脸部凑近竹筒尾端,离开时嘴里喷出来一团烟雾。这表明,他拿的是他的家乡——中国最南部的云南省的普通竹烟管。那段看似竹枝的东西实际上是用来填烟丝的小竹管。大竹筒里装着水,烟穿过水才能被吸出来。照例他只用三口就抽完了装在小竹管中燃烧着的烟丝,然后,使劲摇动竹筒,使水挤压空气,排出小竹管中的烟灰。

当天晚上，驿站站长向我证明，店主的话一点不假。同时，他还告诉我，店主在北京拥有房地产。不久前，他委托他的朋友全权卖出，钱很快就会寄出来，以解脱他的困境。第二天早晨我们驾车离去时，这些财产又被店主扩大了。他说他过去经常举办豪华的宴席，每次要接待四十位客人，甚至向我们透露了每次花费数目的秘密。他也没有疏忽邀请我们到首都他的家中去做客。当然是他佳运又至之后。

与此同时，他那张羊皮纸般的脸孔和老官僚高贵的风度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使得我们去支付住店费用的时候，不能不掏出整块的银元来。这是我们来中国之后，第一次没有因为住宿费而发生激烈的争吵，而且也第一次由店主和他那衣衫褴褛的幼子为我们鞠躬送行。

假如世界上没有褐色、绿色和柔嫩的灰白色，而只是一片炭黑，那将是怎样凄惨的景象啊！这个情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像过。但在将近两天的行进中，我们就置身在黑炭般的世界里。广袤辽阔、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被烧光了，只有大路左边的衰草依稀可见。大群的羚羊曾经被驱赶到这儿避过难。羚羊一般都是小股活动，最多不超过八只到十只。这样的“小家庭”在我们南侧时时可见。它们常常在我们前方的路边上吃草，直到马车离它很近时才飞快地跑开。有时我们甚至会把一两只羚羊冲散，使它们离开群体。这时，它们就会在马路另一边来一阵狂奔，白色的臀部像电光一样闪烁。跑出老远之后，使劲一跃，跳过路面，加入到它们同伴的群体之中。它们身后，不能留下任何踪迹。一只羚羊必须做这项工作。它用咝咝作响的尾巴，天衣无缝地扫清十五英尺范围内的痕迹。然后像一只皮球一样，兴高采烈地一下子蹦到道路另一边。我常常在经过羊群旁边之后仔细进行观察，而当这时，它们已经在悠然自得地吃草了。即使在离我们较远的地方，如果需要横穿道路，它们仍然一跃而过。很显然，它们本能地躲避那些曾有人

或带有人的气味的家畜经过的地方。

安西标志着我们就要离开这条通往新疆和中亚的现代商道了。因为从这儿,我们要顺着一条古道拐往西南方向。长途旅行的团伙已很少使用这条古道,只有那些像我们一样到敦煌绿洲或更远的乡村去的人才经由这条道路。离开大道之后的第二站是瓜州口子(Kwacha Kaotze),它正坐落在南山脚下。只有两间房子的所在就是小客店。它刚好设置在通往一个虽然不大但却兴旺的绿洲的道路上。那个绿洲上的人们常因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要到安西去,否则,没有人会认为值得在这儿住宿的。这儿是地地道道的沙漠地带,不再有足够的大草原供人们去烧荒,为第二年的牧草生长提供肥料。在“甜水井”,我们在陡峭的山崖上一个半坍塌的庙宇里做了一顿饭,因为山下小屋里既不供应饭食也没有牲口饲料,而可以用来做饭的火炉上拥挤不堪地摆放着许多水壶,是由附近露营的一帮赶着三百峰骆驼的人们提来放上去的。我们休息了四个小时,在一轮皎洁的明月照耀下又上路了,一直到太阳出山之前才停下来。这次停顿又是为了短暂地休息一下,饲喂马匹,准备整天行进,奔往绿洲商城——敦煌。如果说敦煌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至少它也是我们名义上的目的地,因为它距离洞窟没有多少路程。最后四个小时的行进是对我们意志的考验。虽然我们已疲劳不堪,但那些可怜的马匹情况更糟。它们在厚重的沙砾中跋涉,每走二十米左右就得停下来喘口气。在这时候,那个懒惰的赶车人特别爱发脾气。他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牲口,在它们刚要停下来时,用鞭子抽打着,驱赶它们前进,连一口气也不让喘。我从他手中接过鞭子,和王译员一起驾驭它们,熬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间。

到达敦煌时,已经是夜间了。我们要进行最后的采购,但这一切不到第二天是无法开始的。我们睡了将近十二小时,起来后饱餐了一顿热土豆,喝了淡茶,然后动身去采购。这个集镇上的商店确实简陋不堪,但比起安西或肃州以西其他城镇的商店来要好一

些。我们购买了一些布料和质量特别低劣的香烟,然后,及时到县衙去拜访。地方长官已经收到了肃州军政长官关于我的介绍信函,他坚持要我和王译员留下来,明天与他一道进餐。虽然我心急如焚,想立刻出发去洞窟,着手研究壁画,但又不便拒绝邀请。除了等待之外,我们无所事事。我回到旅店去写信,并且睡了一阵儿,然后去拜访一位俄国医生。我听说他就住在城内。他不懂英语,也不懂法语,而我对德语和俄语仅略知一二,但我们在一起友好地品茶。我了解到他毕业于托姆斯克大学医学院。

第二天,我参观了三座寺庙,无一不使我失望。它们全是现代的建筑,里边充斥着粗陋不堪的泥塑。虽然其中一座里边有壁画,但与我沿途所见的那些相比好不了多少。

县衙署里摆设的宴席是按古老风俗进行的,拘礼甚谨,但令人高兴。八个在甘州正规中学上学回家度假的学生也应邀前来作陪。长官主持就座仪式,座次是按身份安排的。总管大声地宣读名单,读到名字的客人被一一礼让人席。客人就座后,他的筷子要由主人礼节性地擦拭一下,主人举杯齐眉,表示祝福。这样一个个地进行需要很长时间。我饶有兴致地观看着。中国古老礼节中的这一套在北京已不复存在了。祝福的酒杯在飞快地传递,而且非常迅速地被一次次斟满。酒杯虽小,但杯中物却十分劲烈,我们渐渐变得饶舌起来,甚至还有点好争辩。头脑也开始有点眩晕了。

长官用小杯饮了约二十杯酒,又用大杯饮了十杯之后,开始不时离席,在室内踱步。当他摇摇摆摆地回到座位上时,我有点担心地望着他。尽管有仆人站在他的椅子后面伺候,但这位阁下出其不意地猛坐下去,坐到了地板上,下巴颏磕在桌沿上,我真担心伤了他的舌头。无论如何,我的记忆里总也抹不掉我对而首席上的那张面孔:一时间,他那双凸起的眼睛可怕地圆睁着,里面闪动着莹莹泪光。我将目光从那令人惊恐的场景收回来,与坐在我旁边的王译员随便地神聊起来——这是我一贯为人称道的本事。长官

站起来之后，向仆人问话时带着愠怒的表情。见此情形，客人们急匆匆地起身告退，融入了冷冰冰的夜色之中。而我自己也需要寻找一个僻静地方纵声大笑一场。那天夜里，当我从简陋的床铺上醒来，想起长官那伏在桌子上的像大南瓜一样的脑袋时，都禁不住想要尽情狂笑。

当我们走过横亘在敦煌城和千佛洞之间那片约数英里的沙漠地段时，天色已近黄昏了。出现在我们视野之中的千佛洞，是悬崖上一排排的洞穴，其下是一条小溪。我们溯流而上，到达开阔平原后的咽喉部位，洞窟下面簇拥着羽毛般层层叠叠纤细柔弱的白杨树(图十九)。我们踏冰越过小溪，在主洞口木结构的寺堂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住持道人到敦煌城中去采购物品，迎接我们的农工把我们带到一个狭长阴暗的客厅里。在这里我们将度过其后的十个夜晚。客房确实干净，是我在中国住过的其他客店不能比拟的，但房间光线不足，而且非常潮湿。我留下王译员进行料理，趁天还未黑，立刻迫不及待地去看洞窟了。

第十四章 千佛洞

经过多年的梦想、漫漫长途和耗费在研究伯希和教授所拍摄照片^①上的许多时日之后,此时除了一种热切的渴望之外,我别无他想。十天里,只有吃饭是在洞外,其他时间我从未离开过洞窟。那些公元14世纪前的先哲们在墙壁上留下了精美绝伦的佛像,我几乎无法使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事研究。成千上万的人物,有的步态雍容地列队行进,有的静坐在盛开的莲花上面举手祝福,有的陷入深深的沉思,有的则处于更高深层次的心无所思的涅槃状态。他们正是那费心猜度的神佛,他们确实存在着(图二十)。斯坦因爵士在他的著作中展示过一两幅敦煌壁画,伯希和教授已出版了五卷本的敦煌画集,而且另有一卷也即将问世。学者们正是以那本价值七十三先令六便士的书为基础,来探讨中国万神殿中诸神的源流,并根据这些翻印照片来确立自己的发现。

但在壁画现场,情形却并非如此。在一个漠视宗教的年代,壁画的颜色已经有五成消退了。冬季的太阳从洞外射进的光线非常

^① 伯希和于1908年2月25日到达敦煌千佛洞后,对敦煌石窟壁画和塑像进行了系统的、大规模的摄影工作。拍摄工作是在伯希和的指导下,由随行的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进行的。1920~1926年,伯希和将所摄照片以六卷本《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 De Touen—Houang)的形式出版发行。由于伯希和最早拍摄并公布了敦煌壁画,所以,《敦煌石窟图录》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敦煌艺术的大型图录,是早期研究敦煌艺术的主要依据。华尔纳“研究伯希和教授所拍摄照片”指的应是这部图录。

微弱，画像显得模糊不清。这是一个古代神佛的群体。那些高贵的信徒早就离他们而去了，但他们却没有逃离尘世。他们静静地栖身在高高的洞窟里，是那样的莫测高深，那样的意味深长，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远涉重洋，横越亚美，迈着沉重的脚步，送走那令人疲惫的数月时光，来弄清楚他们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他们非凡的美具有很大程度的积极认识——虽然这美赏心悦目，使我丧失了批判意识——而是因为这一虚幻的现实。他们非生非死，兀立于洞壁之上。我来到这里，是想考察其年代，以事实的雄辩反驳那些教授，并且探索艺术的影响力。但此刻，我站在一个洞窟的中央，双手深深地插在衣袋里，陷入了沉思。我是一个美国人，而且并非佛教徒，但在以主耶稣纪元的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却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显圣……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若有所思地漫步走回了住地。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佛洞——有千座佛像的洞窟。但实际上，这里的洞壁上有大大小小半损坏的或几乎完好无损的画像好几万个。许多上乘之作几近于消失了，只有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内，选择合适的角度才能看得到。他们似乎正在从自然光线中渐渐退隐。也许他们已经驾临须弥山之巔，在那儿，白鹤长喙衔松枝，碧莲终日洒花雨；天气似阴还晴，白昼未有尽期。他们常常似乎已飘然远去，在洞壁上留下的只不过是他们的情影和肖像而已。但这些影像犹如浮动的众佛，他们依稀闪光，明眸流盼，带着不可言表的肃穆平静，一个个从我的眼前掠过。我知道存在于那儿的，正是他们的神灵。

但当我的目光从他们那椭圆形的面孔和平静的嘴部扫过时，我不禁为俄国士兵及其同伙们遗留在上面的划痕和部队番号所震惊了。这真是一种斯拉夫式的对神灵的亵渎。两年前，一支四百人的俄国小股部队被红军击溃尾追时，走投无路，从中亚逃了出来。恐惧布尔什维克更甚于恐惧俄国旧政权残余势力的中国当局

解除了这股逃兵的武装,将他们关进千佛洞,而部队司令官则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中,并仁慈地供给他们足量的鸦片,以便让他们忘却肮脏而劣质的伙食,达到使这些人合理而迅速死亡的目的。

敦煌壁画是古代中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劫难之后,留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遗产,是无以替代的珍宝。但那些寂寞的农民士兵却把他们毫无价值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刻写在上面。刚开始时,我曾对此行为盲目发火,但很快我就认识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这只不过是大战导致的又一个灾难性后果而已。在纷繁的现代世界中,这儿是一个平静的角落,在这儿没有人会知道,在我们这一代人所熟知的最漫长的四年时间里,欧洲是怎样的四分五裂。如果你给他们讲述法国大教堂如何横遭蹂躏,卢浮宫图书馆如何被付之一炬的时候,这儿是不会有人理解的,他们只会目光呆滞地盯着你。然而,和平协议签署了三年之后,当投在我们的世界这个池塘中的石块沉落水底,而激荡起的涟漪却漫延到这遥远的岸边,前来追寻那四百名无知的士兵时,这些玷污了敦煌石窟圣地的帝俄农夫却四处漂泊,不知去向了。剩下来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就是好奇地搜寻他们留下来的东西。谢天谢地,许多无以替代的珍品依然完好无损。

显然,我们必须收集一些壁画样品送回国内进行研究,更主要的是,要妥善加以保护,防止进一步的损坏。我曾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反复思考这一问题。德国人和英国人曾经从绘有壁画的泥墙后部入手,成功地剥离并保存了那些精美壁画的重要画片,但对付在石崖上开凿的洞窟却并非易事。

洞窟内墙的构造是这样的:在粗糙的砾岩表面涂抹了一层约半英寸到两英寸厚的草筋泥,然后在上面粉刷了一层白灰水。在这些白墙上,用普通水彩颜料绘制壁画。我们试图从最松动的地方入手,将墙皮撬下来,但即使十分小心地采用锯割法或凿沟法,都没有成功。剥离下来的画片都不够大,无法使一些重要的人像

或其细部得到保全。最后,只得诚惶诚恐地尝试采用哈佛大学博物馆专家介绍的一种技术。这是一个试验,而对我来说,成功的机率似乎只有百分之一。在普通情况下,我们肯定不会在这些伟大的杰作上进行试验的,但现在我很着急,一旦试验成功,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典型的范例。

离开北京时,我已听从一些化学家的建议,准备了一些黏固剂,用来将古画上的颜料黏结在一起。这些颜料现在已变得松脆易掉,犹如黑板上的粉笔末一样。同时,我还带了可溶性底基配料,如果经鉴定它对颜色没有损害,就可以在画面上使用。

我既不是一个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字画修复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强烈考古意识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似乎具有亵渎性质,而且可能性也不大。然而三个罗圈腿蒙古人的行为却激励了我。他们从骆驼上爬下来,懒洋洋地进洞拜谒神灵。他们足够虔诚地在一具粗陋的红脸蓝发的现代泥塑前祈祷,然后站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人用他那满是油污的手掌撑在一幅公元9世纪的壁画上,斜倚着身子。另一个人踱到绘有壁画的墙前,懒散而好奇地用指甲抠那幅壁画上的裂片。当他们在狭窄的洞口过道里并行而出的时候,散发着腥臊味的羊皮大衣摩擦着神圣的人物画像。那些画像,天啊,经过身穿羊皮大衣的成百上千人肩和肘的摩擦之后,中间部分已经消失了。

这就足够了。我所要进行的任何心怀虔诚的试验都被赋予了正当的理由。我狠着心,开始把北京的一位化学家给我的用来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到墙上。片刻之后,又把经过加热的胶水状的底基涂到壁画上。然而这时出现了未曾料到的情况:洞窟内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我难以判断药液在冻结之前是否已经渗到了墙皮里边,还有加热到沸腾的胶水几乎无法在它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面上。王译员和一名雇工勇敢地举着上面放着加热胶水的火盆,我蘸了胶水往壁画上涂刷。滚烫的胶水像糖稀一样滴洒在

我仰着的脸上和头上、衣服上，而后，正当我要施展本领精细操作的时候，手指被胶水黏结在一起。首先我在一些没有画有内容或破残严重的地方实施这种实验，其结果证明并非完全失败但也并非非常成功。我只能就这样揭取壁画了，把它们带到坎布里奇，让我在福格博物馆的朋友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它们从坚硬的涂层上挽救出来。

我并没有触动那些公元6世纪的作品，它们的存在是绝无仅有的，我也没有剥取那些唐代最杰出的作品，我所选择的只是那些保存状况非常不好的唐代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并非当地最杰出的，但它们也足以证明它们的价值。我们在美国，甚至柏林从未看到过如此精美的作品，它们比藏于那里的从新疆灰泥墙上取下下来的壁画都要优秀，足可以让它们嫉妒。

整整五天，从早晨直到晚上的艰苦工作，而在这五个晚上，我自己又被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深深自责，但第二天又强迫自己去继续工作，最终那些剥取下来的壁画被安全地用毛毡包着，并平铺着绑在两块木板之间，为即将到来的长达十八周的旅行做准备。它们首先用毫无减震设备的马车运，然后是火车、轮船，最终到达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

虽然我曾对自己的罪恶自责，但最终我还是决心必须从当地人的铁锹和无知的洞窟彩绘工的画笔下拯救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这些珍宝，这些彩绘工将在几周以后来这里，在这里举行一个野蛮放纵的庙会，在此期间破坏这些作品。

老道^①看到我们用热胶水在他的洞窟墙上涂壁画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事实上他看待这一切比我还冷静。在我向他解释我在壁画群中寻找壁画时他只是笑了笑，但对于雕塑情况却大不一样，这些塑像就是他的骄傲。为了塑造它们，他曾长年累月地在

^① 指看管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

绿洲之间化缘,而现在,却来了一个近乎发疯的外国人,他尽管也布施了一些财物,但却想拿走一个。他向我建议为了减少麻烦来回搬运,我应该在敦煌城中从他经常雇用的一位雕塑家手中订购一个塑像,或者等我到北京后在那儿请京城的工匠为我塑一个。这些建议尽管有道理,但我却坚持说我对他的寺庙更加崇拜。最后我们达成妥协意见,尽可能以他的意见为主,我只被允许拿走一尊过时的表面不再鲜亮的塑像(图二十一)^①,而不去动他那些新请人制作并付过费的塑像。

就这样我可以开始费力地整理这尊非常优美可爱的塑像,它的一条腿跪在基座上,灵巧的双手合于胸前。在它塑成后一千一百多年的时间中,除了我,再没有任何粗鲁的手碰过它,在它上面满是尘土,遮盖了它本身的色彩。在我们仔细的吹拭和用一块脏丝绸撩拭之后,它上面的色彩逐渐显现出来,有蓝色、红色、金色,面部是淡黄的象牙色,脖子上的项链也发出亮光。

这个塑像尽管并不大,但塑像用的未经烧制的黏土证明是意想不到的沉重。它几乎需要我们六个人才把它从它的底座上抬下来并放入一个填有碎物的木框中,然后四个壮劳力把它抬到我的住屋。在那里,我们用自己带来的一些碎木料做了一个简陋的木箱。箱子里衬上有我们从敦煌县城买来的棉花,还有毛毡及被单。

这尊小圣像只在其衣服部分有微小的一点损坏,这种衣服样式是佛教人物常穿的。我的毛毡、羊皮裤以及一些不合时宜的羊毛内衣后来都非常令人尴尬地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中,那是他们在坎布里奇打开箱子后拍的照片。在我返回的旅程中,尽管我没有穿内衣和袜子,但想到它们正在担负着另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保护塑像光滑的肌肤和鲜亮的色彩时,我的心中也是热乎乎的。

^① 指华尔纳从莫高窟 328 窟移走的唐半跪式观音菩萨像,通高 120 厘米左右,现被视为福格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第十五章 归途

在这里度过十天之后,我们又将面对空旷的漠野,驾驭着小矮马返回北京。我计算路途约需两个多月,但实际上,到第六十七天,我才抵达了离别达三十四个星期之久的北京,在饭店里,我洗了热水澡,悠闲地随时品茶。

当我艰难行进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去筹划将来的行动。这次八个月的考察旅行为学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一些物质性成果:一尊唐代彩塑塑像,三幅敦煌壁画,一面黑城的青铜镜,几座彩色泥塑,而且还有主要在西安府挽救出来的大量石碑摹拓本。泾州象洞还提供了不下五件石刻头像以及一具精美的石刻人像,在当地发现时,它已经断裂了,我们进行了仔细的修复。

然而,非物质性的收获比这一切还要重要得多。其中最出乎意料的发现归因于与地质考察队的安特生^①博士(Dr. Andersson)的邂逅。他送给哈佛大学一件具有争议性质的礼品,是从他的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样品中挑选出的,这是我们拥有的中国文物中最古老的,它可以归属于任何一个明确的文化地域或文化阶段。黑城(喀拉浩特)之旅表明,除非配备大规模的挖掘力量,并准备做出长期开挖,否则别指望在那儿会得到什么。柯兹洛夫和斯坦因

^①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1914~1925年期间在中国,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曾做过地质调查工作,并在河南、甘肃、青海等地做过一些考古工作。发现仰韶村等遗址。归国后曾任远东古物馆馆长。

在那儿收获颇丰,无有阙遗。但接触一下这座死城,搞一点古城开挖的技术实践,这仍然是令人满意的。当我思考在敦煌考察的非物质性结果时,我在最后十天中萌动的具有启发性的思绪似乎仍未中断。虽然斯坦因爵士和伯希和教授在敦煌获取甚丰,而且伯希和教授的著作中对敦煌壁画的复制具有首创的重要性,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

哈佛大学应当再次派人来考察。考察队必须装备齐全,配备有足够的照相机所用的照明电池。要多派几个助手,协助研究我的脑海里考察的各种问题,诸如最早期壁画中描绘的佛教众神有哪些?在公元9~10世纪又增加了哪些?早期颜料是否与后期的不同?这些颜料是从哪里来的等等。

印度众神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异?中亚神佛是否沿着这条贸易通道堂然进入了佛殿?在那些墙壁上,我们可以看到地地道道的中国绘画风格的神韵,这是专业水平的风景画开端——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是比我们优秀的,并且也体现出是以后手法和风格的萌芽。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中世纪晚期的颓唐。有许多地方,原作上面覆盖着二层甚至三层墙皮。这一事实,包括重绘和修复的情况只能在现场进行记录,而在最好的照片中,这些情况也常常得不到反映。经过六个月之久对原作的精心研究,我们不仅应当记住诸如此类可以被确认和记载下来的历史事实,而且应当熟知其艺术风格发展的微妙差别。正是由于这些差别,才使得中国漫长的绘画史艺无止境,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涇州的象洞是佛教艺术及其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虽然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与基督教一样久远,但我们最早有时间记载的遗迹是在公元5世纪初,这比象洞从悬崖上开凿出来的时间大约仅早半个世纪。这些年中,我曾参观过四处重要的早期佛教遗址,其中有一处是规模较小的伊州(I Chow)石窟。那儿没有石碑,仅有一只刻在洞顶的展翅天使,有六英尺长,

是古老的见证。这是躲过了村民的修缮而遗留下来的惟一的古代雕刻。其后我去过大同府,那儿的云冈石窟中有数千尊佛像,还有几座近代庙宇,它们全都保存得很好。后来又去了黄河南边的龙门,距离我们踏上这次旅程时吴佩孚盛情宴请我们的地方仅十几英里。北魏王朝曾经在那里建都,由此控制了商贸要道,使之成为整个中国新思想的传播地和从西域诸国运来的马匹、玉石等物资的集散地。在距此十数英里的地方,我曾看到了同一时期的巩县(Kung Hsien)石窟寺,窟顶上雕刻出嵌板和桁梁的形状,梁头略尖,还有榫头。这一切都是在坚硬的峭崖上凿成的。这意味着在喜马拉雅北部的丛林中,有着多么高超的修建庙宇的匠人世家啊!沿着我们走过的那条商道西行,来到彬州后,可以看到一些已经毁坏的早期雕塑和一尊在整个山崖上雕成的大佛,大佛上而有现代进行修复的涂层,因而已难以确定其年代。大约只有一天的路程,我们就发现了象洞,这是已发现的公元6世纪佛教最远的中间站,其后才知道新疆边境和敦煌的石窟。明年,一支装备齐全的考察队将会发现什么呢?这次考察即将结束了,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在坎布里奇以及东方,进行一次长期的研究活动是完全必要的,哈佛大学已经邀请了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到学校工作。从今以后,哈佛应当在亚洲开展野外考察。

在地图上标注新的考察地点,一丝不苟地确定它们的位置,为坎布里奇的其他人的诠释提供证据,这些工作将占去我们有生之年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而后,校内艺术系学生、历史学家、比较宗教学和汉语系学生们将从中寻找研究资料。正是为了这样的计划,野外工作人员艰辛跋涉,试图与自己在其中占据了小小的一隅之地的整个世界结合到一起。如果早知道第二年的旅行结果,我现在怀疑它是否对我具有诱惑力?我无法想像在短短的七个月中,整个中华民族会令人吃惊地从倦睡中苏醒,让我们所有的外国人溜回本国使馆中去。那时春天还在西省地带徘徊,路途狂风肆

虐。我根本没有想到,当我从敦煌石窟的大门口折返,重新踏上这条道路时,会是在酷热的夏季。我想,如果早知道事情会是这样,我就该继续往前走,准备再进行一次尝试。

虽然我们在第二年被迫离开了,但在回去的时候发现了五处更为重要的遗址,它们正是我们寻觅的第一批佛教文化的证据。另外,我们还带回了一批供研究用的照片。它们复制了大量中世纪的壁画。关于这些壁画的知识,将会填补一项我们初步对其认识上存在的空白。

在我们第一次从边界返回的那几个月里,没有料到发生了上海枪战和冯、张、吴之间的大战。^①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我们束手无策,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这一阶段,盗贼蜂起,仿佛旷野里的野雉,除了可怜的旅客去应付他们外,没有人去管这事。每天晚上,我们都心怀疑惧,认真地防范同住的旅客,试图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上判断会不会第二天对我们来个有计划的伏击。在途中我们曾遇到一些人,一眼就可以断定是土匪无疑。他们全副武装,骑在马上,没带任何行李,贼溜溜的眼睛盯着我们单薄的行囊。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除了四匹小矮马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抢劫,甚至连银元也没有——这东西按惯例是行旅之人生命的价值。我和他们一样的丑陋不堪,外表上,除了每天晚上都要刮胡子,而且用一只锡皮盆子洗一次脸外,与他们没有多大差别。这片土地上当时碰巧没有军队,当然城镇如有成群驻扎的军队,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第二年,有一些部队撤退下来,抢掠了一些小村庄,也引起了我们的担心。

^① “上海枪战”,指江浙战争。1924年9月,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为夺取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的上海,爆发了江浙战争。“冯、张、吴大战”,指1924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冯指直系将领冯玉祥,张指奉系张作霖,吴指直系吴佩孚。

如果说我对归途的事情记得很少,那是因为我全神关注着未来,对路途本身没有多少耐心(图二十二)。自然我对前面的时日和马匹夜间饲料的费用疏于算计,只是以沉重的步履打发了许多时间;虽然我紧张不安,担心马车前部放的箱子里面的那尊珍贵雕塑会受到损伤,但过去的许多日日夜夜和人物却会在朦胧的背景里显现出清晰的轮廓。在酷寒逼人的二月之夜里,几个小镇上都悬挂着红灯,人们正忙于庆贺新春的到来,而我们却连住处和食物都没有。在肃州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作难的麻烦事,我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发现翟荫在去海岸的途中在那儿被阻,耽搁了整整十天。而且,也是在那一带地方,每天早上当我们结账时,卑鄙的小店主们唾星乱溅,骂骂咧咧,硬赖王译员欺骗了他们。有时候,当我们决心冒着天亮前的寒冷,不吃早饭就上路时,他们将旅店大门锁住不让我们出去。有几次,他们安排几个泼妇似的女人挡在大门口,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白人绝不会用赶车的马鞭抽打她们的。我没有鞭打她们,但我曾对着她们吼叫,装成一副要抽打她们的样子。我为此感到很内疚。

在肃州,有一次,我正在煮两只野鸡——我将它们小心地保存了必要的四天时间,现在已变得软嫩了。一名镇守使署卫队的小军官带着四个背着来福枪的士兵,连招呼也没打一声,就大摇大摆地闯了起来。我还没有请他坐,他便坐在炕上,开始向我提出一个个要求。对此,我一是太忙,二是不知原委,没去理会。经过一阵蛮横而且不时夹带着侮辱之词的谈话之后,他最后说我偷了一件非常贵重的青铜佛像,要求我马上交出来。幸好我在到达镇上的那天傍晚去了一趟邮局,收到了翟荫从兰州写给我的两封信,得知了他的行期被延误的原因。他说省府长官收到了蒙古边界金塔小镇的一份控告信,说肃州镇守使的弟弟从金塔寺庙的祭台上拿了一尊小铜佛送给了我,要求我予以归还。尽管翟荫说该铜像在我手中,但那些凭自己想当然判断别人的中国人却仍然将翟荫扣留

下来。他们说：“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话呢？如果我们放你走了，我们怎么知道华尔纳先生到来以后，不会说铜像在你手中呢？”大家为翟荫因这样一种联想而受到的侮辱感到惊愕。

不一会儿，我就对那位镇守使的使者蛮横无理的态度感到厌烦，当他拒绝接受我的解释时，我几乎被迫对其施以暴力。赶走了这家伙以后，王译员和我以及老周（那个曾经给我们当赶车人的漫不经心的小家伙已经被替换掉了）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两只野鸡，然后倒头便睡。第二天一大早，赶在镇守使在他的衙署里指控我们之前，我将那尊小佛像装进衣袋，前去拜谒当地那位军官。他宽厚仁慈，一如既往。我对他写给敦煌地方官的那封信表示过谢意后，请他再帮一次忙。我从衣袋中掏出佛像，问他是否愿以个人名义接受它。虽然我知道金塔在追索这尊佛像，但我极不愿意将它交给那个行为举止我看不上眼的镇守使。

这位老绅士看样子十分惊奇。他闻听已久的铜佛竟然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东西！他有些动怒，当然不是对我。结果，像一位真正有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拒绝将我押送到敦煌去。虽然金塔地方和兰州当局曾再三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他那时只答复说：华尔纳先生尚未返经肃州。待他到署拜会时，我将提醒他注意这一事实，让他决定如何处理。毫无疑问，铜佛必须归还。他满怀歉意，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件毫无价值的东西竟然会发生如此之多的麻烦。所有的文职人员甚至连侍卫们都拥进室内，指点评说这尊他们已听说过不少言过其实的故事的铜像，但完全没有责备的意思。军官硬要留我共进午餐，而且不容推脱。很明显，他是想以此弥补翟荫和我受到的非礼待遇。他给我一张已收到铜佛的条据，并给兰州的上司拍发了一份军用电报，报告了已收回铜佛这件事。正吃饭的时候，一个当差进来报告说，镇守使派了一队士兵到外国人居住的那个旅店去，以便保证不让他走掉。军官虽然年事已高，但在这位骑兵首领身上我看到了某种闪光的东西，于是

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够到达他目前的高位。他高高地站在那儿，大声下达了两条命令：

“撤回派去的士兵！”

“镇守使将受到斥责！”

然后他坐下来，带着长者很有感染力的微笑，又继续和我们谈话。谈话相当吃力，大部分是通过王译员的翻译进行的。席间再没有提起铜佛的事。当天下午，他带着队伍，活像一位苏格兰高地的首领，来到我们住的客栈。骑兵和步卒塞满了肮脏的客栈小院，以至于队伍调头都很困难，甚至踩到了马粪堆上。他给我带了几件礼物：一幅藏族绘画，两只大理石茶杯，而且还有一件精制的铜佛像，与我交出的那尊属于同一时期，但略微高一些，制作也更为精细一些。

当晚，那位镇守使前来道歉，自然是被迫而来的。我让人传出话去，说我不在。第二天，我听说金塔县县长从住地急匆匆地赶来，住在邻近的一个小店里。我立刻去找他，向他表示歉意，因为我无意中给他招惹了许多麻烦。他说这没有什么，我渐渐地从谈话中得知，他所在县的农民都十分憎恨他，因为他是满族，一个外来人。他们发现他将辞职而另有高就时，便旧事重提，控告他曾允许一大批珍宝从金塔寺中运走。村民们强行将他们的父母官羁留了两周多，直到我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为止，这确实是中国专制制度下的一件咄咄怪事。这些村民要他拿出八千块银元，赎回他因那尊小铜佛而失去的自由。而那尊小铜佛在北京古董市场上那些盗贼开的店铺里，也许充其量只卖五美元。互致问候并道过歉意后，我们告别了，并希望友谊长存。

十二天后，我到达了中国内地传教团驻地凉州。仁慈的伯切尔(Belcher)夫妇坚持要我住下来休息两天，调养马匹，整顿行李。躲避开高原的风寒，沐浴在舒适的热水中，享用着丰富的食物，还有那价格不菲的精美物品，这一切虽然使我汗颜，但却是一次永生

难忘的经历。况且,这儿又何止是物质的精美而已!不过十分钟左右,我就感到了基督主耶稣的存在,而且几乎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在一天中的每时每刻,一旦要制作果酱,或烹饪可口的饭菜,就会有祈祷、歌唱和感恩。奋斗的艰难岁月已开始在那位纤弱的女主人身上留下了印迹,但她仍然会在日出前的那段难耐的时光里,带着《新旧约全书》和胃唧筒,到某个贫苦人家的少妇床边去,因为那少妇吞服了当时还很便宜的过量鸦片,试图求得永远的安静。牧师和他的夫人都没有经过辨认药物的训练,但在那样落后的社区里在这方面已经有足够的实践。他们的药房里有药物和外科器械,紧急情况使他们有胆量使用这些东西。牧师不能护理病妇,这就该他的妻子目睹她们遭罪、病亡,而且,极其偶然地,带给他们那种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不得而知、难以理解的安宁。这些对伯切尔夫妇一类人的生活来说,是一种日常的事件,当然的行为。但对一个心中拥有虑无不周、修养良好的上帝——提到他都是一非礼的波士顿一位论派(Boston Unitarian)的教徒来说,突然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幽灵,它迫使你不得不时时赞美它、关注它。这就远不是一次什么有趣的经历了。横渡太平洋时,在轮船上的吸烟室里,我曾听到中国老船员们对此提出了异议。但那些老船员们对自己所说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凉州这个大镇子里同伯切尔夫妇接触哪怕只有三天的时间,不可能耳闻目睹那里的一些事实。中国布道团不向别人只向上帝要钱。上帝俯视和倾听他们的祈求,使他们如愿以偿,得到钱物、药品和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的新成员。常常,当急需一小笔钱时,上帝会毫不犹豫地如数支付给他们,以便让他们懂得必须依赖于它,而对明天无所忧虑。最值得称道的是,上帝在极小一部分中国人的心里赐予了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我们无法用其他言词来形容,只能用今天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似乎已成行话的熟悉短语来表述——上帝的仁慈。立刻,他们从乖戾多疑、同类相残的动物变成了既依赖

别人而自身又值得信赖的男男女女。他们似乎并非出生于中国本土,似乎不再会为一个陌生人的不幸而幸灾乐祸。无须用什么动听的或稍新鲜的言语来形容他们了。总之,这些有了宗教经历的皈依者变成了人。他们偶尔也会犯错误,有时会把抽烟和跳舞与他们躲避的魔鬼混为一谈,有时在强烈的诱惑下他们甚至会再次滑向罪恶的深渊。这给魔鬼提供了机会,魔鬼就会急急窜入横渡太平洋的班轮上的吸烟室里,将这一消息告诉那些中国老船员。他们已经在外国租界里生活了三十年,凭着常常会令人怀疑的手段,从中国人身上获取财富。这样,“好”消息就会不胫而走。美国天真的少女就会告诉另一个人说,中国应当被“允许”去弘扬他们古老的文明,去实践他们那比我们优越的伟大古老的哲学。我不否认中国可能有哲学家——这样说是因为我还没有遇到一位,但中国古老的文明已经消亡了,而且在中国难得发现这一文明的真正内涵,而这一点是对文明的最重要的检验。

我离开这儿的时候,带上了果酱、鲜面包,还有放好了调料的碎肉,它可以使煮得半熟的中国面食易于下咽。伯切尔夫妇还向上帝告诉了我的行进路线,并特别地提到那些最需要上帝保护以防土匪抢劫的地点。

天气虽然很冷,但从凉州出发的一周内,旅途却很平安。出发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一个河谷。这儿似乎没有马车能够通过,我们看到了不止一个遇难车队。这些车夫通常都是结伴同行。途中如果有一辆车出了事故,一长串骡马便挤在一起,从泥中拖曳翻倒的马车,或从因冰层破裂而搁浅的水中将车拉出来。乱山夹峙,砾石满道。时值二月,天气阴郁、寒气逼人,我们都冻得有些麻木了。尽管如此,途经能看到长城断垣残壁的时候,我们的兴致仍然丝毫没有减少。长城在许多地方都断裂了,有的地方形状尚完好,有的地方已剥蚀成一座土丘。但我仍然喜欢沿着城墙,有时小心翼翼地 在墙顶上行走,有时还会攀登到烽火台的废墟顶上去。我们又

一次迷路了。正当我们决定稍晚一些露宿一夜的时候,远处的犬吠声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力量。我们蹒跚来到一座孤零零的农舍里,挤宿在一张冰冷的土炕上。屋外狂风怒号,彻夜未停。

进入兰州,又见故友。那儿有两位香烟贩运的先驱者和布道团,而且还结识了新任的省邮政长官。我们与这位长官一起进了餐,这是最令我满意的一次。在外国朋友中,还有安特生博士。他是一位博学的瑞典人,时任中国地质考察队队长。他很舒适地居住在一座大宅院里,那是他的冬季用房。一会儿,我们便就一些专业话题深谈起来。我一边啜饮着他的杜松子酒,一边鉴赏他那些不寻常的考古发掘品。他慷慨地向我解释着,说这些全是他上个季度发掘到的。大约两年前,他在一个地区搜寻灭绝动物的骨骸时,发现了营火和小棚屋遗迹。循着一连串的遗迹,他得到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中国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是绝对陌生的。它们与地中海的某些早期文明以及帕派利教授(Pumpelly)在中亚地区发现的文明有相似之处。这使人一下子联想到一个结论:史前中国在最后阶段曾同近东,也因而同欧洲联系在一起。这太绝妙了!我不想就此离他而去。我花了整整四天时间,聆听他介绍他的发现,参观尚未打包的样品。我倾听着教授的谈话,仿佛久渴的人啜饮甘露一样。他以真正的科学的大度,反复探讨我提出的问题。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毕业的袁先生(Mr Yun)^①给我讲述了有关他们发现的一些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好久以来,我一直渴盼着新的精神食粮,而当这“盛宴”结束的时候,我担心我会感到害怕的。人类使大陆之间变得很近,而这儿也许是人类生命历程上一个新的连接点。我沿着古老的贸易通道追寻的,只是这样一些文化财富:它们或者在中世纪具有影响力,或者

① 袁先生即袁复礼,河北人,清华大学毕业,曾留学美国,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地质学专家。20年代初曾来甘肃进行过地质勘探考察。

属于已经湮灭了文明，或者是同西方有密切联系，但我在这儿耳闻目睹的东西，已使这条通道比我敢于想像的还要古老若干千年。这儿成为我在独自去北京的一个月艰难路途上思考无尽的地方。在家中时，胜友如云，群书乱眼。这虽然也能给人以博大的思想，但我对中国这条通道的知识是极其贫乏的，以至于会为一种进入我的认识范围内的全新思想而感到欣喜。一个人必须具有博览群书、深思熟虑的背景才敢于独自数月取路野径。北极探险家们曾告诉我，他们的船上有车床、锻工和木工工具，而且还留下许多设备在路途中制造。这样，在途中就有了一个男子汉所懂得的那种令人愉悦的充实，使他忙于活计，让轻松的思想填充痛苦的脑海里的空虚。幸运的是，在家中我有喜欢胡思乱想、注意力易于分散的毛病，这种毛病在这寂寞孤独的地方却派上了用场。

喜气洋洋的安特生和他的助手袁先生骑在他们的蒙古小矮马上送我们上了路。我们告别时，给他们照了像，背景上是插在我们马车上的仿制的六星美国旗。他委托我从美国给他寄一些科学类书籍和专业性论文，并特别谦恭地许诺要给哈佛大学的恐龙博物馆赠送一些他们发掘得到的非常珍贵的物品。

雪断断续续地下了七天，天气非常寒冷。疾风常常掠过高原，掠过我们艰难行进的隘口。第八天凌晨三点，我们在黑暗中动了身，以便能翻越又一次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六盘山——山道盘旋六次的山隘。虽然脚下的积雪仅厚六英寸左右，但它覆盖在冰凉的地面上，而且一开始山坡的陡度就足以令我们的马匹心惊胆战。在好几个地方，我们不得不卸下临时雇用的小马车上套的骡子，去帮助拉大车，然后再驱赶我们所有的七匹牲口下山去拉小马车。到中午时，我们还没有爬完一半上山的路。这时遇到官方的三辆大邮车，每辆车上驾着十匹骡子，绝望地搁置在下山的路上。当我们走近时，眼前人声嘈杂，鞭响劈啪，三十匹骡子和二十个人一片喧闹。我无法想像我们怎样才能通过这儿。在迷人眼目的暴风雪

中,经过大约三个小时叫喊,车卸了又驾,驾了又卸,我们终于从此处通过了。在半山腰,当一阵强烈的风雪袭来时,我们只能两手抱头,静候风雪停下来。我们的一边是向后移去的悬崖,另一边是巍然高耸的峭壁,道路就是在这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在狂风中,虽然脚下悬崖一侧的树木顶尖依稀可见,但谁也说不准再下边可能就是无底的深谷。山顶上有几百码长的一段平坦路面,此外一直到半山腰都是急弯路。平稳行驶的马车想必到那儿就会窜入沟底的。马车后面跟的人和挽绳都毫无用处,因为凉冻的地面上疏松地覆盖着一层白雪,我们根本无法站住脚。我们卸掉其它牲口,只留下一匹白色的富有经验的老骡马。它半蹲在地上,前腿蹦得直直的,两耳前竖,向下滑行。我们两人在车两旁滑行着,手里拿着木墩,准备万一马车下滑太快或者骡马前腿支持不住时,用木墩支在车轮前面。急弯处自然是不会有挡墙的,我们时刻提心吊胆的是马车和我们整个队伍会在一个急转弯处直滑下去,坠入沟底。我亲眼看到一对骡子就这样惨烈地半蹲着,蜿蜒滑行,最后在一个急弯处掉落下去。我急忙赶过去,看见它们卡在下面的灌木丛中,好在没怎么受伤。我不知道它们怎样才能被拖到路面上来。

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小寺庙中,忽必烈汗(Kublai Khan)^①就是在这里逝世的。我们因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停顿了一下。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的两匹骡子驮着挽具走在马车前边,到这儿后我们发现少了一副挽具。我们第二辆车的赶车人非常恼火,但寺庙的僧人和躲在庙内的六个车夫却对他哂笑不已。我进到庙内四处寻找,没有找到。这匹骡子驾的车是临时雇来的。我发现,发生这

^① 华尔纳在归途中经过六盘山与去敦煌时经过六盘山是同一地点,在本书第五章中他曾叙述过此处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去世的地方,这里又出现了是忽必烈汗(Kublai Khan)去世的文字,有误。似应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去世于六盘山的说法与民间传说相符。

类事情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很容易将它处理好。因此,我们决定继续上路,告诉这个车夫让他第二天一早到山下的客栈找我们。他不可能偷马车上装的东西,而且我断定,他一定会下山来找我们要佣费,绝不会再翻越六盘山回去的。

这一天我们共行走了十四小时,才到达山脚下的一个客栈里。我们四个人和七匹牲口几乎都有点跛了。也许一天中没有出现过所有骡马在同一瞬间一起倒地的时刻,但回顾这段路程,似乎我们所有的人和牲口无时无刻不在爬行前进。我的胡须上面结了冰,成了一根冰棍。从昨晚到现在一点东西没吃。但在客栈里,牲口有豆子和草料,我们也有半熟的面食可以充饥,炕上还铺有比较干净的炕席。面条端来后,尽管我饥饿难耐,但仍觉肮脏不堪,难以入口,便用兰州那位烟草商临别时送给我的美国饼干就着热开水充饥了事,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王译员找来一些鸡蛋,我们每人炒了十个,里边加了洋葱片,而且还用伯切尔夫妇送给我们的外国茶叶沏了热气腾腾的茶水。那辆骡马车自然还没有来,后来我派人上山将它带了回来。回来时,挽具没有找到,骡子也没有饲养。这又使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十点半才动身出发。我们走出客栈院子时,十天中从未露面的太阳出来了,但到中午,天上又阴云密布。我知道今晚又不会有月亮了。路上非常艰险,冰冻的地面上厚厚覆盖着半融的雪泥。我们在天黑前停了下来,仅仅走了十英里路,而本来我们打算走二十英里。

两天以后,我们又来到了象洞,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拍摄了另外一张我认为可能有用的照片。在这儿,我发现了在我前面的翟荫的踪迹。他在这儿垒起一个小石柱放置照相机,在那刨开近代所修的砖墙察看后面的雕塑。他离开这儿已有整整五个星期,而我们首次到象洞距现在已有六个多月了。

从象洞到西安有较长的七天路程,大部分路途泥淖遍地,寒冷袭人。我们有时长时间地拽拉陷人淤泥的车轮,有时要胆战心惊

地通过浅水处吱嘎作响的薄冰。沿途所见旅客的情况比我们还要糟糕。邮车在筋疲力尽的牲口拖拉下缓慢行进,几辆马车陷入淤泥中,但我们不敢用我们的骡子和更为宝贵的小矮马去帮助他们。翻越泾州山用了八个小时。那天十三小时半的时间里只走了九英里路。令人欣慰的是,当我们在附近有两间小屋的路边小店时,买到了牲口的草料。我们蜷缩在草垛旁边的车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到达陕西省边界之前的一天,我们是在与干燥的大风进行搏斗中度过的。道路两边是左宗棠将军在讨伐穆斯林之后所栽植的树木。狂风怒号,像要把这两排树吹倒似的。到省界时,太阳出来了,风势也减少了许多。第二天,我们在渭河岸上蜿蜒行进。河谷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壮美。岸崖上的道路是潮湿黏滑的,但路面上的积雪都被风吹干了。沿岸的小山虽然陡峭,但不很高。我们下面,像地图一样铺展开的是梨树和枣树园。去年秋天我们经过这儿时,树上结满了果实,但现在它们光裸着,单薄的身影映衬着灰黄色的土地。

已经是到达西安前的最后一站了。我伫立在客店门口,看见有人牵着配有外国马鞍的马匹从村子街道上走过。牵马的人告诉我,有几个外国人就住在另一个客店里。我急忙穿过街道,去看望我的老朋友——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毕安琪(Carl Bishop)。我头戴毛皮便帽,穿一条又肥又大的羊皮裤,像一个中国车夫一样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最初对我的问候并不是像我对他的那样热情,而流露出他最初一刹那的惊奇。他的这支考察队由三个美国人和两个中国科学家组成。他们邀请我一道于次日去考察唐太宗墓和西安旷野里的其他古迹。我愿意接受这一邀请,但我必须与他们进行一次长谈来求得自我满足,而且我表示希望到达北京后同他们再次见面。

虽然我急切地想早日到达北京,得到家中寄来的邮件,但是在出发去铁路终端之前,我必须把车轴弄短,而且要雇用一个新马

车的车夫，来代替我们在路上雇用过的那辆小马车，因此，不得不在西安逗留三天。这使我有时间再去古董店，为福格博物馆购买一批早期石碑和石刻的最新拓本。

在去铁路终端的五天和火车上及车站上候车的两天中，我已记不清有什么事曾使我感兴趣。因为我的思想已飞到前方我们的目的地去了。我确实知道乡野已披上了一层柔曼的轻纱，冬麦已有六英寸高了。在我们到达车站前一两天，与一伙无人统领的土匪意外遭遇，而且，军队强制性地给我们派了持枪护卫人员。七个月之前，我们走过的那几条深陷的道路又要非经过不可了。它们似乎是如此之深，如此之险，如此没有尽头。前进的步履是如此的缓慢，而且似乎越来越慢。但土匪问题不再困扰我了。我用我自己认为最符合逻辑的方式进行推理：既然我在旅途上如此之久没有遭到劫难，那么在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恐怕不会有路人存心来阻挠我了。因为，即使有人劫道，我们也束手无策。因为我已经卖掉了那枝滑膛枪。至于跟随我的那十个士兵，毫无疑问，只要有人从我们在其下缓慢行进的悬崖上开第一枪，他们就会像兔子一样逃之夭夭。

列车缓缓驶进了街道纵横的都城北京，我精神上的疲惫立刻消失了。那堆不成样子、脏污不堪的羊毛被褥已经为我效力了一个来回，此刻，当想到一会儿就有亚麻被单供我享用的时候，我不再对它们产生厌恶之情了。那件褐黄色衬衫和外缀着蓝色粗布的羊毛裤可以再坚持穿一阵儿，等我洗完澡，洒上香水擦上油，将粗糙的脖颈极不适应地套进洁净无瑕、刚上过浆如枷锁般的衣领里，并且披上我们同一阶层的人所披的那种绸边呢绒服时，再将它们扔掉。

一辆大小可观的手推车上放着一口斧劈刀砍、粗制滥造的矩形大木箱，箱子周围塞满了油腻脏污的黄麻袋，箱子里边装着我的宝中之宝——那尊跪姿塑像。他双手合十，仿佛是在永恒地祈祷。

他那褶皱分明、线条柔和的长袍上还有公元8世纪留下的金、紫、蓝、银等斑斓色彩。我坐在一辆胶轮黄包车上，跟随在行李车后面。这是一个春日的黄昏，当我们大摇大摆地沿法院街(Legation Street)行进的时候，正赶上全权公使们带着他们的太太，坐着平稳行驶的小轿车从警卫森严的大门口出来，去同其他显要人物一起就餐，在那儿非正式地商谈公务，纵情地跳舞、玩牌和打麻将。

脚蹬漆皮皮鞋，双手插在皮大衣口袋里，臂弯上随意地悬挂着一根手杖，极尽一个普通人和外交官的闲情逸致在那里散步——这就是我们的公使馆一等秘书爱德华·贝尔^①。正当他用琥珀烟嘴抽饭前的一支香烟时，他的一位朋友经过他的身旁。但当这位头戴皮帽、衣衫褴褛的朋友从黄包车上向他大声招呼时，他却急匆匆地汇入人流熙攘的街道中间，去和那边一个外国人握手。他决不会想到当他衣着华美、皮领高耸地站在那儿的时候，险些被他的这个乞丐般的朋友拥抱。

第二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我们一起为第二次考察和为哈佛大学将来在中国的工作进行筹划。他和我一样，急切地要我们大学参与解开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秘密。在他向我表示良好祝愿之前，他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差不多就是说，他也要到中国西部去。在那以后，传来不幸的消息说，他确实去了“西部”，但这却是在大战期间士兵们常说的那个“西方”——我们最稳健能干的年轻外交官，急欲报效他的祖国和他的母校，却在中道早逝了。当哈佛考察团再次步入这一领域时，我们只能寻求其他人的帮助了。我觉得，在那天下午，他向我显示的，不仅是他的热情和睿智，而且是我在八个月艰难旅程中所缺少的那一切的标志和象征。

他是回忆，是痛苦，是希冀，

^① 爱德华·贝尔(Edward Bell 1882~1924年)，汉名贝乐。1922年来华，任美国使馆参议，曾代办馆务。

他是身着夜礼服一去永不返的所有。

然而,在我前面的手推车里,有那尊双手合十,身穿虽有点褪色但仍然五彩缤纷的长袍的珍贵小泥佛,还有公元8世纪的虔诚画师手绘的壁画断片。而且,越过我朋友的肩头,在朦胧的远方,我可以看见那些古老的殿堂。在那儿,年代更为久远的可爱佛像正在慢慢地消隐于永恒的过去之中。

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

兰登·华尔纳

一、中国边界

从古至今，富饶的黄河峡谷及其流域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中心。中亚、印度和中国的商贩及朝圣者们带着马匹、玉器、丝绸以及印度佛教所赐予的巨大文明激励，来往于这条通道上。到公元8世纪时，这条贸易通道已历时有年，出现了由官方供应的交通驿站。这些都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事实。

在当时，这条路线和沿途所设的驿站对这些中国人来说，只不过是给骑兵增补马匹或为长城戍军换防提供了交通要道，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成为丝绸出口的途径。但在佛教为宫廷和许多知识界人士所信奉的那个年代里，也有许多人把这条行程约为两年的道路上的每一站都视为离圣地逐渐接近的里程碑。

在这条由来已久的商业通道上，许多营地和水井渐渐变成了集市。当地居民在这儿买卖马匹或为行旅商贩供应羊只。史料有这样的记载：在这条道路上，每年秋天都要举行一次补给活动。因为在这个时节，打算外出的人们要为在沙漠上和峡谷中越冬准备好驼毛和羊皮。

朝圣者死于途中，其坟墓就成为后来朝圣者的祭祀地。在这些地点，有人会购买死者的遗物。假如出售者碰巧是一位印度人，

而且他具有佛陀曾经走过的圣地的知识,虔诚的中国人就会不仅购买他的货物,而且会拜倒在他的脚下。从他这儿,过往客商可以探听有关前面道路、水源和饮料等方面的情况,也会有人停下来,学习阅读佛经,在师傅的带领下唱圣歌,做祈祷,学习正确地理解轮回的法则或者向菩萨虔诚地礼献他们的贡物。这些中国人中,有的患有高山病,有的惧怕路途上可能会遇到的尘暴。这位在众人心目中无所不知的人给他的那些信徒们画了制服疾病和尘暴的咒符。他们小心地藏藏在长衫里,以备路途上使用。有些行商在这样的地方往往一次停留数月之久,等候从祭祀地主人那里抄录一部经书。这样的人群聚集地渐渐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等到修建了庙宇,住进了手持经卷、身着袈裟的僧人时,这些活动点便自行消失了。最初是只有帐篷的活动点,然后是拥有农场、客店和祭祀场所的季节性市场,再后便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学校。许多怯懦的旅客乐于驻足此地,不再远行。他们发现,这儿有足够的地方贸易,也有丰富的佛教活动,因而感到心满意足。

今天,当一个人穿越黄土乡野和沙洲漠地的时候,也许会清楚地知道那条古道就在自己的脚下,而且可以判断现在的有些村庄可能曾是古代村落的遗址,但在流沙掩埋中已看不到明显的证据了。然而,宗教创立者的建树比起房产主和客店老板来要永久得多。因此,即便在那些贫困荒凉的偏僻小村,纵然住房和畜棚仍然采用早就难得看到的土坯、篱笆搭建,但庙宇却清一色是用石料建造的。

中国西北之旅的最后一个绿洲是敦煌,这儿有“千佛洞”,意即拥有一千尊佛像的洞窟。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和保罗·伯希和教授曾造访过这座洞窟,并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其他一些学者也曾先后到这个中世纪书籍和绘画都非常丰富的“书库”进行过多次搜寻,因此,这座洞窟寺庙早已闻名于西方。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那么最迟在公元6世纪晚期,这片绿洲便已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宗教特征来。除了商业站点、旅店、驻军总部、农场兼饲养着成群羊、骆

驼、马的养殖场外,还有一个逐步壮大的僧侣团体及其居住和从事宗教活动的六个石窟寺。在石窟寺中,僧侣们生活并进行一些佛事活动。甚至在更早些时候,这些庙宇毫无疑问地已显示出更多的文化迹象,而非驻军首领或地方长官的居住地。洞壁装潢得很美,上面有肖像、绘画等,僧人做法用的钟磬、经书、蜡烛等必需器物也应有尽有,而且渐渐地正在形成一个规模可观的藏经室。到公元8世纪时,宗教团体的发展似乎已经大大超过了距这儿大约三小时路程、沿河居住的俗民。镇子周围土地肥沃,可以灌溉,因而农场很多,而且还有条宏伟的西北要道由此通过。城镇和寺庙互相联系,当然,它们也是互相独立的。农场溯流延伸,直到远山脚下。农产品有棉花、高粱、小麦、蔬菜等,还有少量葡萄。饲养的牲畜有绵羊、山羊、小矮马等,骆驼则在附近的平川地带养殖。如果说木材一直比较紧缺的话,那么至少有足够的白杨和沙枣树可以为人们提供建造土坯住房的木制框架,也可以为行旅之人提供备用车轴和帐篷支柱。木炭非常昂贵,但生火用的牲畜粪便却俯拾皆是。在春秋季节的暴雨之后,可以在淤泥里发现少量沙金,但它能否维持为数不多的淘金者的生计,这还是个问题。

在精神食粮方面,至少到公元8世纪,这片绿洲一直依赖于运输业。来自首都的消息和寺庙偶尔收到的珍贵书籍包裹都是由从东方而来或由西方返回的中国商人或朝圣者带来的。这些返回者大都携带一些印度财宝——珍奇的丝棉织品、一幅佛画或一尊青铜小佛像,或者用一种或多种西方语言写成的经文,这些物品对虔诚的信教者来说具有特殊的效用。到了公元9世纪,寺庙里就形成了一个丰富、重要的藏书室,在数星期路程的地域范围内,它都是无与伦比的,也许只有在距此约数星期路程、位于西北方向的吐鲁番,才会发现数量可与此相匹敌的书卷,但它们却分散在沿沙漠河流分布的六个绿洲的小寺庙中。

在具有驿站和其他旅行设施的西北之路成为重要通衢之前,

敦煌附近的几个绿洲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佛教场所。在西千佛洞,我们参观了一个这样的场所。但在那里,那些公元6世纪的雕塑与墙壁一样,已被重新绘制或塑造过,一切都被修复得面目全非。我们只在远处一个小洞窟上端角落里发现了两平方英尺原始壁画,它侥幸地逃脱了自公元6世纪以来热心的修复者用白灰进行粉刷的厄运。然而,在敦煌周围三天路程以内的区域中,唐以前其他佛教寺庙的偶尔可见的遗物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上的证据,那就是,在两个世纪之后,边远地区的宗教社团已经很普遍了。虽然只有那些在坚固的岩石上的洞窟保留了下来,但是可以推测,在这条道路沿线,那些满目都是土坯房屋的村庄里,一般都建有神庙。

有不少事实可以证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西部边境上的所有小型宗教团体都从属于同一位僧界首领,他驻锡于敦煌,主管的教区幅员广袤但人口稀少。显然,不论在收益和寺规上的习俗怎么样,边远地带的寺院和庙堂在精神和知识上必须依赖于敦煌以及那儿藏有梵文和中亚原文及其中译本的书库。假如有人能经常置身在经过此地的商队中,他就有许多机会来往于这些寺庙之间。很有可能,不仅僧侣们平常互相串访,而且在塑造佛像和绘饰墙壁的时候,还要从较大的宗教团体借调一些工匠。不用说,一个只有五六十口成年人的小村庄是供养不起那些才华横溢的画师和雕塑匠的,正是他们,创造出了供我们欣赏的上乘作品。

上面介绍了敦煌这一重要绿洲、军队驻防、长城戍兵的供给、兴盛活跃、存在已久的佛教寺庙等的有关情况。这些都是已知的确切事情。掌握了这些情况,再加上时时参考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关于敦煌的那些无价珍文^①以及伯希和教授出版的那些照片集^②,我们就能够

^① 斯坦因著《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第2卷,第791~1088页;第3卷,第1390~1431页,牛津,1921年出版。

^② 伯希和著《敦煌石窟图录》,巴黎,1914~1924年出版。

对这些离敦煌仅有三天路程的极不起眼的洞窟中的壁画进行研究,从而得到有益的和进一步的理解。实际上,只有站在大都市的角度上,我们才能鉴赏万佛峡(即无数佛像的洞窟)的杰作。我们掌握的最重要的二手材料,包括那些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内,都从属于敦煌。因而,很明显,我将这些材料加以扩展并应用到万佛峡的研究上是完全正当的。

二、造窟目的

从现今通往新疆的道路往南到万佛峡石窟约需一天的行程,而从边界往东大约需要六天的行程。石窟位置远离主要通道,也许是因为近处没有岩石可以利用,也可能在当时道路是从那儿经过的。总体来讲,在溪流分割开的陡峭山谷两侧低矮的岩壁上,排列着大约三十个洞窟。那儿曾经有过客店、农场和集市,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在离山崖边缘不远处,在几英亩长得很一般的庄稼的包围之中,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庙宇。南面山上有溪水潺潺流下,在山脚下汇聚成洼,冬天则冻结成冰,渗入土地。甚至在雪消融汇入小河之前,就开始催生百草。

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在西北之路上或其近旁,有一个三四十个僧人组成的小群体,他们安居乐业、耕种养殖,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当然,另外还断断续续的有旅行者向他们提供其他一些货物。那些货物并非生活必需品,而只是一些路过的士兵、旅人和买卖人的身外余物,他们用这些东西与僧人交换羊皮、蔬菜、毛毡、棉花、葡萄干和佛教吉祥物等。

对于这些距敦煌大型石窟最多有三天路程的万佛峡小型洞窟,可以根据我们掌握的有关敦煌石窟的知识来进行研究。假设这个佛教群体属于敦煌教区,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绘制这些壁画的艺人是从敦煌借来的,他们携带工具,移居此间,直到完成这些壁画。

因此,让我们先看看大一点的洞窟,它们已经得到中国和欧洲学者们仔细的研究。当时,虽然描摹佛画、抄写经文和书画圣符是僧众训练内容的一部分,但他们在丝绢和纸张上的作品却没有显示出多少艺术技巧。诚然,正如欧洲一些批评家特意指出的那样,那些他们称之为“敦煌学校”的产品,乡土气息浓郁,制作粗陋,只是作为考古的遗物才具有重要价值,包括那些需要准确地确定其制作年代的样品在内。这些作品之所以粗糙不堪,是因为洞址距离中国文化中心太遥远,而且,它们的制作者大都是一些民间画工。^①

但是,与已经流传到欧洲的那些比较粗糙的绢画、卷轴和纸画相比,对这些灿烂的壁画说些什么呢?如果说只有题材和颜料是相同的,那么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相似之处了。通过研究之后,我

^① 魏礼(Arthur Waley)在他所著《斯坦因发现的敦煌绘画目录》一书中曾谈及绢纸绘画:“这些绘画作品的实际制作质量没有超过艺术工匠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公元7世纪左右的原作的摹画或复制。尽管如此,即使在最不合格的复制品中,那些使佛教画像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抽象的独具手法仍然被保留下来。这种手法在很大程度上遵从一个原则:由现实主义手法(诸如阴影、高光、轮廓线等等)向无意蕴图解形式的转化。这种过程起初出现于雕刻。在犍陀罗艺术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希腊神话中海上仙女紧身衣服的褶皱变成习俗所常见的形式,这种变化除了纯粹雕塑意义之外更无其他含义。敦煌绘画上用来分割画表平面的曲线很清楚地表明它是源于雕塑的。”“在收集到的几乎每一幅画中,都运用了一种表现手法,它创造了一种从并非狭义的欧式观点看而是从广义上看的空间印象。这种手法现在已经无法实现这种功能,它被列为表达抽象的、超自然的特点的手法之一。这种表达对象正是佛教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序言,第4~5页)这种情形尤其适宜于对丝绢、麻布和纸张绘画的描述,它不适用于敦煌或万佛峡壁画,而对后者我尚无描述的意图。同时有必要指出,从现实主义手法向无意蕴图解形式的转化,可以想见是一种实际使用方法的反转。在艺术中,形式主义通常是预备阶段。当形式主义的火花熄灭,艺术家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内涵实质投向表面形象时;当使用稚童和粗陋莽夫拘泥形式的绘画进行插图解释时,接踵而来的就是现实主义。关于敦煌绘画中分割平面的曲线非常明显地表示它是源自雕刻的论述,必须从对下述问题的回答中得到印证:那就是,从总体上看,在凿子得到使用前,犍陀罗和早期中国雕刻是怎样明显地与画在岩石上的线条同出一源,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有某种继承关系的。更进一步地,人们应当认识到,中国毛笔作为一种绘画工具是怎样地适宜绘制那些与此相同的曲线,而凿子的特点是首先刻制槽角,其次是刻制方形物体。若欲使雕刻品更趋近于现实主义,那就必须对其进行精细的琢饰。雕刻品坚固结实,决无损坏之虞。(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第56~104幅)

们就会得出结论：墙壁装饰是由与前述绘画工匠全然不同的一组艺人进行的，这些艺人是专业化的工匠。要形象表现佛教中的各种形象，需要能够通过传统的特征立即将它辨认出来，而他们敏锐的技能已远远超出了这一需要。他们是表达高难主题的全能者，甚至达到了迫使我们不得不欣赏那些我们并不熟悉的佛教形象的程度。很少有欧洲人或中国的专家看到过那些墙壁。没有看见过的人自然会误以为这些壁画就是从这儿带去的那些纸上或麻布上的绘画的放大品。我听说伯希和教授的底片极其美妙，但在复制时却受到损伤，因为他的学生们缺乏有关这些壁画的色度关系、颜料纯度或调配范围等的知识。^① 甚至连那些很清晰的图案在印刷时也被弄得脏污不堪，使很精美的作品变得朦胧依稀，难以复制。

另一方面，斯坦因爵士的复制品^② 却很清晰，虽然它们是精心挑选出来显示这个地方极其宝贵的考古价值的，但也刺激了从事艺术的学生们的求知欲。进入那些洞窟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与只翻翻书页的学生们的经历是完全迥异的。色彩的艳丽、造型的优雅、喧嚷天国和壮丽或者是那寥廓空远的神韵都袭人而来，与之俱来的是辉煌和力量……只有基督教徒进入欧洲大教堂去礼拜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力量可与之相比。

不一会儿，你就会认识到，在敦煌藏经洞藏了上千年的那些拘谨的佛教装饰绘画和纸质艺术品^③ 是不同的一帮人的产物，他们接受过不同的训练，为了不同的目的工作，那些宗教插图作者们数十上百地作画只是为那些只能想像某些抽象神佛名字和职司的大众信仰者们可以迅速辨认出这些神佛来而作画。他们充其量只是礼拜仪式的一种工具而已。

①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②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第200~236幅。

③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第56~104幅。

任何一个熟悉绘画技巧的人会立刻发现,这些壁画是由一些为了这一目的而耗费生命、完善自我的职业艺术家完成的。他们以画笔和颜料为伴侣,以表达伟大的佛教思想为职业。在这些伟大作品中会发现有一些细微差别,说明它们要么是接受过同一种传统训练的不同作家的作品,要么就是经过了后起高秀的改动。

这些壁画的目的在于绘制一些用来唤起和激发宗教本能的圣像。如果说这一表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工匠及其供养人是怎样对这些圣像进行设计的,而且还有,在那些洞窟中跪倒在地的朝拜者们是怎样想的。订制壁画的供养人将它看成一项虔诚的事情,这将使他在天国复活。当然,他被告知他和他的家庭的名字连同他的希望将被镌刻在墙壁上。但这种臆想的、希奇古怪的基督教观点在说明东方和西方宗教绘画的主要目的时是没有权威性的。佛教思想和仪式(比基督徒更多的仪式和思想)常是与抽象性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人的头脑中必须存在一些象征符号,它要描述不可思议的神,其难以想像的属性,因而就有了十字架和佛教的莲花。

但是这种符号根本没有偶像崇拜的含义。因为从定义上讲,偶像崇拜是对一种相对固定的实体形象的礼拜,而不是对其所代表的抽象观念的理解。这种标志常常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们愚昧地用来处理那些他们不熟悉的符号。实际上,他们并不意味着偶像崇拜,而是对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上帝的崇拜。直接的偶像崇拜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普通,这一点,从挥汗如雨,雕琢顽石而为神佛的不信教的艺人的观点中就可以看出来。他雕刻神像的石块也许不久就被赋予了神圣的象征意义,使他那双褻渎神灵的双手不敢再去抚摸。但是,无论艺人还是旁观他们每日辛勤劳作的邻居,从来都不会误以为那块石头就是理论上的神。

所以,这些壁画中具有人形的画像正如法轮和莲花一样,仅是

某种表征而已。虽然它们决不会被想像为具有生物功能,但会立即被公认为表达了某种抽象观念。诚然,非人形象,比如梵文字母表中的字母也很普通地被成功地用来标示同样的神佛。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发现在中世纪早期的中国,形式元素和自然形体(或人类形象)两者的适用程度,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但即使只是提出这一问题,对我们的研究也是有帮助的。因为由此立刻就会看出,中国艺人感觉到了对形式和抽象元素进行保存的必要性,而且与此同时,也表明他们完全有能力最令人信服地复制自然形体。当目的和主题改变了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中国艺人会审慎地由强调形式转向强调自然,而后再倒转过来。我们有理由假定,他强调形式抑或强调自然,是由他对所处年代的时尚的敏感来支配的,而绝对不可能是出于偶然行为。

那些较大型的作品立刻被信徒们奉为曼荼罗(mandala)或变相,他们是排列有序的众神,象征着抽象意义上的天国。在这里,所使用的几乎就是人体形象,只不过所有的形象无不具有庄严的姿态、神圣的表情、身着法衣、高踞宝座、佩戴璎珞,其所表达出来的意义,除了刻板以外,更无别的。比如我们如果想甄别这些形象的性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在东方净土变的左右两侧是直立的长条画面,画上有一些小小的人像,是对佛经中奇异故事的图解。在这里,所使用的,不是抽象标志,而是身着我们熟悉的公元8~10世纪中国服饰的人体形象。将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注解清楚所必需的一切在这里都具备了。韦提希(Vaidehi)王后必须身着女服,而频毗娑罗(Bimbisāra)国王必须穿上男装。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和人类别无二致:骑马、舞剑、探访狱囚、礼拜神佛,应当注意到,当没有这些特征化的需要时,艺术家就是形式主义者而非自然主义者。他用简约的笔法,画一袭长裙,两只长袖和一对高挽的发髻,便毕露无遗地突出了女性特征。对于男性也采用类似的速写手法,一律画得

健壮伟岸,像一尊宝塔,像一匹骏马。我们几乎可以精确地区分出,在哪一个阶段,需要区分人物特性;在哪个阶段,需要控制形式要素。

从一般形式向特殊形式的第三步转化可以在对面的墙壁上进行研究。这儿是一群栩栩如生的比丘尼和比丘众。他们并没有被截然地隔离在天堂,而是在高踞宝座的神像膝下叨沾恩光。不过,这些芸芸众生的形象与神圣佛像的大小一望而知是相当悬殊的。人神之间的区别从细微处就可以看出。而且,小人物们忙于一些只有人类才能想像得出的活计:跪地祈祷、披袍穿服、剪发剃头、犁地耕种、扬场簸谷、哭泣流泪,甚至还有削发后用水冲掉脖颈后部毛发的动作。这样,他们在衣着打扮上必然地要有所差别。我们能够区分比丘尼与沙弥、僧侣与俗人、奴仆与主人、苦力与士子,甚至可以区分出年龄上不太悬殊的差别。那么,关于中世纪中国绘画及其现实主义内涵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我们发现,这些绘画出自一人或几人之手,它包括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神,其构思的正式程度仅次于用图解或用梵文表示;其次,是佛经故事中的人物图像;最后,是对俗众演示宗教仪式以便让他们效仿的现代僧侣。这三个层次都根据不同的需要分别进行了不同的处理。重要的是,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其处理方式在技术上都是相同的,也同样令人心服。而且,我们发现艺术家们无论具有何种风格,他们都有意识地遵循上述的规则。这将使我们永远排除这样的观点,即在对唐代艺术的认识上,我们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回溯了很远很远,以至于达到了艺术工匠尚不可能成为自然主义者的时代。

三、绘画技术

与中国的许多其他佛教洞窟所在的石崖不同,沿万佛峡溪流耸立的石崖并非适宜精细雕刻的均质石岩。它是由基质松软的填料夹带着较坚硬的卵石和水蚀石构成的,根本找不到一处平整的

墙面。实际上,不少地方的开挖毫无疑问是用镐头面不是用凿子进行的。这种地质虽然难于进行石雕或形成平滑的表面,但却易于在其上抹一层泥,形成垂直的平面,然后在上面绘画。石基上的涂层不是别的,正是石崖下小河沿岸的淤泥。它是用泥瓦匠使用的镢刀抹上去的,而且有时还要在泥中加上草秸。在大部分泥面上,都刷了一层白灰浆,它似乎是用中国黏土(高岭土)和动物胶制作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向地方当局的承诺使我们无法将泥墙碎片带回国内进行分析研究,其实获取残片很容易,根本不会损及壁画。

福格博物馆的 R. J. 盖滕斯(Getty)先生曾对敦煌壁画使用的颜料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非常友好地允许我总结性地利用他的成果。这些颜料可能在万佛峡也有应用。这些颜料以及阿瑟·切尔奇(Arthur Church)爵士对斯坦因爵士未曾确定年代的碎片进行说明时提到的那些颜料,^①是迄今所知在窟中绘画采用的全部颜料,共有十一种之多,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公元9世纪或更早一些时期的颜料。

除了加入水和胶使用的六种天然单纯颜料外,还发现了两种含铅颜料,在画工使用前,这两种颜料都经过了相当复杂的加工过程。同时,还有三种植物颜料,在我之前数世纪,靛青就可以通过采用远非简单明了的技术工艺来提取。在中国边陲地带得到的这些数据的重要性是怎样夸张也不过分的。

下面开列的是一份以其天然状态而使用的颜料名单:

炭黑、高岭土、红赭石、绿孔雀石。

蓝铜矿、朱砂。

或多或少需要复杂加工过程的颜料是:

铅丹,采用加热一氧化铅或铅白(碱性碳酸铅)的方法制得。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3卷,第1390~1391页。

铅白,一种碱性碳酸铅,通过铅金属与醋酸(也可能是醋)和水蒸气及从发酵植物中得到的二氧化碳反应而制得。

有机植物颜料是:

红色有机颜料,可能是公元8世纪日本的胭脂(enji),在镀金工艺中使用,类似于欧洲的红花。

黄色有机颜料,可能是藤黄。

蓝色有机颜料,即靛蓝,它需要经过相当复杂的制取过程,才能作为颜料使用。

这样,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确定这些矿物和植物的来源,但有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西部边界仍然骚动不安。盖滕斯先生在他初步草成、尚未发表的报告中写道:“这意味着关于颜料和制作的过程可以与中世纪西方相对比……只有通过远程贸易,这些物料才能够汇聚在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

如果能在当地找到某些颜料,那我们就可以确定出其他颜料中哪些是商队从中亚或印度运来的,哪些是从中国东部运来的。也许还有可能发现,颜料是在哪儿加工的,或者它们是未经加工的还是加工以后才运抵当地的。^①

盖滕斯先生的研究引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直接的美学上的思考。这是一个涉及到采用的颜料为什么能如此近似于原始地使壁画的价值得以保存的问题。只有对这方面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才能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进行判断。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佛陀肉体部分的如深巧克力色的棕色是一种赭石或其他不变色的矿物。但盖滕斯先生却断定,它是已经历了表面变化的铅丹。显微镜显示,这种棕色是色泽鲜亮的铅丹与下面的白色相混合而形成的薄薄的涂层。因为他不相信这是用刷子分

① 魏礼《斯坦因发现的敦煌绘画目录》第47页提及一个事实:在斯坦因从敦煌带来的卷画上,既没有发现铅白,也没有观察到植物颜料。

别涂上去的,所以他继续进行了物理和化学试验。虽然尚未完成,但已经表明,千年来温度和光线将原来的红色改变为棕色。^① 在试验室中,他加速了这种过程,成功地用两个月时间,用铅丹制出了薄薄的一层巧克力色。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想像,那些在我们眼中颇具魅力的皮肤的棕色色调,原本所具有的价值比现在的要大得多,也许更加接近于肉体自然色。

这些即经选定的颜色往墙面上的正式涂刷是循着浅红色或黑色线条勾勒的轮廓进行的。这样,画师就可以把许多工作放心地交给徒弟去完成,保证他的设计构想不被歪曲或改变。毫无疑问,不论是在敦煌还是在万佛峡,这项人们熟知的工程在后期是大规模进行的,调配了些许胶料的颜料,一罐一罐地提供给工匠,由他们按照线条的轮廓往墙上涂刷。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不需要颜色示意图,因为工匠清楚地知道,按惯例佛陀应该涂成什么颜色。

也许在公元8~9世纪时,画师们所使用的刷子已经完善得与今天所使用的相去无几。^② 关于那个时期的我们所知道的惟一一批样品现保存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宝藏里。^③ 它们是用来写字的毛刷,可能与画家勾勒轮廓用的那种差不多,然而,其中没有用来抹平涂料的那种较宽的扁平刷。制刷用的狼毫、鹿毛、狐毛、鼠毛、兔毛都可以在甘肃境内得到,而且很明显:在那一时期的画师(包括徒弟)是自己制作刷子的,而不是像以后那样,非依赖专门的制

① 似乎与克孜尔等的情形一样。参见阿尔伯特·勒柯克著《高昌》(柏林,1913年)。另一种铅丹物质的鉴定将由盖滕斯先生在晚些时候进行报告。

② 弗格森(J. C. Ferguson)著《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s, 芝加哥, 1927年)第34~35页,画面第106幅、第108幅。

③ Jiro Harada 著《天堂宝库藏品英文目录》(东京,1932年)第369号、第371号,第37幅、第38幅。

刷工匠不可。

当时人们是采用什么方法完成洞窟墙壁上的这些杰作的呢？如果能解开这一谜底，那将是很有意义的。许多细节表明，这些画是徒弟直接画上去的。但画师是直接画在墙上对纸样按比例放大的吗？似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是这样做的。另外，从敦煌藏经洞带回的一张图纸上，^① 图案轮廓线是被刺穿的，这样，就可以用木炭或金粉在图纸覆盖的墙面上印出图案轮廓来。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它可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当时就已知道并且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特殊的样品太小了，除了可以用在我们所考察作品上的一些细部外，在其他地方派不上用场。而且，它似乎主要是为了在纸上或丝绸上作画而设计的。

如果一部连环画采用上面的穿刺方法印到了墙上，那么它的含义不外乎两个，或者是将整个巨幅图案一次性地印上去的，或者是将其分割为一些小的局部，组拼印制到墙面上去的。这种方法的采用可以使师傅将大量的工作交给徒弟去完成，然而，根据试验，很明显，一个训练有素的起草人是不会提前将自己的全幅作品画到纸上的，这样做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整个作品的框架、细部无疑都将构成它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我发现在大面积的墙上采用这种印制方法是很难想像的。

当我们转而去思考画师在墙上绘画所使用的工具时，对方法问题得出了一个更具可能性的结论。

与敦煌壁画相联系，我写道：

在二十七英尺高、七十四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洞窟的四壁和天花板上，我无法计算出有多少平方米需要进行绘制。但在敦煌窟群中足有几十个这样的洞窟。仅仅完成粉刷任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第94幅。

务,就意味着需要组织有序而且技艺纯熟的一帮工匠。画师利用角尺、铅垂线进行构图,就像今天在西方木工和泥瓦工弹画粉笔线一样,用浸有印度墨水的线绳在白墙上弹划出线条。圆形光环则是用钉子和线绳画出来的。这儿是头,那儿是肩,位置都确定下来了,构成深邃神圣的姿势的平静柔和的双手也画出来了。在这种用点、角度和一定比例构成的图案上,其他绘画者勾绘出衣饰的外形和如磐石般坚稳的宝座结构。

这时候,而且不一定到这时候,技工们在规定的地方涂上已经混和调配好的颜料。这样,在第一次勾勒出的几何图形的严格限定下,这项工作接着必不可少的预定程序完成了。然后,僧人手执铜铃、经书和蜡烛前来为工程献祭。也许开掘工们这时会报告说,隔壁的洞窟业已开掘完毕,石墙上的泥已干,绘画人可以进入洞内,安放支架,勾图涂色了。那些巨大的壁画群肯定就是这样完成的。一个人愈是从细微和宏观的方面去考察它们,就愈能更好地了解这些画匠们的工作。

在几十面墙上和两群洞窟中,我发现了绘制光环的圆规的针尖,而且找到了准确地延伸通过最主要作品的关键部位的水平、竖直和对角线等线条。我相信,画师仁立在空荡雪白的矩形墙面前,是用从墙的另一角拉过来的线绳确定墙面中心的,然后再退后几步,观察这块可以自由使用的墙面。他认识到佛的巨大头像都必须怎样置于中心线条上方。他用毛笔或炭笔只轻轻的几笔,在中心线上画出了两个同心等边三角形。大三角形界定了佛像两边的光环,而里边的小三角形则界定了中间佛像的身体。这个壁画中大千世界的中心正好位于对角线交叉点上,由此延伸出所有的直线、弧线和轴线,由此,交叉点又确定小佛像群的比例以及金刚力士的座位。如果我对较大窟群的研究无误,那么,窟内布局的方法

取决于人、边墙以及高大的单人像。至于在大佛像群中存在一些较小佛像的现象,可以由此得知,他们的比例和位置在这张巨大的线网中是如何被别无选择地确定在线条交错、夹角丛生的地方。大小和姿态就这样按照第一幅正式的图像被预先决定了,然后,在佛教教规和匠工心理认同所构成的传统框架约束下尽量自由地着色、修饰以及描绘细部。

在小小的照片上研究这些作品,就会完全丧失作品绘制和构思中的风格。因为整个作品不是在一瞥之间就可尽收其妙的。刻意地改变尺寸会令人很不舒服。一个人必须站在或跪在洞窟中,或是被迫扭过头去观看那耸立在作品旁边的巨大佛像,或更进一步用专注凝视天国的眼光的余光去感觉它们伟大的存在。

一度,人们曾认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壁画家们将他们的作品根植于几何学中,我对此感到赞服而且惊奇,正是这方面,使得中国人与埃及人、希腊人、阿拉伯人以及我们自己走到了一起,并感到亲切。

四、五号窟初探

沿万佛峡谷往北朝五号窟方向走,到了山岩中心地带,就会观察到画在墙壁上的神像和供养人像。光线从硕大的方形开口可以透进洞室,但里边还是很昏暗。一座高台占据了洞窟的大半个地方,台上塑像造型笨拙,着实粗俗,给人一种单一、不和谐的感觉。

峡谷人口处里边的墙壁上,现在颜色已荡然无存,甚至连岩石表面都被潮湿弄得破败不堪,石头上用凿子刻出的边缘许多都已剥落了。然而,再往前走几步,向右拐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了路口,壁画又出现了。

在西边岩壁上,站立着两具女像,或插竖旗,或缀花饰,头顶上罩着小型华盖。两人完全着宫廷服装,当然不会是宗教人物。前

面一个手捻花枝或树枝,后面一个手捧香炉。通过在敦煌^①对类似画像的分析研究,我认为这两个人像可能代表了供养人的女眷或者是石室的供养人。

在两位妇人后面,出现了一座花朵竖立向上的莲座,它将两人与一群全副武装,处于暴力对峙状态的人和小精灵分隔开来。

妇人对面,在走廊东墙上,有三个男子像,很可能是供养人。三人中,最外面的也就是靠近崖边的一个,手捻带叶小枝^②,旁边一个拿着一块板子,最里边的一个捧着唐代常见的那种长柄香炉^③。

他们身着长袍,腰系黑带,衬有洁白的装饰性内袖,腰带上佩着木板(但也许是短剑),恰如敦煌第74号石窟中的供养人^④。他们头发的样式,因为壁画损坏严重而无法描述,但好像是用宽宽的丝带系在侧面。

小巧精致的顶盖与敦煌许多洞窟内的洞顶非常相像,旋涡状

① 在敦煌千佛洞,特别是在第117号洞中,与此服饰大体相同的女性服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即在头饰两边悬垂着三根长长的宝石吊链(见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第4册,第204幅)。我认为,这种头饰与六根长簪的头饰相比,具有略微不同的式样(在对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发现物进行年代比较研究时,后者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在风格上的相似又使得这幅画创作的时间远早于其他作品的结论无法成立。

② 这种带叶小枝仍需教规或植物学上的鉴定,但这种植物确实是由一些相似的人物持有的,特别是敦煌壁画中于阗国王的侍从(第74窟;《敦煌石窟图录》第3册,第133幅)和大英博物馆所藏卷轴画中的供养人(斯坦因著《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第61幅、第66幅)都手持这种小枝。

③ 参见勒柯克著《玻璃器皿》(《东方艺术》第1卷,第3号,第135页;斯坦因著《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第79幅,第1章)。

④ 伯希和著《敦煌石窟图录》第3册,第142幅;斯坦因著《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第61幅、第66幅。

花饰沿洞顶披向两边,将雕像分隔在两侧墙上^①,但这儿的旋涡状花饰每一处都是空白的。

三具男像对面相应的位置上,是一组几近消失的身着甲冑的人物,一道垂直的莲带将他们与供养人分隔开来。

往前庭走去,穿过南墙,可以看到南墙上面以门洞为中心分布着一铺佛画,中间是佛祖,端坐在繁花似锦的树下,周围人物有两尊护法神,两尊比丘尼和四尊站在祭坛前的菩萨。在每个中心人物的身体周围有矛头状和三叶草形的环饰。^②头像具有典型的唐代佛像特征。头顶放射出奇妙弯曲的彩色光线,形成了头部后面的圆圆的光环。

东边的一尊佛像盘腿端坐莲台,两手弯曲,掌心向上,搁在腿部,是阿弥陀佛和毗卢遮那佛常见的那种姿态。

位于门廊对面墙上西端的一组壁画和上述东边的一组大体相仿佛,但主佛双手举起,右手掌心向外,左手掌心向内,拇指与食指相触。这两组排列绝似的佛像群在侍者的光环和祭坛的台布设计上也有差别。西边的一组装饰着精细有结的绳索,暗示着佛教教义中的节欲。

前庭的东西墙上的壁画中间不知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打开了一条通道。西边是一尊站立的菩萨,左手下垂,掌心向外,右手举起,食指弯曲,其余手指张开着。佛像对面相应地有一尊站立的佛像,从他手中握着的柳枝就可以知道这是观音像。

东墙和西墙北头的布局方式相似,相互之间很协调,但作品更为精致。西墙北头是佛陀坐在祭坛前的一棵树下,右手举起,似在说法,而左手掌心朝上,搁在腿上。他的周围有十二个也有光环的

^① 伯希和著《敦煌石窟图录》第2册,第69幅;第3册,第133幅;第4册,第204幅。

^② 伯希和著《敦煌石窟图录》第1册,第13幅、第15幅,等等。

人,其中四个是已经剃度的和尚,八个是菩萨。另外,一个裸体人物虔诚地跪拜在祭坛前(这一情景在第十一幅画的左边也可以看到)。对面这组人群的中心人物采取坐姿,左手搁在膝盖上。两尊天王(护法神)侍卫着祭坛,祭坛上放置着青铜色祭器。^①在上方还有两尊护法神像。周围是六个身有光环的人像,其中两个是和尚,四个是菩萨。

在通往主洞通道的右拐角处的两边,站立着一尊护卫神像。他站在人口左边(西边),右手拿着三叉戟,太阳盘(Sun-disc)上悬垂着彩色飘带,左手掌撑在一尊塔身上,表明他是北方的统治者多闻天王。他站在一个仆倒在地上的恶魔身上,两只脚上各站着一个小孩,身旁立着一个和尚。他的肤色如果不是佛教教义上所需要的那种黑色,那就是一种暗红色,一个侍者站在近旁。他从一张虎皮的脑门顶上探出头来,虎爪系在下颏。^②手里捧着一只常用来表演吐出宝石或金粒的那种动物,据传说是常与多闻天王做伴的老鼠或獾。他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颗神圣的如意宝石。

通道对面的守护神是西方统治者广目天王。这幅画面为我们提供了万佛峡美术品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敦煌收藏品之间进行比较的最好的样品。这将进一步证实他在收集现场就已经产生的一个强烈印象,即这两个相邻地方的作品属于同一个时期,而且也证实了我的万佛峡和敦煌的雇工有一部分是两地共用的观点。更令人引起兴趣的是发现了在万佛峡壁画和敦煌藏经洞最珍贵的一轴卷子之间相类似的东西。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卷轴^③明显是出自于一个有造诣的职业画师之手,与那些有插图的经卷和还愿

① 伯希和著《敦煌石窟图录》第1册,第57幅。

② 参见勒柯克著《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柏林,1925年)第62页,第79、第80图。

③ 斯坦因著《千佛》第27幅。

品是大相径庭的。后者出自和尚之手,他们在应付香客的本领方面训练有素但却画技不精。

大英博物馆卷子上的守护神被认为是中国风格的,与更具印度和中亚风格的守护神截然不同。万佛峡样品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在服饰细节、画幅大小和一些制图的气势方面。服饰方面的区别主要是精致的绣花长靴或有压花的皮带代替了斯坦因卷子的中国式守护神的便鞋^①。右手握着的长剑(空剑鞘悬挂在侍者的脖颈上),正如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所描述的,使人们一眼就可辨认出是广目天王。在万佛峡,这一方面的证据从盘绕在侍卫紧握的矛杆上的蟒蛇上也可以看到。因为,作为西方的统治者,广目天王同时也是蛇国之王。

那个压在神人左肘下的魔鬼般的动物除了戴着项链、臂圈和缠着腰布外,全身赤裸裸的。画得精神抖擞,轮廓凸现,但辅之以柔和、绵密的工笔来强调其立体感。疤节累累的头上毛发稀疏而耸竖。攥紧其主人矛杆的手刚劲有力,与人们在整个东方发现的绘画一脉相承。被广目天王站立其上的魔鬼已黯然失色,它虽然痛苦万状,但却精力旺盛。这幅图已半受水损,虽然不能清晰地反映出天王张开的左手,但极具表现力,极其优美动人。它厚实甚至有些柔软,线条简洁,造型准确,掌上的五条纤细的纹理历历可见。整幅作品在技巧和构思上都堪与我们同一时期的人物画精品相提并论。神像脸部与大英博物馆里珍藏的卷子相比也极其相像,是极具才气的艺术家的力作。

在广目天王的左臂下的空间里有草草书写的刻画。这使得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万佛峡壁画是公元9世纪的作品。这些刻画文字有四种不同形式:汉文的、藏文的、回鹘文和梵文字母。我的同事

^① 斯坦因著《千佛》第27幅;参见勒柯克著《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第56页,第58图。

J. R. 瓦利(Ware)教授已经为我将可以辨认的汉字翻译了出来。^①它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附近地区的三位汉官曾于公元 901 年 1 月 15 日造访过洞窟。当然,要界定这些壁画在此前多久就已完成,这是不太可能的。最初我推测这些作品应当属于公元 9 世纪中叶,仅仅基于风格上的证据,这一观点现在更为牢固了。

关于服饰的分析研究,斯坦因爵士和罗里梅尔(Lorimer)小姐已经作了认真的工作^②,这里没有必要再论及了,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两尊把守着通往主洞(即五号窟)的入口的力士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当然,也可能是同一群画工中的另一人。

但是,如果我理解了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关于中国和印度服饰的区分,那么,这里就可能同时存在着这两种类型了。我的意见是,对于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修正我们最先认识的偏差,而且还有可能发现关于女性服饰和诸神姿态的规律,而不是风格的基本变化或年代的中断。

在寺庙的过道里,西侧墙显示出一个立像,但模糊不清。毫无疑问,它是对面侧墙上另一力士的伙伴。那个力士右手挥舞着一把带有金刚杵(Vajra)手柄的宝剑,而左手则持有一个金刚杵。

① 译读如下:“公元 901 年 1 月 15 日,悬泉(敦煌附近的一个地区)长史(Chang-Shih,副官)翟贤达(Che Hsien-Ta)或翟广达(Che Kuang-Ta)……兵马使(Ping-Ma-Shih)冯奉龙(Feng Feng-Lueh),兵马使王(Wang)……。”瓦利(Ware)教授评议说:“这些人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有人提及。如果译读正确的话,翟(Che)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姓氏。其职衔兵马使我也不大清楚,难以冒昧地给出英译。它可能是‘警察’一类的官员。该题识似乎是记述一位职务不高的地方官员的造访。”

②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 2 章,第 872~874 页、第 940~941 页。对类似画像的分析研究,我认为这两个人像可能代表了供养人的女眷或者是石室的供养人。

五、主 室

走进主室,展现在眼前的是公元9世纪中叶大乘佛教毗卢遮那佛的礼拜场所和象征物,那种纯属于远东的创造力使人受到强烈的感染。^①

进门对面的北墙壁上,是图解的大日如来(Mahavairocana Tathāgata)曼荼罗^②,它显现出万物之本原与根源(胎藏界 Garbhadhātu)以及宇宙之精灵(金刚界 Vajradhātu),其中的佛和

^① 华严宗的教义基础是《华严经》(Avatamsaka),是由一名居住在达玛沟(Domoko)地区(即于阗——译者)的僧人译成汉语的。耐人寻味的是,毗卢遮那(卢舍那)的画像也是在达玛沟附近发现的。(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牛津,1928年)在敦煌135号洞窟的壁画上(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巴黎,1914~1924年)和云冈石窟18号洞描绘的是上述《华严经》中早期中国毗卢遮那佛的实例。也许更为早期的例子遗留在中亚贸易通道上。(勒柯克《中亚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第6卷,71页,格伦威德尔《中亚佛教美术》,209页,图465。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西域考古图记》,图125;《古代和阗》,图65)。最为著名和最准确的年代记载要算是752年奈良的大佛寺(Daibutsu)。在那里,象征着统辖天地万物的毗卢遮那的雕像雕刻在青铜莲花宝座之上。我们这里描绘的形式倒有点儿类似敦煌14号、135洞壁画(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和由斯坦因带回的绢画的风格(松本荣一《敦煌画之研究》图59、91a)。

根据经文的权威性,日本大分县法恩寺(Ho-on Kyo)的毗卢遮那的描绘,是把自身表现成与释迦牟尼是同样的,或者是与释迦牟尼十分接近(《大正藏》卷3,128a页),因此,魏礼先生对把法恩寺变相图下面的佛像比定为阿弥陀,似乎改成毗卢遮那更佳。

^② 毗卢遮那是两圈背光,一圈在头后,一圈在身后。头后的光环宽而浅,身后的光环接触到轮廓鲜明的莲花瓣上。头顶覆盖着灿烂的宝石装点的流苏华盖。后面出现了花朵和树的叶柄,毗卢遮那头顶被落在织物上的一节树枝遮住了。主神两侧的菩萨坐在从中央宝座延伸出的卷曲的叶柄托起的莲花上,菩萨的身后同样是两圈光环。惟有在两侧适当距离的两身菩萨颇为相像,毗卢遮那右边的地藏菩萨能确认出来。地藏的右手攥着一颗被崇为神物的宝石(如意宝珠),另一只手手心向上平放在膝部上,他以最早期的尼泊尔壁画上的姿势盘着腿。他下边的文殊菩萨手捻着一枝莲花,像他上边的地藏一样,腿部的姿势也是“尼泊尔”式的。因为主画像妨碍了视线,神的下边一排仅仅左边能看得清,两只抬高的手,手心朝上,抬高些的手手指展开,低一些的手的拇指和食指攥着一只瓶颈。所有这些人物的都佩戴着精致的珠宝饰物。这中心形象东面的四尊神完全被现代的黏土画像掩饰住了,因此,壁画东面尽头的立像就形成了主要印象。但是,位于壁画西边的地藏立像却是清清楚楚的,由枪戟的柄和左手上行乞的钵就可辨认出来。他站在莲花宝座之上,顶罩垂着纓穗和装点着宝石的华盖,披着缀着补丁的长袍。

菩萨只有地藏和文殊能辨认出来。在中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的佛教里,这种八身菩萨、一身佛组成的九身浑然一体的曼荼罗,来源于印度的金刚乘(Vajrayāna)经文。在中国被称为真言(译注:真言为真实言教,即密教,密宗)的这种教义,是由金刚智(Vajrbhodi)在公元719年从印度南部传入的,在公元8世纪末以前通过不空的汉译本得到普及和推广。不空的弟子惠果把这种深奥秘密的教旨传授给了日本学者空海,空海在公元9世纪初在日本传播弘扬,称其为真言宗。

尽管这座洞窟处于新疆边缘,但它包含了所有表示公元9世纪后在中国和日本已成为惯例的传统性象征要素,在此期间或此前探究其宗教礼仪或许不太适合,或者说,隐含于宗教仪式背后的宗教观念,大概可以依照我们从高野山药师寺、东寺等中世纪日本寺院中得到的知识来复原。大约在公元752年,毗卢遮那青铜像就已经供奉在奈良了,因此,在那时这一绘于北壁上的毗卢遮那佛,就有了大量信徒,这无疑是不会有错的。^①

但是另一方面,在洞窟侧壁上看到的最后结果证实了真言的基本宗旨事实上已被接受。需要强调的是,非真正的信徒天国将不予接纳,这同早期佛教理论有根本的不同。

洞窟两侧壁上展现的各自独立的两幅灿烂辉煌的天国图景,一幅是民间新流行的阿弥陀佛天国,另一幅是更为古老的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弥勒统驭的天国。这两幅图景各自把人们渐渐引入毗卢遮那、曼荼罗,各自展示出独特的佛崇拜,而且透过各自以壁画形式表现出的佛教理论来研究那些解脱的方式。甚至于宗教仪式的传授步骤都被如实地描绘出来。

我仔细观察了有重绘迹象的北壁,同一洞窟侧壁由于绘制技

^① Serge Elisséeff, "The Bommōkyō and the Great Buddha of the Todai-j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I, No. I, April 1936.

法的根本差别容易使人形成错误的印象。可是,我比较这种解释与结论发现很多东西表明同这一结论都不一致。在这些壁画的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属于后来施加的不和谐特征,也见不到晚期画工们在壁画上留下的细微的痕迹,或者显示出的低劣的技法。事实上,西壁尽头高大的地藏侧面画和东壁尽头对应的那些绘画,这些主要壁画和其他墙面上的绘画在风格上是相同的。但中央壁画的九品曼荼罗由于手法、姿态和技巧的有所变化而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不管怎么说,中国绘画艺术的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诸如,纤细的腰肢,带花纹的薄纱,蓬松的螺旋形卷发,微微上翘的嘴角以及睥睨一切的独特的眼神,都带有尼泊尔的风格。

我十分自然地把这里的壁画打上了西藏的烙印,是因为有一点十分明确,即是它保留了所有缺乏活力的惯用表现手法,也深深地融会了尼泊尔的艺术,我断定它最早的原型来自于尼泊尔。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以他惯有的洞察力,就对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类似绘画艺术品写道:“一批精巧而色彩艳丽的菩萨群像,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了印度的风格与手法,可以指出这是来源于遥远南方的一种艺术的影响,这种影响大概是从尼泊尔经西藏传来的。”^①

主画像毗卢遮那佛位于曼荼罗中央,两边是四身佛或菩萨。靠西边的那两身地藏菩萨和文殊菩萨只能从附带的题识中辨认出来。在他们和主画像毗卢遮那佛之间的下面右侧空白处,看起来似乎是多余的,但另一侧相应位置被填上了毗卢遮那的名字。这一事实表明,这一布局还是合情合理的。很显然,空白处是画工为了协调布局和比例的虚实疏密之笔,而且,画工并不担心后来的僧人们用传奇故事去填充那块没有绘出内容的空白。毗卢遮那佛的名字被写做“卢那舍”,最后两个汉字的次序颠倒了,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壁画是专业画师们亲手所绘,而并非具有某种画工身份的僧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第839页。

人所为。^①

在靠近南壁入口的两边,我们还发现了比洞窟所有其他壁画更为光彩夺目的构图,这些构图完全可以与敦煌壁画中的佼佼者相媲美。这可再一次印证我的论断,这两组应该出于同一画笔。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它们较少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们比单幅画略显成规俗套,缺乏单幅画独具的特点,但是,作为给人以经久深刻印象的构图,它们是无与伦比的。

入口的西壁上绘出的是盘腿坐在狮子上的文殊菩萨,一个皮肤黝黑的仆人奋力牵住桀骜不驯的狮子,三名侍从跟在近旁,其中两名手持垂直悬挂的三层幡幢。当文殊的骑乘前进时,在他头上的那顶浮动着的华盖上的流苏随之摆动,反衬出他们在徐徐行进。文殊并不是通常握宝剑,而是手持如意,就像敦煌壁画和日本早期及中世纪保留下来的雕塑所刻画的那样。

入口东侧绘出了一幅与文殊变并称的普贤变,六牙象背上负着莲花宝座,上边稳坐着普贤菩萨,三身菩萨相伴随,一个皮肤黝黑的仆人扬起了驱象的刺棒。

线描细致,动感强烈,出于同一画工手笔。面部和颈部不是单调色彩的涂层,而是具有明暗层次,这种技法在敦煌^②也能见到,虽然不尽完善,但还是最具发展前途的形式。我曾在其他地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提出这种技法在脱离它的新疆本土后,不应固守不变地存在几个世纪。这是再次在中国和以中国为基础的日本壁画中被发现的散见的几个最佳的实例。

① 题识读作:“清静法身卢那舍”,最后两个汉字的次序颠倒了,应该做“卢舍那”(毗卢遮那)。

② 从另一着眼点看,万佛峡最接近壁画装饰法,而在敦煌 82b 号洞窟(伯希和编号)中,这个特征却未引起注意,伯希和编号 62、72 号和敦煌 81 号洞窟壁画中描绘了这对神像,但没有明暗层次的技法。

六、两幅天国壁画

浏览这座洞窟的壁画全景,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由大大小小的画像、风景绘画以及优美的建筑构成的巨大画廊。我们知道,距此向西就是敦煌,那里绘制了同样天国情景的壁画,而在欧洲,也保存有从敦煌带去的画卷,只是那些画卷在技法上较这些壁画逊色得多。

在详细了解了这些绘画主题之前,有必要在佩特鲁奇(Petrucci)的论文里添上一个词汇,这个词汇的含义与大英博物馆里的斯坦因收藏品绘画主题是类似的。^①佩特鲁奇认为,天国是这样一番景象,那里的诸神是靠曼荼罗这个专门词汇以等级排列的。在这里,他遵循了西方学者们甚至非专门研究这类问题的东方人的通常惯例。然而,有一点应该值得注意,这个词汇通过那些基于深奥教理之上的代表作品得到了某种限定。严格说来,除了形成壁画的教规特意要求的之外,曼荼罗不能容纳风景、建筑、动物和植物这些自然界特征,也不容许画工在作品总体风格或细节技法上做出任何选择。

另外,变相图^②这个词也被运用于非常灵活的绘画作品中,这些绘画作品更多地是基于佛经而并非深奥的理论。由于画工受到这个词汇的启发,他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去用画表现故事。迪·维森尔(De Visser)对变相图(日文:hensō)做了解释。他说:

……这个专有名称是“净土变相”,或可称为“(阿弥陀佛)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3卷,第1400~1428页。

② 日本人更常使用的形式是 hen-so, hen 意指“变化”,so 指“容貌”,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表示变相或者用绘画或雕塑形式表现之后,真实的佛就隐藏其中,以实现佛拯救众生的诺言。

净土的境界”。在中国一直是这样的称谓,而在日本,由于华严宗的传入,将这个词转换为曼荼罗。这些绘画大致类似于以印度和中亚为典范的中国北齐时期(公元 550~577 年)的“阿弥陀佛与五十尊菩萨”,有隋朝(公元 581~618 年)、唐代时期(公元 618~907 年)的“净土变”,尤其是在公元 7 世纪,由于著名宣传家对阿弥陀佛教义极虔诚的宣扬而得到广泛普及,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名僧善导(卒于公元 681 年),他不仅对 Kwang yō 做了大量注释,而且他的绘画艺术也以这部经文为范本。从那时起,他的“净土变”风格就在中国(但在中国几乎完全失传,以至元、明两代都没能保存完整的复制品)和日本普及开来,犹如一笔巨大的财富至今仍受到珍视并广为流传。善导的模式在唐代被提倡后,成为许多日本画家研究的重点。^①

诚然,信徒对不可言喻的永恒的佛的本质谙熟于心,但佛施于众生的教化恩泽都能以可见的形式再现出来。

佛有三身或三种存在本体。第一是法身(Dharma-Kāya),它是一切佛具有的本质。是真如本觉或佛最高的智慧……是一切现象和一切个体潜存的永恒本体。第二是报身(Sambhoga-Kāya)或享受佛境乐趣的身体,就是说,诸佛在极乐世界现示出的快乐或超乎常人的状态,或者是诸佛在天国的辉耀下证显自身。第三是应身(Nirmāna-Kāya)或变化身,就是说,释迦牟尼或其他任何佛变成人形,或被称为是自然体的一个轮回,也是一个虚幻,因为这种轮回仅仅是佛的部分或

① 迪·维森尔《古代日本的佛教》,第 1 卷,第 328 页。

不完全的表现。^①

东方学者们为研究末世学的绘画艺术而使用的“变相图”这个词汇也是我们这里要研究的。与此相反的是,东方学者们将 mandala 这个词依照梵文词首字母的符号特征进行排列,或者,人形化的诸神是由于画工们受到不同教派的影响而按照严格、神秘的教规绘画出来的。

没有理由相信,这种自由的形式在古印度出现,至少,印度没有给我们提供出早期的例子,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例子是在中亚^②,或中国六朝时期以及初唐。正是在唐代绘画艺术达到巅峰时它们才初露端倪。我们研究的这两个例子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它可以弥补我们在这一时期材料的不足,而且,它们之一似乎在论述和显现同时代中国佛教的创造力方面都具有惟一性。

在中世纪,中国和日本所公认的四个末世学的变相图(日本人称 henso)是:

释迦牟尼的圣地灵鹫山(Grdhrakūṭi);

阿弥陀的圣地西方极乐世界(Sukhavati);

药师的圣地东方净琉璃世界(Vaidūrya);

弥勒的圣地兜率天(Tu'sita);

较为详尽地阐述著名作家迪·维森尔的解释看来是有必要的,因为我在写本文时,他的著作已经出版,这就使我大大缩减了叙述变相图起因的章节。

对我来说,变相图和曼荼罗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巨幅壁画对于精通净土宗(Pure Lang sects)

① 查尔斯·埃里奥特(Charles Eliot)著《印度教与佛教》(伦敦,1921年)第2章,第32~33页。

② 阿甘《集美博物馆佛教收藏品指南目录》,巴黎,1923年,PP,88ff。

的人们早已熟悉了,对于所有信徒来说,天国并非是非常困难进入的。由此,这种壁画艺术能产生激励信仰的作用以及唤起对极乐世界的希冀。进一步说,地狱观念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人注意,并且这一时期的绘画形式是较为自由的,在公元9世纪的中国,它似乎得到了发展,几乎不存在对它造成威胁的问题,而以后的中国佛教徒们却时常感受到威胁的存在。

更进一步说,只有对东墙上的壁画理解之后,才能鉴赏西壁相类似的壁画。洞于对面绘出的是弥勒寄居的兜率天乐土。迪·维森尔论证了中国早期盛行的弥勒崇拜以及逐渐占优势的阿弥陀佛崇拜,这标志着唐代中国佛教的特点。整章都很有意思,并更好说明问题,使用了许多汉文材料,对我们的论题来说,下述引文是适用的:

弥勒信仰和阿弥陀信仰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因为两者都是通向涅槃的“通途”,而取代了雅利安人的“艰难之旅”,而且两者都依赖于“另一种力量”替代自身的力量,两者都以进入“净土之门”(弥勒佛的天国是兜率天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天国是西方极乐世界)取代“雅利安人所走的路”……在中国,道安(公元314~385年)是第一个崇拜弥勒佛并且祈祷兜率天天国再生……这是中国对弥勒最初的崇拜,而且,4~5世纪在整个印度和锡兰已经盛行……因此,最主要的教派接受了弥勒崇拜,将此作为通向天国和涅槃的“捷径”,除了原有的信仰之外,弥勒和阿弥陀就成了公开的或非公开的崇拜对象,而其他的信徒紧紧跟随其后。^①

在公元760年,日本皇太后去世后,王国曾发布诏令,要求每

① 迪·维森尔《古代日本的佛教》,第1卷,第318~322页。

一个郡要绘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图,而且各郡的僧侣都要抄写一部由玄奘翻译的反映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经》。

魏礼在他的《斯坦因发现的敦煌绘画目录》序言中列举了这些天国绘画艺术的例子,做了概括的赞誉,恕我不能更多地直接引用他的论述。他指出,只有在敦煌,弥勒天国的绘画艺术被保存了下来,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可以把奥莱尔·斯坦因先生的这种另外的发现补充到他的著作里。^①

我于1926年写出的此篇描绘万佛峡西壁壁画的文章,可以说是没有借助他的成果写就的。他和扬基(P. M. Yanagi)先生都证实了这一点,这使我感到很大的宽慰。

七、东壁:西方极乐世界

整个东壁展示的是充分表现佛性的阿弥陀佛^②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历来认为,这片净土在西方,而在这里却被描绘在东壁上有些不可思议。或许是由于相邻的主神毗卢遮那佛绘在北壁墙边

① 魏礼《斯坦因发现的敦煌绘画目录》第39页。

② 松本荣一先生在他的著作《敦煌画之研究》中指出,万佛峡东方壁画上的阿弥陀天国兼有 the amide kyo 和 the kan kyo 两种不同经典的自然形态的理性概念。他进一步举例说,伯希和(敦煌144号洞窟,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巴黎,1914~1924年,316页)展示了自然的 Amide Jodo Henso 和 Unadultered Kankyo Henso(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第277、278页)。然而我们认为,这种组合似乎是为艺术家和富有之人收藏信徒们熟悉的画像开拓了视野。这种结合的例子被伯希和在敦煌石窟14,33,44,51,536,54,114,和139A等中找到了证明。以及在日本的 Taima Mandara of the Taima; 德里博物馆所藏来自敦煌的六幅绢画,两幅在集美,以及在《西域考古图记》中第210图中所印刷的壁画中,都得到证明。松本荣一的书中从不同侧面对不同的场景做了分类笔记,他还展示了我们多年前为说明问题,留在日本的一幅照片。

入口,而这幅壁画在毗卢遮那左边,系左面为尊的缘故。据记载,公元761年奈良的Kofukuji也是类似的布局。

阿弥陀佛位于构图中心,半跏趺 Arddhaparyankōasana 姿势,腿部交结,右足置于左膝上。右手在胸前,左手按在膝上。

两边是坐在莲花台上的双重光晕环绕着的菩萨,要比正中的佛陀较小一些。左边的观音菩萨托着一只插着莲花的瓶,右边的大势至菩萨左手做施无畏印(Vitarka mudrā),右手向外伸开。

阿弥陀三尊两边各是五身略小的光圈环绕着的胁侍菩萨,他们坐在长廊地面的莲花台座上。一个没有罩着头光的人在祭坛的一侧向阿弥陀佛跪献祭品。这样,除了阿弥陀三尊,主台上就有十二尊塑像。其中有三尊未戴头饰的,而是自然卷曲的头发,这是较为罕见的。

阿弥陀佛顶罩华盖,观音和大势至顶罩上下七层的幡,幡的顶部饰有崇为神物的宝石(如意宝珠)。佛国乐土就设在由许多墩柱托起的宝座台上,在壁画前景莲池中一座较小的平台上,体态丰满的女神阿布沙罗斯伴随着哨笛、长笛、芦笛、竖琴、古琵琶和两只不同构造的吹奏乐器奏出的美妙音乐,舒卷舞带,翩翩起舞。在画面前面较小的平台伸向池中一截短桥上,一个化生童子托莲而出。

莲池的左右两边平台有一条伸向水中的斜坡形柱廊,在其两面,各有一尊跌坐的佛,它们几乎画在墙面的底部。右边的那尊双手手心朝上并搭在腿上,左边的那尊好像是在说法。佛的身旁各绘两身胁侍菩萨,在摆满供品的供台的前面,有一个呈献贡品的人,右边的一组里,供奉者附近还有一个跪坐在莲花台上的人。

众神排列的总体布局的后上方是与浮在莲池的长廊相对的亭台楼阁。佛顶上和楼阁的两边各是一座耸入天际的琼楼。在长廊上,画有一个长着人头的天龙八部之一的迦楼罗和一只雪白的孔雀。左边对应的天空位置是一只鹤(或雌孔雀)和一个迦楼罗。作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规范表达方式,这类庄严华丽的建筑

群,似乎很早就在中国被接受了。搜集在中国和日本这类建筑实例,并试图找出其中有多少是属于印度建筑学的因素,确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在敦煌^①也多次发现过这类壁画,而日本有年代记载的宗教壁画只是上述实例所记年代之后几个世纪后的作品。在日本,两个表现出不同类型和样式的柱子、长廊、亭台的颇具声名的建筑遗存是:11世纪的法恩寺和14世纪的 Itsukushima-jinja at Miyajima^②。

这幅佛国乐土图南边相邻的画,是一幅表现摩揭陀王国的阿阇世王(Ajatasatru)的罪孽和他企图谋害父母的故事^③。北边对应位置的画是这个故事的继续,表现的是他从这些罪恶中解脱后,同他母后韦提希(Queen Vaidehi)升入极乐世界的故事^④。

当他还是王子时,阿阇世王为了篡夺他父亲的王位,受邪恶的提婆达多(Devadatta)的诱使,把他的父亲囚禁在监狱里,想使其饥渴死去。但是,他的母后韦提希却将食物和琼浆藏匿在花枝中来探望他的丈夫。阿阇世王骑马突临狱中,发现母亲的这一秘密,便勃然大怒,挥剑要杀死他的母后,但耆婆和月光两名大臣冒死阻止了他。然而,他却把他的母亲也囚禁在狱中。佛陀派来阿难和目犍连来到狱中以佛的教义开导她。在一片幻象中,她看见了佛,她

① 斯坦因《千佛》,伦敦,1921年,第1页、第22页、第73页。

② 《日本的寺庙及其珍藏》(Japanese Temples and their Treasures)(东京,1910)指的这些寺庙是:第52~60页中的 the hō-o-do 和第90~95页中的 Itsukushima Jinja。早期中国这类建筑风格的实例发现在建于公元643年的陕西省的大雁塔里,它被雕刻在西面入口处的横梁上。

③ 在印度经哈尔邦(Bihar)省附近。

④ 关于这一故事及其相应各幅壁画,被下列先生讨论过,他们是:高楠顺次郎,《东方圣书》49卷第二部分(牛津,1894);Professor. Taki, Kokka, 247, 249, 251;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魏礼《敦煌获取艺术品目录》及伯希和阿甘等。

请示佛陀,怎样才能在那率天国里获得再生。在壁画的正上方,展示的是阿闍世王的前身,那时他是个居士,站在他的小屋前方,正在接受一个官员的拜访,有一个携带手杖的仆人陪伴着这位官员。壁画顶部绘出的是佛降临人世间,壁画的前景是一条深深的冰冷的河谷。

佛国乐土图北侧边缘的竖条壁画把该故事情节做了相等的划分,每一部分都为我们描绘出故事主题的一个情节。韦提希受到佛的指点,沉思冥想,终于升入天国。在传说上人们所认为韦提希的“十六观”中,有十五个场面在这里有所描述。很显然,上端的那一部分已经残毁了。但还可看出韦提希向前的跪姿,起头部分尚可辨认出,每一幅的特点分别是:

- (1)日落;
- (2)一片洁白如玉的冰层覆盖在池水上;
- (3)莲花池;
- (4)一枝插在瓶中的花(与经文有所不同);
- (5)用宝石装饰的神树;
- (6)极乐世界的宝塔;
- (7)划分为正方形的佛国乐土;
- (8)阿弥陀佛(观音);
- (9)顺遂己意生出宝物的如意宝珠(Cintamani);
- (10)莲花中的菩萨;
- (11)她作为尼姑(?)获得再生;
- (12)由莲花瓣支撑着的高台上花团锦簇般的宝座;
- (13)莲花;
- (14)她(?)在莲花丛中获得重生(头饰与韦提希相同,好像是韦提希);
- (15)盛开的莲花。

在描绘韦提希的竖条壁画两侧左右适当位置上各绘一身高大

的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像。在缀满珠玉、纓纓下垂的华盖底下，观音菩萨怡然伫立在莲台上。他的头妆盘作双角髻，阿弥陀佛像镶嵌在辮发正中，这说明他们的关系，垂吊的珠玉首饰遮掩了双耳，头后围绕着闪射光焰的光环。一条缀以饰物的项圈悬垂在袒露的胸部上，长长的裙带自腰间曳于地面。右手曲肘上举柳枝，左手垂于体侧提净瓶。肩覆宽大的披帛，显露出上身部的曲线特征，而又不失其庄重典雅。壁画接近内边缘与菩萨头部平齐的位置上，剥露下一处空白。

东壁北侧尽头的大势至菩萨立像则远不如观音像了，技法似乎笨拙得多。肌肤的明暗变化没有用深浓的色调去表现，两条眉线也没有用孔雀石和黑色颜料描画。有人怀疑这幅画或者是全部或者是局部是重绘作品。画的上部已经严重受损，莲花座原始简陋，引不起丝毫兴趣。裙摆僵直生硬，是一种套用的呆板的方式，完全不同于附近的那幅画。

八、西壁：兜率天国图

我们一转到表现弥勒天国的西面墙壁，就遇到了对这幅出类拔萃、内涵丰富的绘画现成释读的困难。壁画本身不仅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而且由于当地用水的不纯，也使我们的底片受到了极大损坏。此外，画面若干空白上的说明性题识，不少已经剥落了，或者变得字迹模糊。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这幅画的原始资料——佛经本身以及在敦煌能发现的任何类似的壁画。

这是一幅真正的兜率天国图，我的朋友扬基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并且友善地提供了必要的原文译本。魏礼先生多年后出版的那些著作也是有根有据的，事实上，他只看到了除了与之有关的大英博物馆展品之外的一两个画面。

多数译成汉语的弥勒经典大都已经遗失，而公元4~8世纪翻译的五部佛经却留存了下来，这五部或许关系到我们眼下的考察

活动，^① 这五部中的三部恰好至关重要。《大正藏》453号是在公元303年翻译的，在确定壁画内容方面有相当大的价值。由鸠摩罗什(Kumarajiva)在公元5世纪早期翻译的454号和456号给我们提供了确凿的原始资料。作为原始资料，它们是一种补充——事实上，这种补充作用已不容怀疑——因为展示在我们面前的这幅弥勒天国图，只有奥莱尔·斯坦因在千佛洞藏经洞中发现过两幅图，也都能证明这一点。^② 风格类似、主题一致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了大英博物馆的藏画与万佛峡壁画是类似的，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不必再加论证了。

这幅壁画的空白旋涡纹受到了损坏，但我们可以从敦煌画卷相应题记中予以弥补。首先应该指出，画景前部分的小塔以及两侧的护法场面还不能确定它究竟代表的是哪一种天国。菩萨和弥勒，以后的时间里很少把他作为佛来对待，而为众人所知的图解性曼荼罗，他是以一个象征物或以梵文形式描绘出来的，这幅天国图也未能超出以上的范围。变相图表露的事实进一步显出了层层疑云，就像前面所指出的，画工总是根据自我想像描绘主题，尽管公元7世纪的变相图所描绘的场景总是概括性的，但其结果却使人们更易于理解了。画面穿插了许多星星点点的人物形象，包裹上

① 这五部佛经是：由竺法护(Dharmarakṣa)于公元303年翻译的《弥勒下生经》(Mi Lō hia cheng king)，《大正藏》453号，未见梵文本；由鸠摩罗什于公元402年翻译的《弥勒成佛经》(Maitreyayūkarana)？；《大正藏》454号；由鸠摩罗什翻译的《弥勒大乘佛经》(Mi Lō ta cheng fo king)，《大正藏》456号未见梵文本；失译人名者的《观弥勒菩萨上生经》(Kwan Mi Lō p'u sa chang cheng)(译注：此经系由南朝守沮渠京声译出)《大正藏》452号；由义净(I-ching)于公元701年翻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大正藏》455号。我感谢扬基先生提供的这些经文的适宜部分的英文译本。

②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6卷，第58页；斯坦因《千佛》，伦敦，1921年，第19页。

了一层中国民俗和伪经传奇的描绘,就更增加了理解画面的难度,对我们今天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而且,这在将来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难解之题。

在最初的一瞥中,偌大的弥勒净土场面好像是对对面壁上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模仿,其实,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画中景物建立在平整的地面上,而不是在一泓池水之上。不时冒出一朵花或一束灌木丛,使我们联想到这更像是日本的大和民族画派,不像是中国画派。画面上边两侧的山岳、溪流和森林应该被认为是小场面的背景,而不属于主画面的一部分。而这幅变相图属于佩特鲁奇提到的那一组中的内容,^① 丰富多彩的辅助景致,使其在有限的空间内远远胜过对面墙壁上的那幅画中同样空间的内容。它与敦煌藏经洞的绢画有着类似的个性。^②

我们面前的天国图包含和代表了四个主要部分:中心的三尊一组,即位于中心的弥勒,两侧各一尊菩萨;^③ 图的前景一组显示的宝塔被婆罗门(Brahmins)拆毁的场面以及四宝箱、四龙和七宝;最后,是观音右边和左边华盖后面的场景,各个场景的景致和建筑物渐渐地与邻近的景物融合。

这幅巨大的复合构图又将自身分解为十七个乃至更多的单幅寓言故事、传奇故事和象征性景物,每一景物对于今天识字的或不识字的人都能立即联想到一个人们熟悉的宗教主题。再往上看,就是背后闪耀着光环的佛教的救世主了,他就是人们翘首以盼的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3卷,第1403页、第1408~1409页。

②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3卷,第1400页。

③ 艾丽丝·格蒂(Alice Getty)著《北方佛教的诸神》(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牛津,1914年)第22页中说,与弥勒相伴随的形象特征是:瞿昙佛(Gautama Buddha)和观音菩萨。大英博物馆中绢画所描绘的弥勒天国类似的辅助佛,与魏礼在他的《斯坦因发现的敦煌绘画目录》中第16页所鉴别的并不是同一形象。

未来佛。他给观者的感觉,宛如弥撒乐曲的主旋律舒徐急促,低语回肠;又似乎是礼拜仪式的静思默想,进而做出某种动作姿态;他如同在说法,循循善诱;通过感官赢得了人们对他的肃然起敬。我们局外人对这种神威力量透彻的领悟和感觉,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象征意义及观察其细部。

弥勒坐于居中位置上,赤脚踩莲花宝座,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放在膝上(大英博物馆中的版本未高出胸部)。弥勒的整个形象表面有相当一部分剥落了,但头和身后的两轮光环仍非常清晰。通肩式彩色僧衣从胸前垂于脚下,顶上肉髻,眉间白毫(ūrṇā)相,两侧发光的宝石上浮动精巧的莲花宝盖。紧靠宝盖上方的另一宝石周围飘浮着更多的莲花,莲花被起伏波动的云彩状流苏所包围。天女(apsara)或天使在画面左右翱翔。在华盖后面,远处村野中的山脉、河岸,弯曲的河流依稀可见。

在弥勒两侧,各坐着一身背负两圈光环的菩萨,这两身菩萨都佩戴着镶有宝石的项圈和头饰,各坐于一个小华盖下。以菩萨为中心围绕着一些小神。这些小神每边四身,分布如下:三身坐在菩萨和弥勒的中间,带有两圈背光的第四身坐在靠外缘这一组的一个莲花座上。

排列在菩萨旁边的几组非常费解。在正左边,我们发现三个重要人物,但其中只有两位可以辨认出来。这两者中靠外侧的一位似乎戴着一顶头盔,扛着一面长柄三角旗。这位武士的前面是一位未戴头饰的人物,我认为是个僧人。根据他的长矛,这个武士可推测为广目天王,我不知该如何表述这位僧人。

在正右边的三个人形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来。根据这个剽悍的人像狮子一样的头饰常常使人联想到是多闻天王的侍从,这个较大的人形似可推断就是多闻天王。佛经说:“四大天王来向穰怯王(Joko)辞行,穰怯王在弥勒面前皈依佛门”;当时“还有一些大臣、

僧人和八名卫士”^①。四大天王中的两个,我们已经在对面的三尊一组主画中见到过,另外两个各自与小三人组合排列在画面的下部角落,每个王似乎除了广目天王没有随从外,其他王都有两名卫士。

在弥勒脚边的高祭坛上铺着带图案的织物,织物褶皱垂落到祭台的边沿。排列在祭坛上的是七宝,按照我们的三部佛经所说: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位名叫穰佉的国王,他有七种宝物^②:

(1)一只金轮,每旋转一次都表示圆满;

(2)一头白象,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洁白,而且如此庄严以至看上去像众山之王;

(3)一匹蓝马,长着红色的鬃毛和尾巴,用花装饰的双腿和彩色的双蹄;

(4)一串神珠,两英尺长,如此辉煌以至像晶莹的雨珠,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愿望;

(5)一位宝石女神,她的容貌精致优雅,腰肢柔软,妩媚多姿;

(6)一大珍宝神从嘴喷出宝物,从双脚和双手都能生出宝贝;

(7)一名武士首领,动则身边众人云集。

从左边开始处,我们可见到六牙白象。在鞍座上绚丽的饰物之上背负着神圣的宝石。旁边是位宝石女神,她举着一把印度平扇,这种形象在敦煌壁画和龙门雕塑中都出现过,已为人们所熟知。紧接着是一口箱子,装着第四件东西,即一串神珠。高祭坛的中央部位被一个精心绘制的饰瓶占据,饰瓶的瓶腰和瓶底带有莲花饰纹,瓶顶上是一颗神圣宝石。这再次显示这是只小珠宝匣子,它像七宝中第六宝所说的财宝神,它似乎以这种方式象征着官方。在饰瓶旁边放置着金轮表示完美无缺。在观音右边是蓝马(涂成

① 有关弥勒的佛经。

② 有关弥勒的佛经。

白色),用神珠装饰如同大象背负的那颗一样。在它旁边的武士从头到脚全副武装。武士手持带有顶部凸起的盾牌,盾牌上装饰着一些矩形图案又分成许多各色三角形。^①

如果不是变化的,那么这七宝就时常与弥勒联系在一起。经文如此,艺术家们似乎也对其传统形式非常熟悉。^②

在天国图前部景物中心,可以看到一个坐落在轮子上的小塔,塔的一部被它下面的游廊垂挂下来的布帘遮住。四个半体裸露的男子,两个在房顶,两个在底下正在拆毁这座塔,从柱子上放下的梁木正在运走。以这种独特的从神界到世俗的更移方式,这个小建筑物被如此精心地设计建造以至几乎可以作为同时代佛教建筑的最高水平。^③佛经说:

王子们在主殿前用稀有的珠宝建起一座七宝塔,它有一千个顶和轮子,可以自由移动……在当时,穰怯王率王公贵戚把宝塔供养给弥勒,弥勒接受了这个礼物,并把它送给了婆罗

① 这种模样的盾牌在敦煌 70 号洞窟中是由枪兵使用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第 2 卷,第 124 页),这些枪兵持这种盾牌,与欧洲的不同,它是靠在右臂上的。万佛峡壁画上的盔甲也与这些枪兵类似,好像是一种具有花纹效果的锁金甲。也曾发现过雕塑小人像也佩带这种盾牌。

② 格鲁赛(F. Rene Grousset),《中亚艺术及其影响》,《亚洲艺术评论》第 1 卷,第 2 号,1924 年 7 月,第 13 页;沙畹(E. Chavannes),《汉文大藏经中的五百寓言故事集》,巴黎,1910~1934 年;罗列赫(George Roerich)《西藏绘画》,巴黎,1925 年。《西域考古图记》第 1 卷,图版 74, ch. 00114;图版 75, ch. xvi. a. 004。

③ 就我所知,目前在中国存在的唐朝建筑的例子仅仅在东部的省份有两到三个砖塔,我还没有发现任何那个时代的木建筑。陕西大雁塔始建于公元 643 年,在 Cf. Sekino《中国佛教徒的遗物》第 1 卷,第 9 页、第 10 页,魏礼《斯坦因发现的敦煌绘画目录》第 18 页中都曾有提及。

门。婆罗门收下后便将此塔拆毁，每人分得一些碎片。弥勒看到这精美的宝塔顷刻化为乌有，感悟一切事物都变化无常，由此他考虑到无常。^①

如此一切事物必然遭到破坏的道德故事，被带给了家乡的信徒。^②

宝塔拆毁的两边显露出两个金属制成的小匣，如同上面提到的神珠一样。它们由两条守卫龙护送前往。^③佛经对此原原本本予以说明，它告诉我们：

曾有四个巨大的宝库，一个在犍陀罗国(Gandhāra)的埃力帕特(Elpeatra)，另一个在米特拉国(Mittra)的潘达卡(Panduka)，再一个在苏拉特国(Surata)的皮嘎勒(Pigala)，第四个大宝库在海热那国(Hirana)的珊卡(Sanka)。四条巨龙守护着这四大珍宝以及许多小的珍宝。这四条巨龙腾空而起，犹如盛开的莲花，吸引所有人都来观看。^④

在这幅天国图下部的两角，坐着一些身边有卫士守护的佛以及侍从菩萨。他们的前面放着祭坛，祭坛用许多饰有莲花图案的布遮盖着。每个祭坛上摆设三个青铜容器，这些容器的造型是在

① 有关弥勒的佛经。

② 显然，这是对这一现象正确的描述。而此前，它被中国人和关注宗教建筑的欧洲人弄错了(参看《集美博物年刊》，巴黎，1916年，第41卷，第127~128页；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第1082页，《千佛》第20页)。

③ 这些宝匣不是同时代使用的现实物品，确信这种精巧的工艺是无法实现的。类似的宝匣在壁画上和附近的敦煌绢画上曾有所发现(参看《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图版75，ch,xxvi a 004)。

④ 翻译的关于弥勒的佛经。

壁画中以及该时代保存下来的实例中常见的。这三件容器都是饰瓶,中间的一个是圆顶的高脚碟(移到右手一组),那是一只香炉。其他两个是盛圣水的细颈瓶和托莲花的罐子。

在巨幅壁画下部角落中的一些较小的三尊一组佛像前方和这些神态自若的神的膝部周围,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一系列繁忙情景的描绘。这里以形象的描绘向人们介绍加入佛教华严宗的仪式,这种仪式在公元8世纪和公元9世纪的中国确实曾经实践过。^①

在观者的右边(在神的左边,即其上首)是一组新入佛门的和尚,对面是一组新入佛门的比丘尼。两个男子正在被剃度,^②作为授予象征性僧衣仪式的开始。他们一个挨一个并排坐在适当高度的椅子上,每人后面站着一位为他们剃度的和尚。^③使用的剃

① 根据在敦煌发现的这一主题的描绘,这些涉及穰佉王的少量的人物和穰佉王的八万四千名侍从以及相同数量的婆罗门的描绘,以及穰佉王的儿子提婆萨那(Devasana)及八万四千名随从、王妃与她的八万四千名侍女,以及弥勒的亲属苏玛提(sumat)和四万六千人皈依佛门。这个巨大的群体象征着由少数的中国人构成的上流社会和这一时代他们的贵族妻女。然而,松本荣一认为,中古时期和现代的宗教仪式表明,即使在公元9世纪,人们实际上是以个体身份参加这个最初的宗教仪式的,就像我们自己参加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或当我们在婚礼仪式上唤回艾萨克(Isacc)和丽贝卡(Rebecca)的习惯一样。

② 在大英博物馆的弥勒天国图中也发现过与其最相似的削发场景,《千佛》再版本的第19页对其进行了具体的描写,削发仪式的差异,在敦煌壁画和万佛峡壁画不是特别明显,削发场面在作品中占据的位置相同,但在大英博物馆藏画中,想剃度的男子是在仆人陪同下骑马来的,贵妇人是用四人大轿抬来的,也没有看到想像中的僧服,也没有使这一仪式直接在祭坛前完成。

③ 对相似剃度场面的描写,参见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高昌》36A;这个场面也可以从反映公元3世纪印度文化基础的大都会博物馆藏品中见到。

刀不像中国今天所熟悉的那种,当时的剃刀外侧曲线呈镰刀形刃。在中国,我是在陕西省的鄂尔多斯(Ordos)发现了仅有的与之相似的一系列具有斯基泰(scythian)特征的青铜刀或剃刀而且不知它们的年代。每一位应选者有一个着世俗服装的仆人陪伴,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身后站着和尚,手里托着一块展开的面巾。略靠近前面场景的是应选者中的一位,他跪在镶边的地毯上,这地毯更像近东地区的小块粗地毯而不像中国的那种,他正在接受剃度。他后而是两个仆人,他前面跪着的第三个人手举着白色的毛巾。祭坛前方是一个正在穿僧衣的人物^①。祭台前还有一个跪拜着的人,祭坛两侧各有一张供品桌,较远点的一张侧面紧挨着四位僧人,较近的一张边上有两位僧人。^② 这些桌子上放着的是古铜圣水罐,六套僧人的僧衣整齐地叠放在他们的箱子里,并且有六个小土丘,这些小土丘无疑是佛教中的六圣谷(the six sacred Grains)。

在最角落处,剃度比丘尼的场景是类似的,但并非毫无差异的雷同。因为在这一场景中,陪伴两位正在被削发的女子的不仅有她们的跪着的一些仆人,而且还有另一对女子和一位托着装饰华丽的盒子的侍女。与和尚的不同,这整组画面是谨慎地以屏风包围着的。在屏风的末端有两个男性的身影我却无从解释。在另一块加边的粗地毯上有一只圆凳子,凳子上坐着第三位女子,正在接受剃度。一绺绺又湿又乱的头发落在她的腰部,侍女跪在她面前,手托着一个方盒而不是像对应的剃度和尚那样拿着毛巾做着准

^① 如许多东方的和西方的壁画一样,这并不是容易分辨的,但无论这个人物真实与否,其他个人的描绘或这个相同人物的传奇故事将更深入地延续下去。

^② 类似形状的桌子在日本奈良的东大寺保藏着,这个桌子的腿与横档之间已磨损成椭圆形空隙。见《京都正仓院保存皇室珍宝之英文目录》1932年,图30。

备。在这个场面中，这个将要穿上袈裟的人俯拜在祭坛前，一个站在后面的比丘尼正在将僧衣披在她的肩上。在神脚边侧面的那个祭台上面放的是青铜圣水细颈瓶、比丘尼的长衫、圣谷的六个小堆，还有后面的一个仍是俗人的等候者。这是一些正在被吸收人教的比丘尼，一个托盘盛着她们割断的发辮。在这些人物之外，还有两个比丘尼，其中一个举着燃香的香炉，她们各自坐在垫子上，背对着观者。两个俗家女子坐在长凳上，注视着全部场面中这一最令人兴奋的一幕，一个比丘尼经历了最具慰藉的过程，削去发辮之后将身子弯向一个大脸盆接受一把大口水壶倒向头部的水，其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四周土地上长出的一朵朵小花和一簇簇蕨类植物充满了两个场景之间的空白处。

壁画两端略低的角落是六尊一组的诸神聚集场面。佛的两侧各有一身坐在宝座上的胁侍菩萨，还有一位坐在地面上的较小的菩萨和三个武士。四个护法神和两个天门守护神，只有北方统治者多闻天王能够确认。他左手托着他的象征物佛塔，由他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局部场面被安排在右下角。上方是戴头盔的另外四神，或许是南方守护神增长天王，他持着一支长长的束着纓穗的长矛。第三位武士站在另两位的后面，像是金刚力士，而不可能是其他什么人，他站在主尊之左，面现今日本的寺庙里，他则被下降到庙门入口处。这幅构图边缘南面相应的一组中，他的伙伴也是站立着。同他在一起的仍是四位天王中的两位，可推断为持国天王和广目天王。

那位头戴战盔的持国天王，我认为他肩上扛着的是一把钺或戟，枪尖依照惯例成鸟嘴形。这种唐代的青铜戟头造型人们都很熟悉，那个时代的青铜戟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中有展览，承蒙博物馆的美意我翻拍了展品的照片。

在变相图的右手略低处的一角和三尊一组佛像背后，通过敞开的木屋侧面可看到一群饮宴的女子，她们坐在桌子旁边，头和肩

从低低的帷幔上面露出来，仆人们正端着盘碟和食物走着。在桌子上，人们可以从其他的盘碟中辨认出一个盛着圆形面食或水果的大碗。这宴饮场面可从敦煌^① 弥勒绘画中旋涡花饰里的一个传说中得出解释：

在当时，世界是安宁的，没有盗贼出没带来的危险。无论在城堡或乡野都夜不闭户。那儿既无疾病也无洪涝、火灾、饥馑、战争和瘟疫，人们都富有同情心，彼此和平相处。他们制服一切邪恶，他们的言谈谦虚适度。^②

在右边饮宴场面上方，有一些很难定义的情节。有两个足蹬高筒靴，头戴黑帽子，穿着长外衣的男子正站在帐篷后面。一个看得相当清楚（另一个没有前一个清楚），他的左臂伸进外套的袖子里，右臂弯曲。远处是一片林中景色，景中有一幻象，在云雾缭绕中一男子坐在林木丛生的峭壁下。再向左一点是一个更小的模糊的情节，在这两组场面之间，第三位呈跪姿的人物之上，是一片空白的旋涡花饰。

这幅绘画右侧的一个场面是两组较远处的活动场面。可看见一个城堡的角落被帷幔遮住，在城堡与四座棱堡之间，一座六角亭坐落在这些帷幔上方。所有这些建筑景物以架有两座桥的护城河为边。在这两组景物之间的地上，有一罗刹鬼正在扫除污秽，城中，一位妇人正斜卧在一个坐落在绿树丛中的敞开的亭阁里，看着一个菩萨的幻象坐于莲花宝座飘拂在层层云朵之上。之所以能识别这些人物，是由于佛经的以下一段文字：

有一座大城堡，叫希特玛祖（Shitomatsu），它庄严肃穆，精巧雅致，金碧辉煌，而且十分洁净，住满了有德行的善良人……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6卷，第58页。这个“宴会”场面的描绘也暗示了三种苦难经历中所蒙受的一种，即饥饿的暗示。

② 有关弥勒的佛经。

在这个城里住着一个罗刹鬼，他循规守法，从不违反教义。每天夜里，当善良的人们入睡时，他就用香水湿润泥土，使一切东西发出芳香……

他的名字叫巴达帕拉(Badapara)，只在晚上活动……

日日夜夜守护着这里的百姓，而且把一切清扫得干净利落^①。

一条龙的长长的躯体向左盘旋着，佛经中也有所提及：

有一个威力巨大的龙王，叫托罗·诗奇(Tara-shiki)。龙宫就在城堡旁的池中。他常于夜半降微细雨，以盖尘土。^②

在这座城堡的左侧及桥的前方，这位罗刹鬼再度出现，他的扫帚就放在身旁，跪在一身佛前，佛举起左手正在祝福。佛顶上飘拂着一个带有宝珠的华盖，脚下是簇簇莲花，佛的身后站着三身菩萨，他们头罩光环，足蹬莲花。在跪着的罗刹鬼和佛之间，有一漩涡花饰，现在都是空白的。上方是佛经中所描述的安甫戴(Empudai)山水风光。

这座岛屿名叫安甫戴，有一万由旬长，八千由旬宽。平如镜面，名贵的花和柔软的草覆盖着整个岛屿，各种树木生长茂密，每株树都高达三十英尺。无论在城堡还是在乡村，鸟儿在空中自由飞翔。人的寿命都在八万四千岁。他们有智慧有德行，安宁而欢乐。^③

在观者左侧墙上的两组风景，尽管在第一瞥中似乎是一个整体，但细加分析可发现能够分别予以解释。

从底部开始，在布局匀称的一组神之后的左角较低处绘有两男子，一人穿深色长袍，一人穿浅色长袍。他们正经过一个宝箱（这个宝箱放在壁画中央的主祭坛上），他们头转向宝箱。脚边的

① 有关弥勒的佛经。

② 有关弥勒的佛经。

③ 有关弥勒的佛经。

地上放着三种财物的象征物——一只蝙蝠(富裕的同音),一颗发光的珠宝和一块硬币。佛经做出了如下解释:

在当时,各种财物都无需保护,人们都不贪婪,当看到这些宝物时都不屑一顾,好像它们是些瓦片、石砾或野草、木棒和土块。他们没有私心,彼此交谈有如佛的教诲:“从前人们因为财富而互相残杀。抢劫、欺骗和说谎,使我们生活中遭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因而死亡频增,最后使人们坠入地狱。”^①

在“对财富的蔑视”图上边的那一组,同一部经书做如下说明:当一个人的生命接近终点时,他自愿走向坟墓并在那儿死去。那时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当衰老时自然而然地来到树林的阴影下。那儿宁静舒适,他的生命就在祈祷中结束。^②

在圆顶形墓门的入口处,坐着一个白须长者。长者手中扶着一根弯曲的手杖,四个男子和三个女子站在那里好像是向长者告别。一个小男孩,可能是孙辈,在伏地叩头。左侧的这位女子攥着长者的手以袖拭泪,背对着观音的那位男子也在哭泣。

在这组画面以上,一个男子正驾着牛犁地,犁地的牛一头黑色一头白色。一个妇女跟在后面,手拿着一个方形物体,可推定为种子盒。一个身形几乎涂毁了的人通过前面高高的谷物骑着牛正向他们走来。^③

从底部起的第四组情景,是一个女子和一个穿着讲究的人正在用耙子和扫帚簸去一堆谷物的糠皮。

在这一组右边,两个男子跪在一张矮桌前,背着一个长方形的浅盘和一个难辨认的圆状物,这些都绘在一个呈坐姿的和尚的前方,这个和尚的深色衣襟从左边裹到右边。他的侧面是旋涡花饰,

① 有关弥勒的佛经。

② 有关弥勒的佛经。

③ 这也是蒙受的三种苦难经历的一种,即耽于兽欲的经历。

后面耸立着两棵大树，远处是一条河。这条河弯弯曲曲从左上角延伸而下（这条曲折的线，确切地说是今天那个地区的黄土沟，只有发洪水时才有水）。

溯河流而上，我们可看到露出水面的岩石和树木，可以说就像一顶大的稻草帽，今天人们把它盖在田野边的粪堆上。接下来我们看到一座用一根根圆木构成的带栏杆的桥，桥的更远处是一座山洞，这个山洞位于一些奇特的峭壁之下。在山洞前方，一个衰弱的长者坐在垫子上。在他的上方右侧是旋涡花饰。穿过桥到右边略低一点，是一个蓄着胡须的长者正跪在小块粗地毯上向走近的佛陀奉献他的长衣。佛陀站在莲花丛中，一个珠光闪闪的华盖飘拂在他的头光之上。他右手伸直，左手在胸前。服侍他的是三个也罩有华盖的菩萨和两个着俗装的人。根据佛经所说，这种情节或许代表三种苦难——贪、瞋、痴。^① 在作品靠边部位的上方，展现着一片林木丛生、巨石嶙峋的山水画。的确，我们在此首次对一个中国艺术家描绘的山水画进行广泛的研究。

向右路推进一点，在壁画和窟顶交会处的略下方，一棵树下坐着很小的三尊一组，可推测为弥勒三尊。一个男子身着普通的宫廷服装跪在弥勒面前。再向右一点，有两个更小的穿着凡俗服饰的男子乘着薄雾般的浮云向空中飘去。一个女子与一个相似的人形在华盖右侧云雾中面对着他们。在树木丛生的河滩和湖泊的远方，越过这尊伟大的弥勒顶部，人们可以辨认出在两只小船上的两个人形，一只盛施舍品的碗似乎漂在水面，天使在两侧飞翔。大片的灰泥从窟顶上脱落下来，如同许多其他地方的洞窟一样，这些遗留下来的——系列身后带背光的小佛像整齐有序地安坐在壁画上缘的矩形佛龕中。

这幅巨大的天国图两侧垂直的线条边上装点着许多玫瑰花形

① 有关弥勒的佛经。

图案。稍远处是长幅的菩萨像，每个菩萨的面部都略朝向内侧的墙的中心。靠观者左边的南端尽头，是立于华盖之下的观音。他的头饰正中嵌着一枚象征他的灵魂本原的阿弥陀佛冠，他的右手捻着弯曲的小柳枝，这是他的人所共知的另一个特征，左手提着一个不明物，好像是一盏灯。与头部平齐的旋涡花饰，应该留下他名字的地方却是空白。

在墙北端对面的菩萨却分辨不出是谁，尚不能断定是不是观音的同伴大势至，丝带束发，流苏垂于耳后，他的头发在脑后编盘成角髻，一串镶珠宝的项圈贴在裸露的胸部上，长裙坠地。他立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上，双臂肘部弯曲，手心朝上，右手拇指张开，食指和中指弯曲。他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略微弯曲，其余张开。

这些高大的人物形象体现了艺术家极高超的才智与风格，似乎与在入口处描绘的骑在坐骑上的风度翩翩的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同出一枝画笔，不能说不同的艺术家在这幅天国图中绘制了相似的人物形象。事实上，技艺的差异是如此细微，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总结为整个洞窟的壁画是由同一群画工创作的。但可以说，这幅巨幅作品无疑是高贵壮丽的，在姿势体态的描绘方面更是得心应手，与较小的例子相比，这幅作品更具抽象性。这意味着，要在这里和敦煌进行数月的仔细研究之后，人们才能明确地认识到，这些画工每一位都最具才艺，精于画技，并且几代画工都为之付出心血，把他们的艺术造诣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片新疆边界的地区。经过在作品前的短期停留并将我的笔记与照片进行大量的比较之后，最终得出的印象是，这些画工都是艺术大师。

西行日记

陈万里

沈兼士序

方前年美国敦煌考古队之邀请本校派人参加也，余以敦煌近廿年来外人已屡至其地；顾我国学者以考古为目的而往者，此殆为嚆矢，苟非得智力卓绝之士，虑弗克负荷。适陈君万里奋发欲往，余与叔平亦审谛微陈君莫能当其事者。即行，六阅月而返。虽于敦煌未遑作从容精密之探检，然如记中所载，其成绩固已足惊叹。至其爱护国宝，维持校誉，孤诣苦心，尚有为楮墨所不暇及者。然则陈君此行，于国人及本校之光荣为何如乎！陈君固多才艺，故记中议论旁涉，莫不精彻。即其写景抒情之笔，亦皆妙造自然，使读者得卧游之趣。往昔载籍，录金石者，多乏山水之清音，写景物者，每略史迹之考订。两胜兼擅，厥为郇注水经，陈君兹记，殆足嗣响。惜全书现尚未印毕，未得快读一过，而陈君索序甚急，聊书数语，用志感佩之意云尔。

中华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

沈兼士序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马衡序

陈万里先生精于医学，尤爱美术，钻研之暇，喜作远游。去年春，美国考古队华尔讷君 Langdon Warner 等将赴敦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以福开森先生 Dr. John C. Ferguson 之介绍，得派人参加同往调查。陈君闻之，欣然愿行。以二月十六日出发，七月三十一日归北京，历时几半载，成《西行日记》一卷，《附录》五种。同人以陈君此书，实为国人调查千佛洞者之第一次成绩，不可以不公诸海内。爰怂恿其印行，以供继起者却识考。惟陈君以半载之旅行，留千佛洞仅十五小时，浏览所及才十之七八，不可谓非憾事。然即此所录数十则之造像题名，其关于史料者已不少，如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宋史·沙州传》并称其卒于宋太平兴国五年，继位者为其子延禄。罗叔言先生撰《瓜沙曹氏年表》，以英国伦敦博物院所藏敦煌遗籍有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施舍疏》，颇疑元忠之卒在开宝八年以前。史家因太平兴国五年之贡使误以是年为元忠卒年，并误嗣位之延恭为延禄。又疑延恭以后尚有延禄，史家佚延恭，而以延禄直接元忠。今《附录》第一种中所录者：第三〇〇洞梁上有开宝九年曹延恭题字，第八五洞梁上有太平兴国五年曹延禄题字，其结衔皆为归义军节度使。是罗君所假定之二点已可由此证实。惟诸史所纪太平兴国五年入贡者之为延禄，则确不误，又可订正罗君者也。盖元忠之后为延恭，延恭之后为延禄；元忠之卒必在开宝八年以后，而延禄之继延恭，则又在太平兴国五年以前。是皆可补正《罗表》者也。又敦煌遗籍中有《节度使曹大王夫人赞》，蒋伯斧、曹君直均以为元忠之妻，且据史家所纪赠敦煌郡王以证之。今第六〇洞 e 梁上有乾德八年（即开宝三年）曹延忠（“延”或为“元”字之误）题字，结衔称“平西王”。是元忠生前已僭称王号，蒋氏、曹氏定曹大王为元忠固不

误也。是时西陲隔绝，朝贡不至中土者十余年，乾德六年改元开宝，而元忠仍称乾德八年，无怪乎延恭一代史家阙而不录矣。《夫人赞》中有“辞天公主，……别男司空”之语，而一一七洞题字有曰：“大朝天子阆国天無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知天公主者为延禄之妻，即夫人之子妇；而男司空或即指延禄——惟延禄诸题名，皆题检校太傅，不言司空，或由司空而晋为太傅，未可知也。又可知夫人之卒，当在延禄嗣位之初，其时无忠延恭皆已前卒矣。偶阅前人考证敦煌遗籍之文，觉上举诸条有可以参证之处，爰拈出之以质诸留心西陲史迹者。

十五年四月十日 马衡

顾颉刚序

中国历史上，除了徐霞客以外，竟找不到一个以旅行为生命的人。文人学者的游览的诗文固然多得很，但这些东西只是他们的日常的遭际（如做官、遣戍、赴考等）所引出的偶然的感兴而已，并不是他们预先规定了一种目的，去努力寻求得来的。这类的旅行，原没有很高的价值。

一般的人民，他们既不曾有旅行的习惯，又不能提起游览的兴致，只是安土重迁，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我们只要看“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行船走马三分险”等习用的谚语，便可知道他们是怎样地怕出门了。

只有“重利轻别离”的商人，才肯受金钱的引诱而作远道的旅行。但他们除了金钱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他们虽走得很远，见闻也较广，但与他人是生不出什么关系来的，在文化史上也是占不到什么地位的。例如山东人到满蒙和俄国经商的很多，福

建广东人到南洋群岛和欧美去经商的更不少，但试问他们的工作除了把自己造成一个富家翁之外，再能给我们以智识上的食料吗？他们有一册游记或报告流传下来吗？

商人既如此，文人学者又如彼，所以我们民族的历史固然悠久，足迹固然广远（近年美国学者在墨西哥等处考察的结果，证明一千五百年前已由华人寻得美洲，这是一例），但只是被动的旅行，终于“有若无”的。我们现在要收集各种地理和交通上的材料，不但外国方面不易找，就是本国方面也缺乏到了极步。翻开《四库全书总目》来看，它著录的二千年来的游记总共不满十部，这是何等可耻的一件事！

自从有了轮船铁路之后，有许多地方的交通是便利得多了。欧风东渐，把我们“好静不好动”的性质也渐渐地改变过来了。有了摄影片，大家见到可爱的风景和古物，也很想去亲接一下了。在这种种诱引之下，于是常有结队旅行的事。可惜他们的目的还只在名山胜境的流连，合于昔人之所谓“清游”；并不能做长途的搜奇探险的工作，如徐霞客一般。

陈万里先生是我们一班友侣中特出的一个人。他极度的爱好自然和美术，尽力作旅行。他不但有旅行的兴致而已，又有各种的济胜之才，如摄影、图画、医药等等；又有耐劳的身体，一天走七八十里，睡在骡车上，迟眠早起，是不以为奇的。他不但欣赏美术，而且能下研究的工夫，尤其是对于造像和壁画等佛教的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旅行，是有兴趣、有技能、有目的的。

我固然也是一个欢喜游览的人，但胆子终嫌太小，只要没有人和我同行时，我便不自觉地吧兴致打消了。万里却不然，他想游哪一处时，是不管有伴无伴的。平常日子，他竭力搜集山志、游记、碑文、图像等等，预先定出一个游览的计划；一有机会，便依了他的目的，独去寻访。这真是一个旅行的天才，足以继迹徐霞客而无愧！如果他能够得到经济上的助力，使他摆脱了许多生计的束缚，他的

旅行的成绩一定是极优越的。

这一次,美国哈佛大学的旅行团到敦煌考古,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万里同往调查。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行,在他的历史中是极可纪念的。回京之后,便把所见所闻整理成这部日记。

万里此行的目的,是到敦煌搜访佛教的艺术作品;结果却因当地人对于西方人的恶感,只在千佛洞中消耗了三个半天。这实是一个大缺憾。但就在这行道的五个多月之中,所得的考古材料已经不少。如邠州的大佛寺、泾州的南石窟寺和丈八寺、兰州的金天观、安西的东千佛洞,以前的人多不甚注意,以致志书里留着许多错误。经万里这样实地调查了一下,辨明了方位,判定了年代,以后再有人去时,便可依据了这些材料而作更精密的考察了。

说到古物,真觉得我们一辈人与其他的人站在两个世界。造像壁画之类,在我们的观念中,只觉得是古物、是艺术、是历史,总想把它研究一下;但在其他的人的眼光中却只有一个神祇的观念,以为是应当保存了作顶礼膜拜之用的。这次万里们在南石窟寺的受窘,只算得一个小小的挫折呢。这种绝对不同的观念,真是没有法子可以融合。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用”,所以不是保存,便是毁弃,甚至于盗卖营利。如本记中所载敦煌千佛洞盗卖古物十余年的王道士便是一例。三年前,我和万里同游太原天龙山,那时北齐的造像还是很完整的。去年听说运到北京来出卖的“佛头”已经很多了,山上的石像几乎没有一个不残缺了。千数百年前的艺术作品,因向来不注意之故得完保于土封尘霾之中;到今日一注意之后,它的毁坏的厄运反而临头了。发见之日即渐灭之期,这是多么可以痛心的一件事!

山西陕西是汉族最早的根据地,不知道埋藏了多少我们民族文化的古物。甘肃古来本是西戎和匈奴居住的地方,到汉武帝时始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边关,又为和外国交通的一条主要的道路。佛教输入中国,它又是第一个站口。西夏建

国，它又成了一个文化中心。这里边也不知道埋藏了多少种族史、交通史、宗教史、文化史的材料。前数年甘肃地震，古物出土的便很多。若再加以有意的发掘，必可得着许多料想不到的发见。所以在这一方面，将来真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像万里这样爱好佛教艺术，恐怕仅仅这一点已够消磨他一世的精神了。

以前的志书只有陈陈相因，就是近在咫尺的东西也不会睁眼瞧一下，弄得乖舛踵接（万里记中指摘志书的地方很多）。以前的游记又最多流连风景之辞，以为必须这样做了才见得自己的雅人深致；什么风俗，这些庸夫俗子的生活管它则甚呢。可是现在我们的眼光改变了，知道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有注意和研究的价值，雅俗和贵贱的界限不过是“作茧自缚”的昏愤。我们既作旅行，便当尽量把旅行中的见闻充作记载中的资料。万里这本书名，不把“考古”二字换入“西行日记”之中，所收的材料如方音、市招、戏剧、神祇、唱本等都和古物站在平等的地位，这确是一个很大的觉悟，足以开出一个游记的新局面的。固然这些资料所记并不详细，但这原是匆促中记出的，在时间上本不曾许作精密的调查。只要读者能从此引伸，自可获得许多新鲜的材料。即如车价和物价，此书中屡有记载，已足打破前人“口不言钱”的坏习惯；但没有把此次旅行的详细帐目开列出来，作一附录，也是一个缺憾。将来万里第二次去时，或别人作游记时，我希望他们能够随从我的愿望。

这部日记里，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是行路的困难，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艰窘。万里走的这条路，原是二千余年来东西交通的惟一的大道，经过的两个省会又是以前曾经建都的地方，但道路的不修，天雨后的泥泞难行，上下山岭的困难和危险，旅舍的湫溢和不洁，恐怕比较二千余年前还没有什么分别吧？世界上的文明怎样日进，而号称开化最早的我国的物质生活竟会陋劣到这般，过去的数千年只算是白过的，这已足使我们羞愧。何况途中盗匪充斥，杀人越货的事情成为家常便饭，就是国家蓄养的兵士，只要他们高

兴也可以做出和盗匪相类的行为。这简直是叫旅客们去受罪，去和死神握手了。至于政治的黑暗，如陕甘两省的罌粟的遍野，苛税的繁多，银圆价值的分歧，哪一处不教人看了心痛！我们只要看在陕西经商的山西人说的“有了瘾如何回家！”的话，便可知道山西和陕西的政治是迥然不同的。因为陕甘两省兵匪满地，逼得人民的生活苦痛不堪。因为督军们要收取烟税作自肥之计，借了罚种罌粟的名目，普及于一班种菽麦的人，叫他们分摊罚款，逼得他们不能再种菽麦。因为大家都种了罌粟，弄得烟贱而谷贵，牵连及于一切物价，没有不提高的。人民生计之枯，嗜好之深，惟有一天一天的墮落下去，除了奄奄待毙之外竟没有别的办法。试看这本日记里写的，他们在寒风凛烈之下，赤着身子，战着牙齿作苦笑，真是何等悲惨的一幅“饿殍图”呵！

七八年前，我在上海买到一册新出版的侯鸿鉴先生的《西秦旅行记》，叙述敷水一带的靖国军与政府军相持之下的情形，使我读了之后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残酷的印象，对于陕西的人民发生了不可名状的怜悯。自从看了万里这本游记，这个印象更深切了，怜悯的同情更油然而不能自止了。我们住在都会中的人，过惯了舒服的日子，偶然有几件小抢案，已经轰动全城，看作大事，军阀们的发财之心虽热，究竟还不好意思在中外人士观瞻的地方勒种罌粟（说也惭愧，我还没有见过罌粟花），骗得我们相信世界是不十分残酷的，对于他人的苦况总是漠然。但是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作这样的自了汉呢？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形则已，现在既由旅行者的报告而知道了，若再不想一想将来应该怎么办才好，那么，我们真是太对不起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了！

万里此行，摄影极多，大约有三百帧以上。其中写沙漠的旷远，雕刻壁画的精妍，物质生活的简陋，都使我们没有远行的人仿佛身入其境。只因受制于经济力，未能刊出，成为极大的遗憾。希望他将来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兼以读者的要求，另刊成一册，

使得人家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可以得到实物上的印证。走过的路线和停宿的地点,也希望他补画一幅精密的地图。

最后,我敬为万里祷祝:祷祝他的旅行的天才能够尽量地发展,祷祝他的研究的事业能够专心向佛教艺术方面致力,祷祝他的兴趣能在中国的历史上开出一个旅行的新局面,祷祝他的作品能为将来的游记开出一个新方向,集合考古学、民俗学、地理学、言语学等等材料于一书,记出从来在书本上见不到的东西!

十五年七月六日 顾颉刚

自叙

十四年春,因福开森君之介绍,华尔纳及翟荫二君之厚意相助,得与美国考古队诸君同赴敦煌,为吾校研究所国学门并考古学会第一次之实地调查。此在余个人,十数年来所梦寐以求之西北旅行,今竟于三日内决之,其愉快为何如耶!会豫西胡、刘将战,汴、洛交通梗阻,潼关附近又多匪患,家庭亲友间,以往年登嵩岳,少林寺之恐怖,犹能令人闻之色变。五台归来,适遇直、皖战事,淹滞于定州保定间者几一周,与家人音信隔绝者近月,因此遂有极力尼余西行者。余卒毅然之不顾,无他,纵游无度,固余之天性也。自此而晋,而秦,而陇,而豫,经霍岳、中条之麓,渡河进潼关,望华山莲花峰,过未央遗址,访泾州北魏南石窟寺,登陇坂,升六盘,揽胜五泉,出嘉峪关,涉流沙而至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往返六月余,为程达万余里。深以未获一游吐鲁番,横渡天山为憾!既归京,同好中翮余述西行所见,亦有囑以考古调查之结果著为论文而公表之者。噫!余岂其人耶!余习医,未尝一研究考古学,其行也,纵游无度之天性驱使然耳。复有何说耶?顾车辙所经,马足所涉,耳目所闻见,亦有一二,足资异日考古家之参证者,试为述之如

次：

(一)石窟造像,其见于记载者,仅陕西邠州之大佛寺。泾州王母宫之北魏石窟,前年始为华尔纳君所发见。南石窟寺余以先得碑石拓片故,竟于泾州王家沟附近访觅得之。于是而罗汉洞,而丈八寺,先后见石窟焉。最近友人萧君和生自甘省来,告我天水往平凉道中,石窟颇多,造像亦至美,疑系北魏作品。闻镇原、中卫境内,均有石窟,其他散在者恐复不少,此考古家所应注意者其一。

(二)震灾后出土陶器,品目极繁。安特生博士尽量搜罗,去岁成《甘肃考古记》一册,断为自纪元前一七〇〇至三五〇〇年间,石铜器时代过渡期并紫铜器青铜器时代初期之作品。惟京友中颇多怀疑其说者,余以为是不难解决也,惟发掘耳。此考古家所应注意者其二。

(三)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包含史料,至为广漠。(参观《千佛洞三日所得之印象》)非竭多数人之才力,穷长时间之研究不为功。此考古家所应注意者其三。

(四)壁画除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外,尚有他处存留否耶?是亦一疑问也。赤金、红山口,仿佛为从前石窟所遗。瓜州口,发见残画一处。布隆吉之东千佛洞,余于途经三道沟时,得诸传闻者,后果知有西夏洞窟也。类此采访,或可更有发见。此考古家所应注意者其四。

(五)阳关在敦煌西南一百四十里,已无遗迹可寻。玉门关则说者不一,或谓即小方盘(敦煌西一百七十里),或谓在其西三十里之西湖,系古玉门遗址。余以为苟能发掘,必可解此疑团。此考古家所应注意者其五。

(六)斯坦因氏于敦煌苏勒河之南,沿长城烽墩遗址,掘得木简,有助于历史上之考证者至多。此仅就一局部而言,其成绩已若是。苟能假以岁月,充分调查之后,继以发掘,所得必较斯坦因氏为丰富。董理而考核之,有关史学,宁有涯量!此考古家所应注意

者其六。

(七)甘省汉唐古城之埋于地中者,约有百数十处。此考古家所应注意者其七。

此外番夷之风俗习惯,河州之歌谣小曲,与夫各地方言之异同,均须待专门家之研究,始能探其原委,发其底蕴,为有系统之叙述。余岂其人耶!今于付印日记之际,附述我见,就正通人,不值识者齿冷也。途中所摄影片,以制版费时,不克附印,另刊专集,请俟异日。

西行日记

十四,二,十五,星期,早起即往第三院,希渊、兼士、叔平三先生已先在,会谈颇久。十时,国学门研究所欢送会开会,到会者有沈兼士、马叔平、袁希渊、胡适之、叶浩吾、林玉堂、陈援庵、张凤举、沈尹默、黄仲良、李玄伯、徐旭生、常维钧、容希白、朱骝先、钱稻孙诸先生。先由叔平先生致欢送辞,次为余之答辞。兼士、适之、希渊、玉堂、浩吾诸先生均有赠言。会散,请吴郁周先生合摄一影,复在国学门,与郁周、隅卿、梅庄、文玉诸君商谈清室善后委员会摄影一部分事务。

十二时,赴公园水榭南社雅集。二时,往门框胡同及琉璃厂各处取件。五时三十分,赴大陆应凤鸣、乐之、伯夔、梅庄诸老友之约。晤赵君,谈甘肃情形甚详,并为介绍兰州熟友多人。九时,归寓,整理行装。十时,郁周来,同往东四头条晤华尔讷、时达、汤姆生三君,悉行期已改明晚。十时,遂辞出,回寓。

十六,午前十时,往平大,晤红叶,商量所任学科事。十一时,到三院,取得西行参考书数种;悉兼士、叔平、仲良、希白诸公今早均到车站相送,可感也。晤仲良,邀至森隆午饭。二时,往访子元,晤之,并至夷师处告辞。六时三十分,赶回寓所,收拾行装,即往头条,而同行诸人已出发矣,遂急赴西车站,晤华尔讷、翟荫、汤姆生、时达、溥爱伦、石天生诸人,及王君近仁。兼士、叔平、维钧、仲良诸先生均来站相送,并晤振玉。十时启行,过卢沟桥,风大作,车行顿缓,予与翟荫君同寓一房,夜半过保定,风声犹未息也。

十七,昨晚以风大,遂致误点;八时三十分到石家庄,即赶乘九

时十二分之正、太车。六时四十分，到太原。车中无聊，披阅《河海昆仑录》，为之神往。进城，以正大已无余屋，改寓金谷香。晚饭后，发信数封，即睡。

十八，十时，同翟、王二君赴督军署，见伯川督办于客室。阎御黑布绵袍，已破旧，状类乡曲；然两目炯炯，神采焕发，谈论极和平真挚。约三十分间，始兴辞而出。下午，去晤叔平乡人徐旭瀛先生于高等法院，徐固山西高等审判厅长也。归寓未久，徐遣陆君来谈长途汽车事。陆君，予乡人，来此已四年，并悉乡先辈王翼海先生尚在太原，任高等检察长已十余年矣。晚饭，寓中仍备中菜，石、时诸君以笋炒羊肉片，洋葱炒牛肉丝，满堆碗上，复益以莲子羹，鸡片汤数匙，其味可想。

十九，早起，拟赴傅公祠，一见班禅丰采，翟荫诸君愿同往，遂偕行焉。先在客室，由翻译某持片通报，约候半小时乃得见于楼上经室。班禅衣黄缎袍褂，穿黄缎靴，中坐。余辈向之一鞠躬，彼亦答礼，状极和蔼。翻译而班禅立，译时常屈其身以表恭敬。班禅则时时点头微笑，最后各赠一哈达，同行咸欣然受之，复一鞠躬而退。院中存积行李甚多，支帐篷十余，喇嘛数十蹠躩其间。闻数日后班禅须赴京面合肥；随晤旧友李君即代表蒙藏院来欢迎者也，并识道尹孙君，系直隶玉田人。

出傅公祠，同至学兵团访荣旅长，适因公出未晤，遂归寓午饭。下午，徐先生来寓，始悉汽车大者仅有一辆，自太原赴运城须洋七百九十元，亦只能尽装行李。翟、王二君复至学兵团看车，余赴桥头街摄取市招数片归寓，就旅馆仆役抄录太原歌谣数首。徐厅长遣陆君来，后同翟、王二君去晤山西大学王君接洽汽车事，一如徐厅长之所告。王君夫人为美国人，亦出见；女公子二，一八九岁，一十一二，均明秀可爱。五时，回寓，写信，饭后，阅《河海昆仑录》，几尽一卷。

二〇，早起，黄沙蔽日，狂风怒号。翟、王二君去至南城，接洽

大车，余赴文庙参观教育图书馆博物馆。时适午饭，停止阅览，乃先就外观记其大概焉。棂星门内南屋，东为阅报室，西为阅书室。东部自南至北为动物标本室、儿童玩具室、菲列滨各种出产陈列室、植物标本室、矿物标本室，西部为图书室、生理标本室、事务室及藏书室。北面中央大成门已改为教育成绩及土产陈列室，东侧尚无布置，西侧为来宾接待室、经理室。大成门两侧，均有通道。自此往北，南廊陈列佛像十余，有一铜弥勒像，标为六朝铸，旧在三皇庙，前年始移陈于此云。东配殿为妇女及儿童阅书报室，西殿南部为古物陈列室，北部为藏书室。古物陈列室已封闭，暂停展览，予投刺谒主事者，幸得许可，特派庶务侯君为导。先参观生理标本室，计有玻璃柜十一，陈列品除各种脏器标本外，复有蝇害说明，胎儿发育顺序，绦虫寄生状态等模型，皆购自日本山越工作所者。次至古物陈列室，有汉夔纹鼎一，出土于离安邑一里之古城中，地系汉韩信虏魏豹处，故亦名魏豹城。此鼎出土后，为河东道尹所得，即送馆陈列。北面玻璃柜中出土宋瓷器二十余件，有黑瓷枕、岗瓦罐、茶色罐、白瓷盖罐、白瓷黑花盖罐等，酷似巨鹿出土之物，询之侯君，始悉去年榆次开天一渠时所得。并有六朝造像四石，其一约高尺许，上方刻有小飞天二。此外有开元七年、咸亨二年、武定元年、垂拱元年、永平元年、永平三年、建义三年等造像，间有精者。崇善寺捐赠洪武年造铜瓶八，铜香炉三，铜狮二，及圣母庙捐赠崇祯二年造铜塔一座，均陈列于此，蟠虺钟一，围径约四尺余，极完好，与新郑出土者相似。据侯君云，系商器，昔在荻河县后土祠中，民国十年省长移文飭县知事解省送馆。闻尚有数钟，现仍存在荻河，并云，南廊北齐天保十年四面造像一石，民国十二年介休史村所出，曾经涉讼，去年始移送来馆。参观毕，憩息于来宾接待室，与侯君杂谈馆事。侯君云馆长为政务厅长及教育厅长兼任。馆长下有经理三人，一正二副，管理数人，庶务、会计、文牍各一人，指示员、司书、书记、收发各若干人，经费每月购书费一百四十元，杂支

一百元，薪水二百元。图书编目方法，仿《张氏书目答问》体例。现有藏书，计中文十二万余册，西文二千余册，英文为多，日文九千余册。创办年月，为八年十月。最后侯君以山西圣庙教育图书博物馆简章及一览表见赐。并赠大学国学门山西图书馆藏石四种拓片一份：（一）魏延和二年郭令妃造像；（二）隋《华严经》摩崖残石；（三）唐神龙二年刘仁墓志铭；（四）唐太和四年女道士能师铭志。遂辞侯君出馆归寓。饭后，驱车赴傅公祠，观碑林。嵌于壁者，有《宝贤堂集古法帖》及傅青主先生所书帖，石刻之可贵者，有魏故譙那太守□恪碑，武定八年及大统十三年四面造像各一石，约高五尺，天平元年程哲碑，碑阴造像一躯，做趺坐式，外衣蔽台座，两侧及下方均有浅雕。保定二年祁令和造等身像一躯，像座四周有题铭。观毕，为班禅随从邀去寓所闲谈，室中三面连炕，中置方桌，喇嘛四正在斗牌，视之即三十二张牌也，惟数目较多，斗法亦奇。桌前火炉一，炭盆两，其不加入战团者，则围火取暖，喇嘛中亦有甘肃人，生长后藏，能操京话。晤班禅佛前《裁康鉴萨哲布夏》（官名）宠把巴桑，赠我名片一，并亲书藏文其上，可留作纪念也。后为喇嘛数人摄一片，复在帐篷中略坐片刻，辞出。方至省议会前，一喇嘛手提油瓶，自街市购物归，邀余立谈，然不能作汉语，仅能说“红花”二字，窥其意，似询余需红花否也。却之，遂登车，回旅社，取衣件浴于华园，甚适。归寓，得车站来电，悉先发行李已到站，启行有期，为之欣然。

二一，午前赴邮局寄信件毕，折入帽儿巷，首饰店荟聚于此，经鼓楼街，杂摄市招数片。太原药铺门前中央大都悬一木制涂金葫芦，其茶叶店杂货店海味铺之出卖元宵者，必悬一多角形之纸灯，上书“桂花元宵”四字。至柳巷北口，遇军队约三营，据闻开赴晋南运城方面者，阎亦思逐鹿中原，放弃十年来之门罗主义欤？至中华书局识金君，悉吴县同乡之在太原者有数十人，惜匆匆作客，未能一一握谈耳。遂在桥头街杂购零星物件数种归寓。

饭后略事休息，步行至开化市场游览一周，即赴新化舞台观剧。太原剧场现时演唱者有二，一为二簧班坤角，此则本地梆子男班也。楼上包厢散座为甲等，每座四角三分，戏票较北京染票稍小，上贴一分印花。池子中间为乙等，两廊为丙等，兵士居十之八九。时台上田淑贞《祭江》将毕，田淑凤全本《双玉镯》继之。拾镯时旦角想系灵卿，仅十二三岁，可造材也，刘媒婆为自来香微嫌过火。梆班演剧，大率如此。郡邬县十二红嗓已干枯，做派类刘景然，饰刘瑾者，甚平庸。四时十五分，即散戏，归寓休息。回忆郭宝臣演剧广和楼时，余方习乱弹，以为秦腔戏不值一顾，后荣儿在同乐，夔公极称之，予始赴秦腔班观剧，但终嫌管弦嘈杂，梆鼓喧聒，是以琴去楼空，（同乐停演甚久）兴尽意消，歌台舞榭间不复见予踪迹者久矣。今来太原，忽已数日，他乡作客，顿感岑寂，欲藉一时声歌之乐，稍破数日离群之苦，始只身赴剧场枯坐两小时之久，然所赢得者，惟此连绵不已之旧感而已，噫！

七时，赴东校尉营，应旭瀛厅长之招，在座均系高等审检厅推检，晤翼海乡丈，不相见已十六年矣。是晚，主人设筵甚丰，并推予为首座，席间，又殷勤劝酒，盛情可感。十时，撤席，客均散去，主人复坚留予在内室闲谈，直至十一时，始归旅社。悉翼老来访，余来太原已数日，乡老前尚未专诚拜谒，今于旭瀛厅长席上晤之，已觉慚悚无地，又蒙辱临，惶恐万状，然前辈典型，足资后生矜式已。

二二，早七时，赴东校尉营及典膳所翼丈处辞行。八时到开化寺街三合店，行李已装就，即驱车就道。三十里，小店村尖，五十里，徐沟北关宿，是日予步行二十里。

予等同行七人，仆役三人，晋谷香住五晚，膳宿赏号及另垫，共洋一百三十六元。三合店车价，大车每辆六十三元，计三辆；双套车八辆，每辆三十一元。自太原赴潼关，预计日程十三日可到。

出南门后，一路平原；惟车道以旱久，积土甚厚，故车过尘起逾丈，迷目触鼻，令人难堪。在小店村尖时，时达君坐小桌上假寐，稍

不慎，遽扑于地，伤及颊部，一时颜面苍白，现失神状态。石天生君，外科医生也，为之处置，良久始愈。处处经意，步步留心，此八字真是旅行要诀。

二三，七时起程，二十里尧城，有尧庙，庙前一坊，曰“古帝尧都”，二十里，贾令镇，过此，道多细沙，车行颇缓。如是者又二十里，祁县西关尖，尖后五十里平遥县，进东门至西街宿，时已深夜，是日步行廿五里。所过市镇铺户，间有画杂剧于外壁者。贾令、祁县则斋供太阳甚盛，盖是日为阴历二月初一，山西风俗然也。供牌上刻“供奉太阳老爷之神位”，其前果匣一，茶碗三，供菜供饭供面食均五，鲜果一盘，干果倍之，茶食面食均四大盘，其前复接一方桌，有香炉蜡台花插等物。最前香斗一，着地，设一小几，两侧藤篓，插以翠柏，上覆白幕。其前张一红呢横披，剪黑绒大字曰“报神德”。两侧挂以纸灯，斋供之陈设大率如是。

二四，早起启行，三十五里，过张兰镇。市廛稠密，晋南一雄镇也。与郝家堡紧接，中连石桥。四十五里，介休县，城东北二里有郭有道祠，祠之前一汉槐，大可数围。旁有一《三贤故里之碑》，三贤者，介之推、郭有道、文彦博也。过关城，尖于西关，同行者均愿暂歇，遂宿焉，是日步行二十里，饭后已四时，即进城游览一周而出。至北门外胜因院，院有史公塔，明时所建。回至西关火神庙，正在演剧。庙前悬一木牌曰：“民国十四年二月初一二三四日，敬献马王老爷尊前盘炷，演戏四天，阖社同叩。”台前粘一红纸，书伶名十余，今照录之：“汾阳西南乡叔和村乐意园”，大花脸“滚地雷小狮刘黑”，正红“满天红”，二红“十七红”，正旦“万人香”，正生“乐意生”，小旦“自来酥”，三花脸“乾翠丑”，老旦“自来旦”，坤角“贺柱兰”。时台上正演《四郎探母》，已至见四夫人一场，余直看到交令完。歌唱音节与梆子相似，亦用梆胡，惟不急促，大锣气味似高腔，实为本地梆子一之种，此间人名之为乱弹，从此“乱弹”二字我又得一新诠释矣。

二五,八时发介休,二十里义棠镇,三十里两度镇尖,三十里灵石南关宿,是日步行五十里。

昨今两日途中所见可记者,如某村国民学校之门联,“穿军衣,戴制帽,文明气象;习经学,授算术,大有儒风”,至堪喷饭。张兰镇西关铜烟管铺有七八家,市招即挂一二三尺锡制之烟管,此与靴袜店之挂一木靴袜同一用意。棺材铺则在门之左端悬一约长二尺余之木片棺材市招,此在他处所未见者。客店饭铺高挂“招篱”(捞面用)于门外,所以表明有面食可供客也。

午前大风。颇寒,尘土飞扬,几不能张目。离介休约十里即沿山南行,汾水夹流于两山间,两渡镇南有石桥跨汾水上,东山麓高等小学校在焉。一小学生甚俊秀,询其姓名为陈士聪。自此趋灵石,车路随山曲折,极其幸确,余与石天生君舍车,沿汾河河床步行,较为安适。灵石县北约半里,为水头镇有英雄祠,悬“英雄卓识”扁额,相传李卫公遇虬髯于此。县城极小,繁盛尚不及一镇,客店亦甚狭隘。凭几曲身,补录日记,至十一时始睡。

二六,七时发灵石,以韩侯岭山石倾圯塞路,改就汾河河床行,致未能一谒淮阴侯祠,深以为憾。《度陇记》云,祠壁石刻甚多,曾记杨霖川、吴逢圣七律各一首。予最爱杨诗“亭长八年成帝业,将军三族弃人问”,吴诗“十年成败一知己,七尺存亡两妇人”两联。

自过介休后,即见汾河夹山南流,汽车路沿东岸山麓修筑,路极平坦,二十里内,经张家庄、梁家疙瘩、许家店三处,过此便无村落矣。又四十里,始至南关,尖于汾河西岸之道梅村外,饭铺就河床搭一席棚为之;车则穿行桥孔,盖久旱之后已无滴水,仅沙石与车辙耳。又四十里,霍县北关宿,时已昏夜,是日步行七十里。

霍山即太岳,隋开皇十四年诏封中镇,历代因之,在县东南三十里。北接灵石,南连赵城,绵亘几百数十里,中镇祠即在山麓。惜行色匆匆,不及登临矣。

二七,七时,发霍县,进北门,出南门。五十里赵城县城内尖,

四十里洪洞北门内宿，是日步行二十五里。出霍县南门五里，为台底镇。两山夹峙，狭处仅容一车。如两车相遇，其一必先在此宽处让道，彼此始得过。此种情景，或与函谷道中相仿佛耶？如是约十五里，出口，大车道与汽车道相并驰者约里许，后者复绕山坡，向东南，沿汾河行。汾河自过霍县后，以受霍泉故，不复如昨日之无滴水矣。余得一回程之人力车，以铜元六十枚，自辛集雇至赵城。沿途风景，至堪悦目。飞鸟回翔天空，汾河随山蜿蜒似曲带，远山迷离飘渺，若隐若现，固极好一幅南宗山水画也。茶尖于离城十五里之石塘村，村店以小米汤炸油条饷客，甚适口。溥爱伦、石天生、汤姆生三君亦相继来憩于此。店主年逾六旬，欣然操弦，少主人歌韩湘子龙虎山修行之曲，惜词句冗长，不及录出，即匆匆就道。赵城北关外，有《赵上卿蔺相如故里之碑》一。全城极小，二十分钟可以游览一周。予于石塘村茶尖时已知赵城有木板小曲及剧本可购，即趋赴南街书肆，果获《破温县》、《洪羊洞》（徐杨叮本）、《三上轿》（同意堂本）、《三娘教子》、《单刀赴会》（同义堂本）、《断桥》、《三疑》、《绣白鹅》、《绣八仙》、《当皮袄》（荣意堂本）、《审玉堂春》、《人之初借钱》、《寡妇做春梦》（洪洞同意堂本）、《伯牙奏琴》、《李渊辞朝》、《二进宫》、《血手印》、《女儿经》、《十月怀胎》、《二姐做梦》、《放牛》（洪洞同义堂本）、《骂金殿》（洪洞荣意堂本）、《药王卷》（洪洞荣仪堂本）、《马芳困城》（无刻处）等二十五种，有单人独唱者，有类于评话者，有为迷糊调或乱弹梆子之能爨演登场者。所谓迷糊调者，乐器亦用梆胡，辅以三弦，大半为男女言情之剧，盛行于平阳、闻喜间。其性质与北京徐狗子之化装小戏相类似。并于纸铺得来自曲沃之门神纸数种，预备分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以备参考。

离洪洞县约十五里，有国士桥，牌楼题曰“豫让遗迹”。晚饭后，挽店役为导，往东街购曲本。时已深夜，铺户悉闭，觅同意、同义二肆不得，乃至荣仪堂。叩至再三，始启门，购得《醒世戒烟文》、

《崔连下河南》(同意堂本)、《回贼破泾汤》(同义堂本)、《放风筝》(荣意堂本)、《鞭打芦花》、《三字经告状》、《三字经讨账》、《彦贵卖水》、《吃洋烟全回》、《大破逆贼》、《牧羊卷》(洪洞同意堂本)、《双官诰》、《香山还愿》、《少华山》、《访苏州》、《下河东》、《起解刘彪》、《双灵牌》、《贤王讲情》、《爱吃烟》、《庆顶珠》、《宋江杀院》、《五郎出家》、《康熙游陕西》、《诸葛吊孝》、《走雪山》、《春秋配》、《捡柴》、《梁山杯》(洪洞同仪堂本)、《伍员逃国》、《雪梅吊孝》(洪洞同仪堂本)、《走南阳》、《耍陪送》、《秦琼起解》、《四贝上工》、《万人迷》(荣兴书社本)、《刘玉郎思家》(无刻处)、《火焰驹》(广兴德本)等三十七种。其中仅《火焰驹》一本为河南怀庆府书肆所刻。

二八,平明即起,发洪洞,五十里临汾尖,四十里赵曲镇宿,终日兀坐车中,殊觉闷损。

洪洞南门外约一里,为安乐坂,有叔向食邑及师旷故里两碑。临汾昔为府治,然城中极荒凉,仅东街市肆稍多,县公署,第六师范学校在焉。予在东街,购得曲本《沙陀国》、《渭水河》(绛州文兴堂本)、《梅降雪》、《汾河打雁》、《放风筝》、《探情郎》、《三老婆打灶》(绛州同义书局本)等七种。饭后就道,出南门,门楼有“陶唐故都”匾额。十里,见鸿雁数行自北而南。车中岑寂,不觉冥想入梦。二十里,大韩铺,仅有矮屋两所,有韩康子食邑碑。将至赵曲,行土峡中,适遇来车,不及让道,纷扰半小时,始得通过。赵曲属襄陵,离县治二十里,一小镇也。翟荫君以连日赶道甚疲惫,嘱明日十时启行,得饱睡数小时矣。

三,一,十一时发赵曲,四十里蒙城尖,五十里侯马驿宿,是日步行三十五里。离赵曲二十里为史村,有县佐公署,邮寄代办所等。蒙城属曲沃,繁盛远不如史村;其南二十里为高显镇,比到侯马驿已三更时矣。

二,早发侯马四十里问店尖,又四十里闻喜宿,是日步行二十里。

出侯马西门，往西南十五里，入山，道极崎岖，所谓隘口是也。中途金沟桥，桥石高出于道路者约五寸余，东侧直下土坡，西侧稍倾斜，行李车在前，以所载过重，不得过，遂覆于斜坡。同行者均下车相助推挽，费时颇久。其地有光明洞，昔有寺院，今已无一椽矣。出山口，离问店约十里，为兰德镇，即梨园村，《度陇记》谓唐太平乐府教坊故址。

晚八时，到闻喜，寓西关之三合店，予即进城，拟购曲本，不得，仅获绛州所印之门神纸十种，审之，与曲沃印件迥异，财马（约二寸见方之画片，新正黏贴神龕两侧）春牛（画一牛，上附简单之月历）此间已不复用，可见此区区新岁所用之印片亦随地而异也。方言亦显有不同，“书”念为“夫”，“春”读若“喷”。据问店饭铺伙友云，旧治霍州、平阳、绛州等属方言成一系统，与太原府属迥异，潞安则差别更甚，姑记之，以资研究方言者之参证。

三，十时始发闻喜，遥望中条，山色苍翠可爱。四十里，涑水镇，水头其俗称也，属夏县，离县治三十里。翟荫君以同行数日来饱经风尘，决在此勾留一宵，藉资休养。于是支帆布安乐椅，开留声机，歌意大利某名伶之曲。厨役备食，鸡也，肉也，水菜也，可可也，居然于尘土生活中求得半日闲之安乐，亦足稍慰行旅之苦。

四，平明发涑水镇，五十里北相镇尖，三十里牛杜镇宿，是日步行仅十里。

离涑水十里，为岔口，南往运城，西赴蒲州。北相镇，属安邑，西距县治三十里，繁庶过涑水。杂货铺之卖糕点者，即以茶食一包为市招。居户门外高悬草束者甚多，编制纵横各五束，或六束，复以二束相向交互，交叉点上有一贴红纸之小木片，以泥土黏之，上书“长命百岁”四字，上方草束成一三角形，四周插小纸旗十数面，并以红纸束之。余见而异焉，爰询诸市人，据云，一家添丁则戚属故交于第三日即为之张草束于外墙，名曰编草。主人必以酒肉相享，犹京俗之喜三也。此风不独涑水附近为然，即曲沃所属亦盛行

之，此则据赶车小刘所述如此云。当时并见有娶亲者，新郎坐骡车先导，帽披红绸，车帘上方亦缀以红绸一长条，上有“定良缘”三字，后随乐手及红布轿一乘，即新妇所坐者也。傍晚到牛杜镇，牛杜属猗氏，北离县治仅八里。是日关帝庙适有会集演剧，观者塞途，其盛况远胜介休，而所居客店又适在戏台后院，当热闹之冲。并有唱秧歌小儿一群，载歌载舞，活泼可爱；所用乐器，有大小锣钹摇鼓等种种，戏台上有匾额二，一曰“活画图”，一曰“鬻衍楼”，予以台前观众拥挤甚，乃至后台，晤班主某甲。据云，该班有五十余人，为本地乱弹班之一，兼演迷糊，此次在牛杜庙戏，计四日，第一、二日在关帝庙，第三、四日在火神庙，今日其第一日也，计此四日戏资约五十余元云云。后以彼须登场，饰《辕门斩子》之余太君，不及详谈。余即在下场门前观剧，所演《辕门斩子》，与皮簧秦腔均有差别。第一场杨宗保上念白唱下，第二场杨延昭缓步升帐，见宗保时出帐疾批其颊，并举足蹴之，宗保被缚辕门，面向下场门坐。余太君出场，见宗保则与之对坐对唱，唱毕进帐，杨延昭以上方宝剑交焦赞高举之，太君即下跪，杨延昭亦下冠相向跪唱。其见八贤王一场，以用晚饭故未及观其究竟。饭毕，复去，穆桂英正在场上，与杨延昭纠缠颇久，释放时，余太君、八贤王俱登场，八贤王上坐，宗保先下，桂英、太君继之，延昭与八贤王同下，大略情形如此。第二出《藏舟》，饰旦角者年约二十左右，该班之台柱子也，然嗓已喑哑，细音已不成声，阳调则粗阔干沙，了无可取。饰小生者扮相与故伶李鑫甫有二三分似处，念白酷肖参议院陕西议员某甲口吻，土气甚足。第三出《浣池会》，上场即回旅次。终以锣鼓喧嚷过甚，不能成寐，颇觉其苦。

五日，七时发牛杜，四十里樊桥驿尖，三十二里白堡头宿。是日在车中阅《河海昆仑录》，以解岑寂。昨今两日所经均系平原，麦秀青青，时见鸿雁数行飞过，饶有诗趣。村肆则黏贴门神纸者较少，大半以五彩纸条上书吉祥语连串悬于屋内。樊桥驿，属临晋，

县治在西北十五里。白堡头镇东门额所书，实为“古东信吕镇”，属永济。

六，八时发白堡头，三十五里吕芝镇尖，三十二里，韩杨镇宿。车中阅《河海昆仑录》及《新疆游记》。尖时，见官厅布告两纸，今录其原文如下：

(一)山西陆军第八旅旅长丰为布告事，照得征募乡军曾由军署令飭各县遵办，并颁发布告在案。兹奉督军电开，以本旅应募乡军，亟宜乘此农暇，径向各县开始征募，以期早日训练等因奉此，查征募乡军，系为人民增长军事智识，镇慑地方，以及生命财产庐墓田地，皆可自卫保护，并可收长治久安之效，法良意美，莫过于此。除函达县公署分令各区照办外，合行布告，凡有身家职业以及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壮丁，愿充此项在乡军人者，速赴该管区公所报名，由县转报本旅，以俟派员检验；一经合格即归本旅训练连教育。每名月给饷铜元七吊五百文，以示体恤。候届三个月期满，仍令归乡，各安生业。幸勿失此机会，意存观望！仰各周知，毋违！此布。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实贴吕芝街。

(二)永济县知事赵示：寡妇坐堂招夫，最为恶俗。嗣后寡妇如不能守节，只准再醮，不准招夫；违则从重惩办。房族及村长闾长不为禁止，一并处分，特示。

尖后，十五里坡底镇，亦名寺坡底，以坡上有普救寺故，蒲州即在其西五里。将近坡底镇时，在土峡中约里许，过此仍复坦途。离韩阳约十里，有盐池，野鸭甚多。中条、历山峭立云表，停车凝视，为之神往。韩阳有花行十余家，市肆尚盛，即投宿乾盛客店。明早行四十里，风陵渡便可渡河进关矣。

七，未明即起，六时启程，三十五里匡河镇，十里赵村，四里风陵渡，过河，宿潼关，是日步行十里。自太原启程以来，费时十三又半日，计行一千一百〇八里，步行计二百七十五里。

出韩阳镇，柿树夹道，蔚然成林。主人以之酿酒及醋，极著名。

匡河一带，西侧地极低洼，是即盐滩。自此趋赵村，须过一坡，行土峡中，尘沙眯目。风陵渡沙岸，深几没胫，极难行。对岸，潼关巍然在望；秦岭诸山屹立天际，若屏障；黄河则屈曲东流，诚哉为天堑也！河面阔约半里，三十分间即登彼岸。翟荫君及王君去寻客店，觅脚夫起运行李；余辈候之。去约两小时，尚未回，只见运输军队之船陆续东下往陕州者十余艘，其尚在运输中者，犹有数十也。三时，翟荫君来告，全城旅店均为军队占去，特由县长介绍一乾丰转运行暂住。行李中之笨重者，另雇小船靠近东关，以便搬运；其轻者由脚夫负之，先到寓所，余遂与溥爱伦君各挈零星物件往。

比至东关市街，则蹀躞往来于全市者，均镇嵩军也，其步队马队之陆续来者尚众，乾丰行仅能匀出小房间居住，草草铺陈毕，出至市街闲步。贴邻有一小杂货铺，炉灶上公然煎鸦片烟；询之，月纳“罚款”拾圆者也。据云：东关如此者有三四家，城内则有四五十家左右。铺号之大者，月纳罚款至二百元，若彼每日门市售数两，故罚款只有此数。烟之来源，在营业小者，向大铺匀之，大者则自向西省购运。呜呼！潼关现象竟如斯耶？此非身历其境者不能知。每一小苇叶，售铜元拾枚；一钱板上，约有百余摊，予亦购一小叶，藏之。铺主笑谓余曰：“汝亦吸烟耶？”余笑应之。彼亦无暇再问余，盖照呼买卖，固较闲谈为重要也。余所见来购者，十之八九为镇嵩军之兵士；其一马弁，出牛角小匣，购一元匆匆去，谓即登船开拔云。一状似输送卒者，穿破旧之灰布军服，污黄腿布，黑帆布旧鞋，腰间悬一灰布袋，一水壶，头戴玄色瓜皮小帽，面色瘦黄，一望而知为黑籍中人，竟助铺主扇风箱，此则欲讨小便宜者也。间有兵士来购烟卷或纸者，铺主恒推却之使赴别处；惟有来购此“福寿膏”者，则欢迎之不暇。小杂货铺也？实一“冷笼清膏”之烟馆耳！

镇嵩军中兵士，有年仅十六七岁者，浑浑沌沌，亦居然过此生活。嗟夫！此幼年军队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马队中，有仍穿青布制服者；另有一人御寻常毛呢外氅，毛绳帽，而亦背负一枪。

此为何种军队耶？余向兵士刺探前方消息，欲解十余日来沉闷之苦，始悉刘督已出关旬日，现居洛阳。镇嵩军全部开回河南，曾在灊桥、渭南与陕军冲突两次，代督为吴新田，所闻仅此而已。

晚饭啜白米稀饭两碗，佐以潼关酱菜，甚安适。饭后，补录日记。叩门者约二十分钟必有一次，均为军队之来要求寄宿者。旅店后院平台下即河岸，封船颇多，亦复喧嚷不已。汴、洛风云，京中想早已喧传，余则自太原启程后，每日于尘土中讨生活，政局消息无由闻知；况山西表面固极安靖，乡村旅居欲求一新闻纸不可得，固不啻一世外桃源也。孰知渡河以后，情况剧变如斯？回首风陵渡，不胜“天上人间”之感！

箱件明日或可设法运来，今晚须有人在彼，翟荫、石天生及王君赴河岸露宿看守。因此，留在旅店中者，为溥爱伦、汤姆生、时达及余四人，并仆役三名。睡至十二时，掌柜某来叩余门，急披衣起，某附耳曰：“镇嵩军变矣！隔院掌柜某已为一兵士所殴，越院来此报告云。”余即往告溥爱伦诸君，未几，果有人来叩门，甚急；不之应，叩门者恨恨而去。是晚月明如画，店中伙友及余等均在院中窃窃私语，不敢燃蜡。如是静坐约一小时余，无动静始各归房。余初起床时冷极，至此脑部充血，辗转不能成寐，已过十余日内，亦失眠数次；拟俟到潼关后，攒程赴临潼，浴于华清池，换衣理发，当可得一酣睡。今西行，遍地荆棘，殊可恨也！

八，早起，至河岸，运输军队船只仅余数艘，大多数悉于夜半下驶矣，市街亦较平静。翟荫君及王君往县公署接洽车辆，余在旅社补录日记。一时翟荫君归，悉县长极力设法，得大车一，轿车五，赶即收拾行囊，相助装车。王君极干练，煞费苦心。三时出发，进潼关东门，门额为“屏藩两陕”，门甬极深，门楼两重，整齐宏伟。至西街县署前，以所有车辆均已满装，不能坐人，复雇长途洋车七乘，（每乘洋五元）相将出西门；大车以负载重，且又疲骡瘦马，遂落后，洋车先行。离关仅三里，忽迎面来穿灰色布制服而无领章肩章之

类似兵士甲乙二人，喝止车，声称以急于东行，盘川不敷，拟假若干，翟荫君询其数，甲谓一二十元，相持约五分间，乙趋甲速行，甲犹迟迟，汤姆生、溥爱伦二君下车去招呼落后之车辆，乙以为回潼关也，遂挽甲去，其实贾仆在余等洋车之前行，甲乙已先搜索之矣，搜索未毕，余等适至，遂舍仆而趋止余等之车。甲袖中藏一刺刀，乙徒手，去离潼关仅三里，行路之难已如此，真可虑也！自此余等所乘之车，势非与负重车辆同行不可；而负重之车，又不良于行，赶车者鞭挞之，骡马一步一喘，惨不忍睹。五里，新满城，为前清驻防军所在。五里，吊桥，即杨桥铺。将至吊桥时，有汉太尉杨震祠墓，并有《关西夫子碑》。翟荫君以车行缓，即停宿于此，再想补救方法。潼关城中，关于税捐机关，就余所见者，有棉花收捐公所，车捐局，百货统捐局，厘金分所，常关，畜屠斗捐杂税局等等；即在吊桥，亦有税捐机关数处。军队来查夜，旅店女主人手执鸦片烟灯引导，对屋为洋车夫所寓，数人聚炕上，一灯相对，查夜者固视若无睹也。

九，早起发吊桥，二十五里太华镇，五里华阴县，三十里，敷水铺尖，二十里柳子里宿，是日步行十里。

今日骡车七乘，每辆洋六元；大车五乘，每辆洋八元，遂将洋车辞去。出发后，昨日所落后之车仍不能行，复匀出若干件，驱之；不及一里又落后，不得已将余件悉分载各车遣之去。共十一车衔接而行，溥爱伦君前导，石天生君殿后，汤姆生、时达及予为中间，翟荫君并王君指挥一切，部勒井然，所以防意外也。一路均坦途，麦秀油碧，柳芽嫩绿，春景可爱。至太华镇，岳庙军队驻焉，兼以攒程赶尖敷水镇，不及一游岳庙，况华山乎！东归若经此路，当在华阴勾留数日，独上落雁峰，一偿平生宿愿。抵华阴县，绕北城而过，西关外有《神医华陀墓碑》，渡敷水，至敷水镇，适遇市集，极热闹。六时，到柳子里，客店正对少华。山上野火熊熊，入夜尤可观。汤姆生君坐大车上吹箫，予于月下静对少华，久之，始睡。

一〇，早发柳子里，二十里华县，五十里渭南西关尖，十五里

良田坡宿，是日步行十里。

柳子里西行五里莲花寺，左沿华麓，右则平原一片，弥望无际，柳树夹道，白杨成行，村落中杂树尤多。将近华县有敕《建汾阳王祠》牌坊及《故里碑》。二时到渭南，东门有军士十余人守焉，候久始得进。全城已无商业可言，大商铺尽驻军队，通俗图书馆门外高张兵站发馒头红条，其他可想。城中驻军有镇嵩军及吴新田之第七师，闻三日前尚在河北十余里处与陕军开火云。西关外稍有市集，均系零星地摊及面食小铺而已。尖后，西行十五里内遇见往东运输子弹车约数十辆，未悉何往。

两日内关于社会方面观察所得可以记述者，即鸦片烟之公然贩卖尤甚于潼关附近也。余在岳镇所见市招有戒烟药膏分局，公记公膏局等数种，华县更多，有官膏分售处，官烟分售处，戒烟药膏分售处，销售净烟，销售清烟，棒子分售处，棒子发庄，及销售戒烟官膏等种种，可谓五光十色矣。其无市招者，则于户外放一小桌，桌上置天秤一，及烟卷空匣三四。尖时，客店西邻即一棒子发庄；所谓棒子者，鸦片烟膏，卷以苇片，成小杆状，外以红纸卷之，其大小如纸烟，故名。闻渭南城内外公然售烟膏及棒子者约有二三十家，月纳罚款自二三元至七八元不等。发庄店主系山西人，余询其吸烟否？彼答以有瘾如何回家，谈未竟，二兵士持筛箕小面盆来，要求熬烟，店主告以所在，遂他去。回至客店，一车夫侧卧炕上，正在吞云吐雾之际，余为之摄一影，彼犹欣欣然有得色。呜呼！是可哀也！

一一，平明即发良田坡，二十五里零口镇，二十里新丰镇，二十里海家庄尖，十里斜口镇，二十里灞桥，二十里西安城内宿。

过零口十里戏河铺，戏水所经，周幽王与褒姒戏游于此，因名。闻新丰镇西有鸿门亭，东有鸿门坂，因镇内驻兵，特绕城而过。西关有市集尚热闹，过此西南行为临潼，以攒程赴省，不及浴于温泉；车夫遂改道海家庄谓可稍近数里云。灞桥古名销魂桥，离灞桥约

五里。到省，东关及东门尽闭，交涉后始开。

二、早起洗浴理发。十时往西北大学，佩青校长已出关北上，晤莘田老友，悉抚五先生已来信介绍程铸新先生，程自佩青校长去后代理校长职务；并由莘田兄介绍识吴小朋先生。得由西北大学转来教育部虞电命余赴“甘肃调查历史博物事宜”，兼士先生来信，并附甘肃陆兼省长欢迎赴甘调查敦煌古迹来电、家书，系二月十九日所发者。遂同莘田、小朋二公去游碑林。其地保存唐宋以来石刻，约在五百种以上，沿革详见于道光二十二年《复修碑林记》。兹为摘录如左：

关中碑林之建，自宋龙图阁学士吕大忠移置石经始。石经由汉迄唐凡六刻，其开成以前石均已荡为寒烟，渺无见者，而碑林独如鲁灵光，巍然具存书贾，日毡推诸帖以饷遗天下士，非有神力护呵守护之不及此。我朝天章炳焕，疆臣恭逢列圣宸翰，摹刻尊藏于敬一亭之北，盖自康熙七年，巡抚贾汉复补刻孟子七篇，后至康熙庚子，县令徐朱鼎葺之。乾隆壬辰，巡抚毕沅再修之。嘉庆乙丑，知府盛惇崇续葺之，逮今已三十余年矣。臣富呢扬阿来抚是邦，仰瞻御墨，并旁览汉唐以下各家书，恪然思所以垂示万世者。惟庭楹廊庑，日就摧落，爰商司道诸君，亟捐费新之三，阅月工毕，窃惟关中为金石藪，而图经载宋姜遵知永兴军取汉碑代砖甃以建浮图，是碑林未建时，碑版已多散佚，况其爬搜扶剔于元明兵燹之后者，其珍惜更当奚若也。昔昌黎公作石鼓歌，患其销铄埋没，至欲移之太学。论者谓公三为国子博士，一为祭酒，卒不得取岐阳旧刻安置妥帖于深檐大厦之间，以实其言，于中朝大官又何责焉？不知公当德宗朝，政出多门，方摈斥佛老异端不暇，何暇讲求石墨？今海内承平久，好古之士日益，众居是邦者与二三同志，从容访古于公退之余，又幸值年丰民乐，政平讼理，得乘农隙以修举废坠，一复开成旧规，固非躬逢重熙累洽之日不能也。视昌

黎之西望吟哦，蹉跎自慨者，相越岂不远哉？惟时布政使为黔阳陶廷杰，按察使为宝应朱士达，督粮道为安化罗绕典，署潼关道为那丹珠，署凤邠道为贵麟，例得备书。

返校，莘田留同午饭。饭后博古堂李君携拓片来，选购三十余种，魏碑为《吴氏骑马仁张僧妙姚伯多造像》四种，十二年出土，原石现存渭北耀县某学校内，《七十人魏善兴冯育造像》三种，及《温泉颂碑》，原石均存临潼县公署，渭北澄县《晖福寺碑》，出土后，土人涂以黑漆，拒绝抚拓，此则去漆后之拓本也，并现存山西漪氏之《霍阳碑》及在泾州之《嵩显寺碑》等十一种，符秦《广武将军碑》出土于白水，为某团长所得，后复因事重埋土中，因此拓本较贵。唐《颜勤礼碑》十一年出土，石存省公署，有宋伯鲁跋，此外符秦隋唐等拓片约十余种，目不尽录。二时同莘田兄往游南苑门，遂到图书馆，参观古物陈列室，陈列品中有释迦降伏外道立像石刻一，颇精，无年号，此外有北周天和《夏侯纯驼造像》及隋开皇《钳钊神猛造像》，后院北廊有昭陵余剩四骏石刻，并破碎造像，委弃于地。南廊有唐代造像，纓络雕刻甚美，惜均无头；景云二年大钟一，题铭字体颇似房山雷音洞之莲华经。南屋为植物标本室，劝工陈列室等，未及一一参观；最后为公园，结构虽小，颇具园亭之胜。桃花已盛开，榆叶梅亦已含苞欲放，间有翠竹数丛，旅人睹此，尘襟一洗。出馆就文明堂购秦腔剧本及小曲计：《乾隆王让位》、《香山还愿》、《牧羊放饭》、《蛟龙驹观表》、《冯员外娶小》、《阴阳盒卖水》、《男寡夫上坟》、《孔明祭灯》、《王大娘钉缸》、《金沙滩》、《五郎出家》、《玉莲走雪》、《苟家滩》、《铁角坟》、《十张纸》、《出口外歌》、《二度梅重台》、《雪梅劝夫》、《雪梅观文》、《雁塔寺祭灵》、《大报仇》、《伍员别妻逃国》、《麻子红拆书》、《乾坤带》、《王连哭五更》、《李渊辞朝》、《李渊劝军》、《临潼山》、《劝戒洋烟歌》、《老凹山》、《八郎捎书》、《西城弄险》、《张琏卖布》、《赵德胜带箭》、《女寡妇验田》、《莺莺害病》、《铁兽图》、《黄河阵》全本、《回龙阁》全本、《汾河打雁》全本、《苦节图》

全本、《忠孝贤》全本、《昭君和番》全本、《铡陈世美》全本、《夜打登州》、《云南上寿》、《桂英诉恩》、《八王讲情》、《升官图》、《徐杨叮本》、《血手拍门》、《合凤裙》、《雪梅教子》、《下河东》、《南阳关》、《于让斫袍》、《古城聚义》、《挾盗驾》、《表八杰》、《双凤钗哭楼》(以上文明堂本)、《西城弄险》、《诸葛撑船》、《李翠莲上吊》、《道央歌》、《墩台挡将》、《打灶神》、《小曲相面》、《刘爷祭灵》、《观春秋》、《雪梅吊孝》、《花亭相会》、《裙边扫雪》、《姜维观阵》、《陈姑赶船》、《烟鬼显魂》、《起解秦琼》、《下南唐》(以上无刊处)、《五丈原》全本、《子期论琴》(德兴堂本)、《王桂英哭杀场》全本、《二进宫》全本(万世堂本)、《金陵讨封》、《湘子卖道袍》(恒兴堂本)、《送女》(泉省堂本)、《观星一大回》(永福堂本)、《陕西十大劫》(敦原堂本)、《赖猫斩单同》(照丰斋本)、《绣荷包》(福盛堂本)、《火烧棉山》、《德娃走雪》、《荐诸葛》、《铡陈世美》(义兴堂本)、《凤凰岭》、《镇台念书》、《杨氏婢》、《春闺考试》、《小姑贤》、《软玉屏替婚》、《惜花记》、《蝴蝶杯》(易俗社编)等数十种。四时同赴铸新先生之邀,小朋先生亦在座。饮西凤酒,主人并治徽菜相饷。六时同到易俗社,观全本《飞虹桥》新剧。易俗社在关中颇有声誉,民国初元开演实至今日,所编剧本有数十种,营业亦极发达。秦腔以二簧胡琴辅之,过门有时类广东戏,无繁弦急管之弊。演员中闻颇有出色者,今晚所见小生某,表情极佳,使饰周公瑾排演《三气》必能惬意。旦角刘箴俗已于数月前故世,当时有陕西梅兰芳之称,其负盛名可想。晚场下午六时开演,九点半即散,其时间颇似演电影,不若京师演剧动辄至夜深二、三时始散,使观众神疲力竭,非休养数日不能恢复可比。至于戏剧内容,就《飞虹桥》一剧言之,编制时确曾煞费一番苦心,穿插亦颇能引人入胜,惟前半出微嫌平淡耳。演员身段,并不过火,雅有二簧戏神情。总之易俗社新剧之于秦腔,犹上海新舞台新戏之于皮黄,同为一种所谓改良戏剧;惟易俗颇注意于社会教育四字,新舞台专以《就是我济颠活佛》等一类戏剧感人,此其大较也。剧将散,

忽宪兵座左右发生事故，手枪砰砰数响，座客大半登戏台，走避之惟恐或后，一时全场起大纷扰。一宪兵执手枪趋来，安慰观众曰：“无事！速坐！谁出剧园及登台走避者即枪击谁！”于是观众有勉强坐下者，有倚墙不敢移步者，然宪兵座左右喧嚷如故也。台上演员均呆立若木鸡，移时稍静，始勉强终场。余与莘田同出，茫然不知其起因何在，只见兵士三三四四群赴易俗社而去。莘田云去年亦曾遇见一次，至东大街别去，余返旅社。

一三，午前往竞爽医院访蓝田胡子恒、华县王勉之二同学，王君他出，与胡君晤谈良久，归寓。饭后去访莘田，同至卧龙寺，寺建于汉灵帝时，名福应禅院，宋太祖常幸此，明英宗赐藏经一部，即前年康圣人欲据为私有者也。后殿一佛像，约高六七尺，据闻全体藤制。出寺至下马陵董子祠，谒董仲舒墓。祠极破旧，污秽满地。到文庙看《千字文》、《孔子庙堂》及《皇甫府君》三碑；后至碑林，并在博古选得新疆巴里坤《汉敦煌太守碑》，泾州《魏南石窟寺碑》，图书馆所藏大钟题铭及魏造像拓片数种。回到西北大学，莘田所约也，在座有程、吴二公。饭后，至三意社，欲一观王文鹏之《葫芦峪》，以座满恐再受虚惊作罢。莘田告我：王文鹏秦腔班中之谭鑫培也，《葫芦峪》为其惟一得意之作，十日内必演两三次云。

一四，午前子恒、勉之二君来访，去后余即往游南院门，一时归寓。饭后与同来诸人往游大雁塔，出南门约七八里即慈恩寺。唐贞观二十二年建，为玄奘法师译经之所。塔七层，当时玄奘所以藏西游所得经像者，最初五级，后复增修为七。南面有唐碑二，即褚河南所书之《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及《序记碑》，碑额上方螭首，极飞舞。上下均有释迦及天人雕像，左右缘花纹颇细致。殿前有牡丹十余株，闻花时常有显者宴集于此。游毕，即匆匆进城，以南门闭城较早故也，不及一游小雁塔，至为遗憾。进城即去访莘田，饭于宿舍，识丰润王桐伯君，闲谈直至十时始归寓。

一五，早去访莘田，同至水利局，晤李宜之局长，并识其令兄李

约之君，君为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初级中学校校长，易俗社即其所创立者也。约后早同去参观，遂辞出，与莘田往游南院门，饭于莘田宿舍，识谦和公司经理章君。二时回旅社，同寓蔡君来访，同至圣公会观刘君所藏古物，零件为多。五时回社，小朋、莘田二公来，同至长乐亭，小朋兄所约也。在座有邮务局局长刘君并宜之、铸新二公，菜用西式，在西安仅此一家。餐毕，莘田邀往易俗社观剧，铸新先生同去。新编全本《紫碧鱼》已演其半，坐久仍不得剧中要领，且所演两场甚形松懈，不待终剧，即出戏园，归寓，整理行装。

一六，十时乘车出西门，往寻汉未央宫遗址，其地名央城亦称央角城，离城约十三四里。出城往西北四五里，远见一土阜甚高，若小山然，其上有一碑矗立者，即未央宫遗址也。及近，麦田中散瓦错落，悉为汉制，碑刻“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想系庚子清帝来长安时，乡民所竖立着。乱堆中有一石甚巨，或为宫之遗迹欤？土阜南有村曰马家寨，村民耕种挖地，时能掘得古物，瓦当完善者极少。三时进城，以拓片书籍送莘田兄处，晤小朋闲谈许久，归寓。同王君至善乐亭饭。傅校长有信致莘田云：“自西安往潼关一路，每日辄数遇土匪，护兵开枪射击者亦两次。”余倖仅一遇于潼关附近。亦幸矣哉！

一七，早起甚寒，七时见小筏，莘田、小朋来送行。九时出西门，计雇双套骡车十四辆，送到兰州，每辆洋五十一元，在秦太旅社住六日，共计洋四十余元。过三桥镇丰桥，渡渭河，五十里到咸阳，宿西门内。

渭河春冬搭小桥，仅容一车，夏秋则以舟渡。城东北十余里有周文、武、成、康陵及周太公墓。出咸阳西门有二大道，西北入甘，西南入蜀，东则紧邻长安，洵为冲要之区矣。

一八，早发咸阳出小南门。咸阳南门有三，北门亦有三，小南门者，右侧之南门也。西北高原上，荒冢累累，悉为汉唐将相陪葬之墓。四十里店张驿，属兴平，县治在驿南四十里，以驻军队绕道

而过。沿途播种罌粟不少。三十里醴泉西关宿，是日步行二十里。

到醴泉时仅三钟，遂进城一观，陕西第五混成旅驻此。城中市面极萧条，铺户之开张者，仅去中门数扇，余悉关闭，有官膏总局一处。每家门外均供“五湖四海龙君神位”一，以黄纸书之，其前置一小香炉，询之，因久旱祈雨数日矣，为麦田欤？为罌粟欤？唐太宗昭陵在县城东北五十里九嵕山下，陪葬者诸王七，嫔妃八，公主二十有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九，将军以下六十有四；肃宗建陵在县东北十八里武将山下，陪葬者有郭汾阳。

一九，黎明即发，六十里丰市镇尖，又六十里永寿县南关宿，是日步行二十里。

自醴泉出发后，即偏向西北，不经乾县，是为新道。斜至监军镇（离醴泉八十里），始与旧驿道合。乾县城西北有梁山，秦始皇建宫城其上；唐高宗武后乾陵则在其巅，闻壮丽为唐诸陵冠，温韬所未发者也。监军镇唐九节度会兵，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军于此，故名。沿途所行自杨家庄入山后，数十里内，有登无降。土人均窑居，山田鳞次类层梯。永寿城适当隘口缺处，颇擅形势。旅店中居室无板门，土炕无铺席；晚饭后，寒风袭人，似有雪意。

二〇，发永寿，四十里泰峪镇尖，三十里邠县城内宿，是日步行三十里。

永寿环城不及二里，居民约百户，山城荒凉如此，西来所仅见也。出北门后，浓雾迷满山谷，一望无际，道左时见雾树。粉白之枝条，摇曳风前，弄姿取媚，如此荒山中，行人左右顾盼，顿不寂寞。登泰峪岭，二十里徐家车圈，以绕行山坡故名。下岭数渡涧水，车甚颠簸，是名地窖沟。过沟即泰峪镇，属邠县，有陇东军队一连驻此。无制服，披青布棉袍一袭，肩枪杂入丛中，翟荫君以为匪也，囑严防之。尖后，即越大岭，十里升其巅，平原一片，极好之山田也。约行十里，两壁复削立，中陷深沟，是为泰峪胡同。将近邠县，适遇来车十余辆，因负载重，驾九骡尚不能行，遂挤塞沟中，约一小时，

始设法通过焉。进城，宿西门内。去店数十家，有开元塔一，唐塔也，其前竖一造像，约高四尺，断系唐制，惟白衣大士四字后刻耳。

二一，早发邠县，四十里停口镇尖，又四十里长武县西关宿。

夜半天雨，至晓稍止，遂起身治装，就道后又雨。车经范公祠前，因之未能下车瞻谒，心甚怅怅，西门外有《范文正公旧治碑》，五里水帘洞，山半洞穴密若蜂房，远望之，颇似云冈西部诸窟。邠县城外多植梨柿及枣树，至此益茂密成林。泾水流于南北两山之间，迂回曲折，驿路随之。所谓明岨山者，亦复蜿蜒起伏，愈转愈胜。山麓石骨峻峭，备诸形态，揭帘饱看，衣襟尽湿。车夫告余，始知之也。十里大佛寺，旧称应福，亦名庆寿，唐尉迟敬德监修。大佛高八丈余，胁侍亦有六丈，外建护楼，涉磴登之，可以眺远。大佛殿西侧石洞造像颇多，其完整而姿态足以代表唐代艺术者亦不少。壁间多宋人题名，惜匆匆一瞥，不及细审也。东侧山崖凿洞，亦有数十，是否尽系窑洞，未敢臆断。今日一因天雨，不便登涉，二以团体旅行颇多牵制，不能尽兴搜寻，倘欲细考，当俟异日。

尖后升坡甚峻，其上则旷野一片，田畴弥望，是为泾原。到长武经宜山门外，止于西关，旅店数处，已患人满，不得已遂分宿三家。市有卖熏鸡者尚佳，佐以柿酒，亦旅中乐事也。

二二，平明即发长武，六十里高家坳尖，四十里泾川县宿，是日步行二十里。

自西安启程以后，即阴，前日大雾，昨日乃雨，今日始晴明见日，不惟心目为之一畅，到省日期庶无稽延，为可喜也。德人福克《西行琐录》所记，雨时每日仅走四五里，不能到站时，即宿窑洞，自兰州至西安行五十里方到云云。虽当时大道未尽填筑，车行更费推挽，然亦可见雨行之不易矣。三十里窑店镇，陕甘二省所分治，东属长武，西属泾川，有《秦陇交界处》碑。自西安至此计行五日又半日，共四百二十里，步行仅九十里，自窑店西行，驿树夹道，悉系左相所植。其在陕西境内者，仅见于潼关至西安道中，亦复零落将

尽，西安至窑店则已斩伐无余株矣。陇东军用汽车路，去年筑成极苟且。途中见驮运兰州水烟大车，往东者络绎不绝，当归亦不少，西去者仅遇邮政大车四，骆驼七十匹而已。窑店妇女假髻高耸，余以为驻防所遗，车夫云自窑店镇往西至平凉一带，风尚悉如此云。

七时到泾川县东关，客店中之稍能居住者，已被人先占，遂在出口车驮捐局东，得一客店停留焉。客店无牌号，店役亦仅有一人。上房三间，中间系走道无门，偏北一大炕，为余等司炊所在，西侧向南有四尺见方之明窗一，亦无木板遮蔽。其在东者，南北各一炕，溥爱伦、时达、汤姆生三君居之。在西者，西墙有破矮锅灶，壁均熏染，发光似黑漆，南墙角马粪、草料、灰土堆积甚多，北墙略空，稍稍整理后，遂支行床于此。并向车夫假得破旧麻袋一，铺于床前，书籍及一切零件悉置其上，以行床为书案，趺坐握管而录日记写函件焉；又以行床为餐桌，沽柿酒饮之，亦觉别有乐趣。翟荫与石天生二君则在厩中，安设行床，畜粪遍地，践之甚软，似铺地毯。余等西行已月余矣，客店无门窗，晚间风起，则拥被而卧，亦寻常事；然从未有如今日状况之可笑者；特不嫌琐碎而详记之如此。向店役索水不得，久之来热水一小铅桶，须纸票五百文（银元换商办陇东银行纸票四千四百文），是否因外人而居奇，我不敢知。

二三，早起天阴，随翟荫君等进南门，至文庙参观《魏南石窟寺》碑原石（民国六年自王家沟移存于此），《嵩显寺碑》亦保存在内。壁间嵌前任泾州县知事桂林廖元信之《南石窟寺碑题词》，谓其书法瘦硬通神，风采奕奕，《郑文公碑》系永平四年，此则三年，足以奴视《张黑女》弟蓄《郑文公》云云。十时出北门，往游回中山，亦名官山，在城西北二里，泾绕其左，汭环其右，志称山麓有大佛洞，中架飞阁，凭空凌虚，群卉绚烂如锦，上有王母宫，文昌阁，三清楼，相传为周穆汉武游幸处也。余等先至大佛洞；寺殿仅存破屋数间，已无僧居。洞内东西北三面均有造像。下层者悉毁损，碎石遍地，残破之造像触目皆是。殆有盗者为之毁坏欤？随拾一佛头，拟带

还北京，以证盗者所为，固有意也。中心塔前面，大佛像尚存背光火焰及飞天种种雕刻，西侧较为完整；有石象及浅雕石刻绝美；同行者遂名此洞为象洞。余即择要赶摄数片，以翟荫君命十二时回店，午饭一时即须启程，无暇作详细记录矣。

总之此洞结构，颇似云冈中央第二窟，规模虽远逊，固北魏之作品也。大佛前有一高约一尺二寸见方之石柱，四面造像并飞天等雕刻极精。溥爱伦君爱之，就余商，拟向县署索之以畀北京华语学校或吾校，余深感其诚，遂同赴县署访知事郎君，晤焉。结果，郎君即飭王警佐去取，暂先保存署中，以待省命。余复以王家沟所在，并附近有无石窟询之，郎君接任未久，不能答，王警佐告我约略，并命一衙役导往，谢之出。回店，以告翟荫君决定停留一日，时日西发。匆匆用午饭毕，同翟荫、溥爱伦、石天生及王君等五人出东门，三十里到罗汉洞，远望石窟颇多，以为必有可观，所谓南石窟寺其在此欤？即之，佛像悉新塑，且有道家神像，颇为失望。惟洞外一像，约高丈余，自是唐制。东侧一洞有等身佛像二，其一头部外廓，已去其半，再剥离之，雕刻原状可见，固一极优美之佛像也，与云冈中央第二窟第三层楼上弧门东西两侧佛像面部相似。

罗汉洞西部岩石断面，圆孔散在颇多，洞窟形廓，尚能想像得之。其有完整者，同人悉探之，亦空无所有，遂相将就道回城，途经王家沟，余以《南石窟寺碑》石移置事，询之向导某甲，甲遥指隔岸窟洞之一曰，是即碑石所在之原址也，且有佛像，远胜罗汉洞云。余闻之狂喜，即以此意告翟荫君。翟荫君亦愿停车少待，一探究竟，遂雇得农民一，负我渡河焉。既济，石窟外之力士神，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极精美，窟内三面均有巨丈立像，余见之，惟有瞠目结舌而已。溥爱伦君则跳跃欢呼，如获巨宝。翟荫君亦以如此石窟，岂能匆匆放过，相约明早来此，尽竟日之力，从事查考，遂折回南岸，欣然回城。特遣专人向郎知事假得《泾州志》，就灯翻阅，于回中山见有大佛洞三字，寺观门得罗汉洞在太安里，至治三十

里,及石窟寺在永宁里,至治五里两侧,此外即别无叙述。按之方位,太安里在城南,与今日所游途径适合,永宁里在城北,其非指城东南之王家沟,可以概见,是则县志因明明无王家沟石窟寺之记载矣。此层姑先不论,兹先述我事前所推想者:

(一)在西安购得《南石窟寺碑》拓片时,即以为此石既在泾州,为近年所发见,则泾州境内必有一南石窟寺。

(二)凡称为石窟寺者,为就山凿洞造像供奉之寺,则此所谓南石窟寺,其情形亦不能独外。

(三)来泾州后,见桂林廖知事之题词,始悉此石自王家沟移至城内文庙,则在王家沟附近,必可得南石窟寺之踪迹。

(四)赴县公署接洽后,以为罗汉洞尚在王家沟东南十里,其为另一石窟寺又属毫无疑义。

今此事前所大胆假定者,竟一一见诸实现,此实西来第一得意之事。但连带而发生之疑问有四:(一)既有所谓南石窟寺则必有一北石窟寺与之相对。(二)志称之宫山大佛洞及永宁里之石窟寺,一耶二耶?(三)如其为二,则宫山之大佛洞为北石窟寺耶?抑永宁里之石窟寺为北石窟寺耶?(四)永宁里之石窟寺是否尚在?凡此种种,均非实地考察后不敢解答;顷以时间关系,急欲西行,当函托郎知事先为调查之。

南石窟寺在泾州北岸,土人云从未有人专去游览,如余辈之好事者,因此求之《志》乘,宜《志》乘之无记载也。

二四,午前九时,同出东门,渡泾川至南石窟寺。余与溥爱伦君在西窟,翟荫诸君在东窟。西窟之大,仅有东窟六分之一。东西壁造像下层各八,上层各四,高约一尺二寸,北壁大像三,窟外两侧有等身高之力士像各一。余先就窟内各壁原状,摄取十数片;然后溥爱伦君开始剥离东侧诸像,外廓去后,当时雕刻真相毕露。及至上层,往往于揭去外层泥土之后,发见重要图案装饰雕刻;余亦助之工作。东西壁各像,剥离工作既竣,溥爱伦君复举巨斧斫大像泥

胎，惜所剥离者头部悉缺损，溥爱伦君谓系回乱时所毁，似亦近理。剥离后，余又一一为之摄影，藉资比较。东窟则汤姆生君绘画，时达君摄影，翟荫君记录，石天生君测量。一时休息，即在东窟外支桌露餐，聚谈造像雕刻之美，如是约一小时。

西窟工作已毕，余亦加入东窟，北壁说法姿立像三，女相胁侍四，东西壁说法姿立像各二，女相胁侍各三，南壁东侧交膝说法坐像一，西侧椅坐像一，两侧各有女相胁侍二，中央有乱石一堆，翟荫君指为中心塔之遗址。余以石窟情形度之，恐未必然，盖窟内造像完好无缺者，几有十之七八，岂有中心塔独全毁者乎？再退一步言，既毁损矣，底部必有塔座遗留，何以仅有乱石而无雕刻碎片，此为极明显之事实。不知翟荫君之所指，有何依据也？立像面部之神情，外服之衣折，以及全体之姿态、丰度，与云冈中央第二窟所见，竟无所异，交膝坐像及椅坐像之姿势，亦复相同。窟外力士像二，已稍风化，然精神饱满，见之，犹能令人低徊而不忍去。天井北缘，刻佛传图，东侧为后宫嬉游图，屋后有宝塔，次为太子出城，西侧及东西缘中央部，均已缺损。总之此窟结构整齐，规模恢弘，且处处可见造像时精神之一贯，此又与云冈中央第二窟情形相同者也。余正在凝视出神之际，忽有乡民二十余，蜂涌而至，群起诘问。余等遂未便再事工作，拟即收拾一切登车还城。乡民则强拉骡马不令走，余婉曲言之，许久，势稍缓和。复来十余入咆哮更甚，其中之一诘责翟荫君毁坏佛像之罪。翟荫君不谙华语，未能答，彼即牵其袖曰，同到庙里去，非俟佛像修复不能任汝行。十余人和之，亦有数人谓非先搜捡外人，解除凶器不可。余目睹此状，颇为忧惧，以为群众行动，最易逸出范围，设有不幸，孰任其咎。遂极力为之疏解，颇反复譬喻，终无结果。南石窟寺为附近六村所管，村民鸣锣传知，势非俟六村村众来齐，不能解决。余亦只得唯唯听之，乘间向各个人间剴切譬解。其有年老者，复劝其作和平主张，公推代表一同进城，商量修复云云。颇有数人力赞余说，愿为尽力者，余

心稍慰。未几，村众集者愈多，声势汹汹者亦不少。若辈即就地开会，拒绝旁听；久之，始有结果，居然能推出数人，随同进城，商量重修办法。自此余等始解围，计被困于泾川之北者，约二小时，余亦唇敝唇焦矣。比到旅店，时已昏夜，余以此事宜先求和平方法，如彼此所谈不能谐，始偕赴县署，求最后解决；否则似可无须重烦官厅。此种办法，自信对于村众，亦已顾到。翟荫君深以余说为然，即邀集乡民代表于东屋，磋商重修款项数目。最终决定，给予六十六元之重修费（十八小佛像每像两元，大像系三十元），乡民代表认可，当即交付了结而去。此事，余始终居间调停，虽不敢自居有功，然能如此和平解决，实属万幸。乡民去后，始用晚饭。未毕，郎公来访，欢谈片时而去。未几，郎公又遣王警佐来告，乡民代表受人恫吓，重修费不敢收受，特赴县署报告此事，郎公以事实不明，特嘱王君来询，以祛双方误会云。余即以日间所经过者，为之详述一遍。复告以所以不愿重烦官厅之故，王君乃去。

西窟剥离佛像外廓之事，溥爱伦君主之，自是正当研究方法，余深然之，且为之助。但在内地旅行，为求安全起见，不能不有相当之顾虑。余以初次作西北之行，毫无经验，致事前未能见到及此，遂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实，重累友邦人士以数小时之恐怖，至为遗憾，惟最后获得一绝大之教训者，以为主张是一事，错用手段则纠纷可立见，此种情形，后日大可引以为戒。

复次，尚有一事足以记录者，当余昨日之到东窟也，于北侧台座下见有长方形之石一，横覆于地。翻阅之，雕刻极精，惟上方造像稍有缺损耳。归寓思之，断为《南石窟寺碑》头之一部。乡人不知爱惜，固无足怪，何以官厅当时能移碑石于文庙者，独不能并移此碑头耶？思之重思之，当时移置之动机，确非由于保存古物，殆无疑义矣（据闻乡民因寺基涉讼所致）。因此决定拟将此残石带还北京，实诸吾校考古学室。盖不如是，残石之命运，非至破碎而不止，即不然，据以告知事，知事亦不过飭警移存县署而已。此后残

石之命运如何，岂吾等所能知耶？今早到石窟寺，即以残石示翟荫君，不知溥爱伦君固已于昨日见告矣。复以携归吾校之说告之，翟荫君极力赞成焉。余遂以毛毡覆之，迨剥离事竣，休息露餐，翟荫君已为我装入布袋，安置一侧，余即裹以毛毡防损坏也。纠纷事起，在东窟中已有村民十余，监督吾等行动。此残石其留之耶？抑携之耶？此时诚踌躇矣。留之固已包裹完好，当然不能于环伺者之前，解囊舍去；携之，设为村民阻拦，坚欲启视者，则纠纷将益甚。余于此时，卒毅然命车夫肩之实余车，而此十余监督之村民，竟未一加干涉也。亦幸矣哉！从此，约重四五十斤之残石，将日夕伴我西行，或至兰州而止。俟余敦煌回省后，复携之东归。能否安然到校，尚未可知！顾此一段因缘，不能不详记之也。

二五，早发泾川，三十里王村铺尖，四十里白水驿宿，出发后，即渡汭水，沿回山麓折西，有《古瑶池降王母处碑》。一路杨树夹道，泾水流南北两山间。过王村铺后，驿路更宽，植树益密。时有小沟自南山流出注于泾川。今日所行只七十里，实有九十里云。

二六，拂晓，发白水驿，七十里平凉县东关宿，是日步行四十里。

昨夜微雪，早起阴云四散，转晴，九时后，忽起风颇寒。过四十里铺后（三十余里），驿道宽约三十余丈，植树五重，间杂白杨，直至平凉县城。进东关，市肆颇多，为陇东第一繁庶之区。平凉在前清，本系府治，民国后陇东镇守使及泾原道尹皆驻于此，俨然为一方重镇矣。

饭后，进北门至西街电报局发电，后到邮务局发信，遂出东门，过清平桥回店。晚饭后，忽有一形似马弁者来店，向掌柜索余等来车一乘，云有公干。余以王君告以此来任务，彼亦无词可答，遂去。

二七，发平凉，四十里安国镇尖，三十里蒿店宿。

昨日询店役，悉崆峒山在县西四十里，上山又二十里，无车路，或乘骑，或坐轿。山上寺观甚多，来往须三日，翟荫君极愿去游，后

以来车十四辆，停留平凉一日，每辆须洋二元，以三日计之，须洋八十四元，似乎太费，遂决定俟回来时，设法停留云。

自平凉西发，泾川沙滩甚碍车行，七十里内或升坡，或涉水，或行土峡中，尘土甚大。余在车中阅《甘肃新通志·祠祀志》及《甘肃新通志·兵防志》数册。将到蒿店，时达君猎得六雉，可佐酒也。到客店，土炕烧牛马粪，眯目触鼻，颇难堪，但亦只得安之。

二八，拂晓，发蒿店，四十里和尚铺尖，二十五里杨家店宿，是日步行四十五里。

天未明即起，微雪，出发时更大，心甚忧之，以今日须过六盘山也。离蒿店二里，山势遽紧，大道在南山麓，仅容车轨。两山间涧流甚急，北山有庙，供杨延昭像，相传杨曾驻兵于此，土人遂呼此处为三关口，其实为瓦亭峡，即古之弹筝峡也。石壁有“峭壁奔波”四大字，甚遒劲。余西行已月余矣，途中风景，无有胜于此者，惜阻于雪，未能下车浏览，仅于车中拥被窥视一二而已。行五六里雪渐止，有晴意，急下车步行，登坡，望东来诸山，便觉气象万千，如展瑞士雪山图画。凝望许久，去时犹频频回顾，不忍遽舍也。到瓦亭（离蒿店二十五里），车行石滩上，余进镇一览，仅见破屋数十家，萧条已极；然形势颇胜。后汉隗嚣使牛邯军瓦亭以拒援军，晋苻登与姚萇相持于瓦亭，宋金人陷泾原，刘琦退屯瓦亭，吴玠与金兵战瓦亭皆此，即出镇北门上车，仰面数峰突起，极高峻者，即六盘山也。山中积雪甚于东来诸山，气候也较寒冷，到和尚铺时，天已放晴，匆匆尖后，即启程西发。余仍舍车而步，初进山时，虽路有积雪，车尚可行，一二里后，渐行渐高，而积雪亦渐溶，车行极艰。翟荫诸君以猎雉为乐，余则搜寻风景成我画幅。约四五里后，始盘旋曲折而升，路更泥泞难走，山半庙儿坪有武庙，登山者恒憩息于此。坪后车道复盘曲上，余则别趋小道，泥泞更甚，比至山巅，失足已两次，幸恃昨日所购之车杖，否则步行将愈见困难矣。山巅仅有破屋数椽，客店一家，汤姆生君索水不得，索火亦不得，遂拾取柴草少许，

益以破屋中旧窗格,就客店外屋破灶燃之取暖。未几王君来,未坐定即先走,余等在外屋内候车,约两小时,仍无消息。以重载之车,须用数车骡马拽之,先到庙儿坪,然后复去骡马,返拽别车,如此反复,颇费时间也。山顶寒气加甚,不能耐,余亦下山到杨家店,晤王君,遂同在小店中候车,直到七时,各车始陆续到店。然有一行李车,侧轮陷水沟中,不能出,复命赶车多人往助之,亦可谓多事矣。六盘山自东来登山者,山麓到顶有十五里,下岭仅有五里,山路险仄,古谓络盘道,唐玄宗时破吐蕃于此,宋韩琦置砦戍守,元世祖恒屯兵避暑山上,明徐达定关中,屢于此败元兵,其险要可知。

二九,七时发杨家店,五十五里神林堡宿,到时正午后一时。

离杨家店十里隆德县,起风天阴,气候转冷。然村中小儿仅御单布衣一袭,而赤足无裤者比比皆是;甚者并此上衣而无之,露立风中,齿寒战作声,全身颤动,犹作微笑,盖陇东各县去年以天旱歉收,已成灾象,而每斤纸票五百文,鸡子每枚百文,花生每两百文,煤油每斤一元,各物昂贵称是。以故平民生活,极为艰窘;兼之尚有其他痛心之原因在,其影响于人民道德,社会经济,国际地位尤甚于天灾也。哀哉!

三〇,七时发神林堡,四十五里静宁县尖,又四十五里高家堡宿,是日步行二十里。

离神林堡三十里后,驿路沿北岭山腰行,迂回萦曲,所谓九里十三湾者是也。静宁县东关有三忠祠,旁峙《宋吴玠故里碑》,县城虽非繁盛,然街市宽广,屋宇整洁,质较隆德为胜,城楼亦新葺。余于西街小摊得乾隆三十二年元和宋宗元所刊之《网师园唐诗笺》六册,自西来后,途经西安曾得康熙年刊《虎丘山志》四册,故乡文献,连得两种,为之色喜。出静宁西门渡河,十里即登大岭,赶车者告我为七甲山,稽诸志乘似为西岩山,按诸图记,又为祁家大山,未知孰是。山高峻,不逮六盘而纡远过之,自东往西者,上坡路短,坦途较多,自西往东者,则反是。过岭后,远望池水一泓,色绿若翡翠,

闻系前年地震后方如此云。山坡时见龟裂颇深，此震后所遗留之现象也。下岭十五里到高家堡。

三十一，六时发高家堡，五十里青家驿尖，四十里翟家所宿，是日步行二十里。

出发后，未几即循山麓行，路尚平坦，后升山腰间，缺口甚多，时虞倾覆。将近青家驿，涧水油绿似碧玉，微风拂之，作小皱纹，清洁可爱，是为响水，路侧有《甘肃震灾会修路疏河碑记》。过青家驿，行乱山中，一路逾坡登岭，或上或下，或升或降，几无坦途可言。俯瞰绝涧，约深百余丈，洵足惊心触目。山间坡际，皑皑耀目似雪者，均盐硝也。途中尘土甚大，气候亦亢旱枯燥，令人鼻塞唇裂，喉干头痛，至为不适。车中闷坐，又不敢阅书假寐，以赶车某甲颇贪睡，恒虞车覆也。果然，行李车覆一乘。此次西安雇来之车，赶车者悉系洛阳人，同行中好以骂人为谑，否则倚车瞌睡，到店则相聚赌纸牌。自潼关到西安之赶车者，多为陕西西部人，十之八九隶黑籍，打尖时牲口置之不问，先去开灯过瘾，因此牲口所得饲料至少，不能负重，到宿店，则终夜横卧破席上，除与一灯相对外，别无动作矣。一日某赶车者，以倚车瞌睡故，由车上跌下，伤足，将怨天乎？抑尤人乎？可恨亦可笑也！山西赶车者极勤恳，诚实者多，间有一二到客店时，沽酒饮之，自得其乐。途中歌迷胡调，甲唱乙和，使旅人在车中，不至有寂寞之苦，我甚感之。

四，一，早发翟家所，四十五里会宁县南关尖，二十里西巩驿宿，是日步行十五里。

出发后，行乱山中，时或升坡，惟不若昨日之陡峻耳。二十五里张成堡，自此两山夹峙，一涧中流，车行涧底，随水左右萦回，所谓七十二道脚不干者是也。山则耸峭者有之，蜿蜒者有之，有时突起一壁，若石笋然，可谓诡变万状矣。如此约行十里，始出沟，五里会宁县南关。道旁有《大明麒麟冢碑》，尖后，进南门出北门，一路上下坡极陡，十里后始行坦途，计十里，复行涧底，一如午前。过张

成堡后，道中情形惟山势稍平，涧路亦较短耳。出沟后，升高原，直至西巩驿。

数日来饮水黄浊，味咸而苦，颇感苦痛。今日会宁客店，出所贮冰块，煮之稍胜。道傍杨柳，则自蒿店后，即疏落不复成行，有时十余里内竟不得一株。邮递于将近西巩驿时见往西者，计有百十八驮之多，豫西交通已恢复耶？月余不得消息，沉网已极！

二，发西巩驿，三十里青岚山村尖，四十八里十八里铺宿。是日步行十里。

发西巩驿后五里，下坡极陡，既降，渡王公桥复升，更陡，自此上青岚山，五里至其巅。过此，盘旋数岭，至青岚村，尖后下坡，险仄处甚多，约二十五里定西县，未及进城，即偏行西北，虽大道，车行仍极颠簸。

三，早发十八里铺，四十二里秤钩驿尖，五十里甘草店宿，是日步行十五里。

早起微雪，后又转雨，一路多坦途，惟有数处稍难行耳。至秤钩驿，雨止放晴。尖时，食篋形锅块，外黄内软，颇似面包，饮锡兰茶，加糖屑，以茶叶稍多，味嫌涩，兼以盐而且苦之水泡之，其味可想。尖后启程，即盘曲下坡，此秤钩驿命名之所由来也。约五里上坡，登车道岭，即俗称之二凉山，十里达第三岭，是为山之最高处。有山店数家，以候车放，遂茶尖于此。水极清冽，饮之亦甘，询其源，则云南山有一泉，往返须十五里，定西惟此泉可饮云。有小杂货铺一，与铺伙某闲谈前岁地震情形。当时以固原海城一带为最烈，山崩时，有全村被覆者。古物凡地震剧烈处，均有发见，一铜炉约售一二元不等，可谓贱矣。未几，车齐，就道，虽坡坨较平衍，然时有升降，如是旋盘于山脊者近三十里，始渐次下坡，其迂远实过于青岚山。下坡后，路多深陷，车常倾侧，惟驿树甚密，此数日来所仅见也。约五里，到甘草店，市尘尚多，若谓其几埒泾州，则又过誉矣。

四,早发甘草店,四十里下关营尖,四十五里响水子宿。

出发后尚多坦途,过下关营则车行河道中,小石颇多,故极颠簸。南北山势平迤,河面颇宽,二十里后山势渐紧,河流亦急,适值阴雨,处处见山水下注于河,悬崖绝壁上,时见羊群,河中水凫浮泳,一路左右顾盼,几乎目不暇给。将到响水子,水为山束,流益驶,声益大,夏秋水涨时车马不及避,恒有被冲之虞。华洋赈灾会特建一利济桥以便行旅,市镇则在坡上。安置行装讫,余冒雨一至利济桥边,河于此处为众流所归,因此水势颇大,闻五里后即流入黄河云。顺道并一看土人利用水力磨面工作,因雨大,即匆匆回寓。

五,早发响水子,四十里兰州,宿南门内马坊街福兴旅馆。

天未明,翟荫君与王君先行,余等则六时出发。十里后人山,上下坡以尽系石块,颠簸颇剧。黄河即在山下,望之极狭。约十里东岗镇,始见坦途,五里空心墩有营房,十五里东关门,经东关大街,进南门至马坊街华兴旅馆住。自窑店镇至此,计行十四日又半日,共行甘肃境内九百八十五里,步行一百八十五里。饭后到电报局,北京并无来电,至邮务局,亦无信札,殊出意外,至省长署,访谢厅长悉办公处在督署。比至督署始知今日为植树节,放假,遂出南门至南关大街谦和公司,晤文君亦无信件,怏怏而出。往游南门外兰山市场,仅见金县、河州等处出土之陶器可购,惜携带不便。有一铺云有敦煌经二丈余一卷,以有人持去未见,给价四百元尚未肯脱手云。回进南门,购买零件,一洋瓷饭碗须洋四角五分,顺便问得几种物品价目,老泡台烟每罐银一两,前门牌一元,罐头水果银五钱,鹰牌牛奶六钱,罐头鲍鱼七钱五分,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五元(曾买过十二元)。此间购物,往往先说银两,再折合铜元。通用银元为民国三年袁头;民国九年十年袁头,北洋及站人,较诸本地银元票价约低数分至一钱。大清银币及造币厂竟不能用,其他更可想见矣,每元换铜元一百六十枚,铜元票并无折扣,从前之五枚

十枚现均收还，不复流通。酱园杂货海味茶食合并一家，间有卖布匹者。饮料水则水夫肩挑两担，沿行叫卖。杂货铺前陈列纸钱锭袋颇多，以今日系旧历清明节也。回寓得昌德二儿三月十日所发之信，适于今日到兰，悉家中尚安，惟伟子身体仍多病，为可念耳。晚饭后，即同王君至雅园，浴后，如释重负，精神一振。

六，早起大雪，十时往督署见谢次洲厅长，晤谈颇久。回寓，兰州谦和公司经理吴君来访，饭后，同翟荫君及王君去见省长，传达处号房，酷似戏剧上之门官，接片在手，即以己意回复，及闻早有电来，并接得大帅（此间如此称呼）去电，始入内递片。省长因病，由谢厅长代见，谈颇久。辞出，余往财厅访陆叔明先生，陆以第一科长代理厅长，适因事出，未晤。归寓写详函寄京，夜与时达君洗片，以黄河水混浊，结果至劣，明日当设法滤过用之。

七，午前仍雪，同王君至邮局，复往中外药房购应用物品。主人浙江鄞县人，招待颇周到，并识溧阳王君，邀至寓所，出示秦州出土宋瓷碗，及零件数种。稍谈辞出，归寓悉陆叔明先生见访。饭后，即至财厅晤之，陆虽生长成都，惟籍隶吴县，固同乡也。辞出，往游庄严寺，寺在鼓楼西，唐初建，元至正间重修，相传为薛举故宅。寺有三绝，《志》称佛像停匀生动，衣褶细叠，迎风欲举，塑绝也；元李溥光所书“敕大庄严禅院”，字体遒劲，直逼颜鲁公，写绝也；壁上观音既端好，而所披白衣复首至足，俨然纱谷，柳枝翠色如新，画绝也。相传为吴道子所为，纵未必然，当亦出自宋元高手，惜乎渐就剥落云。至寺，寺僧方出城，仅于大殿内见塑像，画像以绸幔覆之，未能细观，拟明日复来摄影。遂出西门，往观黄河铁桥，桥南有升允《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升虽以顽固及宗社党称，然其力排众议，集款建桥，其功诚不可没。河北为北塔山，顶有北塔寺，明景泰中内监刘永成建，康熙五十四年巡抚绰奇增建梵刹颜曰慈恩寺。寺之南偏西为三官殿，于此俯瞰城郭，山环河绕，如列指掌，盘桓移时下山。适北关关岳庙酬神演剧，遂杂入丛中，立观片时归

寓。

八,早起天阴极寒,往庄严寺摄片既竟,复至嘉福寺。寺贞观九年高昌王建,有木塔一,高十三层,故亦名宝塔寺,俗名木塔寺,今名则元至元间重修时所赐名者也。明肃藩屡加修葺,康熙间塔毁于火,重建后,已较旧制卑小,同治十三年复毁于火,此时仅存瓦砾之外形矣。归寓后,同翟荫、溥爱伦二君去看庄严寺壁画,断定为宋代名手所绘,非唐人笔也。

饭后,吴君来访,同王君出南门往游五泉山。寺宇极多,均系最近士绅刘公所督修者,山以五泉名,遂称为五泉山,三神殿、祠关帝、诸葛武侯及财神,可谓不伦已极。最高处千佛阁,壁饰佛像颇多,悉系明绘。余等在此憩息,约半小时,始缓步下山。后同吴君去游普照寺,寺在城东南隅学院街,俗名大佛寺,唐贞观间建,明永和重修之,殿宇已破败不堪,即出至中外药房小坐,归寓,悉谢厅长见访。傍晚吴君同陶君来寓谈话。

九,午前在寓印片,王君来访,稍谈即去。饭后同近仁去见谢厅长晤之,近仁先回旅馆复翟荫君。余至督署后花园访陶君,承其导游各处,至碑洞,登拂云楼,凭吊烈妃殉节遗址,复至烈妃祠柳庄。园中牡丹颇多,丁香已盛开。别陶公出署,至中外药房,商品陈列所等处购件。归寓,拓碑者送来拓片多种。明肃藩所刻《淳化阁帖》,每部三两,余购数部,分赠太原西安诸友。碑洞所贮董其昌临《颜鲁公赠裴将军诗帖》,米芾行书《虹桥诗帖》及《怀素自叙帖》三种,均系道光四年总督那彦成所摹刻,亦购数份,以赠友好。北周《建崇寺碑》拓片约高三尺,宽二尺余,上截造像,下截镌文,额“建崇寺”三字,连碑阴两纸。光绪戊子三月秦安县城南十里郑家川山崩,居人由土中掘出,移置村庙者。西夏《天佑民安碑》一石,《通志》谓在武威城内西北隅清应寺中。先是寺有碑亭,前后均砌以砖石,封闭已久,相传亭不可启,启则必有风雹之灾。嘉庆间邑人张澍呼佣人数辈启之,自从碑文始传布世间云。本日得伯夔、颀

刚二兄自三月十一日所发挂号信各一，始悉中山逝世，民国元勋，又弱一个矣。

一〇，早起，发谢厅长一函，旋得复。同溥爱伦君往游金天观。庙在西门外，明肃藩建。正殿为雷祖殿，雷霆将吏，风伯雨师，列侍左右，两廊尽系画壁。余等自东廊北面起，溥爱伦君记录，余司摄影。所绘为《金阙玄元太上老君应化图》，自第一化至四十一化止，中隔空廊，其南部则《雷祖出巡图》也。西廊南部为雷祖回宫图，北部自第四十二化至八十一化止，图下附写原经经文，间多剥落，壁画则完好者殆十八九。余择其重要者，如化三清、变真文、垂经教、赞元阳、治器用、住崆峒、进函关、训严喜、升太微、演金光、训杨子、授金丹等等，均经一一摄取，费时三小时之久，遂小憩东院北屋。道士某复导游后园，苹果胡桃树颇多，牡丹有六七十株，其大者约高六尺余，不让宣南崇效寺也。垣外即见黄河，风景极佳。高坡上有混元阁，并有亭台数处，道士住院后有翠竹数十竿，令人悠然意远。出观，沿黄河岸至铁桥，进西门归寓。

金天观，《志》乘所载仅仅称述其殿宇之壮丽，道院之清幽，与夫松柏榆槐之奇古而已，于画壁无一字也。余以为佛传图刻，或石雕，或图绘，尚有遗存可见，道家老君应化事迹则未之前闻，今金天观两廊所绘，虽为时匪遥，然全部完好无缺，特郑重记之，冀研究宗教史及宗教艺术者，知兰州有此道教壁画也。拓碑人送来敦煌千佛洞《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记》、普照寺《金铁钟铭辞》及秦州出土北周《鲁恭姬造像》拓片三种。普照寺铁钟秦和二年郭镛造，高九尺，口宽六尺，计重万斤，铭辞款识共二百五十字，昨日嘱其往拓者也。

傍晚往中外药房，看出土陶器，索价颇昂，明日当往兰山市场询之。得昌儿寄来三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京报，西来将近两月，今日始见京中报纸。莘田来信悉西北受政治影响，地方政府以强力接收，莘田不日将出关回京矣。

一一,早起至兰山市场购得陶器二十余件,识古董商鲜某,同至其家复选得数品;出城在冷摊上得《千佛洞李氏碑》及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纪功碑》。姜碑据《甘肃新通志》卷九十二《艺文志》附《金石》第十页谓:“在安西州祁连山顶碑额正书大唐左屯卫行军姜行本勒石纪文,碑上衔书交河道行军总管右参卫将军上柱国(以下缺)派吴仁领右军十五万,交河道行军总管左卫将军上柱国既缺县开国公牛进(缺)领兵十五万”,碑末书“大唐贞观十四年岁次庚子六月丁卯朔二十五日辛卯瓜州司法参军河内司马(缺)国朝雍正十一年大将军查郎阿,命员外郎阿炳安修盘道数十折卫以栏楯,下临巴尔库勒淖尔,即蒲类海于山之巔得此唐碑,长可八尺,其形方,四面有字,字多残缺犹可读”云云。《西域水道记》卷三第二十六页原文:“始因水以名,地曰巴尔库勒,(今曰巴里坤即音之转)继因地以命水曰巴尔库勒淖尔,当川西偏其东南隅山曰库舍图岭(蒙古语库舍碑也,以岭有唐碑故名),山脉自乌可克岭东行三百里至此,即巴尔库勒南山。山岭有关壮繆祠,祠东三十余步有石室,度唐姜行本碑。其人言碑至神异,相戒不得拓,拓即致大风雪,断行人。余庚辰二月经祠下亲拓一通(以虑僂尺度之碑,高七尺五寸,宽二尺七寸一分,厚七寸,十八行,行四十一字,正书额五行,行三字……)第二十八页原文:“人栅门东行渡招摩多河乃层折而上五里至二层台,又旋折历磴道二十四级,雍正十一年大将军查郎阿命兵部员外郎阿炳安所凿,卫以朱栏,映带流水青松白云,自然明丽,磴道尽乃至关壮繆祠……”徐星伯氏亲历其地,并曾手拓一纸以归,则所载自可确信,惟至可笑者,《甘肃新通志》既谓在安西州祁连山顶,又谓下临巴尔库勒淖尔即蒲类海,其谬误固不待《西域水道记》之记载以证明,而自身叙述矛盾已若此,斯又不可深信《志》书之一证也。

归寓,卖陶器者纷至,余为翟荫君选购得数十件,价值较贱。拓碑人送来拓片,购得数种。其中《敦煌千佛洞陇西李府君修功德

碑记》即《李氏再修碑记》之碑阴，大中十二年《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则原石究在甘肃省何处，尚待考证。

饭后，应次洲厅长之约诣督署，并识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张检察厅长二公。苏出示所得敦煌唐画绢本。左侧画观音坐像，左手提净瓶，右手执杨枝，赤足踏莲花，其前莲花石台上有盆花一，王者跪于右，手托供物，顶上现法器，一童子倾果盘，桃数枚落空中，画极精美。线条细而劲，非唐人不能为也，造像二具亦极佳。次洲厅长则收藏丰富，入其室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陶器精品最多，有数种安特生曾出重价与之竞购，卒为谢公所得，当时陶器价值实为最昂之时期。佛像罗致亦不少，石造像二，铜者最多，有六朝像，有唐像，有来自印度者，泥者次之，然其中有敦煌庆阳寺数具，弥可宝贵。瓷器以秦州出土宋瓷为多，铜器最少，余选得十数种为之摄影，至五时始毕，复闲谈片时，始辞出归寓。

一二，清晨尚未起，送陶器来者已有十余人。敦煌经佳者绝少，然索价颇贵，动辄二三百金，余均挥之使去。陶器花纹有假造者，以水拭之即失，翟荫君购十余件，余所欲得之品均以价昂却之。按甘肃出土陶器，当安特生调查时，广事搜罗，因之售价贵极一时。今则购者较少，价遂低落，然市侩索值仍昂，此不可不知也。陶器大小形式种类至多，花纹亦颇繁复，安特生于其《甘肃考古记》内叙述甚详。就其所见区别为六个文化期：

一、齐家期 村落古址在宁定县齐家坪。陶器全系单色，上缀席纹，或有压花，亦有为浅灰黄色之薄肉瓶，形式极为美丽。就全体论，颇似希腊及罗马古代之 Amphora 两联底瓶。

二、仰韶期 村落遗址及葬地遗址在宁定县半山区瓦罐嘴、碾伯县弥勒沟、黑土庄等处，以其与河南模范址仰韶村所得相近，故名仰韶期。陶器表面花纹繁复，至为华丽，陶质亦致密，单色而粗者甚少，鬲鼎几付阙如。

三、马厂期 葬地遗址在碾伯县马厂，多为长大之瓮。大圈之

图案中，实以方格或之字条纹，并见作手指状花纹。其为小件者，则口径甚大，耳亦高耸，有纵横斜走或三角形之花纹，及有多数方格。

四、辛店期 村落遗址及葬地遗址在洮沙县辛店，及其南十二里会嘴地方。陶质疏松，器身高而口径均大。有作黑色条纹或细狭纵纹者，有于一横线下垂二相反之弧线如兀字形者，有小花纹作“N”形者，亦有图形犬羊等小动物者。

五、寺洼期 葬地遗址在狄道县之寺洼山。马鞍口之单色大陶瓮及足部肥大之陶鬲，最为特色。

六、沙井期 村落遗址及葬地遗址在镇番县附近沙丘。陶器大半无彩纹，有则为直立之三角形及为鸟形之横带纹。

前三期中绝无金属器物之存在，后三期辛店期较少，沙井期最多。因此名前者为新石器时代之末期与新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之过渡期，简称之为石铜器时代之过渡期；后者为紫铜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初期。遂假定一古文化之年代：

齐家期 纪元前三二〇〇～三五〇〇，

仰韶期 纪元前二九〇〇～三二〇〇，

马厂期 纪元前二六〇〇～二九〇〇，

辛店期 纪元前二三〇〇～二六〇〇，

寺洼期 纪元前二〇〇〇～二三〇〇，

沙井期 纪元前一七〇〇～二〇〇〇，

余此次为吾校考古学室所购人者，除寺洼期外各期均略备。亦有介于两个时期之中而为一种过渡时代之作品，此则尤可供专门家之参考矣。

归寓发次洲厅长一信旋得复，送来护照两纸，并为余介绍花定樵运局长潘君，嘱余于今日午后二时去访，可获见其所藏也。

饭后去访潘公于南府街，潘为次洲厅长至亲，出示敦煌泥佛像数件，并六朝造像等，择摄数片辞出。往访吴君于谦和公司不值，

即进城回寓。未几，潘公来片邀去茶话，座有邮务局长波斯人杜达、法工程师某、俄人某、翟荫、溥爱伦二君，并杜达夫人（四川人）、潘夫人等，闲谈至五时归寓，整理行装，预备明日西发。

一三，早至邮局寄信，归寓，整理行囊，十一时启程。出北门过黄河铁桥、金城关，十里至十里店，枣林极盛，又十里则桃树遍野，旬后当可放花矣。自此转向西北，人丛山中，土色朱赤，其崩陷处有笔立若削成者，远望之，颇似园明圆劫后所遗留之石柱，极可观也。车行涧中，是名沙沟，如此约十里朱家井宿，是日行四十里。

西行骡车仍雇十四辆，原来车约有半数。每辆送到肃州洋六十元；在兰州华兴旅馆计住八日，房饭费及杂费共洋一百三十元，又自西安到兰州之车，每辆另赏六元共八十四元，并附记于此。

一四，早发朱家井，七十里盐水河铺尖，三十里红城驿宿，实有一百二十里。

发朱家井后行两山间，虽有升降，路尚平坦。沿途无树木，杳无人烟，景况萧飒。五十里哈家寨，有花定樵运局分处，然民居亦仅十余家耳。遍地霜白，产盐之富，可以概见。过盐水河铺略见驿柳，仍行乱山中，尘土极大，不减晋南道也。二十五里徐家水磨，驿柳始成行，村落渐多，泉流时闻，五里至红城驿已黄昏时矣。

一五，七时发红城驿，七十里平番县西关宿。

自红城驿起一路傍河行，驿柳甚密，窑店至平凉道中仿佛似之。村落衔接，堡寨相望，水磨泷泷，河流汹汹，道旁多沟渠，时乱水而过。所见寺宇有接引龙泉诸刹，道观亦颇多。堡关门楼上往往建魁星阁或文昌阁，其在平番城南之魁星阁尤崇高。离城三里有庄浪满城，堞垣甚整齐。城为清乾隆时所筑，毁于回乱，此则重修者也，闻尚有旗民住居。平番南关极荒凉，各种收税机关及客店咸在西关。客店颇洁净，炕铺木板，为西来仅见。余以到时甚早，安置行李讫，即进西门至庄严寺。据《通志》云，寺为唐宋时建，今驻西军已数年矣，以无可观览遂出。至千佛寺，《志》称在县城东

北,实则在县城西南,志书之不可信也如此。

一六,六时发平番,三十里武胜驿尖,四十里岔口驿宿,实有九十里。

出平番往北稍偏西,仍沿庄浪河滩,时乱流过之;二十八里至小川口,以小川水西来注之故名。过武胜桥沿左山麓而至武胜驿,驿有废堡,久无人居矣。尖后仍行河滩间,乱石梗道,车颇颠簸。岔口驿在乱山中,有堡城颇完整,居民亦较多。东北群峰崔巍,山巅积雪未溶,沿山轮廓成一白线与天分,宛似界画,是为乌稍岭;据闻虽盛夏,亦常飞雪云。一路少树木,遍地生芨芨草,边墙断续,烽墩隐现,废堡故垒,触目皆是。回想当年帝王好武,将帅用命,壮士荷戈,书生投笔,拓疆几万里,受降数十国,丰功伟业,吾人生千载下者,于凭吊遗迹之余,惟惊骇赞叹而已。然有明一代,竭中原之财力,修城筑堡,调将遣戍,卒至闭关徙民,偷安苟延,明社遂屋。兴亡之际,真间不容发哉!

连日因感受风寒,时觉发冷,一至下午则头痛欲裂,颇感不快;惟闷坐车中读《雪堂校刻群书叙录》及《观堂集林》而已。

一七,初明即发岔口驿,四十里镇羌驿尖,五十里龙沟堡宿,是日步行二十五里。

未明即起颇寒,出店后见乌稍岭积雪,更觉冷气袭人。一路紧沿边墙,浪河在边墙外,河面甚宽。左侧山后见有群峰峭峯者,是为马牙雪山,近人游记以为祁连山者误也。山上积雪更多,少顷日出映之,作铜红色,阴部则深黑似墨,绝妙一幅画本也。余意习美术者,不当朝夕在城市中求生活,挽近尤堕落,奉承权要,趋附优伶,自命先进者,曰务排挤倾轧,学校士子则甘为黠者所利用,罢课也,开会也,拥戴也,驱逐也,喧嚷不已,绝不愿与自然界相接近。呜呼!是可痛也!

尖后渡庄浪河,车行冰雪上,轧轧有声。上乌稍岭,巅有韩湘子庙,为平古分界处。迂回盘旋,约十余里,岭非陡峻者,然小石碍

车，颠簸令人头痛。下岭后驿道沿古浪河，河源出乌稍岭北，流经古浪县城，东至元墩子出边墙，入蒙古界。又十余里安远堡，破垣颓墙，触目皆是，盖自回乱后久已不成市集矣。途中山均戴土，现朱红色。回忆幼时看着色山水画，以重染赭石为可骇，今日见此，益知国画固非全凭臆造也。十五里龙沟堡亦名龙口店，以东山名龙沟得名。过东山山沟中，即有番子居住。余于小杂货铺中见一番妇，约四十余，携一子十二岁，来堡以所制牛油易砖茶，其子貌颇聪颖，惜无人提倡番民教育，一任其自生自灭视同化外为可悲耳。闻马牙雪山西南，番民颇多，绰尔天堂寺即在马牙雪山之后，离镇羌驿已不甚远云。

今日沿途所见，以及尖宿时所闻尚有可记者：于镇羌驿见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平番县任知事布告，其中大意略谓土药印花税，平番应摊二万零五百八十三元，此外日本赈捐（按为赈助日本震灾之款）自治经费等为数颇不贖。现为顾恤贫民起见，拟就选举人民册所载有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一万四千九百余家，值百抽一，每家缴洋五元，可得七万余元云云。龙口则有驻军某营长严禁人民勾结军士聚赌布告。其衔名为西军巡防统部护卫步一营营长某，所谓西军者，为属于凉州镇守使之军队。前昨两日途中见有着便服、荷枪骑马者，即是。番子称妇人为“阿其”，男孩“阿拉”，女孩“我模”，我要去了“冈当脚”，喝茶“家吞”，马“斯达”，此系杂货商某君所告，余不能悉忆矣。至于种植罌粟，在甘肃已成公开秘密，财政上以罚款为收入大宗，且知事年有比较，即课税年有增加，亦即人民被迫不能不种之原因也。种后，因课税重，不足以维持其生计，于是携家出关者纷纷，遂令膏腴之地，顿成荒废云。

夜近仁偕陆君来谈，陆君为肃州镇守使署参谋，安肃道尹公署教育科长，生长伊犁，游学北京，民国九年回省任事；近仁去岁识于肃州，刻因进省邂逅于此，遂畅谈至十时始别。

一八，早发龙沟堡，四十五里古浪县北关尖，六十里靖边驿宿，

是日步行二十里。

出龙沟堡北行五里黑松堡，即古之苍松卫，山上多松柏，回乱后斩伐殆尽，已成童山。过此山势紧迫，古浪河为山束甚狭，而流益驶，声愈汹涌，是为古浪峡。驿路沿左山麓，峻坂礧岩，相望于道。车轴为其震折者四辆，崎岖难行之情，可以想见矣。一巨石当道，甚洁白，近人游记谓为催生石者有之，谓为酿酒石者亦有之。右山山巅有寺宇一，左山麓有香林寺。进古浪南门至北关，城内颇荒凉，想回乱后元气尚未恢复欤？

尖后北行，路多小石，二十八里双塔堡，已入武威界尚有市集。自此山势展开，渐现平原，惟所过村堡往往仅有二三家者，荒凉可掬。靖边堡差胜，但餐时索鸡卵仅得二十八枚而已。是日在车中阅《西域水道记》两卷。

一九，早发靖边驿，七十里凉州东关宿，是日步行十五里。

出靖边驿，经七里堡、河东堡四十里至大河驿，一路沙滩，小石遍地，车行颇格磔。驿长二三里，然除南关稍有铺户外，堡内仅有破寺两三所，余均碎石残垣而已。回匪蹂躏后至今未复元气，想见当时受祸之烈！沿途荒冢累累，天又微阴有风。山影模糊，日光惨淡，边关荒寒，一一在望。二十里马儿坝适演酬神戏，观者塞途。妇女小儿均坐大车上，注目戏台不少瞬，余等至，群又移其目光灼灼相视。余匆匆摄取数片，留备插画，遂行。未几观剧归者纷纷，骑驴掠余车而过，一妇人衣白地黑花洋布衫，青布幞头，缓鞭得得北去，可谓别有风情。一男子尾随于后，殆为伊之终身伴侣欤？又一小儿约三四岁，着红布短褂，赤双足亦跨骑于母背后。此种情景，在国画家往往能默识之，出以写意之笔，便觉栩栩欲活。洋画家仅能出纸速写，然骑行颇速，一时把捉不易，且速写之品，粗具轮廓，稍见笔力，神情风趣则视国画远逊也。余于国画洋画习之均无所成，随即弃去，遇此等事，无已，惟有求诸摄影耳。途际小儿行迄者颇多，远远见车来即就道左拾去小石，车近，磕一头，即伸手乞

钱，近仁谓其作假术工，余则以为情实可悯。凉州在甘省为繁庶之区，有金武威银张掖之称，何以小儿行乞者竟如此之多，至可异也。至东关寓鸿新旅店，为时尚早，匆匆午饭后，即赶写数信，挽掌柜觅一导者携摄影器进东门。凉州城垣完整崇高，门洞亦深。先至安国寺，寺在城内东南隅，相传为张轨之宫，现为黄教寺宇。顺治间毁于火，藏经古碑，悉成灰烬，创始年月遂无可考证矣。往西街邮局发数函，折至北街罗什寺。寺一名塔寺，以有十三层塔故名，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于此，为佛教史上重要遗迹。有藏经阁，以寺僧他出，未得取观。遂出寺往东，有竹林寺者，叩之，尼庵也。即舍之往清应者，寻《西夏天祐民安碑》不得，询之居民谓在大云寺，始知嘉庆间张澍氏所记在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者误也。其所以误大云为清应寺，以清应紧邻大云，且均有十三层之古塔一，坐是易致错误耳。遂至大云寺，于大殿后院得见碑屋二，在左者，《西夏碑》赫然在焉，别有一康熙间《重修碑记》。在右者，一为天启二年之碑，一则景云二年唐碑也。特嘱看寺者为拓碑人拓之，明日可送到寓所。此碑为甘肃《全省新通志》中所未载，是否见于别种著录，旅中苦无书册，不能考也。

二〇，午前写数信，并补录《西行日记》寄颉刚。饭后进城，先至西街邮局，折回南街，得关于风俗方面之刻纸十余种。出北门至东岳庙，今日旧历二月二十八，俗称东岳帝诞日，因此一路游人甚多，戏台前尤拥挤。正面停骠车约数十辆，其在车上观剧者，均妇女也。庙内两廊有十殿阴司画壁，东岳殿颇高峻，庙外桃花已盛开，游人有携酒具就林间欢饮者。归途，沿城根至东关，拓碑人送来大云寺中《唐景云二年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拓片，碑文系刘秀撰。前段叙大云寺开创沿革，寺为晋凉州牧张天锡所建，有七层木浮图一，本名宏藏寺后改大云。武后改号天赐庵，景云初重修之，此即重修时之碑记也。此外复有《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开元二十六年《慕容明墓志铭》

及贞观四年《毛府君墓志铭》三种。细核碑文,第一种大长公主葬于凉州南阳浑谷冶城之山冈,慕容明亦葬在凉州仅云先茔,未及地处,毛系安定人,葬于凉州姑臧口方亭里,此三石均系前年出土于凉州城南五十里之上古城,原石均存文庙。

二一,午前九时发凉州,七十里丰乐堡宿。

进凉州东门,出北门,路中即见沙石,四十里后弥望皆是,车行较前数日尤顿撼,令人头痛。将近丰乐堡,喜见驿柳,路亦较平,闻明日尚有数十里沙石道,须至永昌始已。到店微雨,忽又大风,约十五分间即止,复晴朗见日。西来寒暖无常,瞬息即变,此旅行者所应注意者也。

二二,早发丰乐堡,三十里八坝堡尖,六十里永昌县东门内宿,是日步行三十里。

出丰乐堡沙石之碍路者一如昨日。二十里柔远驿,居民极稀,道左有永昌界碑,十里八坝堡。《新疆游记》所载堡东火祖楼塑像,均作髻形,趋视之,未必然。其已改塑耶?抑记载仅凭耳食耶?二者必居其一矣。尖后,三十里通津堡,亦名三十里铺,残垣当道,杳无人烟,劫后凄凉,一至于斯,可慨也!过此,石渐少,路渐平坦,天忽阴,大风,微雨,未几又清明。二十里东冈,即十里铺,有驿柳,道右有《明湟中祁将军孤军战胜处碑》。遥望城北武当山殿宇层叠错落者其为真武庙乎?闻与之邻接者,尚有金川寺,颇擅胜景,惜未能一游也。进东门,宿大街客店。永昌城内街道颇宽,惟店铺少,稍形萧条耳。

二三,早发永昌,七十里水泉驿宿,是日步行十里。

出永昌西门数里,路多小石,车行格磔,渡小沟六七,水均清驶。二十里水磨关,居户数家,荒凉满目。自此傍右山麓行,数升土坡,荒磧弥望,数十里内,杳无人居,遍地惟黄草萋萋,相接于目耳。一时天忽昏暗,狂风大作。车篷为卷,骡马驻蹄难前,声似怒涛撼山,万马腾踏。兼下雪珠,温度骤低,余披驼绒毯二,犹作寒

噤，唐人诗：“蔽日卷征篷，浮天散飞雪。”不啻为此日咏也。到水泉驿稍晴，惟风仍怒号，遂宿焉。饭后，偕店伙高某至石佛寺，有石佛一，约高四尺，背光有小佛七，碑记已磨泐不堪读，匾额所载石佛来历，已不明了。明永乐年间以蒙古人频思盗窃，遂于东关财神庙侧别立一殿置之。同治间回匪蹂躏，水泉驿焚毁极惨，庙亦波及，乱平，堡民为置于西关之三官楼，民国七年由三官楼而移于堡内之三圣庙，特建一接引殿云。高某并谓回乱前堡内居民有三百余户，今仅四十余户耳。乱时居民死者千余人，亦可谓一地之浩劫矣。

二四，早发水泉驿，五十里峡口驿尖，四十里新河驿宿，实有一百十里，是日步行二十五里。

出水泉驿西行，积雪满山，边墙断续入目，席萁遍地，无林木居户，一片荒碛，几类沙漠矣。三十里定羌庙，亦名古城洼，汉日勒城故址也。十八里至石峡口，乱石梗道，车颇颠顿。大黄山立于南，合黎山画于北，形势极险要。二里至石峡口堡，堡城东西较长于南北，尖后仍西行，道极平坦。十五里丰城铺，居户十余家，二十五里新河驿有堡城。

阅《河海昆仑录》关于大黄山与焉支山之是一是二，辩之甚详，其所恃为显然两山之故，析之有三：（一）《方輿纪要》谓“青松山在永昌卫南八十里，一名大黄山，一名瑞兽山，一山连跨数处。”又谓：“焉支山在山丹卫东南百二十里，引《西河旧事》云：‘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上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同，一名删丹山亦名删丹岭’，《括地志》亦云：‘焉支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因此断定焉支、删丹为一山，大黄山与焉支则显然为两山也。（二）以焉支山必当路冲隘，故去病攻而取之，以断匈奴右臂，遂有“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之歌，则焉支山必为今山丹峡之北山，若大黄山则删丹山西南山丹县南相距数十里，且四面草滩，不当路冲，为匈奴所不必争，去病所不必攻之地。其为争战之冲者，实删丹也。（三）以西来

山水多以其色名之，删丹色赤，大黄色黄，一览而知，此亦为显然两山之证。其说虽辩，余却未之敢信。《方輿纪要》既谓青松山在永昌卫南八十里，则今日所指之大黄山必非《纪要》所称之青松山，可以按图考之，毋待词费。《方輿纪要》与《括地志》所载之焉支山一谓在山丹卫东南百二十里，余以行程核之，当在水泉驿之西，或稍偏南十里，然其地固永昌界也。一谓在删丹卫县东南五十里，当在新河驿之东南十里。姑不论二书所载，显有出入，而《河海昆仑录》著者以山丹峡之北，认为焉支山者亦不攻自破矣。至于山色命名，因而强指为二，殊涉附会。余考《甘肃新通志》，于永昌山川条下有青松山“在县西八十里，一名大黄山又名焉支山一山而连跨数处”，以行程核之，恰在水泉驿之西十里，反与《纪要》所载若合符节。于山丹山川条下，有焉支山“在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一名删丹山又名大黄山”，其里数方位，又恰与前条所称之青松山相合。然《通志》所载，余亦未敢信之以证《河海昆仑录》之非是，余以为欲明大黄与焉支之是一是二，当求“焉支”命名之由来。余以行篋携书过少，无从考证。偶忆唐人诗称焉支者，有王维《燕支行》，“胭脂山下弯明月”（元稹《小胡笳引》），“燕支山下少春晖”（屈同仙《燕歌行》），“燕支山下莫经年”（杜审言《赠苏馆书记》）诸句，以为唐时竞称燕支。比至后代，以山产大黄甚丰，遂以大黄名，燕支反无闻矣。古今山名异称，此例正不少。其以古名询土人，土人茫然者尤多。余在峡口尖时，询大黄山，虽一童子亦能指之，遍询焉支无以对也。因此联想大黄、焉支为古今异称，或者大黄竟一俗称，亦未可知。所谓焉支山必为当路冲隘，以大黄四面草滩，不当路冲为词。其实古今争战形势，载籍所未明言者，何能加以臆断。自定羌庙至山丹向西北，峡口固所必经，然自定羌庙往西，经刘家庄老军寨至上下徐家庄，折北过二十里铺，西至山丹亦一道也。否则自上下徐家庄，复西至暖泉堡，直北至山丹又一道也。取此二道，大黄山适当其冲，又有何说耶？总之大黄焉支是一是二，非精于輿地学者不能解决

此疑问。余何人，敢强辩耶？

二五，早发新河驿，四十里山丹县关内尖，四十里东乐县东关宿。

早起甚寒，约五里，忽起大风。将近山丹余与溥爱伦、石天生二君之车，均陷泥淖中，挽出颇费力，遂进东关，关城内街心筑渠，引山丹河水入城，渠畔植杨柳成行，风景颇佳，市肆亦多。余进南门至发塔寺，明洪武间建，先是掘土得铁佛五，石函一，内藏发，又有石炉镌字曰发塔寺，遂就地募化兴筑。寺南有白塔一，别院初级小学校在焉，仅匆匆一瞥而已。

尖后，出西关，渡山丹河，十里大佛寺，一名土佛寺，明正统六年太监王贵指挥杨斌建。佛像高十三丈，覆以重楼七层，以趲程故不及下车一游。过乐定堡计四十里至东乐，实有五十里，山丹附近泲树茂密，自山丹至东乐道中亦复如是，且时涉清流，村堡相望，远非前数日之荒凉景象矣。闻甘州西高台一带尤胜，宛似江南，闻之神往。

东乐在前清，为一厅治，民国三年，始改为县。县城仅有东西两门，城周尚不及山丹一关城，铺户只二十余。县公署在西街，署后紧靠城垣，署西十余家，即系西门，度其面积，差可与昨日新河驿所居客店相仿。署前悬国旗二，询之，新县长昨日方走马上任也。至邮政代办所，遇一姚姓老者，谈及东乐种植，仅恃一山丹河，不若肃州附近有南山融雪，可资灌溉也。地既贫瘠，县缺因此亦极清苦，后遂杂谈他事，辞出回寓。

二六，微明发东乐，七十里甘州城内王府街连升店宿。

启程时微雨，未几即止。初行土沟中，旋行沙滩，道软而平。二十里古城子，即仁寿驿，近人游记谓为汉屋兰县故地，按《通志》屋兰废县在山丹县西北，今古城子地属张掖，疑为西安废县，然亦不敢决也。仁寿驿街市，几埒东乐县。出堡数里，即大沙滩，数为水阻。二十里至二十里铺，田畴纵横，烟林相望，询称膏腴。十二

里八里铺，八里进甘州南关。关外有牌坊题“张掖古郡”四字，南关内垂杨拂水，秀麦遍地，几疑身在江浙间矣。道旁有左文襄公祠，已改为国民学校，进南门至王府街，时正十二时半。稍稍铺陈毕，即出店往北仅数十武，有一类似之古玩铺焉。见敦煌经数卷，并瓷青纸银书经卷两本，均以价昂未购。遂至南街邮局，于小摊上得经卷两小册。摊主人杨姓，山西漪氏人，焦镇台在时曾任马队哨官，今弃武就商矣。邀至其家，得见金书《华严经》卷，购之出，往游弘仁寺。寺在王府街南端，旧名卧佛寺，建于西夏，明永乐九年重修，赐名宝觉寺，康熙十七年始改今名。大殿中卧佛一，卧佛口角约计之，足有四尺，全身长约十四丈，寺后有白塔，形与昨日所见发塔寺略同。今日适有戏剧，广场中观者拥挤万状，奚止千人。复往对面之本塔寺，以旧有本塔故名，实为万寿寺，永乐四年重修，前院已为同善社所占有，并附设一国学专修馆云。

饭后复至北街，折回南街，购应用零件毕；去访张知事，适往镇守使署，未晤。晤幕友某，谈及《西夏黑河建桥敕碑》一石，始悉在县南五十里，允为雇人代拓，遂兴辞而出。

二七，八时发甘州，七十里沙河堡宿，实有八十余里。

出甘州西门，西北行数里，即折北，行沙滩，后又折西，屈曲行黑河故道，二十里至二十里铺。过河沙阜累累，车行颇平软，仅闻车轮与流沙摩擦声及微风拂拂而已。西来流沙，今日始见及之。三十里沙井驿，属抚彝县，自此村堡相望，泅树满目，直至沙河堡。

堡门遍贴抚彝县知事手谕，恍若身在山西境内矣。识章君与谈颇久，章君二十余年前即在敦煌，当时千佛洞经卷画片，充盈洞内，无人过问，至今思之，追悔无及。并杂谈关于敦煌附近各事甚多，约东归时再图良晤乃别。

二八，八时发沙河，三十里威狄堡尖，五十里涧泉子宿。

出沙河堡西门，往西偏南，折入南道。南道有二，其一不经抚彝县城，过威狄堡向西北，趋高台与驿道合。其一则经威狄堡西

北，入高台界后（约三十里）即向西至涧泉子，往西南六十里元山子，又六十里马营堡，然后复向西北趋肃州，此路为车道所不经。今以北道须经盐滩，而车行第一南道自高台后亦须经由盐滩入肃州界，据闻盐滩多泥淖，前日在客店悉邮政驼运，陷入数骑，费时颇久，始克出险云。因此余等行程，不能不趋第二南道，此道旅程为自来游记所未载，不悉沿途作何景况，藉此经行，亦一乐事。

三十里威狄堡，一路桃花盛开，足解岑寂。枣树亦多，柳条丝丝，麦秀芊芊，极似故乡风景。尖后，均行盐滩上，此处道路干燥，无泥淖以碍车行。五十里涧泉子，中途以赶车者不识路径，绕行颇多，计有七十里。

涧泉子有小川一，道旁仅有一井，均盐涩。尖铺一，仅北房二间，为翟荫君等所居。西屋二间，南北各一炕，北者铺主人所居，南者置厨房家具，餐毕，三仆即宿其上，近炕炉灶二。无柴薪，无油盐，其他更可不问。南屋一小间，杂置马粪，赶车者于此安灶焉。铺无门，只有残缺短垣围之，四周均旷野，距南山约十余里耳。铺西盐滩上，支帐篷一，骆驼八九十匹，亦经行此间暂宿者。荒凉景象，为余生平所未遇。晚餐用由甘州携来之挂面，以盐涩井水煮之，佐以由沙河堡带来之头芽菜，及甘州高某所赠之洋葱，各炒一碟，余复倾剩余白兰地，踞炕上饮之。日记册置膝盖上，记录日程，而炕烟熏发，令人几不能张目。饭后，即就车中拥绒毯而卧，半夜风起甚寒，益不成寐，此程景况，亦余生平第一遭也。

二九，破晓发涧泉子，六十里元山子尖，又六十里马营堡宿。

早起颇寒，余以昨夜失寐，精神极不舒服。出荒店后，车往西南，寒沙莽莽，朔风猎猎，盐滩沙碛，一望无际，人烟草木俱无，荒凉已极。如是行五十里升坡，转入乱山中，约五六里出山，遥见树木扶疏，村堡隐约，是即渴望之元山子也。尖时，索鸡卵仅得八枚，索锅盔不得，仍以白水煮挂面食之，聊以充饥。尖后车向西北，荒凉一如午前，惟黄羊成群颇多，闻枪声即疾驰，其大者如小马，时达诸

君竟未获得一头。六十里马营堡，近村桃花数株，云蒸霞蔚，至为可观。小店虽荒陋，然较之昨夜，不啻天上矣。

三〇，早发马营堡，八十里下河清堡宿。

自马营往西，村居树木不断者几十里。道旁时有桃花，向远客迎风弄姿，荒寒之大漠中，有此点缀，足资顾盼，亦稍慰羁情已。过此，又系沙碛，一望无际，十四辆车衔接而行，寂无声息，如是几有十里。比近下河清堡，始见村舍林木。到店，村人聚观者颇多，患甲状腺肿者占十之八九。

连日气候较寒，天又阴霾，南山积雪隐约见之，似颇浓重。今日又起风，行沙漠中，精神极为委顿，幸有一日程，可到肃州，得休养数日矣。

今日车行稍误，自出马营堡后，应往西稍偏北，七十里至上河清堡方为正道，今则往北偏西八十里至下河清堡。上河清与下河清间相距三十里，明日自上河清堡至营儿堡为四十里，若自下河清堡往，则为五十里，是今日多行十里，明日又多行十里，折入正道，合计之多行二十里云。

五，一，初明即发下河清堡，一百里肃州宿。

发下河清堡，五里内村林相望，过此入沙漠。六十五里至三起堡，约有数十家，村树不断者十里。桃花极盛，如在龙华道中，惟彼在繁华风尘里，走马看花，快意固别有在，此则处干苦之生活，已越两阅月，近十日来耳所闻者，朔风怒号，与马嘶驴鸣相应和，目所见者惟衰草与黄沙耳。于此种境界中，忽有数株好花，含笑欲语，征人过此，岂仅眼目一新而已哉。自此又行沙滩，小石碍车，颇见颠簸。将近肃州，驿柳扶疏，阴翳蔽日。进东关南稍门，至东关大街寓东升栈，时仅一钟，可谓速矣。草草铺陈毕，即进东门去访吴静山镇守使桐仁，以有要公，约明早八时相见。遂至邮局发信，至北街访酒泉县陈知事，系浙江绍兴人，晤谈片时，悉豫督胡景翼已死，岳维峻继，京中政局粗安云。辞出至北门外电报局，军署已有来电

留存道署，即折回东街，往晤安肃道尹祁瑞亭观察。得军署转来北京赵君寒电，随即回寓译之，悉所发各电均已收到，家中亦安，为之忻然。

肃州古为西戎地，秦为月氏国，汉初匈奴攻月氏，使其部昆邪王住牧于此。武帝元狩二年置酒泉郡，治福祿县以通西域，断匈奴右臂。新莽更名辅平，东汉仍名酒泉，三国时属魏，隶凉州，晋因之。东晋为前凉张轨所有，后并于符秦，复归于后凉，寻为西凉李暠所都。最后归北凉沮渠蒙逊，元魏平之。改为军，属敦煌郡。孝昌中复置酒泉郡，隋开皇初郡废，仁寿二年置肃州，大业初省入张掖郡，竟宁元年改为酒泉县，唐武德二年复置肃州，八年置都督府，贞观元年罢府，天宝初复曰酒泉郡，乾元初复曰肃州，属陇右道，大历元年为吐蕃所据，后张义潮以州归唐。五代宋初陷于回鹘，景祐中属西夏，宝庆元年蒙古主铁木代夏并有其地。至元七年置肃州路总管府，隶甘肃行中书省，明洪武二十八年为肃州卫隶甘肃行都司。清雍正三年改直隶州，三十七年以高台县改隶肃州。民国成立，废州为酒泉县。其山川古迹之可记者，祁连山一名雪山，在城南一百五十里，为洪水河源及讨赖河源所在。文殊山在城西南三十里，山口内有古刹，为唐贞观中所建，有元太子《喃喀失重修碑记》。城东北一里许有泉如酒，因以名郡。《汉书》所称之“遮虏障”在县北二百四十里，为李陵战单于处，隋镇将杨元曾于其地得铜弩牙箭鏃等物。古长城在城北四百里，秦筑欤？汉筑欤？抑元筑欤？迄无定论。西凉武昭王李暠墓在城西十五里。以上均据《肃州新通志》所载。

二，早起出南稍门，闲步看祁连积雪。八时至镇署，见吴镇守使相谈约三十分钟，悉镇道两署已曾派专员驰赴敦煌矣。遂辞出回寓，写《西行日记》寄京。十二时，翟荫君与近仁自外归，翟荫君告我已单独去见吴镇守使，商量剥离敦煌画壁一事，未获许可云。饭后，镇守使道尹相继来谈，去后，余复往道署为款事随拟发一电

致兰州谢厅长。识电报局长陈君浙江杭县人，五时进北稍门回寓。

三，午前写信，电报局长陈君来访，得次洲厅长复电。一时，镇守使署差官持片催请，即同翟荫诸君乘车去，席设东花园镇远亭内，菜用西式。园有杏花已开毕，桃李数株，含苞欲放。席间有祁道尹，德人卢神父。吴军门年已七十有一，精神矍铄，视之仅五十七八。颇好客，外人道经肃州者，军门必肃柬宴之。所谈在山东芝罘杂事极多，并殷勤劝酒，至为诚挚。临别，又以能同游苏杭各为地主相期，盖军门虽籍合肥，固久寓杭县者，余则吴县人也。辞出后，为划款事往访陈知事，稍谈即出，购应用物件回寓。

四，午前在寓查阅《安西》、《沙州》各志，二时翟荫诸君往道署，赴祁道尹之宴。在座有吴军门及卢神父，四时回寓，陈知事来访。

五，午前余招一警察为导，进东门至上帝庙，公立初级小学附设在内。生徒即在殿廊坐地授课，课本为《三字经》，依然一村塾也。出至西街吉祥寺，偏院为农务会，殿前亦为公立第一初级小学校授课之所。寺俗名大寺，后有白塔，相传汉武帝时创建，姑存此说，未敢信也。出南门往西南，约行三里至陈家花园，园内有敞轩五楹，额题“可园”，前后均有葡萄棚。凝香亭四围，遍植芍药，甬道两侧牡丹约三十余株，均为数十年之物。此外杏花已谢，桃李海棠丁香盛开，全园面积逾十亩，边塞有此，足资观赏矣。距陈家花园约半里，复有杨家果园，面积较小，亦无园亭布置，但花木不减陈园，牡丹数十株，亭亭作花，半月后可以尽开。出至玉器会馆，屋隅亦有桃花数株，遂沿城墙东行，往游酒泉。酒泉亭新经吴镇守使修葺，泉以砖石砌之成方形，与惠泉相似。亭与泉之间，有一池，环池皆垂杨，浓荫蔽日。亭后大池，广约二三十亩，时见白鹭回翔，风景绝胜。南院即澄清堂，其前为清励楼。文昌奎星二楼，以飞桥通之，惟附近树木少，不若后院清幽。进东关至左公祠，祠屋极整齐，正殿供文襄位及造像、陪祀者，右有其部将杨昆山，左则安肃道尹

周务学也。周为民国官吏，死后其家人移去左侧陪祀文襄之位，即以周从祀焉。周之功业如何，我不敢知，即此一事，媚周者亦未免太过矣。回寓，陈知事见访，送来划拨款项，盛意可感。

六，早起即乘车同溥爱伦、时达二君往游文殊山，出南稍门往西南，一路行小川中，两岸树木阴翳，似在江南。十里后河滩小石颇多，二十里至文殊山，实有三十余里。山有前山后山之分，其实非前后，乃东西耳。前山有新修寺宇一，为喇嘛所居，今日尽往南山念经去矣。头门内壁画四天王像，西藏风格，自是不同。东西殿亦有壁画，后山寺观极多，悉为道士所居，喇嘛仅一处耳。前山大寺东侧有一活佛焉，持片访之，云已往南山，未能见也。三时仍就原道回城。晚阅《斯坦因旅行记》第三册之第一第二两篇。

七，今日系阴历四月十五，城内各寺均开门，仍招一警察为导。先至东街定湘王庙，随往北门游张家果园。面积约三亩许，桃树最多，对门即薛家果园，面积与张园埒，有葡萄棚二，牡丹、芍药数株，李花盛开，极可观，桃杏海棠均有，树阴处杂种菜蔬，雅有田园趣味。屋宇三楹为主人所居，如此清福，令人艳羨。出至钟鼓寺，正殿匾额题“罗祖庙”，中祀关壮缪，左像似武侯，与兰州五泉山所见正同，且有惠被西蜀匾额，而寺僧告我为罗祖，右为财神，深为不解。殿后升石级上，始为钟鼓寺，凭栏俯瞰，全城一览。出至玉皇宫观音堂，略一瞻览而已。其东有药王宫、三义庙、昭忠祠。三义庙之南有方园者，地约二亩，海棠丁香作花甚繁，榆叶梅亦盛，牡丹芍药约有十余株，此外杂卉颇多。园内有酒馆，遂与近仁在此午饭。出至继善丰购杂物归寓，整理行件。七时，翟荫君及同行诸人邀往方园晚饭，闲谈颇久，九时始踏月回寓。

八，早起写信，及整理行装毕，进城至邮局，并在继美丰购应用物品回寓。

下午五时西发，计雇敦煌大车八辆。翟荫君等以北京带来之洋布一捆，木箱五件，寄存肃州，始省去数车。每辆价洋六十元，兰

州来车马五同去。又兰州到肃州车十五辆，每辆另赏洋六元。大车装货极多，即坐人亦颇安适，惟车行甚滞。出肃州北门数里，过讨来川河滩，碎石遍地，颠簸一如在凉州道中。约行十里，月出，光明如昼，远处村树，隐约可辨。二十里丁家镇坝，又四十里嘉峪关宿，到店已四时三十分。一路甚寒，余以倦极，即拥被而卧。

九，早起进嘉峪关内城。内城甚小，除游击公署及巡防营哨部外，仅破屋十余家而已。外城居民铺户亦仅二三十家，荒凉已极。关之北为嘉峪山，长城环抱之，南则祁连透迤数百里，形势颇为险要。关城东西各三门，城楼三层，望之俨然，雄壮过潼关也。西门外道左有《天下雄关》碑石，一望沙阜垒垒，渺无涯际，遂绕城北进东门回店。巡防二营中哨哨长，左哨哨长，及军需诸君来访，邀往哨部闲谈。悉游击吴海仁将军为肃州吴军门之介弟，两哨长则军门之子侄也。余以就道匆促，不及往游击公署，遂留片哨部以别。

近仁催套车至再，车夫竟不之顾。盖自肃州以西无尖站，赶车者恒喜夜行，大概下午五时出发，明日到店，旅客亦每晚在车上宿，到店始下车盥漱进餐。然余等不惯此等生活，昨晚到店，未几即天明，仅一晚已觉精神委顿不堪，故近仁催之也，三时西发，行戈壁中，多碎石，车震头涔涔然，且气候燥热，颇不耐。四十里双井堡，仅有居户一家，余悉破墙残垣，盖无人居已百余年矣。又五十里惠回驿宿，到店已十二时三十分。赶车者一路横卧车上，因此车行极迟，近仁鞭之，最后二十里内较速，否则到店恐又在两三时后矣。

关外戈壁气候变迁甚于关内，今日出发时，单衣尚热，六时后微寒，须易棉衣，夜深则御重裘还冷，遇起风更剧变，此旅行者所不可不注意也。

一〇，午前九时起，十时早饭，饭后即起程，有风。

惠回驿有居民二三十家。驿东有白杨河，杏花数株，尚未全谢，为戈壁中所罕见。出惠回驿西行，荒碛忽起忽伏，车随升降，是名九沟十八坡。三十里火烧沟，沟内石子尽黑。自此车路渐平，四

十里至赤金湖，荒凉甚于惠回驿。又四十里赤金峡宿，到店正十时，已较昨日为早。玉门县派马警来迎，在惠回驿等候已七日矣。防营马队已守候多日，先回玉门。

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讷、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讷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

一一，午前九时四十五分同翟荫、溥爱伦二君乘车往游红山寺。先是查阅《新通志》有赤金峡南山多古佛洞之记载，昨日询之赤金湖居民，及玉门县马警，咸谓红山之阳有石洞颇多云云，翟荫君遂决定同余驱车访之。出客店往东南行五里渡赤金河，二十五里赤金堡，其地唐开元中置玉门军，天宝十四年废军为县，明永乐二年建赤金蒙古所，正德后为土鲁番所掠。其城遂空，清康熙五十七年立为赤金卫，雍正五年改为守御千户所，乾隆中裁所归并玉门县，康熙五十六年于旧城西连筑新城一座，即今之堡城也。又东南五里进红山口，五里至红山寺。寺建于唐贞观中，旧有尉迟敬德“大千光明”铁匾，同治中经兵燹，全寺尽毁，光绪中叶重修之。画壁塑像均极恶俗，遍寻唐代遗迹，渺不可得。寺西山上有石洞六七，即之，亦空无所有，遂废然而返。惟沿途村树成林，民舍相望，时见赤金河流向西北，不若前日之干枯矣。回店正四时，翟荫君忽告六时晚饭，七时启程。车夫经近仁前昨两日之鞭策，始由夜行改为日站，顷又复旧，固车夫所愿，余与近仁则大窘，然亦无如何也。七时三十分西发，行戈壁极平坦。四十里高见滩小尖，复行，余在车中不能成寐，精神颇感痛苦。

一二，出高见滩后行四十里天明，十里玉门县，进南门停天和店。自出肃州后，每日必至深夜始获安卧，昨晚则彻夜在车中，连日失眠，精神恍惚已极。且余不惯午睡，无以取偿，饭食次数，又无

一定,此种生活,深以为虑。所幸到达敦煌,屈指计之,不及旬日,顽躯尚能抵抗也。余以为长途旅行,第一须充分睡眠,第二能调节便通,二者缺一,精神顿感不快,身体抵抗力亦随之减退;于是以风寒饥渴劳顿种种外因,诱起疾病,易如反掌。在京晤福开森君,悉同行诸人于旅行颇多经验,证以数月来之观察,似未必然。

在店用早饭后,即在东街,经县公署前见有李知事在署立国文研究社、贫民学校,以及仿照书院月课办法,考试高小学生种种布告,即出片访之,晤谈颇久。知事湖北黄安人,悉国文研究社尚无人去报名,贫民学校正在开办中,此间教育事业,进行极难,今年始有高小毕业三人,由县长送往酒泉初级中学云。辞出往邮局,晤局长和君系无锡人,寄居肃州已数代矣。哨部书记官王君泰县人,边塞得遇同乡,欣喜可知,王君告我吴镇守使所辖军队分驻酒泉、嘉峪关、玉门、安西、敦煌各处者,合计之只有四营,每营三哨,每哨五十余,共六百余人,镇署职员亦极简单。以视其他军阀,日以扩充军实伸长势力者,其相去正不可以道里计,为之钦仰不已。回店李知事送来饭菜数事,盛情可感。饭后,知事来访,店伙送来梵文写经一卷,约长四尺,求售,索价二百金,可谓居奇矣。

下午五时同翟荫、近仁二君往县公署辞行。六时启程,出玉门县北门,四围村树极茂密,多可耕之地。一路车夫歌本地梆子《二进宫》,一人三役,颇可听。声调腔格,出音吐字,与山、陕梆子殆无差别。车夫并告我安西、玉门方言,刘牛不分,肃州则湖河混淆。余数月来与甘人谈话,深觉甘省方言,完全受山陕二省支配,甘凉一带念“书”为“夫”,正与山西南部一致。类似者其例至多,固不仅戏剧与山陕相近也。六十里三道沟庄宿,到店已三时,车行之缓,殊出意外。每一小时仅能行六七里,其故由于溥爱伦、汤姆生二君之车夫,年已五十余,嗜好甚深,且为敦煌某车店佣役,而非自赶者,牲口草料,饲养甚少,以致驴马均极疲瘦,不能负重,同行者咸恶之。余到店,即忍饥而卧。

一三,早起出店至邮务代办所晤高姓者,始悉大坝千佛洞里数方位。见敦煌写经三卷,其一三尺余,缺首有尾尚佳,庄东某村户闻有十余卷,已携往肃州,未能寓目也。三道沟庄现有居户约百余家,回乱前闻远过之云。

十二时三十分发三道沟庄,渡三道沟、四道沟经五夹滩,计四十里至七道沟。沿途多沮洳,附近土地颇可耕植,惜多废弃。过七道沟后行河滩上,时见黄羊野雉。五十里至布隆吉城宿,已十一时矣,是日行九十里。煮挂面食之即卧,辗转竟不成寐,此为数日来旅行生活过于不规则之结果。

一四,八时起,盥漱毕往游街市,晤都司张君,定西人,年已六十有九,曾随左相为差官,邀至寓所,谈话颇久。出至某铺,询问锁阳城(即苦峪城)桥资各处道路情形,已知大概,可备东归时参考。布隆吉城居户仅有数十家,道右白杨数十株,大者逾四五抱,悉为数百年前物,玉门城内亦有古树,但不足与此相颉颃也。店后有一小池,时达君猎得黄雁一尾,羽毛颇美观。

下午三时启程,尽系河滩,四十里双塔堡小尖,自此沿窟窿河入山,远望山巅双塔,窟窿河蜿蜒经流其下,时已夕阳,颇可入画。河发源于土葫芦沟,西北流入苏赖河,内多大穴,上小下大,深邃不测因名窟窿河。五十里小湾宿,已十二时三十分。

一五,早起进堡--览,仅有东门,额曰“永安”,可知永安与小湾非两地矣。东南离辘轳井子五里,可以望见,堡内居民有七八十家。其曾往苦峪城者,至少亦藏有五铢及开元钱数枚。

午前十一时四十分启程,一路沟渠交错,颇可耕植。二十五里车辘轳把,只有居民一家,治茶水以售行人,并自养牛马百余头,其地水草肥美,可以概见。沙中产锁阳,为壮阳圣药,闻在双井子所产特多。予在车中,因天气亢燥,昏昏欲睡,精神极为不快。未几,天色昏黄,日光黯淡,忽起大风。声如金戈铁马,奔涛怒潮,汹涌而至,余急裹毛毯蒙头而卧,如是约半小时稍息。四十里安西城,进

东门宿东街客店,时已昏夜。方铺陈毕,安西陈知事芷皋来访。陈原籍上元,又系同乡,坚邀留住署中,后以种种关系,决计明日在此勾留一日。

一六,早起到邮局寄信,往访周统领于东街,晤谈数十分归寓。同翟荫、王近仁二君去访陈知事,辞出回寓,携摄影机出东门得数片。东门外沙阜,高齐城墙,颇似正定府。安西风独多,有“安西一场风”之谚,意谓一年自始至终无日或平息也。城中极荒凉,空地颇多。鼓楼下有一井,围以木栏,是即渊泉,归寓检阅《安西新志》。

安西在春秋战国时为西戎地,秦月支戎居之。汉为敦煌郡属县六,晋为晋昌郡凡八县,后魏置敦煌常乐二郡,隋开皇初二郡废,大业复置,唐设瓜、沙二州,贞元后陷于吐蕃,大中五年张义潮以二州来归。宋初为回鹘所据,景祐中元昊据之,元初立瓜州属沙州路隶甘肃行中书省,明为赤斤蒙古沙州二卫地,成化后为吐鲁番所侵掠,嘉靖三年闭嘉峪关绝贡,其地遂为吐鲁番所有,清雍正后于行政区划上颇多变更,初为卫所,后为安西府,乾隆三十九年始改为安西直隶州,民国成立,废州为安西县属安肃道。

下午四时与同行诸人往县公署,赴陈知事之宴。在座有周统领、丁委员,席设极丰,有无鳞鱼一种,出城北三里之疏勒河,似鲑鱼而较为肥美,主人频频劝酒,颇为尽兴。回店已七时余,即启程,出南门过河,行河滩上,自此往西南绕向十工,经九八七六等工七十里而至瓜州口驿,已天明矣。所谓工者,即系引苏勒河以灌田亩之沟渠,其在布隆吉城之东者曰沟,三道沟四道沟等是也。城西大者谓之渠,有南北二渠,由渠分枝者谓之工,至瓜州口东南而止。大道因所过沟渠宽,沮洳多,故车行亦较难,绕道虽稍远,然走夜站,则较为平坦易行也。

出安西西门往西北行戈壁,五站至星星峡,为西往新疆大道,出南门西南一站至瓜州口驿,又五十里双墩子入敦煌界。

瓜州口驿东北四十里有瓜州古城,为由大道往西者所必经。

春秋时允姓之戎居于瓜州即此，汉为冥安县属敦煌郡，晋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隋开皇四年改为常乐县，唐置瓜州属河西道，开元十五年城为吐蕃所陷，寻张守珪为刺史修筑之，大历十一年复陷于吐蕃，大中五年张义潮以瓜州来归，宋属西夏，西夏亡州废，元至元四年复立属沙州路，后此仅存名而已。至今称瓜州古城者沿唐名也。

一七，瓜州口驿仅有荒店二家，店房一如润泉子，四望空阔，尽戈壁也。十时周帮统亦到，饭后走往晤之。帮统狄道人，出身于保定陆军学堂，现为肃州巡防各路帮统兼带第四营，工书能诗，安西统部办公室内图书盈架，与之谈宛然儒者，和蔼似吴军门，甘州以西统兵者若是，宜地方之安堵矣。下午一时启程，三十里芦苇沟，有水草无人居，仅存破墙屹立于沙碛中。有寺宇废基一，玄奘法师曾寓于此。过此，天忽起风，余在车上朗诵尹默师之《秋明集》，随风吹入云际，字字尽成逸响，不图戈壁旅行留此佳话。二十里双墩子已无残剩建筑物，只存名计里数而已。二十里甜水井已晚间九时，仅客店一家，本为宿站，以攸程故，小尖复行，余拥毯曲肱而卧，居然入梦。

一八，甜水井后七十里至疙瘩井，有荒店二，废寺一，到店正上午七时，静山统领早到已三小时矣。九时统领来，与翟荫君谈约一小时始去。翟荫君拟到敦煌后偕近仁折回肃州止华尔讷君西来，以华尔讷君前岁剥离千佛洞画壁后，人民颇有反感，此来恐多周折也。此间离敦煌仅有七十里，数月来所梦想之千佛洞转瞬可到，欣喜万分。

下午一时启程，五里后即系河滩，道右盐湖甚大。二十五里新店子，绕道过之，实有三十余里。时已将暮，夕阳照戈壁上，倍觉苍茫。远见黄羊数四，飞奔驰逐，此惟戈壁始有此奇景也。四十里敦煌县，进东关宿万玉店已十二时。县署派有县警招呼一切，途中亦有马警保护，出关后各县皆然。

一九,早老周往邮局取来儿辈所寄家书及友朋惠函十余封。九时往访杨知事,杨于潘省长时曾为政务厅厅长,江苏武进人,年已六十有二,久居直隶,来甘亦已二十余年,谈未久,静山将军亦去,续谈约半小时辞出回店。十一时同翟荫、溥爱伦、王近仁三君复至县署谈摄影事,毫无结果,约今日下午二时在署集各方代表商议遂出,得县长请帖,于明日午前在月牙泉并约近仁同去。

下午十二时偕同行诸人赴县署集议。在座者有周统领、肃州镇道两署所派专员张参谋长、牛科长、杨知事及敦煌县商会、教育会长并各界代表约七八人。会议时先由翟荫君说明此来本拟剥离一部分画壁,运赴北京陈列,以便中外人士得就近研究,曾以此意商之陆省长,未蒙许可,嗣后即查意摄影,希望能得各界谅解,予以充分时间云云。杨知事、牛科长、周统领及教育会会长相继发言,均以前年华尔讷运去千佛洞画壁二十余方及佛像数尊后,地方人民群向知事诘问,今年庙会时,复有人向千佛洞王道士诘责,因此此番游历,为期势难太长。且在千佛洞居住,有种种为难情形,即军警保护,亦恐有不周之处。说之至再,仅允游历日期,不得逾两星期,千佛洞碍难居住,只能当日往返。余亦发言约二十分间,同行诸人以无可磋商,一一承诺辞出回店。决定明日休息一日,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日往千佛洞游览摄影,二十四日即启程还安西,翟荫君则往肃州候华尔讷君止其西来,余等在安西待翟荫君回城,即同往踏实万佛峡诸处游览数日,即可进关回京。盖翟荫诸君以为敦煌官民所允许之两星期,且须当日往返,摄影成绩,能得几何,故不如缩短日程以期迅速离此,较为直接痛快。自此余所预计计划,拟往阳关、西湖一带调查者,至此亦完全打消,不无遗憾。四时遂同翟荫、王近仁二君去访周统领,翟即告以此意后,略谈片时辞出。翟荫君回店,余招巡警为导,往游文庙访《唐索勋纪德碑》,碑在棂星门内,已断为二石,想缺文必多,俟得拓片后校之。《索》石后为《杨公碑》,亦唐碑也。旁有断石二,系千佛洞中石刻,数年

前由山移来者。出城至东关南街,往看缠回物品,回店,悉统领来访,杨知事赠白面百斤、羊一头。

二〇,早五时即起,假翟荫君携来伯希和千佛洞印片阅之,影片计有六册,并复制一平面图,以便明日往游时与周统领所调查之号数相对照也。十时进城,往县公署,晤绛闻县长,闲谈颇久,并晤振卿公子。十一时同出南门,往月牙泉,余与陆警佐同车。月牙泉四围均沙山,离城约七里,《元和志》所称为鸣沙山者,一名神沙山,人自山巅流沙而下,有声如擂鼓然甚厉。天晴自鸣,声闻颇远。今日为阴历四月二十八日,月牙泉适有庙会,到时游人极盛,观音殿、药师殿尤多,盖前者祷之冀护子嗣,后者则延年祛病也。先在敞轩小憩,傍有汉渥洼池石刻一。后同县长警佐往游各殿,乡民有携酒器烟具铺毯于地,或一家族、或呼朋辈欢然相聚者,此风余于甘凉一带已见之。还至憩所,对面即鸣沙山,时有数十人或十余人流沙而下。月牙泉水极清冽,饮之亦甘。时见野兔三四,隐现出没,闻秋时芦草弥望,更饶清趣,当远胜江亭也。未几,周统领、张参谋长、牛科长、刘所长(安西禁烟分公所)、郭山长(曾掌敦煌书院)、朱会长(商会)等均到。见有跳神者,县长命在广院中演之,余摄数片,是亦研究风俗者所宜注意者也。演者发辫上系一绳,左手执藤圈蒙皮之鼓,握柄有铁环三四,演时右手击之,环亦铿锵作声,辫绳随舞随转,另一人击同样之鼓,伺立其侧,有时二人或四人六人同舞之,是名跳神。余以为此实巫之变相也,闻在肃州各县此风极盛。演罢,县长以余关心戏剧,复命乡人之能歌者设桌歌当地剧曲,聆其音节,有时颇肖滩簧中之弦索调,有时几与山西之迷糊相一致。席间以戏剧关系,复涉及甘省方言,纵谈颇久,获益亦甚多。兹撮记其大概如次:

敦煌在关外虽与安西、玉门相邻,为安肃道属之一县,顾其方言,不在同一系统之下;十二日日记中,曾记其一二,而不详其故,今日始恍然也。盖敦煌无土著,其称为敦煌籍者,先代多为狄道及

河州人，故其方言与狄道、河州相似而独立于肃州所属（即安肃道属）各县之外。如“那里”狄道方言为“五答儿”，敦煌完全与之相同，“这里”敦煌谓之“楂儿”，“那里去”谓为“鞋（念吴音）泥起”又与狄道为近。安西、玉门二县人民，则由镇番迁去者多，故其方言似甘凉。如安西、玉门朱顾二字不分，高台（属肃州）然，武威亦然（凉州），此其确证也。“严杨”、“两娘”、“和合”、“钟羹”安西、玉门均不能分别发音，敦煌均能之，此又为敦煌与安西、玉门方言系统不同之一证。此外并杂谈别属方言如秦州“女”谓之“密”，西宁“吾的”之为“吾阿（吴音切）子”，秦安、安定“是吓”之为“哈”（出声甚微）。狄道吴镇（乾嘉时人，曾服官江苏）氏之“借问酒家在鞋呢，牧童遥指五合头”及形容陇东、平凉一带之方言“清明时节雨发发，路上行人克咱家。借问酒家在那答，牧童遥指在哇哇”均可记也。书至此忽忆上海新剧中往往插入所谓苏州《卖马》（店主东一段）、宁波及浦东《空城记》（“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一段）等等土语唱句，虽属一时滑稽遣兴之作，与吴镇氏之用意相似，然在研究方言上实一极有价值极感兴趣之方法，于比较研究各地方言尤为便利，质诸方言研究会诸君以为如何。

席散，闲谈片时，偕陆君进城。途中陆君告我前任陆县长卸任后，行至新店子为人民所截留，非取还华尔讷所剥离之画壁不可，经陆君驰回敦煌，邀去绅士数人，始得和平了结。因此杨县长对于此番外人游历，颇为郑重，况镇道叠有密令，不得不如此云，余唯唯。回店后，为抄写敦煌歌谣事，往晤刘掌柜，并同至王家，仅见一六朝造像，约高二寸，其余悉来自刺巴楞寺者。回至刘掌柜处，又见一约高四寸之唐造像，无题铭，而索价竟至二百金，余只能以一笑报之。

二一，未明即起，与翟荫、汤姆生二君同车往游千佛洞。出东门折南，复偏东，过沟渠十余处，约七八里，行戈壁转人山口，至三危山下，名为四十里，实有五十里。先在指定之中寺稍憩，即由张

哨官等导游各洞。午前依伯希和氏之编号自一三九号往北至一七一号 c。十二时回寺用饭,饭后自一六二号往南至一三五号 a,于一四六号洞内,得见《李君碑》,碑于民国十年时为居留俄人所断,已折为二。一五七洞及一五九洞 a 画壁均被熏染成墨,亦居留俄人所为也。一四五、一四四、一四一、一三九号诸洞画壁均有缺损处,导者指以相告曰,此即华尔讷君前年所剥离窃去者也。于一四〇号洞内见有五代刘、汉画像题铭,惜匆匆随游,全文未及录出耳。三时翟荫君以途中沟渠颇多,车行不便,主张随即登车回城,比到旅店为时尚早,复决定明日延长三十分钟。晚间拓碑人送来《裴岑纪功碑》一种系贗本,原石在巴里坤,而《甘肃新通志》卷九十二却谓在敦煌县旧城外关帝庙内,至可笑也。

二二,拂晓即启程,往千佛洞。余于途中假护警乘马骑之,先到中寺,憩息片时,同行始到。遂分途出游,于一二(〇)号 n 洞发见大魏大统四年及五年画像题铭,翟荫君告我在京时所计划剥离者即系此洞云。顺序至一二〇号 o、p、q 及一二一号往北诸洞,复折至第三层,又自一一九洞往南直至五四洞,其中如一〇三及一〇五均为北魏洞窟之绝佳者。饭后,仍同溥爱伦君往游各洞,自五三号往南至一号。可注意者为第三层一九号 bis,伯希和于此洞摄影颇多,第某号发现元嘉二年题铭。时已三时三十分即登车回城,尚有五十余洞未曾游览也,拟于明日尽上午二小时内毕之。

二三,早起往千佛洞。翟荫君以明日必须东归,所欲预备之事尚未就绪,因此今日在千佛洞勾留时间仅能至二时为止,自此余所未游之洞约五十,势不能尽览矣。决计单独择各洞中重要之题铭摄影或抄录之。自第六号开始,至一二〇号 p 尚未毕,视時計已二时。急回中寺,匆匆啖干馒头数片,即上车辞千佛洞回城。昨晚预拟摄影之一一六、一一七、一一八 ae,一一九、一二一、一三一、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一六一 d 及一六三号并元嘉刘汉题铭之窟,均未能摄取影片,实为大憾。而匆促中所摄得之十七片不知结果如

何，又深以为虑。时达君第二日及第三日两日中共得十三片均拟在安西冲洗也。车中与汤姆生君闲谈，悉此来所费甚巨，结果仅能游览三日，以所费之数计算往游千佛洞之时间，计每秒钟费大洋四角，若以所费者与所获之摄片数计，则每片代价更属可观。回店后张哨官来访，稍坐即去。

二四，当地人送来唐人写经甚多，顾无精者，而索价颇昂，其长约七八尺之卷，亦须五六十金，较长者更贵，梵文经卷以购者少，故价值颇贱。余为吾校考古学室选购数卷，惟有《金刚经》一册，长一九仙米宽一五，类旧书装订之蝴蝶式，封面及册内均有着色图像并年月题记。其文如下：“发愿文：凡人持经，先须至心启请，稽首三界尊十方无量佛。我今发弘愿，持此金刚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保身，同生极乐国，归依佛教。显德四年岁次丁巳太族之月书记。”十一时偕同行诸人往县公署，赴杨县长之宴。同座有周统领、张参谋长二人，直至三时归寓。卖经者犹纷至，不忍一一谢却，必展卷一观方快意。将启程前尤多，使余勾留在此十余日者，当必有佳卷饷我眼福也。闻绅士某有虞世南所写一卷最精，北关天津人某甲亦云，其友人有一褚河南一卷可以割让，惜行期匆促，无暇顾矣。五时出发，计大车八辆，每辆送到肃州七十五元，缠回车有三，骡车一四十元。马五车翟荫君坐之，先赴肃州为止华尔讷君西来。出东门，一路尽系麦田，关外土地肥美，树木葱郁，无有过于敦煌者。但在城所闻，今年斗价颇大，食粮缺乏，人民赴县署闹荒已数次。殆因天旱欤？然引党河之水，足资灌溉，况关外向不以雨水之多寡，卜农事之丰歉，则今年敦煌之所以闹荒者，其原因当别有所在矣。

二五，天明到疙瘩井尖，忽起风，尘沙眯目。余不惯午睡，遂在车中补记日程，数分钟后纸上尘土为满，巩仆来告，店西坡上废庙较可避风，往就之，铺毡于地，略较安适。十二时午饭，饭后与静山统领闲谈。一时启程，四望尽系戈壁，沉闷已极，遂在车中展阅所

得唐人写经，足破寂寥。傍晚复起风，半夜到甜水井小尖，风势更厉，余拥被卧，觉冷，覆以毡，未几又覆以大氅，最后凡在车中所易取之衣服尽覆之，然终夜犹瑟缩也。

二六，早六时到瓜州口，早餐后，偕静山统领，溥爱伦、时达二君往游离店约半里之小墩。墩之建筑为正方形，顶部略尖，溥爱伦君谓如希腊之坟墓，欧洲建筑家称之为蜂房式。向南开一门，壁上有画，今惟东部上方略存数尺，余悉残毁。余决其为明画，与离店往北约七八里之废城，有历史上之关系，溥爱伦君以为初系宋画，明代重修之云。回店补书数日来日记。

在敦煌最后数日内竟无片时余暇可得，因此所欲记载者，至此遗忘不少，颇以为憾。前数年闻有俄人某博士者，在千佛洞居留半年，测绘颇详。博士又能画，临画约有数十幅之多，后因接报得国内革命事起，即大哭言归，取道新疆，竟在喀什死于缠回之手，同行数人亦均被害云。

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时，闻余等至，即趋避他往。询之庙祝，亦谓精神尚好，则前日之传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厅之惩办欤？

下午一时启程，四十里瓜州故城，城中无民居。然四围土地肥美，村舍疏落入画。三十里进安西西门，已八时三十分，仍寓东街客店。

二七，午前往访陈县长，晤谈甚久。回店整理千佛洞及凉州各处所得拓片，预备付邮。晚间冲洗敦煌所照各片，结果极佳，良足自慰。直至二时始毕，在暗室中与时达君闲谈，颇不寂寞。

二八，午前在寓晒片，印“敦煌途中之我”约数十片，预备邮赠京中至友，极忙。下午四时溥爱伦君宴周统领及陈县长，余与同行诸人作陪，菜俱纯粹西式，调度指挥一切者，汤姆生君之力居多，以汤精于烹调故也。统领未及终席，因张参谋长来安先去，陈县长后

去约数十分间。席间饮酒颇多，酒后开留声机奏意大利、西班牙著名歌曲，溥爱伦君即就炕上随歌舞之。后汤姆生君奏军笛，缠回之赶车者，亦加入欢乐，载歌载舞，音节与泰戈尔同来某君所唱之印度曲颇相似。石天生君复强余歌，遂择取《问探扫秦》剧中两段随曲随演。最后时达与溥爱伦二君合舞数段，均极尽兴，亦旅中乐事也。十时始各回卧室。

二九，午前准备付邮各件，饭后赴邮局。归寓，为和阗旅商摄片十余。夜与时达君同洗照片，计泾川南石窟寺及兰州金天观壁画共六十幅，失败者仅三幅而已。自九时起直至次早五时三十分，为摄影事全夜工作，此实第一次也。

三〇，六时就寝，睡数小时即起，得伟子促归之电并昌儿等家书。下午与溥爱伦、王近仁二君商订千佛洞摘记颇久，后整理昨洗各片。

三一，午前晒印时达君所摄各片，下午整理之，费时颇久。和阗商来闲谈，夜洗途中所摄片及安西附近数纸尚佳。

六，一，午前誊录日记，预备寄京。十时往访静山统领，后复赴县署晤陈县长及张、牛二公。回店，得凤鸣促归电信，即赴电局复之。下午翟荫君偕华尔讷及柯乐克二君自玉门来。晚芷皋县长见访，华尔讷、翟荫二君与谈往万佛峡事，不得端倪，约明日再商。

二，早起检理途中速写稿片。两次同华尔讷、翟荫二君去访周统领，均以公出未晤。下午一时陈县长来请，商榷往万佛峡事，遂与华尔讷、翟荫、王近仁三君同去。列席者有周统领，张、牛二公并商会会长等五六人。最先华尔讷、翟荫二君要求在万佛峡勾留一月，地方代表仅允三日，后静山统领折衷为一星期，最后复决定为先去一星期，如一星期后认为尚有摄影工作应须继续者，再行磋商。讨论约一小时之久，余亦发言多次；议定后，余等先出回店。

四时偕同行诸人往县署，赴芷皋县长之招。设东西两席，席间行令颇多，散已薄暮矣。回店后，复为县长邀去瞻仰万佛峡寺中所

藏象牙雕品。先是县长以该件为安西古物之一，急应暂移县署保留，特于数日前派专人速道士携之来城，今晚始送到，因此邀余赴县署一观，时周统领，张、牛二人均在座。雕品外裹丝棉，及淡黄、深黄、红绸并哈达共计八重，展开后各人传观，群相惊讶，以为象牙雕品如此，实为向所未见。件系一整块象牙，分成两片，合覆之。外面所雕者象一，鞍踏悉具，手捧宝塔之人跨其上，塔之下复有一像负之，象身前后足间左右各二像，其后上方及前下方左右又各有一像焉。像悉袒胸，散发作波纹式，衣蔽下身，赤足。左右两面各为二十六方，方刻《佛传图》至细密，该件长径一五点九仙米，中部最宽处为三点四，每片厚径为一点五。在座诸人以雕刻年代询余，余以其所雕诸像容貌、服饰纯为印度风格，且雕件外面主要物品系一大象，象产印度，内面《佛传图》又显然可见印度式雕刻，因断定该件系印度作品，且由此推定必为唐代西游僧侣所携归者；芷皋诸君深以余说为然。时张、牛二公回玉门，遂送之登车，还店。

三，九时赴县署晤芷皋县长，为象牙雕件摄片十余，并抚拓数纸，下午一时始拓毕，遂在署内午饭。芷皋并出示瓷青纸金书《华严经》一页，系其友人黎君所赠，纸张三五点三仙米，宽一二点一，每面五行，每行十五字，上下各两边线，一宽一细，宽者径零点二五。闻其友人曾有考证一篇，附刊集中。芷皋遍觅不得，仅有赠经时函牍一纸，尚可考见此种写经来源。特抄录如左：

（上略）“金书《华严经》凡六十卷，清光绪初元在阆中城东开元寺发见。闻初出时，贮石匣内，全卷书自一人，署有开元年号，惜书者姓名无考。笔意与诚悬雅近，不独楮毫双绝，即金色亦奕奕有光。询可宝也！当日寺僧奉为神物，值天旱，千百人揭竿曝烈日中以祈雨，阆邑习惯名词拜《华严经》即此。鹿芝帅巡行川北，悉携以去，绅耆无过问者，今所存者百之一二耳。敦煌莫高窟写经，士夫争以重金罗致，视此未知何若？此经沉沦于屏山字水间，近数十年，邑人既罔知宝贵，中间又为有力者攫取，束之高阁，未获闻名当

世。……特剪赠一幅，留作纪念。”(下略)

据甘州杨某所述：大佛寺亦有金书经典，天旱时取出祈雨，其俗一如阆中。惟闻经本绝大，与此不相类，其为余所购得之《大方广华严经卷》五册则大略与之相同。纸长三四点七仙米，宽一二点一，每面五行，每行十五字，上下两边线，上宽下狭，宽者零点四。无年号，就画像断之，为明代写本耳。但沙河堡章某告我，敦煌千佛洞中亦有此种写经，约十余套云。其亦唐人所写欤？不可考也。二时回店，三时与同行诸人赴周统领之宴。席散即回寓，收拾行李，七时登车，出南门；余以席间饮酒过多，在车中极为不适。

四，早在狭口荒野小尖，余未下车，下午一时到麻菇台子，自安西至此计百六十里。该地仅有道院一处，无民居，在此憩息约数十分间；出院，东行十里即系万佛峡，先游览上层各洞，计自第一至第十五洞，后至下层，约有七洞，未及到西岸回院休息，闻峡口亦有石窟六七，谓之下洞，系对万佛峡而言，殆即斯坦因氏所称之小千佛洞欤？询之乡约，据述峡水甚大，颇难渡涉云。

五，早起即同往万佛峡，余单独先往西岸，寻还东岸，工作终日，摄片二十余，并抄录题记、速写数幅，殊忙碌。芷皋县长亦亲自编定号数，跋涉极劳。六时回道院，晚饭后，与翟荫、溥爱伦、王近仁三君谈先回北京事，华尔讷君则坚留一日，以乡民对于外人，颇有烦言，而县长明日又急须回城故也。予遂决计后日启程，先回安西，至多勾留一晚，即就道进关，兼程回京。

万佛峡东西岸石窟，依安西县之调查而编号者，计四十，东岸有两层，为窟二十七，余均在西岸。东岸多元窟，并有西夏窟，宋窟则在西岸者为多。其题记之可记者，摘录如次：

(一)东岸

第十一窟 第一弧门左方：“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窟记”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

供养人有元至正十三年题名

第二入口右方：“敕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一心供养”

左方：“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公主陇西李氏一心供养”

第十二窟 第二入口东墙：“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榆林窟记”，其北有“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千佛寺记”、“至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重修记”

第二十五窟有至正二十五年题记并有“□□皇太子”等字样。

(二)西岸

第四窟 敕入口：“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

“敕受凉国夫人浚阳郡翟氏一心供养”

第五窟 入口：“敕竭诚奉化功臣归义军节度瓜州等州观察处置管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

“节度副使……”

“光禄大夫……”

“天朝大于阗金王国皇帝的……”

“敕受武威郡夫人阴氏一……”

“□□清河……□氏……”

第六窟 “敕□归义军节度内亲从……”

入口左方“男司马迨禄……”

在万佛峡大佛洞中见一匾额，叙述牙佛事：据称清初时某僧于积沙中获之，同治回乱，踏实一带均被蹂躏，道士星散，牙佛亦遂失踪。乱平，遍觅之，始悉已移置金塔，初奉于塔院寺，寻在梁贡士家，后为盛居士所供养，地方人民即醮金推代表，往金塔求之，往返半年，几费唇舌，居然佛归原处，此光绪三十年冬间事也。特记之，以补芷皋县长所述之缺。

六，午前在寓中检理万佛峡速写诸稿，饭后与河南来车马五磋商车价，自安西直达陕州洋二百元；后因风大遂未往石窟。晚与近仁谈至夜深；睡后旧病复发，胃脘部疼痛甚剧，且呕吐数次，颇以为

苦。

七,早起以昨夜胃病,精神极委顿。六时,遂别同入就道,路中频频呕吐,极为不快。

自出道院后,北行四十里,尽在峡中。峡水甚大,闻塔西一带田地,均资此水以灌溉者也。红柳正作花,时见数株,摇曳风前,足资顾盼。出峡后七十里,全系戈壁。四望寥廓,不知所极!七十里后,复入山道,即在安西所见之南山也。蜿蜒曲折,约十余里,始出山。自此沙漠河滩约四十里,进安西南门仍宿东街,到时仅四时,余以精神颇惫,即支床而卧。静山统领来,勉强起与周旋,去后复卧。

八,昨夜仍胃疼,今日依然。下午疼痛复延及左肋部,放散至于肩胛部腰部,呼吸极困难,坐卧不安,深感苦痛。来时以同行中有石天生君,遂未携药品,今石天生君在万佛峡,须四五日后方可回到此间,寓中卧病,至为焦虑。四时芷皋县长来,县长适从桥资回城,闻余病即来寓探问,至可感也。以车夫马五所约来中医药方示之,谓系顺气药剂,平稳可服。勉强与谈三十分间别去,即购药服之,少顷,县长又送来沉香。客中遇此,深可感谢!

九,昨夜服药后略瘥,左肋部疼痛已减,呼吸亦较通利。勉强起床,略略休息后,即去访县长,以有一部分旅费由县长转划,故不得不扶病访之。芷皋睹余状,极力要余寓署中,以便休养;予以今日痛势已减,胸部亦觉疏利,拟即就道东归,即辞出回店,收拾行装。午后四时,芷皋来,送来划款并托转兰州各款,复力劝在城休养数日,余婉言辞谢,久谈,始别去。少顷,遣人送赠途中用品,厚意可感!六时往静山统领处辞行,适遇吴所长,为余开调理方一纸,并谓系脾胃过弱,积水存留不化,肝气复上犯,遂致胃脘肋部作痛云云。余以其所述按诸中医病理,颇为相近。且中医于脾胃二字并称,实存妙谛。此脾字切不可作近今科学医之脾脏解,依余愚见,确系脾脏。但近今科学医于脾脏疾病,知之尚鲜,而中医视脾

颇要，此中医有独到处也。遂别统领、所长，即登车出东门；夜半，抵小湾尖，复赶站东行。

一〇，午前十一时抵布隆吉城，计自安西启程至此，一百六十里。精神困惫已极，到店即铺陈，蒙被而卧，然久不成寐，更感苦痛。余自七日万佛峡启程后，至今已四日矣，仅饮牛乳数杯，而胃不觉饿，颇以身体衰弱，未能远行为虑。

午后四时金巡警来，苏巡官在万佛峡时嘱为招待同往东千佛洞者，余以病尚未愈，遂中止焉，东千佛洞志书不载，前次途经三道沟时，据乡民所述其南有千佛洞，后在万佛峡遇苏巡官始悉其处，在布隆吉城南九十里，西距桥资七十里，有石洞十余，并有西夏文写经残片，前日在芷皋县长处已见之。推想石洞壁画必多西夏时作品，异日西游，不能不一去调查也。六时登车，一路颇寒。

一一，午前三时，赶车者忽迷道，幸有月色，且距三道沟约十余里，四围已有林木，可无他虞，然亦良久始觅得大路。余蜷卧车中，终夜竟不成寐，精神至为痛苦。天明后，抵三道沟，小尖复行，十二时进玉门城，共行一百五十里。到店啖小饼一，数日来至此始行食面，后又服药一剂而卧。四时县长持片来，邀往署中晚饭，予以病尚未愈，辞之。少顷，李县长来视疾，略谈别去。

一二，早三时余上车行十里后天明。途遇关内苦力之赴新疆者约有二三十人。十二时到赤金峡尖，下午又行，六时到赤金湖宿，是日共行一百三十里。途中以近日精神迷离恍惚，而幻想尤多，遂出网师园所选唐诗读之尽一卷，然掩卷者亦十余次。到赤金湖时夕阳将下，拟散步河滩，稍舒筋骨，终以腿脚酸软而罢。

一三，天明发赤金湖。十一时到惠回驿尖，下午三时复行。今日有风。日站行戈壁，尚觉凉爽。傍晚到嘉峪关，途遇新疆招募军士之出关者约数百人，是日共行一百六十里。晚，双某来，稍谈即去。

一四，早起发嘉峪关六十里，于午前十一时到肃州，寓东关悦

来店。稍稍整理后,即进城先至方园进餐,索米饭不得,仍用面食。出访祁观察于道署,悉京校有风潮,顾不得其详,至为纳闷。晤牛科长并获观得自吐鲁番之高昌墓表砖一,约定明日假拓数纸携归。遂辞出,往访吴军门晤之。复与张参谋长晤谈颇久,并识秘书军需数人,秘书于君江苏同乡也。辞出,回店,阅假自镇署之五月十五及十七两日上海新闻报,始于五七风潮略识大概,然此系一月以前事,未悉近状如何,不能不令人悬悬也。

一五,午前重复检理行装,镇道两署均来约,赴署中午饭,辞之。十一时到方园用饭。高台米颇富黏性,色白、粒亦较大,西北所难得也。一时至道署,拓高昌墓砖,方约尺二,共三十一字“延昌二十六年丙午岁三月朔辛亥二十五日乙亥民部主簿周贤文妻范氏之墓表”。祁观察复殷勤约在署中晚饭,遂先赴镇署,向军门辞行,摄片数纸,折还道署。晤张参谋长、丁委员、汪、永二前县长诸人,又摄十余片入座。席散与汪君同辞出,赴丁委员寓所,假观敦煌所得经卷。雷雨猝至,据闻此间早已半年余,盼雨甚殷,得此,虽于农事补助至微,然旅中苦旱已久,藉此稍杀干燥气候,固大佳事,不仅为余洗尘而已也。雨停后,辞出,偕汪君回店,汪君毕业武昌师大,与谈颇久,后于君亦来访。二君去后,军门遣人来询明日启程时间,拟来店送行,即复片辞谢。

一六,九时发肃州,一路林木极密,间有稻田,然弃地仍多,未免可惜也。四十里临水驿尖,过此即系草滩,俨然关外气象。二十里黄泥堡,仅有居民数户,四十里双井驿宿,共行一百里。客店二三家,颇似赤金湖,店内停大车数辆,悉装高台所制草帽,每顶只售钱三百余文,闻运赴金塔云。

一七,早发双井驿,四十里尽系盐滩,直至盐池堡,堡有居民数十户,并有高台盐务副税局所。堡东盐池较敦煌道中所见者为大,据闻产盐颇富,盐色亦白净纯洁。又三十里草滩,至深沟驿尖。尖后东发,十里山嘴墩,上坡稍有沙窝,又十里红寺坡,下坡复十里花

墙子，有店房可以尖宿，余因赶程故，促车夫前进。右有沙阜，左有苇塘，颇擅风景，且自红寺坡后。四围即见林木，如是二十里至黑泉驿宿，共行一百二十里。

一八，早起天阴，五时发黑泉驿，二十里至羊达子，略有市镇，过此麦田弥望，亦有稻田，宛然江南景象矣。如此绵亘几二十里，将近高台，十里内有苇塘，是名南湖。进西门穿城而过，街道整齐，市廛比栉，远胜安西敦煌诸县。出东门后，有二道并趋沙河堡者，详见四月二十八日日记。余以赴威狄堡一道，沙窝较大，遂决定经由抚彝。约行二十里入抚彝界，天雨，雨后复继以风，而四周尽系田亩，渠水沿路皆是，麦田中杂植罌粟，已有作花者。又二十里至抚彝县，雨止天晴，遂出西门客店小尖，余则进城一游。全城面积极小，与东乐相伯仲。抚彝在昔为厅治，民国二年始升为县，又与东乐情形相似。尖后经沙窝约十里，又十里至小屯堡，二十里沙河堡宿，共行一百三十里。将近沙河枣林极密，闻此处产枣最佳，未审与邠州相较何如？

一九，早起微雨，气候似深秋。七十里进甘州城，一路细雨蒙蒙，车中拥被而坐，犹觉寒冷也。仍寓皇府街，未及铺陈，即去访马代镇守使，悉陆督已有电来，即派马队护送云，遂回旅店。途中遇雨，衣履尽湿。不及往访县长，即发一信去，询黑河桥西夏碑事，旋得复。拓碑人杜姓来访，张、杨诸君亦相继来，见魏徵写经二卷，悉系贗本。镇县均差人持片来，镇署复询行期。

二〇，七时发甘州，城外罌粟种植颇多，作花浓艳，与南山积雪相映，遂成奇景，此非甘省不能有也。七十里东乐县东门外尖。适值祈雨，建醮坛于城内国民学校，特进城往访执事人某君，得于布篷外窥见所谓内坛景象。向南供神位及供器等，朝北搭一小坛，三面蒙黑布，一同善社社员作法其中。余侧耳听之，仅得龙王二字，然三分钟内连诵约有数十遍，可怪也！外坛向南，亦陈设一供桌，中悬黑绸金绣龙轴一幅。乡民来者，均于此处跪拜；外插黑旗两

面,复有鼓手数人,以司音乐。醮坛大概情形如此。此次自敦煌东归所过城邑,均见县知事“虔诚祈雨,禁止屠宰!如敢故违,重惩不贷!”四言韵语布告。安西芷皋县长说:顺从民情,不得不然,玉门李县长并为之扶乩焉。抚彝朱县长则手执长香,往龙王庙祈雨甚诚,今见东乐醮坛,想县长亦必躬临祈祷无疑矣。尖后行四十里山丹县关外宿,共行一百一十里。

二一,天明发山丹,八十里峡口驿尖,甘州护送马队在此更换。途中见死羊甚多,初以为疫,店主告我前日阵雨颇暴,一时羊群不及走避,毙者约六百余头,亦可谓浩劫矣。尖后出峡,山坡下又见死羊约二三百头,尚未收去,惨不忍睹。至定羌庙,忽遇雷雨,幸不甚大。一路与护送排长高某闲谈,悉五六日前,于离水泉驿约七八里处,曾有土匪路劫,一行人死焉。事后峡口驿迅派队伍搜索数日,毫无踪迹,即将死者埋于南山之麓,竖一木牌,以为标识。遂指一弯曲之山麓曰此失事处也,此即木牌标识也。余为之惻然!高某复告我自定羌以南,水泉以北三十里间,于前月三十日内连出降劫计十七次,邮包亦曾被劫一次,因此分驻队伍于峡口。余按定羌与水泉间,正为山丹永昌二县接界所在,亦即甘凉驻军防地分划处。越北山仅数十里,即系蒙古界阿拉善草地,南则跨大黄山后,有极大之草滩,为人迹所不至,而定羌以北二十里以南三十里内,均系荒原,杳无人烟,遂为土匪出没之所,因此旅行者过此咸有戒心也。傍晚到水泉驿宿,共行一百三十里。

二二,早发水泉驿,改由水泉守备队护送,六十里进永昌城尖。尖后由凉州西军骑兵之驻永昌者护送。马队服装灰布裤,青布褂,红呢坎肩,前后有“西军精锐右军右营马队”黑绒字十,七十里八坝堡宿,共行一百三十里。今日本可宿永昌,以明日拟赶到凉州,遂攒程前进。

二三,拂晓发八坝,六十里四十里铺尖,尖后,四十里凉州东关宿,共行一百里。凉州附近罍粟花,均作白色,远望一片,仿佛丰台

道中看芍药也。在店小憩，即进城拟往访马镇守使，并购途中应用物件，忽遇雨，即急行回店，晚镇署派卫队来告，凉州派军士护送到古浪，再由古浪峡口驿等处接送云。

二四，早晨以赶车者修理车轮，启程稍迟。九时出东关罨粟花遍地皆是，有纯白者，有边缘作粉红或深红者，娇艳之色，令人望而心醉。然祸国殃民者，莫此花若矣！五十里河东驿尖，于客店中识黟县李君因公赴山丹者也。悉陕东潼关一带又有变动，车行颇难，此为十余日前在省城所得之消息，现状若何，不知也，闻之颇为纳闷。次洲厅长仍在省城，出席于北京财政会议及国宪起草会者，为潘局长及苏厅长，以东路有阻，改行北道，已启程云。约谈二十分间，李君先行，余尖后，又行五十里双塔堡宿，共行一百里。于离双塔堡十里之土峡中，忽遇阵雨，到店雨尚未止；余以胃部又感不舒，常觉嘈杂，并有暖气，吞酸，遂不敢用晚饭，即燃蜡拥被而卧，读《唐诗笺》，几及两卷。

二五，早发双塔堡，三十里古浪县，改由凉州镇署步队第七队之驻防古浪者护送。全城铺户门沿，遍插杨柳枝条，此与我乡之悬菖蒲蓬艾相同，儿童俱着新服，咸欣然有喜色。有以柳条弯成圆圈覆于头部，亦有系于辫发者。黍角随处可见，如此佳节，客中匆匆经过，殊令人不胜乡关之思！出古浪南门以峡中巨石当道，车行颇苦颠顿，遂舍车而步，此自安西病后第一次也。古浪河因昨日天雨，水势较来时为大。途中与三坝乡人某闲谈，悉头坝、三坝及土门于各处田地，皆赖此河为之灌溉。日来正苦亢旱，今获此水，农事可无忧矣。出峡复上车，计四五里龙沟堡尖，尖时微雨，未几即晴，尖后登乌稍岭又遇阵雨。于湘子庙坡下，复见新阡一处，前立木片，系二十余日前行人于此被劫而死者。乌稍岭三十里内，只有湘子庙在山巅，此外别无居户，荒野已极，且为古浪、平番接界之所，与峡口以南情形相同，而乌稍岭东则万山重叠，匪尤易于藏匿，旅行得于此两处，不可不注意也。下岭至镇羌驿宿，共行一百二十

五里,悉此处阵雨极暴,余在乌稍岭所遇,却不甚大,亦幸事也。

二六,早自镇羌驿启程,四十里岔口驿,更换西军第六营步队护送,又四十里武胜驿尖,尖后,三十里平番县西关宿,共行一百一十里。平番城附近及关内几于遍地皆是罌粟,视武威尤甚也。

二七,早发平番,由驻扎平番西军马队护送。平番关城颇大,明时为与番夷互市之处,且出产红纓,贸易称极盛也,回乱后,一落千丈,今则红纓已无过问者矣。出关后,沿庄浪河东岸,高处土地肥美,宜于种植,河滩则水草丰富,便于牧畜,直至红城驿,七十里内几无弃地;然麦田仅十之三四,而甘人所谓花花子者几占十之六七,红城驿附近尤多。遂在红城驿城内尖,尖后三十里盐水河铺宿,共行一百里。途中步行与乡人闲话,悉平番一县罚款去年十六万元,今年加增一万。寻常每亩可出麦三斗,以现时斗价计之,每斗四元,则每亩十二元。花花子新土出市,每元约售三两余,一亩可得二十元左右。罚款分摊,不论其地种植与否,以地亩之有无及肥瘠为准。红城驿去年麦田较多,今年则花花子过之。盐水河铺全系山地,且地含碱性,然罚款每亩八元,小小村落,亦摊至三四百元。今年委员尚未到铺,不悉将增加否也。此两处罚款直接解交平番西军某营长处,某为凉镇姻戚,当然转解凉州。余按甘省之所谓罚款,命名极美,细察内容,则某地明明无花花子也而亦强迫分摊之。人民以既已摊得罚款,自然群趋于改种一途,以为出产固较种麦为优,殊不知一究其极,与未改种前及未曾摊得罚款前,毫无出人。即使稍有霑润,亦极微细,而坐享其大利者,实为征收此罚款之军人。此犹就人民改种后,利的一方面观察所得之结果,尚且如此;其有害的一方面考核之,则一经改种,产麦额减少,斗价有涨无落。斗价既高,凡百物价随之增加,此为自然之趋势,于是生计发生问题矣。至于因改种之结果,烟土产额益增进,吸户亦随之而愈众,此其害犹小焉者也。甘省未来隐患,以余观察至为繁多,此亦甘省前途生死问题之一。

二八，未晓即发盐水河，七十里朱家井尖。一路均在山中，斜坡上时见白花一片，微风送来，略作枣花香。花诚可爱也！尖后四十里到兰州，寓东下关豫盛店；略坐，即进城在华兴用饭。住客法人某，与我谈游历西藏、青海事，并出示所摄照片，洗印均极恶劣，而又絮絮不休，殊可厌也。饭后，即至雅园，浴后如释重负。九时雇车回店，周君来谈甚久，约明早来。得谦和公司送来家信及友朋惠函计三十余封，一部分旅行照片亦由郁周、仲良二君寄来，深为可喜；至十二时尚未阅毕，后又作复数封，始睡。

连日途中时遇小贩，往往挑密篓二及随身行件，自东西去，同伴五六人或八九人，甚至有十余人者。询其籍贯，非湖北即四川。前日曾遇一湖北汉阳人云：每年二月出门，十一月回家。此次因东路不通，改道襄阳，步行人关。销售地点，凉州以西，直至敦煌，货售尽，购皮件鹿角等东还，此与新疆和阗商人情形相同，运来地毯布匹在敦煌、安西、肃州一带销售后，复由碧口入川贩来绸缎还新，亦每年来往一次。惟所异者，缠回资本足，骑牲口，押货用大车，四川、湖北人则小车经营，咸肩挑徒步耳。

前日在南大通等处，所见官膏销售商户悬有调查吸户之虎头牌，殊为不解，特记之。

二九，午前周君来，同出门，先至谦和晤吴君，后至严宅看北魏造像，出往财厅晤陆代财厅长，取校寄划款，并闲谈东路情形。辞出同周君在济南春饭，饭后至电报局发电，即至周君处，看秦州出土宋瓷碗及汉镜数件。遂往督军署，访谢厅长谈颇久。晤张检察长及廖秘书长，辞出后，往游兰山市场无所得，回店。董季高同学来访，董君现在此间陆军医院，谈约数十分钟别去。晚间遣医兵来，邀往寓所，遂同去闲谈甚久，董君新夫人亦母校毕业之助产妇也，十一时回店。

三〇，早董君遣人来迎，遂同出新关，杨柳夹道，田中罌粟盛开，风景至佳。约一里至陆军医院，晤董君，偕赴各医室参观。虽

因财政困难，设备较简，然董君苦心孤诣，经营二载，成绩斐然，英人所办之河北医院，因此一落千丈，殊为可喜，即在院中午饭。饭后，董君坚邀为医院附设之陆军卫生教练所学员演讲，固辞不获，勉强谈话数十分钟。十二时即同董君至督军署政务厅，见陆督，谢厅长亦在座。谈敦煌千佛洞事，约半小时，辞出回寓。董君偕马君来访，陶秘书亦来，详谈往东情形。董君又遣其公子来，遂同至关院，托董君介绍醴泉、咸阳数处友人，以便行旅，余遂回店。未几董君遣人送来介绍信数封，及可供“风俗调查会”参考之画戏纸扇两柄，可感也。

七，一，早雨，决再勾留一日，周君及介眉均来；去后整备行件。十一时为划款事到谦和，稍坐即回店，十二时往华兴饭，得蚕豆及小青椒，时天已放晴，惟道路极泥泞耳。饭后，至邮局，晤杨君，托寄书件数包，免随身携带也。赴电报局后，去访陶公于督署花园不值，即出至南大街，购途中应用物件，回店。晚又雨，然明日无论如何，必东行矣。

二，六时十五分发兰州。出东门，罍粟一片，作玫瑰色，极娇艳。四十里响水子，所有可耕之地，几乎全种花子，可痛也！兰州斗价现已涨至八两（斗量较甘凉为大），以此情形卜之，秋后殆无低落希望矣。尖后，以响水河水大，遂过利济桥上山坡，约七八里始下河滩。雨后水发，路又泥泞，四五里下关营宿，闻甘草店附近车行亦甚费力，果尔，则明日又难赶站矣。

三，昨夜又雨，甚大，至今早尚未止。十时稍停，即催套车。十时三十分发下关营，不及一里，山沟以雨后车辙流水成阱穴，车为所陷，鞭策久之不能出，幸后来一车，遂假一骡驾之，始曳之上坡，不敢复行沟中矣。然一路极泥泞难行，至五时三十分方到甘草店，费时七小时，仅行四十里。行程之难以预定也如此！到店，已有数车停留在此两日，未能东下，以甘草店往东南，上车道岭，雨后路更难行也。响水河经昨晚之雨，水势益暴，若今日发兰州者，只能暂

住响水子，不敢如昨日之能涉河滩矣。到店后，天阴仍无晴意，若今晚复雨，明日不但不能赶站，车道岭即不能过，颇为纳闷。

今日车夫马五觅得陇南当制钱一百文之铜元一枚，正面为四川铜圆军政府造，背面有篆文汉字，一如寻常所见之当十铜圆。因此联想到甘省银元行市，民三袁头七钱四，北洋次之七钱三，站人及十年袁头又次之七钱二，大清银币只七钱一，最可异者，甘肃银行一元纸币之票面明定为七钱一分，因此使用时，较民三者少三分。前日财厅陆君付我划款，尽系纸币（酒泉陈知事划款尽付站人及大清银币，安西陈知事则尽系民三袁头），而纸币一出省城，即不能行使，势非折换现洋不可，但一经折换，钱铺须有手数料，是以每元纸币折换现洋，约须贴四分余。据闻纸币之所以定此七钱一分者，因当时现洋行市实系七钱一之故。推其初意，原欲与现洋同其价值，结果，现洋行事涨，而纸币以有明定不能随之，遂转较现洋行市为低，此主张明定七钱一分之人，亦可谓之笨伯矣。至于以民三袁头兑换铜元，各处行市亦颇不同，省城满钱一千六百七十文，凉州九四钱一千六百文，甘州八八钱一千七百文，肃州九折一千六百文，敦煌九折一千三百文，满钱仅一千一百七十文，洋价实以敦煌为最小。省城有铜元钱票无折扣，凉州以西制钱甚通用。省城新旧铜元并用，凉州往西则沙版及煌新制铜元全不能行使。

省城以东自响水子起，洋价虽同省城，但系九九钱，新旧铜元并用。秤钩驿（属安定）以东为九八钱，会宁铜元满钱一千七百文，制钱一千九百文，高家堡（属静宁）铜元一千八百文，制钱二千文。至静宁即见平凉、陇东银行铜元钱票，自此洋价行市又添一种。在静宁钱票每元可兑三千八百文，惟用者甚少；隆德反是，几全用钱票，制钱次之，铜元极少见，钱票每元三千四百文制钱二千一铜元一千六。蒿店（属固原）则兑铜元竟不能得，制钱亦少，所流通者惟此钱票耳。去年年底一元可兑七八千文，今年二三月尚兑五千余文，嗣后逐渐低落，当余路经蒿店时仅兑千四百文，闻不日即可与

制钱同其价值云。

四,早发甘草店,上车道岭路尚易行,五十里秤钩驿尖。尖后,路多泥泞,将近三十里铺,因桥为山水冲毁,改行河道,车即陷入,幸有同行数车相助,推挽良久,始克出险,然几乎倾覆者数次。雨后行路,诚难矣哉!计四十二里十八里铺宿,共行九十二里,步行二十里。今日途中花子绝少见,全系麦田,青葱可爱。

五,早发十八里铺,四十八里青岚山村尖。途中绕行山脊,时见缺口,倘再冲毁数寸者,车即不能过,勉强行之,则一倾覆下坠数十丈,人马俱成齑粉,危险极矣。尖后二十里过西巩驿,十里后下一山坡,予车一轮陷入缺口,幸在内侧,然亦几经推挽,始能曳出。又十里樱桃河湾宿,共行八十八里。到店为时尚早,马五昨因车道泥泞,今日又以骡马困乏,不敢赶站,余亦只得忍之而已。屈指计之,十四站不及到西安,或须在平凉住一日,行路不能心急诚然。

六,五时发樱桃河湾,四十里过会宁城,又二十里张诚堡尖,尖后,四十五里太平店宿,计行一百〇五里。客店新建小楼一间,极清洁,楼有外廊栏杆,泥地平之如水门汀,余遂支锅架,燃柳枝野草,煮高台米粥。少时月出,光明如昼,即在廊下啜粥玩月,如此清福,得于旅中遇之,颇不易也。

七,六时发太平店,仅二里,同行一车覆山沟中。平地尚如此,况山坡乎?覆辙不远,可为殷鉴!七十五里高家堡尖,尖后,十五里孙家沟。自此上坡升祁家大山,远望山脊驿树成行,车马登降其间,宋元画家《关山行旅图》,今日余始见之。将及巅,忽起阵雨,急加鞭下坡,风雨骤至并有冰雹,遂在一小屋中避之。幸阵雨自西偏南,仅十分钟即止,比出屋登车,只数步,以地滑遽仆于地,衣衫尽为泥水所污,狼狈之至。三十里到静宁,城中积潦成渠,顷间阵雨所致也。到店已近黄昏,计行一百二十里。昨今两日稍稍赶程,然马五仍以骡马疲乏为辞,明日不知能否赶到杨家店。对付此辈,正宜宽猛并用,数十日相处,亦大费苦心矣。

八,六时发静宁,五十五里神林堡尖,尖后,四十里隆德城内宿,计行八十五里。隆德于同治回乱受害极烈,故空地甚多。饭铺有十余家,竟无一稍洁净者,远不如神林堡也。

前昨两日途中时见烟叶苗,已长四五寸,回想先父在沪三十余年,即营此贸易,自学徒起家以至开设行号,复于宿松九江各处,设庄派人,采买运沪,销售各处,一旦弃养,不肖如余,竟不能继承父业。思之腹痛!

九,五时三十分启程过杨家店即上山。途中杨花铺地似积雪,五月飞絮,惟六盘山中为然,登巅稍憩,即下坡至庙儿坪候车。马五于肃州购一马,昨日在隆德以数日来黑骡困乏,复购一青骡,遂成四套,因此今日上山极不费力。余自山巅下坡仍走来时小道,中途颇狭,且全系细砂,行时须用虚劲,漫不经意。固易失足,若矜持太过,转致蛙步难移,余于游天龙时,已有此种经验。

六盘来时,冰雪载途,极不易行,山巅候车时,又以饥寒交迫,遂先下山,至杨家店。此次东归,虽系独行,而山色苍翠,涧流飞泻,六盘盛概,得领略一二,深自欣幸。下山时驿树尤密,此左相所遗也。计四十里至和尚铺尖,遇来时熟车数辆,后又四十里蒿店宿,共行八十里,步行三十里。过三关口时,摄取数片,藉补来时之缺。

一〇,初明即起,有形似军士者一人来寓,逡巡即去。马五告我,昨晚亦曾来过,恐系索车者,遂即套车出店。果见空车数辆,停留街中,并有军士三四人,灼灼视余车。三十里安国镇,驻有军队约二三连,正在准备出发中。兵士命马五装载口袋十余于余车中,运回平凉,余严辞拒之。及下坡,车不及避,擦马队之乘马而过,马五竟因此横受数鞭,亦只得吞声饮恨而已。四十里到平凉,寓东关恒泰店,稍憩,即往小饭店中进午膳,候久,仅得炒面片一碗。草草用过,遂进城,往道尹公署访贾观察。出至荣庆店,访受团长不在,晤其同僚王君。稍谈归寓,阅假自道署之京津报纸,(六月十九日

至二十二日)惊悉汉口又有英人惨杀我同胞之事发生,不悉二十日来,又作何种情形也。

一一,早得受君介绍函件,即出平凉东关,七十里白水驿尖,尖后行四十里王村铺宿,共行一百一十里。以《志》称离泾州北十五里永宁里之石窟寺,遍询乡民,竟无一人知之者。

一二,平明即发王村铺,三十里泾州,先往河北王母宫,见有折断佛头三四,在瓦砾中,殆为夫己氏前次来游所留存者欤?是真可伤矣!遂进北门,往访知事郎君,尚高卧未起,其政简可想。晤其幕友某君,亦因余至而起身者,可感也。询以永宁里石窟寺,茫然无以应,承招一捕快来,同出南门。安置车辆讫;骑马出东关,马、孙二君偕行。经王家沟时,据闻隔岸南石窟寺所剥离之佛像,尚未兴修。东行约五里,渡河,石窟七,朗然在目。以泾川即经行其下,不能登涉,须绕道上坡复下,始进东侧第一窟,由此通行,以次至第六窟而止。第一至第四均系空洞,第五窟有新塑佛像数尊,第六窟中央大佛一,高近二丈,胁侍稍逊之。确系北魏作品。东坡中途复有二小洞,三面造像,隐约可辨,此为泾川盛涨时水流冲洗所致。其第一至第四窟壁间,冲刷痕迹,亦极明显。此处乡民称为丈八寺,按之《泾州志》寺观门有“石窟寺在永宁里,至治十五里”一则,《甘肃新通志》则称“丈八寺在永宁里”云。以方位证之,《泾州志》所记之永宁里石窟寺与《新通志》所载之丈八寺实为一处,石窟寺为其古名,丈八寺为其俗称,犹之吾人恒见所称之石佛寺、千佛寺、大佛寺等等(崇信、合水均有丈八寺),而此乡民所称之丈八寺,即系二志所记载之丈八寺及石窟寺。此寺之名称既定,然后得以解决从前所发生之疑问矣。(一)永宁里之石窟寺现尚残存一部,(二)官山大佛洞与永宁里之石窟寺,毫不相涉;惟尚有怀疑者,王家沟之南石窟寺是否对此石窟寺而言。此外即别无所谓北石窟寺?抑所谓北石窟寺者,为传闻所知之镇原石窟寺?此则非余所知矣。

由石窟寺回至泾川南关，已近三时，余自早至此，尚未进食也。不及赶宿高家坳，遂决计在此停留半日。四时与孙君往游嵩山高峰寺。《志》称嵩山高峰寺有魏、唐碑刻，文庙所保存之《嵩显寺碑》及大唐《重修高公佛堂碣》即自此处移去者。遂上南关东坡小道，达其巅，仅有小屋一，供药王神像，别无殿宇。碑刻卧草莽中者有三四石，均系明清重修碑记，景泰七年大钟一，断头损手之石造像一，台座有题铭，惜已缺年号一角，余以弃置此间，不若携归吾校，遂由孙君裹之回店。余复进城，至永庆寺，国民学校适在院中授课，即退出。招拓碑者，拓文庙唐碑，并回至文庙细审《南石窟寺碑记》原石。

一三，早起不见拓碑者来，遂至文庙，而《高公佛堂碣》还未拓就，候久始携归登车。四十里高家坳尖，尖后六十里长武西关宿，计行百里。

出泾川县南门上坡，一片高原，百里直至长武是为南原，泾川以北为北原，官山之后为中原，总称曰泾原，其在陇水左右者曰陇坂。连日途中罍粟已全收割，泾川提罚款委员亦已到县，农民忙秋种矣。

一四，早发长武，六十五里大佛寺尖，尖后四十五里太峪镇宿，计行一百一十里。

大佛寺西约七八里，有石窟无数，余意此非寻常窟洞，必为与大佛寺相连之石窟，惜无绳梯，可以攀登，以一证余说也。后于大佛寺西数百步处石窟中，果见造像。其一东西南三面各有坐像一胁侍二。西者屈右足，偏身，遍缠瓔珞，极似天龙唐代石窟中之最精者；虽全部曾受泾水冲洗，石质剥损，而丰神犹灼然可见。其一则南壁仅存一像，东壁下部残缺小像约八九尊而已。比至大佛寺即从事补照。偏西宋人题名洞中，北壁有等身菩萨造像数尊，手提净瓶，姿态极精美。近人每谓造像艺术，至唐代而益见圆满，我亦云然。寺中大佛高约八丈余，游者徒震其高大，遂谓庆寿寺之足以

称述者，惟此大佛而已，此其一；或者又以为崇楼数层，贮此庞然大物，几类笨伯所为，此种评论，时见近人游记中，此其二；余以为此两失也。前者不知石洞中尽有精美之造像在，徒以佛像高大而赞叹之，是其见解，直等于乡曲；后者以一时的情感，欲为艺术的定论，其不谬误者又几希。盖后代重修时之假面泥像确可憎，而内部原来之石质造像，固不如是也。即推一步，不涉冥想，稽诸实质，则大佛背光之造像也，飞天也，火焰也，决不能谓无艺术上之价值，而遂武断之曰几类笨伯之所为也，故我曰此两失也。

尖后车行枣林中，花未全谢，尚有余香，耐人寻味。既至太峪镇，以山水极洁净，遂解衣浴之，顿觉轻快。惟一回旅居，飞蝇群集，晚间蚊也，虱也，臭虫也，久不成寐，痛苦已极。

一五，昨夜有雨，早起雨止，即发太峪镇，不数里又雨，四十里永寿，雨益大，遂往南关。车停门道中，当院泥泞，不堪涉足，不得已在车中用饭，补录日记，苦于蝇多，几致手不停扇。四时后，始有晴意，蝇集愈多，下车帘又感苦闷。晚间即睡在车上，如此生活，亦草草过去。从此可知天下无不可忍耐之事，须放心得定，自然随遇而安。雨中闻新知事走马上任，此公兴致亦复不浅，一笑。

一六，早发永寿，六十里丰市镇尖。丰市客店有三四家，俱极洁净，为西来第一，惜昨日因雨不及赶宿此间也。蝇绝少，儿童颇多可爱者。尖后以大路雨后尚无车辙可寻，遂绕道偏南折东，过柳门镇，有晋《周孝侯殉节处》及《窦氏双英》二碑。六十里醴泉西关宿，计行一百二十里，实有一百四十里。进城往访党团长，已往三原未晤，遂出。

一七，早发醴泉，仍绕道走七十里，实有九十里。至咸阳西门，出示北大护照，稍候始进城。车停店中，余即去访县长，谈咸阳出土古物拓本影片，悉在省中或可得之，原物之散失者，恐已什八九，可惜也。并闻吴新田已于前晚退出省城，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师长昨早进城，维持秩序云。遂辞出稍尖店中，即套车启程，至东门

以不通出入，即折而出北门，到河岸，晤陕西军第五混成旅陈团长之副官贾君。陈团现驻扶风，在甘安君介绍云在醴泉者误也。现驻咸阳之第二十二混成旅王旅长亦进省，已在船中。余与贾君等同船，渡至南岸，费两小时，三十里三桥镇宿，计行百里。途中见有军士颇多，初误以为退却之第七师，实则第二十二混成旅归集咸阳之步队也。

一八，拂晓即发三桥，二十里到长安西门，稍候进城，至北桥梓口义顺店。悉吴新田于十六晚退出，李师长于退出后约两小时即进城，驻省公署，复派队追击焉；退出前，在零口、临潼等处，曾经开火云。设余前五日来省者，必在省东亲见战事，彼时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狼狈情形，可以想见；前三日来者，则长安西门不通行入，只能退住咸阳，或竟途遇败卒，更属不堪设想矣。此次适因途中有雨，遂致稽滞数日，到省已事过境迁，深自庆幸。十二时乘车往谦和公司晤章君，稍谈即出赴邮局，竟无一信，遂在义仙亭饭。饭后至电局发一巧电，即赴省公署取李师长护照。往碑林博古堂晤李君，选购拓片十余种，得太原风峪北齐《华严经》全份，深为可喜。出碑林，往游南院门书肆，无所获。识第一师范学生数君于风雅社纸扇铺，略谈英日惨杀事件。悉广东沙面受害尤酷，且牵涉法国，闻之甚为痛心。别后浴于华清池，归寓，已近黄昏时矣。店中住随同青海王公回甘之喇嘛数人，悉王于已于数日前移住咸阳，来此已近月余，以不得车辆未能西行云。其中有藏人一，塔儿寺喇嘛二人，闲谈颇久。塔儿寺往拉萨约六十站，须结伴同行，否则恐遇番子被劫也。拉萨往加林坡二十余站，有宿店可住，自此即可乘车赴印度喀尔喀达。

一九，本拟今日东行，赶车者又托故骡马困乏，遂稽滞一日。午后往南院门，购应用物件，去访昨识之阎君昆仲于风雅社。悉阎甘园先生为其尊翁，即出片相见，晤谈颇久，承赠所藏魏石之一，《长宁穆公墓志铭》拓片一纸，并出示李龙眠白描画幅，上有顾阿瑛

题识，及新出土西汉明器数种。甘园先生精鉴别，所藏书画造像甚多，惜明日须东行，不及遍观，深以为憾。辞出往长乐楼，饭毕归寓，途中经东大街骡马市口，见有斩首死尸一，横卧街中，非第七军之残兵，即本城土匪之乘机抢掠者。回店后，颇热，久不成寐；夜半大雨。

二〇，早起催马五装车，迟至十一时始启程焉。一路所见军队颇多，有整队者，有三五成群者，络绎不绝于途。五十里临潼城内尖，苍蝇之多，出人意外。城内极萧条，只有小商铺数家尚开市。其受军事影响欤？尖后三十里西河镇宿，计行八十里。国民军第二军某队来查店，同行陈君被查甚久，余出护照，仅诘问数语即去。

二一，早发西河镇，五十里渭南，途中情形一如昨日。过渭南后，往西队伍绝少。二十五里赤水镇尖，尖后六十五里敷水镇宿，计行一百四十里。过柳枝镇后，似有阵雨。余在车中，静看华山出云，诡变万状，殊非笔墨所能形容。马五急加鞭，比到客店，雨即随至。店与永寿大略相同，车在门道内，对面大院，门道之右一小屋，火灶在焉，污水窖一，距余车仅两步，同行孙君即在其侧铺毡而卧，余则仍睡车中，臭气至不堪耐。小屋南房为店主所居，有一初生儿，又彻夜啼不休，厌烦已极。此诚地狱生活也！夜半复雨，深为可虑。

二二，午前雨甚大，不能套车。九时后，时有来叩车门者；十时有驮运子弹牲口十余来店。其时敷水镇街市，尽系军队，询之，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二混成旅之一团，自华阴开拔西来者也。十二时放晴，余在车中，始见华山。一时三十分启程东发，一路所见队伍极多，衣履尽湿透，雨中行军之苦，今日亲见之矣。约行十余里有子弹牛车二，陷泥淖中，兵士命马五卸余车骡马曳之而出。其时华山复起云，远看山中暴雨，如展高房山、方方壶图画。未几雨及余车，四围烟树迷蒙，云山蒸郁，笔墨又似恽南田、董思翁仿米山水。将及华阴县，雨止云散，得饱看山巅飞瀑。复有薄云数片，渲染烘

托，此景惟诗与画能尽力追摹之，仅凭机械，欲传其情意者，是妄人也。至岳庙镇，以不及赶往潼关遂宿镇西小店，计行三十五里。

数日来在西安及在途中所得消息可记者：临潼战事在十四、十五两日，第七师大队退走后，残部曾在南院门一带抢掠数家，幸警察维持秩序颇力，地方未致糜烂。其饱掠出城之残部，当经李师追及，丧亡逾什之八九。大队先经斗门镇，距西安四十里，稍有抢劫，过此三十里大王店受灾颇巨。现第二、第三两军已追及鄠县左近，作包围形势。陇南王孔繁锦势力所及之地，亦派有队伍迫其退出陕境。当余到兰州时，颇思绕道陇南，由南道回陕。后因须多费五六十站，遂尔中止，否则又要受虚惊矣。

二三，早发岳镇，望华岳隐现云隙，如海上岛屿，洵称伟观。此番西来，虽未一探岳胜，而一二日间得饱看山中变化，亦可谓奇遇矣。三十五里进潼关，飞蝇扑面，仿佛临潼道中。出东门，检查处搜检马五车辆颇严，余出示李师长护照，得免验焉。出关，行土峡中，七里至七里店尖，尖后十三里文底镇。将近镇时有缺口，黄河离车道仅数十步，车即转而上坡，绕河岸而行。过文底镇后，悉盘头、阌乡间车道为雨水冲毁，尚未修复，不能通行，今日只能至盘头镇而止，不及赶宿大安镇矣。行二十里遂至盘头，遍觅客店不得，在镇东得一小店宿焉，计行七十五里。途中时遇积潦，车行颇苦。店中已寓陈、王二家眷属，识蓝田赵君，君毕业于吾校工科，现为延长石油官厂总理，晤谈甚快。约明日同路东行，后复偕往河岸闲步，傍晚始归。

盘头苍蝇极多，一片西瓜约有百余，饼食上集者几满。余数日来昼间苦于蝇，虽在车中亦复手不停扇，沿途食品俱不敢购用，今日仅以鸡子五枚，西瓜一个，聊以充饥；人晚则苦于蚊、蚋、蚤虱，不易成寐，可谓寝食俱废。小店极肮脏，进车门后一广院，中有过厅，陈、王二家附搭商货车二辆及余车均停于过厅下，赵君之车则在厅外。东屋二间，陈家母子二人及车夫各占其一。南屋三间，中屋王

家夫妇所占,东西两侧粪秽遍地,不堪涉足。院中亦复潮湿,余至此惟有仍寓车中之一途。马五及同行二人,均在车旁席地而卧。余正拟铺陈间,陈家所住东屋外,尚有一片地,扫除较为洁净,遂移布床于此,将于今晚露宿焉。八时后,店中所寓诸人熟睡已大半。过厅下除马五等三个外,有货车二辆之车夫,赵君在车中,赵君堂弟睡在小桌上,均旁在过厅偏南,余之布床距过厅约五尺。睡未久,忽听过厅发声,急起即见过厅自东部向南倾倒;未及穿履,即避至东屋外南部。倏时,过厅全部倒毁,尘土弥漫空间,呼号之声甚惨。斯时,陈君燃蜡出,赵君扶其堂弟卧余床上,左侧大腿受伤极重,已不能行步。一面复大声呼救,隔院遂来第三军某营工兵一连,救出被压诸人。货车车夫某甲,年六十余,已无气息;孙君为大梁所压,腰部受伤,设迟数分钟者,孙君恐亦无救矣。幸余人受伤均较轻,被压驴马,无死伤者。余即为赵君堂弟稍施缠络,惜行篋医药俱无,只能尽我力所能行面已。如此纷扰几五小时,在赵君车中休息,终不成寐。

二四,天未明即起,视余车几已全碎。车中包件亦为梁木所击坏,设余在车中卧者,其危险何如?顾余所支布床,离过厅甚近,竟未受瓦片木件之打击,亦可谓万幸矣。赶将车中各件取出整理。赵君雇脚夫六人,特制一担架,赶程西行,陈君附行焉。据闻六日前货车来此者有十余辆,当时以前途有战事,不敢西进,随即退往达子营,已死车夫某甲不愿往,留住此间,遂及于难。赵君昨日到此甚早,以搭船议价不谐,未能成行,致堂弟受此无妄之灾。余亦以盘头、闾乡间,不能通行,而大店又尽为军队所占,始寓此处,个人车夫及牲口虽无恙,而车不能行,终致稽滞于此。盘头离陕州仅有一百二十里,赶行一日可到,竟有如许波折,行路事诚不能预定也。赵君等行后,即到河岸,东下船只,曾见数艘,均不停留,怅怅而归。马五修理碎车,去车篷,已断车杆缚以长木,勉强装运行李,余决步行。于四时十五分发盘头,车行坡上,亲见土沟车辙,水冲

后陷入颇深。二十里阌乡，又二十里达子营，到店已深夜，余与马五均甚惴惴，以此处素多匪患也。本年自二月至四月间，匪风尤炽，赵君告我曾于盘头东行入山处，被劫一次；马五亦谓亲见被枪击死行人于达子营西五六里石碑之下。余于晚间经行此处，殊太冒险，不足为训。

二五，八时始发达子营。因东行车道被冲颇剧，待邮政大车先走，可望修筑后，随之通过。二十里秋仓，邮政车尖于林间，适见有轻车二乘自东来，函谷沟中或可希望过去，遂先邮政车行。出秋仓镇即上坡，入土峡中，果见车辙冲毁颇甚，深者有三四尺，浅者一二尺不等。马五于途中假得农器，由车夫同行友人李三随处修填，并时见修路乡民划区工作。遇李师长之参谋长来车，护兵告马五，坡顶一段，更不易上，劝退回达子营，暂缓一二日再行，余等不为所动。十里竟达坡顶，然其间经过困难，确为不少。比至巅，复见微雨，赶即下坡，路已泥泞，坡底即函谷，险要实胜潼关。其时雨点渐密，不及流连，即渡河至灵宝南关客店，拟暂尖于此，希望雨后天晴，可以赶宿大营，明日到陕。不想到店后，大雨倾盆，达三小时之久，市街水深几二尺，至晚始止雨，然尚无晴意也。后悉午前同行之邮政车，未及坡巅，即遇大雨，骡马被冲，包件尽湿。有牲口二，竟雇数人抬回秋仓，当时狼狈情形可想。余深以冒险得济为庆；然灵宝东门外即有高坡，如此大雨，车辙宁有不冲毁者，是东行仍多困难也，又深以为忧。

函谷沟中上下坡各有十里，大雨后交通即被断绝，非天晴五六日，复有大帮车辆，先为开路，随处修填后，不敢轻易驱车前进。此次以途中尚有步队，须急行人关，遂有乡民分区担任修填，通行较早。然邮政车稽滞在达子营者已四五日，运货小车之停留在灵宝者，竟至十余日；方冀一二日后，可能通行无阻，不想今日复有如此大雨，非十日后不能恢复交通矣。此处最忌于夏季过之，但入冬大雪以后其困难情形，亦复相似。沟中土峡极高，狭处仅容一车，且

曲折颇多，向称匪窟。前日第三军驻灵宝某队，曾于沟中捕得土匪四人，当即解往洛阳。余在盘头时已闻此处匪患尚未肃清，然函谷为东行所必由之地，别无小道，可以绕行，能否获免，惟卜诸命运而已。

二六，早起阴晴，即发灵宝南关，未及东门，已有泥淖。马足陷入约尺余，李三等先去探路，据报，坡道悉被冲陷，深者有五六尺云。即折进南门往访县长，拟设法觅船东下，县长已往潼关，代理者为第一科长某尚未起也。遂赴车马局，拟恳代觅牲口，结果仅得二小驴，但须将马五车留局备用。马五系三套车，局以二小驴易之，余非笨伯，岂能一愚至此耶？车马局之高情厚意，余对之惟有心感而已。遂即辞出回店，雇得小车一辆，专装行李，复套一黑骡，马五友人马套儿牵之，余与李三则各骑一骡，装驮行李数件，勉强对付启程。马五因病不能同回陕州，车费外所透支之五十余元，无法归还，余亦以盘头一役，车已毁坏，马五损失约五六十元，余则毫无所失，以视当时压毙及击断下肢者，自庆命运至佳。区区数十元似可无须与人斤斤，况人在患难中，岂能复施逼迫耶？

十一时三十分发灵宝，至十里铺路程仅十里，费时达三小时，已二时三十五分，途中困难可以想见。二十里到大营，以南山有雨，不敢赶道，即进堡城北门，假宿关帝庙中，时已七时余矣，本日仅行三十里。余出在阆乡所购之馒首，复剖西瓜一枚坐石阶上食之，自觉精神颇为安适。李三心甚急，极欲早到陕州，余以微笑报之。

二七，六时出大营南门，绕道赴文堂镇。大营距文堂只五里，费时竟达三小时之久。途中见灵宝山口复雨，颇为焦急，幸雨势自西偏南，仅遇数点，殊可庆也。过文堂后，泥淖甚少，路较易行，十里桥头镇尖，加雇一小车，留下两骡，马套儿即牵之回灵宝，十五里到陕州，宿二马路中华旅社。

此两日内小车倾覆几数十次，牲口受惊，掀翻行李亦有数次。

过十里铺后,上一土坡极高;时遇泥淖。余昨日牵骡过坡,下腿部为牲口所踢。过河时一足陷入泥中,几及膝部。今日过桥头镇,稍一不慎,自骡背跌于道左,右侧大腿关节部适触石上,一时竟至不能步行。到店后尚隐隐作痛,咳嗽亦为其牵制,可谓艰苦备尝矣。三时乘洋车过河进城。城中已修马路,颇有商务;城外车站附近,繁华似郑州,肮脏亦相伯仲也。得见七月二十二沪报,沪案仍延宕,陕事专电,失实颇多。在店补录日记,时闻京腔,居然有唱《珠帘寨》者。凡火车所经处,必多旅社,多妓女,多零卖小摊,俨然别成一种气象,陕州亦其例也。

二八,七时趋车站上车,八时启行。将近观音堂,忽闻枪声数响,仿佛发自车旁山上者;下午五时到洛阳,寓车站中西旅社。

二九,八时到车站,喜晤叔平先生,立谈许久。上车东发,下午二时到郑州,寓金台旅社。用饭及洗浴毕,访润生、右迁二同学,晤之,晚应右迁之约,在医院中闲谈,至十一时始归寓。

三〇,未明即起,七时到车站上车,晤谭女士,车中喜遇熟人,可不虞寂寞矣。

三一,午前十一时到京,晤郁周老友,三儿亦来站,遂携行李驱车回寓。计自二月十六日晚离家,至此五月余,往返共行九千四百余里,铁路所经里数尚不在内。友人均以壮游目之,然在敦煌仅留数日;数月光阴,悉在途中消磨,一无成绩可言,殊愧悚也。

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

敦煌千佛洞自伯希和(1907年冬)、斯坦因(1907年3月同年5月写本画绣计运去三十余箱)二氏先后将宝物捆载西去之后,遂为世人所注目。吾国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辈依据千佛洞所已发见之古物,频有著述,以饷士林,于是国人亦知有千佛洞矣。顾实地调查者伯希和、斯坦因二氏外(在斯坦因氏之先,称述千佛洞画

壁者有匈牙利人洛克济教授及伯爵斯起尼氏)仅有二三日本人及有德人之远征队,国人反无闻焉。1924年美人华尔讷君至其地,勾留约一周间;既归国,即组织一敦煌考古队来华,拟在千佛洞为长时间之考察,由翟荫君主其事,溥爱伦、石天生二君任记载,时达君任摄影,汤姆生君则专攻美术者也。吾校知其事,由福开森君之介绍,沈兼士、马叔平二先生之筹划,胡适之先生勸励,余竟获随之西行,不可谓非壮游矣。遂于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六晚乘京汉车南下,以豫西胡憨将战,风声紧,改道太原,经平阳,风陵渡河,进潼关,至五月二十日到敦煌目的地。同行诸人所欲期望于千佛洞能居留三阅月者,不想因华尔讷君故,仅能住三日,且每日往返八十里,其确实消耗于千佛洞之考查时间,每日五小时,三日合计之只十五小时,以费时百余日所获得者惟此,殊非意想所及。而我所欲试为较有系统之报告者,亦就无从著笔,姑拉杂记之,预为异日第二次调查时之参考而已。

依伯希和图谱中所刊平面画之编号,自南往北,至一七一号c,影片则至一八二号而止,其间以同一号数复以a,b,c,d,e……区别者,如一一八号,一二〇号,一二一号,一三七号,一六〇号等是,合计佛洞之编号者共二六九。周统领所命营部司书会同敦煌县署警察所员之调查编号,适与伯希和氏成反方向,计自北往南;而为调查表上所记载者,号数至三五三,但其间有空号八(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一八九,二七六,二七七),漏列欤?抑误编欤?非对勘复查无以明也。

余于第一日第二日两日间,追随同行诸君之后,尽量游览,约及全数五分之四。第三日单独为摄影工作,并随时摘录题记,因此所剩余之五分之一,竟未获见及也。回京时使以此未及游览之数,举以告我关切此事之友人,宁非怪事!

就余仓卒中所假定各洞之年代,一〇三,一一一,一一〇,一二〇n,一二一,一二六,一二九,一三七及一三七b各号为北魏所造

之窟殆无疑义。第一三〇号上部有北魏壁画,下部复有唐代供养人,而一部分壁画则又为宋人所重修。唐窟如六七,一一八 a,一二〇 f,一二二,一三九 b,一四四,一四六及一四九各号均是。

第一四〇号有五代刘汉题记,该洞壁画,可为唐宋递变之关键。北宋窟亦多,如五二,六六,七四,一一九等号是也。亦有系北宋规模而为后代重修者;其重修所致之结果,复至不一,极恶俗者,惟增修时之塑像耳。元窟一八一最著,一八二中,壁画有欢喜佛,极易与他窟相识别。余于第一六号 a 竟见有三层重叠之壁画,层次井然,色彩各别(正定大佛寺壁画亦见两层重叠);使有余暇,就此以细审先后,判定年代,与其他各洞相比较,则在时代之区别上,更可得一确实之根据,较之仓卒中加以论断曰,是唐画也,是宋画也,其精粗之间,直不可以道里计矣。顾在此百忙中,于摘录题记之际,除北宋年号外,得西魏大统四年、五年两段,并得摄影以归,良足自慰矣。五代刘汉年号,第一日于一四〇号洞内见之,期于第三日录其全文者,竟致忘却而未果。最可笑者,第二日发见一元嘉二年题记,固已摘录于日记册矣。洞号仅标九〇 c,及回安西州,整理记录,核诸伯希和氏编号,只有九〇及九〇号 a,而九六号则有 a, b, c, d, e 五洞之分,是否九〇为九六之误,无从臆断。且记录时于伯希和氏平面画上,有时亦加以周统领所调查之号数,别以 c 字标之,所以示中国编号也;则此九〇号 c 者,又有为中国编号九〇号之疑,但查之图录,中国编号九〇号又不能得其实在位置,殊可憾也。

考千佛洞造窟年代,其可依据者,仅有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傅法良造窟之说,唐李氏有《再修碑记》;其在乐傅之后,李氏之前,一段中固无徵也。今于西魏大统年号之外,复见此元嘉二年题记,似于千佛洞史料之参考上,不无有多少之补助;因此异日苟有机缘,作第二度之敦煌旅行时,不敢不以此而自勉焉。兹先就当时所摘记者,录之如次:

第六洞：西台座下方：“管内□门都判官任隆兴‘寺上座龙藏□修先代功德’永为供养”

南台座下方：“主兄节度衙前子弟虞侯海润”

“主兄海圆一心供养”

右方：“普光寺都维证一心供养”

北台座下方：“伯母……供养”南北墙下方题记均已模糊。

第八洞：西台座下方：“故女惠意一心供养”余均不可见。

第一九洞 bis：“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

第五二洞：“敕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等州节……”

人口东墙南部：“故姊第十一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氏”，余悉模糊。

东墙北部：第三行“□女普光寺法律尼最胜喜……”，余悉模糊。

南墙自东至西第一：“□妹第十七娘子一心供养出适罗氏”。第三：“侄女第十二小娘子一心供养……”。第五：“故侄女第十四小娘子是北方大回国圣天可汗的孙心一供养”。第七：“侄女第十六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氏”。第九：“女第十五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曹氏”。第二、第四、第六、第八、第十均模糊。

北墙自东至西第六：“侄女第十四小娘子一心供养……”，“新妇小娘子□氏供养”，余均模糊。

第五八洞：人口东墙南部：“佛弟子王法奴敬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

北部：“女弟子优婆□□氏为六男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

第六〇洞：梁上“大宋乾德八年岁次庚午正月癸卯敕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平西王曹注忠之世建此窟”

第七〇洞：南台座下方右侧：“颜新妇张氏……”此外供养人题

记均已模糊。

第七四洞：“大朝大宝于真国大圣大明天子……”供养人题名“第十五小娘子供养出适□氏”

第八一洞：西墙南部：“孙内亲从都头银……”在底层。

第九二洞：东墙南部：“□师普□寺坚进”

北部：“故□尚龙兴寺……”

第一一二洞：人口东西墙有西夏文题记极多。

第一一七洞：人口东墙南部：“姊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第四“故姊谯县夫人一心供养出适□氏”，“大朝大于真国天無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祿姬供养”（按此三行自左往右）。“扫洒尼姑播□杯氏愿月明像”，旁有西夏文。“此缘□□杂谋惠□之像”，旁有西夏文，类此者甚多。

第一一八洞 e：人口南墙西部：“故敕河西陇右□西□□□□□节度使检校太尉……”尚有数处题名，均能在外层色彩下隐约透见；亦有数处，外层剥落，可见题记，但文义均不贯串。

第一二〇洞 n：北墙中层自东至西。

（一）“夫从缘至果，非积集无以成功。是以佛弟子滑黑奴，为有识之类，敬造天量寿佛一区，并二菩萨，□斯□福，愿佛法兴隆，魔事□减。愿□□抱识，□于三□八□。明年□日，往生妙乐，齐登正觉。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廿日造讫”。

（二）（三）两方已模糊。

（四）：大统五年题铭文已模糊，有“信女丁爱供养”。

（五）：“比丘尼惠胜供养时。夫从缘至果，非积集无以成功。是以佛弟子比丘惠遵，仰为有识之类，敬造拘那□牟尼佛一区，并二菩萨。□服□□□佛法兴隆，魔事（缺）大代（缺）——中旬造”。在此题铭之西，有“货主和供养，信士阴胡仁供养，信士阴苟生供养，信士阴安归所供养时”等题记。

（六）：“比丘智化供养时。夫至极阗旷，正为尘罗所约，圣道归

趣，非积垒何能济拔。是以佛弟子比丘畧化，仰为七世父母，所生母父，敬造迦叶佛一区，并二菩萨，因此激福，愿上者神游净土，不离二途，现在居眷，位太安吉，普及蠕动之类，还登常乐，大代大魏大统四年岁次戊午八月中旬造”。在此题铭之西，有“清信女史山崇姬所供养时，信女阿丑供养，信女乾绿供养，信女乾□供养，信女阿媚供养，信女娥女供养”，等题记。

第一二五洞：“孙本行都料料兼步平队头像奴一心供养”。

第一三〇洞：梁上：“大宋太平兴国五年岁次□辰二月甲朔二十日乙丑敕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口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谯郡开国公食邑一仟五百户实食封七伯户曹迕禄之世建此窟檐纪”。

另一梁上：“节度使内亲从知紫亭县令兼衙前都押□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阎员清”。

第一三一洞台座下：“比丘□愿供养时”余缺。

第一四〇洞：有五代刘汉时题记。

以上悉系伯希和编号洞数。

第八二洞：梁上“大宋太平兴国五年岁次庚辰二月甲辰朔二十日乙丑敕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佃蕃落等特授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实封七伯户曹迕禄之世建此窟檐纪”。

第八五洞：梁上：“大宋太平兴国庚辰年节度使内亲从知紫亭县令兼衙前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阎员清”。

第三〇〇洞：梁上：“维大宋开宝九年岁次丙子正月戊辰朔七日甲戌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仟五百户实封三百户曹迕恭建此”。

以上系中国编号洞数

第九〇洞 c：“供奉天童□□位元嘉二年二月廿五一心虔奉”。

七月初回兰州，以此元嘉二年题记示次洲厅长；翌日谢公即告我曰：宋文帝元嘉二年，岁次乙丑，今年亦乙丑，诚奇遇也。既回京，友人中闻之，或以是为南朝年号，不应发见于敦煌之千佛洞；而吾校叶浩吾先生则坦然不疑，为考证一篇，反复稽核，论据极确。其言曰：

吾友陈君万里，今春往游甘肃敦煌千佛岩及安西万佛崖（一名三危山），意在视察苻秦北凉时佛教美术。在千佛岩，获见宋元嘉二年题记，爰手记之归以示余。夫西陲僻远，颇有南人题字，乍观之下，意颇不省；及详细钩考，乃知为北凉人作，非南人书也。盖果为南人题记，则必在宋武帝灭姚泓后。按《宋书》武帝纪，破禽姚泓为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八月，而宋敏求《长安志》亦云苻孙泓为刘裕所灭，东晋复置雍州及京兆郡，是年岁次丁巳；越四年而宋代晋，改号永初，岁次庚申，再越五年为宋文帝元嘉元年，岁次甲子，二年为乙丑，先后相距八年，阅岁并非久远。惟宋武克长安后，不久为赫连勃勃所踞。《晋书》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云：“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谓算无遗策矣。”（谓王买德语）约计其时，赫连夺踞长安，当在宋武灭泓之次年，即义熙十四年，刘裕得长安，不克久居，何迟至文帝时犹有在南人在秦陇间，作造像功德之举，明题刘宋正朔乎？斯必不能之事也。窃谓此刘宋年号题记，乃北凉人所书，非南人所作也。《宋书》文帝纪，元嘉三年，骠骑大将军凉州牧沮渠蒙逊改为车骑将军，是蒙逊于元嘉三年尚受刘宋官封，则元嘉二年造像题宋正朔并非异事。又元嘉十一年以大沮渠茂虔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是蒙逊父子皆先后受封于宋，未尝中绝，此又北凉得书宋正朔之证也。又蒙逊父子皆甚重汉化，屡陈请汉籍，而河西人赵畝善历算，茂虔亦善著述，均见本传。则北凉以汉文题记，亦非不能之事也。此事远在魏孝文提倡汉化之先，故特为考明，以质同人以为何如？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八日，杭县叶瀚记。

北魏诸窟中所见壁画与他洞绝不相类。有半裸体舞蹈画像甚多，中心柱壁龕所有塑像，几与云冈石造像一致。而中心柱上方小造像，塑尤精美，惜剥落颇多，游人恒以长竿揭之，完整者取之去，碎者委弃于地，毫无顾惜。如此情状，安得不令外人起攘窃之念！俄人所居之洞，毁坏更甚。据闻当年新疆白党，蠢蠢欲动，杨督遣送来甘。甘省当局以敦煌偏在西面，交通阻隔，易于防范，乃居留之于千佛洞，于是俄人寝食于斯，游憩于斯，而一部分之壁画遂受其蹂躏矣。我深不料，敦煌人民，何以今日能拒绝华尔纳君西来，阻翟荫君诸人居留千佛洞，而于俄人之举动，竟若是其愤愤也？

敦煌千佛洞洞数已如上述，有三百余；其在峡口者，复有废洞百余，亦有残缺壁画。如此伟大之古迹，恐在国内无第二处，足以相抗。单就摄影计划言，非有半年工作不可。此外工作之须待专门家者如：

(一)假定各洞壁画年代——画材之史的考定，色彩之化学的分析等等。

(二)壁画实质上之研究。

1. 画像及关于佛教教理上美术上一切画材之蜕变。
2. 就辅助画画材以考证各时代一切背景之情状，如建筑、服饰、器具、军备及关于风俗事项。

(三)塑像与石像之比较。

(四)充分记录及整理各种题记。

(五)详细探索有无流沙所湮没之洞窟，等等，亦非多假时日不为功。

最后实际上之保存方法，更非几句空泛之词而语，所能了事，因此我所希望于未来者，在于有组织、有计划、有各种专门学者分工担任之中国敦煌考古队，以从事于各方面之研究；并在实地经验上计划保存方法，若仅仅以敦煌经典为范围，求所以影印，纂述，留传者，抑亦狭矣。

华尔纳与中国文物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和《西行日记》的背景解说

王冀青

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是20世纪前半期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位中亚考察家和敦煌学家之一,曾两次代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远赴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他的第一次考察于1923年至1924年间进行,主要考察游记为1926年出版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①一书;他的第二次考察于1925年进行,主要考察成果为1938年出版的《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②一书。这两部书可以算是近代中国西北考察史或敦煌学史上的知名著作,向来为研究美国敦煌学史或美国藏敦煌文物的学者所重视。但因为英文原著在我国难以找到,再加上

①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6.

② Langdon Warner, *Buddhist Wall-Paintings: 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 Fo H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本书原著书名为《佛教壁画》,副标题是“万佛峡:一个九世纪洞窟的研究”。本文中采用姜洪源、魏宏举两先生的意译书名。

语言文字隔阂,我国的学者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和利用这两部书。

因此,当我去年听说姜洪源、魏宏举两位先生已将华尔纳著《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和《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这两部书一并翻译成中文时,便感觉到这是中国敦煌学界的幸事。据我所知,姜洪源先生是理工科出身,近年来又先后担任甘肃省档案馆副馆长和《档案》杂志主编等行政领导职务,百忙之中竟能抽出宝贵的时间,为中国的敦煌学界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真令我辈敦煌学子钦佩!最近听说,新疆人民出版社已经编辑出版了一套规模宏大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将姜洪源等先生翻译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收为丛书的一种,并将《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以及北京大学陈万里跟随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旅行后写成的《西行日记》^①当做该书的附录,闻此佳讯,倍感欣慰。出版前夕,本书执行主编荣新江先生命我为该书写一篇序。我深知,凭我浅薄之才学,实在没有资格担当此重任,本想推托,却又不好意思。荣新江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师友,姜洪源先生是我难得遇见的知音,他们叫我为该书写一点东西,这当然体现了他们谦逊的风度,而他们的另一本意实际上也是想为我提供一方发言的宝地,可谓用心良苦。犹豫再三,我决定从命,但还是不敢写序,只能斗胆写一篇附在书后的解说,权当做是续貂之狗尾吧。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在本书出版前来不及拜读姜洪源等先生的译稿。依照姜洪源等先生的英语功力,再加上荣新江先生从学术方面把关,我确信译文是准确可信的。我写此文的首要目的,是想综合散记于它处的罕见材料,对华尔纳其人其事,对本书所收正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北京,朴社出版,1926年。

文《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和附文《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石窟的研究》、《西行日记》这三部书的产生背景，尽可能全面地做一个介绍，为本书的读者提供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我本人在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介绍华尔纳的小文^①，实际上那不过是为应酬而赶制出来的“急就章”，粗糙无比。此后十年间，我的主要兴趣在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中亚考察档案的研究方面，无暇顾及华尔纳研究。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可能提供多么高深的研究成果，只能将以前看到过的有关资料重新爬梳整理一下，也算是借机从资料方面对从前那篇拙文进行的修补吧。至于本文中提出的某些看法，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有错误，完全由我本人负责。

—

华尔纳于1881年8月1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的一个名门望族。如果按父系追溯，他的十世祖威廉·华尔纳(William Warner)于1637年从英格兰移民到北美，属于美国历史上光荣的开拓者。如果按母系追溯，他的祖先罗杰·舍尔曼(Roger Shelman)是美国《独立宣言》和《大宪章》的签字人之一，在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他的父亲约瑟夫·邦格斯·华尔纳(Joseph Bangs Warner)是美国著名律师，曾处理过拉德克里夫学院并入哈佛大学等大案要案，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一带享有很高的声誉。

华尔纳少年时先后在坎布里奇镇的布朗与尼科尔斯小学校(Browne and Nichols School)以及波士顿市的格林那夫斯中学校(Greenough's School)读书。中学毕业后于1899年进哈佛大学深造，属于1903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华尔纳热衷于社交活动，曾被

^① 王冀青《兰登·华尔纳(1881~1955年)》，载陆庆夫、郭锋、王冀青：《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第三卷(王冀青执笔)，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选为哈佛大学《哈佛辩护者》(*Harvard Advocate*)杂志编委和“1770年学会(The Institute of 1770)”成员,因擅长写诗而有“1903届班级诗人”的美称。但他胸无大志,曾选修过化学、哲学、希腊语、英语等课程,杂乱无章,学习成绩平平。到1903年临毕业时,华尔纳曾考虑过几种谋职出路,其中之一是当律师,但未获他父亲的同意。于是,他又于1903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的环境美化建筑学院(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读研究生,但还没有来得及选修课程,便因为一个偶然的机,加入到美国人首次进行的中亚考古活动中去。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各国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的中亚考察始终处在竞争之中,而美国只是一个起步较晚的落伍者,在19世纪的中亚考察活动中毫无地位可言。1897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以搜集中亚出土印度语言文字材料为目的的“印度考察基金会”中,美国没有代表,当时它在国际中亚研究界的卑微地位由此可见一斑。1902年9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中亚和东亚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 and 民俗学考察国际协会”中,美国是14个会员国的末位,26名委员中的惟一美国代表是1902年刚从德国移居到美国并担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的弗里德里克·夏德(Friedrich Hirth),而他并非中亚研究专家或中亚考察家。不过,该国际协会的成立,以及此后各国在中亚考察中更大规模的竞争,无疑促进了美国中亚考察的起步。真正为美国发起中亚考察活动的人是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朋普利(Raphael Pumpelly)。

1902年,因经营钢铁业而致富的美国资本家安德鲁·卡奈基(Andrew Carnegie)捐款2200万美元,在华盛顿创建以资助科学研究为宗旨的卡奈基学会(Carnegie Institution)。当时正值西方列强进行的中亚考察进入高潮阶段,已65岁高龄的朋普利闻讯后立即向新成立的卡奈基学会申请组建由他领导的中亚考察队,1902

年年底获得批准。由朋普利领导的第一次卡奈基学会中亚考察队于1903年春对俄属中亚地区进行了初步勘察,重点调查了阿什哈巴德附近的安诺遗址(现属土库曼斯坦),考察队一共由4人组成,队员包括朋普利在哈佛大学教过的学生、时任哈佛大学地质学教授的威廉·莫利斯·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朋普利的儿子拉斐尔·威尔斯·朋普利(Raphael Wells Pumpelly,小朋普利)以及戴维斯的学生艾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第一次卡奈基学会中亚考察结束之后,卡奈基学会又批准朋普利组建第二次中亚考察队。这支考察队一共由7人组成,队员包括当时西方最著名的史前陶器发掘研究专家、德国柏林人种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olkerkunde)的休伯特·施密特(Hubert Schmidt)、朋普利夫人、小朋普利、亨廷顿、希尔德嘉·布鲁克斯(Miss Hildegard Brooks)和华尔纳,其中布鲁克斯和华尔纳担任施密特的考古学助手。华尔纳之所以能参加到朋普利领导的第二次卡奈基学会中亚考察队中去担任考古学助手,完全是由于他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小朋普利的盛情相邀。当小朋普利在1903年底邀请华尔纳加入他父亲组织的中亚考察队时,华尔纳既没有任何考古学知识,又没有长途旅行的经验,但出于好奇他还是接受了同学的邀请。

华尔纳与小朋普利在1904年1月到达埃及开罗,在尼罗河一带游览后,经亚历山大里亚至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与考察队主体会合。汇集后的考察队接着经第比利斯(Tiflis),前往俄属中亚的安诺遗址进行发掘。华尔纳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施密特进行挖掘,在移动所有被发现的陶片和骨骼残片之前,对它们进行原地绘图、测量尺寸和初步拼接工作。华尔纳为此必须做很多现场笔记,也使他有机会在实地工作中学习考古学。按照协定,所发现的大部分重要文物(主要是彩陶)都要被运往柏林的人种学博物馆,由施密特在那里进行仔细研究,最后留给华尔纳写文章的材料只是些

剩余的石器和骷髅。

这支考察队在安诺遗址发掘了两个月时间,然后移往谋夫(Merv)附近搜寻可供今后发掘的遗址,还访问了阿姆河以北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中亚名城。1904年6月,考察队在中亚原地解散,华尔纳没有立即回国,而是于当年7月份前往基瓦汗国(Khanate of Khiva)访问。基瓦汗国是16世纪乌孜别克人在中亚阿姆河下游花刺子模建立的封建汗国,在俄国征服中亚的狂潮中被迫于1873年沦为俄国的保护国,但名义上还是一个保留基瓦汗王的独立国家。华尔纳之所以要去基瓦汗国访问,是因为他误以为此前还没有一个美国人访问过这片地区。华尔纳认为,如果他能进行这次访问并将经历写成文章的话,美国肯定有杂志社愿意买下稿件用于发表。经过费力的周旋,华尔纳最终进入了基瓦汗国,并且拜见了汗王,但他的这次访问没有任何学术目的,只不过走马观花而已。俄国当局对华尔纳的访问活动感到很生气,不久即勒令他从铁路线上的查尔朱(Chardjui)出境。华尔纳于1904年7月13日到达查尔朱,然后经克拉斯诺伏斯克、巴库、欧洲大陆返回美国。

1904年朋普利领导的第二次卡奈基学会中亚考察队队员陆续返回美国后,即着手撰写考察报告。华尔纳回国后首先将他访问基瓦汗国的经历写成一篇长文,题为《进入基瓦》,分三次连载于美国《世纪》杂志1906年9月号至11月号上。^①由朋普利主编的考察队详尽学术报告书作为华盛顿卡奈基学会出版物第73种,于1908年在华盛顿出版,该报告书题为《1904年考察队在突厥斯坦的考察——安诺史前文明:其起源、发展及其受环境的影响》,分两卷,共494页,包括11篇文章,其中最后一篇就是华尔纳撰写的

^① Langdon Warner, 'Getting into Khiva', *The Century Magazine*. September to November, 1906.

《安诺发掘的石器和骷髅》一文。^①

朋普利的中亚考察活动为美国培养了两位后来著名的中亚考察家,即亨廷顿和华尔纳。他们对亚洲的兴趣都是从追随朋普利开始起步的,不同的是,亨廷顿在两次卡奈基学会中亚考察队中都是骨干,而华尔纳只是在第二次卡奈基学会中亚考察队中起过微不足道的作用。华尔纳为考察报告书撰写的文章分量也不重,但这篇文章毕竟是他的第一篇考古学文章,从此将他引入了考古学之门。四十多年后,当小朋普利于1949年去世后不久,华尔纳在给自己的儿子卡里布·华尔纳(Caleb Warner)写的信中回忆道:

我去纽约参加我的同班同学拉斐尔·威尔斯·朋普利的葬礼,他在睡觉时去世了。……你应该喜欢他的。也许你知道,在我们毕业后的那一年,我和他一起去了俄属突厥斯坦,参加由他老爹组织的考古学考察队。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那次旅行,才使我开始对本来毫不相干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兴趣。^②

对于华尔纳来说,参加朋普利领导的中亚考察队确实是他的人生转折点之一。这次考察将他和中亚联系在了一起,也使他从此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他一生中多次想在中亚考古方面跃跃欲试,与此不无关系。

^① Langdon Warner, 'Stone Implements and Skeletons Excavated in Anau', *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Anau, Origin, Growth and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Edited by Raphael Pumpelly, Director of the Expediti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 No. 73, Washington, 1908, Vol. II, Part XI, pp. 477-494.

^② 1949年华尔纳致儿子卡里布·华尔纳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01-202.

二

1905~1906年,华尔纳的旅伴亨廷顿追随财阀子弟罗伯特·巴尔莱特(Robert L. Barrett)代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去新疆考察,而华尔纳在此前后却朝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华尔纳最初对当职业考察家的兴趣似乎不是很大,早在安诺参加发掘工作时,他就曾给他的父亲写信说:

我缺乏科学家的头脑,干这种营生挣钱也很少,人总不能一辈子老去外国的土地上进行考察吧。^①

看上去他并没有将考察工作确定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但是由于初次参加考古挖掘的经历,也是为了完成对安诺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华尔纳在1904年秋天返回母校哈佛大学后,便立即在该校的皮伯底博物馆(The Peabody Museum)进修考古学课程。但不久他就辍学而去,在纽约的一家出版社谋职,编辑《园林杂志》(*Garden Magazine*)。不过,他当编辑的态度似乎也不认真积极,从1905年开始沉浸在和第二十六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堂妹罗兰·罗斯福(Lorraine d'Oremieulx Roosevelt)的热恋之中。1906年春,位于哈佛大学附近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 in Boston)董事会要求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爱略特(Charles W. Eliot)为该馆推荐两位青年人,由博物馆方面负责培训后安排在该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从事管理工作。爱略特推荐的人选之一便是华尔纳,他的受训

^① 1904年华尔纳从中亚安诺遗址致父亲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5.

方向是远东(日本与中国)艺术,按要求必须立即前往日本进行实地学习。这一机会可以说也决定了华尔纳的一生的轨迹,首先是将他和博物馆事业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其次又将他和日本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为了便于了解华尔纳,我们需要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入手,将华尔纳的师承关系做一简介。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成立于1876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家艺术博物馆。1877年1月,哈佛大学1874届毕业生厄恩斯特·弗朗西斯科·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进入初创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随后又应日本政府招聘于1878~1886年间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他本人在这一段时间里则研究东方美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欧风美雨泛滥,社会上形成轻视传统艺术的倾向,而费诺罗萨在日本任教期间首次强调日本古典艺术的固有价值,承认东方艺术的独特风格,主张尊重古代美术,提倡复兴日本画。在费诺罗萨的弟子当中,最著名的是冈仓觉三(号天心)。1886年,费诺罗萨从东京帝国大学辞职,率冈仓觉三以日本文部省美术调查委员身份赴欧洲调查美术教育。1887年,冈仓觉三在费诺罗萨等人的帮助下创建东京美术学校,次年担任该校校长,费诺罗萨也被聘为该校教授。1889年10月,冈仓觉三和日本内阁官报局次长高桥健三因为共同的国粹主义(主张恢复日本文化和美术的应有地位)见解而创办《国华》月刊杂志,该杂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介绍与日本美术源流密切相关的中亚敦煌美术的主要阵地。1890年,费诺罗萨返回美国,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创建了亚洲(日本与中国)艺术部,并担任主任,使该博物馆成为美国最早设立东方艺术部门的博物馆;除1897~1900年间曾再返日本任教外,费诺罗萨一直在美国从事有关东方艺术的著述与讲学工作。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经济的繁荣使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文

化机构的发展又对东方文物和艺术品产生了很大的需求量。但当时美国除了费诺罗萨之外并没有研究远东艺术的专家,不利于东方文物的搜集。1904年,冈仓觉三应费诺罗萨的邀请赴美国各地讲学,受到美国东方艺术收藏界的青睐。在费诺罗萨的建议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也于1904年聘冈仓觉三为亚洲艺术部主任,优惠条件是他可以常驻日本,实际上主要职责是在亚洲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购买搜集东方文物。为了壮大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搜集亚洲艺术文物方面的力量,冈仓觉三便建议该博物馆在美国为亚洲艺术部招聘青年人,然后送到日本留学,华尔纳便成为第一个被选拔上的人。

1906年6月19日,华尔纳从旧金山起航,前往日本留学,他在日本的导师便是遥兼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的冈仓觉三。华尔纳到达东京之初,住在冈仓觉三家中,随导师学习东方考古与美术,并由冈仓觉三的弟弟教授日语。在1907年,华尔纳基本上待在日本奈良,奉冈仓觉三之命在奈良诸寺(包括法隆寺、东大寺等)学习和研究日本雕刻。而冈仓觉三则于同年返回美国,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冈仓觉三在美期间,也曾受到华尔纳的父亲老华尔纳的热情款待。

到1908年前后,西方列强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与考古的活动已经达到了高潮。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勒考克(Albert von Le Coq)、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伯希和(Paul Pelliot)、曼内海姆(Gustaf E. Mannerheim)、橘瑞超、野村荣三郎等人要么刚结束考察,要么正在进行考察,要么准备进行考察。身在美国的冈仓觉三自然信息灵通,对这些考察活动了如指掌,此时他也迫不及待地想派美国弟子华尔纳参加到中亚考察的行列中去。1908年晚春某日,华尔纳从日本在给他的对象罗兰·罗斯福写信时透露:

老师(指冈仓觉三)正在为我筹集资金,让我今年秋天去东突厥斯坦(新疆)考察,要不然就去爪哇岛考察。天哪!这是今天下午才到达的(是信,而不是资金),真犹如晴天一个霹雳,因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提出干这件事的要求。……我的头脑里充满着各种方案。我不敢写信告诉你更多的事情了。有指望重赴野外,这真是太令人着迷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因为一旦你的血液里染上了这种癖好,你便再也不可能恢复平静了:你得搜寻未知世界,你得指导一帮人工作,你得将虚幻的理论和棘手的实际最后熬成“成果”。能够指挥一支这种类型的考察队,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比指挥一个旅要带劲得多,因为所做出的决定含有更多的智力因素。^①

但是此后不久,华尔纳便打消了外出考察的念头。首先是因为他母亲身体有病,不宜过度牵心。第二是因为他的父亲坚决反对有危险的考察计划。第三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当局也不太愿意。同年(1908年)夏天,冈仓觉三带着他在美国筹集到的考察经费回到日本,当他提出想派华尔纳去中国新疆省和闽或者南洋爪哇进行考察时,便被华尔纳婉言拒绝了。华尔纳在1908年夏天某日给罗兰·罗斯福写信时说:

老师于前天回来,……随身带回来一万美元,用来让我去爪哇或和闽进行一次初步的试探性旅行。他对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就动身吧。”也许,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白,当我拒绝了他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谁都会认为:这个小伙子太让人生气了。可是老师没有催促我,只是完全同意我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29.

迟早得去的想法。他还说,他将把这笔钱保留到明年。不过,这将不会有什么作用;老师也已经答应,如果在此期间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的话,便派他去。^①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华尔纳实际上并不像斯文·赫定或斯坦因等人那样具备探险家应该具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有想成名成家的欲望,但在关键的时候又总是缩手缩脚。冈仓觉三在1908年准备实施的和阗考察计划已经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地步,而华尔纳却在最后时刻以种种借口突然放弃。今天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件幸事。假如华尔纳在1908年拿着冈仓觉三为他筹集到的一万美元去和阗考察的话,那么中亚考察史肯定会增添更多令中国人伤心的内容,不论他获得的文物运往日本,还是运往美国,都是中国的巨大损失。

1909年华尔纳结束了他留学日本的生活,返回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工作,并且与罗兰·罗斯福订婚,但不久他又应冈仓觉三的要求返回日本东京为老师帮忙。日本政府定于1910年在英国伦敦举办一次日本国宝展览,冈仓觉三负责为这次展览编写一部题为《日本的寺庙及其宝藏》(*Japanese Temples and Their Treasures*)的介绍书和目录,由于要用英文撰写,所以他要求华尔纳协助工作;该目录由冈仓觉三用日文写出,再由华尔纳翻译成英文。当该书编写完毕之后,冈仓觉三还曾打算派华尔纳去中国河南省搜集龙门石窟文物。华尔纳在从日本给他父亲写的一封信中说:

老师对我将来在博物馆的前途感到很有责任。当他听说我马上要结婚,并想在这里再住一年时,他便问牧野男爵(前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29~30.

文部大臣)是否有大学里的工作给我做。现在还没有,但很快就会有的。老师说实际上已经有了工作。老师又说:“不过,你想做河南的生意吗?”河南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河南省洛阳城,位于一座山侧,山崖上凿有数百个石窟佛寺,窟寺中有成千上万件雕塑品,年代从公元516年开始,直到公元13世纪或者更晚些。在很久很久以前,老师是在一个半偶然的机会里发现这些石窟的,他是到达过龙门石窟的第一个外国人。……老师认为,这是一座代表中国雕塑最高水平的宝库,应该向西方世界开放,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等待人们去探究的、尚未公开的巴台农神庙,或者是整个雅典卫城。^①

所谓“做河南的生意”,实际上就是去变相盗窃龙门石窟文物。华尔纳本人对去龙门收集文物的态度是积极的,但他知道最大的阻力是他父亲反对他进行野外工作,于是他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劝道:

我知道您的看法,您认为野外工作不适于我做,在博物馆中搞行政工作更容易得到提拔。但是,就以馆长这个职务为例吧,我敢非常肯定地说它对我毫无吸引力,而且我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你听说过的所有人,譬如斯坦因……都是以野外工作而成名的。而现在说的这个地方(龙门石窟)比和阗或吐鲁番要重要得多,从艺术的角度上说(当然不是从种族的角度上说)可与底比斯古城或者罗马广场遗址相媲美。就此,我已经给罗兰·罗斯福写信,如果我发现那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32~33.

个地方既安全又不太艰苦的话,我将带她一起去。^①

老华尔纳终于被说服,不仅转变了态度,而且还在美国为儿子筹集资金。但是,华尔纳的这次龙门之行最终并未实现,主要原因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方面不同意。这样,华尔纳便只好返回波士顿,就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副主任一职。

美国人的日本弟子冈仓觉三和日本人的美国弟子华尔纳之间的关系是美日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段趣闻。1906~1909年间华尔纳在日本追随冈仓觉三的这段留学生活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这段经历决定的。在日本,华尔纳学会了日本语言,了解了日本文化,决定了他后半生与日本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日本最具权威的美术史家冈仓觉三的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亚洲佛教艺术知识基础,使他后来将亚洲佛教艺术作为自己的终生专业,并且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系统开设亚洲艺术课程的人。但同时,冈仓觉三又确实是想通过各种方法把华尔纳培养成从亚洲弱国(主要是中国)攫取文物的高手,使华尔纳从此沾染上了想方设法将中国文物运出境外的恶劣念头。虽然冈仓觉三为华尔纳安排的和阗考察和龙门考察未能实现,但那种念头无疑在华尔纳的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20年代以后,华尔纳热衷于从中国敦煌等地攫取佛教艺术珍宝,应该说是与他早年在日本受到的这种教育分不开的。至于冈仓觉三本人,虽然生前没有能够使他的美国弟子华尔纳参加到去中国攫宝的行列中去,但仍一直关注着中亚考察活动。1910年他还在《国华》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倡议“在地理等方面具有最大优势的”日本人挺身而出,“不要满足于由斯文·赫定首开的、由斯坦因等人随后的学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33.

术探险旅行成果,试着进一步获得更多成果”,“按照超过英国、德国的大规模的计划,着手进行这些探险,使日本人能够把握对这些地区的美术进行研究的钥匙”。^① 1913年,由于冈仓觉三在日本新潟突然去世,日本美术史界(不是宗教界)才断了参加中亚考察活动的念头。

三

1910年5月14日,华尔纳和罗兰·罗斯福在西奥多·罗斯福家族聚居的纽约长岛奥伊斯特湾结婚,由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亲手将新娘交给了新郎,从此华尔纳便成了西奥多·罗斯福门下的乘龙快婿。随后,华尔纳夫妇一起去日本度婚假,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不但准假,而且照发薪水。同时哈佛大学也向华尔纳提供了一份“谢尔顿研究基金(Sheldon Fellowship)”,作为华尔纳为撰写出版一部论早期日本佛教美术的著作而搜集资料的经费。华尔纳夫妇于1910年夏到达日本,在奈良和京都搜集佛教美术资料。1911年春,华尔纳又去日本统治下的朝鲜,调查日本佛教美术之来源问题。同年夏天,华尔纳夫妇返回美国波士顿。华尔纳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复职后不久,便于1912年8月提出辞呈,同年11月正式辞职。

华尔纳之所以要辞去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中的职务,一是因为他对所在部门的工作感到不满,二是因为他接受了查尔斯·朗格·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委托他在中国北京创办一所美国考古学院的工作。弗利尔是在美国底特律发家的铁路和机车大垄断资本家,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搜集艺术品,1900年养

^① 《国华》,第20编总第238号,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月发行,杂录部,第256页。

闲后开始在欧洲和东方各地旅行、考察并搜集文物,尤其偏爱东方艺术品,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的美术品,曾经在中国河南龙门石窟进行过考察。到1910年时,弗利尔的东方艺术搜集品中已经包括大约八千件珍贵文物。1906年,弗利尔决定在他死后将他的所有搜集品捐赠给国家,但在他有生之年仍然掌握搜集品的所有权。为了收藏这批搜集品,弗利尔还捐钱由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面在华盛顿修建用于典藏文物的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该馆迟至1919年他去世时才完工。1909年,老华尔纳在为儿子去龙门石窟考察筹集经费时,结识了弗利尔。当华尔纳返回美国后,便通过他父亲的介绍与弗利尔相识,并通过弗利尔与史密森学会的分支机构美国考古研究所(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取得了联系。中国辛亥革命后,弗利尔及其朋友们都认为,美国要想研究和搜集中国文物,必须趁民国初建之机在中国设立一个固定的机构,一可以为美国人提供实地考察研究的基地,二可以训练美国和中国的考古人才(实际上主要是培养文物贩子),三可以保护搜集中国文物(实际上主要目的是搜集文物)。于是他们建议华尔纳帮助他们在中国北京创建这样的一所美国机构,定名为“北京美国考古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Peking)”,任命华尔纳为空头院长,给他一笔钱和一年的时间,让他去北京与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即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谈判有关事项。1912年冬天华尔纳在辞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职务后,便为北京美国考古学院的筹建工作做准备。在筹备过程中,他还于1913年上半年为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正式课程,称“东方美术”(侧重中国和日本美术),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大学中开设的东方美术正式课程,此前只有冈仓觉三的老师(即华尔纳的师爷)费诺罗萨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拉特研究院(Pratt Institute)开设过独立讲座。

1913年6月,华尔纳携妻子起程前往中国。他们取道英国、

法国、德国、俄国,沿途拜访欧洲各国对中国考古学感兴趣的机构以及同行,就创建北京美国考古学院一事征求他们的意见,并熟悉欧洲典藏的中国文物,尤其是中国西北文物,为将来的北京美国考古学院在华工作并在中国西北进行考察做准备。老华尔纳陪着儿子和儿媳走完从伦敦到莫斯科的一段行程。在英国伦敦,华尔纳一家人成了大英博物院东方艺术品管理员罗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的座上客,宾雍是英国著名诗人和东方美术史家,也是斯坦因所获敦煌美术品的最早研究者,他安排华尔纳等人参观了斯坦因搜集品中的中亚敦煌美术品。在法国巴黎,华尔纳一家人和沙畹(Edouard Chavannes)及其弟子伯希和相识,就创办北京美国考古学院一事交换意见,沙畹和伯希和都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中国文物搜集者和敦煌学家,他们建议华尔纳抽空去法属安南参观一下当时西方在远东地区的第一所考古学校,即设在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Hanoi),并建议华尔纳首先建一座图书馆,搜集一套早期中国碑铭资料。在德国柏林,华尔纳一家人参观了人种学博物馆收藏的该馆印度部主任格伦威德尔和职员勒考克从中国新疆吐鲁番、库车等地搜集到的美术品,华尔纳在给朋友写的信中介绍他在柏林参观新疆美术品时的情况如下:

这些非凡的晚唐和宋代壁画是冯·勒考克从火州(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带回来的。最近勒考克刚出版了一册画集,名为《火州》。这些壁画很精彩,保存状况好得出奇,但是很缺乏日本法隆寺正殿壁画上展现出来的那种魅力。而且它们看上去比日本美术史上的白凤时期(645~710年)或产生白凤美术的时代要晚。纺织品美丽而重要,雕塑品也有很大的意义,它们多带有一些西方的痕迹。很多壁画也显示出明显的西方痕迹,用明暗对照等方法画成,因而具有立体感。总的来

说,斯坦因给大英博物院带回的东西在美感方面要超过柏林的这批搜集品,当然这并不损害这批搜集品的重要性。^①

在俄国圣彼得堡,华尔纳一家人数次参观了爱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主要看了科兹洛夫中亚搜集品;华尔纳还单独在人种学博物馆研究科兹洛夫从喀拉浩特(黑城)遗址发掘出来的绘画品、泥塑、纺织品等,其中的绘画多为13世纪画在布、绢、纸上的佛教或喇嘛教绘画,而泥塑和纺织品的年代更早些。结束了在俄国的访问后,老华尔纳从莫斯科返回美国,而华尔纳夫妇则继续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东行,于1913年8月21日到达朝鲜汉城。因为华尔纳夫人想写一部关于朝鲜陶瓷的书,所以他们在这里逗留了四个星期。然后他们于同年9月份到达北京,这是华尔纳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到北京后,华尔纳立即与北洋政府谈判建立北京美国考古学院的事情,所见内阁成员表面上都表示支持此事,袁世凯还接见了华尔纳夫妇。华尔纳在致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了他和袁世凯的会晤:

袁世凯在旧皇宫的湖外一角单独接见了我们,我们是乘船过湖的。……我们都围着一张桌子坐下,然后他问了我们一些普通的问题。但很快我们就深入到建校问题上来,当他呷茶表示会谈结束时,我们发现他给我们发表看法的时间是45分钟。……虽然他并不懂考古学的方法,但是对于考古学问题和考古学材料,他仍然显示出有教养的中国绅士所具有的那种知识。……他答应将在建校一事上给我们提供精神道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41~42.

义方面的支持。^①

但实际上北洋政府当时根本无心关注文化事业,迟迟未能做出任何决定。华尔纳夫妇在北京等待结果期间,于1913年11月代表无形的北京美国考古学院赴东北考察一次,对辽宁锦州府义州(今辽宁义县)城外的万佛堂石窟进行调查工作。回到北京后,又在1913年底乘船经香港前往东南亚一带访问,主要目的是遵照沙畹和伯希和的建议,访问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工作重点虽然以印度支那为主,但也搜集中国文物,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法国汉学大师和中国文物搜集者都是从这里起家的。当华尔纳来访时,该院院长让·考麦尔(Jean Commaille)对于美国人拟建立北京美国考古学院表示支持,并表示法兰西远东学院愿意向美国方面提供技术和专家援助。1914年初,华尔纳夫妇遵照考麦尔的建议参观了法兰西远东学院正在修复的柬埔寨吴哥古迹,然后经澳门、上海返回北京。

华尔纳回到北京后,发现建校之事仍无结果,于是决定赴中国内地寻找可供将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遗址,主要计划是去陕西西安府和河南临汝县宋代钧窑遗址考察。由于白朗起义的缘故,他到河南省境后无法深入豫陕内地,只能将妻子安顿在开封府,他本人则去彰德府(河南安阳)一带考察甲骨发掘情况,检查了数千枚甲骨。离开彰德府后,华尔纳又考察了洛阳龙门石窟。华尔纳在考察龙门石窟后从洛阳给他妻子写的一封信中介绍说:

我们外出去了龙门,现在返回,没有你在身边真不走运。
原来乘大车去那里真是太简单了,但我却没有能像我们出发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44.

时设想的那样带你一起去。说句老实话,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耽搁。……总的说来,这个地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我们非常了解的那组“夫人”群像(即宾阳洞皇后礼佛图)是中国美术中最精美的作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作品能够赶得上它们。我已经得到了两组群像的大型拓片,以及另外一千件小拓片,它们是刚刚为比利时的一家小博物馆订制好的,还没有来得及寄出。……至于75英尺高的坐佛及其侍从占据的那个大台座,那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我躺在那里的草地上,尽力不去想它。最近遭受到的破坏不次于我们所听说过的任何破坏,到处都是凿断头像的新鲜痕迹,有些是被故意挖掉的,有些是被士兵敲掉的。我想用照相机尽可能多地拍摄一些细节,但是徒劳无获。最糟糕的是差点得了病。……我们对这些雕刻品非常熟悉,因为沙畹和弗利尔拍摄回的照片中以及我们能见到的拓片中都记录了它们,但是看真物到底是不一样。^①

考察龙门石窟后,华尔纳又考察了巩县石窟,然后返回北京。看到建校无望,华尔纳于1914年春从开封府给弗利尔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去拟建立的北京美国考古学院空头院长职务。1914年6月,华尔纳夫人先行返回美国,而华尔纳则继续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稍后有一支由二百八十头骆驼组成的旅行商队要去外蒙古库仑(今乌兰巴托),于是华尔纳参加了这支商队,想经库仑去内蒙古西部额济纳地区喀拉浩特遗址考察,然后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北京。商队从张家口出发后,行走了五十八天才到达库仑。因外界长久得不到华尔纳的音讯,所以北京一度曾有他在蒙古遇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58-59

害的讹传报道。实际情况是,华尔纳到达库仑后,听到在欧洲爆发大战的消息,于是突然决定取消前往喀拉浩特考察的计划,也不再返回北京,而是在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沃什尼·乌丁斯克(Virshne Udinsk)跳上西去欧洲的火车,然后经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英国首都伦敦返回美国,途中访问了圣彼得堡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应瑞典皇太子之邀请参观了瑞典皇宫中收藏的中国艺术品。

华尔纳这次长途旅行的主要任务是创建北京美国考古学院,但由于中国北洋政府未予积极配合,他的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不过,华尔纳在这次旅行中有很多收获。首先,他在途经欧洲时结识了许多中亚考察家和研究家,参观了各国典藏的中亚和敦煌艺术品。其次,他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游历了中国和亚洲的许多古代遗址,在北京结识了一些要人,为他后来的中国考察埋下了伏笔。华尔纳在这次旅行中差一点就去了喀拉浩特遗址考察,如果成行,则他攫取的文物肯定不在少数;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使他的这次考察计划流产。

四

华尔纳于1914年秋返回美国后,仍没有正式工作,将主要的精力用在为美国史密森学会撰写北京美国考古学院筹建报告书上。1915年6月该报告书撰毕后,被呈送给由弗利尔领导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其抄件分呈美国的有关要人和机构,其中包括华尔纳的堂内兄、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哈佛大学前校长爱略特。报告写完后,华尔纳便正式辞去北京美国考古学院院长一职,从此与建校之事脱离干系。

1915年,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Cleveland)的一群名流拟联合筹建一座克里夫兰美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事

先任命弗里德里克·怀丁(Frederick A. Whiting)为馆长,怀丁又请华尔纳协助筹建该博物馆的东方部。1915年夏天,怀丁派遣华尔纳去欧洲伦敦、巴黎等地,考察艺术品市场行情,然后正式任命华尔纳为该博物馆的亚洲研究野外代表(Field Agent for Research in Asia),派他率考察队赴俄属中亚进行考察和发掘。但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俄国当局不愿意让外国考察队入境。在等待批准的那段时间里,华尔纳又接受了弗利尔的建议,去底特律为弗利尔搜集的东方雕刻品编制目录。到1916年秋天,俄国当局仍不批准华尔纳入境,于是他只好改往中国考察,目的是为克里夫兰美术博物馆搜集中国文物,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

华尔纳到达中国后,首先向北洋政府申请去陕西省西安府发掘古代墓葬,未获批准。1916年10月底,华尔纳去山西大同府考察云冈石窟,几年前沙畹刚在这里拍摄过照片,华尔纳这次又拍摄了一批新照片,制作了一批拓片。回到北京后,华尔纳通过古董商为克里夫兰美术博物馆购获了一批重要的石雕和铜像。

值得一提的是,华尔纳这次在北京逗留期间,和他于1913年在巴黎结识的法国朋友伯希和第二次见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正在巴黎任法兰西学院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教授的伯希和应征入伍,于1914年被派往中国,担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陆军武官。华尔纳和伯希和这次在北京相交甚欢,伯希和建议他们两个人在大战结束后联袂去新疆考察,华尔纳对伯希和的这个建议当然感到高兴,他在给怀丁写的汇报信中说:

这将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大夸耀的事情,因为他(伯希和)正是将敦煌写本席卷而去,并带回唐代伟大绘画品的那个人。他私下还隐藏着几处可供发掘的新遗址,但是苦于将来没有经费去发掘它们。如果他能参加我们的考察队,那等于我们

新添了一位世界上最有名气的学者。^①

当然,华尔纳高兴得早了点,由于各种变化了的情况,他们两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这一联合考察计划。

华尔纳离开北京后,又前往朝鲜汉城和日本的一些古玩店,为克里夫兰美术博物馆购买文物,直到1917年春天才回到美国。回国后,华尔纳立即辞去了在克里夫兰美术博物馆的职务,又跳槽去了设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博物馆(Pennsylvania Museum)担任馆长,该馆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华尔纳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到1923年重返母校哈佛大学时为止。但其间他断断续续地数次出差,外出期间的馆务由他的朋友哈密尔顿·贝尔(Hamilton Bell)代理。

华尔纳在1917年任宾夕法尼亚博物馆馆长后不久,又代表史密森学会赴远东搜集文物并做调查研究。他先到日本住了几个月,撰写有关推古时代雕刻的书;然后于1918年3月到达中国哈尔滨,想在中国东北进行考古。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中国东北的形势十分混乱,不适宜进行考古工作,于是华尔纳在征得史密森学会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就地为美国国务院服务一段时间,担任美国驻哈尔滨副领事。在副领事任上,华尔纳经常出没于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代表美国政府参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滞留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大约由六七万人组成的“捷克军团”的遣返工作,直到1918年年底。

1919年初,为华尔纳代守宾夕法尼亚博物馆馆长职务的贝尔因为急需外出,请求华尔纳回馆复职。于是华尔纳放弃了美国驻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87.

哈尔滨副领事一职,回到美国重新担任宾夕法尼亚博物馆馆长一职,直到1923年。宾夕法尼亚博物馆馆长一职是华尔纳一生中干得时间最长的博物馆行政工作。华尔纳在宾夕法尼亚博物馆任馆长期间,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他于1921年招聘霍拉斯·翟荫(Horace Jayne)入馆工作,翟荫在该馆一直工作到1939年,其间于1923~1925年间参加了华尔纳领导的两次敦煌旅行,长期是华尔纳的助手。第二件事是他在此期间完成了他一生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即关于日本推古时代雕刻的研究专著《推古时代的日本雕刻》,该书于1923年出版^①。

五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的中亚考察史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20世纪的最初10年),其间最主要的事件就是由美国自然史博物馆(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组织的中亚考察。早在1916~1917年间,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就派罗伊·查普曼·安助斯(Roy Chapman Andrews)赴缅甸、中国云南和西藏考察,1918~1919年间又派安助斯赴蒙古高原北部考察,并将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大中亚确定为该博物馆在20年代考察的重点地区。当安助斯于1918年在蒙古考察时,在戈壁沙漠中碰上正在担任美国驻哈尔滨副领事并为遣送“捷克军团”事穿梭于蒙古的华尔纳。这两个人从前没有见过面,但互相知道对方的工作。安助斯向华尔纳透露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拟在蒙古进行大规模中亚考察的计划,建议华尔纳在战后也立即参加到由他领导的中亚考察队中来,华尔纳欣然答应,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再一

^① Langdon Warner, *Japanese Sculpture of the Suiko Period*, New Haven, 1923.

次食言。

当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开始在中亚大规模地搜集古生物化石时,华尔纳的母校哈佛大学得到了美国铝业大资本家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的一部分遗产,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急于利用这笔经费发展其东方艺术品收藏规模,于是导致了华尔纳的返校和他领导的两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霍尔于1881年进入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专攻化学,在校期间埋头钻研铝的提炼方法。1885年毕业后不久就发明了既经济又实用的电解提炼铝方法,1886年在匹兹堡一家工厂批量实验成功。1887年这家工厂组建为“匹兹堡还原公司”(Pittsburgh Reduction Company),从1890年开始,该公司是美国唯一的原铝生产厂家,完全垄断了美国的制铝工业,势力发展到加拿大、西欧、南亚等地,1907年组建成“美国铝业公司”(Aluminium Company of America),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铝业垄断组织。霍尔作为电解铝技术的发明人,在美国铝业公司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本人也因此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据说,霍尔早在欧柏林学院读书时,由于只埋头研究铝的提炼方法,学习成绩不佳,被校方斥为不务正业,经常遭到美国同学的嘲笑,而该校的两个中国留学生则对他表示同情和安慰。中国人的温和性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后来发迹得意之时,没有忘记和他要好的两名中国留学生,逐渐地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①。当霍尔在世的时候,他便花巨资购买东方艺术品和文物,特别是中国文物。1914年12月27日,年仅51岁的霍尔去世,由于他终身未娶,所以生前遗嘱决定将绝大部分遗产用于除神学教育之外的社会公益教育事业。他的遗

^① 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华书局,1962年,第70页。这一说法经常被中国学者引用,但不见载于霍尔的正规传记。

嘱规定将遗产的三分之一(大约 1500 万美元)捐赠给母校欧柏林学院,三分之一“用于促进中国、日本等国教育事业的经费”,其余遗产也被分配给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许多教育机构。他的中国艺术品和其他艺术收藏品捐赠给欧柏林学院的艺术博物馆。打算用于研究中国文化或发展中国教育的经费至少有 700 万美元,按照霍尔遗嘱的规定,用于发展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方法是,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组织联合机构进行研究。在霍尔去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他的遗嘱无法实现,直到战后的 1919 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霍尔遗嘱执行团才开始分配遗产。^①

1919 年,霍尔遗嘱执行团在美国选中了哈佛大学,但在中国为哈佛大学选择合作学校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此后的几年间颇费周折。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学术机构当属国立北京大学,该校自然是美国方面首选的对象。但是美国教会组织在北京新建立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得悉消息后也先后加入到经费竞争的行列中来。尤其是燕京大学,它由美国的长老会等四个基督教差会再加上英国的伦敦会合办,由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等四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1916 年燕京大学在纽约和北京分别成立托事部和董事会,1919 年 1 月聘传教士出身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校长。燕京大学创办之初,筹集经费成了当务之急,司徒雷登自然不放过任何机会。从哈佛大学方面讲,与国立北京大学合作当然比与燕京大学合作更为理想,但由于司徒雷登在美国霍尔基金会里进行公关活动,使此后哈佛大学选择合作学校的过程颇具变数。

哈佛大学首先从霍尔基金会得到了 600 万美元的经费,这笔

^① 关于霍尔基金的数目、分配原则和分配办法等,有很多种说法,这里引用的只是其中之一,不一定准确。

钱刺激了该校福格艺术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搜集欲望。福格艺术博物馆全称是威廉·海耶斯·福格艺术博物馆(William Hayes Fogg Art Museum),创建于1895年,原本是哈佛大学专门为美术系和博物馆学系设置的实习用小型博物馆。在20世纪上半叶,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主要领导人是爱德华·瓦尔多·佛比斯(Edward Waldo Forbes)和保罗·约瑟夫·萨克斯(Paul Joseph Sachs)。佛比斯是艺术家出身,他的外祖父即是美国著名作家、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但他常年研究的课题是壁画修复技术和壁画剥离方法,因此也成了半个化学家;他于1909年任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后,一直到1944年退休时,始终都在研究此类课题。萨克斯出生于商人家庭,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纽约华尔街上当银行家,但因自幼喜爱美术,终于在1912年接受佛比斯的邀请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工作,1915年被任命为助理馆长,1916年任哈佛大学讲师,1917年任助理教授,1922年任副教授,1923年升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主管筹集经费,直到1944年退休。佛比斯和萨克斯同时又分管哈佛大学的美术系和博物馆学系,因此可以说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美术系和博物馆学系是三位一体的机构。当哈佛大学获得霍尔基金资助后,佛比斯和萨克斯野心勃勃,想利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扩展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东方收藏品,促进哈佛大学的远东艺术与考古学研究,最终将福格艺术博物馆建设成全美最大的大学博物馆。于是他们便想从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将已经多次赴东方考察过的华尔纳挖回哈佛大学,协助他们建立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东方藏品部。他们为华尔纳提供了一系列优厚待遇,其中包括给华尔纳一个为期五年的研究员职位,答应华尔纳在任职期间可以领导考察队进入他选择的亚洲任何地方进行考察并搜集文物,允许华尔纳在居留哈佛大学期间为本校开讲一些课程等。华尔纳本人这时已经厌倦了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行政工作,想念他的老家新英格兰,想着返回亚洲进行考察,

于是一拍即合,于1923年辞去宾夕法尼亚博物馆馆长一职,返回母校哈佛大学。

华尔纳返回哈佛大学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领导了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1923年华尔纳返校后,立即组建了由他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已改称费城艺术博物馆)馆员翟荫两人组成的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华尔纳为这次考察设定的目标是为哈佛大学将来的考古学考察工作进行初步侦察,选定可供将来发掘的遗址,他的具体目的是:(1)探索一下在额济纳地区喀拉浩特遗址进行发掘的可能性;(2)如果喀拉浩特不再具备发掘价值,就在沿途寻找其他遗址并进行试探性发掘;(3)从东方美术史的角度对敦煌千佛洞壁画进行调查。喀拉浩特遗址虽然已经被英国的斯坦因、俄国的科兹洛夫等人发掘过,但华尔纳对他在1913年访问俄国时参观过的科兹洛夫搜集品印象很深,总想再从该遗址找到一些艺术品;1914年华尔纳曾经想从北京经库仑前往该遗址考察,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半途而废。此次华尔纳将喀拉浩特遗址作为他返回哈佛大学后要考察的第一个目标,应该说是原因的。华尔纳的主要目标是考察中国西北的艺术品,而那里的美术遗物主要是壁画,所以华尔纳在考察前就决心要为美国带回一批壁画标本;如果仿效斯坦因、科兹洛夫、勒考克等人用切割泥层的方法攫获壁画,在华尔纳看来是个过分沉重的负担。于是华尔纳临行前,从跟随佛比斯专攻意大利壁画技法的哈佛大学青年美术助教丹尼尔·汤姆生(Daniel V. Thompson)那里讨得一个配方,想用化学药剂粘取壁画标本。

六

华尔纳和翟荫于1923年7月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逗留期间从燕京大学物色了一位名叫王近仁的学生当考察途中的翻译兼

事务员(秘书),并且按照哈佛大学的壁画剥离药剂配方购买了化学药品。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宴会上,华尔纳还结识了哈佛学校友吉尔伯特。吉尔伯特曾两次去过中国西北,1914年8月在甘州一带还与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斯坦因一起旅行过两天^①,对中国西北形势比较关注,他考虑到华尔纳一行拟取道军阀割据、匪患猖獗的河南、陕西一带前往甘肃,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于是出面给总部设在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军阀吴佩孚写信,请求吴佩孚保护拟过境西去的考察队。

1923年8月,华尔纳一行乘火车到达河南府,吴佩孚在自己的司令部接待并宴请了考察队,还安排考察队参观了龙门石窟。华尔纳曾在1913年参观过龙门石窟,他此次参观时认为“龙门石窟自从1913年以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②。随后考察队前往陕西省西安府,由吴佩孚派出的军士将考察队护送到豫陕边界。到西安后,华尔纳给福格艺术博物馆购买并寄回了大约二百五十件拓片和其他文物,其中包括端方旧藏多件;他还参观了碑林并购买了一批拓片,包括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1923年9月5日,考察队离开西安,9月12日进入甘肃省境内,9月13日早晨6时30分在泾州(甘肃泾川县)城西意外地找到王母宫石窟。王母宫石窟位于泾河和汭河交汇处的回中山(宫山)脚下,是北魏时期的一个中心柱式佛教石窟。^③当日,华尔纳给妻子写信,要她将王母宫的发现情况转告给佛比斯和萨克斯,信中还写道:

① Jeannette Mirsky. *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 372.

②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07.

③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文物保管所合编:《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8~10页,图版第103~105幅。

今天是9月13日,我们在城外不远的一些岩石洞窟前停了下来(这种里面住人和牲口的洞窟多得数不过来),时间是早晨6时30分。如果只从外表看,看不出有什么指望。但是当我一看清它们的真实面目时,我就立即命令将闪光照明器材拿出来,并让大车回城去。有一个中心柱式大窟,属于六朝早期,可推测为北魏时期,虽然我以前并不知道北魏的势力早在这种雕刻出现时就已经达到这里。当然,该窟的大部分都被泥土覆盖着,但可以看到一尊巨像的头部和肩膀,它可以与你曾经看到过的属于这一时期的任何一件作品相媲美。此外还有一些佛本生故事雕刻画面,即年轻的太子以剑劈树(释迦与诸释种试斫多罗树)和掷象(释迦与诸释种象技)的画面;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这两个故事表现的都是乔达摩婚礼上的游戏。据我所知,除了云冈石窟、巩县石窟和这些新发现的石窟外,中国不存在任何其他石刻佛本生故事。^①

随后,华尔纳和翟荫立即对石窟进行了拍摄和测量工作。两天后,华尔纳又给贝尔写信如下:

中心柱的四个边上各有一个大壁龛,在其上方,四个柱角上各有一只大象的头和肩部无拘无束地突出来,托着宝塔。大象背后的柱顶变成了八边形。当然,很多部分都已经被损毁了,更多的部位覆盖着泥土,但是我们放开胆子剥掉了一部分泥层。……最精美的雕像被埋在粪土和屋顶及墙壁上掉下的落石中,几乎堆到了它的肩部。想将它清理出来需要花费几周的时间,因为只能允许两三个人同时工作。其面部未受

^① 1923年9月13日华尔纳致妻子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08.

伤,属于早期的那种楔形鼻、弓形眉优美类型,而且很大。……如果我的想法没有错的话,这一窟室应该与云冈石窟时代相同。……当然这只是一个发现,但我很高兴,因为其明显的早期年代以及这里是一条传播出路这一事实。现在剩下来的就是要阅读伯希和关于更靠西边的敦煌魏朝壁画的文稿了,然后确定它们的年代。我对中心柱以及四个角上的四只象也很感兴趣,据我所知,别处不曾出现过这类东西。^①

华尔纳和翟荫在洞窟里还凿下一批石雕作品,其中有七件后来被他们带回美国,现在收藏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②。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华尔纳一行是最早对王母宫石窟进行考察的外国人,当时石窟内雕刻品虽然部分遭到毁坏,但大部分仍保护在泥土之下。而当北京大学陈万里于1925年3月随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来到这里时,他看到的毁坏状况已经是很严重的了,应该是华尔纳和翟荫在1923年留下的破坏痕迹,陈万里在1925年3月23日日记中记录道:

余等先至大佛洞;寺殿仅存破屋数间,已无僧居。洞内东西北三面均有造像。下层者悉毁损,碎石遍地,残破之造像触目皆是。殆有盗者为之毁坏欤?随拾一佛头,拟带还北京,以证盗者所为,固有意也。中心塔前面,大佛像尚存背光火焰及飞天种种雕刻,西侧较为完整。有石象及浅雕石刻绝美;同行

^① 1923年9月15日左右华尔纳致贝尔信,转引自: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08~109.

^② 王冀青、莫洛索斯基(Susan E. Mrozowski)《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第122~124页。

者遂名此洞为象洞。^①

此外,当陈万里结束这次考察东返途中,还于1925年7月12日在王母宫石窟看到过华尔纳和翟荫留下的一些没有来得及带走的石雕,他在1925年7月12日日记中记录道:

先往河北王母宫,见有折断佛头三四,在瓦砾中,殆为夫己氏(指华尔纳)前次来游所留存者欤?是真可伤矣!^②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华尔纳当时将王母宫石窟断代为北魏洞窟,还是比较准确的,今天学术界仍无异议。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王母宫石窟中心柱上有四只大象,华尔纳将该石窟定名为“象洞”,该词至今仍被美国的有关著作沿用。

结束了在泾川一带的考察后,华尔纳一行继续西行,翻越六盘山,于1923年10月初到达兰州府,刚一进城就遇到了麻烦,他在致岳母的信中叙述道:

晚上10时30分我们到达甘肃省会兰州,行程15个小时,没吃没喝,还要不厌其烦地将大车和跛腿的骡子们从泥窟窿里推拉出来,因此劳累过度。我们自腰以下全是结成干块的黑泥巴,脱衣服时必须先用棍子将泥巴敲碎才行。正当我们将大车拉到客栈门前的时候,大兵们从黑暗中蜂拥而至,以地方行政长官的名义强行征用我们的大车、车夫和骡子。我记得我过去也曾经像红头大公鸡一样怒发冲冠过,于是我此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3月23日条,北京:朴社出版,1926年,第34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7月12日条,第120~121页。

时真正地大发了一通脾气,因为我知道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好办法。我揪住那个军士的领子,呼来我的秘书王近仁,然后踏着泥浆,冒着黑暗,前往行政长官的衙门,群龙无首的士兵们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在衙门的门口,我竭尽全力地扯着嗓子喊叫着,然后呈上我的名片。长官阁下正在床上酣睡呢。那么就请告诉阁下吧,该起床了。阁下正在睡觉呢!那么请告诉阁下,再过一会儿就有一个洋鬼子进来帮他穿衣服了!上面这些话都是我用汉语说出来的,但后来我就结结巴巴了,得由王近仁翻译,因为我没词儿了。当我站在灯光下看着我的衣服时,我为这一场面的幽默而乐得流了泪,更让人乐的是,这时忠诚的翟荫也跟了进来,要为我壮胆,他的腰部以下粘满了稀泥,整个脸上都抹满了大块的黑泥。我们在长官那舒适的椅子上坐下,至少有20个衙役望着我们。长官入睡了。长官必须醒来。即便在此时此刻,长官也得穿上衣服来见洋鬼子。洋鬼子(看着他的手表)给长官五分钟的穿戴梳洗时间。

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五分钟后,行政长官露了面。我起身站起,通过王近仁非常精确地解释了这绝不是礼节性拜访,我被一支无法无天的军队拘捕了,我的运输工具被充了军。我是来到他的这座伟大城市的游客,早就听闻长官以公正和聪明著称,将这座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条,我还没有搞到吃的东西,我一直在欣赏着省城和其他地方的街景,已有15个小时。现在我来到这里是要一份书面保证,保证要留住自己的大车。

长官神经质地编织着他的手指头,把指关节掰得噼噼啪啪乱响。他说他是奉了甘肃省督军之命令,将兰州的所有大车都充公划归正在派往北京的军队使用。接着,他简要地讲了一下他们国家首都的局势,而且还妄测哈定(Harding)不会

当下届美国总统。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都瞪着他，我的一双人眼一直没有从他那流淌汗水的额头上移开过。我不敢看翟荫，翟荫事后说，如果我看了他的话，我会破口大笑的。当长官一直滔滔不绝地说到无话可说的时候，我站起来说：看来不无遗憾，我明天早上必须向都督报告我被无礼拘捕（我忘了是我提着那个下士的脖颈来的）以及我的大车被强制充公这一不愉快事件，届时我会将吴佩孚大帅给我写的介绍信递交给都督。我一提吴佩孚的大名，长官突然之间差点把自己的手从手腕部位扭掉，立即答应释放我的大车，还要在我逗留兰州期间为我写一封证明信，末了还邀请我和翟荫住在他的衙门里过夜。我说请他不必操心，反正第二天见了都督时一切都会解决的，这让他多难受了一会儿。不过我们还是和和气气地分手，两个士兵提着大大的官府红灯笼跟着我们归来，我们的大车也被释放了。假如我们在那里失去了我们的大车，那么我们就永远地中止我们的行程，因为士兵们已经搜遍了整个乡间，没有人能够用钱得到一辆大车。^①

这封信的细节可以反映 1923 年西北官府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还不像 1925 年以后那样强硬。华尔纳一行在兰州逗留了四天，然后于 1923 年 10 月初离开兰州，经过甘州（张掖）到达肃州（酒泉），拜见了肃州镇守使吴静山（桐仁），雇了一个周姓木匠做发掘帮工，然后经金塔县前往喀拉浩特。在金塔县，华尔纳从县城外一个寺庙里拿走一件青铜小佛像，使他后来在返途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① 1923 年 10 月初华尔纳致岳母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c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09~110.

七

1923年11月13日,华尔纳一行到达喀拉浩特遗址。这里是华尔纳此次考察的首要目标,所以他和翟荫一到达这里就开始进行发掘。1923年11月15日,华尔纳从遗址给贝尔写信说:

这地方本身是可爱的,其可爱程度超出了我所有的想像。城的周围是一片旷野,铺满了扁平的鹅卵石,绵延一英里左右,然后才是沙丘的开始。城墙庞大宽厚,并且各有大型的防御堡垒。中国其他地方的城墙都用令人打心眼里看着不舒服的灰色黄土建成,而这里的灰泥明显地呈现出粉红色。日落与日出时分的光辉简直可以说给这些城墙镀上了一层金色;当月亮出来时,又使得残垣断壁以及堡垒的漆黑影子与人们头顶上一大片银色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夜晚,野狼嚎叫,一直叫得我们驼队的狗快要变得发疯了。结冰的帐篷噼噼啪啪地晃动着,骆驼在附近打着饱嗝发出哞哞的声音。当然天气是寒冷的,大风吹起的沙子和尘土扰乱着你的双眼和脸部,但是除了在洗澡和刮胡子这些方面不方便外,我们并不觉得不舒服。^①

华尔纳在信中还介绍说,斯坦因、科兹洛夫等人已将遗址里的佛塔和壁画劫毁一空。但是,华尔纳和翟荫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在喀拉浩特发掘了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并且绘制了该遗址的平面图。华

^① 1923年11月15日华尔纳致贝尔信,转引自: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12.

尔纳在喀拉浩特遗址的发掘所获文物并不多^①,使他确信该遗址在经过欧洲人的大规模挖掘后已无发掘前途,不值得美国哈佛大学加以考虑。于是华尔纳和翟荫决定按照计划继续西进,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敦煌。

1923年感恩节(11月22日)前,喀拉浩特一带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降,翟荫双脚冻伤。当考察队离开喀拉浩特遗址不久,翟荫已经因脚冻伤而无法行走。于是华尔纳决定先护送翟荫去甘州找名医高金城治疗。他们于12月10日到达甘州,请高金城给翟荫处理脚伤后,于12月26日离开甘州前往敦煌,1924年1月4日到达肃州,但此时翟荫不但脚伤未好,又得了重感冒,已不能继续西行,于是华尔纳决定让翟荫带着在喀拉浩特发掘出来的文物,先行辗转回国,而他本人则带领王近仁和木匠老周继续西行。

华尔纳和翟荫于1924年1月8日分手,然后华尔纳一行于1月21日到达敦煌。当时敦煌县长已经接到肃州镇道两署的通知,次日宴请了华尔纳一行,饭后华尔纳便迫不及待地动身前往千佛洞。当华尔纳到达莫高窟时,王圆禄道士恰好进敦煌城化缘去了,华尔纳一个人在洞窟里参观了一天。他在当日从千佛洞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中说:

我和壁画一起待了漫长的一整天,这使我感到昏头昏脑、烦恼压抑,但我还是必须要在第一印象尚没有散失时给你写这封信。首先要说的是,两年前曾经有400名俄国囚俘在这里住过6个月,他们对壁画进行了大量的、无可弥补的破坏工作,现在再也拍摄不到当年斯坦因和伯希和所能够拍摄到的那些照片了。这里至少有一千个洞窟,其中四分之三里面存

^① 王冀青、莫洛索斯基《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第119~120页、第124页、第128页。

有壁画,并具有一些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东西。但是,到处都有用手指头挖掉的眼睛,或者是划着深深刻痕的脸。风沙的危害和许多世纪里来自自然力的危害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太值得诅咒。至少它使所有的地方同样变得昏暗,并且不属于渎神行为。成排成排头饰华丽的女像并不注意你,但你却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头部。有一幅过去诸神崇拜菩萨的精美构图,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舞女在菩萨面前的一块毯子上跳舞,但整个构图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不时地,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一张脸的局部,其眼神中透露出唐代气韵,绝不会有错;你还可以看到一条飘带仍然被天堂的真气吹得迎风招展。我不知道我曾经在何时如此大受感动过。这里是另一个鲁文,是骇人听闻的、不必要的战争后果。这些可怜的俄国人是哥萨克和其他骑兵的残余势力,被迫越过中国突厥斯坦的边界,被总督缴了械并被遣送到这里。他们的首领在乌鲁木齐的一座中国监狱里正濒临死亡或已经死去,外界没有人能够接近他。但是一个俄国团队的番号被胡乱地涂画在这些美丽的脸庞上,一些斯拉夫语下流话从坐着讲授莲华法的佛陀的口中流出。……毫无疑问,许多洞窟和大量的雕塑可断代为六朝,这些洞窟有中心柱(为我们的理论欢呼!),有交脚佛,有楔形鼻,还有椎形长脖子,所有这些都是确凿的证据。……还有许多石窟,我对其完全迷惑不解。使用了大量的沉黑阴影,使得脸部肥胖臃肿。没有轮廓线条,虽然作品粗糙,但显得厚重并充满力量。它们使我略微想到吐鲁番,但是我承认我一点都不知道它们是早些呢还是晚些。……在同一类并且显然年代也相同的洞窟里,有用沉重的笔触渲染出来的恶魔,和这里的任何绘画一样有力量,但因为毁损太严重了,我怀疑是否照片能够将它们显示出来。它们更像是米开朗吉罗的画,而不是中国的画。这些洞窟是否不属于六朝,我

无法判定,因为我总是找到一些在雕塑上和《玉虫厨子》^①上所常见的线条。毕竟,龙门的仕女行列图一点也不生硬和粗糙。……斯坦因认识的王道士出门进城去了,但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他就会回来。让我感到很高兴的是,在心理战打响之前,我可以一个人单独待一天。不用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誓死带回一些壁画局部。我的职责就是豁出命来,从这个很快就将要变成废墟的遗址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和保护任何一件东西以及每一件东西。很多世纪以来,这个遗址一直处于平稳安宁的状态,但是现在它的末日就在眼前了。^②

最后两句话表明华尔纳在到达敦煌千佛洞的第一天就决心要剥离敦煌壁画。数日之后,华尔纳给贝尔的信中就敦煌艺术品说了更多的细节:

还有另一种风格,其中的笈多成分是如此浓厚,足令你欢跳起来。菩萨具有天平时代(729~749年)的胖脸和唐代的高髻大发,但是那些较小的像(往往是半裸的)则完全是蓝、黑色的小像,就好像它们是从阿旃陀石窟飞过来的。它们和一个印度人挤在一起,完全不考虑构图结构及它们向上翘着的椭圆形脸,那脸看上去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一块小残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我还是坚信它们是唐朝的作品。另外

① 《玉虫の厨子》,日本奈良法隆寺藏7世纪佛龛绘画作品名,参见秋山光和著,常任侠、袁音译:《日本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第11~12页。

② 1924年1月22日华尔纳致妻子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15~116.

一种风格是非常纯正的和最强烈的唐代风格,用红色画成,没有轮廓线,从留下的仅有例子看,其尺寸都大于真人。……至于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您还记得弗利尔收藏的那幅可爱的宋朝《鱼篓观音图》吗?您还记得弗利尔收藏的《柳枝观音图》以及由狩野芳崖创作的那幅《观音图》吗?狩野芳崖的《观音图》上画着观音手持长颈净瓶喷洒净水,其中的一滴水中可见新生婴儿。这些观音像的祖先就在这些墙壁上,在可爱的白幔之中。她真是可爱,无疑是晚宋时期的作品。在宋朝的构图上,有牛车,有马,有干瘪的老和尚;日本的“卷物”(卷轴画)艺术家们正是从这些构图中得到灵感的,并且对这些构图加以改进。肯定没有什么东西能与鸟羽僧正的《斗牛图》相比较。但没有一幅保留下当年斯坦因和伯希和看到时的状况。许多人像都是一笔涂成单像,数量很多而且很优美,但没有一个像画有细节或局部,要么是还没有完成,要么是已经褪色。我一定要设法使自己能够带回至少一些片段。但是我怀疑是否能够做到。①

最后一句话再次说明华尔纳时刻不忘剥离敦煌壁画的念头。关于华尔纳为自己寻找到的剥离敦煌壁画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这里替他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白俄军队对敦煌文物的破坏活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支大约九百余人的白俄残余势力于1920年9月逃窜到中国新疆省,新疆督军杨增新恐其日久滋事,在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后,将其中原沙俄七河省军区中将司令阿年科夫及所部三百余人迁往甘肃,甘肃督军陆洪涛将这支残军安置在敦煌千佛洞,由敦煌县政

① 1924年1月23日华尔纳致贝尔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16~117.

府供养。阿年科夫所部迁居敦煌千佛洞后,在洞窟中生火造饭,许多壁画被熏黑,许多塑像被破坏,而且俄军士兵还在洞窟墙壁上乱刻乱画。数月之后,俄军破坏文物的活动被当地群众发现,引起他们的愤怒,他们向敦煌县署告发。当时驻扎在敦煌的肃州巡防第三营营长周炳南(字静山)出于保护文物之心,会同县署报请省政府,建议迅速将俄人迁出。^①甘肃督军陆洪涛遂于1922年9月下令将俄人解往兰州皋兰县阿千镇养寨村。^②华尔纳到达敦煌千佛洞后,看到了俄人破坏洞窟文物的痕迹,也表示出愤怒之情,上引华尔纳致妻子信以及《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第十四章的有关段落可以表明这一点。但是,俄国人破坏敦煌文物的行径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美国游历者华尔纳用来作为进一步破坏的理由。

第二点是中国人已经对敦煌文物造成的破坏和将来有可能对敦煌文物造成的破坏。华尔纳在剥离敦煌壁画前说:

至于这类汪达尔主义式的文物破坏的道德问题,我真想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地方剥得光秃秃的,一点都不剩。谁知道中国军队什么时候也会像俄国人那样驻扎在这里呢?更糟糕的是,每一个人都能预期到的穆斯林造反之前还会有多长时间呢?再过二十年,这个地方将不值得一访。每一位进香的游客都将他出身卑微的姓名胡乱涂写在这里,并且弹去一小块摇晃着的墙壁灰泥。所有的写本和绢画、纸画收藏品看来在很久以前就被瓜分完毕了。斯坦因、伯希和,北京、甘肃总督和日本人未能获得的东西,又被县长知事们一件一件地得

^① 师侃《最早保护敦煌文物的官员》,载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王惠科、赵志凡、赵世英主编)《陇史掇遗》(萧乾主编“新编文史笔记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127~128页。

^② 师侃《俄将阿年科夫》,载《陇史掇遗》,第25~26页。

到,这些县长知事们的任职期限也都不过是一年左右。每个县长知事在他们任职的最后时刻都要来拜访石窟,拿走一些珍贵的卷子。王道士承认尚遗留多少,他便拿走多少。这些卷子可以避水患火灾,可以带来福气。他们将这些卷子作为厚礼送给上级高官,或者将卷子卖掉,每个卷子可卖得数百两银子。^①

中国人在清末民初时期对待文物的态度不够端正,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依据这一点推测将来的形势,为剥离壁画找理由,事实证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华尔纳在剥离了敦煌壁画后又说:

显然,必须获得这些壁画中的一些标本,为的是在自己的国家内进行研究;而且更重要的,为了保障这些壁画的安全,以防止进一步的汪达尔主义式的破坏。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心中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

我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受过训练的绘画复原专家,只不过是一个具有积极的考古学道德心的普通人。我打算要做的事情看上去属于亵渎神灵、盗窃圣物之类的勾当,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三个罗圈腿蒙古人的行为驱使着我去这样做。他们在石窟外面从骆驼上滑下来,懒洋洋地走进洞窟,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礼拜。他们对着一个涂着洋红色脸颊和鬼蓝色头发的近代丑陋泥像虔诚地祷告了很长时间,然后起身开始聚在一起聊天。这时,其中一位张开布满油污的大手掌,放在一幅9世纪的壁画上,当他说话时将全身重量倚靠

^① 1924年1月下旬华尔纳致贝尔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18.

在这幅壁画上。另一位则溜达到画面跟前，一副懒散好奇的样子，用他的指甲盖在起皮的鳞状画面上剔来剔去。当他们通过窄小的甬道一轰而出时，他们穿的那令人作呕的老羊皮袄在门口的一排神像上摩擦着。噫！那神像的中间部分已经荡然无存，过去还不知道有几百只穿套老羊皮袄的肩膀和胳膊肘在那里摩擦过。

这就够了！不管我出于虔诚心做什么样的实验，现在都找到正当理由了。^①

三个“罗圈腿蒙古人”到千佛洞的正常拜佛活动竟然也被自称为“具有积极的考古学道德心的普通人”的华尔纳当成了剥离敦煌壁画的理由，真是可笑！对于华尔纳，和对于近代其他外国考察家一样，欲取他家宝物，何患无辞？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一个例子。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华尔纳早在旅行之前就早已经计划要在中国西北剥离壁画了，否则他从北京带来化学品做什么用？因此说，不论华尔纳为他剥离敦煌壁画找出什么理由，那理由都是在自欺欺人。

八

华尔纳在王道士返回千佛洞后，立即就剥离壁画事与王道士进行了交涉，并送了七十五两银子作为贿赂。根据王近仁后来告诉燕京大学教授洪业（煨莲）的情况看，华尔纳最初似乎是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地剥离壁画的。美籍华人陈毓贤在《洪业传》中记述了一件事：

1925年一个深夜里，洪夫人及两个女儿都已上床睡觉，

^①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pp. 141~142.

洪业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学生王近仁打来的,说:“我有要紧事得马上见你。”

为了不吵醒门房,洪业到四合院大门去等他,把他带入客厅,一进门,王近仁便在洪业跟前跪下,说:“洪科长,我是卖国贼,你得救救我。”

洪业对着他发愣,迟迟才说:“王近仁,站起来,你不会是卖国贼,卖国贼是达官贵人才能做的,你是学生没资格卖国,你一定把自己估错了。”

王近仁流着眼泪跟洪业说,他前一年向燕京请假,替一个来自哈佛叫华纳的人当翻译员,又替他安排到西北探险。到了敦煌,他们在窑洞附近一个庙里住下,华纳说他要研究洞里的佛教古物。一天晚上王半夜起来,发现华纳不在,去找他,原来他在一个窑洞里,用布把一片壁画盖上,不知道在干什么,华纳看见王进来,吃了一惊,便要王替他守密,说这些壁画是很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但中国人对此类文物没兴趣,美国的诸大学却很想研究它,所以他正用甘油渗透了的棉纱布试验,看能不能把一些壁画搬回美国去。他说试验成功的话,就再回中国来,到时候又有差事给王近仁做。王近仁那时便猜疑这件事是不合法的,现在华纳果然又来了,还携带了一大帮美国人来。他们带了一罐一罐的甘油,无数巨卷棉纱布,王近仁深信他们要把敦煌壁画都偷走。

洪业听了不寒而栗,华纳的计划成功的话,中国最重要的历史遗址之一就全会被掠劫了。^①

王近仁是在1925年华尔纳组织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的前夕将这件事告诉洪业的,所说应该可信。华尔纳之所以要这

^① [美]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样做,大概因为剥离壁画最初只是他和王道士之间的幕后交易,为了掩人耳目,只好夜晚行事。后来既然被王近仁发现,也只好以利劝诱王近仁保守秘密,王近仁自然也为剥离壁画事提供了协助。

关于华尔纳剥离敦煌壁画时使用的手段,王近仁告诉洪业说是用甘油加棉纱布,恐怕不会是这么简单。华尔纳在《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第十四章中介绍他的剥离技法时说:

德国人和英国人是从背部入手,将画有壁画的泥壁拿下,所以能够成块切割,可以保存画面的重要部分。但是,对于从石崖的内心部挖出来的石窟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用泥和麦秸和成的土层被涂抹在砾岩的粗糙表面上,厚半英寸至两英寸不等,上面再用刷子刷薄薄一层白灰。在这些白墙上,再用普通的水彩颜料画上壁画。我几次试图撬下最松动的脱落泥土层,但很快证明,用这种方法我不能控制较大的彩绘泥墙片以保全较完整的画像或细部,即使使用锯子小心切割或用凿子敲出一个槽来也不行。剩下的办法只有怀着恐惧和担忧的心情试一试哈佛大学的博物馆专家们所推荐的技术了。这只是一个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好像只有百分之一。若出于普通的正义心,我不应该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上进行这种实验,不过我也渴望着万一事情成功了做一个典型示范。

离开北京前,我按照化学家们的建议,为自己装备采购了大量的固着剂,用于紧固古代的颜料,这些颜料现在就如同黑板上的粉笔灰一样轻淡和易于被抹去。而且我还带来了配置可溶性基层的成分,当认为颜料已经牢固可靠之后,就必须在画面上施用这种可溶性基层。

……

……北京的一位化学家给了我一种无色的液体,我首先

残忍地着手将这种液体涂抹在墙壁上，以固定正在脱落的颜料，然后再将加热了的糨糊状涂层抹在颜料层上。不过这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洞窟里的气温在零度以下，我一点都不能保证我使用的化学品能够在冻结之前渗透到墙壁灰泥里面去，后来的滚烫的糊状物在变硬之前几乎不可能涂抹在垂直的墙面上。王近仁和苦力（老周）勇敢地坚守在火盆边上，火盆用来加热我的那些涂料；而我本人则冒着种种困难抹刷这些涂料，滚烫的涂料滴滴答答往下掉，就好像滚热的蜜糖一样，掉在我上仰的脸上，掉在我的头顶上，掉在我的衣服上，最后把我的手指粘连成了一团，而此时我正需要熟练地运用我具有的灵敏触觉呢。我首先在没有画壁画的墙壁上或画壁已不可救药的墙壁上做试验，试验结果说不上失败，也说不上成功。我必须再往前走一步，在真正的壁画上做试验，然后将揭下来的壁画运到坎布里奇，让我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朋友们将壁画从坚硬的涂层上挽救出来，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

我没有碰6世纪的作品，因为据悉其他地方不存在此类作品；我也避免触动最杰出的唐代作品。我选择了一些在部分毁损的组画中尚保存完好的唐代画像。这些作品虽然远远谈不上是当地最重要的作品，但它们肯定是我们在美国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珍宝，甚至柏林也会嫉妒它们；在柏林有大量的壁画，是从突厥斯坦的泥墙上成方成块地锯下来的。

我从早晨到天黑一共干了五天，而在五个夜晚我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和自责，这五个夜晚充满着极度的绝望，但每天早晨又被困难所驱赶；结果是一块块壁画残片被安全地包裹在毡布中，再用平木板夹牢，用绳子捆紧，准备旅行十八个星期，用没有弹簧的颠簸大车、用火车、用轮船一直运

到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①

华尔纳在敦煌千佛洞一共逗留了十天(一说七天),其中的五天便用来剥离敦煌壁画。除了剥离敦煌壁画之外,华尔纳在最后还从敦煌移走了一尊彩塑像。他在《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第十四章中说:

再过几个星期,当地的塑匠就要从城里来到这里,进行一年一度的大规模汪达尔主义式破坏。虽然我将一个邪恶念头一拖再拖,但我现在终于意识到,我必须鼓足勇气,试图从这塑匠的泥刀和颜料盒下拯救出至少一件泥塑品。

我用热糨糊从王老道的画壁上将艺术杰作粘去,王老道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当我解释说我希望能在那肮脏的炊饮窟里找一块壁画,王老道面带讥笑;虽然如此,王老道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显得比我要豁达得多。但塑像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塑像似乎是他的骄傲。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一个绿洲走到另一个绿洲,沿街化缘,乞讨来的钱都用来做塑像;而现在来了一个发疯的洋鬼子,虽然给了一笔可观的礼金,也竟然想拿走一件塑像。他建议说,在城里留几天就可以从他雇佣的塑匠那里订做一件塑像,何必找麻烦花运费呢。他甚至还建议说,等到了北京再找大城里的匠人做一件塑像不是更好么。他的建议固然有理,但我坚持说我更喜欢他的庙里供奉着的一尊像。最后我们达成妥协:我答应只拿走一件又古又旧的、失去光泽的塑像,绝不拿他最近才花钱做好的艺术品,这一妥协方案使他大感宽慰。^②

①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pp. 141~143.

②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pp. 143~144.

华尔纳在 1924 年 1 月下旬给贝尔写的信中附记道：

又及：到了最后，幸运之神又重重地拍了我一下，让我得到了按原状保存完好的少数几件唐代雕塑中的一件，高 3.5 英尺，一腿跪地，双手（修复过）在脸前合掌膜拜。色彩严重褪去，但我怀疑它是否曾被重新涂过色彩。为了拿走这座像，我不得不毁去基座，但保住了放在较低部分的莲花瓣，其余部分仅仅是一个锥形物。我想您会赞成的。我一获得许可，便毫不犹豫地立即将该像取了下来，因为再过二十年后，一切都将会化为乌有。惟一成问题的是，如何包装它们并安全地把它们送回家。容易破碎的、没有烧焙过的泥土和石膏粉非常娇气。^①

华尔纳在剥离敦煌壁画、移走敦煌彩塑时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此后令中国人民愤怒不已，也使他被中国人民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众所周知，近代外国人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时，绝大多数人都曾从石窟寺、庙堂遗址中剥移过壁画，譬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考克、鄂登堡、科兹洛夫、特林克勒尔等。他们在剥移这些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壁画时，总是要找到种种借口，打着拯救保护壁画的幌子。今天人们回过头去看，那些借口当然都是些自欺欺人之谈。中国的敦煌学家们尤其对剥移敦煌壁画的行为感到愤怒，因为近现代敦煌的社会背景、民俗宗教情况毕竟和新疆有所不同，根本不存在任何剥移敦煌壁画的正当理由。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如王道士、张大千等），一旦有剥移破坏

^① 1924 年 1 月下旬华尔纳致贝尔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17.

敦煌壁画之嫌,就永难洗清自己的名声。迄今为止,中国敦煌学著作中一般均误认为华尔纳是惟一剥离过敦煌壁画的外国人,因此敦煌画壁上遗留下来的片片“天窗”都成了华尔纳的罪状,华尔纳之所以在来过敦煌的外国人中声名最恶,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九

在本小节,我们想专门谈一谈华尔纳剥离敦煌壁画的数量问题。华尔纳从敦煌剥移走多少幅壁画,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记录华尔纳剥离敦煌壁画数量的人是陈万里,他在《西行日记》1925年5月10日日记中记录道:

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①

华尔纳本人在1926年出版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第十五章中记录他从中国西北带回的文物时说 he 拿走了三方壁画:

和我们预料的相反,我们经过8个月的侦察旅行,为学院带回了一些有形的成果。其中有来自敦煌的唐代泥塑像和三块壁画片段;还有喀拉浩特出土的漂亮铜镜和彩塑泥像;还得到了主要出自西安府的一大批古代碑铭石刻拓片。泾州象洞为我们提供了至少5件石刻头像和一件优美的残体躯干,它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10日条,第81页。

们从原来的位置上断裂掉下,被我们仔细挽救。^①

华尔纳本人在1926年12月26日致斯坦因信中也说:

因此,我就说服您的老朋友王道士,使他允许我剥下来三方唐代壁画残片,并移走一尊彩塑泥像,我对此毫无良心上的谴责。关于那尊彩塑泥像,我最近已经著文发表,并且将一册论文给您寄到大英博物院。我剥下来的壁画残片大小不一,大者长两英尺(1英尺等于30.48厘米),小者长半英尺,是从已经部分被毁损的画壁上挑选的。我相信,无论是您,还是您的保护神玄奘,都不会怪罪我的汪达尔主义行为。^②

华尔纳自称剥得三方壁画,肯定有所隐瞒,因为在1936年夏季出版的《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馆刊》哈佛大学校庆三百周年纪念专号(第5卷第3期)上,华尔纳发表了一篇题为《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部》的文章,其中改正了的说法是:

我们在北京购买了一颗大石狮子的头,断代为公元4世纪。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一返回美国,我们就能将那件重要的、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获自敦煌石窟的佛教彩塑神像安装布置起来。而且,我们还从敦煌获得了几方独一无二的8世纪壁画断片,以及半打(6幅)早期壁画样片,它们是被购买得到的,或者是别人送给我们的;这些壁画丰富了我们的绘

①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p. 146.

② 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画收藏品。^①

话句虽然模糊,但“几方”唐代壁画再加“半打”早期壁画显然不止三方。1955年常书鸿在《警告霍雷斯·杰尼和他的主子们》一文中揭露说:

对于敦煌文物工作者和敦煌县人民来说,美帝国主义分子劫夺文物的无耻罪行是知道得最清楚的。如所周知,敦煌文物近五十年来曾经受到帝国主义者不断的劫夺,其中最卑鄙最无耻的一个,就是一九二四年到敦煌劫夺了千佛洞唐代彩塑和壁画,因而获得华尔街老板们的青睐,换得了剑桥哈佛大学伐格博物馆馆长的南陀·华尔纳。^②

常书鸿在注释1中解释华尔纳剥离壁画事时统计道:

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二四年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3,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等的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及328窟通高120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

① Langdon Warner,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Art', *Bulletin of the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Tercentenary Number, Vol. V. No. 3, Summer, 1936, p. 47.

② 常书鸿《警告霍雷斯·杰尼和他的主子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第3页。

音彩塑等数尊,这批赃物现藏美国剑桥费城伐格博物馆。^①

常书鸿与陈万里的说法基本上相近。陈万里所说二十余幅是从曾帮助华尔纳剥壁画的周某处听到的,常书鸿所说的二十六方是在洞窟里统计出来,应该说都是有所根据。但是,这个数目与今天一般所知的华尔纳剥移敦煌壁画数目相差甚远。

1966年波威在《通过信件看到的兰登·华尔纳》一书中说华尔纳剥移了十二幅壁画^②,而且还提到“12幅敦煌壁画残片中的11幅经过处理修复后又完全重现光彩”^③。1977年波威在《兰登·华尔纳》一文中又说“华尔纳带回了12幅壁画残片和一尊彩塑跪拜菩萨像”^④。波威根据信件研究华尔纳,所说应当也是有依据的。后来英国人彼得·霍布刻克(Peter Hopkirk)在《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一书中说“华尔纳设法剥移下来十二幅尺寸不大的壁画”,而且“十二幅壁画中的十一幅最后获救”^⑤,大概是采用了波威的说法。日本学者秋山光和曾于1966年、1968年和1972年三度访问福格艺术博物馆,调查所藏敦煌壁画,据他的调查报告《唐代的敦煌壁

① 常书鸿《警告霍雷斯·杰尼和他的主子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第3页。

②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17.

③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21.

④ Theodore Bowie, 'Langdon Warner (Aug. 1, 1881~June 9, 1955)',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Supplement Five, 1951~1955, New York: Chales Scribner's Sons, 1977, p. 729.

⑤ 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John Murray, 1980, p. 221.

画——以福格艺术博物馆藏断片为中心》^① 和《敦煌壁画研究的新资料——罗寄梅氏摄影照片和福格、爱尔米塔什两美术馆所藏残片之探讨》^② 披露,当时福格艺术博物馆的流水底账上记录了十一幅,其中四幅公开展览,另有七幅在地下室仓库中保管。1988年,美国学者苏珊·莫洛索斯基帮助我去福格艺术博物馆调查华尔纳所获敦煌壁画,调查到十幅(秋山光和先录第八幅或后录第六幅除外)^③,情况大致相同。因此看来,华尔纳剥移了十二幅壁画,最后保存下来十一幅,似乎是定论了。那么,怎样解释十二幅和二十多方之间的差异呢?我们怀疑有两种可能:一是华尔纳在剥离壁画时实验了二十余幅,但成功剥下并带回美国的十二幅;二是陈万里、常书鸿等人记录被剥壁画数目时,有可能将其他外国人剥离的敦煌壁画也算在了华尔纳的账上。其中第一种可能性大一些。

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剥离敦煌壁画的外国人绝不止华尔纳一人。据我们所知,19世纪来敦煌千佛洞访问的早期外国考察队还没有想到干剥移壁画之类的勾当。1907年斯坦因初访千佛洞时,也不曾剥移壁画。第一个剥离敦煌壁画的外国人是1908年访问敦煌的伯希和,斯坦因第二次访问敦煌千佛洞时于1914年4月3日写的日记中记录道:

我遗憾地发现,由于有人企图割去一个妖怪的形象,那幅

① 秋山光和《唐代の敦煌壁画——フォッグ美术馆所藏の断片を中心に》,佛教艺术学会编《佛教艺术》季刊,第71号,每日新闻社刊,1969年7月,第78~95页。

② 秋山光和《敦煌壁画研究の新资料——James Lo氏摄影写真とフォッグ、エルミタージュ两美术馆所藏断片の检讨》,《佛教美术》,第100号,1975年2月,第77~93页。

③ 王冀青、莫洛索斯基《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第116~128页。

有无马大车等等场面的大壁画(千佛洞第8号洞窟)已被损毁。王道士指名点姓,说做这种事的人乃是伯希和。从列队菩萨的壁画上,一长条一长条的画面被割去,以至暴露出底下一层壁画画面上的题记栏,这些肯定也是伯希和干的。^①

以前人们并不知道伯希和有剥移敦煌壁画的行为,幸亏斯坦因的私人日记里做了记录。据秋山光和说,俄国人鄂登堡在敦煌考察时,也从敦煌剥移壁画十几幅,后藏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②。斯坦因还听说过日本人剥移敦煌壁画之事,1924年11月28日美国波士顿富商兼哈佛大学校董卡尔·凯乐(Carl T. Keller)致斯坦因信中说:

他(华尔纳)向我展示了一些(敦煌壁画)照片,从上面可以看出某人试图用凿子将一些壁画凿下来的痕迹,我猜是小日本干的,您向我提到过他的所作所为。^③

斯坦因看到其他人剥移敦煌壁画后,也加以效法,在1914年4月间剥移了一批敦煌壁画,详细情况记载于斯坦因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日记中。^④

我们举出伯希和、斯坦因等人剥移敦煌壁画的行为,并不是要为华尔纳解脱罪名,只想说明华尔纳的行为不过是步他人后尘而

① 斯坦因1914年4月3日日记,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② 秋山光和《唐代の敦煌壁画——フォック美术馆所藏の断片を中心に》,《佛教艺术》季刊,第71号,1969年7月,第78-95页。

③ 1924年11月28日凯乐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④ 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的敦煌莫高窟日记研究》,未刊稿。

已。我们在谴责外国人剥移敦煌壁画行为时,对这些人应该同样评价。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用刀、凿剥移,而华尔纳则首次将哈佛大学化学系和福格艺术博物馆发明的最新科学技术用在了剥移敦煌壁画上。哈佛大学此后一直在研制这种壁画剥离法,后来斯坦因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时,也曾试图运用这种方法。

十

华尔纳和翟荫在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过程中为哈佛大学从中国西北获取了一批文物,同时他们也第一次领受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人擅自攫取文物的力量。早在1923年10月底或11月初,当华尔纳去喀拉浩特途经金塔县时,曾与该县县长郊游,并在县长兄弟的帮助下拿走了当地寺庙里的一件小青铜佛像,华尔纳对这件事自述道:

我们在现今的(金塔)城外驻足,目的是看看金塔,该城因此而得名。他们(县衙门的人)告诉我们说,从前塔的穹隆顶上覆盖着一层纯金,而不是像现在看到的那样是一层黄漆;可是来自我们光荣国度的那个人竟跑到这里将金子给揭走了。这种说法好像有点不公平,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以前从未有过美国人踏足于此地。建筑物看上去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地基无疑是古代的。在近代修筑的神坛上有一些劣质的泥像,当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件公元七八世纪的小青铜佛像时,我更加相信该寺始建于古代这一点。在北京的古董店里,有数以百计的这类不很重要的小像在出售,但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件处在原来位置上的小像。这是预示着未来工作顺利的好兆头。所以,当县长的兄弟将这个像掰下来硬要塞到我的怀

里作为礼物时,我只是半推半就地扭捏一番而已。假如我能预感到这小像后来要给我们造成麻烦的话,假如我能预知这小像在结束它的长途旅行后、重新回到它那悲惨的环境之前曾差点打乱我们的全盘计划的话,我当初真应该坚辞不受。^①

据华尔纳说,这位金塔县长是满族人,与下属官员和当地人民向来不和,而且即将去职他赴。所以当华尔纳离开金塔县后不久,县署内的反对派和当地农民便将即将离职的县长截留了至少两个星期,并给兰州的甘肃省督军打电报,通报县长纵容华尔纳一行偷盗铜佛像之事,请求下令堵截华尔纳和翟荫,追回文物。兰州府尹首先奉命在兰州堵住了提前东返的翟荫,又给肃州镇道两衙门打电报,要求在肃州堵截华尔纳。翟荫被扣留后,为了自己脱身,供认铜像在华尔纳手上,并给华尔纳在安西的通讯地址打了一份电报,给他在肃州的通讯地址写了两封信,汇报情况。而肃州道台在收到兰州官府来电后,也派人在肃州侦访,堵截住了东返的华尔纳,要求华尔纳交还文物。华尔纳在肃州被扣留时给他的妻子写信中叙述说:

我正打算离开客栈,一个个士兵每人手提一只大红灯笼鱼贯而入。领头的那位坐在泥火炉的边上,抽着一支烟,态度极为蛮横。在安西的时候,我收到翟荫在兰州府知事的要求下给我打来的一份电报,要求我将一件六朝小青铜像送回金塔县(从此向北的一个绿洲,经过去喀拉浩特的道路)。我曾经对这件小青铜像感兴趣,于是金塔县县长的弟弟便将它从庙坛上掰了下来送给了我。幸好我没有亲自去拿它,我说明当时我并不愿意去拿它。金塔县打电报,让在兰州捉拿我,翟

①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pp. 75-76.

荫又将电报打回安西，而现在肃州道台也派他的奴才来了，这家伙对待我就像是对待贼一样，还说我最好乖乖地将东西交出来，否则他们将给大使打电报。我告诉他说，我已经打电报说了，我要将东西通过邮寄的方式交还。尽管如此，这厮还是坐在我的火炕上，无休止地谈呀谈。最后我告诉他说，我很忙，他可以改时间再来。费了好一阵工夫，才将这厮打发走。明天我将立即去镇台那里，将这件小青铜像转交给他，并谴责道台的命令和他的传令人。这是我第三次与道台的奴才或道台本人之间产生麻烦了。上一次的情况是，我去拜访他的衙门，但他的看门人如此无礼，我连名片都没有递，转身就走。幸好镇台是一位可爱的老人，我们曾经在一起吃过饭，还在一起喝过酒，一共有好幾次呢。所有这些都表明，为什么人在这里走路时一定要当心，在身后的回路上留下朋友又是多么的有价值。我过去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因此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引起所有这些争吵的小铜像不过4英寸高，是这种类型的小像中最差的一种。我之所以对它感兴趣，那是因为它是我曾经见过的第一件也是惟一一件放在古玩店之外的小像，它站立的那个庙又位于去喀拉浩特道路上的一个古遗址上。现在，我为我自己是如此高尚正直的一个人而感到双倍的欣慰。镇台将会让一切都变得好转起来，我不必非要去和道台或者他手下那帮无礼之徒打交道。^①

华尔纳在同一封信又附记了一部分，暑期“第二天”，继续讲这件事：

^① 1924年2月初华尔纳致妻子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18~119.

我刚刚收到翟荫从兰州写给我的一张便条，上面用长长一段话解释了小青铜像一事。他一直被挡住了去路，虽然实际上还算不上是被逮捕。看来，他们真想搜查那几只装有喀拉浩特(黑城)发掘成果的箱子，虽然他们并没有这样说。官吏故意跟翟荫闹别扭，已经将翟荫耽搁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幸好，翟荫得到了在兰州的善良的外国人们的建议和帮助。翟荫耍了个花招，将这件事搪塞过去，而他的行李也没有让打开。他说，谁要想打开行李，就得在他的尸体上干。今天早上，我将要去镇台那里归还青铜像，幸运的是我仍然带着它。这青铜像高4英寸，支架的两条前腿已经折断，你知道这类没有什么特色的六朝和唐朝的玩意儿。西安以西的中国人绝没有谁肯掏10分钱买它。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政治困境，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躲过去这样的困境。我彻头彻尾地发疯了，翟荫比我疯得更厉害。他们告诉翟荫说，他必须待到事情水落石出时才能离开；因为他们担心，在翟荫跳出搜寻范围之后，我也会说小青铜像是翟荫拿走了。

附记。我刚去镇台那里，我的口袋里装着那只小青铜像。镇台完全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且偏袒着我。当他们要求镇台派一个人去阻拦我时，镇台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他将会让他们知道我何时进城，届时他们可以派那个将小青铜像送给我的人来，再将它要回去！因此说，毕竟中国人中间还是有一些正派人的。当镇台看到这件小青铜像时，他不禁大吃一惊，人们吵吵闹闹，原来就是为了这么一件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接着，我们坐下来吃了一顿仓促之间准备的午饭，配有三星白兰地，有罐头装的腌牛肉，以照顾我的外国口味。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人报信说，道台已经告诫客栈的老板，不要让我们离城。你应该看一看镇台是怎样发脾气的！刹那间他就变成了一位老骑兵，怒气

冲冲地喊出一道命令说：道台应该受到惩戒，去告诉客栈老板说要像对待贵宾那样善待我们。再来点三星啤酒吧，还有火腿和蛋；再来点三星啤酒吧，然后送给我一幅西藏绘画作为礼物。镇台陪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穿过画着龙虎和真人大小门神的四对大门，一直走到大车旁。最后镇台对我说，他明天要来回访我。在最需要面子的地方，这将给我带来面子。如果再多一些这类争吵，那么中国人将会像对待那些穿过他们的国境线逃难而来的可怜的俄国人那样对待我。我离开衙门后，又去了电报局，给兰州的邮政局拍了一份电报；在这场纠纷中，他们曾经帮助过翟荫，应该让他们知道青铜像已经归还。那里的人们对于这件事一清二楚，立即询问我是否已将它交回。同时，镇台不仅给我写了一张收据，而且还给兰州的镇台发了一份官方电报，电报中说，现在青铜像已经在他的手中。明天，衙门要派一个人骑着马去一百多英里开外的金塔县，将这件青铜像重新安放在原来的那间摇摇欲坠的破庙中。这件青铜像将在那里等待着下一个想要得到它的中国人来将它搬走，要不然它就会落在地上的马粪中，永远地丢失掉，再也找不回来了。写到这里时，我让一支武装卫队和道台的名片给打扰了。应该给他点严厉惩罚！我说我不在家。那将会给他一两点教训的。而且王近仁也外出了，我无法单独与他交谈。在我这头，事情也许已经了结了，但我很想知道翟荫的遭遇如何。此时，他一定是离开兰州了，要不然的话我应该接到他发来的电报。现在，他正在路上，再也不能被追赶上了。①

① 1924年2月初华尔纳致妻子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19~121.

在肃州镇守使(镇台)吴静山的斡旋下,华尔纳盗拿金塔县青铜佛像一案最后不了了之。金塔县的铜佛虽然被迫交还,但由翟荫押送的喀拉浩特文物和由华尔纳携带的敦煌文物却没有被发现。翟荫和华尔纳都是经过兰州、六盘山、泾川县象洞、西安等地返回北京的。翟荫首先回到美国,华尔纳几个星期后也回到了美国,他们从中国带回的文物、照片等等也被安全地运回美国。

关于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华尔纳在美国发表的旅行游记和报告书比较多。在考察期间及考察结束后不久,华尔纳首先将考察游记陆续寄回,连载于1923年至1925年间出版的《世界作品》杂志上,题为《在土匪猖獗的中国西部寻找最早的艺术珍宝》^①。1925年,华尔纳还将同一次经历写成《在土匪横行的中国西部追寻艺术探险记》,连载发表在《今日世界》杂志的第45卷和第46卷上^②。在1925年4月出版的《福格艺术博物馆纪要》第2卷上,华尔纳还发表了《1923年至1924年的中国考察》一文^③。在1926年出版的美国《美术研究》杂志第4卷上,华尔纳发表了《来自敦煌的一件8世纪塑像及其在中国、日本同类作品》^④,讨论他从敦煌带回美国哈佛大学的彩塑像,可算是他的第一篇敦煌艺术专题研究论文。华尔纳就这次考察撰写的主要旅行报告书即本书所收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1926年由纽约州花园城的达

① Langdon Warner, 'Amid Western China's Bandits in Search of Earliest Art Treasures', *The World's Work*, 1923~1925.

② Langdon Warner, 'Adventuring After Art in Bandit-ridden Western China', *World Today*, Vol. 45, May 1925, pp. 473~484, 562~572; Vol. 46, August 1925, pp. 690~693, 777~787.

③ Langdon Warner, 'Chinese Expedition, 1923~24', *Fogg Museum Notes*, Vol. 2, April 1925, pp. 2~18.

④ Langdon Warner, 'An Eighth Century Statue from Tun Huang with Chinese and Japanese Parallels', *Art Studies*, Vol. 4, 1926.

伯带·佩奇出版公司出版,1927年由伦敦阿罗史密斯出版公司再版,^①全书共168页,分15章,附插图照片25幅,地图3幅。

十一

华尔纳领导的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原本是想为哈佛大学侦察一些可供将来考察发掘的目标,但却意外地给哈佛大学的这个小博物馆带回了一批特殊的美术品,尤其是当时被认定为中国境外仅有的一批敦煌壁画和彩塑艺术品。在敦煌的“收获”使华尔纳将敦煌确定为哈佛大学今后研究与考察的重点。他在结束考察后认为:

虽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和伯希和教授已经从敦煌拿走了大量的东西,虽然伯希和的书中对敦煌壁画的照相复制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但是还有一千个问题尚无答案。

哈佛大学必须再次派人去那里,这次应该派一支装备精良的考察队,配备有全套的照相器材,再配置若干人手,以协助研究我心中产生的各种问题。^②

此外甘肃泾川县一带的石窟群也被他列为将来的考察重点。佛比斯和萨克斯以及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主要赞助人也认为第一次考察是成功的,他们认为壁画、彩塑、石雕等类型的收藏品一定会提高福格艺术博物馆在美国的地位。于是,当1924年华尔纳返回美国后不久,他们便决定委派华尔纳组建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

^①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6; London: Arrowsmith, 1927.

^②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p. 147.

考察队。

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首要目的是为敦煌壁画进行大规模的摄影,并将华尔纳 1924 年在敦煌莫高窟仔细研究过的一个西魏石窟(即伯希和编 120N 窟,现敦煌研究院编号 285 窟)的壁画全部剥离下来,并带回美国哈佛大学。其次考察队计划沿途对泾川县象洞(王母宫石窟)进行拍摄与研究。因此,队员中必须包括一名负责敦煌壁画摄影工作的专业摄影师和一名负责敦煌壁画剥离技术的壁画专家。华尔纳组建的考察队由六人组成,华尔纳任考察队队长,老队员翟荫负责协助华尔纳管理考察队事务,除此之外又物色了四名新队员,其中擅长摄影的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理查德·时达(Richard Starr)担任壁画摄影工作,曾经为华尔纳提供剥离敦煌壁画用化学品配方的哈佛大学美术助教汤姆生担任壁画剥离工作,哈佛大学美术助教溥爱伦(Alan Priest)协助壁画研究工作,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生霍拉斯·石天生(Horace P. Stimson)担任随队医生。除了华尔纳已经 44 岁外,其余五人都是不满 30 岁的年轻人,最大的翟荫 27 岁,最小的剥离壁画“专家”汤姆生只有 22 岁。

考察队长华尔纳除了肩负领导敦煌考察的任务之外,还有一项使命便是代表哈佛大学与北京的一些教育机构进行谈判,目的是利用霍尔基金的资助在北京建立一个中美合作的中国文化高级研究中心。通过这种方式,将在哈佛大学专攻远东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生送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然后从哈佛大学获取哲学博士学位。这件事有点类似华尔纳在大约十年前受命组建“北京美国考古学院”的活动,其难度可想而知。

1925 年初,翟荫首先到达北京打前站。六个星期后,华尔纳率领的哈佛大学一班人也到达北京,他们一行迟到的原因是在途中对日本做了一次短访,主要目的是调查 1923 年 10 月关东大地震对于东京地区文物和艺术品造成的破坏程度。考察队员到达北

京后,开始集训汉语。而华尔纳在此期间则首先通过常驻北京的美籍文物收藏家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做介绍人,开始了他代表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的有关合作方面的交涉。前文提过,当哈佛大学和霍尔基金会准备在北京选择一所大学作为合作伙伴时,北京大学始终是美国方面的首选对象,但美国教会主办的燕京大学为了争取经费,也不遗余力地参加到竞争中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此事经常赴美活动,1924年,洪业担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负责与哈佛大学谈判合作事^①。此外,由美国传教士裴德士(William Bacon Pettus)任校长的北京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也加入到竞争行列中来。华尔纳基本上属于力主与北京大学合作的一派,到北京后便先与北京大学谈判,他认为燕京大学过分强调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因此对燕京大学的态度比较冷淡,建议哈佛大学不要考虑与燕京大学合作事,因而引起了燕京大学方面的强烈不满。由于中、美四所学校在合作办院方面引起了纠纷,矛盾错综复杂,所以华尔纳后来又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即将北京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改组为“北京中国研究院”,作为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联合主管的研究生部,所需经费则通过哈佛大学进行分配^②。他将这一方案提交美国方面后,须在北京静等回音,于是决定由翟荫率领考察队先行去敦煌考察。

就在华尔纳进行了他的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中国人民的反帝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中国学者也已经意识到阻止外国人来华考古的重

① 翁独健、刘子健、王钟翰《洪煨莲先生传略》,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②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25.

要性和紧迫性,在对待来华考古的外国人的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华尔纳为了避免考察队在西北遇到阻力,在代表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谈判合作的过程中邀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人参加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一起赴敦煌考察,作为两校初步合作的尝试,考察队也可以借此得到北京大学的介绍信,以北京大学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考察。而北京大学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待美国哈佛大学来华考古的态度比较谨慎,但代理校长蒋梦麟还是同意考虑与哈佛大学尝试合作,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等遂决定派人参加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北京大学医学院陈万里闻讯后意欲前往。陈万里《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一文中说:

1924年美人华尔纳君至其地(敦煌千佛洞),勾留约一周间;既归国,即组织一敦煌考古队来华,拟在千佛洞为长时间之考察,由翟荫君主其事,溥爱伦、石天生二君任记载,时达君任摄影,汤姆生君则专攻美术者也。吾校知其事,由福开森君之介绍,沈兼士、马叔平二先生之筹划,胡适之先生之勸励,余竟获随之西行,不可谓非壮游矣。^①

陈万里之所以愿意前往,是因为他虽然“精于医学,尤爱美术,钻研之暇,喜作远游”^②,若能与华尔纳、翟荫等一同前往,则是实现“十数年来所梦寐以求之西北旅行”^③。沈兼士、马衡等之所以同意派陈万里前往,一是因为“敦煌近廿年来外人已屡至其地;顾我国学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附录一:《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第135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马衡序(序二)。

③ 陈万里《西行日记》,自序。

者以考古为目的而往者，此殆为嚆矢，苟非得智力卓绝之士，虑弗克负荷。适陈君万里奋发欲往，余（沈兼士）与叔平（马衡）亦审谛微陈君莫能当其事者”^①。二是因为这将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第一次进行外出实地调查活动，三是因为借此机会可监视美国人的活动。第三点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1925年华尔纳一到达北京，就找到燕京大学学生王近仁，请他再次担任考察队的翻译兼事务员。王近仁在华尔纳和他联络后的某日深夜到他的老师洪业家中去，诉说华尔纳在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中剥离敦煌壁画的内情，以及华尔纳又将赴敦煌大规模剥离敦煌壁画的计划，他这样做大概是出于恐惧或悔悟的心情。洪业对华尔纳剥离敦煌壁画之事当然感到气愤，司徒雷登对华尔纳与北京大学秘密谈判之事也非常不满，据陈毓贤《洪业传》记述，洪业在知情后采取的措施如下：

现在洪业面临保护敦煌壁画的重大责任，他吩咐王近仁装着没泄密，仍跟华纳到敦煌去，第二天自己雇了洋车去见教育部副部长秦汾（号景阳），秦汾也是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他马上采取行动，打电报到每一个由北京到敦煌途上的省长、县长、警察长，说不久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机构派人来西北考古，请各官员客气地对待他们，并加以武装保护，可是得防备他们损害任何文物。

两三天后，华纳到燕大拜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早已得到燕大在美国的托事通知，知道哈佛要派华纳来北京，因为哈佛与燕京正在协商合作办学社。司徒雷登听闻华纳在北京秘密跟政府办的北京大学联系，非常恼怒，华纳显然深感如果哈佛要跟一个中国机构合作才能得到霍尔这份钱的话，他宁可跟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沈兼士序（序一）。

这机构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而不愿跟这小教会学校的传教士打交道。司徒雷登虽然心里不悦,也按照礼仪请华纳与哈佛同人吃顿晚饭,洪业和其他教授在座做陪客。饭吃完了还互相敬酒。华纳就表示他对中国艺术传统无限仰慕。洪业也发言,欢迎国外来帮助中国研究古物的朋友,他说因中国历年来政局经济不稳,国人没机会好好地研究出土的古物,但他认为中国人可胜任研究的古物应留在中国,若中国没有专家可以研究某些古物,而古物被运到国外去,一定得归还中国。席上各位酒酣饭饱,对洪业的话也没有特别留意。

结果哈佛那一批人每到一个地方,就有政府代表欢迎他们,到了敦煌,每个外国人都被两个警卫彬彬有礼地挟护着,动弹不得。华纳本来要雇几十只骆驼把赃物驮到印度,壁画既偷不到手,只好回北京,路过兰州把大量的甘油及棉纱布捐献给一个小教会医院。华纳私下告诉王近仁说一定是队伍中的北京大学代表陈万里作梗,因为每到一个地方,陈万里便去拜见地方官,地方官便坚持保护他们。^①

从陈万里《西行日记》看,王近仁在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途中并没有什么过分行爲,而且他和陈万里还经常密谈,因此可以推测,正如陈万里代表北京大学监督考察队一样,王近仁也起到了代表燕京大学监督考察队的作用,他后来将这次考察的失败过程报告给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又在中、美加紧活动,最终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由于派陈万里参加美国哈佛大学考察队西行意味着北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首次对西北进行学术考察,所以颇受北京学术界的重视。在陈万里出发的前一天(即1925年2月15日)的上

① [美]陈毓贤《洪业传》,第97~98页。

午 10 时,北京大学国学门为陈万里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会,到会者除陈万里外,还有沈兼士、马衡、袁复礼、胡适、林玉堂、陈垣、黄文弼、李宗侗、徐炳昶、朱家骅等十六人。会前沈兼士、马衡、袁复礼与陈万里“会谈颇久”,大概是交代监视考察队的事宜。1925 年 2 月 16 日,陈万里、王近仁和翟荫、汤姆生、时达、溥爱伦、石天生等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员从北京西车站起程,西去考察。由于华尔纳还必须在北京代表哈佛大学谈判合作事,暂时不能随队西行,于是翟荫被任命为考察队临时队长。

十二

当华尔纳在北京逗留期间,他也许还不知道,他的敦煌考察情况已经被当时号称中亚敦煌考察头号权威的斯坦因所了解。华尔纳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仔细阅读过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报告书,曾向往过去和夙考古。当斯坦因描述敦煌文物的第二次中亚考察游记《沙埋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 年)和详尽报告书《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1921 年)陆续出版之后,华尔纳更是爱不释手,他在进行第一次赴中国西北考察时,随身带着《沙埋契丹废址记》,譬如他在 1923 年 9 月翻越六盘山后就曾“打开了书箱,拿出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废址记》读将起来,一直读到因强烈的嫉妒心理而读不下去的时候为止”^①,可见他真是像后来多次说过的那样,一直将斯坦因的著作当做考察的指南书。

而斯坦因对华尔纳的最早了解应该说是始于 1924 年,当时华尔纳正在组建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最早向斯坦因介绍华尔纳及其敦煌考察活动的人是美国人凯乐,他是波士顿的富商,也是哈佛大学的校董,在美国的许多博物馆任董事,对中国

^①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p. 50.

文物和敦煌文物也很有兴趣。凯乐长期与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门交往密切,自然对华尔纳的考察和动向极为关注,甚至还多次请华尔纳作为他购买中国文物的代理人。1924年7月,凯乐到英国伦敦旅行,为了能接近斯坦因,以便将华尔纳的敦煌考察介绍给斯坦因,便请英国伦敦名流赛克斯小姐(Miss Ella Sykes)从中牵线。赛克斯小姐曾经于1915年4月至11月间跟着他的哥哥、英国陆军准将珀西·赛克斯爵士(Sir Percy Sykes)逗留喀什噶尔,替回英国度假的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Sir George Macartney)暂时管理英国领事馆,其间曾帮助斯坦因将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抢运出境,因此她与斯坦因的私交颇深。1924年7月10日,赛克斯小姐在伦敦阿尔贝玛尔俱乐部(Albemarle Club)举办了一次茶会,邀请斯坦因和凯乐同时参加,给他们两人提供了初识的机会,使他们就华尔纳敦煌考察一事进行了交谈。凯乐返回美国后,于1924年11月28日从波士顿家中用打字机给斯坦因打印出第一封信(凯乐的手写笔迹极难辨认),然后由伦敦的赛克斯小姐转交斯坦因。凯乐在这第一封信中同样重点地介绍了华尔纳的敦煌考察,主要段落如下:

假如我用自己的手写体给您写信的话,恐怕您会以为您又发现了一种未知语言文字,就好像您在敦煌发现的许多未知语言文字一样。

您也许能回忆起,我是您的崇拜者之一。7月10日在赛克斯小姐于阿尔贝玛尔俱乐部举办的茶会上,我遇到了您。当时我告诉您说,我的一位朋友兰登·华尔纳先生向我汇报说,千佛洞的一些部分遭到了俄国人的大破坏。华尔纳先生是今年1月份从敦煌回来的;自从我回国以后,我一直试图见到华尔纳先生,但是由于他有许多约会,我直到上个星期才成功地见他一面。

华尔纳先生让我看了他拍回来的照片；不知我是否应该告诉您，他急不可耐地说过，假如不是您成功地踏出来一条光明道路的话，那么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那些成绩的。他还说，他只在敦煌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正打算立即重返敦煌，并带上一套适当的照相设备，以便能使您在敦煌揭开的奇迹通过照相的手段得到永久性的记录。

华尔纳先生毫不掩饰他对您的杰出工作的崇拜与敬仰之情，他也毫不掩饰一个事实：您才是大师呢，而他们所有的人都不过是跟在您屁股后面的追随者！好像他还去了一个地方，经我调查，是喀拉浩特（黑城），他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据他说，在战争期间，有四百名俄国军人一度被安置在敦煌石窟寺里。在一些石窟的墙壁上，刻画着部队的番号；而在石窟寺内，到处都是烟熏火燎后留下的污垢，还刻画着人名和其他乱七八糟的题记。幸好，彩塑像实际上没有受到损坏，主要的破坏发生在壁画上面。

……

华尔纳还告诉我说，王老道仍在敦煌，您曾从他的手上得到了您的大部分文书。华尔纳告诉那个老家伙说，他知道有关您的一切，他甚至随身带着您的著作当他的向导！这使华尔纳得到了很大的面子。

我敢肯定，如果您愿意提出来您在敦煌急欲做的任何事情，华尔纳先生都会欢天喜地地去遵命照办，并且以此为荣。您可以通过我和他取得联系。

华尔纳先生的妻子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小女人。她总是处处跟随着他，几乎寸步不离；作为和罗斯福总统属于一家人的一位罗斯福氏，这女人这样做当然是非常合适的了！^①

^① 1924年11月28日凯乐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斯坦因收到凯乐这封信后,于1925年1月13日从伦敦大英博物院给凯乐回信,主要段落如下:

我的确回忆起来了,去年7月份,由于赛克斯小姐的盛情邀请,我得有机会与您相识,对此我感到心满意足。我还回想起,您曾经好意答应我说,您要从您的朋友兰登·华尔纳那里为我搞到一些信息。您现在终于将信息传递给了我。根据您的信息,我遗憾地获知,千佛洞的壁画在俄国人占据期间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幸好,洞窟的数量很大,我相信那些俄国难民们只占据一些位置最便利的洞窟就会感到满意了,因为他们一般来说都喜欢交际。

对于您告诉我的有关华尔纳先生及其夫人的情况,我非常非常地感兴趣。请代我向他转达说,他以褒奖的口吻谈及我从前在敦煌那片地区做过的二作,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不知是否有任何出版物描述华尔纳先生的旅行和考察工作,如果能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我本人将感到非常高兴。此时此刻,我还想不起来有什么与敦煌相关联的特别事情需要麻烦华尔纳先生去帮我打听。但同时我还要对他的慷慨允诺表示由衷的感谢。我的老朋友王道士竟还能愉快地回忆起我来,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假如华尔纳先生能返回敦煌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将我的问候转达给那位老人家。^①

读这两封信时让人觉得可笑的是,王道士竟也被视做斯坦因的朋友而成为谈论的对象。按照斯坦因的要求,凯乐随后将华尔纳在《世界作品》杂志上发表的连载游记《在土匪猖獗的中国西部寻找

^① 1925年1月13日斯坦因致凯乐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最早的艺术珍宝》寄给了斯坦因。

当翟荫率领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离开北京后，华尔纳继续留在北京与北京大学等校谈判，并不断通过电报方式将谈判进展情况向哈佛大学汇报。与此同时他还受凯乐委托在北京代购文物。1925年3月5日，华尔纳从北京的汇丰银行支行给凯乐写信汇报有关文物购买情况，该信写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专用信笺上，鉴于这封信可以反映华尔纳此次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些情况，以及他是如何购买中国文物的，兹将其主要段落译引如下：

我正在给我的妻子拍无线电电报，让她设法劝您给我寄来一千美金，要通过汇丰银行的纽约支行寄来。我不得不通过这种方法得到钱，否则的话我的计划就会失败。我为了您的事情过度花费钱财，今天终于囊中告罄。经过大约十天的讨价还价后，我今天支付了1000墨西哥银圆，用以购买四块故宫“地毯”，这种类型的地毯已经多年没有在这座城市里露面了。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能为您购得什么东西呢。我也不知道您家房屋的大小，以及您家中的摆设情况，这使我感到很棘手。我以前给您写信时提到过一些小铜器之类的东西，但是它们不太适于做装饰品，我相信您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就是它们。因此，我要将它们全部带回去，将这些织锦地毯和丝绒地毯给您奉上，看上去这些东西是在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从故宫流落出来的。我曾经见到过一些类似的物品，它们在小皇帝退位后不久被运往伦敦，在那里出售后得到的英镑要比它们的墨西哥银圆成本价高出许多。因此我就打消了疑虑，因为我知道，假如您和您的家人不喜欢它们的话，您可以卖了它们。

其中一件丝绒地毯据说曾经铺在皇帝宝座前面的走道

上,还有一件大的黄色织锦地毯据说曾被用来覆盖御座大殿里的普通地毯。虽然我从来也不相信古董商们编出来的故事,但是这次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人们从满清旧官那里打听到的有关皇宫规矩和摆设的情况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不认为它们的年代非常古老,按照有一百年历史的物品需要报海关的条款规定,它们也许勉强够得上这个条件。另一方面,这类物品有时保存得非常完好,就是用过好几个世纪后,也看不出它们的真实年代。无论是从风格上看,还是从制作工艺上看,它们大概都属于18世纪初,甚至属于17世纪末。假如有任何人告诉您说,他可以断定它们的年代晚于我刚才说过的年代,那他肯定是在撒大谎。今天再也造不出来这种地毯了,残剩下来的几块不时地在北京的市场上出现,价钱上扬了好几倍。据人们所知,这批地毯是很多年来第一次露面的,他们当然都告诉我说,再没有这种地毯了。我能向您做出的保证只是它们出自故宫,大概是南方某省的总督进献的礼物。我不想在这里描述它们,我只是想说,我认为它们能使人目瞪口呆,因为它们的色彩纯正无比,远远超过中世纪威尼斯地毯。我搞到了现有的所有地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价钱从1800银圆降到1000银圆。总共花了十天的时间,我这方面一直保持沉默,装做漠不关心的样子,这才得到这个价钱。您明天就能以一千美金的价钱将那件大的黄色地毯卖给一家纽约的古董商。

我还不了解一千墨西哥银圆到底相当于多少美金,但是我大概估算1美金等于1.75墨西哥银圆。我请您汇来足足一千美金,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您可以通过我的汇丰银行纽约支行用无线电报的方式电汇钱来,其成本只是相当于给北京拍一份密码电报的价钱。

我高兴地收到了您的信,里面尽是些有关政治、斗争、体

育等方面的闲言碎语。在春季大战开始之前，各路将军的代理人们在这里尔虞我诈，以图谋利益；他们全力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上演着一幕幕稀奇古怪的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这里正在进行些什么事情，除此之外，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小皇帝带着他的皇后以及头号妃子，一直住在和我的住处隔一条马路的日本驻华公使馆里，住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上一个星期，小皇帝突然跳上一列开往天津的火车，在天津的一家日本旅馆里安营扎寨。北京收到了这个消息，但是没有感到不安。

小皇帝现在正在设法逃往日本，日本人现在正在试图决定如何接待小皇帝。与此同时，前一届大总统成了囚徒，被关押在紫禁城里，没有人能查明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病很重，家财荡然无存，八个月前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呢。

现任临时大总统成天在大街上冲来冲去，大街的两边都站着士兵，禁止一般老百姓入内。上一个星期，班禅喇嘛到达这里，被急匆匆地迎进一辆裹着黄色长毛绒的汽车里，冲进故宫去访问。现在，人们在北京的大街上可以看到摇摇摆摆地走着一群群西藏喇嘛和蒙古喇嘛，他们穿着油腻腻的黄色锦缎，吃着苹果和炸团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几座外国建筑物和大官们乘坐的小汽车。他们全身长满了虱子，就好像他们在自己的老家一样；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手巾。

我的那帮人已经朝西去了，我没有跟着去，而是在北京闲逛着。我正等待一份海底电缆电报，收到电报后我就可以脱身，可以去加入我的考察队了。他们得迂回绕道，以免碰到正在进行着的战斗。我现在正在设法警告他们，想让他们小心一点，在前面道路上有撤退下来的军队，遇到这些人麻烦更多，但是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我希望他们能在接触到那些匪

徒前有机会在途中找个地洞躲起来。

有人邀请我在夏季去鄂尔多斯中部,和一位蒙古王公一起度夏。假如能有机会去,我真希望利用大部分时间研究那些蒙古人的生活和民俗。当然,这是无法办到的。

几天后我就会知道我的命运,就能骑着马西行,去参加我的考察队了。有可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惟一事情就是陕西、甘肃边界上发生的恶战。据我猜测,战争还没有打起来。我听说,吵闹将在那片地区以东开始,很快就会决出胜负。基督徒将军冯玉祥占据了此地西北部的铁路线,并以铁腕牢牢地控制着铁路。但是,他还没有将铁路线尽头以外的匪徒降服。那些匪徒已被迫进入蒙古地区,正在劫掠横穿鄂尔多斯高原的商队,这些商队运送羊毛和兽皮前往铁路线。昨天晚上,我和罗伊·安助斯聊天,他告诉我说,他相信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之后,他已经将他的辎重安全地运到高原上了;一个星期以后,他的辎重就会脱离危险地带。这意味着今年秋天报纸上将会报道更多的恐龙蛋。

我将试图通过当地的山中商会(Yamanaka)把您的东西寄回美国。如果我能成功,当您的东西寄到后,您将会从他们设在波伊斯顿大街(Boylston Street)上的分店听到消息。^①

凯乐收到华尔纳的这封信后,于1925年4月2日从波士顿给在伦敦的斯坦因写信,通报华尔纳的情况,并将华尔纳的前印信函抄件寄给斯坦因。凯乐致斯坦因信的有关段落如下:

我现在随信给您寄去一份华尔纳先生最近来信的抄件。信中所言并没有什么价值,但也许很有趣,还能逗人笑。当我

① 1925年3月5日华尔纳致凯乐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看到他已经买下我想要得到的那些出自故宫的珍宝时,我当然激动得浑身发抖。我坦率地承认,不久前我得到了一件古代画幡,还有其他一些珍宝;您曾经描写过那些珍宝,文笔引人入胜;我也曾经在大英博物院的斯坦因搜集品部看到过那些珍宝,我一见到它们就差一点去当窃贼,想偷走它们。

.....

我已经给您寄去了华尔纳在《世界作品》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另一部分。我相信这一部分会让您感到高兴的。我越来越希望你们两个人能找个机会见一下面。我敢肯定您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能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家伙,体格高大健壮,长着红头发,充满着幽默感和生活之乐,真能刺激人。

.....

别忘了,假如我能为您提供任何帮助的话,我的确会感到非常高兴的,不论在任何时间,或者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内的任何地方。有时我会想到一个能让您高兴的主意:在美国您也能同样得到您已经在旅行中习惯了的阳光。^①

凯乐将华尔纳 1925 年 3 月 5 日信的抄件寄给斯坦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说明华尔纳在文物搜集方面的本事,希望斯坦因和华尔纳能够合作。他在信中提到的有关得到敦煌画幡的事情应该能引起敦煌学家的兴趣。斯坦因在收到凯乐信后于 1925 年 5 月 30 日给凯乐复信如下:

您接连给我寄来几期连载华尔纳先生美妙游记的《世界作品》杂志,我对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他描述的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以及其他名胜,我都怀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

^① 1925 年 4 月 2 日凯乐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您很容易理解。华尔纳先生的文笔非常优美,他在观察和描写事物时显然怀有极大的热忱。如果今后我能有机会见到华尔纳先生和华尔纳夫人,那才让我高兴呢。

我希望他得到的出自故宫的东西已经安全地寄到您那里,并且给您带去了您已经期待了很久的巨大欢乐。^①

这几次通信使我们可以看出,从1924年开始,凯乐和华尔纳等美国人就已经主动接近并拉拢斯坦因,这一动向的发展结果就是后文要提到的斯坦因代表哈佛大学进行的第四次中亚考察。

十三

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以及陈万里、王近仁等人于1925年2月16日离开北京,随身带有剥离壁画用的化学药品和布匹。他们经石家庄、太原,于3月12日到达西安。陈万里在到达西安的当日,便“得由西北大学转来教育部虞(7日)电命余赴‘甘肃调查历史博物事宜’,兼士先生来信,亦附甘肃陆兼省长欢迎赴甘调查敦煌古迹来电”^②,可见陈万里一行在出发时还没有拿到有关的考察执照。3月17日,考察队雇十四辆大车继续西行,3月22日到达甘肃省泾川县,并在泾川进行了第一次考古活动。

1925年3月23日,考察队首先考察了华尔纳和翟荫在1923年首次考察过的回中山王母宫石窟(象洞),溥爱伦想从象洞拿走一件佛像,得到陈万里的帮助,陈万里在同日日记里记录道:

总之此洞结构,颇似云冈中央第二窟,规模虽远逊,固北

① 1925年5月30日斯坦因致凯乐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3月12日条,第23页。

魏之作品也。大佛前有一高约一尺二寸见方之石柱，四面造像并飞天等雕刻极精。溥爱伦君爱之，就余商，拟向县署索之以畀北京华语学校或吾校，余深感其诚，遂同赴县署访知事郎君，晤焉。结果，郎君即飭王警佐去取，暂先保存署中，以待省命。^①

同日下午，陈万里、翟荫、溥爱伦、石天生、王近仁五人外出考察罗汉洞石窟和南石窟寺，3月24日他们在南石窟寺进行了考察发掘。陈万里1925年3月24日日记中记录道：

午前九时，同出东门，渡泾川至南石窟寺。余与溥爱伦君在西窟，翟荫诸君在东窟。西窟之大，仅有东窟六分之一。东西壁造像下层各八，上层各四，高约一尺二寸，北壁大像三，窟外两侧有等身高之力士像各一。余先就窟内各壁原状，摄取十数片；然后溥爱伦君开始剥离东侧诸像，外廓去后，当时雕刻真相毕露。及至上层，往往于揭去外层泥土之后，发见重要图案装饰雕刻；余亦助之工作。东西壁各像，剥离工作既竣，溥爱伦君复举巨斧斫大像泥胎，惜所剥离者头部悉缺损，溥爱伦君谓系回乱时所毁，似亦近理。剥离后，余又一一为之摄影，藉资比较。东窟则汤姆生君绘画，时达君摄影，翟荫君记录，石天生君测量。^②

从行文上看，溥爱伦剥离的是南石窟寺西窟石雕像的外层泥胎，并“举巨斧斫大像泥胎”。陈万里显然认为这种做法不算出格，所以也提供了帮助。而在东窟工作的翟荫等人反倒比较规矩。但是考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3月23日条，第34~35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3月24日条，第37页。

察队在石窟内工作的消息很快就被附近村民所知,结果引来民众的围攻。陈万里 1925 年 3 月 24 日日记录道:

余正在凝视出神之际,忽有乡民二十余,蜂拥而至,群起诘问。余等遂未便再事工作,拟即收拾一切登车还城。乡民则强拉骡马不令走,余婉曲言之。许久,势稍缓和。复来十余人咆哮更甚,其中之一诘责翟荫君毁坏佛像之罪。翟荫君不谙华语,未能答,彼即牵其袖曰,同到庙里去,非俟佛像修复不能任汝行。十余人和之,亦有数人谓非先搜掠外人,解除凶器不可。余目睹此状,颇为忧惧,以为群众行动,最易逸出范围,设有不幸,孰任其咎。遂极力为之疏解,顾反复譬喻,终无结果。南石窟寺为附近六村所管,村民鸣锣传知,势非俟六村村众来齐,不能解决。余亦只得唯唯听之,乘间向各个人间剖切譬解。其有年老者,复劝其作和平主张,公推代表一同进城,商量修复云云。颇有数人力赞余说,愿为尽力者,余心稍慰。未几,村众集者愈多,声势汹汹者亦不少。若辈即就地开会,拒绝旁听;久之,始有结果,居然能推出数人,随同进城,商量重修办法。自此余等始解围,计被困于泾川之北者,约二小时,余亦唇敝唇焦矣。比到旅店,时已昏夜,余以此事宜先求和平方法,如彼此所谈不能谐,始偕赴县署,求最后解决;否则似可无须重烦官厅。此种办法,自信对于村众,亦已顾到。翟荫君深以余说为然,即邀集乡民代表于东屋,磋商重修款项数目。最终决定,给予六十六元之重修费(十八小佛像每像两元,大像系三十元),乡民代表认可,当即交付了结而去。此事,余始终居间调停,虽不敢自居有功,然能如此和平解决,实属万幸。乡民去后,始用晚饭。未毕,郎公来访,欢谈片时而去。未几,郎公又遣王警佐来告,乡民代表受人恫吓,重修费不敢收受,特赴县署报告此事,郎公以事实不明,特嘱王君来

询,以祛双方误会云。余即以日间所经过者,为之详述一遍。复告以所以不愿重烦官厅之故,王君乃去。^①

时过近六十年后,作家赵燕翼还曾调查过这一事件,他在《南石窟寺杂记》一文中说:

这一段发生于六十余年前的往事,有些年长的泾川人记忆犹新。1982年春,我到南石窟寺考察文物时,曾向居住在近村的蒋思聪等几位老人探询得悉事件经过详情。当时洞窟原无专人看守,洋人乘三辆席篷马车前来,未经任何人允许,径自钻入佛窟,用刀斧剥离后期加塑于石造像外廓的泥胎。为山坡上放牧的羊倌发现,遂鸣锣为号,将上下蒋家、王家沟、何家坪、凤凰庄、纸坊沟等六村村民召来。一时群情激愤,怒斥洋人毁坏佛像之罪,吓得杰尼先生冷汗直冒。最后,由“通事”出面赔情道歉,请派群众代表同到县城,赔偿大洋六十六元,为佛重塑金身,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群众所称的“通事”,乃北大学者陈万里先生。当时他随美国人去敦煌进行考察,不料远征队刚踏入甘肃地界,就碰了一鼻子灰。两年后,陈先生出版了一本《西行日记》,关于泾川历险情节,书中有所记叙。^②

这是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西行途中遇到的第一场风波,群众抵制考察队的活动显然是自发而起,陈万里此时是剥离雕像的当事人之一,当时没有鼓动群众的迹象。恫吓乡民代表使其不敢收受重修费的人到底是谁,不得而知,而泾川县县长郎某事后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3月24日条,第38~39页。

② 赵燕翼《南石窟寺杂记》,载《陇史掇遗》,第124~126页。

知情,对此事也不了了之。然精美石雕泥胎已被剥离,大像泥胎已被斫毁,支付区区六十六元,如何得以修复?需要一提的是,陈万里在南石窟寺还伙同翟荫等人擅自拿走石碑一块,他在1925年3月24日日记里记录了此事的经过:

当余昨日之到东窟也,于北侧台座下见有长方形之石一,横覆于地。翻阅之,雕刻极精,惟上方造像稍有缺损耳。归寓思之,断为《南石窟寺碑》头之一部。乡人不知爱惜,固无足怪,何以官厅当时能移碑石于文庙者,独不能并移此碑头耶?思之重思之,当时移置之动机,确非由于保存古物,殆无疑义矣(据闻乡民因寺基涉讼所致)。因此决定拟将此残石带还北京,实诸吾校考古学室。盖不如是,残石之命运,非至破碎而不止,即不然,据以告知事,知事亦不过伤警移存县署而已。此后残石之命运如何,岂吾等所能知耶?今早到石窟寺,即以此残石示翟荫君,不知溥爱伦君固已于昨日见告矣。复以携归吾校之说告之,翟荫君极力赞成焉。余遂以毛毡覆之,迨剥离事竣,休息露餐,翟荫君已为我装入布袋,安置一侧,余即裹以毛毡防损坏也。纠纷事起,在东窟中已有村民十余,监督吾等行动。此残石其留之耶?抑携之耶?此时诚踌躇矣。留之,固已包裹完好,当然不能于环伺者之前,解囊舍去;携之,设为村民阻拦,坚欲启视者,则纠纷将益甚。余于此时,卒毅然命车夫肩之实余车,而此十余监督之村民,竟未一加干涉也。亦幸矣哉!从此,约重四五十斤之残石,将日夕伴我西行,或至兰州而止。俟余敦煌回省后,复携之东归。能否安然到校,尚未可知!顾此一段因缘,不能不详记之也。^①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3月24日条,第40页。

陈万里此时的心情,或者说他要将文物拿走的理由,应该说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人当年拿走敦煌文物时的心思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外国人将中国西北文物拿往外国和北京人将西北文物带往北京毕竟还是有本质不同的。赵燕翼在《南石窟寺杂记》一文中说:

刻有永平纪年的石窟寺碑,现存泾川县博物馆。据该馆老职工王绍周说,此碑原在石窟,因碑文书法精妙,为某天主堂瑞典修女所觊觎,阴谋盗往国外未遂,始被当时泾川县县知事廖元信移入文庙保管云。……可惜移碑人无知,将雕有美丽装饰花纹的碑头,弃置洞窟角落多年不顾,却被陈万里先生顺手牵羊,用毡子包裹塞到席篷车上,安然携往北京大学,藏于国学门考古学会,不知今日下落如何?如原物尚在,理应完璧归赵。^①

近代运藏北京的西北文物是否应该还归西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涉及到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此不论。陈万里经过在泾川事件后,吸取了一定的经验,他在1925年3月24日日记中总结该事件时说:

西窟剥离佛像外廓之事,溥爱伦君主之,自是正当研究方法,余深然之,且为之助。但在内地旅行,为求安全起见,不能不有相当之顾虑。余以初次作西北之行,毫无经验,致事前未能见到及此,遂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实,重累友邦人士以数小时之恐怖,至为遗憾。惟最后获得一绝大之教训者,以为主张是一事,错用手段则纠纷可立见,此种情形,后日大可引以为

^① 赵燕翼《南石窟寺杂记》,载《陇史掇遗》,第124~126页。

戒。^①

同时,陈万里也看清了美国人的真实目的,等到达兰州以后,就更加严密注意外国人的举动。从兰州开始,陈万里所到之处首先与地方官府联络,最终阻止了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大规模文物破坏活动。

十四

陈万里随考察队于1925年3月25日离开泾川,4月5日到达兰州。当日因植树节放假,陈万里未能拜访甘肃督军陆洪涛等官员。4月6日,陈万里先拜访甘肃省教育厅长谢次洲,然后与翟荫、王近仁一起访问陆洪涛,陆借口有病命谢次洲代见。据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编《内政年鉴》记载:

民国十四年(1925年),甘肃陆洪涛以北大特派员内有美国技师数人,赴甘肃调查古迹,日前据密探报告,美国技师欲攫取敦煌画壁,电请内务部迅予转令北大校长,婉飭该技师等,不得逾越调查范围,或竟予撤回,以免误会。经函准教育部转飭遵照。^②

这条资料没有具体日期,但应该是陈万里和美国考察队员到达兰州之后的事情。4月13日,考察队离开兰州,经凉州、甘州,于5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3月24日条,第39页。

②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内政年鉴》(四),礼俗篇,第十章:“名胜古迹古物之保管”,第一节:“中央”,第二目:“保管之实施”,十三:“处理外人采运古物”,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4月,第(F)163页。

月1日到达肃州(酒泉)。陈万里在到达肃州的当日,即先后单独拜见了酒泉县知县陈某、安肃道尹祁瑞亭等,报告考察队拟剥离壁画的计划,请求派员赴敦煌早作准备。5月2日,陈万里又拜访掌管酒泉、嘉峪关、玉门、安西、敦煌各地军事大权的肃州镇守使吴静山,“相谈约三十分钟,悉镇道两署已曾派专员驰赴敦煌矣”^①。当日,翟荫等也拜见了吴静山,提出剥离敦煌壁画的要求,遭到吴静山的拒绝,陈万里1925年5月2日日记记录道:

十二时,翟荫君与近仁自外归,翟荫君告我已单独去见吴镇守使,商量剥离敦煌画壁一事,未获许可云。^②

既然剥离敦煌壁画的要求遭到拒绝,翟荫等自知计划难施,于是打消了剥离敦煌壁画的念头,将所带剥离壁画用物品留下,于5月8日率队离开肃州,前往敦煌,“下午五时西发,计雇敦煌大车八辆。翟荫君等以北京带来之洋布一捆,木箱五件,寄存肃州,始省去数辆”^③。曾为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效力的木匠老周在肃州加入第二次考察队。考察队离开肃州后,经嘉峪关、玉门、布隆吉,于5月15日至安西,出嘉峪关后沿途一路有军警“保护”考察队。到达安西的当日晚,陈万里与安西县县长陈芷皋见面,次日拜见周炳南等,商量对付美国人的办法。周炳南字静山,1913年随安肃道尹周务学驻军酒泉,1919年以肃州巡防第三营营长职率部驻扎敦煌,曾力主将俄人从敦煌千佛洞迁出,并在千佛洞各洞窟逐个检查编号,被后人誉为“我国官员中对敦煌文物的最早保护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2日条,第76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2日条,第76页。

③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8日条,第79页。

者”^①，因此他的介入将极大地妨碍美国人在敦煌、安西一带的考察活动。5月18日，考察队走到疙瘩井，在这里与周炳南会晤，陈万里1925年5月18日日记记录道：

到店正上午七时，静山统领早到已三小时矣。九时统领来，与翟荫君谈约一小时始去。翟荫君拟到敦煌后偕近仁折回肃州止华尔纳君西来，以华尔纳君前岁剥离千佛洞画壁后，人民颇有反感，此来恐多周折也。^②

看来周炳南来与翟荫会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华尔纳西来敦煌，他将事态的严重性告诉了翟荫，翟荫遂决定尽快折回肃州阻挡华尔纳。当日，考察队到达敦煌县城，并于次日就拍摄敦煌千佛洞壁画一事与敦煌县县长杨某等地方政府官员商量，结果是他们的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陈万里1925年5月19日日记记录道：

九时往访杨知事，……谈未久，静山将军亦去，续谈约半小时辞出回店。十一时同翟荫、溥爱伦、王近仁三君复至县署谈摄影事，毫无结果，约今日下午二时在署集各方代表商议……

下午十二时偕同行诸人赴县署集议。在座者有周统领，肃州镇道两署所派专员张参谋长、牛科长、杨知事及敦煌县商会、教育会会长并各界代表约七八人。会议时先由翟荫君说明此来本拟剥离一部分画壁，运赴北京陈列，以便中外人士得就近研究，曾以此意商之陆省长，未蒙许可，嗣后即壹意摄影，希望能得各界谅解，予以充分时间云云。杨知事、牛科长、周

① 师侃《最早保护敦煌文物的官员》，载《陇史掇遗》，第127～128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18日条，第88页。

统领及教育会会长相继发言,均以前年华尔纳运去千佛洞画壁二十余方及佛像数尊后,地方人民群向知事诘问,今年庙会时,复有人向千佛洞王道士诘责,因此此番游历,为期势难太长。且在千佛洞居住,有种种为难情形,即军警保护,亦恐有不周之处。说之至再,仅允游历日期,不得逾两星期,千佛洞碍难居住,只能当日往返。余亦发言约二十分间,同行诸人以无可磋商,一一承诺辞出回店。决定明日休息一日,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日往千佛洞游览摄影,二十四日即启程还安西,翟荫君则往肃州候华尔纳君止其西来,余等在安西待翟荫君回城,即同往踏实万佛峡诸处游览数日,即可进关回京。盖翟荫诸君以为敦煌官民所允许之两星期,且须当日往返,摄影成绩,能得几何,故不如缩短日程以期迅速离此,较为直接痛快。……四时遂同翟荫、王近仁二君去访周统领,翟即告以此意后,略谈片时辞出。^①

1925年5月21日至5月23日,陈万里与翟荫、汤姆生等按照敦煌县署的规定游览千佛洞,当日往返,仅游三日。他们按照伯希和所编号码,并参照周炳南所编号码,参观洞窟。陈万里1925年5月21日日记中说:

一四五(331)、一四四(329)、一四一(326)、一三九(320)号诸洞画壁均有缺损处,导者指以相告曰,此即华尔纳君前年所剥离窃去者也。……三时翟荫君以途中沟渠颇多,车行不便,主张随即登车回城。^②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19日条,第88~89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21日条,第93页。文中窟号后面所加的(331)、(329)、(326)、(320)为引者标出的现敦煌研究院编号。

可见此时翟荫早已对敦煌考察失去信心，回返心切。陈万里在1925年5月22日日记中还记录道：

于一二〇号 n 洞发见大魏大统四年及五年画像题铭，翟荫君告我在京时所计划剥离者即系此洞云。^①

由于时间紧张，陈万里、翟荫等连王道士都没有找到。根据1925年5月26日陈万里在安西补记的敦煌记事中说：

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时，闻余等至，即趋避他往。询之庙祝，亦谓精神尚好，则前日之传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厅之惩办欤？^②

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信中也提到：

只能找到一丝真实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点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翟荫去敦煌的时候，随身带着我过去的翻译员，这位翻译员在前一次随我访问敦煌时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22日条，第93页。该书1926年版将“一二〇号 n 洞”误印为“一二号 n 洞”，按具有大统四年、大统五年题记的西魏洞窟为伯编120 n 号窟（敦煌研究院编285号窟）。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26日条，第96页。

对王道士极为友好。但是此时王道士竟然不认他,躲得远远的!①

1925年5月24日,翟荫迫不及待地先行离开敦煌,赶往肃州阻止华尔纳西来;其余人也随后离开敦煌,经疙瘩井、甜水井、瓜州口,于5月26日到安西县境内,在这里等待华尔纳的到来,然后准备考察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考察过的万佛峡石窟(榆林窟)。

十五

华尔纳逗留北京的目的是等待美国方面(哈佛大学和霍尔基金会)就他提出的中、美合作办院方案给予答复,但是由于该方案引起了各种复杂的纠纷,始终无法拍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全中国出现了一次民族主义反帝排外运动,北京大学表示不愿意与美国合作,就连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也反对接受美国资金。②在这种情况下,哈佛大学决定暂缓与北京有关院校谈判合作事,电令华尔纳重返考察队,于是华尔纳在1925年3月底离开北京西行。在离开北京之前,华尔纳还发展了一个名叫艾兰·柯乐克(Allan Clark)的美国青年画家加入考察队,柯乐克的任务是在敦煌临摹难以摄影的大型净土变壁画,并且分析构图。华尔纳和柯乐克离开北京后,想尽办法追赶考察队,譬如租汽车、购马匹等等。当他们于1925年5月15日到达甘州时,收到翟荫从安西拍来的一份电报,电报上说“甚至连照相或访问石窟都难以获

① 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②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26.

准,除非做出不移走任何东西的保证”^①,使华尔纳感到他的考察计划正面临着破产。几天后,华尔纳到达肃州,为获准考察特去拜访了他在第一次考察期间结识的肃州镇守使吴静山,华尔纳在给贝尔的信中这样叙述他对吴静山的拜访:

他和蔼可亲,一如既往,但在批准我们进行敦煌摄影和研究时显得有点严肃,而且还说,我们不得拿走任何东西。我判断这种状况已成定局,如果我们胆敢试图剥离敦煌壁画的话,那么天法的绞索便会套在我们欲望的脖颈上。^②

1925年5月28日左右,当华尔纳和柯乐克到达玉门后,与前来迎接的翟荫相会。华尔纳在致妻子信中叙述道:

翟荫从敦煌远道赶来,目的是和我会面并且商量事情。考察队在石窟活动时一直处于严密的监管之下,每天晚上都被迫花上四个小时返回城里,每次回来时都有一群愤怒的人围在客栈门外。他们不让我们的队员住在石窟附近,也不让我们的队员使用闪光灯。尽管如此,考察队还是通过壁画题记准确无误地确定了一些石窟的年代,还拍摄了一些照片。肃州镇守使的许诺还不如废纸管用。考察队现在正在安西等着我们,安西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我们将从安西前往万佛峡考察,万佛峡是一处较小的石窟群。即便是在万佛峡,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指望能移走任何东西,甚至连是否能获准照相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27.

^② 1925年5月中旬华尔纳致贝尔信,转引自: Theodor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27.

也没有把握。这便是事情的简单经过,当然还有一些需要慢慢讲的细节,这些情况都表明事态是何等糟糕。好像翟荫他们还被告知:如果我也和他们在一起的话,那么他们甚至连参观石窟都不可能。尽管我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但是现实仍然如此。……翟荫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每个人都好,底片大概全没有问题。……前途暗淡哪,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在军警的监督下做一切事情,军警们只需催促我们就会使我们厌恶地离开该省。要等待好多年之后,外国人才能在甘肃进行科学工作。我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思索,想想去年我到底做过什么不检点的事情。但是,不管是我,还是翟荫,或者王近仁,我们想呀想,总觉得我们并没有树敌,也没有做任何错事。王道士这个人贪婪好财,在安特生(瑞典考古学家)和我出现时达到了极点,还有从未再返回敦煌的斯坦因和佐希和所搅起的余波。从现在起,也许再过十年以后,当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北京政府的时候,我们才能做点什么事情,但也只能是经过中国人仔细准备之后,在敦煌人民当中进行了更多的有利于我们的宣传之后。我忘记说了,翟荫曾经通过陈万里博士给北京大学拍过一份电报,告诉我们所遇到的麻烦,谁知道北京大学竟然撇下所有的事情不管了,他们洗手不干了。北京大学曾答应和我们合作,并且让人们以为我们是由他们派遣的。他们给翟荫的复电简直是一篇无耻推诿的杰作。等我回到北京后,我要给蒋梦麟校长留下一句话。我将邀请蒋梦麟校长共进餐,然后在我自己的餐桌上给他说这句话。幸好蒋梦麟校长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英语学者,他将能够领会我说的这句话的要旨。^①

^① 1925年5月29日华尔纳致妻子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28~129.

这封信说明此时的华尔纳已经是气急败坏了。华尔纳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他在敦煌没有做过任何错事,表明他根本没有因为剥离敦煌壁画和从中国拿走文物之事受到过任何良心上的谴责。他最后把考察队遇阻的怒气撒在蒋梦麟头上,也说明他对中国的形势并不理解。

在华尔纳和翟荫到达安西之前,溥爱伦、汤姆生等于1925年5月28日请周炳南和安西县长陈芷皋等吃了一顿饭,想缓和一下感情。6月1日下午,翟荫陪着华尔纳和柯乐克赶到安西,然后立即就考察事与官府商谈。但是就在此前的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排外运动,敦煌、安西一带虽地处偏僻,也很快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为华尔纳等人的考察罩了一层阴影。北京大学电令陈万里与美国考察队决裂,迅速东返;在北京的美国人士也给华尔纳等人拍来急电,督促考察队赶紧空手回返,不要危及将来的研究工作,“不要让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大学处于窘境”^①,但华尔纳还是想对万佛峡石窟拍摄一些照片。陈万里在1925年6月1日日记中记录道:

十时往访静山统领,后复赴县署晤陈县长及张、牛二公。回店,得凤鸣促归电信,即赴电局复之。下午翟荫君偕华尔纳及柯乐克二君自玉门来。晚芷皋县长见访,华尔纳、翟荫二君与谈往万佛峡事,不得端倪,约明日再商。^②

但第二天的商谈结果也不令美国人满意,陈万里的1925年6月2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29.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6月1日条,第98页。

日日记中记录道：

两次同华尔纳、翟荫二君去访周统领，均以公出未晤。下午一时陈县长来请，商榷往万佛峡事，遂与华尔纳、翟荫、王近仁三君同去。列席者有周统领，张、岑二公并商会会长等五六人。最先华尔纳、翟荫二君要求在万佛峡勾留一月，地方代表仅允三日，后静山统领折衷为一星期，最后复决定为先去一星期，如一星期后认为尚有摄影工作应须继续者，再行磋商。讨论约一小时之久，余亦发言多次；议定后，余等先出回店。^①

大势至此，华尔纳等人也只得同意。6月4日，安西县县长陈芷皋、陈万里和华尔纳、翟荫等考察队成员到达万佛峡以东的蘑菇台子，住在该地的一处道院中，准备以此为基地考察万佛峡。

就在华尔纳一行开始考察万佛峡的时候，陈万里于6月5日向华尔纳提出提前返回北京的要求，陈万里1925年6月5日日记记录：

早起即同往万佛峡……。芷皋县长亦亲自编定号数，跋涉极劳。六时回道院，晚饭后，与翟荫、溥爱伦、王近仁三君谈先回北京事，华尔纳君则坚留一日，以乡民对于外人，颇有烦言，而县长明日又急须回城故也。予遂决计后日启程，先回安西，至多勾留一晚，即就道进关，兼程回京。^②

陈万里突然提出提前返回北京的理由是祖母病危，但真实原因是北京大学命令他提前返回，他于5月30日在安西得家人促归电报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6月2日条，第98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6月5日条，第101页。

以及家信、6月1日又得友人促归电报,与此不无关系。6月6日,陈万里胃病复发,6月7日抱病离开蘑菇台子,回到安西县城。养病两日后于6月9日离开安西,经肃州、甘州、凉州,于6月28日到达兰州。6月30日“十二时即同董君(同学董季高)至督军署政务厅,见陆督,谢厅长亦在座。谈敦煌千佛洞事,约半小时,辞出回寓”^①,实际上是向甘肃督军陆洪涛汇报情况。7月2日离开兰州,经平凉、泾州、西安、陕州(三门峡)、洛阳、郑州,于7月31日回到北京。

陈万里回到北京后,将他在考察途中所记日记加以整理,编定《西行日记》一册,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于1926年7月由北京朴社出版。该书由胡适题签,由沈兼士、马衡、顾颉刚作序。该书有五个比较重要的附录:(1)《敦煌千佛洞三日所得之印象》;(2)《泾川石刻校释及考证》;(3)《万里校碑录》;(4)《官厅调查表》(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安西东千佛洞);(5)《旅程表》。本书的附录二即《西行日记》的主体部分。

十六

陈万里走后,华尔纳、翟荫等仍在万佛峡考察了几天,主要成果是拍摄了一批照片。在万佛峡考察期间,华尔纳等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抗议和阻挠,遇到了“愤怒的村民以及为他们撑腰的县长”制造的许多麻烦。华尔纳当时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讲述了其中的一件事:

今天晚上我经历了一场风波,起因是领头制造麻烦的人强制性地向我的中亚车夫罚款200元钱,说是车夫的马吃了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6月30日条,第115页。

一点青麦。我看到地里充满着牛蹄印和马蹄印,这些损失加起来至多不超过一元钱。同时,车夫因惧怕挨打的恐吓,已逃之夭夭,他的一匹马被扣留。我清楚地告诉他们,罚打车夫将由我来进行,而马匹则必须还给另一车夫照管。明天,他们还会竭尽全力地玩耍其他更多的鬼把戏。这些该死的人,当整个事情在这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在想我从未在任何书上读到过竟有这类始终邪恶和狡诈的刁民。中间还有一段插曲。那领头的将马拉到庙的台阶上拴了起来,我出去让王近仁解释说,马是我的,不能被强行拉去。然后我去解开马的缰绳,但这老家伙竟跳将起来,跑到马缰这里试图动武。我当然不能打他,因此我只推开了他的手,将他弄了个屁股蹲;我告诉他说,让他客气点。他眼看就要气急败坏了,而我仍然像阿拉伯人一样彬彬有礼。接着,我们走着去查看损失的情况,结果发现只有一棵小杨树被马啃过,这使他大大地丢了脸。现在,大约有30个人站在院子中间互相尖叫着,我又出去想让他们平息下来。麻烦的是,王近仁不去翻译我的话,而是开始他自己的长篇演说。局面暂时平息下去了,但他们正在想着明天新的恶作剧。^①

十二年后,华尔纳在《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的“绪论”中回忆道:

当地政府只允许我们在蘑菇台子的庙宇中居住7天,而蘑菇台子又距离我们要来看的石窟有两英里远。显然,要想对细节做一次详尽无遗的研究,那我们拥有的时间太短缺了。

^① 1925年6月上旬华尔纳致妻子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29~130.

因为有十几个村民的出现,使情况变得极为棘手。这些村民丢下了自己的日常活计,跑了大约 15 英里的路,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并千方百计地想引诱我们闹事,这样便可以找到理由向我们进攻,或者用武力将我们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面对着唠唠叨叨找茬责骂,面对着背信弃义,甚至公开的敌对,为了避免肉体遭受暴力,我们也只得坚持不懈地保持彬彬有礼的姿态。

除了我的朋友、我前一次在中国内陆旅行时的旅伴霍拉斯·霍荫之外,这次我的美国旅伴艾兰·柯乐克、溥爱伦、时达、石天生和汤姆生都对这个国家不熟悉。他们原来雄心勃勃地想花 8 个月的时间对敦煌壁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希望解决许许多多有关中国绘画史、中国文化概况、佛教造像学和当地历史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而感到深深地懊悔。作为不拿薪水的志愿人员,他们强烈地感到,我们对不起哈佛学院及其好不容易才乞求来的美元,对不起曾慷慨捐钱的朋友们,对不起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们,馆长们听信了我说的我们的计划不仅值得而且可行的那套话。尽管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因为当地人制造麻烦而发怒、发狂,但他们还是团结在一起,用摸不透的圆滑外表和有教养的幽默感来对付未来的敌人。一个小小的失误,甚至一张生气的面孔,都可能会招致整个蜂群在我们耳边嗡嗡作鸣,甚至很有可能让我们丢了性命。人们对他们的表现是称赞不够的,他们的行为使得考察队能够带着底片、笔记以及我们自己完整的身躯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们保证说,我们不会从现场移走任何他们的宝贝,我们以牺牲知识为代价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遵守这一诺言,但当地政府拒绝相信我们的话,这也不能完全责备他们。甚至从我们的主人们正在石窟地面上踢来踢去的、从画壁墙面上掉下来的许多残片中取一块显微镜样片,都能在我

们返回后得到分析,并产生大量的有关早期中国化学、物理学和画家技巧的重要详细结果。^①

考察队拍摄完照片之后,回到安西就地解散。柯乐克和汤姆生首先骑马离开安西东返;翟荫和溥爱伦决定先前往新疆游历,然后返回北京;时达、石天生、王近仁等人都愿意跟随华尔纳乘皮筏子漂流黄河,直到通往北京的铁路起端包头。

华尔纳之所以想出来漂流黄河的主意,是因为他认为这种走法比经过陕西、河南更快些,比坐马车走在滚热的黄尘土路上也更舒适些。他们从兰州乘皮筏子,沿着黄河,经过鄂尔多斯等地,直到包头,然后从包头乘火车,于1925年8月回到北京。

翟荫和溥爱伦到新疆后,主要在乌鲁木齐活动。他们曾计划经喀什噶尔和英属印度回国。1925年9月15日,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吉兰少校(Major G. V. B. Gillan)给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写的一封信中说:

我荣幸地报告,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霍拉斯·翟荫先生和溥爱伦先生从乌鲁木齐寄来的两封信。第一封信的大意是,他们打算来喀什噶尔,如果能获得允许的话,他们将经过列城前往印度。第二封信的大意是,由于季节已晚,他们将经由西伯利亚返回北京,但是希望明年再来这里。

本总领事馆似乎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有关这两位先生的信息。由于他们显然打算于明年来喀什噶尔,所以我非常想

^① Langdon Warner, *Buddhist Wall-Paintings: 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 Fo H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xiii - xv.

了解以下内容：这支考察队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可能走哪条路线，是否应该批准他们提出的经列城前往印度的请求。若能明示，则不胜感激。^①

1925年11月20日，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Sir Ronald MacLeay）给吉兰写信答复如下：

我谨通知您，我们收到贵馆暑期1925年9月15日的第18-D号公函，主题是关于美国公民、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队员霍拉斯·霍荫先生和溥爱伦先生计划经列城道进入印度的申请。作为答复，谨通知如下：本公使馆不知道任何与该考察队的目的或其大致行进路线有关的情报。

您无疑知道，印度政府特别关注非英国人民从北方进入印度领土之事。考虑到缺乏与这支考察队的目的有关的情报，究竟是否应该批准该考察队成员有可能向您提出的要求走列城道进入印度的请求，恕我不能发表看法。

我的意见是，如果此类申请通过有关申请人所在国家的授权机构直接呈交给印度政府，那才是比较正确的程序。^②

此前吉兰已将霍荫和溥爱伦申请去印度的情况提交给了在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外交与政治部，该部于1925年10月26日致函在斯

①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吉兰致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公函，抄件藏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收藏品部，原印度事务图书馆外交与秘密档案，IOR, L/PS/10/1018。

② 1925年11月20日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吉兰公函，抄件藏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收藏品部，原印度事务图书馆外交与秘密档案，IOR, L/PS/10/1018。

利那加的英国克什米尔驻扎官伍德(J. B. Wood),征求他的意见。1925年11月9日,伍德给英属印度政府外交与政治部部长布莱伊(D. de S. Bray)写了一份备忘录,全文如下:

关于哈佛大学霍拉斯·翟荫先生和溥爱伦先生计划经列城前往印度的备忘录。

参见印度政府外交与政治部署期1925年10月26日的D. 2920-X号批件。

由于列城道在运输与供应方面的困难,又由于下一个旅行季节计划前往拉达克的游客人数已满,英国驻拉达克联合专员认为,他无法满足申请者的要求。而且,如果申请人获准走这条道路旅行,那么联合专员就无法向三名英国官员提供运输和物资供应,这三名英国官员已经申请批准他们在1926年经列城去中国突厥斯坦旅行的计划。因此,我建议拒绝申请人提出的经列城进入印度的请求。^①

这样看来,翟荫和溥爱伦定于1926年来新疆考察并从新疆进入印度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考察。考察队想大规模剥移敦煌壁画的计划完全化为泡影,想拍摄、研究敦煌千佛洞壁画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关于这次考察队在时间上的损失,陈万里在《敦煌千佛洞三日所得之印象》一文中说:

^① 1925年11月9日英国克什米尔驻扎官伍德致英属印度政府外交与政治部外交秘书备忘录,抄件藏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收藏品部,原印度事务图书馆外交与秘密档案,IOR, L/PS/10/1018。

至五月二十日到敦煌目的地。同行诸人所欲期望于千佛洞能居留三阅月者,不想因华尔纳君故,仅能住三日,且每日往返八十里,其确实消耗于千佛洞之考查时间,每日五小时,三日合计之只十五小时,以费时百余日所获得者惟此,殊非意想所及。^①

而美国人更是从经济上感觉到损失。陈万里 1925 年 5 月 23 日日记中记载道:

车中与汤姆生君闲谈,悉此来所费甚巨,结果仅能游览三日,以所费之数计算往游千佛洞之时间,计每秒钟费大洋四角,若以所费者与所获之摄片数计,则每片代价更属可观。^②

至于华尔纳,这次根本不敢在敦煌露面,虽然他始终顽固地坚持蔑视中国人民的态度,但已在精神上完全垮台,他本人在 1926 年不无感慨地说: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短短的 7 个月时间里,整个中华民族就从沉睡中醒来,并且打了一个可怕的哈欠,吓得我们这些洋鬼子们全都夹着尾巴滚回了我们的公使馆里。^③

从此以后,华尔纳再也不敢到中国西北地区旅行考察了。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附录一:《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第 135~136 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 年 5 月 23 日条,第 94 页。

③ 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pp. 149~150.

十七

导致敦煌县署和安西县署竭力限制美国人考察或摄影的根本原因,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热情的高涨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而1923~1924年第一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从敦煌剥移壁画、拿走彩塑的行为则更进一步地促使了甘肃人民的觉醒。陈万里在1925年5月20日(阴历四月二十八浴佛节,这一天是敦煌月牙泉庙会)日记中记录了他在敦煌警佐陆某的陪同下游览月牙泉时陆某告诉他的一件事:

席散,闲谈片时,偕陆君进城。途中陆君告我前任陆县长卸任后,行至新店子为人民所截留,非取还华尔讷所剥离之画壁不可,经陆君驰回敦煌,邀去绅士数人,始得和平了结。因此杨县长对于此番外人游历,颇为郑重,况镇道叠有密令,不得不如此云,余唯唯。^①

人民的觉悟,由此可见一斑。而人民对待前敦煌县县长陆某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后任者在处理外国人考察敦煌事件时的政策。陈万里在《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一文中曾说:

俄人所居之洞,毁坏更甚。据闻当年新疆白党,蠢蠢欲动,杨督遣送来甘。甘省当局以敦煌偏在西南,交通阻隔,易于防范,乃居留之于千佛洞,于是俄人寝食于斯,游憩于斯,而一部分之壁画遂受其蹂躏矣。我深不料,敦煌人民,何以今日能拒绝华尔讷君西来,阻翟荫君诸人居留千佛洞,而于俄人之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20日条,1926年,第92页。

举动,竟若是其愤愤也?^①

实际上在俄国人居留敦煌千佛洞时,敦煌人民和以周炳南为代表的一些敦煌官员就已经表现出积极保护文物的意识。

1928年1月6日,凯乐从波士顿给斯坦因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告诉斯坦因一条重要的信息: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从赛克斯小姐那里收到什么消息了。说句老实话,我在给像她和您这样的人写信的时候总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我无法回报从你们那里榨取的东西。我最近在纽约碰见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家伙。不幸的是我把他的名字完全忘记了。他刚回到美国不久,他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据他说,假如兰登·华尔纳和包括您在内的其他人胆敢返回敦煌的话,那你们就会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声称,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是敦煌人现在有异常狂热的情绪;您本人、伯希和和其他人将他们的东西拿走了,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使他们愤怒不已。想一想他们被激怒的样子真觉得可笑,他们根本不懂那些东西,对那些东西也没有任何兴趣,你们把那些东西转移走了,竟也会惹他们生气。不过,也有可能是向我提供信息的人把事情搞错了;再说,无论如何您也不会打算再去敦煌吧。^②

凯乐在这封信中转达了敦煌人民针对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人拿走敦煌文物而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但他本人竟觉得敦煌人民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附录一:《敦煌千佛洞三日所得之印象》,第144~145页。

^② 1928年1月6日凯乐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的这种愤怒情绪是“可笑”的,让他感到“可笑”的理由是“他们根本不懂那些东西,对那些东西也没有任何兴趣,你们把那些东西转移走了,竟也会惹他们生气”,这理由才真正滑稽可笑,不值一驳。至于凯乐在纽约碰到的那个向他提供情报的人究竟是谁,因为凯乐本人忘记了姓名(也许他不愿意说),所以我们今天无从查明。从凯乐对他的介绍以及他给凯乐提供的信息来看,此人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他和凯乐从1928年起相识,二是他曾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三是他在1928年返回美国,四是他对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人的敦煌考察比较了解。据我推断,具备这些条件的美国人只有一个,他就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出生于华盛顿,不满周岁时随父母来中国,12岁时从中国去瑞士和英国受中等教育,在英国中学毕业后于1920年回到中国,先在上海的英商安利洋行(Arnold Brothers and Co., Ltd.)任职,不久就转到英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任星期周刊编辑。1926~1927年间,拉铁摩尔在新疆朋友潘季鲁的邀请下和新婚妻子先后来到新疆考察。1928年,拉铁摩尔首次返回阔别了28年的美国,此后仍然对中亚考察感兴趣并最终成为西方的中亚研究权威。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斯坦因手稿时,曾发现一封拉铁摩尔于1931年致凯乐信的抄件,主要内容涉及到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当时正在进行的中亚考察,从这封信中的语气上看,拉铁摩尔与凯乐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因此可以断定,间接向斯坦因、华尔纳等人发出的警告声音来自拉铁摩尔。华尔纳从1925年起就再也不敢到中国西北旅行,斯坦因在筹划、实施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时也千方百计地避开河西走廊,都与此不无关系。

十八

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之所以在敦煌、安西一带

未达到预期目的,除了当地群众在保护文物方面的觉悟提高这一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以陈万里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地方官府的影响。由于陈万里在组织美国考察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华尔纳后来对于陈万里一直怀恨在心。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第一封信中就对陈万里加以指责:

除了夸张的金钱神话以及王道士没有和村民们分享他的巨额财产这些原因之外,我相信还有一些麻烦可能是一个被称为陈万里博士的人引起的,陈万里博士是我从北京大学带来的。北京大学的人乞求我们让他随我们同行,尽管我不大愿意带他一起来,但是最后我想通了。我觉得,如果北京大学的人想要派一个间谍来监视我的行动,那我就带他一同旅行好了,这样可以让他们看明白我的诚心善意;如果北京大学的人派来的并不是间谍,那带着这个人也没有任何坏处。据翟荫告诉我说,陈万里博士从来也没有真正地相信过我们会遵守诺言,即不移走任何宝藏的诺言,直到最后时刻,他还是态度冷淡,充满疑心。当我和考察队会合后,当全中国都在排斥外国人的消息传来以后,陈万里博士的奶奶也在北京病得快要死了,于是他离开了我们,火速赶回沿海地区(还得由我来出钱)。从那以后,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讲述他是如何随洋人进行惊人冒险的;他硬是捏造说,我的那些年轻助手们怀有卑鄙可耻透顶的动机。^①

华尔纳在1938年出版的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的报告书《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的“绪论”中又以比较温和的语

^① 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气攻击了陈万里：

在北京大学的郑重恳求下，在最了解形势的一些外国人的建议下，我让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一位职员陈万里博士加入了我们的考察队，他的任务是途中致力于为我们的利益服务，并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帮助我们译解铭文题记。当我们到达该石窟的第二天，他便坚持要火速离去，说要赶回北京，要在他祖母的病床前服侍；我们此时发现，我们自己因此而变得好像是严重丧失活动能力的跛子一样。我恳求陈万里博士再多待一段时间，至少有足够的时间指出重要的题记，并试图提供它们的年代，结果徒劳。于是，我很不情愿地将我最快的骡子车给了他，还派我最好的车夫送他，给他发了薪水，还送给他额外的一笔钱，足可使他能加快行程，赶回沿海地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因为当我返回北京以后，他怎么也不肯来见我。不过，我在回来的路上，的确偶然发现他的急促并不能太令人相信，急促并没有妨碍他在兰州逗留了14天，还在凉州逗留了10天，在他途经的另一座城中逗留了一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之间曾经达成协议：在西行道路上发现的任何重要文物都应该交给我，以供哈佛学院选购。但是我遗憾地要说，在他同考察队待在一起的时间里，他瞒着我买下了一件佛教写本，据信年代属于公元6世纪，写本中有4幅罕见的插图，画的是四大天王，也许是这一类绘画中在中国现存最早的作品。他竟将这件写本卖给了北京图书馆，我获准在北京图书馆检查了这件写本；我承认，由于高兴地看到这件写本现在恰好已经在它应该待的地方，我对失去这件写本所产生的遗憾感也大大地得到了缓减。

我们并没有能够利用陈万里博士的服务。我之所以要提起他，是因为他在民族主义势力上升到最高峰的时期出版了

一本书,讲述他的冒险旅行。他在书中解释说,他之所以要与美国人合作,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目的,即记录美国人的行为,防止他们的劫掠。更有甚者,他不辞辛劳地试图使人们对我们的考察队的性质产生怀疑,他的这种方法也许值得我表示断然否定。

陈万里博士刚走,我们便发现载着沿海各城市排外骚动新闻(甚至有所夸大)的电报飞到了这片突厥斯坦的边境之地。旧中国一去不复返地死掉了。我们到处都不受欢迎,我们很难得被人民容忍宽容,我们的使命也很少能得以完成。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失去了惟一的一位汉学家,的确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如果陈万里博士有胆量再和我们多合作几天的话,那么这本报告书便会更有意义。^①

华尔纳对于陈万里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他说陈万里在东归途中长期逗留于凉州、兰州等地,显然也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本书所附陈万里的《西行日记》可以为证。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全中国各行各业掀起反美浪潮之际,陈万里也于1951年针对华尔纳的指责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事实》(后改题目为《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该文全文如下:

在这各处控诉美帝暴行的愤怒声中,我想把我一九二五年亲身遭遇到的一件美帝文化侵略五史暴露出来,让大家看看美帝是怎样一副可耻可恶的面目。

^① Langdon Warner, *Buddhist Wall-Paintings: 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 Fo H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xiii ~ xv.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有一天马叔平、沈兼士两先生约我去谈话，说是福开森的介绍，有一批美国人要去甘肃敦煌考察，北京大学可以设法派人同去，所以两位先生颇希望我能同他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一批外国人到敦煌去，是捣什么鬼的。因为敦煌的国宝被斯坦因、伯希和一班文化侵略者捆载而去了不知多少，我们不能不密切注意。两位先生站在爱护国宝的立场上来鼓励我督促我，我非常感动，所以当时虽有许多亲友不赞成我西行的，我却一无顾虑答应下来。

那一批考古团的主持者是华尔讷(Langdon Warner)，他在一九二四年曾经去敦煌调查过，此番是大规模的组织了一队，前往考察。据说停留在敦煌的时间，需要半年。队员中有翟荫，是代理队长，因为华尔讷留在北京尚有一段时间，调查队便先出发，他随后赶去。队员除翟荫外，有溥爱伦(此人后来在北京多年，说是研究戏曲)，时达(摄影员)，汤姆孙，石天生(医生)等五个美国人，此外有一位姓王的翻译，和三个工友。

离开北京以后，我先从王姓翻译那里，知道了华尔讷在第一次去敦煌的时候，曾经盗窃过几幅壁画，确是事实，因此我就时时注意他们的行动。同时在我们的大车行列中，果然有一大车的布匹，我等时时警惕我所负的任务。本来我从北京出发时候，已经知道华尔讷的行径，我们决定应该密切监视，设法防护。个中情形，当时除马、沈二先生外，只有马夷福(马叙伦)先生知道。

后来经过了相当时间(在旅途中)的注意，知道这一次调查队的惟一目的，就在大规模的完成上次华尔讷所试验过的剥离壁画工作。队中的汤姆孙，就是担任这个工作的专家。而主要的壁画对象，即是伯希和所编的一二〇洞，想要把这整个洞里所有的壁画粘去。这是多么可怕的行动呀！所以我到

了兰州,到了肃州,以及到了敦煌的目的地,一一先与地方当局接洽说明,并研究我们如何保护国宝的方法。结果调查队原拟在千佛洞停留半年的计划,不为地方所允许,即以华尔纳之剥离、破坏、盗窃,为惟一拒绝他们的理由。当时调查队人员,自然无法掩护他们上一次不名誉的行动,也只好接受了这个限制,而且仅仅几天的游览,还要每天来回,不得住宿,因此调查队就决定游览了三天,离开敦煌,一二〇洞的宝贵壁画,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

调查队经由新疆回来,我以使命已经完成,就一个人单独循原道先期回京。

这件事,到今天相隔已二十五年了,我们一直保守着这段故事,因为在已经一贯的亲美、崇美、恐美底反动政府之下,这与他们维持所谓“传统的中美友谊”是不能相容的。可是华尔纳后来知道了那次所以失败的原因,见到了叔平先生,就大肆咆哮。据说回到了美国以后,碰到有人提起敦煌的事,还非常地愤怒。从这一件事实里,深深可以了解到美帝的文化侵略是多方面的。在一个以考古为掩饰的假面具之下,就露出了帝国主义者狰狞的面目。所以,我们在今天抗美援朝的高潮中,揭破他们的丑行,实在是必要的。^①

正是由于陈万里设法阻止了福格艺术博物馆大规模剥移敦煌壁画的阴谋,所以他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文物保护历史中值得称颂的人物。

^① 陈万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事实》,原载《新观察》,第2卷第1期,后转载于《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1期(1951年1月31日出版),第73~75页,改题为《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这里据《文物参考资料》转载的文章录文。

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的失败,以及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关系的破裂,还在另外一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从王近仁那里得知详情后,利用这一机会,挫败了华尔纳力主的与北京大学合作的方案,设法使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单独合作,最终创建了哈佛燕京学社。聂崇岐在《简述“哈佛燕京学社”》一文中谈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起源时说起一件事:

(赫尔)遗嘱执行团在美国选上了哈佛大学,在中国看中了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得到这笔款项,就行动起来,一九二四年,它派久居上海的美国流氓华尔纳先做探路工作——去敦煌千佛洞“考古”。这个流氓到达后,一方面收买庙祝,送了七十两银子的“香钱”,一方面就将一部分壁画连同泥皮剥下来,装运回国,这种盗窃勾当,引起当地人民很大愤慨,纷纷向县公署质问,弄得县知事十分狼狈。第二年初,华尔纳又来了,还组成一个小型的“敦煌考古队”,并且为了奠定将来合作基础,通过福开森,要求北京大学派人参加,于是由研究所国学门商定陈万里偕同前往。据陈氏所写的《西行日记》所载,华尔纳因故晚发,他的助手翟荫带“队”先走。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了敦煌,可是这次“考古”,很不顺利。地方当局鉴于去年华尔纳给招致的麻烦,对这个“考古队”表面上虽然十分客气,骨子里却很不欢迎,借口困难,予以种种限制。而华尔纳虽然随后赶来,也没有敢去千佛洞。这群洋盗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只带着一些照片回去交差。没想到华尔纳的失败,却给司徒雷登造成机会。

本来赫尔遗嘱的一切情形,司徒雷登是有所闻知而且打算染指的。但是由于燕京大学成立不久,美国人知道它的不多,不如北京大学之名声赫赫,难与之相争,所以只好放弃前去争取的念头,可是心还是不死的。

恰巧有个燕京大学学生叫王近仁的,曾做过华尔纳的译员和事务员,在一九二五年秋,“敦煌考古队”解散后,返校复学。司徒雷登从王近仁处知道了华尔纳在千佛洞的盗匪行为以及和北京大学合作“考古”的失败情形,于是就下起手来,先辗转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奏汾,由教育部知会外交部,以华尔纳的违反国际法行动为题,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这件抗议虽由美国政府敷衍了事,但哈佛大学觉得太不光彩,既不满意华尔纳,也不高兴北京大学。司徒雷登乘此机会,赶回美国,极力活动,结果完全成功。一九二八年春,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①

其中关于司徒雷登通过中国教育部知会外交部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抗议华尔纳违反国际法一节引起我们关注,但是就此问题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有关资料。对于聂崇岐的这一说法,我们现在还无法证实。我们目前只能证明华尔纳此后和司徒雷登之间的关系很不融洽,譬如司徒雷登在对待华尔纳等人支持斯坦因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一事上始终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再譬如华尔纳 1932 年 12 月 6 日从哈佛大学给斯坦因写的信中所说的一件事:

自从您离开之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经到这里来过好几次。尽管他以前和这里关系密切,但他却一直小心翼翼,总是避免造访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地下室。我确信,他隐约知道我对他有看法,我怨他竟和北京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串通一气。^②

^① 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中华书局,1962 年,第 71~72 页。

^② 1932 年 12 月 6 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据我们分析,曾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官员的聂崇岐所说应该有所依据,不会是捕风捉影。但聂崇岐写作时中国仍在反美高潮中,文章里夹带有感情色彩或夸张成分也是可以谅解的,譬如文中将华尔纳说成是“久居上海的美国流氓”就与事实不符。总之,这一说法还需要寻找档案材料来加以证实。

十九

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的失败,使华尔纳在中国名声扫地,迫使他决定开始“新生活”,不再去中国西北考察。1925年华尔纳从中国返回美国哈佛大学后不久,就给萨克斯写信,说他下一步的打算是“做学问”^①。从1926年到1938年,可以说是华尔纳一生中的“做学问”阶段。这十二年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个时期,主要为了“做学问”的目的而定居在坎布里奇镇,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和少量研究生上一些与东方艺术有关的课程,他主讲的课程是哈佛大学课表上的美术第17号课“东方艺术”,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亚洲艺术专门人才。

华尔纳在这段“做学问”的日子里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斯坦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前文说过,华尔纳早就对斯坦因崇拜不已,而斯坦因也通过凯乐的介绍在1924年就对华尔纳的敦煌考察工作有所了解。但是,华尔纳与斯坦因之间的直接通信则始于1926年。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首先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给斯坦因写了第一封信,主要段落如下: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34.

我们共同认识一个人,他就是波士顿的卡尔·凯乐。在凯乐的建议下,我现在冒昧给您写信。他告诉我说,您很想知道敦煌在过去几年间的状况如何。您对敦煌石窟的生动描述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代表哈佛学院福格艺术博物馆研究那些壁画,于是我在1924年12月访问了敦煌。由于装备不足,我只在敦煌逗留了十天。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检查被伯希和编号为120N窟(285窟)的那个六朝洞窟里的最早壁画,还检查了一两个比较重要的唐代洞窟。两年以前,有大约四百名俄国骑兵被监禁在那里,那些洞窟显然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这些俄国骑兵在阿年科夫将军的带领下,被布尔什维克追赶到这边来了;布尔什维克劝说新疆省都督将他们拘禁起来。在一些最精美的佛教壁画上面,到处都刻画着他们的部队番号和他们的姓名。因此,我就说服您的老朋友王道士,使他允许我剥下来三方唐代壁画残片,并移走一尊彩塑泥像,我对此毫无良心上的谴责。关于那尊彩塑泥像,我最近已经著文发表,并且将一册论文给您寄到大英博物院。我剥下来的壁画残片大小不一,大者长两英尺,小者长半英尺,是从已经部分被毁损的画壁上挑选的。我相信,无论是您,还是您的保护神玄奘,都不会怪罪我的汪达尔主义行为。

仍然保存下来的可用于研究的材料实在太多了,而且范围广阔,种类繁多;所以我决定在次年再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察,在当地至少逗留六个月的时间。当我离开敦煌石窟和敦煌县城的时候,我相信我的声望还特别高。敦煌县的县长请我吃饭喝酒,敦煌县的名流举行仪式送我上路。完全出于偶然,我特意将我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县长,我还告诉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敦煌卷子,剩下来的一些敦煌卷子显然全被俄国人拿走了。第二年,我又返回,带着一全套照相器材和四名

帮手,打算拍一些详细的照片,以补充伯希和教授出版的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和图版。顺便,我还特别希望能获准移走更多的一些壁画,将一个小窟室中的壁画全部移走;为了使所有的学者都获得益处,我本打算在北京将它重建起来,只为哈佛大学保留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残片。由于我在途中有一些急事要办,所以我就不得不先派我的考察队去敦煌,先我几个星期,他们由我的朋友霍拉斯·翟荫率领。进入甘肃境内以后,他们感觉到当地官员们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翟荫多次给我写信打电报说,他发现他绝对有必要以我的名义并以他本人的名义做出保证,保证我们不移动任何东西。当我后来赶到甘肃各地时,我也向同样的官员们做出了同样的保证,真让人感到懊悔。当我到达安西县的时候,翟荫迎接了我,他给我带来的消息是,他们在敦煌时遇到成群结队的人们围攻骚扰,他们还被禁止前往石窟。面对着巨大的困难,他们说服当地官员允许他们对石窟寺连续访问三天,但晚上不能住在石窟寺。卫队一直监护着他们,他们必须得到保护,以免遭群众的袭击。我的县长朋友好像是因为允许我拿走大量珍宝而被撵走。他的继任者也因为没能将我擒获(不管是死是活)而被驱逐。可想而知,现在的县长简直吓得两腿打哆嗦。我竟然还想再访敦煌,那不是白日做梦吗。他们领着翟荫看了整个山坡,说是我把石窟寺给炸毁了。那一年发生了干旱和局部饥荒,我也得为此负责任,说是我使用闪光灯拍摄照片惹得神灵大为震怒。……事情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以至于翟荫不得不撤退到安西县,在那里等我到来,以便向我发出警告。我急不可耐地要奋勇前进,但是他们最后劝我说,如果我出场了,将会使事情变得更坏。您对敦煌的访问,伯希和对敦煌的访问,以及我本人对敦煌的访问,现在都被夸张为大规模的盗匪抢劫队伍;所有的外国人现在都是嫌疑犯。正在此时,来自

沿海地区的一封封电报打到这里，无限夸张地描述了英国人在上海开枪杀人的事件，这更是火上浇油，事情搞得一团糟。我知道，您一定会责备我，说我不够机智老练，说我导致外国人在甘肃西部地区变得不受欢迎。我惟一的辩解就是，不论翟荫也好，我本人也好，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国惹过麻烦；尽管我们一遍遍地自我反省，看做了什么对不起良心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出来，我们没有任何举动应该激起民众的不满。……

我返回时有护卫队监送。途中得以在您的万佛峡石窟逗留了短短的一个星期。我们在万佛峡拍摄了一组非常有意义的照片，可以补充您发表了的那些照片。不用说，如果您愿意使用这些照片的话，它们可以随时为您效劳。如果您不想用它们的话，那我可以从它们中间挑出足够的部分，既有意义，又有质量，可以出一本画册，再配上很少一点文字。在同一地区，我们还考察了另外三组石窟寺，或者已被毁坏，或者已被装修过。不过，在一处遗址里还保留有大约一平方码的六朝壁画。这幅壁画已经几乎被涂抹殆尽了，没有什么大的重要性，只是可以用来证明该遗址的年代。

我们全都急切地等待着大著《亚洲腹地》的问世，也等待着您对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考察成果的问世。我听说，法国人明年保不住他们在阿富汗的考察特许领地了，原因是缺乏资金。我非常希望您有可能对那片犍陀罗故地勘探一番，给您的考古学宝囊里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毫无疑问，福色尔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但是我总是忍不住要想：犍陀罗艺术在整个东方的影响力是否被有所夸大了。

我冒昧地给您寄上有关我第一次敦煌旅行的通俗游记，等我写给福格艺术博物院的报告书发表以后，我当然也会给您寄去。您在收到这本书后不必写信通知我，它只不过是

混饭吃而粗制滥造的小作品，写它的目的是为了引起美国人民对东方问题的关切。

您的宝贵时间是用来进行学术工作的，百忙之中请不必费心答复这封长信。我把这封信看做是一份报告书，您理应得到这份报告书。^①

这是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第一封信。斯坦因收到这封信后，于1927年2月21日从俾路支斯坦的考察营地给华尔纳回信，信文主要段落如下：

您于(1926年)12月26日给我写来了详尽而非常有趣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几天前才寄达我手中的，当时我就在位于俾路支斯坦北部边境的这个地方；为此，我必须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我现在正沿着西北边境省的这片地区进行一次漫长而紧张的考古学考察旅行，因此我在眼下不能给您写去太详细的回信，尽管我非常想这样做。不过，请您务必放心，我确实非常感谢您，因为您能按照我们的共同朋友凯乐先生的建议，给我写来了如此详细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您在千佛洞的经历。您本人应该知道，对您关于自己最后一次在千佛洞的经历的那些叙述，我将怀有多么大的兴趣。

您为了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目的而进行的第二次考察竟被如此愚蠢的阻挠行为所挫败，我确实感到非常遗憾。这种阻挠行为无疑是时代的一个迹象。但是我始终觉得，敦煌人民淳朴虔诚，任何一个挑拨是非的人都很容易利用他们的迷信等方面的心理去左右他们。我在《沙埋契丹废址记》一书中试图说明这种印象，但是大概低估了地方情绪一旦被唤起后产

^① 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生的力量。

我特别感到难过的是,我的老朋友王道士竟也成了牺牲品,而且受到了那样不公正的对待。恐怕他一定会将他遇到的绝大部分麻烦都和我本人对他进行的最初访问联系起来。不用说,对您报告的有关那些俄国难民在千佛洞里造成破坏的情况,我也感到非常遗憾。

我已经及时地收到了您的那篇文章,您在文章中谈到您自己第一次访问千佛洞的情况,还谈到您得以带往安全地点的那件非常有意义的彩塑作品。

您好心答应给我寄一本您的报告书,我当然也非常欢迎。您探索到了其他一些石窟寺遗址,若能从您的书中了解到有关其中残存遗物的某些事情,我将感到非常有趣。我敢肯定,由您本人根据它们出版一本画集将是非常有用的。

《亚洲腹地》的最后几章涉及到我在锡斯坦的工作,我已经在去年12月将这几章交给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这部书的绝大部分已经印好,如果索引等部分的编制工作一切顺利的话,我可以指望这一卷在今年年底发行。

您特别胜任您现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我衷心地祝愿您将来的研究工作一切顺利。^①

这是斯坦因给华尔纳写的第一封信。从此以后,华尔纳和斯坦因之间便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最终的结果是华尔纳会同凯乐等人,不仅促成哈佛大学邀请斯坦因赴美讲学,还促成斯坦因于1930~1931年间代表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哈佛燕京学社进行了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

1927年,日本美术史家矢代幸雄创建东京美术研究所(今东

^① 1927年2月21日斯坦因致华尔纳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前身),要求与华尔纳进行学术合作。1928年2月,华尔纳前往日本,计划去东京美术研究所以及京都、奈良、大阪等地的寺院访问,目的是更深入地研究日本推古时代雕刻,然后在秋季学期开学前返回美国。在离开日本之前,华尔纳和他的朋友翟荫、贝尔等人联合创办了一份东方艺术与考古季刊杂志。华尔纳的老师冈仓觉三曾于1889年在日本创办著名的《国华》杂志,对于介绍亚洲美术(包括中亚敦煌美术)起了很大的作用,华尔纳非常想效法他的老师,在美国办一份英文杂志,旨在向西方介绍东方美术。1928年,由贝尔、华尔纳和翟荫联合主编的季刊《东方美术》(*Eastern Art*)杂志在费城创办。华尔纳去日本之前在为《东方美术》第一卷组稿时,曾经写信向斯坦因约稿。1928年2月7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信,主要段落如下:

我非常明白您现在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您即将出版的大著上面,我也知道您的这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打扰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代表我的朋友哈密尔顿·贝尔和霍拉斯·翟荫给您写信,询问您是否有什么文章或论文愿意发表在一份亚洲研究季刊杂志的创刊号上,我们经过了多年的准备,现在终于可以出版这份杂志了。

您尽管放心,不管您投来的是什么样的稿件,它都会找到很好的伴侣;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欧洲人和东方人,他们答应投稿。稿酬微薄,只是每页5美元的样子。但是我明白,对于这种事业来说,这点稿酬还不算少得出奇。您还可以感到放心的是,杂志的版式、印刷和插图水准都是非常高的。我们的赞助人已经提供了经费,用于支付第一年的费用。

在投稿人名单中(我本人并不掌握这份名单),有斯特里斯戈斯基(*Stryzowski*)、伯希和、劳费尔、宾雍(他在几年前就

答应投稿了)、胡适、关野贞,还有日本、法国、德国、荷兰、瑞典、中国、印度支那和印度的另外十几个人。

从3月份开始到9月份为止,我将住在日本,不怎么参与该杂志的事务性工作,9月份以后也是如此。因此,杂志的通讯地址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费尔蒙特公园,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管理员,霍拉斯·翟荫先生收。

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用不着我向您指出:您的投稿将在许多方面有助于美国的东方学研究事业。在与东方学研究有关的领域里,您的姓名也许在许多美国人所知道的惟一大名。帮助激发我国人对东方学研究的兴趣,其成果是无限辉煌的,因为您知道,我的同胞们对于外国的研究和对于我们自己国家的研究是同样慷慨大方的。我相信,如果您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您将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可喜的反响,其结果也许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给一个大忙人写了信。^①

斯坦因收到华尔纳的这封信后,于1928年5月6日给在日本的华尔纳写了一封回信,可惜这封回信的复写纸抄件无法辨认,不知他如何答复。《东方美术》杂志的第一卷于1928至1929年间出版,但1931年出版了第三卷后便由于经济大萧条等缘故而停办。华尔纳在这三卷杂志上面没有发表文章,翟荫在第二卷上发表了《泾河流域的佛教石窟》一文^②,介绍他在泾川考察石窟寺时的一些考古学结果。

华尔纳1928年在日本逗留期间,还曾计划过与德国勒考克、

① 1928年2月7日华尔纳致给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② Horace Jayne, 'The Buddhist Caves of the Ching Ho Valley', *Eastern Art*, Vol. II, 1930.

俄国科兹洛夫等中亚考察家一起在蒙古高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在从奈良给萨克斯写的信中曾经提到过：

如果我能够将经费节省下来的话，明年2月份我想和冯·勒考克合作一两个月，我们想一起去俄国，去和科兹洛夫以及其他一些正在进行发掘的家伙们一起将断线头捡起来。他们邀请我过去，甚至暗示我可以做一些田野工作，但我们是否能保留发掘物，就没有任何保证了。如果我有把握获准保留发掘物，那我就立刻前往我向往已久的特斯河(the Tess)河谷^①，然后带回一个装满斯基泰铜镜的大袋子，这一大袋子东西足可以让伯希和稳坐在他的教授宝座上。^②

但是华尔纳显然再也没有实现过他的中亚考察愿望。

二十

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是中亚考察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考察实际上是为哈佛大学进行的，而促成斯坦因为哈佛大学进行考察的人则是华尔纳等。关于华尔纳等人拉拢斯坦因的过程，我们在此不便详述，只引几条资料就足以说明。1929年7月25日斯坦因在应邀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举办的花园聚会后，从伦敦给牛津的阿伦夫人写的信中说：

① 特斯河位于蒙古国西北部和俄罗斯交界的地区，上游和下游位于蒙古境内，中游位于俄国境内。

②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44~145.

国王陛下非常亲切地问我是否正在筹划其他的考察,准备去哪里考察!我的回答当然是:我急于要去我经常出没的那个老地方再进行一次旅行,国王的仁慈关怀和垂问将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当我回到这里时,我发现亲爱的兰曼打来的一份海底电缆电报,电报上告诉我说:兰登·华尔纳已经给我写信,他能够搞到钱,给钱的人允许我放手自由地去干,不会用巡回讲演和观光旅游这类事纠缠我!^①

1929年8月18日,华尔纳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给斯坦因写信如下:

我们的朋友凯乐已经将您的第二份电报和您的信以及信中的附寄物交给了我,您附寄的东西是您以前策划的考察方案,不过正如您所说的,它仍适用于作为一次新考察的根据。

我急于要告诉您的是,萨克斯教授已经满怀着他平常就有的那股热情,将这件事包揽在他自己身上,他有指望获得您所提到的经费。当他去向洛维尔校长汇报此事时,他高兴地获知您已经接受了校长的邀请,准备于今年的冬天来这里做一系列洛维尔讲座。不用多说,我对此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将给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和您详细地谈一谈有关旅行诸方面的事情,这事用嘴讨论比用一封信讨论要容易得多。萨克斯教授告诉我说,校长对中央亚细亚考察很热心。对于佛比斯、萨克斯和我本人来说,校长在精神和道义上给予的这种支持将会使我们在获取必要的经费时感到容易得多,哈佛大学是不能够通过挪用学校普通经费的方法来资助这一类考察

^① 1929年7月25日斯坦因致阿伦夫人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的,必须从另外的途径获取经费。萨克斯认为,最好等待几位最有可能捐款的人到来,在9月份之前先不要急着干这件事情;尤其是,他希望能得到他的一位朋友的极有帮助的答复,他的这位朋友现在在美。我们大概在9月份的第三周便能够向您报告实质性的进展情况。同时,我毫不犹豫地私下告诉您说:萨克斯教授和佛比斯先生一旦想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是绝不会半途而废的。

萨克斯和佛比斯想让我告诉您说,只要您来我们这里,那么商谈与大英博物院合作的细节一事将肯定是简单的。不过,假如这种合作化为泡影,我们仍一如既往地希望这次考察能完全由我方维持进行到底。

根据我和馆长们长期合作的经验,我敢向您保证:当您在秋季需要挑选一位随从工作人员时,他们的态度将会是完全通情达理的。您在整理考察成果阶段居住在什么地方,完全由您自己决定,他们的态度也是通情达理的。不过,假如您在哈佛大学看不中一个人或一些人,不认为他们的训练水平和品质足以让您带着他们去野外帮忙,那可真是咄咄怪事。

您只字未提您自己的薪水问题,也未提到将来应该留做出版费用的钱数。很希望您能写来一封信,告诉我您对这两点问题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再转呈给萨克斯,他想立即知道有关这两点问题的情况。

我再重复说一遍,如果您能在今年冬天来这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就您过去的工作和您未来的计划进行直接了解。您将会发现,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是您的大著《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以及您关于克什米尔的大部分著作的热心读者。^①

^① 1929年8月15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抄件藏大英博物院档案处。

同一天,即1929年8月15日,凯乐也从波士顿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建议斯坦因于12月到美国哈佛大学后“便可以同华尔纳先生和萨克斯博士一起深入讨论有关中央亚细亚考察的所有问题了”,并且说“萨克斯博士和华尔纳先生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寻求他们所需要的资助,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功记录是百分之百”,他鼓励斯坦因说“您尽管放心,他们会一心一意地按照您的旨意来做这件事;您将会发现,他们是您生平遇到的最讨人喜欢的和最通情达理的合作者”。凯乐在该信中提出的愿望是:“如果您能再碰上类似敦煌那种事情,并给哈佛大学带回来一些如同我在大英博物院看到过的那么珍贵的宝物,那该多好呀!”^①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凯乐、华尔纳、萨克斯等人拉拢斯坦因的真实目的。

斯坦因于1929年底和1930年初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第一次了解了由佛比斯领导的哈佛大学壁画剥离技术,斯坦因在1930年1月10日日记记载说“佛比斯让我看了他的化学研究:分析颜料、凡利水(清漆)等物”^②。1930年1月13日,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会任命斯坦因为“福格艺术博物馆亚洲研究名誉研究员,任期从1930年1月13日起”^③。1930年春天,当斯坦因为访问中国南京而途经美国时,再次领教了哈佛大学的壁画剥离技术。1930年3月20日,斯坦因和他选拔为第四次中亚考察助手的耶鲁大学地质系研究生米尔顿·布拉姆莱特(Milton Bramlette)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参观了佛比斯和哈佛大学壁画剥离专家乔治·斯托特(George L. Stout)演示的壁画剥离方法。斯坦因在当日记事簿上记载说

① 1929年8月15日凯乐致斯坦因信,抄件藏大英博物院档案处。

② 1930年1月10日斯坦因日记,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③ 1930年1月13日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会办公室秘书致斯坦因任命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他在当日“会见布拉姆莱特,观看佛比斯的壁画处理方法”^①,斯坦因在当日日记里更详细地记载说“佛比斯和斯托特向我们展示他们研究出来的剥离壁画的新方法,直到傍晚6时30分”^②。1930年3月22日,斯坦因以信的方式给布拉姆莱特发布指令如下:

当你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时候,已经多多少少看到了被推荐用来剥移壁画的那种方法。为达到剥移壁画的目的,我在考察时打算随身带上数量有限的一些化学品。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在福格艺术博物馆获得实际操作经验,以便届时能使用这种方法。为了这个学习目的,兰登·华尔纳先生将给你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条件。必需的化学品将不得不由你从福格艺术博物馆带来。至于需要的物品清单,将由我直接转交给兰登·华尔纳先生。^③

斯坦因离开哈佛大学前往中国后,布拉姆莱特遵令到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学习剥离壁画的方法,而且很快就掌握了这套方法,不过华尔纳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似乎不是很大,原因是他在此期间一直住院治病。当斯坦因开始踏上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之路后,华尔纳于1930年8月23日从福格艺术博物馆给斯坦因写信,主要段落如下:

我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浏览了福格艺术博物馆里的“斯坦因文件”,真是引人入胜;我是想通过来往通信中反映的

① 1930年3月20日斯坦因记事簿,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② 1930年3月20日斯坦因日记,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③ 1930年3月22日斯坦因致布拉姆莱特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情况捕捉到您的行踪和所作所为。我本能地意识到,不应该写信打扰您繁忙而紧张的生活,显然我是对的。最初几步棋走得好,您充分利用了您一直具有的精打细算和深谋远虑的本领。我们都希望,最坏困难已经被您甩在了身后。我承认,当我看到迈尔斯·蓝普森爵士的电报时,我感到非常吃惊,心都快要提到嗓子眼里去了;蓝普森爵士在这份电报里告诉您说,中国的古物保管委员会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也提出声明。如果您是和诚实的人打交道,那么我坚信您的答复(不用说您在过去的记录了)一定会使他们安静下来。事实上,我更信赖他们和新疆之间的遥远距离。假如横穿大陆的电报线被切断几个月,那么我就会觉得更安全了。对于在坎布里奇的那两天不愉快时间,我还记忆犹新。此前我觉得有责任在我过高的心愿上泼一盆冷水,于是我说,我相信在中国本土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如果您能在新疆从事您的工作,那么您就是创造了奇迹;当然我完全相信您能。

印度方面同意转借测量员和勤杂工,这是一个大好消息。喀什噶尔的潘季鲁愿意忠实地帮助您,这也使人快慰。潘季鲁一定属于可怜的中国今天急需的那种类型的人才,就好像他父亲潘震在从前一样。我也曾见到过少数几个这种类型的人才,只是数量太少了,我珍重对他们的回忆。

我很少见到布拉姆莱特,因为我一直住在医院里。但是萨克斯和斯托特对他把握新问题的那种方式感到很满意。让人高兴的是,斯托特发明的那套野外技巧好像已经达到了可以安全使用的地步。假如一年前说这话,那还不能算是真话,我们还不能对您有多大用处。在以前的几次考察中,假如我在野外工作时使用了这种新化学品,那我本来应该有大量的收获。在我的请求下,罗斯托夫兹格(Rostovtzig?)从耶鲁大学派了一个人来这里,目的是看看斯托特的工作;但是我听

说,若和布拉姆莱特相比,这个人的悟性不太高,对化学品使用技巧的掌握也不够熟练。

我的鼻窦动了个小手术,然后就在今年的春天住医院;出院后大家都满怀同情地告诉我说,我应该去国外转转。但我这人蠢得出奇,当我的一个愿望得到了满足,获准可以在一处还不算坏的隐居地养病后,我就依旧上蹿下跳,东奔西跑。病是养好了,但我发现我仍然对城市的交通感到恐慌,成天提心吊胆;在过去的两年间我一直这样,实际上根本无法真正享受伦敦或巴黎的生活。当我追寻留在记忆中的德文郡的那种宁静之地时,却遭到了奇形怪状的野生大虫们的袭击,罗伊·查普曼·安助斯见到它们时一定会感到欢心,假如他能在蒙古发现它们的骨骼化石的话。于是我仓皇逃离,回到了破破烂烂的福格,坐在我那冰凉的办公斗室里,没有人来打搅我。^①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斯坦因在第四次中亚考察期间由于受到严密的监视,没有实施剥移壁画的机会。

当斯坦因结束第四次中亚考察后,华尔纳于1932年12月6日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给斯坦因写信吹嘘道:

我相信您现在对哈佛学院感到满意了吧。经济大萧条还没有使我们消沉。我们放弃了一切扩张的念头,全都忙忙碌碌地做着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敢肯定它有助于我们修心养性。我自己的工作仍然是:设法加强我们系里的东方艺术力量。我的老朋友矢代幸雄教授这个月要来这里,后半年在这里讲学,我正满怀喜悦地翘首盼望着他的到来。博学的叶里绥(Serge Elisseeff)从巴黎来到这里,讲授日本历史课程,他

^① 1930年8月23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极为热心地给我撑腰。看上去,佛教哲学、汉语、日语和远东艺术真的好像用不了多少年就会终于在愚昧无知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得到尊重和关注。至少我敢夸口说,在选听我的课的那些人当中,绝没有人不了解您的《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和《古代和阗》,没有人不对它们鞠躬膜拜。

.....

我们没有见到老兰曼。他两耳失聪,不便到处走动。不过在去年夏天,他竟公然违背医生的命令,驾着他的单人划艇在河上游荡,直到10月份。我只在大街上碰见他一次,老头子满嘴脏话,说得我心花怒放。不过他在谈起您时,仍充满着无限的爱戴与尊敬之情。^①

在华尔纳等人的联络下,斯坦因与哈佛大学的关系一直持续不断,直到去世时还担任着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亚洲研究名誉研究员一职。

二十一

1928年秋天华尔纳从日本返回美国后,负责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建立远东美术专业图书馆,该图书馆集中了他本人搜集的三千幅拓片和大量的照片等其他研究资料,住在巴黎的汉奸卖国贼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也向华尔纳提供了一批照片。此外,华尔纳在30年代初还帮助费城博物馆、福格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密苏里州坎萨斯城威廉·洛克希尔·奈尔逊美术馆(William Rockhill Nelson Gallery)搜集东方艺术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奈尔逊美术馆的帮助。

^① 1932年12月6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华尔纳于 1930 年前后接受了奈尔逊美术馆顾问的职务,帮助该馆搜集东方艺术品。华尔纳首先建议该馆董事会任命他的朋友罗伦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为该馆东方艺术品部主任。稍后,史克门获得 1930~1934 年间的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北京深造,实际目的是为奈尔逊博物馆搜集文物。1932 年,华尔纳到中国走访古董商,为奈尔逊美术馆搜集购买文物,一直由史克门陪同。由于福格艺术博物馆两次敦煌考察的恶劣影响,华尔纳在中国的处境尴尬。但是,他还是帮助奈尔逊博物馆获得龙门石窟宾阳洞北魏浮雕礼佛图的一部分。

华尔纳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从他的导师冈仓觉三那里听说过龙门石窟,1914 年他又亲自考察过该石窟,他认为其中的宾阳洞北魏浮雕皇帝皇后礼佛图是中国雕刻史上最杰出的作品。由于古物盗窃活动猖獗,这套浮雕作品竟在 30 年代初被不法古董商盗凿,零星残片先后出现在北平和上海的古董市场上。华尔纳认识这些浮雕,知道它们的价值,于是建议奈尔逊博物馆将其中一部分购下,而另外的部分则被曾任第二次福格中国考察团团员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东方部主任溥爱伦购得。关于宾阳洞浮雕被盗以及被美国人购下的情况,溥爱伦曾记录说:

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间,宾阳洞的男女两面礼佛图浮雕人物的头部和身体衣带的碎片,渐在北京古董市场上出现。它们是这样被盗的:龙门附近,虽然有一个小镇在看守,但夜间有人从河对岸涉过半人多深的水前去盗凿。他们将碎石片送到郑州,经古董商收买之后,再运到北京去拼凑起来。……幸亏两个美国博物馆拯救了这些浮雕,那就是坎城的奈尔逊艺术馆,得到了女供养人的一面,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即纽约

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得到了男供养人的一面。^①

奈尔逊博物馆买回的这部分群像被定名为“供养皇后及其侍从”。溥爱伦虽然记载了宾阳洞石雕被盗的情况,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正是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在中国疯狂的文物搜集购买活动,才刺激了中国文物卖国贼们肆无忌惮地盗窃文物。

将龙门石窟宾阳洞北魏石雕运回奈尔逊博物馆是华尔纳在导致中国文物外流方面的一大罪状,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参与从石窟墙上将石雕像凿下的勾当。奈尔逊博物馆将残片运回美国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拼接修复。华尔纳当然不承认他们这一伙人的所作所为是在破坏中国文物,1940年当他看到拼接修复后的浮雕群像照片时给史克门写信说:

如果我们因为买下这些残片而受到批判的话,那么我们在汇集拼接这些残片时所花费的爱、劳动和美元都应该会使所有的批判销声匿迹。这项工作是对中国事业的一大贡献,比本国任何做过的贡献都大。^②

华尔纳在30年代还参加了几次国际性的学术活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35年年底至1936年年初将他拿到美国的一些敦煌艺术品带到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英国人主办这次展览会的本意是向英国国王乔治五世(King

① A Priest,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转引自:王世襄《记美帝搜刮我国文物的七大中心》,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48页。

②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47.

George V) 献礼。乔治五世于 1910 年 5 月 6 日登基, 同年 6 月即封将敦煌文物带回伦敦的斯坦因为“印度帝国骑士(C. I. E.)”, 并在皇宫接见了斯坦因。1911 年 6 月 22 日乔治五世加冕, 1912 年又封斯坦因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K. C. I. E.)”; 斯坦因则在同年将他刚出版的第二次中亚考察游记《沙埋契丹废址记》进献乔治五世, 颇受赞许。1924 年 6 月乔治五世特邀斯坦因参加白金汉宫皇家花园聚会;^① 1929 年 7 月乔治五世又邀请斯坦因参加白金汉宫皇家花园聚会, 席间询问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准备情况并加以鼓励。^② 因此可以说乔治五世是与敦煌文物颇有关联的一位英国国王。1934 年, 英国一批著名的中国美术收藏家为了纪念乔治五世登基、加冕 25 周年, 决定于 1935~1936 年间在伦敦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 将近代以来散藏于世界各国的中国美术珍品会集一堂, 包括中亚敦煌美术品, 再作以学术讲演活动, 使之成为轰动世界的一次盛会。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也认为这是一次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好机会, 于是积极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建议, 国民政府在征得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同意后, 于 1934 年 10 月决定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5 年 11 月 28 日至 1936 年 3 月 7 日,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伯灵顿宫(Burlington House)的英国皇家艺术院(Royal Academy of Art)展出。正当展览达到高潮时, 乔治五世竟于 1936 年 1 月 20 日病逝, 但他的去世并没有影响展览会。据说这次展览会的规模超过以往英国皇家艺术院举办的任

① 1924 年 6 月英国掌玺大臣张伯伦勋爵奉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及王后之命特邀斯坦因于 1924 年 6 月 25 日赴白金汉宫参加花园聚会的邀请片, 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② 1929 年 7 月 25 日斯坦因致阿伦夫人信, 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何一次美术展览会,参观过展览的人数大约有42万人次^①。根据1936年出版的《中国展览会: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间在皇家艺术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纪念目录》^②统计,参展品共有3080件,其中786件来自中国,其余均来自各国的官私藏品,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苏联、美国、日本、土耳其、埃及、印度、朝鲜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240个机构,其中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在所有展品中,出土于中国新疆、敦煌等中亚地区的美术品有大约一百件,包括斯坦因搜集品、伯希和搜集品、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搜集品、科兹洛夫搜集品、华尔纳搜集品等。华尔纳带到英国参展的福格艺术博物馆藏中亚敦煌搜集品数量并不多,计有展品第673号“唐代木雕版印黑色麒麟织品残片”、第675号“唐代敦煌壁画菩萨像残片”、第676号“唐代敦煌壁画菩萨与天王像残片”、第679号“唐代敦煌佛教壁画残片”等。中国学者向达当时正在伦敦研究敦煌学,有机会参观了这次展览,并首次看到了华尔纳搜集品,他后来在《坚决反对美帝勾结台湾蒋匪卖国集团掠夺我国在台文物》一文中回忆说:

一九三五年,我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上看到了华尔纳诸人用上胶竹布粘去的敦煌壁画原脏,一九四二年冬我在敦煌千佛洞又亲自凭吊了被华尔纳诸人所毁损的原来洞

① F. St. G. Spendlove.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in Retrospect', *The Asiatic Review*, Vol. XXXII, Issue 110, April 1936, pp. 313-325.

② *The Chinese Exhibition: A Commemorative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Royal Academy of Arts, November 1935 ~ March 1936,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36.

壁。对比之下,愤慨至极,曾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一篇论敦煌千佛洞的文章,以为这种行为,简直是文化的罪人。^①

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期间,还举办了二十五次与中国艺术有关的公开讲演,讲演者包括伯希和、矢代幸雄、华尔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安特生(Johann. G. Andersson)、郑天锡等十六人^②,其中华尔纳应邀于1936年1月3日在伯灵顿宫做了题为《中国雕塑入门》的讲演,^③讲演稿后来由伦敦的印度学会收在《中国美术及其所受印度影响研究》论文集中。^④伦敦展览结束后,华尔纳在《美国艺术杂志》第29卷上以《伦敦的中国雕塑品》^⑤为题,介绍了展品中的雕塑品。

1936年9月,哈佛大学举办三百周年校庆纪念会,当时世界各国著名机构的名流学者纷纷前往祝贺讲演,其中包括法国的伯希和、中国的胡适等,胡适在会上讲演的题目为《中国的印度化》。

① 向达《坚决反对美帝勾结台湾蒋匪卖国集团掠夺我国在台文物》,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23-24页。

② 那志良《故宫四十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8月第二版,第73-75页;那志良:《沪上寓公,伦敦艺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1980年9月号(总200号)。

③ 普拉默说华尔纳在伯灵顿宫做了两次讲演,见:James Marshall Plumer, 'Langdon Warner, 1881~1955', *Ars Orientalis*, Vol. 2, 1957, p. 635;波威说法相同,见: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48。但根据那志良《故宫四十年》第73-75页上列出的讲演目录,华尔纳只做了一次讲演。

④ Langdon Warner, 'An Approach to Chinese Sculpture', *Studies in Chinese Art and Some Indian Influences*, London: India Society, 1937.

⑤ Langdon Warner, 'Chinese Sculpture at London', *American Magazine of Art*, Vol. 29, March 1936, pp. 156~175.

华尔纳与伯希和、胡适等是旧识，自然位会聆听。华尔纳当时给威廉·詹姆斯写的信中说：

我曾经担心每个人都会大谈历史并且吹大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甚至连科学家们都放弃了对过去的评论，哲学家们也戴上他们最远视的眼镜。中国哲学家胡适庄重并简练地谈论他的国家从印度转借来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是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诠释现在的新方法。我只去听了胡适、姊崎正治和保罗·伯希和宣读的三篇论文。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这位法国大才子说的全是废话，他是东方语言大师，擅长考据；但在上述三人当中，只有他根本提供不出来让人想要再读或回家咀嚼的文章，而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则比他更好。^①

华尔纳在 30 年代做的第三件大事是在 1938 年出版他的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报告书，书名为《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②，由设在坎布里奇镇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华尔纳署的职务是哈佛大学哈佛学院美术讲师、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美术部主任。该书题献为：“谨怀着最热烈的感激之情，将此书献给该石窟的发现者奥莱尔·斯坦因爵士”。

30 年代华尔纳干的最大一件事是于 1937~1939 年间在旧金山筹备一次大规模的东方美术展览。1937 秋，旧金山世界博览会理事会邀请华尔纳组织一次东方美术展览，作为这次博览会的组

① 1936 年秋华尔纳致威廉·詹姆斯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90.

② Langdon Warner, *Buddhist Wall-Paintings: 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 Fo H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成部分,定于1939年在旧金山珍宝岛(Treasure Island)举办。哈佛大学准许华尔纳为此目的请假两年,其间由密苏里州坎萨斯城威廉·洛克希尔·奈尔逊美术馆(William Rockhill Nelson Gallery of Art in Kansas City)东方艺术部主任罗伦斯·史克门暂时代替他的工作。华尔纳组织这次展览的思路受他的师祖费诺罗萨提出的“太平洋盆地”理论影响,即将远东美术作为太平洋盆地美术的一部分看待,因此将展览会定名为“太平洋文化:太平洋盆地艺术展(Pacific Cultures: The Art of the Pacific Basin)”。1938年春天,华尔纳为了租借展品到东方各国旅行,主要在日本和东南亚活动。由于当时中国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已不可能从中国租借到文物,于是中国美术品部分由欧美收藏的第一流藏品作为代表,主要来自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费城博物馆、奈尔逊美术馆、福格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和英国的珀西瓦尔·大卫收藏品、乔治·尤莫佛普罗斯收藏品。华尔纳这次一共借得1551件展品,来自132个官私收藏机构,代表着构成所谓“太平洋文化”的35种文化;展品的半数以上是远东美术品和东南亚美术品,其中有481件来自日本的50多个官私机构(包括日本及其占领的朝鲜和台湾),是这次展览会上最大的一批租借品。当时日美关系已经紧张,能从日本借得这么多的展品,全靠华尔纳和日本人的密切私人关系。所有展品的目录,也都由华尔纳编制。

1939年2月18日,由华尔纳组织的“太平洋盆地艺术展”作为旧金山世界博览会的四个艺术展之一在珍宝岛开展。展览圆满结束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于1939年学位授予典礼日上授予华尔纳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二十二

华尔纳早年曾留学日本,自然对日本文化情有独钟。但是,当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远东积极扩张、并对亚洲各国形成军事威胁的时候,华尔纳也曾对日本军国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从1913年开始多次对日本威胁中国的行为表示过不满。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华尔纳已经意识到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势必会导致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由于他热爱日本文物古迹,也有很多日本的朋友,为了避免美国和日本直接冲突,曾试图利用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戚关系,从中起到一定的调停作用。

1941年秋,华尔纳曾向他的老朋友、耶鲁大学日裔教授朝河贯一提出过请美国罗斯福总统直接呼吁日本昭和天皇以避免战争的想法。从1941年11月16日到12月10日间,华尔纳与朝河贯一就此问题互相写了很多信。华尔纳致朝河贯一的信现在还没有发现,但根据已经发现的朝河贯一致华尔纳信看,华尔纳曾请朝河贯一起草一份从措辞上讲最有可能被日本昭和天皇接受的罗斯福致天皇信草稿,后来罗斯福总统真的以这封信为基础给日本天皇写了一封信。根据在珍珠港事件前长年担任日本政府顾问的美国人弗里德里克·摩尔(Frederick Moore)在《与日本领导人周旋》一书中记载:

当美国各大报纸的标题已经充满着最浓的火药味的时候,大概在(1941年)11月26日之后的一两天,我的一个老朋友兰登·华尔纳与我联系。华尔纳的本职工作是搞艺术的,和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他甚至也不住在华盛顿;可以这么说吧,他就和大街上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当然,此人智商极高,活动能力很不一般。他长期以来对日本文化非常崇拜,对于那些没有教养的军人将这个国家带入灾难境地一事表示哀叹。战争对他来说就好像是喜怒无常的过家家游戏一样,他给我写信时是这样说的;他还询问我是否认为由美国罗斯福总统给日本天皇直接写一封信可以起到什么作用。我起初的回答

是：“不，我不认为会有什么效果。事态已经发展到太严重的地步。”但是，华尔纳是那种不许别人回答半个“不”字的人。他带着他的这个建议来华盛顿见参议员艾尔伯特·托玛斯(Elbert Thomas)，他发现托玛斯对这个建议的态度比我要好些。托玛斯参议员派人找我去他那里，说他认为我应该问一问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我立即去见野村吉三郎大将，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野村吉三郎大将竟然说罗斯福总统的这个举动很可能会起作用。野村吉三郎大将现在感觉到是在捞救命稻草，甚至两国元首之间的通信现在也成了救命稻草。罗斯福总统得到汇报，同意这样做。于是，在12月5日星期五将这封信发出。只是太晚了。^①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华尔纳的和平梦破灭。美日交战后，美国的一些博物馆为防止不测事件，关闭了日本艺术品部，有关人员都纷纷参军。华尔纳试图利用他的日语知识为美军效力，但因为他虽精通日语，却不谙日本文字，加上年龄偏大，所以未被录用。但他通过其他途径为美国服务，譬如在美国广播电台上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批评当时美国流行的“一个美国佬可以揍扁五个小日本”的轻敌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也反对美国政府将西海岸一带七万名日本侨民迁入美国内地的过激做法，并为这些内迁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多方奔走。战争中期，华尔纳在华盛顿的美军后勤部特种部队师临时任职。后来美军要对军官进行培训，开设日本的语言、日本的近代历史和政治、日本的地理与气候等课程，华尔纳负责日本语言课程，直到

^① Frederick Moore, *With Japan's Leaders*, New York, 1942, pp. 173~174.

1944年4月份。

1943年初,在美国各界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哈佛大学校友们成立了“保卫美国哈佛团体(American Defense-Harvard Group)”,主席是华尔纳的上司、福格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萨克斯。该团体的主要宗旨是保护与拯救全世界面临战争毁灭危险的古迹、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艺术品和其他人类文化遗产。稍后,该团体与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发起的一个类似组织合并为“美国保护与拯救战区艺术遗物和历史遗物委员会(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由于该委员会主席为查史梯斯·欧文·罗伯兹(Justice Owen J. Roberts),故又简称为“罗伯兹委员会(Roberts Commission)”。该委员会的首要工作是将需要保护的文物遗址编列成表,汇集有关资料,编写有关手册,绘制有关地图,然后将它们转交给军方,以便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参考。华尔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日本、朝鲜、暹罗地区的特别顾问。后来,华尔纳又加入盟军发起的“战后保护文物遗址、艺术品和档案项目”,是远东地区专家小组的三位文职成员之一,主要负责编制日本文物古迹保护指南和保护地图,将不宜轰炸的文化名城(包括京都和奈良)在空军用地图上标明。

当然,华尔纳的本职工作仍旧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部主任和东方艺术讲师,他在大战期间的工作虽然以战时任务为主,但也偶尔从事与艺术文物有关的工作。大战期间,美国大资本家格兰威尔·温斯洛普(Grenville Winthrop)死去,遗嘱规定将他搜集到的一大批东方艺术品和西方艺术品捐赠给哈佛大学,其中包括一件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北宋初十二头观音像

绢画。^①华尔纳于1943年负责将这批艺术珍品从纽约市转运到哈佛大学,并在福格艺术博物馆负责监督对这批艺术品的编目、整理和展览。这批艺术品使福格艺术博物馆一跃而成为美国研究东方美术的重镇之一。

二十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病逝,副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继任为总统。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遭到日本政府拒绝。随后美国决定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包括原子弹轰炸。美军在选定原子弹轰炸目标时,最初选定的是日本军事工业重镇京都,但后来考虑到京都是日本古都,历史遗迹和艺术宝藏众多,而且周围还有奈良等文化名城,所以后来将京都从空袭轰炸的名单上删除。8月6日,美国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8月9日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战败投降。

由于华尔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担任的特殊角色,导致了战后初期的日本人编造了一个“救星神话”,认为华尔纳是京都、奈良等城市免遭美军原子弹轰炸破坏的“救星”。日本人的这种信念是何时形成的,又是如何形成的,难以考定;但一般认为是华尔纳的朋友矢代幸雄捏造出来的。矢代幸雄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一直坚

^① 关于这件敦煌绢画的情况,参见:Kristin A. Mortimer,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Cross River Press Ltd., 1986, No. 24;王冀青、莫洛索斯基《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第126页。

持研究佛教艺术和敦煌美术,据他后来在《日本美术的恩人们》^①一书中自供,他是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据他说,他曾从占领军教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那里了解到“罗伯兹委员会”以及华尔纳在该委员会内扮演的角色,并将他听到的这些消息传播出去;结果,在1945年11月,日本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拯救日本城市的所有功绩都推到了华尔纳的身上。尽管矢代幸雄后来也试图做进一步的解释,但已无济于事,从此以后这种“救星神话”在日本逐渐传播开来,并一直被广泛接受。华尔纳本人得知这一说法后,感到哭笑不得,他对矢代幸雄无中生有的传言感到很不满意,曾反复地特别声明:美军之所以未轰炸京都、奈良,并不是他的功绩;如果说真有人拯救了京都和奈良的话,那人应该是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而矢代幸雄则认为,如果是麦克阿瑟决定不轰炸京都、奈良,那肯定是因为他采纳了文职顾问的好建议,而提出这种建议的顾问只能是华尔纳。实际上,真正将京都从轰炸名单上删除的人既不是华尔纳,也不是麦克阿瑟,而是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上校(Colonel Stimson)^②;至于奈良,美国人从来没有将其列为轰炸目标。

美军占领日本后,华尔纳被任命为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高级技术顾问,负责艺术与文物古迹保护。1946年3月,华尔纳为此目的从美国来到日本东京。但他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在他的老朋友斯托特手下效力。由于“救星神话”的作用,他在日本时到处都被当做英雄受到隆重的欢迎,这使他感到很难堪,也很生

^① 矢代幸雄《日本美术的恩人们》,东京,新潮社,1961年。该书的英文书名直译为《日本美术之友》(*The Friends of Japanese Art*)。

^②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1947,转引自: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68。

气。美军报纸《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记者曾采访过华尔纳,问他对“京都和奈良的恩人”这一称法有何感想,华尔纳只是笼统地说有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起过作用,他只是其中的一员。华尔纳在日本时给秘书写的一封信中提到过有关的情况:

一批又一批的人闯进办公室来,找乔治·斯托特谈话,或者找我谈话,一般情况下是找我们两个人谈话。每一个人都要谈好长时间,每一个人都要提起那个老掉牙的“救星神话”(连我现在都对这个神话坚信不疑了)。那个神话是:我一个人将京都和奈良从轰炸中拯救了出来。我的程式化答复套语是:“那是政府的政策,由麦克阿瑟将军执行,任何文职人员个人都没有责任”。可是那些人总是要将一切事情都推到某个人的身上。^①

华尔纳这次在日本逗留了大约半年时间,和斯托特一起负责战后日本文物保护工作。斯托特战前是化学家,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文物修复室主任,也是华尔纳剥离敦煌壁画时使用的那种方法的发明人;美国参战后从军,战后先在欧洲任文物、艺术品、档案保护技术专家,后转往远东,以美国海军少校军衔负责日本和朝鲜的文物保护工作,手下人几乎全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培养出来的人,包括罗伦斯·史克门、詹姆斯·普拉默等人,他们的职责是负责记录战争和军事占领给日本文物造成的破坏,防止进一步的破坏,并且确定掠夺文物赃物的收藏地点和安全情况。华尔纳在日本和朝鲜逗留了大约半年时间,领着一帮人到处调查,其间与梅原末治等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合作,保护并修复了一大批日本

^① 1946年华尔纳致秘书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170。

官私文物收藏品。1946年8月中旬,华尔纳离开日本回国。回国前夕,日本昭和天皇于1946年7月接见华尔纳,一方面是对华尔纳在保护日本文物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嘉奖,另一方面是为了请华尔纳在美军处置属于皇室财产的帝室博物馆和正仓院藏品时加以关照。

1946年秋华尔纳从日本返回哈佛大学后,继续从事他的教学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挪威政治家、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列(Trygve Lie,1946~1953年在任)建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尔纳对这种态度表示支持。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参战。从6月末到7月初,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问题吵吵闹闹,最后做出美国率领“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决议。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华尔纳在1950年夏天给友人威廉·詹姆斯写的信中说:

我们每天收听一次广播,每天中午收到当天的报纸;我们通过这些媒体完全知道令人沮丧的朝鲜战况,也听到卑鄙可耻的联合国吵骂声。特里格夫·列建议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我发现我本人欢迎列的建议。我非常讨厌华盛顿那种心胸狭窄的小家子气,他们看待事物的态度很固执,不惜以牺牲全人类的价值为代价。^①

种种迹象表明,华尔纳本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新中国抱有比较公正的态度,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中国人民并不了解华尔纳的政治态度,此后也不会因此而原谅华

^① 1950年夏华尔纳致威廉·詹姆斯信,转引自: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199~200。

尔纳过去从中国敦煌等地拿走文物的行为。

1950年,华尔纳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退休,但校方允许他缓离一两年,使他得以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地下室办公室里整理档案、处理藏书。1950年和1951年,华尔纳先后在波士顿洛维尔研究所和檀香山艺术学院(Honolulu Academy of Art)讲授“日本美术”一课,讲稿于1952年出版,书名为《日本的不朽美术》^①,可以看做是华尔纳毕生研究日本美术的心血结晶。1951年4月5日,美国政府公布《对日和约》,该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为了庆祝美、日结束战争状态,日本政府于1952年决定次年在美国各地进行一次日本绘画与雕塑巡回展览。为了从日本各地国宝中挑选展品,美国方面成立了“日本绘画与雕塑展览品遴选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of Selection for the Exhibition of Japanese Painting and Sculpture)”,由华尔纳、弗利尔美术馆馆长阿其巴尔德·温莱(Archibald Wenley)、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部主任溥爱伦三人组成;日本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委员会,由华尔纳的老朋友矢代幸雄、细川护立等组成。展品首先由日本委员会挑选,然后由美国委员会确定,年逾七旬的华尔纳为此目的于1952年最后一次访日本,共选出国宝级绘画品77件,雕塑品14件。但这次长途旅行损害了华尔纳的健康,1953年1月25日,当日本绘画雕塑展在美国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正式开展时,华尔纳却因身体不适而被迫取消了原定在开幕式上发表讲演的计划。

1955年6月9日,华尔纳因病在坎布里奇镇去世,终年74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从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全国各界到处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并阻挠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行径,华尔纳、翟荫、溥爱伦、史克门等美国人过去在中国进行

^① Langdon Warner, *The Enduring Art of Japan*, 1952.

的文物劫掠老底也被重新提起,华尔纳作为美国对华文物劫掠的“带头大哥”,在几乎所有声讨文章中都被痛斥一番。如果套用一句中国人过去常用的话来讲,华尔纳确实是在中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离开人世的。

二十四

华尔纳去世后,如何对他“盖棺定论”,便成为学术界内外的一个问题。美国人曾出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华尔纳的生平传记或研究论著,其中主要包括:本杰明·罗兰德(Benjamin Rowland)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杂志1955年12月号上发表的《兰登·华尔纳(1881~1955)》一文^①、普拉默在《亚洲美术》杂志1957年卷上发表的《兰登·华尔纳(1881~1955)》一文(附华尔纳发表论著全目)^②、西奥多·波威于1966年出版的《通过信件看到的兰登·华尔纳》一书^③、西奥多·波威在《美国传记辞典》撰写的《兰登·华尔纳(1881年8月1日至1955年6月9日)》一文^④等。通观美国人写的这些传记,可以看出他们对华尔纳的评价完全是持褒扬态度的,譬如西奥多·波威说:

① Benjamin Rowland, 'Langdon Warner, 1881-195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December, 1955.

② James Marshall Plumer, 'Langdon Warner, 1881-1955', *Ars Orientalis*, Vol. 2, 1957, pp. 633-637.

③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xii + 225.

④ Theodore Bowie, 'Langdon Warner (Aug. 1, 1881-June 9, 1955)',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Supplement Five, 1951-1955,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7, pp. 729-730.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华尔纳都是一位开山鼻祖:他曾赴远东的偏远角落进行发掘;他开拓了一些以前从未被涉及过的研究领域;他最早在美国教授东方艺术史课程;他帮助至少四座美国博物馆建立了亚洲艺术部;他培养出了整整一代教师、管理员、专家和收集家。^①

这基本上可以代表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学术界对于华尔纳的评价。另外,美国人给华尔纳写的传记中,明显带有“为亲者讳”的倾向,不利于华尔纳的材料不用,不利于华尔纳的事件不提。最权威的波威著《通过信件看到的兰登·华尔纳》一书甚至连所引信件的日期都不愿意公布,使欲寻觅华尔纳在中国西北足迹的读者如坠人九霄云雾之中。

日本人在评价华尔纳时,主要考虑的是他对待日本文化的态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保护日本文物古迹方面担任的角色。日本人将华尔纳誉为日本文物的保护者,甚至曾拔高为京都、奈良等文化名城的“拯救者”。据说,早在1946年,当华尔纳还在日本东京任职期间,每天早上都有许多不留姓名的人将一束束鲜花摆放在他的办公室门外。^②华尔纳死后,日本人在奈良法隆寺主院西侧立起一座高五层的五轮塔,这座石质小塔前有一块石碑,碑上用英文和日文刻着“纪念兰登·华尔纳(In Memory of Langdon Warner)”的字样,这是日本人第一次为西洋人建塔,也是惟一的一座为西洋人建立的五轮塔。1958年6月9日,奈良法隆

① Theodore Bowie, 'Langdon Warner',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Supplement Five, 1951 ~ 1955,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7, p. 730.

② James Marshall Plumer, 'Langdon Warner, 1881 ~ 1955', *Ars Orientalis*, Vol. 2, 1957, p. 635.

寺法主为华尔纳纪念塔揭幕,参加揭幕仪式的美籍人士有富田小次郎夫妇、罗伦斯·史克门、霍华德·霍里斯(Howard C. Hollis)、詹姆斯·普拉默等,普拉默发表了简短的颂词。无独有偶,在附近的樱井村儿童公园里,也立着一件华尔纳纪念塔复制品,建塔资金首先来自一位贫苦工匠捐出的微薄积蓄和打杂工挣来的钱,随后引来大约 30 位村民的捐款,建塔的目的是为了“让下一代的孩子们缅怀这位美国学者,是他将京都和奈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中拯救出来”^①。这些事件都反映出华尔纳的“救星神话”曾长期在日本民间流行。华尔纳热爱日本文化,再加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确实为保护日本古迹文物出过力,所以日本人在战后一度绝望的心态下对他产生感谢之情,甚至夸大他的作用,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褒贬。

中国人民在评价华尔纳时,当然与日本人过分赞誉华尔纳的情形相反。可以说中国人民向来将华尔纳完全否定,并打人“强盗”之列。我们试翻检一下 50 年代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等杂志,以及此后中国出版的一系列敦煌学著作,便很容易找到一篇篇“控诉状”。同样一个人物,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是常有的事情,在中亚考察家的评价方面更是如此,但在华尔纳身上却显得格外突出。面对如此不同的评价,西奥多·波威曾为华尔纳辩解说:

据闻,美国著名东方学家亚历山大·索波(Alexander Soper)曾说过:华尔纳在日本人心目中是圣徒,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恶魔,其理由都是完全不真实的。日本人将华尔纳描述成保护神,中国共产党人将华尔纳说成是强盗,都不对。华尔纳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p. v, 209.

为日本所做的事情,是使全世界了解并热爱日本的古代文化。华尔纳试图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是想唤醒她,使她能为自己的佛教文物感到崇高而自豪,是想帮助她将自己的佛教文物从无人管理、遭人盗窃、被人遗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①

波威涉及到中国的辩解词显然是苍白无力的。所谓“华尔纳试图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是想唤醒她,使她能为自己的佛教文物感到崇高而自豪,是想帮助她将自己的佛教文物从无人管理、遭人盗窃、被人遗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只不过是西方学术界老生常谈的一面之词。我们通过学习中亚考察史和中亚考古史,知道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格伦威德尔、勒考克、鄂登堡、华尔纳等大大小小数十位考察家在将中国西北文物从原地移往西方时,都是以“拯救”这些文物为理由的,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所谓“拯救”的结果反而促使了对中国文物更严重的破坏。中国人民之所以长期否定华尔纳,主要是因为他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这种打着“拯救”的幌子将大量中国文物运走的活动,造成了中国文物外流的严重恶果;这一桩桩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因而中国人民咒骂华尔纳并非没有理由。但在所有的中亚考察家中,中国人民似乎显得更加痛恨华尔纳,这大概与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存在着反美的情绪有关,大概也因为华尔纳长期被误认为是使用不良手段将敦煌壁画从墙壁上剥走的惟一外国人。

我认为,中国学术界今天在评价华尔纳时,首先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还是对其加以谴责。华尔纳和其他所有在近代劫掠过中国文物的外国考察家一样,都是造成中国文物流失的魁首,都是剥夺中华民族拥有并享受本民族文物权利的罪人。文物凝聚着民族历史文化的魂魄,中华民族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热爱自己文物、最珍惜

^① 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p. v.

自己历史的民族,只是到了社会发展落伍、学术凋敝的近代,才在列强侵略、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丧权辱国,赔款割地,最终竟连自己的文物也无力保全,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大辱。随着新中国的逐渐强大,今天的中国有识之士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一个连本民族的文物都不能保护并拥有的民族,谈不上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将来不论发达到什么地步,如果连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文物也得靠别人代为保管,那这个国家还是无异于丢魂落魄的空躯壳。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会原谅那些将本国或本民族的文物肆意掘毁、席卷而去的外人,这一点绝不应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从道义上讲,作为中华民族精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包括华尔纳在内的西方中亚考察家们劫掠中国西北文物的行径进行谴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依鄙人愚见,即使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即使充分承认了这些考察家在学术上的建树和在社会活动中的贡献,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只要中国和中华民族没有消失,他们都将无法摆脱中国学者的谴责。中国学者对他们的谴责并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而更重要的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历史阶段和侵略势力。中国学者谴责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争取到中华民族对流散到海外的本民族历史文物的所有权和保护权;只有各有关国家和机构承认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权利,才有可能抚慰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的伤痛,才有可能缓解中国人民的不满情绪。

我们在满怀民族感情谴责包括华尔纳在内的所有西方考察家掠夺中国西北文物的行径时,对他们行为性质的评价基调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两个次要的问题,第一是在不改变对他们的评价基调的前提下,站在国际学术的高度对他们各自在科学上的建树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贡献充分加以肯定;第二是应该站在具体分析的角度,对他们之间的差别加以注意。现在,

中国学者在评价各中亚考察家的时候,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两点。对于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考克、格伦威德尔等大考察家在科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已基本肯定;而且还根据他们对待中国人和中国文物的态度,对一些比较温和的人物(譬如最终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斯文·赫定、反对勒考克无限制地剥移新疆文物的格伦威德尔等)和另一些比较顽固的人物(譬如拒绝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斯坦因、谩骂中国学术界的安助斯等)有所区别。就华尔纳这个人而言,其人其行的本质和其他所有西方考察家是完全一致的,他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傲慢无礼的,这些应该受到谴责;但华尔纳从中国拿走的文物无论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都不如上述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他最遭痛恨的劣迹是剥离敦煌壁画,这也是承袭了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先例;这些也都应该指出来。华尔纳在学术上的贡献当然无法与上述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相提并论,但他在美国首先开设亚洲佛教艺术的课程,对于西方人了解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为保护亚洲文物(尤其是日本文物)做了许多工作,这些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事情。

最后,我想再向读者说几句多余的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近现代西方各国的中亚考察家在回国后,往往都要撰写并出版自己的游记。无论是将它们当做文学作品看,还是将它们当做历史著作读,这些游记都是很有价值的,都必将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的遗产永存下去。游记的生命应该建立在真实记录的基础上,但是也应该认识到,所有为出版而写的游记都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由于各种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其中必定会出现错误,会隐瞒许多作者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实。近代外国考察家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的中亚考察,尤其是考古学考察,都涉及到中国科学资料和文物的外流等重大问题,有关考察家们在自己的游记中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或者隐瞒真相,或者歪曲事实,或者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

通过十余年来将中亚考察游记与未刊档案资料相对照,已经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更有甚者,几乎所有的游记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中华民族的误解和污蔑。华尔纳撰写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等著作当然也不例外。如果学者仅依据考察家们的游记来研究他们的活动,或着评价他们的行为,那可能会得出偏颇的结论。如果一般读者在阅读游记时不带着批判的眼光,而是完全被书中的情绪或观点所左右,则更容易误入歧途。近代的中亚考察运动的确为充实人类的知识宝库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中华民族又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因此,中国的读者在阅读这类游记时,应该和西方读者怀着不同的态度。

1999年5月草于兰州大学

附记:

我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来不及拜读姜洪源、魏宏举两位先生的译稿。因此本文在引用华尔纳著《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的部分段落系我根据原著自行翻译的,译文风格可能和本书所收译著正文的风格不尽相同,特此说明。

译后记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的名字,早已为许多中国人知晓了,但他当时自北京取道洛阳、西安、兰州到敦煌揭取莫高窟壁画的详细过程,除了敦煌学专家、学者外,恐怕很少有人了解。早在1926年由美国纽约花园城出版社出版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是华尔纳在1923年第一次率福格中国考察队赴敦煌后写成的考察记,记录了此行自始至终的详情。尽管多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华尔纳来华考察问题时,曾引用过该书英文版的部分内容,但国内尚未见到中译本。

蒙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的鼓励并惠赐该书的英文原著,我们不揣浅陋,将它翻译了出来,为了使读者详尽地了解华尔纳来华活动的一些更多情况和背景,我们将华尔纳在1925年第二次率福格中国考察队考察安西榆林窟的研究报告《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也翻译了出来。该报告是第一部榆林窟研究专著,在敦煌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我们将它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华尔纳第二次考察的同行者,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的《西行日记》,对研究华尔纳第二次来华考察,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也是很少见到的当时由中国人写的西部考察探险著作,我们也将它收入本书,作为附录二。

译文由荣新江和南开大学陈海涛两位先生审核斧正;荣新江先生的序和兰州大学王冀青先生的长文《华尔纳与中国文物》,为本书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学术研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杨镰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的出版,并将此书收入《西域探险考察大

系》中；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敦煌吐鲁番北京资料中心中国美馆员、甘肃档案学校马春兰讲师等同志提供资料等多方面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译本第一至九章，附录一的五至八章由姜洪源翻译，第十至十五章，附录一的一至四章由魏宏举翻译。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译 者

1998年7月27日

编译说明

一、本书是宿白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中的一种，执行主编由荣新江担任。

二、本书主体部分《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6)以及附录一《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Buddhist Wall-Paintings: 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 Fo H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由姜洪源、魏宏举译成中文，由执行主编荣新江统稿。

三、本书的三幅地图及图片均采用《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原版书中的图片。

四、本书主体部分《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的注释均为译注，附录一《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的注释均为原注。